

季羨林传

臧克家·题

蔡德贵·著



国内唯一一本得到季羨林先生首肯的个人传记
季羨林生前最后一位学术助手 蔡德贵
倾十数年之力写就《季羨林传》

国内唯一授权

著名诗人臧克家生前亲笔题写书名，国学大师饶宗颐倾情作序

这两年，季羨林先生因病住在三〇一医院，我每年都去看他。他非常博学，每次谈起来，对我都有很大的教益。中国像他这样的大师，可谓人中龙凤，所以我非常尊重他。在今年的谈话中，他对我说，和谐社会除了讲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还应该讲人的自我和谐。我说，先生，您讲得对。人能够做到正确处理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正确对待荣誉、挫折和困难，这就是自我和谐。后来，我们俩谈话的大意，写进了十六届六中全会文件。

——温家宝（2006年11月13日，在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同文学艺术家谈心）

《季羨林传》序

山东大学蔡德贵先生撰《季羨林传》，来书要我写一篇序文，我是万不敢当，亦万不敢辞；在踌躇和耽延的交织心态之下，几个月不敢下笔。首先让我表示一点歉意。

从我肤浅的考虑，常见的学问家，可能有下面几种类型：一是才士型，一是辩士型，还有探险家型，或者是会计师型。才士型胜处在紧抓问题，入情入理，但易流于感情用事，接近文学家。辩士型长于辨析，鞭辟入里，每每播弄词说，有如哲学家。其他一是比较大胆，有究元决疑的缜幽疏证精神，另一则谨慎、扎实，喜欢校勘、统计，好像核数师。这几种类型有单纯的，亦有复杂的，有的一人只能属于某一类型，有时一个人亦可同时兼有其中一二者。我不欲举出何人属于哪一类型，让读者自己去思考或遴选代表人物。

我所认识的季先生，很难说是上面的哪一类型。他是一位笃实敦厚，人们乐于亲近的博大长者，摇起笔来却娓娓动听，光华四射。他具有褒衣博带从容不迫的齐鲁风格和涵盖气象，从来不矜奇、不炫博，脚踏实地，做起学问来，一定要“竭泽而渔”，这四个字正是表现他上下求索的精神，如果用来作为度人的金针，亦是再好没有的。

要能够“竭泽而渔”，必须具备许多条件：第一要有超越的语文条件，第二是多彩多姿的丰富生活经验，第三是能拥有或有机会使用的实物和图籍、各种参考资料。这样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随便做到的，而季老皆具备之；故能无一物不知，复一丝不苟，为一般人所望尘莫及。

“竭泽而渔”的方针，借《易经·坤卦》的文句来取譬：真是“括囊、无咎、无誉”，又是“厚德载物”的充分表征。多年以来，季老领导下的多种重要学术工作，既博综，又缜密，放出异彩，完全是“海涵地负”的具体表现，为中华学术的奠基工程做出人人称赏的

不可磨灭的劳绩。有目共睹，不待我来多所置喙。这本传记的刊行，对于从学者的鼓舞，从而带起严正、向上的学风，一定会“不胫而走”，是可以断言的。

目录

第一章 齐鲁厚土

一、抹不掉的母爱 3

1. 是传记，不是故事 3
2. 命运 4
3. 降生 6
4. 季家的第一个“偶然” 8
5. 好景不长 10
6. 多想吃顿“白的” 12
7. 第一个老师和小伙伴们 15
8. 母亲的面影 16
9. 难忘母爱 18

二、故乡童趣 20

1. 运河文化的产儿——临清 20
2. 五样松的骄傲 23
3. 临清的历史文化名人和风土人情 25
4. 这里的黄昏真像一首诗 28
5. 听老牛喘气，看洞里的兔子 30
6. 母亲养的一条狗 32

三、济南多出一个会玩耍的乡下孩子 34

1. 骑着毛驴进济南 34
2. 神怪老人 35
3. 到老庙去玩 37

4. 终于有了三只兔子 38

5. 叔父和婶母 40

6. 童蒙难启 42

7. 想当绿林好汉 46

8. 开始对英语感兴趣 48

四、山东大学附属中学的“四连冠” 50

1. 初中只能考正谊 50

2. 鞠思敏老师 53

3. 王妈 54

4. 海棠花和夹竹桃 58

5. 送礼的小插曲 61

6. 山东大学附属中学 62

7. 一年的临时亡国奴 66

8. 再上高中 68

9. 业师胡也频、董秋芳 69

10. 课外爱好 72

11. 娶了个贤妻 74

第二章 京华岁月

一、面临选择：上北大，还是上清华？ 79

1. 告别高中 79

2. 到北平考大学 80

3. 高考照样潇洒 82

4. 鱼与熊掌，何去何从？ 84

二、水木清华 86

1. 充满诗意的清华园 86

2. “拖尸” 89

3. 学业 90

4. 获益于选修课 93

5. 广泛的兴趣 97

6. 政治活动 98

三、师与生 101

1. 师生之间 101

2. 和老师的交往 103

3. “四剑客”的学友情 108

4. 孤独的宿舍生活 110

5. 为未来忧愁 111

6. 永远感谢清华 113

第三章 初尝人生

一、择业 117

1. 毕业即失业的现实 117

2. 谁是幸运儿? 118

3. 终于拿到了饭碗 119

二、济南高中 121

1. 初为人师 121

2. 如履薄冰 124

3. 提心吊胆 126

4. 为“拿到了没有”焦虑 128

5. 离别济南高中 129

第四章 德邦十年（一）

一、初离故土 135

1. 离愁袭心头 135

2. 离家赴京 137

3. 别故国 141

4. 异域之旅 142

5. 红都停泊 145

6. 波兰女孩 146

二、从柏林到小城哥廷根 149

1. 柏林小住 149
2. 趣话和洋相 151
3. 强化口语训练 156
4. 小城哥廷根 157
5. 房东欧朴尔夫妇 160
6. 初识章用 163

三、主修梵文、巴利文 166

1. 又一次选择 166
2. 哥廷根大学的梵文研究室 168
3. 主课梵文和副课 169
4. 去听诗 172
5. 林中撷趣 175

四、哲学博士 177

1. 紧张的学习生活 177
2.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 179
3. 交换期满，有国难回 183
4. 在汉学研究所当讲师 185
5. 确定博士论文题目 186
6. 获哲学博士学位 188

第五章 德邦十年（二）

一、战争地狱 195

1. 法西斯点燃的战火 195
2. 饥肠辘辘 198
3. 尝试回国 201
4. 成为无国籍者 203
5. 盟军轰炸 204
6. 世外桃源 206

7. 羡慕人的牛肉罐头林 207

二、吐火罗语 210

1. 又一次偶然 210

2. 山林中的学术沙龙 214

3. 博士后的学习生活 216

4. 学问三境界的逐一超越 218

三、德国恩师们 221

1. 博士父亲恩重如山 221

2. 西克教授 225

3. 西克灵教授 227

4. 布劳恩教授 228

5. 冯·格林和其他教授 230

6. 程门立雪的好弟子 231

四、德国普通人 234

1. 难忘欧朴尔太太 234

2. 伊姆加德和她的家 236

3. 反战者伯恩克一家 239

4. 蘑菇山洞与转折中的众生相 243

第六章 重归故土

一、尝试回国 249

1. 邂逅中国青田商人 249

2. 去汉诺威办签证失败 252

3. 依依惜别情 255

二、滞留欧洲 258

1. 揖别哥廷根和德国 258

2. 瑞士弗里堡暂住 260

3. 弗里堡的外国新朋友 262

4. 与使馆的一场经济斗争 266

5. 转赴法国马赛 267

三、漫长的船旅漂流 270

1. 尝到了被骗的滋味 270

2. 看到红海之“红” 271

3. 排除了险情 273

4. 在西贡闻到了家乡味 274

5. 香港印象 278

四、回归祖国 280

1. 船到上海 280

2. 转赴南京 283

3. 结识臧克家 286

4. 到达北京 290

第七章 沙滩足迹

一、创办东语系 293

1. 北大红楼 293

2. 东语系系主任和教授 299

3. 创业者的同伴——马坚和金克木 303

二、翠花胡同 305

1. 这里是东厂遗址 305

2. 马缨花做伴 308

3. 回济南省亲 310

4. 清苦与快乐 313

5. 迎接解放 314

6. 东语系得到扩大 317

7. 第一次出访 319

8. 院系调整 322

9. 背上沉重的“原罪”十字架 323

三、与师友和北大同事的交往 327

1. 为陈师寅恪送栅栏红葡萄酒 327
2. 抬杠会长郑振铎和大胡子冯友兰 330
3. 矛盾人物胡适 332
4. 老舍的白煮肉和沈从文的汽锅鸡 334
5. 忠厚长者曹靖华和抒情诗人冯至 337
6. 画家吴作人和佛学家汤用彤 340

第八章 燕园春秋（一）

一、院系调整迁到西郊的北大 345

1. 这里曾是“万园之园”的一部分 345
2. 蓝旗营公寓 349
3. 东语系正常平稳发展 352

二、经历运动 356

1. 从艺术界开始的运动 356
2. 不是阴谋，而是阳谋 358
3. 运动中的东语系和季羨林 361
4. 入党 363
5. 反右，反右 365
6. 劳动的乐趣 369
7.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371
8. 报春的燕子——雷锋 374
9. 社教中的心路历程 375

三、春满燕园 379

1. 人生百味 379
2. 朗润园 13 号公寓 382
3. 团聚的一家人 384
4. 在家中上早班 385
5. 到外文楼去上上午班 388
6. 午后的学术和其他活动 391

7. 从南国吹来的春风 393

8. 琅琅书声 398

第九章 燕园春秋（二）

一、“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 403

1. 风暴前奏 403

2. 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大灾难 405

3. 情形不妙 410

4. 自投罗网 411

二、“牛棚”岁月 414

1. 在完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 414

2. “牛棚”里的八个月 418

3. 失掉笑的人 422

4. 劫后余生 425

三、灾难并没有结束 427

1. 生活上的煎熬 427

2. 武斗不断升级 429

3. 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 431

4. 成为“资产阶级权威”的典型 433

5. 西府海棠含冤、古藤萝遭殃 436

四、《罗摩衍那》的诞生 439

1. 高等学府即将变成文化沙漠 439

2. “文化沙漠”在扩大 444

3. 二月兰笑对春风的启示 446

4. 恢复“闲不住”的习惯 448

5. 找回失去的笑 451

第十章 燕园春秋（三）

一、北京大学副校长的宝座 457

1. 灾难终于结束 457

2. 春归燕园 459
3. 出任副校长 462
4. 忙里偷闲著华章 464
5. 仍是普通人 466
6. 原则面前人人平等 469

二、笔耕的快乐 471

1. 不凡的动机——要使人生更有价值和意义 471
2. 续译《罗摩衍那》 474
3. 科研的最佳时段 477
4. 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480
5. 资料的搜集 483

三、像老农而非老农 485

1. 朴厚的“土包子” 485
2. “朴素衣裳常在眼” 489
3. “微有颠意” 寄木石 492
4. 守时的“老农” 性格 495
5. 一把红枣勾起的乡情 497
6. 高山仰止 499

四、永无退休之日 504

1. 桃李满天下 504
2. 博士、硕士研究生 506
3. 进修生和外国博士 511
4. 辞职而不退休 516

第十一章 学界泰斗

一、大杂家 521

1. 杂家成因 521
2. 语言学家 524
3. 翻译家 525

4. 教育家 528

5. 宗教学家 530

6. 民族学家 533

二、中外文化交流 536

1. 印度佛与中国佛 536

2. 西域研究和玄奘情结 541

3. 吐火罗文 A《弥勒会见记剧本》 545

4. 比较文学 547

5. 中外《糖史》 550

6. “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 553

三、新的追求和开拓 557

1. 模糊学与浑沌学 557

2. 对中国文化特点重新认识 561

3. 人学 564

4. 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工作 566

5. 投身于中国文化书院建设 569

6. 出任《传世藏书》总编 572

7. 出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总编撰 573

四、道德文章 576

1. 光风霁月 577

2. 学者散文的风格 582

3. 直面对“我” 587

第十二章 业余生活

一、交友之道 595

1. 与老友臧克家的交情 595

2. 同学加朋友胡乔木 597

3. 同在燕园的昔日清华“三剑客” 599

4. 旧雨新知 602

5. 助手李铮和其他人	605
二、生活情趣	610
1. “养生无术是有术”	610
2. 不断修身养性	614
3. 坐拥书城的快乐	616
4. 猫趣	618
5. 怀旧之情	622
6. 也得念念消费经	624
7. 人生座右铭	626
8. “老表走新时”	628
三、三大洲游踪	632
1. 列国之游	632
2. 印度、缅甸之行	634
3. 苏联塔什干之行	639
4. 西亚、非洲的访问	642
5. 日本的三次出访	647
6. 泰国的皇宫和韩国的汉城（今首尔）	651
四、华夏足迹	655
1. 祖国各地	655
2. 还乡时的快乐	659
3. 燕园之爱	663
不是尾声的尾声	666
附录 季羨林先生著译作目录	671
后记	685
修订版后记	687

引子

对于当代学人来说，季羨林这个名字是太熟悉了。多年来，各种新闻媒体，从山东电视台到中央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从《大众日报》到《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有关他的报道几乎是连篇累牍，他的形象活跃在荧屏上，他的业绩披露在报端。人们这样评价他：兼容百家、学贯中外的学界泰斗，是中国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世界上最著名的梵文学者之一，是一位完全具备知识分子品格的人，他永远是气节的象征。

经常接触季羨林的人，会在他身上发现一种奇特的吸引力，既有学识的吸引力，也有人格的吸引力。英籍女作家韩素音说：“我在他的身上发现的不只是博学，而且是睿智。不仅是睿智，而且还有非常地谦恭有礼和幽默。他的博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可是他是这样地谦虚，可以让人们跟他谈论那些他其实比他们知道得更多的话题。与他谈话，使我感觉鼓舞，而在我们的谈话中，我总是期待着那种时刻，那时他用一个轻轻的笑容，以及在他眼神中的一个轻微的闪动，就会纠正我的一两处说得不合适的地方。”[1]已经去世的中国学者张中行认为季羨林以一身而具有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三种难能之中，我以为，最难能的还是朴厚，因为，在我见过的诸多知名学者（包括已作古的）中，像他这样的就难于找到第二位。”[2]诗人臧克家生前也不无深情地歌颂道：

满头白发，根根记录着你的寿长，
标志着你的业绩受到众多的赞扬。
你兼有诸家的同能；你的独秀孤芳，
有几个能够赶上？[3]

人们还发现，季羨林虽然寡言少语，但学术会上有了他，就会平添几分活跃气氛，没有人会为他的沉默而拘束，在座的人都会分享到

一种熨贴平淡的温暖和宁静，不在乎他说了没有，而很在乎他来了，只要是满是智慧的大额头有几分像寿星的季先生来了，气氛就不一样。[4]

但初次接触季羨林的人，从他身着的半旧中山装，往往会得出他像一个老农的印象。北京大学有一位新生，入学时莽莽撞撞地把他当成了校工，托他代为看管行李。季羨林自己也多次说过，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是一个“土包子”。

两种印象综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谜”一样的季羨林：

是什么力量，使一个农民的儿子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成为名闻遐迩、卓尔不群的大学者？

是什么力量，使一个留学德国十载的学者，没沾染上一点洋味而终生保持着一种朴厚的农民气象？

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的祖国母亲。

我对这两个母亲怀着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5]

爱国情怀是季羨林一生不绝如缕的永恒主题。这情怀使他家事、校事、国事事事萦心，这情怀使他中学、东学、西学学学贯通。成为著名学者是来自于这一情怀的刺激，终生保持农民气象也是来自于这一情怀的刺激。

解开季羨林这个“谜”，对于卑微者来说，他们从季羨林身上能看到自己的成才之路；对于成功者来说，他们从季羨林身上能发现自身的不足。对于任何人来说，季羨林总是读不完的。读不完的季羨林，会给人以很多。

第一章 齐鲁厚土

一、抹不掉的母爱

1. 是传记，不是故事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故事，每个人的故事都有不同。

有的故事富有传奇色彩，高潮迭起，引人入胜；有的故事平淡，无波无澜，枯燥乏味；有的故事幽默，诙谐有趣，叫人发笑，读后却不能给人留下什么；有的故事严肃，寓意深刻，隽永深沉，读后让人回味无穷。

这里要叙述的，是季羨林的故事。这些故事是季羨林一生的足迹，没有任何虚构，完全出自于真实，因此，与其说是故事，还不如把它叫做传记。

怎么来看季羨林的故事呢？

季羨林自己说，自己的一生“没有大激荡，没有大震动，是一个平凡人的平凡的经历”[1]。他自己认为，自己的生活，包括治学经验，都是卑之无甚高论的，比较有点价值的，也许是一些近乎怪话的意见。

但是，我们看季羨林的故事，视点截然不同。他丰富的人生经历，是平淡中有传奇，严肃中有幽默，是一个“非凡人”的“非凡经历”。他的一生，历清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不同的历史时代，正好是 20 世纪的一个缩影。它给我们展现的，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本来命中注定要当农民的，然而靠社会的造就，靠自己始终如一的艰苦奋斗，最后成长为一个国内外著名的学术大师的艰难历程。成才后的季羨林，不谋名利，用自己的所学报效祖国、报效人民。他一生重精神轻物质，具有典型的东方文化丰富的内涵。

季羨林的故事给人们一个启示：一个普通工人或农民的儿子，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完全可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季羨林把自己最重要的经验压缩成两个字，就是“勤奋”。他经常给自己的学生讲鲁迅讲过的一个笑话：一个江湖郎中在市集上大声吆喝，叫卖治臭虫的妙方。有人出钱买了这个郎中的一个纸卷，它是层层用纸严密裹住

的，打开一看，里面写着的妙方只有两个字：勤捉。你说它不对吗？不是，它是完全对的，但是说了等于不说。治学靠勤奋，也是人人皆知的道理，人们都知道，灵感这东西不能说没有，但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勤奋出灵感。季羨林的故事，无一不在证明着这样一个真理。

季羨林的故事还给人们另一个启示：一个成了名的人，只有不图私利，勤勤恳恳为民族、为社会、为国家尽职尽责，不图回报，才能名垂青史；否则，两眼只盯着钱，争名于朝，逐利于市，即使最终腰缠万贯，也只能是一只空躯壳。所以一个人要把精神世界的超升作为一生永不松懈的奋斗目标。

读季羨林的故事，你会发现，它浓缩的是百年人生，再现的是泰斗风华。

2. 命运

当代有很多人热衷于谈命运。

但是，命运到底是有，还是无？是人受命运主宰，还是人能改变命运呢？

有谁真能对此作出回答呢？

孔子，这位齐鲁大地的杰出儿子，就经常矛盾地看待命运。他周游列国，在匡地被困时，明显地表现出相信命运的世界观。面对着困境，孔子相信命运会作出安排，他说：老天若是要消灭文化，那我也不会掌握这些文化了；老天若是不要消灭这些文化，那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2]司马桓魋要加害于他，他又说：老天造就了我这样的品德，桓魋又能把我怎么样？[3]孔子认为，只有老天是了解他的，所以说：“知我者，其天乎！”[4]这都说明，孔子相信有一个有人格意志的天存在，这个天接近于上帝，能在冥冥中操纵和掌握人类的命运，所以，人不仅要信天，也要信命，因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

也”[5]。主张行得通，要听之于命运；主张行不通，也要听之于命运。[6]然而，孔子虽然相信一切都是由天命所决定的，但他并不否定人为努力可以改变命运的安排，因此，人要努力去了解 and 认识天命，天命并不是绝对不可知的，他自称“五十而知天命”[7]，认为知命对于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作为“至圣先师”的孔子，教给我们的，是对命运的一种矛盾态度。

战国时期山东籍的另一个大思想家，人们把他称之为“亚圣”的孟子，也经常谈命运。在孟子看来，天命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当然也是人类的主宰，人的生死寿夭、富贵贫贱以及仁义礼智的善性，都是天命所赋予的。所以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8]天命成了最后的决定者，人类所不能为、不能致的一切现象，都可以归之于天命。国君传位给下一代，不是出自于私人的意志，而是出自于天的命令。因此，君臣关系、君民关系都是由天命来决定，而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但是，天不是直接下命令，而是通过行动和事实来显示。那么，人也就可以通过行动和事实来改变命运，所以，孟子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9]而且，他鼓励人们通过自身，去尽心、知性、知天。可见，孟子对天命的态度，也是模棱两可的。他相信命运，但却不放弃个人的主观努力。

中国历史上有的思想家是提倡命定论的，偶因论的倡导者范缜就是著名的代表。范缜是南朝齐梁时河南籍学者，他在南齐竟陵王萧子良西邸，发表反对佛教因果报应的言论，提出了偶因论的思想。因为范缜盛称无佛，反对因果报应，萧子良便质问他：“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贵贫贱？”范缜的回答是：“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散：或拂帘幌坠茵席之上，或关篱墙落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10]范缜用偶因论驳倒了萧子良的因果报应论，使萧子良无言以对。显然，范缜的偶因论，正是孔子、孟子等儒家天命论的发挥和运用。

如果命定论真能决定人的命运，那么季羨林的命运该是如何呢？

季羨林年轻的时候，曾经相信过命运。在 1934 年 1 月 24 日写成的一篇散文《年》中，在结尾部分说：当我们还没有达到一个目标以前，脚下又正在踏着一块界石的时候，“我们命定的只能向前看，或向后看。向后看，灰蒙蒙，不新奇了。向前看，灰蒙蒙，更不新奇了，然而，我们可以做梦。再要问：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梦呢？谁知道。——一切都交给命运去安排吧” [11]。但是，后来他对命运的理解似乎更为灵活了，命运、缘分、偶然性、必然性，都有其相通之处了。他说：

缘分一词似乎有点迷信。如果我们换一个词儿，叫做偶然性，似乎就非常妥当了。缘分也罢，偶然性也罢，其背后都有其必然性。

[12]

佛家讲因缘，中国老百姓讲缘分。我不是宗教家，但缘分我却是相信的。原因何在呢？原因就是非信不行。哲学上讲偶然性，你能把偶然性说清楚吗？偶然性其实就是除掉迷信成分的缘分。 [13]

这种命运、缘分、偶然性、必然性，被季羨林用几句话就说透了：“按我出生的环境，我本应该终生成为一个贫农。但是造化小儿却偏偏要播弄我，把我播弄成了一个知识分子，从小知识分子把我播弄成一个中年知识分子，又从中年知识分子把我播弄成一个老知识分子。” [14]这几句话看来是那么简单，但是，透过季羨林百年的生活历程，我们会看到，一个农民之子、大地之子，是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始终如一的努力，最后才成为一个名闻遐迩的著名学者的。他的一生，正是凸现了与命运抗争的鲜明主题；他的一生，处处都布满了求索者踽踽前行的足迹。

3. 降生

公元 1911 年，中国农历是辛亥年——猪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极

不寻常的一年。清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宣统即位仅三年，便遭到南方各省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激烈反对。这年的春夏之交，两湖地区的革命党人便在积极准备发动推翻满清王朝的武装起义。秋天，起义的条件日臻成熟。9月14日，中部同盟会联合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成立了领导起义的联合指挥部，决定在中秋节（10月6日）这一天发动起义。只是因为准备不足，起义日期被推迟。10月9日，革命军参谋长孙武在汉口配制炸药不慎爆炸，起义机密泄露，孙武受伤住院，革命党人或被捕，或逃离。10月10日清晨，被捕的革命党人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惨遭杀害，革命形势极端危急。10月10日晚，武昌城内革命党人熊秉坤、金兆龙等四十多名士兵，打死镇压革命党人的反动军官，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打响了武昌起义的枪声。之后，各省革命党人纷纷起义响应，到11月下旬，在当时全部二十四个省区中，已有陕西等十四个省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东北三省和直隶等十个省区在名义上还属于清政府统辖，在这十个省区中，山东是先宣告独立，后又取消。革命领袖孙中山结束了十六年流亡生活，于1911年12月25日（农历十一月初六）回到上海，1912年元旦，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这一天是农历辛亥年的十一月十三日。

几乎和辛亥革命从准备到发动的同时，在山东西部清平县（今临清市）的一个小村庄——官庄，季姓家庭一个年轻而贫穷的农村妇女，在经历着怀孕的痛苦。这一年闰六月，夏天长得难耐而可怕。就在最热的闰六月初八日，这位农村妇女分娩成功，顺利地生下一个男孩。这一天是公历1911年8月2日。

男孩出生的这一天，距离辛亥革命爆发的10月10日仅有两个月的零八天。而正是由于有了这两个多月的经历，严格说应该是“履历”，季羨林常戏称自己是“满清遗少”。不管怎样，这段履历就使他经历了清朝末年的“末”。但是在当时的临清乡间，人们对这种消息一开始是将信将疑的。他们不知道宣统帝溥仪竟会成为满清王朝的

“末代皇帝”。他们甚至对什么是“皇帝”、什么是“朝廷”也并不清楚。因此，乡民们嘴里说起清朝，仍然是肃然起敬地谈论着的北京“朝廷”，而且仿佛皇帝仍然高踞于金銮殿的宝座之上。这也就使小时候的季羨林，并不理解什么是“朝廷”，它是人，还是神？反正是极有权威、极有力量的一种东西。留在他幼小心灵中的清代残影，也不过如此而已。

男孩出生之后十天，叔父家的堂妹紧接着出生，季家是双喜临门，按照当时农村的习惯，男孩被取名为双喜，大名为季宝山。到济南后乳名被简化成喜子，大名改为季羨林。叔父的女儿取名秋妹，这是后话。

季羨林家为官庄村南头。季姓在官庄是小姓，只有几户人家。他们的先祖是春秋时的季文子。官庄周围最大的地方是康庄镇，离官庄很近，是原清平县政府所在地，属原清平县四境中心，地处六路交叉四通八达之衢，是原清平县最富庶的村镇，故名为康庄。而官庄是一个小村，无法与康庄镇相比。季家在官庄又是最贫穷的，用官庄村民们的话来说，连贫农都不是，其地位远在贫农之下。

季羨林的祖父，名字怪怪的，叫季老苔。季老苔兄弟三人，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足不出县，从来没有离开过清平农村。

过去，在山东农村，为了显示一个家族的势力，往往用大排行。季老苔是官庄的小姓人家，更要借助大排行，以壮自己家族的声势。他兄弟三人共生下十一个儿子，这十一个第二代后辈就实行大排行。季老苔膝下有三子，老大季嗣廉，就是季羨林的生父，在大排行中行七。老二季嗣诚，是季羨林的叔父，在大排行中行九。老三行十一，生下不久，就因为实在无法养活而送了人，连名字还没来得及起，就跟着来领养的人姓了刁。十一个兄弟中的其他六人，则因为家贫而被迫下了关东，后来他们都客死在东北，再也没有返回故乡。

季老苔虽非出身于书香门第，但对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还是颇为了解的。他为自己的儿子取名为嗣廉、嗣诚，正体现了儒家的道统，

也表示出让自己的儿子接续道统的殷殷之心。只是名字虽然起得响亮，但两个孩子命苦，只得生活在官庄的小天地里，无法沾上高雅文化的光。因为家里穷，他们俩经常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肚子里咕咕叫的滋味实在难受，便到村南口大户人家的枣树林子里，捡一些掉在地上的烂枣充饥。

季老苔夫妇年龄还不到五十，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剩下两个儿子，孤苦伶仃，只得寄人篱下。去捡掉在地上的烂枣，就更成为家常便饭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季羡林的父亲和叔父渐渐长大，而日子越发难以忍受。兄弟俩一商量，何不到外头去闯荡一下世界呢？

4. 季家的第一个“偶然”

出去闯荡要有路费，可穷得连饭都吃不饱，到哪儿去弄路费呢？

听人说，离清平县最近的大城市是山东省首府济南，那里或许能给人一条活路，而且去济南也是花路费最少的。对，就去济南！

从清平到济南也就有一百多公里旱路，又是一马平川，没有什么难走的山路，兄弟俩几乎没费多大劲，便来到了济南。

可到了济南，问题就来了。两个毛头毛脚的小伙子，纯粹的乡巴佬，到了当时山东最大的城市里，举目无亲，人地两生，也就只有望市兴叹了。他们当时碰到过多少困难，遭受过多少波折，后人谁也不知道。因为碍于面子，父亲和叔父从来也没给孩子们说过。他们觉得太可怕，太悲惨，因此不愿意再揭过去的伤疤，更不愿意让后代人在心中留下那惊心动魄的凄惨阴影。因此这一段历史，对谁也没有讲过。父亲和叔父的善良，于此也可见一斑。

不知熬过了多少个艰难的日子，兄弟俩东奔西跑，拉过洋车，扛过大件，当过警察，卖过苦力，受尽了多少难耐的煎熬。最后，叔父总算在济南立住了脚，虽然哪怕只是像石头缝里的一棵小草，艰难困

苦地挣扎着，但总算有了一条生路。为了保险起见，兄弟俩决定，弟弟继续留在济南挣钱，而哥哥则回家务农，弟弟寄点钱接济。

季老苔留下了很少的几亩地，季嗣廉返乡后就靠这一点地来维持生活。生活虽然艰难，但勉强还过得下去。几年后，他娶了媳妇，媳妇姓赵，不是本村的，而是邻村五里长屯的，家境也很穷，连个名字都没起，嫁到季家之后，就成了季赵氏。她后来就是季羨林的母亲。

在济南的季嗣诚，希望有朝一日能混出点名堂来，即使不衣锦还乡，也得让乡亲们刮目相看，为自己的祖宗争一口气！但是，偌大个济南，穷人要混出点名堂来，谈何容易！他虽然尽力挣扎，终于还是在济南失了业。没混出名堂来，不能光宗耀祖，有何脸面回故乡见乡亲呢？

在走投无路之时，季嗣诚想起了闯关东的六个弟兄，他们能去，自己何不也去闯一闯呢？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他流落到关东，身上一贫如洗，仅剩下了一元钱。可奇迹就发生在这充满希望的一元钱上。他用这一元钱，买了正在东北上市的湖北水灾赈灾奖券。

当奇迹出现时，季嗣诚简直惊呆了。他竟然中了头彩，一下子，3千两白花花的银子到了他的手里。

季家没想到在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当用小推车推着这些银子兑换成的制钱回到故乡时，兄弟俩那高兴劲，任是什么笔墨都形容不出来。哥哥拿出一部分银子，买了六十亩带水井的地。为了炫耀财富，他还要盖大房子。一时买不到砖头，他性子又急，于是便想出一个点子，诏告全村：谁愿意拆掉自己的房子，把砖卖给他，他可以付高出几十倍的砖钱。

这真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村子里有些农户贪图卖好价钱，拆掉了自己的房子，砖头被用来盖季家的房子。

这是季家祖祖辈辈以来最气派的时候：东、西、北房各五大间，大门朝东，是一个典型的农村三合大院。这个大院和周围的低泥平顶

房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按照清平的风俗，在北屋正房屋门的东墙壁上，设了神龛，供奉上了宅神。兄弟俩将东屋作为“配房”，不住人，只作储存室用，有谚说：“有钱不住东厢房，冬不暖，夏不凉。”兄弟俩总算争到了一口气，着实感到神气了。

这成为季家第一次出现的“偶然”，意外之财改变了季家的境遇。哥哥继续留在官庄，守住这十五间大房子和六十亩水浇地，而弟弟有了钱，不再回东北，又到自己已经很熟悉的济南府了。

5. 好景不长

钱这东西，是个怪物。有时得来容易，失去也容易。西晋隐士鲁褒说，一旦有了钱，就能“转祸为福，因败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有“达穷开塞，振贫济乏”的神功，“穷者能使通达，富者能使温暖，贫者能使勇悍”。[15]有了钱，就有了神物，无位而尊，无势而热，宾客辐辏，门常如市。而一旦失去钱，就会使人落魄。《天方夜谭》中有诗说：

我的钱少了
亲友不睬我
我的钱财多
人人亲近我
几许朋友辈
为钱结交我
一旦金钱尽
朋辈撇开我

中外文化背景有差异，但对钱的重视，竟是这样的一致。难怪古今中外有那么多人对钱顶礼膜拜，孜孜以求了。

但是，季嗣廉却不像世人那样对钱重视。他不善于聚敛财富，而是仗义疏财。他属于乡村中朱家、郭解一流的人物。朱家是汉初鲁

人，郭解是西汉河内轵县（今河南济源）人，俩人均以“任侠”而闻名于世。朱家与汉高祖同时，当时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以侠闻。他“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然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惟恐见之。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所以“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16]。郭解则是“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17]，他为人态度温和善良，泛爱众生，帮助和接济陷入穷困潦倒之人，谦虚退让，又不居功自傲。朱家和郭解这般游侠人物，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纳，但当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18]。他俩的事迹在整个鲁西北颇有些影响。季嗣廉虽不能断文识字，但对朱家、郭解故事，却也耳熟能详。他一旦有了钱，便想做这一类游侠式的人物，仗义疏财，忘乎所以。

清平农村有赶集的习惯，一般是五天一个集，没有钱的时候，季嗣廉不敢去赶集，现在手里有了钱，赶集的欲望强烈起来，几乎每集必赶。而一赶集，便显出朱家、郭解的侠客作风。他一时兴起，全席棚里喝酒吃饭的人，也不管是多是少，都请了客，由他来买单。全席棚的人自然都高兴，吃了肉，喝了酒，还不用自己付钱，这可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这样子，慕季嗣廉之名去赶集的人越来越多，请客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了。从此人称季嗣廉为季七爷。他名震四方，可是，天长日久，这样下去，手中积存的那点银子全部花光了，还欠了人家的钱。没办法，六十亩良田被一亩一亩地卖掉，结果还是还不清债。这又得拆新盖起来的房子。东房和北房都被拆掉，卖了砖瓦，只留下了五间西房。这些砖瓦买进时似黄金，卖出时似粪土。想不到钱这东西能呼之即来，也可以挥之即去。一场春梦终成空，季家重又成了破落户。

季羨林出生的时候，家里已经破落得不像样子了。长大后听叔父说起这段往事，季羨林感到十分可笑。但父亲的这种性格，不能说对

季羨林没有影响。后来他到德国留学，有人劝他学保险可以发大财，他对这种赚大钱的行当竟然不屑一顾，这可能就是受到父亲这种性格的影响。

6. 多想吃顿“白的”

季羨林开始记事了，家境也变得越来越穷。旧时，山东农村把用小麦面做成的食品称为“面饭”，只要是吃到一次“面饭”，就算是吃到好的了。季羨林在家，一年最多能吃到一两次“面饭”，所以吃顿“白的”面食，便成了他的最大愿望。

那时候，季羨林家里已经从万丈高楼跌落到了平地，只能常年以红高粱饼子为主食，小孩称为吃“红的”，用玉米面做成的黄饼子，也成为珍品。

季羨林在家里很难吃到玉米面饼子。为吃顿玉米面饼子，季羨林还得想点办法。春夏之交，机会来了。那时青草已经长出来，高粱也长高了。他便去割点青草，或劈点高粱叶，当然都不多，送到举人家的二儿子二大爷家里，用一两个叶子喂他的老黄牛，就赖在二大爷家里不肯离开，等着给奖励。最高奖励，就是吃上一顿玉米面饼子，打一打牙祭，这才兴高采烈地离开二大爷家。

在过年时，家里才能偶尔吃到一次“白的”面食，那时的感觉就像吃龙肝凤髓，甜美的滋味似乎永远也赶不走。多么想多吃上一顿“白的”面食啊！

机会终于盼来了。

季羨林的对门邻居家，住着宁大婶和宁大姑，她们和季家来往挺多，也很喜欢季羨林这孩子。夏天麦收完了，她们俩便带小小的季羨林到村外人家收获过的麦田里，去拾一点掉落在地上的麦穗。不知道跑多少趟，积攒多少次，才能堆成一小堆，这时母亲才能勉强用双手搓出点麦粒，磨成白面，让自己的儿子吃上一顿“白的”。善良的母

亲坐在旁边，看着自己的儿子狼吞虎咽地吃着“白的”，心里又高兴，又难过，可怜的孩子，只能吃到这么可怜的一点面食，她的眼泪直往肚子里咽。面对着可怜的孩子，母亲自己从来不舍得尝一口。

季羨林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母亲高兴地把麦粒磨成了面粉，因为面少，不值得发酵，当时也不会发酵，就在锅里贴了一些没发酵的死面饼子。吃着这白的死面饼子，季羨林很快就进入了角色，吃出味道来了。但吃完了饭，感到还不满足，趁母亲不注意，就又偷了一块。吃着吃着，被母亲看到了，赶着要打他。

当时正值盛夏，小季羨林身上赤条条一丝不挂，看到母亲要打，他跑出屋外。房后是一片有苇子的水坑，他往水坑里一跳，母亲没有法子再追，他就站在水中，把剩下的白面饼子尽情地享受了。[19]儿子在水里笑，母亲站在岸上也笑。

这种如诗如画的风情，每每回忆起来，季羨林总感到回味无穷。

但夏天很快过去，再也没有麦穗可拾了。

季羨林开始动脑筋，要另觅新路了。

季羨林的父亲有一个堂伯父，是一个举人，住在官庄的村北头。方圆几十里最有学问的人是他，做官最大的也是他，据说做到一个县的教谕，主持过文庙祭祀，传授儒家经典、皇帝训诫，教诲所属生员，在清末是县里有地位的人。他对季羨林一家都很好，在生活方面还接济过他们。可他的家是一个大家庭，人多是非多，也顾不了别人那么多了。

季羨林记事时，举人已经去世。举人的太太，季羨林管她叫奶奶。她是个善良而宽厚的人，自己虽有两个儿子，但却非常喜欢这个本家但不是亲孙子的季羨林。

在三四岁的时候，季羨林的家境异常艰苦。家里连买盐的零钱都没有，只能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在锅里煮成咸水，用来腌咸菜。什么酱油、香油，从来是看不到的，季羨林简直不知这些是何物了。一年到头，吃着红高粱面饼子，就着这种苦涩的咸菜，这就叫生活！

看出大奶奶喜欢自己的门道，季羨林每天一睁眼，起来就往村北头的大奶奶家跑。跑到家门口，大奶奶已经站在那儿等他了。他早早跑来是有所图的，而她则是有所施予的。

季羨林甜脆地叫一声：“奶奶！”奶奶这时开始变戏法，只见她把手一蜷，蜷曲到肥大的袖子里面。手再伸出来的时候，就会有半个白面馒头拿在手中了。她免不了再逗孙子多叫几声好的，听几声清脆的“奶奶”叫声，心里乐开了花，白面馒头也就递给了小小的季羨林了。

但是，每次他只能吃到半个馒头，没等真正尝到是啥滋味，馒头已不见了。想再吃，没有了。因为这白面馒头是大奶奶的两个儿子特别孝敬她的。虽然他俩已经独立过日子，每家都有几十亩地，但家口多，生活也不算很富裕。孝敬来的白面馒头，大奶奶舍不得都吃了，每天总要省下半个，留给自己喜欢的孙子吃，于是就有了每天早晨这令人激动的一幕。在六岁离开家乡以前，季羨林记忆中每天最高的享受，最大的愉快，就莫过于吃到这半个白面馒头了。季羨林一生愿吃烤馒头片，这一习惯的形成，就与小时候的这种最高享受有关。

在故乡还有三件事，深深地留在季羨林的记忆之中。这是三件与吃有关的事，至今仍深深地刺伤着他的心。

有一件事发生在一年中秋节，母亲意外地不知从哪里弄了点月饼。她掰了一块给自己的丈夫，剩下的一点给了自己的儿子。季羨林是生平第一次见到月饼，他兴冲冲地接到这一小块月饼，就蹲在院里的一块石头边吃起来。月饼太小，他不舍得大口大口地吃，只是一小口一小口，仔细地、慢慢地品尝着月饼的滋味。他觉得月饼可真是神奇的东西，龙肝凤胆也难以比得上的。母亲只是站在一边，默默地看着心爱的儿子，拿着这一小块月饼，大快朵颐似地享受着，她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儿子不知道母亲在想什么，只知道母亲一口也没有尝。不但是月饼，连其他“白的”，母亲也从来没沾过边，都留给儿子吃了。

第二件事是偶尔吃到的一小块牛肚。这是发生在外祖母家的事。一次，季羨林到五里长屯的外祖母家走亲戚。外祖母家的隔壁邻居，是一家卖煮牛肉的小作坊。农村集市上往往有一些不再能役使耕作的老牛，因退役之后已无别的用处，便出卖给屠户。邻居的小作坊就用极其低廉的价格买下来，用极其野蛮的办法把它杀死，将肉煮烂，然后卖掉赚钱。但是，老牛肉难煮，实在没有办法，作坊主就在肉锅里小便一通，这样肉就好烂了。作坊主对邻居心肠挺好，碰到这种情况，就告诉四邻：“今天的牛肉你们别买！”邻居们心里也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外祖母家也是穷户人家，平常买不起牛肉。外祖母看到外孙来了，又高兴又疼爱，便抱上一个小小土罐子，花几个制钱，去买一罐子牛肉汤回来给外孙喝，也算聊胜于无吧。季羨林是第一次喝这么好喝的汤，那肉香真让他陶醉。喝着喝着，突然罐子里多了一块东西，是一小块带进肉汤里的牛肚！这块小牛肚，自然又成了季羨林的专利。他舍不得一口气吃掉，就找了一把生了锈的小铁刀，一星一点地割着吃，慢慢地、仔细地吃，琢磨着其中的滋味。他感到，这一小块牛肚，真可以同月饼媲美了。

第三件事是吃到另一种“黄的”。“黄的”有两种，一种是玉米面、小米面做成的饼子。这种饼子在季羨林家里也不是能经常吃的东西，但相对来说还是有机会吃的。另一种是黍谷做成的黄粘糕，则一年只能见一次。五岁时，为了能多吃一顿玉米面、小米面饼子，季羨林常给二大爷家打牛草。每当他这个不到三块豆腐高的孩子背着“一大捆”草或高粱叶子，走进二大爷家的大门，便觉得是立了功，“赖”在二大爷家里不走，总能蹭上一顿。年糕——粘糕，就是在二大爷家吃到的，但这种机会很难得，因为只有过年的时候才有这种好吃的东西。季羨林回忆说：

到了过年的时候，自己心里觉得，在过去的一年里，自己喂牛立了功，才有了勇气到二大爷家里赖着吃黄面糕。黄面糕是用黄米面加上枣蒸成的。颜色虽黄，却位列“白的”之上，因为一年只在过年时

吃一次，物以稀为贵，于是黄面糕就贵了起来。[20]

7. 第一个老师和小伙伴们

季羨林家里既非书香门第，家境又十分贫困，但父亲深知文化知识对于后代的重要性。父亲的希望，就寄托在这根独苗苗身上。

大约在四岁到六岁之间，父亲开始让季羨林跟着别人学着认字。

家穷上不起私塾，但邻居家有个把认得几个字的。印象虽然已经有些模糊，但季羨林清楚地记得，他认识的第一位老师，是本村的马景功先生，“功”字有时也写作“恭”。马姓在官庄是比季姓大的姓氏，但也没有什么富裕人家。这位马老师肚子里大概也没有多少墨水，当时没教给季羨林多少知识，甚至连《千字文》、《百家姓》之类的儿童启蒙读物，也没有教过。大概只不过教给他几个字罢了。因为自己的家徒有四壁，在家里既没有一本书，也没有见过带字的什么纸条子，认得的几个字，全是来自马老师。[21]就是教了这几个字，马景功的名字在季羨林脑海里永志不忘。

没有机会进私塾，没有同窗好友。但季羨林有两个很要好的小伙伴，是邻居家的孩子。他俩一个叫杨狗，一个叫哑吧小。杨狗是小名，即是乳名。山东农村起乳名，男孩有以属相干支起的，如小虎、小狗之类。杨狗比季羨林大一岁，是1910年生人，这年农历是庚戌年——狗年，所以名字中有狗字。哑吧小姓甚名谁，已无法确知，只知道因为他是哑巴的儿子，便给了他这么一个诨号。

那时候，三个孩子家里虽然都很穷，但因为年龄小，从来不知什么叫愁苦。夏天来了，是他们最高兴的时候，他们经常光着屁股在一起玩，在村南头屋后的水坑里凫水，捉知了，摸虾，打枣，不见不散，几乎天天都泡在一起玩。

杨狗一直活到上世纪80年代，去世之前仍然是一字不识的文盲。季羨林经常捎点钱接济他。哑吧小听说后来当了山大王，练就了

一身功夫，蹿房越脊，飞檐走壁，还能用手指抓住大庙的椽子，身子悬空，围绕着大殿走上一遭。他杀富济贫，颇有点英雄气概。有一次被官府捉住，在十冬腊月天里，被剥光了衣服，赤身露体，再浇上凉水，捆起来，倒挂在梁上，一夜下来，竟然还能活着。哑巴小虽然没有文化，但懂得“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道理，所以从来不到官庄来作案。这样一个讲义气的绿林英雄，最后还是被杀掉了。直到今天，每当季羨林想到一个光着屁股一起玩的小伙伴竟成为这样一个英雄，还颇有点骄傲自豪之感。[22]

童年的小伙伴，是值得回忆的。

8. 母亲的面影

六岁以前，季羨林一直生活在母亲身边。和同龄的其他孩子一样，小季羨林在母亲跟前撒娇、淘气，有时也难免遭到母亲的怒嗔，但这正是母爱的另一方面表现。

夏天，黄昏时节。

小小的季羨林耐不住黄昏的寂寞，常出去走走。

屋后面是一个大苇坑，汪洋一片水，差不多有一个小湖那样大。坑里丛生着芦苇，郁郁葱葱，密不透风。夏末，芦苇都顶着白茸茸的小花，望过去，像一片银海。芦苇的稀疏处，能看到碧绿的水面。

季羨林经常在黄昏独自坐在这水边的芦花丛里，欣赏着水面反射的静静的清光。不时地，有一两条小鱼冲出水面，唼喋着，嬉戏在水面。一时兴起，自然要下水洗洗澡，那惬意的劲儿，自不用说了。

早晨，在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水面还在闪着蓝黑色的光，显不出碧深的静美。季羨林经常早早起来，就沿着这水坑走去，很小心地向浅滩边上的水里看去。偶尔会看到，暗黑的水面下，有个什么东西在发着白色的微弱亮光，伸手下去一摸，是一个又白又大的鸭蛋。兴冲冲地拿给母亲看，母亲的微笑在童稚的心灵里开成了一朵花。

有时候，季羨林也淘气。母亲被逼急了，就跟在后面追着打。季羨林有的是对付母亲的办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赶快跳下水坑，站在水里，回头对着站在岸上的母亲。无可奈何的母亲，却因了孩子这过分顽皮的举动被逗笑了。母亲在岸上笑，儿子在水里也笑，矛盾于是化解，母子又重归于好了。

初秋，庄稼开始熟了。一望无际的鲁西大平原上，谷子黄，高粱红。玉米啦，黄豆啦，绿豆啦，也都报告着丰收的喜悦。

五六岁的季羨林最喜欢走进高粱地，他感到高粱很神奇，高粱比他的身体要高出一倍多，走进高粱地，便有如同走进大森林的感觉。透过密叶的间隙，才能看到上面的蓝天。每天早晨，朝露还未退去，季羨林便来到高粱地里，来劈高粱叶子。叶子上的露水，像一颗颗珍珠闪着淡白的光。有的大水珠，还能照出自己像一粒芝麻那样小的有点变形的面影，小小的他，自然感到又新鲜，又有趣。

老玉米也长得比季羨林高得多，踮起脚尖，才能掰到棒子。

黄豆和绿豆都比小孩矮，所以季羨林也喜欢在黄豆地、绿豆地里走。走在里面，他觉得爽朗，一点也不闷气，颇有一种趾高气扬之感。

他喜欢在豆子地里帮助大人干点活。那时候，他总是缠着母亲，母亲走到哪里，他便跟到哪里。午饭以前，母亲到地里去摘绿豆荚，好把豆粒剥出来，回去煮午饭吃。季羨林也跟着母亲来到地里，正午时光，天高云淡，蝉声四起，蝈蝈也爬到豆枝上去，纵声欢唱着。空气中还飘拂着一股股淡淡的草香和泥土香。太阳晒在身上，热自然还有一点，但已不像盛夏那样令人难以忍受了，反而会给人一种暖烘烘怪舒服的感觉。

跟在母亲身后，季羨林的兴致非常高。他跑来跑去，欢呼雀跃。一会儿，捉住一只蚱蜢，赶快拿给母亲看；一会儿，掐到一朵野花，也赶快拿给母亲看。玉米棒子上长个乌霉，他感到奇怪，一定要问母亲个究竟。有的豆荚长得又短又粗，也要向母亲追问原因。对这段生

活，季羨林后来回忆说：

总之，这一片豆子地就是我的乐园，我说话像百灵鸟，跑起来像羚羊，腿和嘴一刻也不停。干起活来，更是全神贯注，总想用最高的速度摘下最多的绿豆荚来。但是，一检查成绩，却未免令人气短：母亲的筐子里已经满了，而自己的呢，连一半还不到哩。在失望之余，就细心加以观察和研究。不久，我就发现，这里面也并没有什么奥妙，关键就在母亲那一双长满了老茧的手上。[23]

后来，离开了母亲，但母亲的面影和这双长满了老茧的手，却时时出现在眼前。公共汽车上，偶尔发现老妇人一双长满老茧的手，马上会想到母亲的手，母亲的面影也就同时出现在面前。虽然只有六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但母亲的面影却是终生都不会忘记的。

9. 难忘母爱

六岁离开家之后，虽然也有回去看望母亲的时候，但都住不了多长时间。

1933年初秋，离开母亲17年，距离最后一次见到母亲也有8年，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季羨林突然接到母亲逝世的噩耗。

在火车里闷了一天，在长途汽车里又颠荡了一天，季羨林回到了八年多未曾回过的故乡。

踏上故乡的土地，路边的树丛里虽然还残留着一点浮翠，他已经看不到。他看到的只是淡远的长天下，一片凄凉的黄雾。从远处一看到在烟云笼罩下的小村，忽然想到死去的母亲，就躺在这烟云里的某一个角落里，便感到有一团烈焰在心里烧着，又感到好像严冬里的厚冰堆积在心头。

他迷惘地撞进了自己的家，一切都在泪光里浮动。在寂寞冷落的屋子里，墙上满布着灰尘和蛛网，正中放着一个大而黑的棺材。棺材装走了母亲，也装走了季羨林的希望和幻影。

在母亲死后不到一年，季羨林不无悲凉地写道：

母亲的死使我对一切都灰心。以前也曾自己吹起过幻影：怎样在十几年的漂泊生活以后，回到故乡来，听到母亲的一声含着温热的呼唤，仿佛饮一杯甘露似地，给疲惫的心加一点生气，然后再冲到人世里去。现在这幻影终于证实了是个幻影。……屋外是一个用黄土堆成的墙围绕着的天井。墙上已经有了几处倾地的缺口，上面长着乱草。从缺口里看出去是另一片黄土的墙，黄土的屋顶，黄土的街道，接连着枣树林里的一片淡淡的还残留着点绿色的黄雾，枣林的上面是初秋阴沉的也有点黄色的长天。我的心也像这许多黄的东西一样地黄，也一样地深沉。一个丢掉希望和幻影的人，不也正该丢掉生趣吗？[24]

悲凉侵袭着这个年轻人的心，他只觉得自己的心，虽然像黄土一样的黄，却不能像黄土一样的安定。他被圈在一个小小的天井里：天井的四周，都栽满了树，榆树最多，也有桃树和梨树。他凝望着这些树，每棵树上几乎都有母亲修剪、砍伐过的刀痕。在被油烟熏黑了的小厨房里，母亲生前吃剩的半个茄子、半棵葱，还在厨子上摆着。母亲用过的碗筷、手巾，依然还印有母亲的手泽和口泽。地面上，每块砖上几乎都印有母亲的足印。现在却人去屋空了，他所能看到的，只是母亲躺在棺材里。看不到，再也看不到母亲的身影会在榆树和桃树中间，会在这砖上，会在这黄的墙、黄的枣林、黄的长天之下游动了。

夜晚，季羨林枕着母亲枕过的枕头，思想着母亲怎样在这枕头上想着自己的儿子，怎样在这枕头上流着泪水。他再也止不住，枕着这枕头，流着泪。怎么也睡不着，朦胧中，看到淡淡的月光从门缝里流进来，黑漆的棺材上反射出丝丝清光。

终于这一天到了，这是乡间阴阳先生按照天干地支找出的所谓“好日子”的一天。从早晨开始，季羨林就穿上了白布孝衫，听着一个暗示。暗示他哭，他就跪在地上冲着棺材嚎啕地哭上一阵；正哭得淋漓的时候，又暗示他停止，他也只能顺从地收了眼泪。就这

样，不知循环多少次，被一个人牵着东走西走，跪下又站起，站起又跪下，一直弄到莫名其妙，不知该是站起，还是跪下，终于看到有十几个人去抬母亲的棺材了。

跟着棺材，沿着水坑，走过了一段长长的路，到了墓地。在墓地，又被人拖着转了几个圈子，不知道怎的脑筋里一闪，又给人拖到家里来了。

母亲活着时，不在身边；母亲去世，总算赶回来为母亲送了葬。季羨林似乎得到了一点安慰。

后来，季羨林就是到德国留学，也时常在夜里梦到母亲，哭着醒来。经常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听别人告诉他，母亲说过一句话：“要知道一去不回头的话，我拼了命也不放那孩子走！”[25]这一句不是他亲耳听到的话，终生都回荡在他的耳边。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从这句话里，季羨林领悟出：母爱是一种最无私的爱，他庆幸自己有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享受到这种永远抹不掉的母爱，享受到人世间这最真挚的爱。

二、故乡童趣

1. 运河文化的产儿——临清

季羨林的故乡，是一望无际的鲁西北平原。这是鲁西和鲁北两个平原的总称，在改革开放以前，这里通称为“北三区”，即聊城、惠民、德州，是过去山东最贫困的三个地区。聊城和德州地区的全部，都是鲁西北平原。鲁西平原，西以黄河与河南省相接，南以省界与河南、安徽、江苏三省为邻，东以东平湖和南四湖为界。鲁北平原，北与河北省接壤，南以小清河和鲁中南的山地为界。

鲁北平原是华北凹陷区的一部分，鲁西平原是鲁西隆起区的一部分，从大地构造来说，属于中朝准地台。整个平原的基底由古生界变

质岩和古生界、中生界的沉积岩构成，上覆新生界的沉积层。在新生代喜马拉雅运动早期，平原区的差异性断陷沉降加强，到第四纪的中晚期，由于接受黄河冲积物沉积，形成平原。平原内，地貌主要由河成高地、河间洼地和微斜平地组成。近代黄河已成地上河。[26]

鲁西北平原属温带季风气候，大陆性气候非常明显，冬季寒冷，夏季炎热。降雨集中在夏季，常发生春秋旱、夏涝的现象。区内土壤以潮土、盐化潮土和盐土为主，土地的利用主要是耕地，农作物以小麦、玉米、棉花为主，也出产大枣、苹果、梨和柿子等干鲜果品。

[27]

京杭大运河由北向南，穿越了鲁西北平原。

今日临清市，就是这个平原的一部分。

临清市地处鲁西北平原的西部，在山东省的西北部，西以卫运河为界，与河北省的临西县隔河相望。临清的得名，因城临漳卫河，而漳卫河在战国时为清河段，魏晋时至沧州段也仍叫清河，所以是以临近古清河而得名的。京杭大运河开通后，天津至临清段为南运河，又称卫漕，其中德州至临清段即今之漳卫河，又称卫运河。隋代称永济渠，唐、宋时称御河，元、明、清称卫河。1949年因漳河与卫河合流，故改称今名。

从历史上看，临清在战国时为贝丘邑地，西汉置贝丘、厓两县（今为临清市境内东半部），属冀州的清河郡（国），又置清渊县（今临清市境内西南部）。东汉时，改厓县为甘陵县，西晋改为清河县。后赵时，析清渊县置临清县，治所在今河北临西县，但不久即废，这是历史上临清作为地名第一次出现。北魏时复置临清县。隋代在原贝丘地置清平县。金将临清县治所迁往曹仁镇。明迁往今治所，并升为临清州，属东昌府。1958年撤县入市，不久废市复县。1984年撤县复市，包括原临清运河东部和清平县一部分。原临清运河以西为今河北省临西县，清平县另一部分划入山东省高唐县。

临清市属于鲁西北平原，但气候属南温带半湿润气候区，与整个

平原的温带季风气候有别。农作物有棉花、小麦、玉米、枣等。有临清三件宝之说：哈达、枣脯、千张袄；另一说是：瓜干、熏枣、千张袄。哈达在过去是藏传佛教喇嘛从运河北上至临清买了以后到北京献给朝廷的。今天西藏喜欢用的哈达，仍是临清生产的。瓜干是临清晒的一种黄瓜干（青瓜），冬天向朝廷进贡用的。千张袄在临清有悠久的历史。过去，口外羊毛多在临清加工，珍贵的毛皮在京师颇有名气。毛皮作坊老板为了省钱，把加工毛皮的边角料，论斤秤给工人作工资，巧手工人用这些边角料，分门别类，一块块拼凑成大块皮毛，再做成羊皮袄，竟像珍贵毛皮一样有名气，遂使临清“千张袄”名闻遐迩。熏枣又叫进京枣脯，用临清特产圆铃大枣作原料，经去核、晾晒、糖水浸泡、煮腌、烘干、熏硫等工序，制成呈紫红色的枣脯，韧性适中，枣香浓郁，至今仍畅销国内外。

临清自古就是鲁西北文化经济重镇，流风余韵，光耀齐鲁。虽经时移世变，津浦路开通，运河被废弃，对临清经济文化的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致使经济有一蹶不振之势。但是，文化命脉，却从未中断。

临清是典型的运河文化的产儿，处处充满运河文化的气息。最具典型意义的运河文化表现有临清的茶馆、舍利宝塔、清真寺、鳌头矶和东郊孤松等。

临清茶馆是靠大运河的传播才繁荣起来的。临清的茶馆遍布全市，连偏远地方的路边都有茶馆，备茶并兼卖方便食品，临清人叫做茶食点。百姓家日常饮茶也极为普遍，有一日三茶的习惯。早茶是免不了的，午后的一壶茶叫“除腻茶”，晚饭后则喝“夜茶”。过去有钱人到茶馆喝茶，什么大宁寺、竹竿巷、养济院、二闸口、浮桥口、碧霞宫，都是阔气人的去处。茶馆里，店家备有从茶庄买来的份茶，每份约有六分之一小两，沏好后，还把包茶的纸卡挂在壶嘴上，以示茶品高低。请人喝茶，还有礼仪讲究，斟过茶后，要把壶嘴朝向空座，如果座位都是满的，壶嘴必须朝向主人自己，否则便是失礼。茶

叶的产地，多是安徽、福建，从运河北运过来的。[28]

在临清市区往北二公里多的地方，紧靠漳卫河右岸原永寿寺旧址南边，有一座远近闻名的舍利宝塔。该宝塔建于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重修。塔有九层，高六十多米，底座八面围长近四十米，为石砌基座，二层以上是条砖结构，白灰勾缝。向南的门楣上有四个石刻大字“舍利宝塔”，系郡人进士按察使王成德所题。塔外檐青砖斗拱，八百檐下都刻有“阿弥陀佛”四字，塔内六至八层内壁各有造像。宝塔通体呈不明显锥形，整个建筑淳厚大方，巍峨壮观。

临清清真北寺位于市区西北部漳卫河东岸，俗称北礼拜寺，也叫洪家寺，是全国著名的清真寺。该寺始建年代不详，明嘉靖、清嘉庆年间两次重修。该寺建筑风格独特，建筑群由礼拜殿、望月楼、讲堂、沐浴室等构成。殿顶覆盖绿色琉璃瓦，脊部置有三个大的桃形空心铜顶。殿堂隆起，飞檐四出，殿内有明代珍贵壁画，雕梁画柱，精工细作。整个群落既有中国古代庙宇的特点，又具有浓重的伊斯兰风格，加之院内古柏参天，更显庄严肃穆。临清的回民，多是沿京杭大运河从杭州北上的，后来长期定居下来。

鳌头矶位于市区小运河（即汶河）的分叉处，建于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以前，据旧《临清县志》记载：“鳌头矶在鳌背桥西南数十步，中州起处砌以石，如鳌头突出，筑观音阁于其上，旧闸、新闸各二，分左右如鳌足，而广济桥尾其后，明知州马纶题曰鳌头矶。”这是一个小型建筑群，呈四合院，北殿称李公祠，西殿称吕祖堂，南楼称登瀛楼，东楼称观音阁。观音阁下一通院门洞上，有石刻“独占”二字。方形阁楼，四挑飞檐，落地木隔，玲珑小巧，别具一格，是有名的“鳌矶凝秀”之所在，明大学士李东阳过此曾题诗：

十里人家两岸分，
层楼高栋入青云，
官船贾舶纷纷过，

击鼓鸣锣处处闻。

至于东郊孤松，更是南北文化融合的象征，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

2. 五样松的骄傲

在临清市往东二公里多的地方，有一个陈坟村，在村东北头陈氏先祖的坟内，有一棵松树，临清人称之为“东郊孤松”。树高二十余米，树围六米，松子有檀香味，木质呈紫色，树枝、叶片颜色、形态不一，有五样之多，所以人们也把它叫做“五样松”。

相传这棵树是明朝永乐年间（1403—1424）所植。陈坟村陈氏族人中有一位在京都任锦衣卫，是护卫皇宫的亲军，掌管皇帝的出入仪仗，又是皇帝的耳目与爪牙。此人从江南采来桧树树苗五种，拧为一体，植于花盆中，随漕船运回，后来花盆长不下了，植于其先祖坟前，长成大树。这棵树的奇特之处，不仅在于树上有五种不同的叶子，还在于它遭过两次大火，却依然枝叶繁茂。第一次大火是1943年，树干遭火焚，三日之后方息，树干里成了空洞。1969年又遭火焚，人们赶来扑火，费了好大劲，竟没有扑灭，连烧数十日。有人想出一个办法，用湿泥巴从树下的空洞里往上糊，这才把火熄灭。它居然安然度过了这两场大灾难，成活至今。火烧的痕迹赫然犹在，却仍然是枝繁叶茂，黛色逼人，树的尖顶直刺蔚蓝的长天。

对这样一棵饱经沧桑的老寿星，季羨林小时候不知道，上世纪80年代他回故乡时，才得以在树前驻足。他站在树下，展开了丰富的想象：

我的眼前一晃，我恍惚看到，这个老寿星长着五种不同的叶子，猛然长了起来，长到我的眼睛看不到的地方：一个枝子直通到本县的首府临清，一个枝子直通到本地区的首府聊城，一个枝子直通到山东的省府济南，一个枝子直通到中国的首都北京，还剩下一个枝子，右

边担着初升的太阳，左边担着初升的月亮，顶与泰山齐高，根与黄河并长。因此它才能历千年而不衰，经百代而常在。时光的流逝，季候的变换，夏日的炎阳，冬天的霜霰，在它身上当然留下了痕迹。然而不管是春秋，还是冬夏，它永远苍翠，一点没有变化。看到它的人，都会不自觉地挺直了腰板，无穷的精力在心里汹涌，傲然面对一切的挑战。[29]

矗立的五样松，就这样叙说着临清的过去，注视着临清的未来。没有运河，也就没有这棵五样松，它同样是运河文化的象征。

3. 临清的历史文化名人和风土人情

临清虽在运河边上，但过去的文化并不发达。季羨林说过：

姑且不从全中国来看吧，就是从山东全省来看，我们地区（指聊城地区）也不是文化发达的地区。清朝初年，聊城出过一个姓傅的状元，后来还当上了宰相。但那已是过去的“光荣”，现在早已暗淡，连这位状元公的名字知道的人也不多了。也曾有过一个海源阁，藏善本书，名闻海内外，而今也已荡为荒烟蔓草，只能供人凭吊了。[30]

姓傅的状元，是傅以渐（1609—1665）。他是聊城人，字于磬。清顺治年间（1644—1661）进士，由弘文院修撰累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兼领兵部尚书，先后充《明史》、《清太宗实录》纂修，任《清太祖圣训》、《清太宗圣训》总裁，又奉命与曹本荣合著《周易通注》。傅以渐是聊城的名人，在临清也有影响，而海源阁虽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四大私人藏书楼，但却在聊城而不在临清。

临清的历史文化名人，一为谢榛，一为王成德。

谢榛（1495—1575），字茂秦，号四溟山人，又号脱屣山人，不仕以终身。他眇一目，勤奋好学，十六岁就能作乐府商调，少年争歌之。又折节读书，刻意为诗，有闻于京师。李攀龙、王世贞辈结社，他以布衣为长，李攀龙位次之。后与李攀龙互相诘责，李贽书与他绝

交，削其名于后七子之列。但他游道日广，大河南北皆称谢榛先生。他论诗主取李白、杜甫之长，说：“取李、杜十四家最胜者，熟读之以会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得此三要，则浩乎浑沦，不必塑谪仙而画少陵也。”[31]他强调兴趣与超悟，其称诗指要，被时人心师其言。他为后人留下了论诗著作《四溟诗话》（亦名《诗家直说》）四卷、诗文集《四溟山人集》十卷。其诗作以近体为胜，精洁端凝，功力深厚，句响而字稳，在清简秀润之中不乏苍茫沉涵之深蕴。而古体诗也不乏佳作，笔力雄健，气势驰骋，神采飞动，颇具盛唐浑沦高华的气象。因此他对临清的影响甚大。

王成德（1544—1614），字行之。明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授户部主事，官至按察使。他后来在山西任按察使，名气不算很大。

明代大学士李东阳从湖南老家北上去京师，在临清住过一段时间，并写了一些诗作，除上面一首写鳌头矶的之外，还有一首，是他写的《临清二绝》之一：

折岸惊流此地回，
涛声日夜响春雷。
城中烟火千家集，
江上帆樯万斛来。

大运河流经临清城下，飞流转折，直向东南，惊涛拍岸，日夜轰鸣如春雷。这里在明代船舶密集，商贾云集，市场繁荣。李东阳咏临清的诗作，至今仍在临清人中传颂。

临清近代的闻人是抗日救国将领张自忠。张自忠（1890—1940），字荃忱，曾在冯玉祥部中任职，后担任过张家口警备司令、天津市市长。抗日战争中率部在山东台儿庄与日军血战，为抗日战争立下丰功伟绩，1940年5月在襄河南岸南瓜店前线指挥作战时，不幸牺牲。他永远是临清人民、山东人民、全中国人民的骄傲。

临清的其他历史人物，有北魏大臣傅永、房亮、傅竖眼、崔休，唐名僧德美、大臣路敬淳、路敬潜、宰相崔彦昭，后梁将领张归霸、

张归弁、张归厚，五代将领王彦超，明官员张鸣凤、大臣阎闾、周朝瑞、左良玉、左梦庚、张振秀、市民运动领袖王朝佐，清大臣汪灏、徐延旭、徐坊、文人王霭，近人高僧释海隆等人。其中王朝佐杀富济贫，临刑时神色自若。周朝瑞身为大臣，上疏多斥宦官为非，忤魏忠贤，与同事杨涟等五人被逮系诏狱，为著名的“六君子”之一，被毙于狱中，他们都在临清留有美名。而清大臣汪灏有著作《倚云阁诗集》，为王士禛所推重，被收入《四库全书》。王霭也一生好诗文，著有《痴云诗草》。他们都是临清人中的佼佼者。

其他历史文化名人如吕才、武训、傅斯年都属于聊城市人，武训在临清创办过御史巷义塾，对临清有过贡献，但他们都不是临清人。

临清因为是运河文化的产儿，所以其风土人情带有浓厚的运河文化的特点，受南北漕运影响，与山东其他地方多有不同。如在临清，过去有一个竹竿巷，经营江南出产的竹编器具，街面上开设的茶馆，其格局和卖茶、饮茶的风俗也与江南茶馆大致相同。清代临清港、阳谷县张秋镇，是黄河以北的京杭大运河上最繁荣的码头，与江南杭州、苏州齐名，河上常唱的谚谣说：“南有苏杭，北有临张。”[32]

临清饮食风俗也常有文化融合的特点，回、汉两族的生活习俗都有。

临清的风味小吃，有御史巷锅饼，以厚、重闻名，以至于当地的歇后语说：“御史巷的锅饼——吃不透。”汉族吃的烧饼夹肉，是用肉摊卖的熟肉切末，由烧饼铺厨师在烧饼上切口、夹肉，即烤即食，俗称“等烧饼”。烧麦与煎包是临清人爱吃的食物，尹家阁村聚隆号肉铺制成的“下凡肉”，风味独特，闻名于运河南北各地。聊城地方名菜糖酥鱼、清蒸白鱼（又称八味白鱼）、涮羊肉、空心琉璃丸子，都在临清有知名度，但临清独有的是著名的“临清汤”，有木耳汤、海米汤、干贝汤、鱿鱼汤、鸡腰汤、肉丝汤、果子汤等一百多种，最有名的是“对鱼汤”。临清人在祝寿时还要喝长命汤。

临清的其他风俗，行骑毛驴，驴有黑、褐、灰白、乌各色，以黑

驴为有力，其中粉鼻、粉眼、粉蹄的尤讨人喜。平时走亲串友，捎上个麻袋或被褥，即能骑行，远行则要装鞍辔坠镫。婚俗过去喜早婚，男十五六岁即娶，女长于男，有的甚至十岁娶二十岁之妇。婚后二三年内不生孩子，就要去祈子。城区多在正月十六日，农村多在四月初八日，到奶奶庙里跪在送生奶奶前，用红线拴住泥娃娃的脖子，口里念：“有福的小子跟娘来，没福的小子坐庙台，姑家姥家都不去，跟着亲娘回家来。”然后用红包袱包好娃娃，抱回家放到炕头的窗窝里，一日三餐饭食供奉。如碰巧生子，要给庙里丰厚的报酬。[33]

民间说唱乐调在临清很受欢迎。临清时调也叫丝调，曲调有雁鹅调、靠山调、英雄调、鸳鸯调、平调，小曲则流行山西五更、伤心调等。

在衣着方面，临清过去流行长衫，俗称大褂、长袍，这本是知识分子和商人的日常服装，一般临清人在交际场合也偶尔穿着，解放后已不再时兴。现在临清人保留的习惯是以毛巾包头。中老年用白毛巾简单地系结于脑后，青年农民则常卷结于额前，俗称“英雄巾”。据说此种风俗源于赶车人，车夫用蓝布作头巾，既可防风沙、雨雪，又可揩汗，有多种用途，后来相沿成习，以毛巾代蓝布。这一风俗与河北一带农村一样。

4. 这里的黄昏真像一首诗

季羨林在临清只呆了六年，到底在临清受过多少文化方面的熏陶，无法说清楚。留在他心目中的印象，是故乡的姣好，还有故乡的贫穷。

小时候，季羨林从来没有见过山，也不知山为何物。他曾幻想，山，大概是一个圆而粗的柱子吧，顶天立地，好不威风。

在故乡里望月，他从来不同山联系。苏轼所说的“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完全是他无法想象的。

官庄虽是个小村，但有很多湖坑水湾，几个大苇坑几乎占了小村面积的一半。在季羨林这个小孩子眼中，这些苇坑虽不能像洞庭湖“八月湖水平”那样有气派，但也颇有一点烟波浩渺之势。

到了夏天，黄昏以后，季羨林便来到坑边的场院里，躺在地上，数天上的星星。

有时候，他常常待在自家的天井里等候黄昏的来临。

他坐在很矮的小凳上，看墙角里渐渐暗了下来，四周的白墙上，也布上了一层淡淡的黑影。幽暗中，夜来香的花香一阵阵地沁入他的心田。天空里不时地有蝙蝠在飞着，嬉戏着。屋檐角上的蜘蛛网，映着灰白的天空。朦胧中，网上的线索和粘在上面的小生物，依稀可见，在不经意的时候，蓦地再一抬头，暗灰的天空里已经嵌上闪着眼的小星了。

有时候，季羨林也和小伙伴们在村外玩。古柳下面，点上一堆篝火，然后将树一摇，成群的知了都往火堆上飞落。白天常用嚼烂的麦粒做成的粘筋去粘知了，可比晚上用火堆吸引难得多了。为此，小季羨林天天盼望着黄昏早早来临，一到晚上，便玩这种游戏，经常是乐此不疲。

到更晚一点的时候，季羨林便常走到苇坑边上，抬头去看那晴空中的一轮明月，只见那月亮清光四溢，与苇坑水中的那个月亮正好相映成趣。他当时还没背过苏东坡“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也没背过秦观的“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也没背过欧阳修的“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千种花”和郑板桥的“夜深更饮秋潭水，带月连星舀一瓢”，自然还不懂什么叫诗兴。但他仍然顾而乐之，心中油然有什么东西在萌动。有时候在坑边流连忘返，玩很久才回家睡觉。梦中，他还见到两个月亮叠在一起，清光更加晶莹澄澈。后来，季羨林到过几十个国家，看到过许许多多的月亮：在风光旖旎的瑞士莱芒湖上，在平沙无垠的非洲大沙漠中，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上，在巍峨雄奇的高山上，他都观赏过月亮。这些月亮虽然都美妙绝

伦，但是，看到它们，他立刻想到故乡那个苇坑上面和水中的那个小月亮。对比之下，无论如何他都感到，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万万比不上他那心爱的小月亮。不管他离开自己的故乡多少万里，他的心一想到这轮小月亮，就飞回到了故乡。他在心中默念着：我的小月亮，我永远忘不掉你！[34]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有个故乡，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人人都爱自己故乡的月亮。

在冬天里，家中天井里满铺着白雪。季羨林常蜷伏在屋子里。当他看到，白色的窗户纸渐渐灰了起来，炉子里的火焰渐渐红起来、亮起来的时候，他也就知道：这不是黄昏了。这时，他常从风门的缝里望出去：灰白的天空，灰白的盖着雪的屋顶。半弯惨淡的凉月印在天上，虽然有点凄凉，但仍掩不了黄昏的美丽。

所以，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季羨林都忘不了对黄昏的赞美：

（黄昏）漫过了大平原，大草原，留下了一层阴影；漫过了大森林，留下了一片阴郁的黑暗；漫过了小溪，把深灰的暮色溶入琮琤的水声里，水面在阒静里透着微明；漫过了山顶，留给它们星的光和月的光；漫过了小村，留下了苍茫的暮烟……给每个墙角扯下了一片，给每个蜘蛛网网住了一把。……

在门外，它却不管人们关心不关心，寂寞地，冷落地，替他们安排好了一个幻变的又充满了诗意的童话般的世界，朦胧，微明，正像反射在镜子里的影子，它给一切东西涂上银灰的梦的色彩。牛乳色的空气仿佛真牛乳似地凝结起来。但似乎又在软软地粘粘地浓浓地流动着。它带来了阒静，你听：一切静静的，像下着大雪的中夜。但是死寂吗？却并不，再比现在沉默一点，也会变成坟墓般地死寂。仿佛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少，优美的轻适的阒静软软地粘粘地浓浓地压在人们的心头，灰的天空像一张薄幕；树木，房屋，烟纹，云缕，都像一张张的剪影，静静地贴在这幕上。这里，那里，点缀着晚霞的紫曛和小星的冷光。黄昏真像一首诗，一支歌，一篇童话；像一片月明楼上传来的悠扬的笛声，一声缭绕在长空里亮唳的鹤鸣；像陈了几十年

的绍酒；像一切美到说不出来的东西。说不出来，只能去看；看之不足，只能意会；意会之不足，只能赞叹。[35]

真的，季羨林的故乡的黄昏，简直就是一首诗！

5. 听老牛喘气，看洞里的兔子

季羨林常说：我是地之子，我渴望着再回到大地的怀里去。故乡的黄昏那么优美，故乡的平原那么辽阔，故乡童趣永远让他回味无穷！

单说这乡间的路，就有说不尽的乐趣。小时候的季羨林，一边走在乡村的路上，一边欣赏着似水的流云笼罩着远村，欣赏着金海似的麦浪。后来，他走过其他许许多多的路，看红的梅，白的雪，潏潏的流水，十里谿谿的松壑，死人的蜡黄的面色，小孩充满了生命力的踊跃。在这许许多多的路上，他接触到种种面影，熟悉的，不熟悉的，但这一切的一切，都在他走着的时候，蓦地成轻烟，成细雾，成淡淡的影子，储在他的记忆里。有的则干脆被埋在回忆的暗隙里，忘了。只有这故乡村间的小路，是他永远永远也不能忘的。这种体会，没有乡情的人，是断断不能有的。

故乡的秋，是更有韵味的。季羨林小时候常喜欢走到场院里去。豆子、谷子、高粱已经熟透，都从田地里用牛车拖了回来，堆成一个个小山似的垛。谷子堆，黄黄的；高粱堆，红红的；豆子堆，褐褐的；豆荚在日光下毕剥的炸裂着。周围是飘浮着云烟的田野，屋后的水坑里，是银白的一片秋芦。一切都充满了静态的美。

谷穗摊在场院里晒干了，老牛拖着石碌碡，在谷场上转，有节奏地左右摆动着头。毛驴也摇着耳朵，在拉着车走。中午小憩时，老牛被拴到柳树下，稍一沉心，仿佛能听到老牛的喘气声。柳树上的蝉，曳长了声在鸣着。风从刚刚割净了庄稼的田地里吹了过来，带着泥土

的香味。一切似乎又都充满了流动的美。

过午时分，季羨林常沿着屋后的大坑去踱步，看银色的芦花在阳光里闪着光，看天上的流云，看流云倒在水中的影子。芦花流着银光，水面上反射着青光，夕阳的残辉照在树梢上发着金光。一切都沉默。夏花之绚烂，秋叶之静美，均在这里达到了和谐。

季羨林的童趣，在兔子身上得到更为淋漓尽致的发挥。

他清楚地记得，故乡官庄的许多人家里，都养着一窝兔子，而唯独他家里没有。越是自家没有的东西，就越感到新奇，也就愿意去看个究竟。季羨林就喜欢到别人家里去看兔子。邻居家在地上掘一个井似的圆洞，不深，在洞底再开几个向旁边通的小洞，兔子就住在里边。他自己家里没有这样的洞，也没有兔子。他每次便只能随大人去别的养兔子的邻居家里去玩。当大人们在扯不断拉不断絮絮地谈得高兴时，季羨林则总是放轻了脚步，走到洞口，偷偷地向洞里面瞧。小兔正在洞底的小洞口徘徊着，黑的、白的。白的最好玩，黑影里眼睛红亮得好看，透亮的长耳朵左右摇摆着，三瓣嘴也仿佛战栗似的颤动着，在嚼着菜根呀，豆芽呀之类的东西。蓦地，兔子看到洞上边有人影，便迅速地跑进小洞里去，像一溜溜白色的、黑色的烟。再伏下身子去看，在洞底的薄暗里，便只能看见一对对的莹透的、宝石似的眼睛。

真喜欢这种可爱的小动物，但季羨林故乡的家里，始终没有这种小动物。直到随叔父去了济南，才圆了一次自己养兔子的梦。

6. 母亲养的一条狗

季羨林在官庄的家里，没养过兔子，但是，他记得，母亲养过一条狗。

小时候，季羨林住在官庄这个小村里，终日与狗为伍。那时，他一点也没有感觉到狗这种东西有什么稀奇的地方。狗，食肉目犬科动

物，有强腭、利齿、健腿，嗅觉和听觉敏锐，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有集群合作的本能。狗的健康和正常心理发展，决定于它与群中其他成员间的关系。狗是最早的家养动物，难以换群换主，难以在野外独立生活。狗可分为猎犬、看守犬、警犬、牧羊犬、玩赏犬、表演犬、赛犬、向导犬、拉橇犬和科学实验犬。对狗的这些知识，少年的季羨林并不知道，甚至也没有想去知道。但是，狗却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后来，母亲逝世时，季羨林从清华回故乡为母亲送葬。故乡的家中，已经空无一人。母亲养过的一条狗，虽然他后来已经忘了它的颜色，但却清楚地记得，那条狗仍然日日夜夜守卧在他的家门口，守而不走。

女主人已经离开人世，再没有人喂它了。它也好像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它却坚决宁愿忍饥挨饿，也决不离开那个破烂不堪的家门口。

黄昏时分，季羨林从村里走回家，屋子里停放着母亲的棺材，门口卧着这一只失去了主人的狗，泪眼汪汪地望着季羨林这个失去了慈母的孩子，有气无力地摇摆着尾巴，嗅他的脚。他只感到，茫茫宇宙，好像只剩下这只狗和他自己。

面对此情此景，季羨林连泪都流不出来了。他流的是血，而这血还是流向他自己的心中。他想到，本来应该同这只狗相依为命，互相安慰。但是，他必须离开这个小村庄，而又无法将它带走。

离别之时，季羨林紧紧地搂住了这只狗。他因为遗弃了它，而受到良心的谴责。

直到今天，他一闭眼，便想到了这只狗，有时还会不由自主地流下眼泪。他离开家以后，这只狗是决不会离开这个破烂的家门口的，而它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如果母亲有灵，会从这只狗身上，得到他这个儿子无法给她的慰藉。[36]

从此以后，季羨林爱天下一切狗，甚至延及一切植物、小动物、

天地万物。博大无私的胸怀使他加深了对“天人合一”思想的理解。

既有姣好，也有贫穷，故乡是一个复合体。

季羨林自己常说，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来，眼前没有红，没有绿，有的只是一片灰黄。

20 世纪 80 年代，季羨林经过长期反复的考虑，终于冒着溽暑，带着哮喘，回到自己的家乡。他住在临清招待所，看到绿树满院，浓荫匝地；鲜红的花朵，在骄阳中迎风怒放。在这里，他看到了南国的青翠与红艳，眼睛一下子亮起来，心头洋溢着快乐的激情，便情不自禁地写下了下面这段话：

我记忆中的临清不是这样子的，完完全全不是这样子的。我生在过去独立成县、今天划归临清的清平县。在那个地方，除了黄色和灰色之外，好像什么都没有。我把自己的回忆翻腾了几遍，然而却找不出半点的红色。灰色，灰色，弥漫天地的灰色啊！如果勉强去找的话，大概也只有新娘子腮上涂上的那一点点胭脂，还有深秋时枣树上的黄叶已将落尽、在树顶上最高枝头剩下的几颗红枣，孤零零地悬在那里，在冷冽的秋风中，在薄薄的淡黄色中，红艳艳，夺人眼目。

[37]

这样的故乡，姣好与贫穷交织在一起。它既给季羨林无穷的乐趣，使他始终对故乡有一种亲情，又让季羨林无时无刻不牵肠挂肚，到济南，到北京，到海外，也永远想着自己的故乡，一想到家乡的穷困，就忧从中来，所以也就能始终如一地为故乡的发展尽自己的力量。他希望看到红色的故乡，在自己眼前出现一片繁花似锦的景象，灿烂夺目，熠熠生光，使残留在脑海里的那种灰色、灰色、弥漫天地的灰色，一扫而光，只留下红彤彤的一片，宛如黎明时分东边天空的朝霞。[38]这就是季羨林对居住了六年的故乡永久的一种美好祝愿。

三、济南多出一个会玩耍的乡下孩子

1. 骑着毛驴进济南

前边已经说过，季羨林父亲一辈，大排行兄弟十一个，有六个因为穷得受不了，下了关东，后来都客死在关东。留下的五个，还有一个送了人。这剩下的四个人中，只有季羨林的大大爷有过一个儿子季宝庆，但又不幸夭亡。这样，季羨林生下以后，就成了季家惟一的男孩子。在儒家传统根深蒂固的山东，季羨林就成了传宗接代的惟一希望。

季羨林的亲叔叔已经在济南扎下了根，在黄河河务局谋了个小职员位子。虽然薪水还不是很丰厚，但生活总还过得去。叔父膝下只有一个女儿，而父亲在官庄又贫困不堪，于是兄弟俩一商量，决定把季羨林送到济南。当时母亲是如何想的，年幼的季羨林完全不能确知，而他自己，也并没有想到从此就永远地离开了父母，成了叔父、婶母的子嗣，而济南也就成了他一住就是十三年的又一个故乡。

这时候，季羨林六岁，是一个刚开始懂事的孩子。

回想起当时进济南的情景，季羨林现在还觉得可笑。

1917年刚过了春节不久，季羨林离开了只生活了六年的故乡清平县官庄村。他跟着父亲骑在一头毛驴上，骑了两天，来到了以湖山著名的山东省最大的都市——济南。

在平原上生活了六年的孩子，虽然听说过“山”这种东西，但并不知道山是什么样子。他原来以为，山只不过是一个巨大无比的石头柱子。临到济南，季羨林眼前换了一个世界，他生平第一次见到了只是听说过的“山”，这让他又惊又喜。

下了毛驴，又随着父亲走了许多路。从鳞次栉比的楼房的空隙里，季羨林看到了一线蓝蓝的天，这里的天怎么会是这样的呢？官庄的天是蓝蓝的像个锅盖覆盖着，而这里却只有一线。这里看不到远方笼罩着一层轻雾的树，也看不到天边上飘动的水似的云烟；这里嗅不到乡间特有的泥土的气息，只感到像是生活在灰之国里。

一直走得自己莫名其妙，爷俩才走到一条古旧的黄土街，然后，转进一个有石头台阶颇带古味的大门里去。

2. 神怪老人

进了大门，迎头是一棵大的枸杞树。因为刚刚走过了迷宫似的长长的又曲折的街，走进屋里，眼前还只是一片花，没有看到一个人，定了定神，才看到了婶母。

不久，在屋内黑暗的角隅里，发现了一个老人，在起劲地同父亲谈着话。

这个老人并没有什么特异的地方，但第一眼就在季羨林心里留下了一个莫大的威胁，形成了一个神怪老人的印象：白色稀疏的胡子，白色更稀疏的头发，夹着一张蝙蝠形的棕黑色的面孔，和父亲说话的时候，灰白色的胡子在一上一下地颤动着。这样一个综合体，给一个乡下孩子造成的，只能是恐怖的幻想。

初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晚上怎么也睡不安宁。一躺下，就先想到故乡，想到故乡的母亲。迷离凄凉的梦，萦绕在他的身旁，时时会在黑暗里发现离奇的幻影。这时候，一进屋见到的这个老人蝙蝠形的面孔，就浮现在他的面前，把他带到一个神秘的境地里去。在故乡常听一些老人讲的神怪故事，和这位老人连成一片，这个蝙蝠形脸的神怪老人，也就成了故事里的主人公了。

半夜里，都市的喧嚣终于停止，夜静下来，但不时还有小贩的喊声，从远处的小巷里飘了过来。这真让人难以忍受。当时，季羨林小小的心灵已经感到阵阵空漠的悲哀，他是地之子，他渴望着再回到大地的怀里去。

第二天，一早起来。第一个看到的偏又是这个长着蝙蝠形脸的神怪老人。

我不敢再看他，我只呆呆地注视着那棵枸杞树，注视着细弱的枝

条上才冒出的红星似的小芽，看熹微的晨光慢慢地照透那凌乱的枝条。小贩的叫卖声从墙外飘过来，但我不知道他们叫卖的什么。对我，一切都充满了惊异。故乡里小村的影子，母亲的影子，时时浮掠在我的眼前。我一闭眼，仿佛自己还骑在驴背上，还能听到驴子项下的单调的铃声，看到从驴子头前伸展出去的长长又崎岖的仿佛再也走不到尽头的黄土路。在一瞬间这崎岖的再也走不到尽头的黄土路就把自己引到这陌生的地方来。在这陌生的地方，现在（一个初春的早晨）就又看到这样一个神秘的老人在枸杞树下面来来往往地做着事。

[39]

季羨林在 1935 年年轻时写下的这段文字，真实地记录了他进入济南之后的恐惧。

但老人却一点也没有孩子似的幻觉。他见了季羨林，仿佛很高兴，打一个招呼，接着就笑起来。这是怎样可怕的一种笑啊！鲇鱼须似的灰白胡子向两旁咧了咧，眼与鼻子之间的距离，被牵掣得更近了，中间耸起了几条皱纹。这时的神怪老人，看起来就更像一只蝙蝠，而且像一个跃跃欲飞的蝙蝠了。季羨林害怕极了，不敢再看他。而他也就拖了一片笑声，消逝在枸杞树下面。留给季羨林的，仍然是蝙蝠形脸的影子，混合了一串串的金星，在眼前晃动着，一直追到梦里去。

终日里，季羨林只听到闹嚷嚷的车马声。平凡的日子就这样在平凡之中消磨下去。随着时间的流逝，终于把他与神怪老人之间的隔膜磨去了。他开始从别人的嘴里，知道了一点老人的一些事情。

原来老人在年轻时，从济南南边山里的一个小村飘流到了济南，打着光棍在一种极勤苦极艰难的情况下，活下来了。到了变成一个白须老人，生活却更加艰难了。不得已，老人只得借住在叔父家房子后院的一间草棚里，做泥瓦匠的活计，偶尔也帮叔父做点杂事。

季羨林这时才发现，在老人那强打出来的微笑下面，隐藏着一颗怎样为生活磨透的、悲苦的心。这样一来，季羨林便同老人亲近起

来，也被邀到这老人的屋里去。

他的屋子其实并不像个屋，只是靠着墙打成的一个低矮的小棚。一进小棚的门，就仿佛走进一个黑洞里去，阴森森的，有霉湿的气息钻进鼻子里去。棚子四周，全是烟熏火燎的痕迹，棚顶上垂着浓密的蜘蛛网。棚子中央，有一张叫做床的东西，旁边是一张三条腿的桌子。当季羨林正要抽身往外走的时候，忽然看到在贴屋墙的一个壁龛里，居然放着一个肥白的大泥娃娃。

老人看这孩子注视泥娃娃的神情，就把泥娃娃拿下来送给了季羨林。他那时并不了解，这样一位奇异的神怪老人，怎么还有这样的童心。慢慢地，他才理解，原来天下还有比自己家更穷的人，而再穷的人，也会有自己的精神追求。这样的泥娃娃，给了小季羨林无量的欣慰，他渐渐觉得，这张蝙蝠形的脸，原来就是一张穷人的脸，它不再可怕，反而变得可爱起来了。

3. 到老庙去玩

和神怪老人渐渐地熟了起来。

老人闲下来的时候，便带季羨林出去玩。

这一老一少常去玩的地方，有一个是圩子墙。在这墙上面，季羨林可以看到南面云似的黛黑的山峰，那就是著名的千佛山，又叫历山、舜耕山。《水经注》说：雷泽西南十许里，有一小山，孤立峻上，亭亭（亭亭）巉巖，谓之历山。山北有小阜，南属迤泽之东，北有陶墟，缘生言舜耕陶所在，墟阜联属，滨带瓠河也。郑玄云：历山河东，今有舜井。皇甫谧曰：或言今济阴历山是也，与雷泽相比。当然，他们在圩子墙上看不到岩壁上北魏及隋时的石刻佛像。

往北看去，华不注山也隐约可见，《水经注》说：华不注山，虎牙桀立，孤峰特起，青崖发翠，同点黛焉。

这些山峰的顶上，成为季羨林幻想常飞到的地方。

老人还领他看过济南的护城河。济南是个有名的泉城，家家泉水，户户垂柳，早已是尽人皆知。但看到这护城河，他真想不到河水这么清，水草这么绿。

最常去的地方，是一所古庙。出了自家大门不远，就到了。古庙不大，院子里栽了不少柏树，浓荫铺地，森冷幽渺。阴阴森森的大殿里列着几座神像，封满了蛛网和尘土，檐头上有燕子垒的窝。这样的一座破庙，只会引起成年人苍茫怀古的情绪，想不到对一个六岁的孩子，也有那么大的诱惑力。神怪老人每天都几乎领他到那里去，他每每都是很高兴地随老人去。

在柏树下面，老人开始讲一些故事给他听。一个放牛的小孩，遇到一只狼，后来又设法脱了险，绘声绘色，一直讲到黄昏。每次回家，都有说不尽的欢欣。

就在这年的夏天，叔父一家搬了家，从一条铺满了石头的古旧的佛山街北头，搬到了南头。

因为搬了家，老人原先住的那间草棚也归了别人。黑洞似的草棚也难以住下去了，老人只好移到这个古庙里去存身。

一个夏天，都没有见到老人。在夏末的一个黄昏，他突然想到要去看看老人。

古老的庙堂仍然同先前一样地衰颓，柏树仍然遮蔽着天空。一进庙门，四周是一片寂静，城市的喧嚣突然隐遁起来。季羨林终于看到老人的背影在大殿的一个角隅里晃动。

老人回头看到是他，马上高兴起来，立刻忙着搬来一条凳子，又忙着倒水给他。老人告诉他，自己再也不能做泥瓦匠，同街住的好心人常常给他送饭吃，身体处处都显出了弱象。老人兴奋地告诉季羨林，昨天夜里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托着一个太阳，人说梦见托太阳是个好征兆，于是老人也相信自己的身子会慢慢地好起来，希望能壮壮实实地再活几年。

但是，老人再也没有康复。他得了病，病完之后，他变成了另一

个人，身体伛偻得简直要折过去，嘴里随时都在哼哼着，面孔苍黑得像涂过一层灰。哼哼着，吐着痰，再也不能做别的事情，只能在近似行乞的情况下，把自己的生命延续下去。

4. 终于有了三只兔子

叔父把家搬到佛山街南头之后不久，就外出了。当他从望口山回到家中时，随行的仆人挑了一担子东西，上面是用蒲包装着的有名的肥城桃，散发着诱人的香气。下面是一个木笼子，正想探究里面会装些什么东西，仆人却已经把木笼子举到季羨林的眼前了。

这一惊可非同小可，原来里面装着三只兔子：一只大的，黑色；两只小的，白色。战栗似地颤动着的嘴，透亮的长长的耳朵，红亮的宝石似的眼睛。在官庄梦寐以求的兔子，现在竟这样容易地得到了。这真让他又惊又喜，想不到在叔父去望口山以前，也不过随意一说，让他带几只兔子回来，现在居然带回来了。他顾不得去吃那美味的肥桃，而是东跑西跑，忙着找白菜，找豆芽，喂这三只可爱的小动物。然后又替它们张罗住处，先后找了几个地方都不合适，最后就决定让它们住在他自己的床下了。

六岁多的孩子，一下子得到自己盼望了许久的心爱之物，那个高兴劲，自然是可以想象得出的。在官庄的时候，要伏在邻居家兔子洞口才能看到的東西，现在居然有三只伏在自己的床下，季羨林感到自己简直是处在童话世界之中了。

把兔子从笼子里放出来，立刻就有猫挤上来。兔子伏在地上，一点也不敢动，耳朵紧贴在头上，三瓣嘴颤动得更加厉害。兔子虽然没有意识，但显然知道猫是自己的天敌，那种胆怯劲，已经暴露无遗了。

季羨林把猫赶走，兔子这才慢慢地试着跑。可一转眼，三只兔子都窜到花盆后边了。再一转眼，又都跑到床下边去了。

有了这三只兔子，躺在床上，高兴着，辗转着，他怎么也睡不沉了。听着兔子在床下嚼着豆芽，发着轻微的咯吱咯吱声，他仿佛浮在云堆里，不知道自己在做着什么奇异的梦。

到了白天，兔子和小主人熟了起来，开始捉迷藏。季羨林刚一坐到靠窗的一张桌子边，开始按叔父的要求读书了，兔子偷偷地从床下面溜了出来，没有一点声音。他从书页上面屏息地看着它们：先是大的一探头，又缩回去；再一探头，蹦跳着出来了，一溜黑烟似地快。紧随着是两只小白兔，白得一团雪似的，眼睛红亮得像玛瑙，但比玛瑙还光莹。小白兔就用这红亮的眼睛四面看着，蹦跳 to 花盆下面，躲在拂着地面的草叶下面，嘴战栗似地颤动几下，停一停，蹦到书架旁边，嘴战栗似地颤动几下，停一停，蹦到小凳下面。

忽然间，季羨林觉得有个软茸茸的东西靠到脚上了，他忍耐着，不敢动。可不知怎地，他的腿忽然一抽，只见一溜黑烟，两溜白烟，三只兔子便都藏到床下面了。小主人伏下身子去看，床下面暗黑的角隅里，莹透的宝石似的三双眼睛，闪亮着。

大半个秋天，朝夕和三只兔子相处在一起，日子就在这种颇具诗意的情况下过去。提心吊胆的事是有的，那就是得防备猫。为了不让猫进屋，小主人总是把门关得严严的。但窗外有一棵海棠树，猫有时就从这棵海棠树上进到屋里。最担心的是晚上，只要窗外风吹落叶，有窸窣的响声，他总疑心是猫从海棠树爬上屋子的窗户。看看周围，不见有猫进屋。刚要朦胧睡去的时候，忽然听到“咪”的一声，看看窗子上破了一个洞的地方，两只灯似的猫眼向里瞅着，闪着攫取的光。为此，他不得不常常把猫赶跑。

早晨起来，放心不下的事，就是伏下身子看床下，兔子丢了没有。日子一天天过去，三只兔子和小主人更熟了，当有一只小白兔第一次很驯顺地让小主人抚摸的时候，小主人简直高兴得流泪。

兔子的胆子也渐渐大起来，黑色的大兔子胆子更大了，常常自己偷跑到天井里去，往往要找一圈才能找到它。

就在秋末一个蓝天的早晨，季羨林起了床，又照例伏下身子，去看床下的兔子丢了没有。奇怪，床下好像空空的，仿佛少了什么东西。仔细一看，两只小白兔依偎在一起，可那只黑色的大兔子呢？它哪里去了呢？小主人立刻慌了，汗流遍了全身。

这只黑色的大兔子，从一开始就被季羨林当做两只小白兔的母亲。母亲丢了，他赶快去为它们俩找母亲，可是各处找遍了，屋里，屋外，床下，花盆边，海棠树下，都找过了，还是没有踪影。回头再看看两只依偎在一起的小白兔，一种莫名的凄凉袭进了他的心。他哭了，他想到自己也是离开母亲的，为此，他时常想到她，时常感到凄凉和寂寞，他从两只小白兔身上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但小白兔更可怜，因为他至少还可以在梦里倾诉凄凉和寂寞，可小白兔又会在哪里倾诉呢？

他和它们俩同命相怜，他想用自己的爱抚去弥补它们失掉母爱的悲哀，但他已无力回天，眼看着它们渐渐消瘦下去。看到它们蹒跚地走开，小小的心里，充满了无名的悲哀。

后来，小白兔又丢了一只。剩下最后的一只，先是耳朵上有了一点血痕，不几天也失踪了。这时候，他反而不哭了，只把眼泪流到肚子里，悲哀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他又想到留在故乡里的母亲。

暗淡的灯照彻了冷寂的秋夜，外面又有什么东西在窸窣地响。冷粟，寂寞，再加上一点轻微空漠的悲哀，压在一个六岁孩子的心头。他生平第一次感到，一切都空虚。

5. 叔父和婶母

父亲和母亲都留在故乡官庄。

季羨林住在叔父家里。他虽然还管他们叫叔父和婶母，但实际上，他们是等同于自己的父亲和母亲的，他们把季羨林当做亲生儿子来抚养。

叔父第一次在济南没有立住脚，在东北买了湖北赈灾奖券中了头奖之后，他第二次回到了济南。这次，虽然经过不知多少艰难险阻，但终于立定了脚跟，在黄河河务局谋得了一个小职员的位置。家境虽说不上富裕，但总算无衣食之虞。

对于叔父，季羨林一向是又佩服又尊敬的，他在 20 世纪 90 年代写成的一篇文章里，充满感情地说：

叔父是一个非常有天才的人。他并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在颠沛流离中，完全靠自学，获得了知识和本领。他能作诗，能填词，能写字，能刻图章。中国古书也读了不少。按照他的出身，他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对宋明理学发生兴趣；然而他竟然发生了兴趣，而且还极为浓烈，非同一般。这件事我至今大惑不解。我每看到他正襟危坐，威仪俨然，在读《皇清经解》一类十分枯燥的书时，我都觉得滑稽可笑。

[40]

季羨林是季家惟一传宗接代的人，叔父自然很关心对他的教育。

为了上学，叔父要重新给取名，因为按照原来的名字季宝山，是根据季宝庆这个同族的名字起的，而季宝庆早逝，就不想再用这个名字了。五里长屯有个季元林，是同辈的。按照季元林的辈份是要取林字辈的，但是叫慕林还是叫羨林，叔父犹豫不决，请教一位教师朋友，被确定为季羨林。那位教师说，因为慕林的发音，接近上海话阿木林——傻瓜蛋（“阿木林”是上海人用来形容某人不谙世道、做事不灵活，为人迟钝，易轻信人的意思。因为“木（mù）”和上海话里的“漠（mò）知漠觉”是谐音，所以人们逐渐叫上了口。也就放过阿金阿土阿火，而独尊“阿木林”了），会一辈子倒霉。

叔父先是把季羨林送进一个私塾里，私塾先生是个白胡子老头，面色严峻，令人望而生畏。每天入学，总是先向孔子牌位行礼，然后再念“赵钱孙李”，在这里念的书不外是《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四书》之类。

在私塾里念了不到一年，叔父又把他送进一所新式的小学校，济

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

这个小学在南城根旧城墙里面，在一个叫“升官街”的街上。街名看上去很堂皇，可实际上，“官”者，“棺”也，原来整条街都是做棺材的。

这时，已经是 1919 年了，季羨林也已经九岁。五四运动波及了山东。小学校长由济南第一师范校长王大牛（士栋）兼任，他是个新派人物，在山东得风气之先。他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在济南率先采用了白话文教科书。不是从《百家姓》、《三字经》念起，而是念人、手、足、刀、尺了。

在小学生眼里，校长是个大人物，轻易见不到面。对老师，表面上都很尊敬。学生见了老师，老远要鞠躬如也，像老鼠避猫似地躲在一旁。老师对学生很严厉，学生经常受到老师的体罚，用手拧耳朵，用戒尺打手心，是老师最常用的方式。学生自然是逆来顺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也偶尔反抗一下。

国文教科书里有一篇寓言，名叫《阿拉伯的骆驼》，是当时国际上流行的讲得寸进尺的故事。巧得很，这篇课文偏偏被叔父看到了，叔父勃然大怒，喊道：“骆驼怎么能说话呀！这简直是胡闹！赶快转学！”

于是，季羨林从济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转到新育小学。转学手续非常简单，只进行了一次口试，老师写了一个“骡”字，季羨林认得这个字，而同时进行转学口试的一个亲戚不认得。季羨林得到老师的垂青，直接插入高级小学一年级，而亲戚则被派进初级小学三年级。

一字之差，我硬是沾了一年的光。这就叫做人生！最初课本还是文言，后来则也随时代潮流改了白话，不但骆驼能说话，连乌龟蛤蟆都说起话来。叔父都置之不理了。[41]

就这样，叔父履行着父亲的职责，对幼小的季羨林进行着教育。而婶母和家中的一个佣人王妈，操持着家务。

从六岁骑着毛驴进济南，到 1930 年夏天考入清华大学，有将近

十三年，季羨林一直住在叔父婶母家里，是叔父婶母把他抚养成人的。对此，他从来不敢忘怀。

6. 童蒙难启

季羨林带了一颗充满欢欣与惊异的心，进了新育小学。

这个学校靠近南圩子墙，校园很空阔，树木很多。花草茂密，景色算是秀丽的。在用木架子支撑起来的一座柴门上面，悬着一块木匾，上面刻着四个字“循规蹈矩”。我当时并不懂这四个字的涵义，只觉得笔划多得好玩而已。我就天天从这个木匾下出出进进，上学，游戏。当时立匾者的用心到了后来我才了解，无非是想让小学生规规矩矩做好孩子而已。但是用了四个古怪的字，小孩子谁也不懂，结果形同虚设，多此一举。[42]

在另一个地方，他还回忆说：

校址靠近外城的城墙；很宽阔，有很多的树木，有假山和亭子，而且还有一个大水池。春天的时候，校园里开满了木槿花；木槿花谢了，又来了牡丹和芍药。靠近山洞有一棵很高大的树，一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在别的地方也似乎没有看到过。一到夏天，这树就结满了金黄色的豆子，垒垒垂垂地很是好看。有几次在黄昏的时候，自己一个人走到那里去捉蜻蜓，苍茫的暮色浮漫在池子上面，空中飞动蝙蝠的翅膀。只觉得似乎才一霎那的工夫，再看水面，已经有星星的影子在闪耀着暗淡的光了。这一切当然不像以前那一片黄色，它曾把当时的生活点缀得很有色彩。[43]

学校不算小，但校园里有点乡村味。从家里到学校路还挺远，且既曲折狭隘，又挺偏僻。每天一大早，季羨林就沿着这条小路去上学。这时周围还非常寂静，路上也没有什么行人。

季羨林对新育小学老师的印象，并不算好。不管是沙着声念古文的语文老师，还是讲数学的老师，都是年老的又装着威严的老师，这

自然引不起他的兴趣。上课的时候，他和其他顽皮的孩子一样，用小刀在桌子上刻花，在书本上画小人头。课堂上没有兴趣，便用课后来弥补。一下课，季羨林便随了几个小同伴，飞跑到离学校不远的一个小池子边上，去捉蝴蝶，或者去拣小石头子，打个水漂玩。幼小的整个心灵，也便倾注在蝴蝶的彩色翅膀上和小石头子的螺旋似的花纹里了。小石头子可是家乡的大平原上难以见到的。

学校里有趣的地方，是一个设在一间幽暗小屋的图书室。每天过午下了课，季羨林就往那里跑，这小屋的力量，甚至于大过外面这花的世界。

当时在这小屋里读的，是些封面很美丽、里面插图的色彩也很鲜艳的儿童读物。

但在当时，这些东西却给了我一些安慰。它们鼓动了我当时幼稚的幻想，把我带到动物的世界里，植物的世界里，月的国，虹的国里去翱翔。不止一次地，我在幻想里看到金色的翅膀的天使在一团金色的光里飞舞。终于自己也仿佛加入到里面去，一直到忘记了哪是天使，哪是自己，这些天使们就这样一直陪我到梦里去。[44]

这种幸福，只在这小图书室里才有。

课堂生活实在乏味，老师又那么严厉，动辄受罚，小孩子们终于受不了，起来造反了。

有一个珠算老师，眼睛长得凸出来，孩子们给他起个外号叫“稍迁”，就是临清叫的那种知了——蝉。他对孩子特别蛮横，打算盘不准错，错一个数，打一板子。而孩子们打算盘，都是初学，错上十个八个数，甚至上百个数，都是很难避免的。孩子们都挨过不少板子。孩子们便决定“架”（意思是赶走）他！他们商定：他来上课时，学生们上去把教桌弄翻，然后一起离开教室，躲到假山背后。他们觉得老师无颜见人，非卷铺盖回家不可。但是，有几个孩子想拍老师的马屁，没有离开教室。这样一来，长了老师的气焰，威风大振，造反的孩子们被用大竹板子狠狠地打了手心，手肿得像发面馒头。另一次是

对图画老师，他脾气暴烈，伸手就打人，孩子们团结一致向他示威，他知难而退，辞职不干了。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每天还是去新育小学上学。但在学校里，感兴趣的自然不是听课，而仍然是捉蝴蝶，找石子。

有一次，在早晨上学的路上，他遇到一个挑着担子卖绿豆小米的，这是一个近于老境的中年人，有一张纯朴的老实的北方农民的脸。不知怎么的，季羨林初次看到他，看到他的微笑，既感到有点窘，也有点害臊，赶紧避开了他。但整整的一天，这个人的微笑老在季羨林眼前晃动。

第二天一早，季羨林刚要出大门去上学，在门口遇到他，担子放在家门口，王妈正在同他争论着小米和绿豆的价钱。这位中年人，一看到季羨林，脸上立刻又浮上微笑，嘴动了动，要说话。这微笑使季羨林更有点窘，也更害怕，赶紧避开他，匆匆地去上学。

就这样，接连几天，天天早晨都要遇到这位中年人。每天放了学回家，就买他的绿豆和小米熬成的稀饭喝。见面多了，季羨林不再避开他。这才知道，原来他是蛮喜欢小孩子的。他开始说一些离奇怪诞的话，什么他见过比象还要大的老鼠；什么一个馒头皮竟有四里地厚，一个人啃了几个月才啃到馅；什么一只鸡下了个比西瓜还大的蛋；什么一个穷小子娶了个仙女；……一看到孩子瞪大了惊愕的眼睛看着他，这中年男子竟孩子似地笑起来。

春天，放了学，季羨林坐在家中的小屋里，小屋白天也黑黝黝的，仅有的一个窗户，上面糊满了纸，把光都遮住了。窗外有一棵山丁香，正在开着花，到处都充满了花香鸟语的春光。暮色降临了，季羨林不再想这个中年人，他的心被星光吸引住，被蝙蝠的翅膀拖到苍茫的太空里去了。

春天过去，是长长的暑假。接着是瑟缩的秋天。秋天里，季羨林愿意看落叶在西风里颤抖，听秋蝉的嘶声从黄了顶的树上飘下来。跟着来了冬天。他愿意看白雪装点的桔树，在下雪的早晨，和小伙伴们

堆雪人，晚上则在自家的小院里捉迷藏，也听听大雪天寒鸦冷峭的鸣声。

季节在轮换着，但每天上学的时候，却不管春夏秋冬夏，仍然能碰到这个中年男子。

第二年，春天将尽，夏天又要来了。季羨林的心情微微起了点变化，总感到有点轻微的不满足。学校里在桌上刻花、在书本上画人头，已经腻烦了，沙着声念古文的老师，更让他讨厌得不可名状。老实的中年人，不管说什么荒唐话，再也不能引起他的兴趣。以前把蝴蝶的彩色翅膀和小石子的花纹，当成快乐的天堂，这时也再不感到有趣，空灵的天堂也幻灭了，他渴望着有一个新的天堂。

叔父的管教仍然很严，《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小说，他都认为是“闲书”，绝对禁止看。但叔父越管得严，反而越触发了季羨林的逆反心理，偏要拗着劲去看这些“闲书”，不少旧小说，包括《金瓶梅》、《西厢记》等几十种，他都偷着看了个遍。有时候，是放学后不回家，躲在砖瓦堆里看；有时候，是在被窝里用手电照着看；有时候，在家里也看，但这可得使点心计：他书桌下面有一个盛白面的大缸，上面盖着一个用高粱秆编成的“盖垫”。他坐在桌旁，桌上摆着《四书》，看的却是闲书。《红楼梦》内容大概太深，他看不懂其中的奥妙，林黛玉整天价哭哭啼啼，也为他所不喜，看不下去。其他书看得都是津津有味。冷不防叔父闯进来，他赶忙掀起盖垫，把闲书往里一推，嘴里又念起“子曰”、“诗云”来。

无论如何，季羨林在这时还没有离开浑沌时期，除了吃喝玩乐，什么都不懂。甚至跟别的孩子打架也懵懵懂懂，打起架来，他闭紧了眼睛，乱挥拳头。这架势，也只有挨打的份了。

7. 想当绿林好汉

就在这个时候，季羨林看闲书入了迷，开始看《彭公案》之类的

武侠小说，想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

武侠小说给他描绘了一个新奇的世界，一个人会凭空上屋，飞檐走壁；一张嘴，会吐出一道白光，敌人的头就在这白光里掉落下来。这样的神奇天地，自然是蝴蝶翅膀和小石子的花纹里找不到的。新的世界挑起了季羨林的求知欲。

最初读这些武侠小说，有许多不认识的字。但求知欲刺激他继续看下去，通过书中的插图，去明了书中的含意。一看到书中的插图，一个个有着同普通人不一样的眼、眉、胡子，手里都拿着刀啊，枪啊什么的，这些小人便占据了他整个的心。

为了读这些小说，季羨林开始逃学。有时候，整整一个下午，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去读小说。黄昏时分，装着放学回家的样子回家去，红着脸对付叔父和婶母的询问，而脑子里仍然满装着剑仙剑侠之流飞腾的影子。晚上，也睡不深沉，梦中也能见到武侠的影子。巴不得天快亮，看到窗纸上微微有白光在晃动，王妈起来纺线，季羨林便悄悄地拿一本武侠小说，就着王妈纺线的灯光，瞅着一行行蚂蚁似的小字，瞅着瞅着，小字也就像蚂蚁似地活动起来。

受这类武侠小说的影响，季羨林开始有了雄心壮志：想当个绿林英雄，如何一张嘴也吐出一道白光，敌人的头便在白光里掉在地上；如何一抬腿，便能在黑夜的屋顶上、树顶上飞。一闭眼，蓦地有一条黑影一晃，来了能人，他便一张嘴，一道白光射出去，眼看着这个能人从几十丈高的墙上翻落下去。这可真是天下的一大快事！

但是，小朋友们告诉他，光这样想是不行的，还得苦练。他于是学着打铁沙掌，学练隔山打牛。回到家，便开始实行，看到家里没有人的时候，他便开始练铁沙掌，把手不停地向盛着大米或绿豆的缸里插，插到整个手都麻木了，抽出手来一看，指甲与肉连着的地方，已经磨出了血。铁沙掌难练成了，便练隔山打牛。在帐子顶上，悬上一个纸球，每天早晨起床之前，先向空中打上一百掌。倘若能把纸球打动，据说就能百步打人了。晚上，也顾不上去嗅小院里夜来香的幽

香，而是在花丛中，背上斜插一条量布用的尺子，当做宝剑，在同时玩的小孩面前，便凛凛然，仿佛有不可一世的气概。

可是这样练来练去，功夫不见有什么长进，手往大米或绿豆里插，流着血疼痛得不能再练，纸球打来打去，也不见球能微微地动一动。季羨林心里想，这剑仙剑侠看样子也不好当。又听别人说，这剑仙剑侠一类的神人，只有古时候有，现在不会再有了。那么，做剑仙剑侠不成，可也不能放弃雄心壮志，绿林好汉总还是要向往的。

当时，季羨林心目中的绿林好汉也不同平常人一样，他们该有红胡子，花脸，蓝眼睛，一生气也就杀人了。于是，梦中便常见到青面红发的人，在自己的屋子里跳。

几天来，上学的路上，也还能看到那个老实的中年北方农民。他缠着季羨林给他讲剑侠剑仙之类的故事，但他不知道，季羨林这时已放弃了剑侠剑仙，而是有了新的向往，新的追求。

又过了些日子，上学的路上不再能见到这个人了。早晨这么寂静，季羨林心里感觉到缺了点什么。

这样子过了一个多月，天更高、更蓝了，已经是萧瑟的淡黄色的秋天了。还是不见这位中年人。有一天黄昏，不知有件什么事，季羨林走过一条通到墟子外古老的石头街上去。只见街两边都挤满了人，人们都伸长了脖颈，仿佛期待什么似的。

我也站下来。一问，才知道今天要到墟子外河滩里杀土匪。这使我惊奇。我倒要看看杀人到底是什么样子。不久，就看见刽子手蹒跚地走了过去，背着血痕斑剥的一个包，里面是刀。接着是马队步队。在这一队人的中间是反手缚着的犯人，脸色比蜡还黄。别人是啧啧地说这家伙没种的时候，我却奇怪起来：为什么这人这样像那卖绿豆小米的老实的中年人呢？随着就听到四周的人说：这人怎样在乡里因为没饭吃作了土匪；后来洗了手，避到济南来卖绿豆小米；终于给人发现了捉起来。我的心立刻冰冷了，头嗡嗡地响。我却终于跟了人群到墟子外去。上千上万的人站成了一个圈子，这老实的中年人跪在正

中，只见刀一闪，一道红的血光在我眼前一闪。我的眼花了。回看西天的晚霞正在天边上结成了一朵大大的红的花。[45]

这样的—个中年男子，近于老境的老实农民，有着北方农民特有的纯朴的面孔，过来过去每天都在上学的路上看到他，卖着绿豆小米，原来就是个绿林英雄，当过土匪，杀过富，济过贫。小小的季羨林茫然了。第二天上学的路上，到处都泛着红的血光的影子，在残蝉的声里，他也仿佛听出红色的声音，小石子的花纹也都转成红的了。

从此，季羨林再也不想当绿林英雄了。

8. 开始对英语感兴趣

在新育小学，季羨林就这样过得平平常常，平淡无奇。他不用功，玩的时候多，念书的时候少。班上有一个比他大五六岁的孩子，叫李玉和，年年都是考甲等第一。虽然也是个孩子，但好像已经很成熟了，死记硬背，刻苦努力，天天皱着眉头，不见笑容，也不同于一般大小的同学们打闹。对这样的一位学长，季羨林一点也没有敬意，觉得他非己族类，有点瞧不起的意思。季羨林常说，自己少无大志，一点也不想争那个状元第一。学习既没有什么动力，三年小学没有什么拔尖的成绩，考过两个甲等第三（只设三名甲等），两个乙等第一，还可以算是上等生，如此而已。

但是在这里意外的收获也有，这就是从这个学校开始学英语。当时的正规小学并不设英语课，季羨林学英语是利用业余时间，上课多是在晚上。学习的机会纯属偶然，大概是这个小学有一位老师会一点英文，他答应晚上可以教一点，但是要收点学费。这样，一个业余英语学习班便组成了，大约有十几个孩子便凑合成一个班集体。

对于少年的季羨林来说，外语是一种非常神奇的东西。他当时认

为，中国的方块字是天经地义，不用方块字，只写一些弯弯曲曲像蚯蚓爬过的痕迹一样的东西，居然也能发出声来，还能有意思，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越是神秘的东西，便越有吸引力。英语对于季羨林来说，就有极大的吸引力，他万没有想到，望起来如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竟然唾手可得了。

事实上，当时学习英语的时间并不长，学的东西自然也不多。二十六个字母学完之后，又学了一些单词，还多少学了点语法。当时最让他伤脑筋的是所谓“动词”，to be 和 have 一点也没有动的意思，为什么竟然叫动词呢？他问老师，老师说不清楚，其他人也说不清楚。后来，他才弄明白，把英文 verb（拉丁文 verbum）译为“动词”是不够确切的，容易给初学英语的孩子造成误会。

奇怪的是，每次去学校参加晚上举办的英语学习，总有一种非常好的感觉。每次走过学校，眼前总有一团零乱的花影，是绛紫色的芍药花。原来在新育小学校长办公室前的院子里，有几个花畦，春天一到，芍药盛开，都是绛紫色的花朵。白天走过的时候，紫花绿叶，那是很分明的。可到了晚上，英文课结束了，再走过这个院子，紫花与绿叶已化为一个颜色，朦朦胧胧的一堆一团，可白天的印象还在，所以觉得它们的花叶还是分明的。夜晚的朦胧，更增加了花影的神秘，但鼻子闻到的花香，确然证明着花的存在，于是这样的印记便永远留在了脑海里。季羨林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

这一幅情景伴随了我一生，只要一想起学习英文，这一幅美妙无比的情景就浮现到眼前来，带给我无量的幸福与快乐。[46]

从初学英语开始，就有了这样一种好感觉。扩大到其他外文的学习，他可能也闻到了这种芍药花的香味，难怪他后来学习外语一发而不可收拾，原来都是芍药仙子陪伴他的结果。看来，学习一种东西，兴趣是相当要紧的，有了兴趣，就有了动力，动力就是芍药仙子。

在黑暗中，走过一片种满了芍药花的花畦，紫色的芍药花同绿色的叶子化成了一个颜色，清香似乎扑入鼻官。从那以后，在几十年的

漫长的岁月中，学习英文总同美丽的芍药花联在一起，成为美丽的回忆。[47]

四、山东大学附属中学的“四连冠”

1. 初中只能考正谊

1924 年，季羨林 13 岁。

他生平第一次面临一种选择。这一年，他小学毕业，要考初中了。

当时，济南市，乃至山东省，最好的中学是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孩子们把它称为山东中学的拿摩温。

季羨林因为少无大志，自知小学成绩不是最好的，癞蛤蟆不敢吃天鹅肉，不敢投考当时大名鼎鼎的山东省立第一中学，甚至连去报名的勇气都没有。他觉得按自己的成绩，只配入“破正谊”，或者“烂育英”。这两个学校招生的标准自然都不高，结果，他去报考“破正谊”。

正谊中学虽“破”，但新生入学考试居然考了英语。他万万没有想到，就是由于小学学的这一点英语知识，使他报考中学时沾了半年光。英语考试出的题目是汉语译英语，只有一句话：“我新得了一本书，已经读了几页，可是有些字我不认得。”季羨林把它翻译出来了，但当时不知道“已经”这个词的英文译法，所以把他也苦恼了很长时间。结果，季羨林被录取，而且不是新生一年级，而是一年半级。

正谊中学虽有“破”名，但学校环境异常优美，背靠大明湖，一条清溪流经校舍。到了夏天，杨柳参天，蝉声满园，后面又有万顷苇绿，十里荷香，不啻人间仙境，天堂乐园。优美的学习环境并没有刺激起季羨林的上进心，他学习依然不努力，成绩倒也不坏，总是徘徊

在甲等后几名、乙等前几名之间，属于上中水平。在这里，继续学习英语。英语列入正式课程，英文老师则时有更换。这些孩子们并不老实，往往要试试新老老师的本领如何。有一次，换了一个英语老师，孩子们都觉得他不怎么样，出于一种少年心理，他们便想出一个高招来测试他。于是，从字典里找了一个短语 by the by。这个短语并不稀见，但孩子们从来没有读到过，觉得很深奥，便以此去问老师。老师没能答出来，脸上露出愧色。下次他见到他们，说：你们大概是从字典上查来的吧？孩子们笑而不答。这位老师颇宽宏大量，不对恶作剧的学生进行打击报复。就这样，念不少英文书。初中毕业是在春天，只得在这里又念了半年高中。教英文的郑又桥老师，是南方人，英文水平很高，发音很好，教学又努力。只是他抽鸦片烟，早晨起得很晚，往往上课铃响了，还不到教室来，班长只得去他的住处催请。学生们写的英语作文，他很少改动，而是一笔勾销，自己重写一遍。用力之勤苦，是可以想见的。对这位老师，季羨林印象颇好，后来还常说，从那以后，自己学习英语又同美丽的校园和一位古怪的老师联在一起，也算是一种美丽的回忆了。[48]

从年龄上看，季羨林是班上最小的，孩子的玩心很浓。上课之余，他大半是跑到学校后面大明湖畔去钓虾，抓蛤蟆，不知用功是何物。生活自然找不出什么有声有色的东西，单调、死板、固执，是他当时生活的写照。玩起来，从来没有什么玩具，自己弄个细铁条，把它弯成一圈，再弄个小铁钩，一推，圆圈就能跑起来，他自己也就非常高兴了。

正谊中学的正式课程，有国文、英语、数学、物理、生物、地理、历史。国文课主要是念《古文观止》一类的书，要求学生们背诵。英语课念《泰西五十轶事》、《天方夜谭》、《莎氏乐府本事》等等。国文课连写作文也要求用文言，英语也布置写作文。这些课程季羨林除了英语，对其他的兴趣都一般。只是对小说的兴趣越来越浓，《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演义》、《说唐》、《说

岳》、《济公传》、《彭公案》、《三侠五义》、《玉历至宝钞》等等，都读了不老少。《西厢记》、《金瓶梅》一类的书也都看，只是对《红楼梦》还是不喜欢。小说之外，他读过宗白华的《三叶集》。

除了在学校上课，每天晚上还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语。校长冯鹏展是广东人，说一口蓝青官话。他的房子大得很，前面的一进院子学社占用，有四五间教室，按年级分班。后面的大院子，则是他全家的住处。冯老师最喜欢养蚰蚰，经常不惜重金，购买良种，斗起蚰蚰来，舍得下很大的赌注。季羨林也喜欢玩蚰蚰，只是没有钱买良种，便约几个同院的大孩子到荒山野外蔓草丛中去捉，捉到一只好蚰蚰，欣喜若狂。但季羨林不敢去赌，只不过随便玩玩而已。由此，他和冯老师引为同道。教英文的老师除冯老师，还有钮威如、陈鹤巢两位老师。钮老师满脸胡子，身体肥胖，用英语教历史。陈老师则是翩翩公子，注重衣饰，穿得很漂亮。这些老师英文水平都很高，教学也努力，使他学到不少东西。《纳氏文法》（Nesfield 的文法）因为艰深，学得很费劲，因而孩子们也非常崇拜，学到了内容丰富的语法。只是到后来，才知道这本文法是英国人专门写出来供殖民地人民学习英文之用的。

叔父一点也没放松对侄子的教育，对他期望极大，要求极严。季羨林后来在自己写的自传里说：

他自己亲自给我讲课，选了一本《课侄选文》，大都是些理学的文章。他并没有受过什么系统教育，但是他绝顶聪明，完全靠自学，经史子集都读了不少，能诗，善书，还能刻图章。他没有男孩子，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他严而慈，对我影响极大。我今天勉强学得了一些东西，都出于他之赐，我永远不会忘掉。根据他的要求，我在正谊下课以后，参加了一个古文学习班，读了《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书，当然对老师另给报酬。晚上，又要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文，一直到十点才回家。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八年。我当时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负担；但也不了解其深远意义，依然顽皮如

故，摸鱼钓虾而已。现在回想起来，我今天这一点不管多么单薄的基础不是那时打下的吗？[49]

又说：

叔父相信“中学为体”，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是否也相信“西学为用”呢？这一点我说不清楚。反正当时社会上都认为，学点洋玩意儿是能够升官发财的。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崇洋”，“媚外”则不见得。叔父心目中的“夷夏之辨”是很显然的。[50]

季羨林听说洋人中有一个叫爱因斯坦，虽然是男是女、是哪一国人他当时都不清楚，甚至相对论是什么，属于哪一个学科也不甚了了，但听说相对论在全世界只有七个半人懂，他便对爱因斯坦肃然起敬，认为学问到这个地步才真正算是学问。从此，他反对一切通俗化的举措，看不起一切通俗化的书籍。他开始崇拜专门家，专门研究一个问题的专家，问题的范围越小越好，牛角尖钻得越深越好，最好是一头钻进去，三年五载不出来，然后写出一篇论文来。这篇论文也许只有几个人肯读，几个人能读懂。但这样的专家在他眼中才真正是一个专家，值得他佩服。年纪小小的季羨林，已经开始对专家有所认识了。

在正谊中学上学期间，叔父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而老师中，印象最深的是鞠思敏先生。

2. 鞠思敏老师

鞠思敏老师是季羨林永世难忘的人。

鞠思敏老师个子魁梧，步履庄重，表情严肃却又可亲，给了季羨林极其深刻的印象。鞠老师是正谊中学校长，并不教课，只是在上朝会时，总是亲自对全校学生讲话。在这种每周一次或几次的朝会上，鞠老师讲的，无非是一些处世待人的道理，并没有什么惊人之论。但是，这些普通的道理，从他嘴里讲出来，那缓慢而低沉的声音，认真

而诚恳的态度，却总是能打动这些初中孩子们的心。

鞠老师不是一个卖嘴皮子的人，他一生着力追求的是言行一致、民族气节。到季羨林考上山东大学附属中学时，鞠老师受聘给学生们的上课，教伦理学，用的课本是蔡元培先生的《中国伦理学史》。

《中国伦理学史》是蔡元培先生运用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研究方法而编著出来的，是中国伦理学史的第一部较系统的著作。该书将中国伦理学史分为三个时代：先秦创始时代、汉唐继承时代、宋明理学时代，选取了从孔子到王守仁共二十八个代表人物的伦理思想，还附述了戴震、黄宗羲、俞正燮三位明清思想家的伦理学说。蔡元培先生在该书《序例》中说：“吾国夙重伦理学，而至今顾尚无伦理学史。迩际伦理界怀疑时代之托始，异方学说之分道而输入者，如槃如烛，几有互相冲突之势。苟不得吾族固有之思想系统以相为衡，则盖将彷徨于歧途。”蔡元培强调，中国古代因受儒家思想影响，一切精神界科学，悉以伦理为范围。这部著作初版于清宣统二年（1910），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时署名蔡振，到1927年已印行了十一版，在国内学术界影响是很大的。而且，该书所讲的道理，有的学生也已知道。但是，这样一部书，从鞠思敏老师嘴里讲出来，似乎新增加了分量，让人不得不相信，不得不去遵照执行。

后来，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济南，慕鞠思敏老师大名，想方设法，劝他出来为日本做事，以壮敌伪的声势。但鞠思敏先生总是严词拒绝。后来生计非常困难了，鞠先生每天只能吃开水泡煎饼，加上一点咸菜，这样来勉强度日，却始终未为五斗米折腰，终于在极度忧患之中郁郁逝世。

这样的一位老师，季羨林在离开高中以后再也没能见到他，但每每想到他那热爱青年的精神，热爱教育的毅力，热爱祖国的民族骨气，眼前总会浮现出他的影像，时间愈久，反而愈显得鲜明。每次想到济南，首先就会想到鞠老师。

至于这里的同学，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位同屋住的室友，是他终

生难忘的。这位同学把一个脸盆派上多种用途：早晨洗脸，晚上洗脚，夜里小便。这同学每天早晨，先到厕所把小便倒掉，然后用水一冲，立刻再倒上水洗脸。冬天里有一天起晚了，工友进来送洗脸水，一看脸盆里有黄色液体，以为不过是茶水什么的，便把热水倒在里边了。这位同学起来一看，也不好意思再喊工友，便一不做二不休，就用这尿水混合物洗起脸来，脸上的汗毛居然连动都不动。这可真是瓜子里嗑出臭虫来，什么仁（人）都有啊！

3. 王妈

从到了济南以后，季羨林的生活状况应该说比在故乡要好得多。不但能吃上白面馒头，而且还能吃上肉，但他总觉得日子非常难过，这种难过，是孩子离开母亲的难过。为此，季羨林多次从梦里哭着醒来，思母情结在苦苦地煎熬着他。

这时候，有另外一个女人，用自己的爱来填补季羨林离开母亲而形成的心灵空白。她就是王妈，叔父家中的一个佣人。

季羨林刚从故乡到济南的时候，王妈已经在叔父家来来往往地做着杂事了。

在最初的几个夏夜里，闷热退去，凉意袭来之时，季羨林从飘忽的梦境里醒转来，可看到窗纸上微微有点白，稍一沉心，立刻有嗡嗡的纺车的声音，混了一阵阵夜来香的幽香，传进了屋里。昏黄的灯光下，王妈坐在灯旁纺着麻，黑而大的影子投在墙上，合了夜来香花的影子在晃动着。

叔父第一次搬家，住进一条曲折的铺满了石头的佛山街上，王妈自然也跟了来。

这里的房子有点旧，墙上满是雨水的渍痕。屋子只有一个窗子，上面糊着窗纸，即使在白天，屋子也是暗沉沉的。屋外有个小小的院子，王妈摆上了夜来香。孩子们常和季羨林聚在一起，在夏日的黄

昏，仰卧在院子里的席子上，数天空里飞来飞去的蝙蝠。而有时，季羨林则对夜来香的黄花更感兴趣，最初只是一个长长的花苞，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它：还不开？还不开？蓦地再一眨眼，再看时，长长的花苞已经开放成伞似的黄花了。他觉得这样开的花简直是个奇迹，他很快乐，王妈也跟着高兴。每天她都把所有开过的花数一遍，可当她数着的时候，随时又有新的花在一闪一闪地开放着，她眼花缭乱了，数也数不清了。看了她那认真用心又慌张的样子，孩子们也都哄笑起来，季羨林的思母情结似乎也就被冲淡了一些。

王妈总是忙东忙西，在初秋的暴雨里，她提着篮子去买菜；在严冬大雪的早晨，她点着灯起来生炉子。冷风把她的手吹得像红萝卜似地裂开了缝，露出鲜红的肉来。从这只有着鲜红裂口的手，她表达出自己的感情，自己的脾气，表示出一个北方农民的固执与倔强。她特别注意季羨林衣服的寒暖，冬天里，她让他穿得暖和，夏夜里，她用大芭蕉扇为他驱赶蚊子。

后来，季羨林从昏黄的灯下听到她的叹息，从这低咽的叹息中，她告诉了她出来做佣工的苦衷。原来，她的丈夫是她村子里惟一的秀才，但没等考上举人就死去了，她自己被家里的妯娌们排挤，不得已才出来帮佣。她有一个儿子，因为在乡里没有饭吃，到关外做买卖去了，一个不大正经的儿媳妇还留在这济南市里。

从王妈所受的苦和平日的微笑里，季羨林已经领悟到：每个人尽管嘴角上常挂着微笑，但背后不知掩藏着怎样冷酷的生活，人们同样都被黑暗的命运支配着，而王妈就在这冷酷和黑暗的命运下，呻吟着活下来。他看透了她的凄凉，也了解了她的寂寞。

叔父又搬了一次家，在佛山街柴火市 73 号。房子稍好了一点，四壁已看不到雨痕和蜘蛛，每间屋子也都有了兩扇以上的玻璃窗子。西屋的窗前，有两棵高过房檐的海棠，刚搬进来是春天，树上还开着一团团的花。到了夏天，在院子里放一个养着子午莲的大水缸，种着几十棵凤仙花，还养了一丛丛的夜来香。黄昏时分，季羨林还是坐在

院子里数天上飞来飞去的蝙蝠，看着夜色慢慢织入夜来香的花丛里。在一片朦胧的薄暗里，一眨眼，眼前又是一片黄黄的伞似的花，幽香又跟着流过来。晚上对付了蚊子，好容易睡过去，做着形形色色的梦，等从飘忽的梦境里醒转来，窗上又有点白，纺车又在发出嗡嗡声，王妈的黑大的影子又合着夜来香的花影在晃动了。

进了新育小学，季羨林住到学校，每星期日回家一次。在学校死沉的空气里住过六天，到了家便觉得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一进家门，就先看到了王妈温暖的微笑。等到踏着暮色再回学校的时候，心里带走的是在家中感到的意外的轻松。学校生活惊人地单调，每天要听老先生沙着声念古文，拼命地在饭堂里抢馒头。感情冲动的时候，也同别人打打架，把从家中带去的轻松和温馨消磨掉，时间也就慢慢地过去了。

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季羨林不断地上学，王妈也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在叔父家当佣工，却一天天地老了。她仍然提着篮子去买菜，冬天老早起来生炉子，从走路的样子看来，她是有点老了。

后来，她的生活发生了一个大变化，她在关外的儿子回来了，当然是她把储蓄了几年的钱汇给他才回来的。

儿子回来，除了一床破棉被，就是一个有病的身子和一双连霹雳都听不到的耳朵。但终归是儿子，她为他的回来而高兴。不正经的儿媳妇也找了来，名正言顺地组成了一个家庭。儿子带着病，咳嗽着，一出一进，挑着满桶的泉水卖钱。有时，儿子买一个甜瓜或柿子，甚至几个小小的梨，拿来送给母亲吃。这时，儿子笑，不说话，母亲也笑，也不说话。这笑已经润湿了老人干枯的心，脸上也闪了红光，提着篮子买菜也更带劲儿，冬天早晨也起得更早，生命对她似乎是一杯香醪，她高兴地活下去，没有了寂寞，也没有了凄凉。

但这样的日子没有过多久，也就是一年多吧。中学里放了暑假，季羨林回到家中。黄昏里，躺在院子里的竹床上，仍然数天上的蝙蝠，欣赏着夜来香的花。但常听到王妈又在叹息，儿子病弱，拼命地

挑水，结果病得更厉害，媳妇又抽烟又喝酒，甚至在自己丈夫面前与别的男人调情。王妈为儿子的病焦灼，又生媳妇的气，却一点办法都没有，这有一颗简单的心的老人，也只有叹息了。

叹息，也不耽搁做活，做饭、洗衣服、扫地、擦桌子，家里那些琐琐碎碎的活全是她一个人干。夏末秋初，夜来香开花的时候，她又开始搓麻线，准备纳鞋底，给全家人做鞋。季羨林常侧着身子躺在那里，借着从窗子里流出来的微弱灯光，看她搓麻线。他意外地发现，她那一双手，上面长满了老茧。这双手看上去是那么拙笨，十个指头又短又粗，像是一些老干树枝子。但在季羨林这时候看来却显得灵巧而美丽。那些杂乱无章的麻缕，在这双手的摆布下，服服帖帖，要长就长，要短就短，一点儿也不敢违抗。这双手就这样左旋右转，搓呀搓呀，一刻也不停，似乎把夜来香的香气也搓进麻线里了。

看着这双手，季羨林又想到了乡下的母亲。母亲做饭、洗衣服、打水、种菜、养猪、喂鸡，也有一双这样的长满了老茧的手。看着看着，季羨林沉沉入睡了。他梦到刚进济南的头几年，到了深夜，王妈把他抱到屋里去，睡在她的那张床上。半夜醒来，还听到她手里拿着大芭蕉扇在为他赶蚊子。直到后来，季羨林也没忘王妈对他的恩德。在 1935 年写成的一篇文章中，季羨林写道：

四年前，为了一个近于荒诞的理想，我从故乡来到这辽远的故都里。我看到的自然是另一个新的世界，但这世界却不能吸引着我；我时常想到王妈，想到她数夜来香的神情，想到她红萝卜似地开了鲜红裂口的手。[51]

季羨林上了大学的第二年，寒假回济南，再也没有看到王妈。王妈自己先是有了病，眼也长了白内障。她不想死，请医生，供神水，喝符，用大葱叶包起七只活着的蜘蛛生吞下去，还用了她能搜集到的一切偏方正方，几个月以后，身子略有好转，眼睛却只剩下了一只。再后来，儿子死了，她在一个严冬的大风雪里，在灰黯的长天下，坐在一辆独轮小车上，带着独子的棺材，被人推着，回到自己的故乡里

去。她艰苦地追求了一辈子，终于什么也没有得到。在穷僻的小村里，自己的房子没有了，只好借住在亲戚家里，剩下的一只眼睛也哭得失了明。最后在忧郁中慢慢地死去。

当听到王妈死去的消息时，季羨林的痛苦是可以想得到的：

王妈死了。我哭都没哭，我的眼泪都堆在心里，永远地。现在我的眼前更亮，我认识了怎样叫人生，怎样叫命运。——小小的院子里仍然挤满了夜来香。黄昏里我仍然坐在院子里的竹床上，悲哀沉重地压住了我的心。我没有心绪再数蝙蝠了。在沉寂里，夜来香自己一闪一闪地开放着，却没有人再去数它们。半夜里，当我再从飘忽的梦境里醒转来的时候，看不到窗上的微微的白光，也再听不到嗡嗡的纺车的声音，自然更看不到照在墙上的黑而大的影子在合着历乱的枝影晃动。一切都死样的沉寂。我的心寂寞得像古潭。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整夜散放着幽香的夜来香的伞似的黄花枝枝都枯萎了。没了王妈，夜来香哪能不感到寂寞呢？[52]

到上世纪 60 年代，季羨林在从城里坐公共汽车回家途中，偶然见到了一位老妇人，看到她那长满了老茧的一双手，他想到了母亲，想到了王妈。面对这样一双长满老茧的手，他不无深情地说：

这样一双手我是熟悉的，它同母亲的那一双手是多么相像呀。我总想多看上几眼。看着看着，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竟沉沉睡去了。到了深夜，王妈就把我抱到屋里去，同她睡在一张床上。半夜醒来，还听到她手里拿着大芭蕉扇给我赶蚊子。在矇矓眈眈中，扇子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似的。[53]

4. 海棠花和夹竹桃

叔父、婶母、王妈，在济南的十几年中，都是季羨林相依为命的亲人。除了他们，季羨林最亲近的还有两样东西：海棠花和夹竹桃。海棠花常勾起他的乡思，夹竹桃教给他韧性。

叔父第二次搬家到佛山街南头，院子里有两棵海棠树，枝干都非常粗大，最高的枝子高过房顶，秋后，叶子落光，尖尖的顶枝直刺着蔚蓝悠悠的天空，季羨林总是要默默地看上半天，自己的幻想也仿佛跟着高爬上去。

一个春天海棠开花的季节。在一天的黄昏，季羨林同几个小伙伴去家南边的一个高崖子上游玩。站在地势高的崖子上，向北一看，看到一片屋顶，就在这房顶之上，蓦地看到一树繁花的尖顶，绚烂得像是西天的晚霞。季羨林当时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其中还夹杂着一点渴望，渴望自己能够走到这树下去看上一看。于是，他便按照房屋中的空隙街道数起来，数来数去，终于发现，原来那就是自己家里那两棵海棠树。他立刻兴奋地跑下崖头，回到家里，站在海棠树下，欣赏着那开得团团滚滚的花朵，一直站到淡红的花团渐渐消逝到暮色里去，只朦胧留下一片淡白。

夏天，两棵海棠已经密密层层地盖满了大叶子，已经难以让人回忆起上面曾经开过团团滚滚的花。长昼无聊，他躺在屋子里面地上的席子上睡觉，醒来往往觉得一枕清凉，非常舒服，抬头看到窗户上历历乱乱地布满了叶影；白天，他坐在窗前看书，满窗浓绿，不时有一只绿色的虫子在树干上慢慢爬过去，一下子让他想起在深山大泽中的行人。蜗牛也在树上爬，爬过的痕迹就像是山间林中蜿蜒的小路。就这样，他一看能看上半天。晚上吃过晚饭，就搬张椅子坐在海棠树下乘凉，从叶子的空隙处看灰色的天空，上面镶嵌着一颗一颗的星。结在海棠树与屋檐边中间的蜘蛛网，借了星星的微光，把影子投在天幕上。一切是这样静，他什么也不想，只让睡意轻轻地压上眉头，一觉醒来，听到海棠叶子窸窣窸窣地响，他知道，外面下雨了。

就这样，海棠树的花、叶、枝头，绿色的小虫，蜗牛的痕迹，灰色的天空，闪闪的星星，有时候还有王妈用扇子赶蚊子的声音，这一切的一切，似乎将济南的夏夜编成了一首诗，谱成了一支歌。于是，他就把这海棠树和自己的家联系在一起，以后离开了家，一看到海棠

树、海棠花，就想起了“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济南，就想起了自己在济南的家，引起了一串串的乡情、乡思、乡恋。

十几年后，季羡林在德国住了六年，有一天早晨，他忽然看到人家园子里盛开的海棠花。他的心一动，乡思浓浓地压上心头，无法排解。

乡思并不是很舒服的事情，但是在这垂尽的五月天，当自己心里填满了忧愁的时候，有这么一团十分浓烈的乡思压在心头，令人感到痛苦。同时我却又有点爱惜这一点乡思，欣赏这一点乡思。它使我想到了：我是一个有故乡和祖国的人。故乡和祖国虽然远在天边，但是现在它们却近在眼前。我离开它们的时间愈远，它们却离我愈近。我的祖国正在苦难中，我是多么想看到它呀！把祖国召唤到我眼前来的，似乎就是这海棠花，我应该感激它才是。[54]

很明显，海棠花就是家，就是故乡，就是祖国！

在叔父家里，还常年种着一种平常的花——夹竹桃。

夹竹桃自然不是名贵的花，也并不算美丽，但在季羡林在济南住的这些日子里，济南几乎家家都种上几盆夹竹桃，摆在大门内影壁墙下，正对着大门口。有客人进家，扑鼻而来的是一阵幽香，绿蜡似的叶子，红霞或白雪似的花朵，足让人有宾至如归之感。

叔父家大门内也有两盆夹竹桃，一盆开红花，一盆开白花。季羡林天天从这两盆花下面走出走进。红色花朵让他想到火，白色花朵让他想到雪。火与雪是不相容的，但这两盆花却融洽地开在一起，宛如火上有雪，雪上有火，他顾而乐之，幼小的心灵里觉得奇妙而有趣。

院子里的花应有尽有，春天，迎春花开着黄花，报告春的消息，接着是桃花、杏花、海棠、榆叶梅、丁香等，整个院子常是花团锦簇的。夏天，凤仙花，石竹花，鸡冠花，五色梅，江西腊，更是开得五彩缤纷，满院葳蕤。还有夜来香的香气，熏透了整个庭院。秋天，先是玉簪花带来凄凉的寒意，接着是菊花报告花事的结束。一年三季，花开花落，没有间歇，情景既美，变化又多，真是美不胜收。

但是惟独这夹竹桃，在那里静悄悄一声不响，一朵花败了，又开出一朵，一嘟噜凋落了，又长出一嘟噜。不管是和煦的春风，还是盛夏的暴雨，或是深秋的清冷，它都一如既往，既看不出特别茂盛，也看不出特别衰败，从迎春花开之日到玉簪花和菊花开时，它无不奉陪，从春天一直到秋天，无日不迎风弄姿。正是夹竹桃的这一点韧性，引起季羨林无限的幻想，万花丛中他更喜欢夹竹桃了。

也许，季羨林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做学问，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从来没有一丝的懈怠，正是夹竹桃这种韧性的写照吧！

5. 送礼的小插曲

齐鲁这块丰厚的文化土壤，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济南这个地方，自然也不例外。

“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杜甫留在大明湖历下亭上的两句诗，揭示了济南多出名士的秘密。这些名士中有多少礼仪之士的典雅而有趣的动人故事，自不用说。单从普通百姓之间五花八门的送礼礼俗，有常态的，也有变态的，就够让人动情的了。常态的，可看到民风之淳朴可爱；变态的，则让人看到人的真性情之被扭曲，也算是各得其所。

季羨林住在济南的这条佛山街上，住着一个穷人，邻居们都管他叫“地方”，有学问的人说，这个头衔几乎就等于汉朝的亭长。

每逢过年过节的早上，叔父家的大门一开，就会看到这个“地方”，笑嘻嘻地，一手提着一只鸡，一手提着两瓶酒，跨进大门来。鸡咯咯地叫，酒瓶上的红签红得眩人，“地方”嘴里还嫌不够，还要大声喊着：“给老爷太太送礼来了。”婶母便拿出几毛钱，让王妈送出去给他。这“地方”接了钱，也不谦让，却仍旧提了鸡和酒瓶子笑嘻嘻地走到另一家喊叫着去“送礼”了。

这样的“送礼”，季羨林一年里至少要见三次，后来也就习以为

常，不足为奇了。

不知是哪一年了，有一个节日的清晨，这位“地方”既没提鸡，也没拿酒，只见他愁容满面地跨进家门口，嘴里也没喊“给老爷太太送礼来了”，却拉了王妈，交头接耳说了一大会儿，后来声音也大了，终于放声大骂起来。王妈进来告诉了婶母，仍然是拿了几毛钱送出去。这“地方”道了谢，出了大门，老远还听到他的骂声。

后来，王妈告诉，原来他的鸡是自己养了预备下蛋的，每逢过年过节，便委屈它一下，缚了双足，倒提着陪他出来逛街。酒瓶子里装的也不是酒，而是装的水，瓶子上的红签还是从铺子里借来的。“地方”送礼，邻居们都知道用意，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不过如同《庄子》里说的“盗亦有道”，只不过是乞丐讨乞的另一种方法，用了山东人给送礼人赏钱的习惯而已。所以，邻居们没有收的，只给赏钱，一天里跑下来，衣袋里钱也就塞满了。回了家，瓶子里的水倒出来，把鸡放开。但今年过节，这“地方”倒楣，向第一家去“送礼”，就遇到一家才搬来的外省人，偏偏不知底，竟老实不客气地收了礼。王妈说，这怎么能不让这“地方”忿忿呢？他倒不是怕瓶子里的凉水泄漏真相，他是打心眼里心疼那只下蛋的鸡。一个外省人，到了礼仪之邦，失“礼”了。

有一次，叔父家把一盒有特别标志的点心当礼物送出去。过了一年，一个熟门熟户的胖老太太到叔父家来拜访，又恭而敬之地把这盒点心提来给叔父。嘴里还说着：这都是小意思，但点心是新买的，可以尝尝。家里人都忍不住想笑，好歹等这位胖老太太走了，就动手去打盒子，盒盖一开，有股奇怪的臭味马上从里面飞出来，再把纸揭开，点心的形状还是原来的，上面却满是小飞蛾，一块也不能吃了，只好扔掉。

一年里头，这盒点心不知代表了多少人的盛意，被恭敬地提着，从这一家送到那一家，上面的签和铺子的名称也不知换过了多少次，转了一年，终于物归原主。礼欤，非礼欤？

至于给当官的送礼，那可要有学问了。季羨林有一位亲戚，在县衙门里做事，因为与县太爷过从甚密，所以地位很重要。在晚上回家睡觉的时候，常在棉被下面发现一堆银元或别的值钱的东西。有时候，并不知道，无意中银元掉在地上，哗啦一声，让他吃一惊。这些银元自然也是送来的“礼”。

这样的“礼”是当官的人才资格接受的，因为官或是官的下属，能让人生，也能让人死，所以会有这金子银元给送过来。但官又讲究面子，虽然喜欢钱，但又不能当面给他。于是，“送礼学”便应运而生。需要经过长期揣摩，多次实习，方能得到其中的奥妙，既把钱送到官长手中，又不伤官长的面子。敦厚的山东人，一点也不缺乏必要的聪明。自古已然，于今为烈。

6. 山东大学附属中学

1926年，季羨林在正谊中学毕了业，考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属中学。附中有两处校舍，一处设在北园白鹤庄，用的是原职业中学校舍。另一处设在老东门外山水沟，用的是原矿业专门学校的校舍。季羨林是在北园白鹤庄这一处上高中。

当时，山东大学刚刚重建成立。原来的山东大学堂成立于1901年。这一年，在废科举、兴学堂的浪潮中，山东巡抚袁世凯奏陈办理山东大学堂事宜及试办章程，得到清廷照准。同年十月，学部大臣张百熙将办学章程转饬各省参照办理，山东率先在全国办起官立山东大学堂，是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之后在各省兴办最早的官立大学堂。学校设在济南泺源书院内，第一任校长为袁世凯的智囊人物唐绍仪。十月正式开学，招收了三百名学生。1904年，搬入杆石桥路北新校舍，改名为山东高等学堂。1911年改称山东高等学校。1912年民国成立，在中心城市设大学，各省设专门学校，到1914年等最后两届学生毕业，山东大学堂裁撤，师生分别转入工业、农业、矿

业、商业、法政、医学六个专门学校。

1926年，奉系军阀张宗昌督鲁，为顺应潮流，他装扮开明，6月30日下令在济南重建山东大学。山东省教育厅7月30日将省立工业、农业、矿业、商业、医学、法政六个专门学校合并，改建为省立山东大学。山东省第一、第二、第六、第十，四个中学高中部，组建为山东大学附属中学。山东省督办府委派省教育厅厅长、前清状元王寿彭任校长，8月5日，他到职视事，启铃办公，山东大学重建成立。

校长王寿彭，字次篋，山东潍县南关人。他幼承祖训，刻苦砥砺，十七岁入邑庠，屡试冠军。光绪辛丑年（1901）中举，癸卯

（1903）连捷进士。因名字中隐含“寿比彭祖”之意，深得当时大操大办七十寿典的慈禧太后的嘉许，高中头名状元，又入翰林，授修撰，入进士馆，司法政，并被派赴日本考察政治。王寿彭后任湖北提学使，创办两湖优级师范学堂，首创经费预算制度，使办学经费专款专用。1926年9月5日，王寿彭在重新组建的山东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读圣贤书，做圣贤事”的校长训词，学校随即正式上课。

王寿彭思想陈旧保守，主张尊孔读经，以提倡经学为己任，敌视孙中山革命。但他曾在日本和欧洲考察，也接受了一些维新思想，深知文化、教育对于国民的重要性，因而热心教育事业。他任山东大学校长期间，制订了完整的《教学大纲》和明确的培养目标，建立了一些规章制度。他还工书法，时人以得其片纸寸缣为荣。

在王寿彭任校长期间，山东大学每年都举行祭孔仪式，张宗昌身着长袍马褂，亲临参加，他匍匐在地，行叩头大礼，可见山东大学当时尊孔之风之盛。大概也正是因为过于守旧，王寿彭受到校内强烈谴责，当校长仅一年多乃拂袖而去。

重建的山东大学集中了当时的一些著名学人，文学院院长王宪五精通经学、古文，有“山东才子”之称，教授如陈舸庭、丛禾生、祁蕴璞等，也都很有名。法学院院长朱正钧，工学院院长汪公旭，农学

院院长郭次璋，医学院院长周颂声，可谓阵容整齐，人才济济。另外，还有一批从国外留学归来的洋博士张徽五、张东里、王慈伯、于复先、周瑞廷、高汉符、卞东寅、房金铎等人，也都名声不小。

附属中学的教师，也可谓极一时之选。国文教师王崑玉，英文教师尤桐，史化教师祁蕴璞，伦理教师鞠思敏（正谊中学校长兼）、完颜祥卿（一中校长兼），还有救经书的“大清国”（因译名太响亮，真名被忘记）、前清翰林（不知是不是陈舸庭），两位先生教《书经》、《易经》、《诗经》，上课从来不带课本，四书五经连注都背诵如流。

有这样一批阵容整齐的好老师，再加上学校用了原职业中学校舍，周围环境优美如仙境，荷塘四布，垂柳蔽天，是念书再好不过的地方。季羨林到了这所中学，学会了用功，再也不去荷塘钓虾、捉蛤蟆了。他后来回忆说：

我有意识地真正用功，是从这里开始的。我是一个很容易受环境支配的人。在小学和初中时，成绩不能算坏，总在班上前几名，但从来没有考过甲等第一。我毫不在意，照样钓鱼、摸虾。到了高中，国文作文无意中受到了王崑玉先生的表扬，英文是全班第一。其他课程考个高分并不难，只需稍稍一背，就能应付裕如。结果我生平第一次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平均分数超过九十五分，是全校惟一的一个学生。当时山大校长兼山东教育厅长前清状元王寿彭，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给我。这样被别人一指，我的虚荣心就被抬起来了。从此认真注意考试名次，不再掉以轻心。结果两年之内，四次期考，我考了四个甲等第一，威名大震。[55]

山大附中的国文老师王崑玉，是一位对季羨林影响极大的老师。他是桐城派的古文作家，有自己的文集。第一篇作文，他给学生出的题目是《读〈徐文长传〉书后》。写作文都要用文言文，而且尽量模仿桐城派的格调。季羨林的作文写好以后，意外地得到了王崑玉老师的高度赞扬，批语是“亦简劲，亦畅达”。这对于季羨林来说是极大的

鼓励，蕴藏已久的求知欲得到强烈刺激，充分发挥出来了。

在国文方面，在王崑玉老师影响下，季羨林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过去被用来读武侠小说的劲头，现在被用到读古文上了。他弄到不少古文的代表作，如韩愈的《韩昌黎集》，柳宗元的《柳河东集》，以及欧阳修、苏轼、苏辙、苏洵等唐宋八大家的许多文集，都开始认真阅读。读《古文观止》的时候，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李密的《陈情表》、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欧阳修的《泂冈阡表》、苏轼的前后《赤壁赋》、归有光的《项脊轩记》等一类的文字，以及吴均的《与宋元思书》，他都百读不厌，背诵如流，从此打下了雄厚的古文基础。他开始喜欢抒情散文，而且也写了不少，因此中学同学给他起过一个绰号，叫做“诗人”。[56]对于古文的不同风格，如《史记》的雄浑，六朝文章的浓艳，陶渊明、王维的朴素，徐摛、庾肩吾的华丽，杜甫的沉郁顿挫，李白的流畅灵动，《红楼梦》的细腻，《儒林外史》的简明，他都注意到无不各擅胜场。[57]从这些名作佳篇中汲取的营养，滋润了他一生的文学创作。

在外文学习方面，他继续学习英文，由于有尚实英文学社的底子，他在班上的英文成绩，名列榜首，别的同学都无法与他竞争。教英文的一共有三位老师，尤桐老师、刘老师都是水平较高的。第三位老师水平低，季羨林把他的姓和名都忘记了。那时候，季羨林当了班长，伤了一点脑筋，想把他“架”走。最后，取得一致意见，考试都交白卷，结果老师脸上无光，自然被赶跑了。

这时，他又开始学德文。教德文的孙老师长着一副宽额方脸，嘴上留着德皇威廉二世的两撇胡子。用的课本是山东济宁天主教堂编的，水平不高。孙老师是胶东人，学的德文也不高明，发音带有胶东味，把 gut 念成“古吃”。学生笑话他，他居然满脸怒容，冲学生发过火。孙老师还附庸风雅，自己花钱印了一本十七字诗，诗作挺整脚，有一首嘲笑一只眼的诗，他还记得：

发配到云阳，
见舅如见娘，
两人齐下泪，
三行！

有这样欣赏水平的老师，教了一学期德文，学生们只学会几个单词，不可能把德文学好。

在山东大学附中的第一学期，平均分数超过了九十五分，名副其实是甲等第一名。在一共四个学期里，他考试成绩虽然不一定都超过九十五分，但总是稳坐甲等第一名的宝座，成了名副其实的“四连冠”。工书法的山东大学校长王寿彭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扇子面奖励给他。王寿彭的书法是一般人求都求不到的，时人以得片纸寸缣为荣，季羨林一下子得了两件墨宝，当然出乎自己的意料。从此他更加有意识地努力学习，动机也许并不堂皇，无非是想保住自己的面子。他自己称之为虚荣心“作福”。

7. 一年的临时亡国奴

1928年，蒋介石借革命之名，打着孙中山先生的旗号，一路北伐。4月初，北伐军占领了济南。4月30日，日本帝国主义福田彦助第六师团中的五百余人占领济南，北伐军从城中撤出。5月1日，北伐军孙良诚部和第一集团军各部进入济南，蒋介石于5月2日抵达济南，要求福田彦助撤离军队，以维持济南的平静。但日军仍寻衅开枪，打死中国军民多人。5月3日，日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后援部队不断到济，蒋介石下令不准抵抗，并撤出济南。日本侵略军在济南大肆屠杀中国军民五千余人，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国民党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被日军割去鼻、耳，最后与十七名外交人员同遭杀害。济南市被破坏得很严重。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济南“五三”惨案。山东大学师生不计安危，开展各种爱国反日运动，揭露“五三”惨案

真相，查禁日货，慰问难民，表现出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英勇气概。惨案发生之后，学校无人负责，经费无着，随即停办，教师和学生大部分散去。设在北园的山东大学附中也同时关了门。

日寇占领济南期间，季羨林无学可上，过了一年临时亡国奴的生活。他回忆说：

此时日军当然就是全济南至高无上的惟一统治者。同一切非正义的统治者一样，他们色厉内荏，十分害怕中国老百姓，简直害怕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程度。天天如临大敌，常常搞一些突然袭击，到居民家里去搜查。我们一听到日军到附近某地来搜查了，家里就像开了锅。有人主张关上大门，有人坚决反对。前者说：不关门，日本兵会说：“你们怎么这样大胆呀！竟敢双门大开！”于是捅上一刀。后者则说：关门，日本兵会说：“你们一定有见不得人的勾当；不然的话，皇军驾到，你们应该开门恭迎吆！”于是捅上一刀。结果是，一会儿开门，一会儿又关上，如坐针毡又如热锅上的蚂蚁。此情此景，非亲身经历者，是决不能理解的。[58]

季羨林此时无学可上，又深知日本人最恨中国学生，在济南焚烧日货的“罪魁祸首”就是山东大学的学生，于是，剃光了脑袋，伪装成商店小伙计。有一天，他走在东门大街上，迎面来了一群日军，检查过往行人。他知道，此时万不能逃跑，一定要镇静，否则刀枪无情，定死无疑。这样想着，他故作镇静地走上前去。一个日军士兵搜他的全身，发现他腰上扎的是一条皮带，便如获至宝，发出狞笑，说：“你的，狡猾的大大地。你不是学徒，你是学生。学徒的，是不扎皮带的！”季羨林当头挨了一棒，幸亏还没有昏过去，他便向日军解释，说小徒弟们现在也发了财，有能扎皮带的了。日军坚持不信。俩人正在争论，另外一个高一级的日军走过来，不耐烦听了，一摆手：“让他走吧！”季羨林这才死里逃生，从阴阳界上又转了回来。一个十七岁的孩子，面临着这样危急的时刻，他身上会出多少汗，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这一年的亡国奴生活，至今想来还让他后怕！

8. 再上高中

1929年，日军撤出济南，国民党重新进了济南。此时，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按照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把省立山东大学改为国立山东大学的决定，着手筹建国立山东大学，决定将学校迁至青岛，接收私立青岛大学的校产，重建国立山东大学。至此，省立山东大学告一段落，设在北园的附属中学也告一段落。附中的学生转入新成立的由山东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改设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这是全省当时惟一的一所高级中学。山大附中高中部学生，不用考试，即可入学。

这一年，是季羨林一生中又一个重要的年头。

省立济南高中的校址，由绿柳红荷交相辉映的北园，搬到车水马龙的杆石桥来。学校环境变了，新校址原是清代的一个大衙门，高楼峻阁，雕梁画栋，颇有一点威武富贵的气象。校内有一个大花园，虽然其中的花坛多年失修，水池也干涸了，小路上长满了草，但是花木却依然青翠茂密，浓绿扑入人的眉宇。夏天，似锦的繁花开满树木的枝头，把这古园点缀得更为明丽耀眼。丛中枝头上，不时有鸟鸣声声，令人如入幽谷之中。课余，师生们来园中漫步，各得其乐。

学校师资队伍的结构也变了，换上了一批国民党官员，“党”气颇浓，令人生厌。但学校也出现了一些新气象，在山大附中时读的古籍《诗经》、《书经》和《古文观止》，现在都被白话文学作品代替。作文也由文言文改为白话文。语文教师由前清翰林、进士改为新文学家，给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以耳目一新之感，大孩子们都兴高采烈了。

这里的国文教师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董每戡等人，都是全国闻名的作家。先是胡也频教现代文艺，几个月后被国民党通缉，逃

到上海，不久壮烈牺牲。接替胡也频的是董秋芳老师，他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专业是外国文学，在高中讲国文自然讲到外国文学。

季羨林的白话作文又受到董秋芳老师的垂青，有一篇作文与同级同学王联榜的作文一起，被董老师誉为全班、全校之冠。在董老师的影响下，季羨林学习文学，其中当然也有学习外国文学的决心，就算是确定下来了。

在这里，季羨林虽以学习白话文为主，但对古籍的兴趣丝毫没减，他的阅读范围仍然很广，涉及的方面仍然很杂，陶渊明、杜甫、李白、王维、李义山、李后主、苏轼、陆游、姜白石等诗人、词人的作品，他都读了不老少。

季羨林对外国文学作品的兴趣也极高。他节衣缩食，从每个月的饭钱里省下几块大洋，寄到日本东京丸善书店，订购几本外国文学的书，其中就有英国作家吉卜林的短篇小说。书寄到后，还要到十几里以外的商埠去取。虽然几块大洋够他一个月的饭钱，但看到省下饭钱买来的新书，心中的愉快，简直无法形容。从这时起，他开始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翻译过吉卜林短篇小说中的一篇。从这时起，他开始向翻译领域进军了。

在这里，季羨林一年两个学期又考了甲等第一名，加上在山东大学附中的“四连冠”，季羨林在高中阶段是“六连冠”。

9. 业师胡也频、董秋芳

季羨林在山东省立济南高中的业师，一是胡也频，二是董秋芳，两人爱好不同，志向各异，但都给季羨林以很大影响。

胡也频（1903—1931），原名崇轩，福建福州人。小时候当过学徒，后入海军学校，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1928年在上海从事编辑和出版工作。1927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圣徒》，奠定了其作品诅咒人生、讴歌爱情的基调，其中的《械斗》一篇被认为早期力作，文

笔流畅明快，间或流露出幽默的气息。1930年，他到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教书。

胡也频给季羨林的印象极深，他个子不高，人很清秀，完全是一副南方人的形象。胡也频的居室，就在学校花园门口旁边，走过花园便可到后面教室去上课。每次上课，他都在黑板上写下“什么是现代文艺？”几个大字，然后滔滔不绝地讲，直讲得眉飞色舞，浓重的福建口音更加难懂了。下一次课，仍然写这几个大字，内容却与上次不一样。这种讲课方式简直使学生们着了迷，根据他的介绍去买一些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籍。学生们不懂什么“现代文艺”，也不懂什么“革命”，但知道国民党最厌恶的是共产党，似乎有不共戴天之仇，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在这样的气氛下，胡也频竟敢明目张胆地宣传“现代文艺”，鼓动学生革命，学生们真为他捏一把汗。季羨林后来回忆说：

胡先生是有社会经历的人，他应该知道其中的利害。可是他也毫不在乎。只见他那清瘦的小个子，在校内课堂上，在那座大花园中，迈着轻盈细碎的步子，上身有点向前倾斜，匆匆忙忙，仓仓促促，满面春风，忙得不亦乐乎。他照样在课堂上宣传他的“现代文艺”，侃侃而谈，视敌人如草芥，宛如走入没有敌人的敌人阵中。[59]

在胡先生号召之下，学生们成立了一个现代文艺研究会，准备由胡也频主编一个杂志。季羨林参考了一些从日本翻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写了一篇《现代文艺的使命》，内容无非是革命，革命，革命之类。这篇文章不意竟受到胡先生垂青，想在这份杂志的第一期上发表。

这时，蜚声文坛的胡夫人丁玲女士，从上海来校探亲。丁玲的衣着非常讲究，代表了时髦的上海最新式的服装。这样的服装，在相当闭塞淳朴的济南出现，被高中生们视为飞来的一只金凤凰，没见过世面的他们便觉得她浑身闪光，照耀四方了。

丁玲比较胖，又穿了挺高的高跟鞋。校内的路年久失修，穿平底

鞋就不牢靠，何况穿高跟鞋。丁玲走在这路上，步履维艰，要靠胡也频搀扶着才能迈步。胡先生比丁玲矮，学生们见了这情景，觉得好玩，他们就窃窃私语，说胡先生成了夫人的手杖，更增加了对胡也频的敬意。

事情急转直下，胡先生有一天终于没去上课。小道消息说他被国民党通缉，连夜逃到上海。不久，他同柔石等四人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秘密杀害，时年 28 岁。

直到今天，胡也频的身影仍在季羨林面前闪耀。

胡也频离开济南高中以后，到季羨林再上国文课时，来了一个陌生的老师，个子也不高，相貌也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一只手似乎还有点毛病，说话绍兴口音颇重，不很好懂。他就是季羨林的另一位业师董秋芳。

胡老师讲课带有鼓动性，而董老师上课则有启发性。董老师上课，不讲现代文艺，也不讲革命。讲一点文艺理论，全是鲁迅翻译自日本的，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等。他老实地讲课，认真小心地为学生改作文。他布置作文，从来不出题目，而是在黑板上信笔写下“随便写来”四个大字，愿写什么，就写什么，愿怎样写，就怎样写，丝毫不用受约束，学生有绝对的写作自由。

就在董老师“随便写来”的启迪下，季羨林写了一篇记述自己回故乡的作文，因为感情写得真挚，深得董老师赞许，在作文本每一页的空白处，都写了一些批注，“一处节奏”，“又一处节奏”等批语，竟让他拨云雾而见青天。于是，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苦心孤诣，为董老师合盘托出，知己之感，便油然而生。季羨林对董老师的感激之情，永生难忘：

从那以后，六十年来，我从事研究的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与文章作风马牛不相及。但是感情一受到剧烈的震动，所谓“心血来潮”，则立即拿起笔来，写点什么。至今已到垂暮之年，仍然是积习

难除，锲而不舍。这同董先生的影响是绝对分不开的。我对董先生的知己之感，将伴我终生了。[60]

在另一处，季羨林又回忆说：

我此时改用白话写作文，大得董先生赞扬，认为我同王联榜（即王峻岑，后考入北大数学系）是“全校之冠”。这当然给我极大的鼓励。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61]

这些高中学生，本来在董老师接替胡老师上课以前，就久仰其大名，读过他翻译的一本苏联小说《争自由的波浪》。这本小说因鲁迅作序而使董老师声名大震，加之报刊上还发表过董老师写给鲁迅的一封信（后收入《鲁迅全集》）。因此，学生们和他神交已久，课堂上经他这样一启发，积极性、创造性，如趵突泉之水，喷涌而出，就难怪毕生不忘其恩德了。

对这两位恩师，季羨林以为自己不是程门立雪的好弟子。但是每每想到他们，总是怅望青天，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10. 课外爱好

季羨林在三年的高中学习生活中得了六个学期的甲等第一名，成了名符其实的“六连冠”。但是季羨林绝不是死记硬背的刻板学生，他是一个会读书的人，有着广泛的兴趣。

从古到今，从中到外，许多名著季羨林都广泛涉猎。

中国古籍他仍不放松钻研，陶渊明、杜甫、李白、王维、李义山、李后主、苏轼、陆游、姜白石的诗、词作品，庄子、孟子、司马迁、唐宋八大家、明末公安派、竟陵派、清代桐城派，他都读，广泛地汲取营养。外国文学作品，英国名家的散文，他也读了不少。俄国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理论书籍，他也有莫大的狂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天天都在拼命念这些书。意义似乎明白，又似

乎不明白。念一句就像念西藏喇嘛的番咒。他总是用铅笔记出哪是主词，哪是动词，哪是副词，开头似乎还有径可循，但愈来愈糊涂，一个长到两三行充满了“底”“地”“的”的句子念到一半的时候，已经如入五里雾中，再也难挣扎出来了。因此还失眠过几次。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鲁迅、胡适、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茅盾、巴金、老舍等人的小说和散文，他几乎都读遍了。鲁迅的作品，季羨林读了所有已经出版的，有的还不止读一遍，其中有些篇章，他能够背诵得出来。季羨林也很喜欢老舍先生的著作，如《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一开始，老舍的著作，他还不能全都理解，但老舍语言生动幽默，是地道的北京话，间或也夹上一点山东俗语，没有那种忸怩作态让人读了感到浑身难受的非常别扭的文体，而是有一种新鲜活泼的力量跳动在字里行间。

这时候，季羨林还读了冯友兰的《人生哲学》。这是季羨林刚进山东大学附属中学的第一年，他刚十五岁，既不懂人生，也不懂哲学，但对开设的人生哲学这门课很感兴趣，从此将冯芝生（友兰）的名字，深深印在心中，认为冯先生是一个高不可攀的大人物。

在这样广泛阅读的过程中，潜移默化，他在无意识中形成了自己对写文章的一套看法。名家时代不同，风格迥异，但却有不少共同之处，最主要的有三点：第一，感情必须充沛真挚；第二，遣词造句必须简练、优美、生动；第三，整篇布局必须紧凑、浑成。三者缺一，就不是一篇好文章。而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更是至关重要。他有时甚至想到，写文章应当像谱乐曲一样，有一个主旋律，辅之以一些小的旋律，前后照应，左右辅助，要在纷纭变化中有统一，在统一中有错综复杂，关键在于有节奏。他的体会是：

总之，写文章必须惨淡经营。自古以来，确有一些文章如行云流水，仿佛是信手拈来，毫无斧凿痕迹。但是，那是长期惨淡经营终入化境的结果。如果一开始就行云流水，必然走入魔道。[62]

也就是从高中开始，他养成了勤于写作的习惯，尤其是写散文的

笔此后再也没有放下。在他看来，文章写得好坏姑且不论，但对自己来说，文章能抒发自己的感情，表露自己的喜悦，缓解自己的愤怒，激励自己的志向。几十年如一日的好习惯，就从高中阶段开始了。

11. 娶了个贤妻

1929年，季羨林十八岁了。

按照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这是《礼记·内则》篇中就规定了的。后来，鲁哀公有疑问：这样的婚龄，不是太晚了吗？他就请孔子解释，孔子说：官方的这个规定，指的是结婚的最大年龄，超过这个年龄，就是“失时”，在此年龄之前是可以的。此说见于《孔子家语·本命》。封建社会因为人口问题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所以一般都提倡早婚，西汉规定：

“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汉书·惠帝纪》）即要罚交五倍于常人的人头税。到宋代，干脆规定：“凡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并听婚嫁。”（《书仪》卷三）这种早婚的习惯，一直到民国初期，都是很盛行的，尤其在农村，十三四岁结婚的男子，是很普遍的。

季羨林的老家临清，有早婚的习俗，有的男孩子，十二三岁就做了丈夫。有一首写男子早婚的歌谣唱道：

十八的大姐九岁郎，
抱了上床抱下床，
说他郎来郎还小，
说他儿子不叫娘。[63]

季羨林虽然还不到举行“冠礼”的二十岁，还没正式进入“成人之道”，但早已超过农村普遍盛行的结婚年龄了。他是季家的独根独苗，身上负有传宗接代的重大任务，所以，受叔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在这一年，季羨林结了婚。

妻子彭德华，比季羨林大四岁，二十二岁了。她的家庭也不是富裕之家，大体与季家门当户对。她是地道的济南人。妻子小时候只念过小学，大概也就能认千八百字。叔父家里有不少旧小说，季羨林小时候偷看过的，叔父的女儿秋妹，也偷看过不少。秋妹因为把小说中的“飞檐走壁”念成了“飞胆走壁”，一时传为笑柄。但妻子彭德华却从来也没有看过任何一部小说，别的书就更谈不上了。所以到后来，他们分居两地，季羨林到了异域，彭德华没有给他写过一封信，她根本拿不起笔来。

但她对于季家来说，却是真正做到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勤勤恳恳，含辛茹苦。

婚后，1933年4月14日，他们先是有了女儿，取名为婉如。1935年5月15日，又有了儿子，取名为延宗。

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妻子上有公婆，下有幼女稚子。公公（叔父）脾气极为暴烈，甚至有点乖戾，极难侍奉。家里又穷，经济朝不保夕。在季羨林走出国门之后，她究竟受了多少苦，后来她只是偶尔对季羨林流露一点。所以对这样一个妻子，季羨林的评价极高：

在道德方面，她却是超一流的。上对公婆，她真正尽上了孝道；下对子女，她真正做到了慈母应做的一切；中对丈夫，她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爱护。她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孝顺媳妇，贤妻良母。她对待任何人都是忠厚诚实，从来没有说过半句谎话。她不会撒谎，我敢保证，她一辈子没有说过半句谎话，如果中国将来要修《二十几史》，而其中又有什么“妇女列传”或“闺秀列传”的话，她应该榜上有名。[64]

正是有了这样一位贤妻，季羨林免去了许多后顾之忧，如果没有妻子和婶母，他在国外十一年，这个家不知会成什么样子。

彭德华，是一个典型的伟大东方女性！

第二章 京华岁月

一、面临选择：上北大，还是上清华？

1. 告别高中

在山东大学附属中学学习了两年，中间因为日本侵略军占领济南而停学一年，又在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学习了一年，季羨林终于结束了高中阶段的学习生活，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高中毕业文凭。

几年前，从新育小学毕业时，季羨林曾因为幼无大志，而不敢报考山东中学的拿摩温——山东省立第一中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癞蛤蟆不敢吃天鹅肉，连去报名的勇气都没有。初中毕业时，仍然是胸无大志，所想做的，也只是在当时谋生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抢到一只饭碗，无灾无难，平平庸庸地度过一生。

但到了山东大学附属中学，在王寿彭的刺激之下，季羨林开始有意识地努力学习，而且，他还广泛涉猎古今中外大量文学名著、文艺理论书籍以及散文名篇。从这时开始，他养成了舞文弄墨的习惯，所写的文章，被胡也频这样的名作家看中，准备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发表，只是由于胡也频被捕而未能正式发表。但无疑已经由此而刺激起季羨林的创作欲望。他对周围的一切，开始注意细致地观察，深切地体会。从这时起，他已认识到，在这个林林总总的花花世界上，遍地潜伏着蓬勃的生命，随处活动着熙攘的人群。一个老妇人布满皱纹的脸上的微笑，一个婴儿鲜苹果似的双颊上的红霞，一个农民长满了老茧的手，一个工人工作服上斑斑点点的油渍，一个学生琅琅的读书声，一个教师住房窗口深夜流出来的灯光，对这些常见的现象他都深入体会，体会出许多动人的涵义。他还把这些常见的、习以为常的、平凡的现象，涵润在心中，融会贯通，仿佛一个酿蜜的蜜蜂，酝酿再

酝酿，直到酝酿成熟，使情境交融，浑然一体。也就是说，从这时起，在日常的平凡生活中，他不断地能找到刺激，引起激动，形成新鲜的印象，也就使自己的灵感保持一种常有常新的状况。可以说，高中阶段的这几年，是季羨林一生中相当关键的一个阶段。

用一句伟人的话来说，坚冰已经打破，道路已经开通，方向已经指明！季羨林面前，肯定会有一个美妙的前程。平时的偶然之花，将结出必然之果。

季羨林充满自信地告别了高中。

2. 到北平考大学

这一年是 1930 年，季羨林十九岁。就在这一年的夏天，季羨林和他在山东省立济南高中的八十多位同学，联合进京赶考。

当时北京还叫北平，大学虽然不像今天这么多，但还是五花八门，国立的，私立的，教会立的，纷然杂陈。当时的国立大学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私立大学有朝阳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北平大学、北平民国大学、孔教大学、北京弘达学院，教会大学有美国基督教会在协和大学和汇文大学基础上建立的燕京大学、罗马教廷办的辅仁大学，等等。

这些大学教育水平、质量极端参差不齐，因此对考生的吸引力也就大不一样。其中最受垂青的，同今天完全一样，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两个大学是齐名的国立大学，全国所有进京赶考的“举子”，几乎没有不报考这两所大学的。这两所大学自然也就成了龙门，门坎高得怕人，一般人很难跳过这个龙门。往往是几十个人才能录取一个，被录取的考生金榜题名，小鲤鱼也就成了龙。

季羨林有一个山东老乡，去北平报考北大和清华，已经有五次了，次次名落孙山。这一次是第六次，又同季羨林他们来报考，结果又是榜上无名。他受刺激太大，几乎神经失常，一个人恍恍惚惚在西

山一带转悠了七天，才清醒过来。从此，他终于断了大学梦，回了山东老家，后来不知所终。

季羨林是第一次进北京。他从一个省会城市来到这元明清三朝首都的大都市，真有点刘姥姥进大观园的味道。他在几年后的一篇文章里写道：

我现在还能很清晰地温习一些事情：我记得初次到北平时，在前门下了火车以后，这古老都市的影子，便像一个秤锤，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我迷惘地上了一辆洋车，跟着木屋似的电车向北跑。远处是红的墙、黄的瓦。我是初次看到电车的，我想，“电”不是很危险吗？后面的电车上的脚铃响了，我坐的洋车仍然在前面悠然地跑着。我感到焦急，同时，我的眼仍然“如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我仍然看到，红的墙、黄的瓦，终于，在焦急，又因为初踏入一个新的境地而生的迷惘的心情下，折过了不知多少满填着黑土的小胡同以后，我被拖到西城的某一个公寓里去了，我仍然非常迷惘而有点近于慌张，眼前的一切都仿佛给一层轻烟笼罩起来似的，我看不清院子里有什么东西，我甚至也没有看清我住的小屋，黑夜跟着来了，我便糊里糊涂地睡下去，做了许许多多离奇古怪的梦。[1]

季羨林坐着洋车进了北京城。据说，坐这种人力车，不能把背紧靠在座背上，以免惹上能传染伤寒病的虱子。在外国人看来，这种人力车实为马车，因为乘人力车看起来似乎你也在驾驶它。人力车夫希望你乘车，他们可以因此得到一点微薄的车费养家糊口。车夫之间的竞争及无组织，使车费低微。这都是由于中国的过剩的劳动力所致。[2]

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写的就是这种人力车夫的生活。被压在社会底层的祥子虽然正直善良，勤劳俭朴，以顽强的意志和生活搏斗，但他三次买车，三次失败，最后家破人亡。老舍先生思索写这部小说的时候，笔尖口能滴出血与泪来，真实地将祥子的悲剧再现在读者面前。只是这部小说在季羨林初次进北京时尚未发表，对人力车

夫，季羨林也就没有太多的感受。他就这样稀里糊涂进了北京。

3. 高考照样潇洒

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对于每一个参考者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一关过得好，以后的一生可能比较平坦，没有大起伏，没有大动荡，最起码，饭碗是不会成大问题了。在这样的时刻，考生所面对的巨大压力就是可以想象的了。而季羨林和绝大多数考生不一样。他成竹在胸，没有一丝一毫高考前的紧张。

高考中的季羨林，照样潇洒！

在公寓住下以后，他睡下去。他并没有睡得很熟，他做了许多离奇古怪的梦。

窗上刚有点发白，他就起了床。这时候，他的心已不像初进北京时那样迷惘，已经安定了一些。他开始对周围进行观察，发现住的是间北屋，屋前的小院里，有不小的一缸荷花，缸四周错落地摆了几盆杂花，其中有一棵仙人球，马上要开白色的花。但是，这些似乎都没有引起他过多的注意。很快，他的目光转到靠墙长着的一棵枸杞树。

这棵枸杞树，长得已经高过了屋檐，枝干苍老而钩曲，像千年的古松，树皮皱巴着，黝黑的颜色，有几处已经开了裂。

他在故乡时，听人说过，枸杞树是长得非常慢的，很难成长为一棵树。现在在自己面前，居然有这样一棵虬干的老枸杞树，真像做梦似的。

他不解地问公寓的主人，这枸杞多大年龄了？公寓主人渺茫地说：他初次来这里开公寓时，这树就是这个样子，三十多年来，没有多少变化。季羨林更感到惊奇了，他用惊奇的眼光注视着这苍老的枝干，又注视着接连着树顶的蓝蓝的长天。

就在这骄阳似火的高考季节，考前的几天，他复习功课感到疲乏，便到这棵枸杞树下，寻找自己的感觉。

在细弱的枝条上，蜘蛛结着网，间或有一片树叶儿或苍蝇蚊子之流的尸体粘在上面。在有太阳或灯火照上去的时候，这小小的网也会反射出细弱的清光来。倘若再走近一点，你又可以看到有许多叶上都爬着长长的绿色的虫子，在爬过的叶上留了半圆缺口。就在这有着缺口的叶片上，你可以看到各样的斑驳陆离的彩痕。对了这彩痕，你可以随便想到什么东西：想到地图，想到水彩画，想到被雨水冲过的墙上的残痕，再玄妙一点，想到宇宙，想到有着各种彩色的迷离的梦境。这许许多多的东西，都在这小的叶片上呈现给你。当你想到地图的时候，你可以任意指定一个小的黑点，算作你的故乡。再大一点的黑点，算作你曾游过的湖或山，你不是也可以在你心的深处浮起点温热的感觉么？这苍老的枸杞树就是我的宇宙。不，这叶片就是我的全宇宙。我替它把长长的绿色的虫子拿下来，摔在地上。对着它，我描画给自己种种涂着彩色的幻象，我把我的童稚的幻想，拴在这苍老的枝干上。[3]

原来季羨林从这古老的枸杞树干上，叶片上，找到了自己的故乡，找到了自己的宇宙，找到了自己的全宇宙。这种联想，使他在离开故土以后，一看到类似故乡的东西，一棵海棠花，一株夹竹桃，甚至一盆水仙花，马上就能想到故乡，想到母亲。这种故乡情、爱国心，在童稚的季羨林身上，已经开始养成了。

傍晚，一切角隅都为黄昏占领了。这时，季羨林便约了几个同来赶考的“举子”，走出公寓，到西单一带去散步。

穿过花市，晚香玉在薄暗里发着幽香。季羨林忽然想到不知在哪里读过的一句现代诗：“黄昏里充满了木犀花的香。”他觉得很美丽，虽然他从来没闻到过木犀花的香，也明知道现在闻到的是晚香玉的香，但是他总觉得他到了那种飘渺的诗的境界。

逛完了西单，在淡黄色的灯光下，几个“举子”摸索着走进了幽黑的小胡同，走回了公寓。

晚饭之后，季羨林坐在窗前复习预备考试的功课。这时候，又有

大头尖尾的绿色小虫，在玻璃窗外有所寻觅似地撞击着。一会儿，一个从窗缝里挤进来，接着又一个，又一个，成群地围着灯飞。“玉米面饽饽！”戛长的，带点儿颤动的声音，从远处的小巷里越了墙飘过来，季羨林捻熄了灯，一边和蚊子、臭虫斗争着，一边慢慢地睡去。静静的夜里，仍然做着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梦。

成竹在胸的季羨林，高考中仍然这样潇洒！

4. 鱼与熊掌，何去何从？

高中三年打下的坚实基础，使季羨林不像其他考生那样苦煎苦熬，而是非常潇洒地度过了考试关。而且，他同别的高中同学不同，他只报北大与清华这两个国立大学，而别的同学则报很多大学，二流的、三流的、不入流的，有的人竟报了七八所大学。季羨林当时非常有信心，他几乎是本能地只报北大、清华，而不报别的学校。

清华大学的入学考试没有特异之处，北京大学的入学考试则非常奇特，他至今记忆犹新。

北大国文试题是：“何谓科学方法？试分析详论之。”当时考生们都手足无措，这哪里是一般的国文试题呢？

英文试题更加奇特，除了一般的作文和语法方面的试题以外，据说与往年一样的，是另外加一段汉译英。这一年的汉译英内容是：

别来春半，

触目愁肠断。

砌下落梅如雪乱，

拂了一身还满。

原来是五代时李煜《清平乐》词的上半阙，下半阙未入选：

雁来音信无凭，

路遥归梦难成；

离恨恰如春草，

更行更远还生。

这样的半阙词，对一般高中毕业生来说，确实是很难啃的硬骨头，不用说译成英文，就是译成现代汉语，也绝非易事。

而且，在英语考试中，出乎考生的意料，在公布的考试科目之外，又加了一盘小菜，搞了一次突然袭击：加试英语听写。

济南高中英语教学从来没做这样的练习，所以考北大的几个学生被这当头一棒给打懵了，没有几个考生能听得懂。季羨林因为从小学开始就学英文，基础比较牢固，很容易就对付过去了。听写时，老师念了一段寓言，其中有狐狸，有鸡，他大都写对了。但有一个单词 suffer（经受，忍耐），由于临阵惊慌，听懂了，却没有写对。考完之后，同去的山东老乡都面带惊慌之色，几乎都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录取的希望破灭了。对付不了北大考试的一些考生，最后被为了收报名费和学费的朝阳大学录取。

结果，这次高考他撞上了喜神，北大和清华他都被录取，一时成了人们羡慕的对象。

那时候，考大学不像现在这样录取，而是同时几所大学都可以录取。比季羨林早一年高考的乔冠华，是 1929 年在上海报考大学，他报考的是武汉大学和清华大学，乔冠华两个大学也都考取了，后来选了清华大学。乔冠华似乎容易做出选择，因为清华大学比武汉大学名气大多了。

但是，到季羨林这里，选择却成了难题，北大与清华对他来说，成了鱼与熊掌，何去何从？一时成了他挠头的问题，一番艰苦的思考开始了。

按理说，北大和清华各有其优点。北大建校略早几年，建于 1898 年，原名为京师大学堂。梁启超为京师大学堂草拟的办学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1917 年，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从此以后，北大一直存在着民主与进步的传统，自由阅读、独立研究学

术的空气比较浓厚，比较活跃，且养成了严谨治学的优良学风。北大一直有学术造诣极高的教授、学者执教。上这样的名牌大学，自然是考生梦寐以求的。

清华是 1911 年成立的，是清朝政府用美国“退还”的一部分庚子赔款办成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1925 年设立大学部，1928 年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校址是原来清代的皇家庄园，建筑则是中西合璧的产物。

对这两所大学，季羨林认为北大强调兼容并包，自由发展，各极其妙，不可偏执，而清华则强调计划培养，严格训练。季羨林对清华的印象是：清新、活泼、民主、向上。

后来成为季羨林同学的胡乔木，也在 1930 年夏天考入清华大学。他入的是物理系，系主任是吴有训。新生入学时，吴有训总要与他们谈话。吴有训对胡乔木说：“上物理课，要做许多实验，很费时间。”胡乔木希望能有时间，自己多读点书。吴有训作为物理系的系主任，给他出主意说：“文科学生的读书时间多，何不转到文科去？”这样，胡乔木就从物理系转入文科，本想进国文系，但由于国文系新生名额已满，而历史系尚有余额，于是胡乔木进了历史系就读。[4]

季羨林后来的另一位同学乔冠华，1929 年考入清华大学。这一年清华招生不分系，只分文科、理科。乔冠华选了国文系，但到了第二年，发现哲学系的课程更少，每天讲课只有一个多小时，自己看书时间更多，于是转入哲学系。[5]

对这样的民主气氛，季羨林心向往之。当然，北大的学术自由也是他向往的。所以，季羨林在选择面前为难了。

我左考虑，右考虑，总难以下这这一步棋。当时“留学热”不亚于今天，我未能免俗。如果从留学这个角度来考虑，清华似乎有一日之长。至少当时人们都是这样看的。“吾从众”，终于决定了清华，入的是西洋文学系（后改名外国语文系）。[6]

就这样，季羨林进了清华园。

二、水木清华

1. 充满诗意的清华园

考入清华大学，从西城的那个公寓，移住到清华园来，季羨林被清华园的美丽景色陶醉了。他对清华园的印象是这样的：

这园子素来是以水木著名的。春天里，满园里怒放着红的花，远处看，红红的一片火焰。夏天里，垂柳拂着地；浓翠扑上人的眉头。红霞般爬山虎给冷清的深秋涂上一层凄艳的色彩。冬天里，白雪又把这园子安排成为一个银的世界。在这四季，又都有西山的一层轻渺的紫气，给这园子添了不少的光辉。这一切颜色：红的，翠的，白的，紫的，混合地涂上了我的心，在我心里幻成一幅绚烂的彩画。我做着红色的，翠色的，白色的，紫色的，各种颜色的梦。[7]

在校园内西隅湖畔，有一个“水木清华”轩，殷兆镛写了一副楹联：

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

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山居

“水木清华”由来已久。早在古代，文人们使用“清华”形容清美华丽，如《晋书·左贵嫔传》上说：“帝每游华林，辄回辇过之，言及文义，辞对清华，左右侍听，莫不称美。”晋谢叔源（混）的《游西池诗》说：“逍遥越城肆，愿言屡经过。回阡被陵阙，高台眺飞霞。惠风荡繁囿，白云屯曾阿。景昊鸣禽集，水木湛清华。褰裳顺兰沚，徙倚引芳柯。美人愆岁月，迟暮独如何？”这是“水木清华”的最早出处。《南史·隐逸传》也有“岩壑闲远，水石清华”的句子，都是在清美华丽的意义上使用的。后来“清华”一词还有引申意，从物之华美，扩大到人之清高显贵，如《北齐书·表聿修传》：

“聿修少年平和温润，素流之中，最有规检。以名家子历任清华，时望多相器待，许其风鉴。”

于是，建于清朝末年、中华民国初年的清华学堂，便出尽了“清华”的风头，使“清华园”这名称充满了诗意。对这充满了诗意的清华园，季羨林用诗一样的语言来描述它：

清华园这名称本身就充满了诗意。它的自然风光又是无限地美妙。每当严冬初过，春的信息，在清华园要比别的地方来得早，阳光似乎比别的地方多。这里的青草从融化过的雪地里探出头来，我们就知道：春天已经悄悄地来了。过不了多久，满园就开满了繁花，形成了花山、花海。再一转眼，就听到满园蝉声，荷香飘溢。等到蝉声消逝，荷花凋零，红叶又代替了红花，“霜叶红于二月花”。明月之夜，散步荷塘边上，充分享受朱自清先生所特别欣赏的“荷塘月色”。待到红叶落尽，白雪渐飘，满园就成了银妆玉塑，“既然冬天已经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我们就盼望春天的来临了。在这四时变换、景色随时改变的情况下，有一个永远不变的背景，那就是西山的紫气。“烟光凝而暮山紫”，唐朝王勃已在一千多年前赞美过这美妙绝伦的紫色了。这样，清华园不是一首诗而是什么呢？[8]

当时的北京市不像今天规模这样大，今天的北京大学那时是燕京大学的所在地。清华和燕京都是在北京市的郊区。据 20 世纪 30 年代曾在清华大学执教的著名美国中国学巨擘费正清先生回忆，当时他住在西总布胡同 21 号，每星期有三个早晨要在黎明前即起身，以便能赶上去清华的银蓝色公共汽车。费正清在自传中，追述了他当时在去清华路上的感受：

公共汽车上的乘务员堪称是胡来上尉，有时他们搭载的乘客远远超员。他们中有圆脸上满是胡茬的司机，有小巧玲珑的售票员，有主管钱和车票的高高大大的管账员，还有坐在那儿无事可干的人，他们或许是初学开车者，或者是长官的侄儿。

汽车轰隆隆走在哈德门街上……在东单牌楼向西转，我们便走上

了故宫前宽阔壮丽的大道。汽车对那些在街上弯弯扭扭行车的人力车和似乎是聋子的行人发出“嘟、嘟、嘟”的警告，汽车如同特别快车穿过横在街上的一道道城门洞。

到清华的路是华北的主要道路，从北京城内到颐和园，它一直可通到西山。晨曦中的西山色彩、形态变化多端，有时山上可看到雪，如同喜马拉雅山，有时看上去它距你竟那么近……我们通过一段两边大约有一里宽的平地，远处的一端是驻扎在颐和园的兵营……在这块平地上，每天早晨都有士兵操练，看上去像是滑铁卢战役的再现……一块块深色方队在我们的视野中来来去去行进着。[9]

从费正清所说来看，当时清华大学的四周基本上还是一片旷野。

2. “拖尸”

清华大学的新生入学，第一个关口是要过“拖尸”关。“拖尸”是英文 toss 的音译，意思是新生在报到前，必须先到体育馆，老生中的好事者列队在里边对新生进行“拖尸”。具体做法是：几个长得壮实的老生，把新生的两手两脚抓住，举起来，在空中摇晃几次，然后抛到铺在地上的垫子上，就算是完成了手续，很像《水浒传》中的杀威棍。体育馆的墙上贴着大字标语：“反抗者入水！”果然，室内游泳池的门开着，随时等候入水者。

按照惯例，新生入学，男生们是人人都要过这一关的。季羨林很自然地随人流到了体育馆，接受“拖尸”这一关的考验。但是，正当他要轮到被“拖尸”时，老生中有个叫许振德的人，是山东老乡，又是清华大学的篮球队长，站出来为季羨林保驾，使他没有被“拖尸”。后来，季羨林才意识到机会难得，这个终生难遇的机会被自己轻轻放过，以后想补课也不行了，所以至今想来，他还颇为憾。

季羨林认为“拖尸”是清华大学校风清新活泼的表现。他在回忆中说：

这个从美国输入的“舶来品”，是不是表示旧生“虐待”新生呢？我不认为是这样。我觉得，这里面并无一点敌意，只不过是对新伙伴开一点玩笑，其实是充满了友情的。这种表示友情的美国方式，也许有人看不惯，觉得洋里洋气的。我的看法正相反。我上面说到清华校风清新活泼，就是指的这种“拖尸”，还有其他一些行动。[10]

这种“拖尸”，仅限于在男生中间进行。当时的清华大学，虽然接受美国的庚子赔款，且有许多外国教授，但男女之间的防线还是非常牢固的。男女学生都是来自中国各地的英才，但是气氛是平静而严肃的，男生与女生之间的接触很少，而且女生与男老师之间的接触也非常少。费正清有一段经历，对此是最好的说明。

我有了与学生们正常接触的时间，男孩子们很高兴与我谈他们自己的事，但女生很少来。第一位女生来找我时，我习惯地把门带上，她显得非常窘迫。后来有人提醒我，仅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在一间屋子里时，一般应把门半掩着。如果把门关上就很可能意味着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这对于这个女生来说，可能是不幸的，因为她很可能被加上让人不能容忍的恶名，她会因此整日里遭到人们的谴责和非议，甚至上公共厕所也不放过。[11]

这就可见，即使在民主气氛最浓厚的清华大学，男女之间的防线也是非常严格的。费正清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为我们提供的这方面的记录，恰恰是习以为常的中国人，一般都不大容易注意的，所以显得珍贵。

3. 学业

清华学堂 1925 年设立大学部。1928 年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1929 年正式完成了从留美预备学校到大学的过渡，成为具有现代色彩的文理科综合大学。

由于有留美预备学校的基础，清华大学的西洋文学系名震神州。

究其原因，教授几乎全是外国人，讲课自然用外国话，中国教授很少，而且，即使是中国教授，也全用外语授课。这对于新生来说，自然有很大的吸引力。

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季羨林在考上清华以后选择系科的时候，却有過一阵心血来潮，想改学理科的数学或经济。可是，季羨林高中读的是文科，几乎是没有学过数学，所以在高考时数学成绩只有4分。这样的成绩想学数学或是经济，可真有点滑天下之大稽了。自然，他想学数学或经济的愿望，只能落空。在经过一番冲动之后，他的心情终于平静下来，还是老老实实，安分守己，选择了对新生文科学生吸引力比较大的西洋文学系。

这个系分三个专修方向（specialized）：英文、德文、法文。只要选某种语言一至四年，就算是专修某种语言。其实这只是一个形式，因为英文是从小学就学起的，而德文和法文则是从字母学起。教授中外籍人士居多，不管是哪国人，上课都讲英语，连中国教授也多半讲英语。课程也以英国文学为主，课本都是英文的，有“欧洲文学史”、“欧洲古典文学”、“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文学”、“文艺批评”、“莎士比亚”、“英国浪漫诗人”、“近代长篇小说”、“文学概论”、“文艺心理学（美学）”、“西洋通史”、“大一国文”、“一二年级英语”等等。[12]

当时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有一个非常古怪的规定：学习英、德、法三种语言中任何一种，从一年级学到四年级，就叫什么语的专门化。季羨林是德语专门化的学生。但德语和法语，是从字母学起，而大一的英语一上来就念J. 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可见英语专门化与德语和法语的专门化，水平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给季羨林教课的主要老师，教大一英文的叶公超，后来当了国民党的外交部长。他教课的水平不低，但有时故意不修边幅，好像在模仿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因此学生们对他没有什么好印象，季羨林也不例外。而且，他不准同学问问题，一个同学问他一个英文问题，他

竟狮子般吼叫：回去查字典去！班上同学面面相觑，再也不敢问他问题。教他们大二的是毕莲（Miss Bille）。教现代长篇小说的是英国人吴可读，他同时还教中世纪文学。教文艺复兴文学的是温特（Winter）。教欧洲文学史的是翟孟生（Jameson）。教法语的是一位华兰德 Holland 小姐。教德文的是杨丙辰、石坦安（Von den Steinen）、艾克（Ecke）。教东西诗之比较的是吴宓。

杨丙辰（字震文）是一、二年级的德文老师，时任北京大学德语系系主任。他德文水平应该不错，是在德国学过多年的留学生，并且译过德国名著，如席勒的《强盗》等。他没有教授架子，平易近人，常请学生吃饭。但他教课，却不负责任，教第一个字母 a 时，说 a 是丹田里的一口气，到教 b、c、d 时，也都说是丹田里的一口气。学生们便窃窃私语：是不是丹田之气我们不管，我们只想把音发准确。从此，“丹田里的一口气”几乎成了杨老师的代号。他在生活上也很有趣，因为同时兼五个大学的教授职务，月工资可达上千银元。他住在北大沙滩，有一处大房子，侍候的人一大群，太太年轻貌美，天天晚上去看戏。老师推崇佛家的“四大皆空”，这种人生哲学应用在教学上，表现出游戏人生的态度。甚至考试打分，杨老师也不负责任。学生交上卷子，他连看都不看，立刻把分数写上。有一个同学，脾气粘粘糊糊，交上卷子站着不走，杨老师以为他嫌分数低，立即把 S（第二级）改为 E（最高分）。如此懈怠的老师，竟也在北大任教授、系主任，且在五个大学兼课。跟这样的老师学德语，基础自然也脆弱了。

教三年级德语的是德国人石坦安先生，他教课比较认真，要求也严格，学生还学了点东西。到四年级，是德国人艾克教他们。这又是一位马虎先生，对教书心不在焉，讲德语只用英文讲授，有一次学生们请求他用德语讲，他便哇啦哇啦讲一通德语，速度快得如悬河泻水，使学生反应不过来，结果还是用英语讲德语。学生们自然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但艾克不是没有水平，他对艺术很有兴趣，用

德文写过一部《中国的宝塔》，在国外学术界颇得好评。尤其是他喜欢德国古典诗歌，对季羨林产生了影响，致使学士论文也是在他影响和指导下写出来的。

华兰德小姐也是德国人，教法语。她年纪很大，头发全白了，由于独身，性情反常，专在课堂上骂人，以此为乐。学生越学得好，她挑不出毛病来，学生挨骂就越厉害，结果法语课的学生被她骂走了一半多，只有季羨林、华罗庚几个不怕骂的留下来了。学生们予以反抗，治了她一次，她反而屈服了，从此天下太平。她还请这些学生去她家吃饭，终于化干戈为玉帛了。

季羨林这时还旁听过俄语课。老师是白俄人陈作福，他不会英文，也不会汉文，用直接教学法教学生，但教学又不得法，学生听不懂，季羨林旁听的兴趣也越来越低，最后终于放弃不再听了。这门课，他只学了一些单词和几句话，便结束了第一次学俄语的过程。

另外的几门必修课，老师水平大多也都不高。

毕莲是一位美国女教授，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硕士，教英文文字学。在大二第一学期，她拿一位丹麦语言学家论普通语言学的书当教本，把本来不是很难懂的格林定律越讲越糊涂。古典语言她一点都不懂。第二学期，换了课本，第一堂课讲乔叟杰作《坎特伯雷故事集》，她高声背诵了书中的第一段，让学生们大惊失色。课上下去，才发现她的本领也就会背这第一段。她不懂中古英文文法，学生们只得读译成近代英语的乔叟著作。教欧洲文学史的翟孟生也是美国人。他用自己的著作一部五六百页的巨著当教材，一开始挺能吓唬人，但学生们很快就发现，这部教材除了厚以外，没有任何别的长处。里面涉及到许多世界名著，有一个内容提要，但却不可靠。原来原著他没读过，连译本都没读几本，只是抄了一些别人书中的内容，抄得又极不细心，错误百出。他连抄的耐性都没有，除了中国不会有人给他出这部书，然而他却成为清华当时的名教授。

这些外国教授，除了个别的，大多是草包。他们都在本国大学毕

过业，但肯定在本国当不了大学教授，有的可以作大学助教，有的可以作中学教师，有的只配当商店店员或小公务员之类，找不到太好的工作，但到中国来却成为名教授。更为可笑的是，他们在中国并不老老实实当教授，而是来中国猎奇，看看这个神秘的国度。受好奇心驱使，有的人学了一脸假笑，挤鼻子弄眼，打拱作揖，能说上三句半中国话，便成为中国通，回国去了。不久居然还写出几大本论中国的书，名也有了，财也有了，皆大欢喜。殊不知，这些人花钱雇人帮自己翻译中国古籍，结果书出版时，译者名字不见了，只剩下了他自己的名字。个别“杰出者”，还在本国的大学当了汉学教授。在清华，这些非正途出身的洋教授，讲课都有点野狐谈禅的味道。所以，在规定的必修课程中，洋教授教的，没有一门课让学生们满意。季羨林自己觉得，四年下来，收效甚微。尤为可笑的是，学了四年德语，只能看书，却不能听和说。

4. 获益于选修课

四年大学的必修课，季羨林觉得收获甚微。而使他感到满意的，反而是旁听和选修的两门课，旁听的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选修的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就是美学。正是这两门课，使他终生难忘，终生受益。

朱光潜先生开的“文艺心理学”，季羨林作为选修课，认真地听了一年。他对这一门课的印象之深，从一开始就感觉到它非同凡响，比那些外籍教师所开的课不知好到多少倍。

朱先生不是那种口若悬河的人，他的口才并不好，讲一口带安徽味的蓝青官话，听起来并不“美”。看来他不是一个演说者，讲课从来不看学生，两只眼向上翻，看的好像是天花板上或者窗户上的某一块地方。然而却没有废话，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他介绍西方各国流行的文艺理论，有时候举一些中国旧诗词作例子，并不牵强附会，我

们一听就懂。对于那些古里古怪的理论，他确实能讲出一个道理来，我听起来津津有味，我觉得，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在学术上诚实的人。他不哗众取宠，他不用连自己都不懂的“洋玩意儿”去欺骗、吓唬年轻的中国学生。因此，在开课以后不久，我就爱上了这门课，每周盼望上课，成为我的乐趣了。[13]

朱光潜先生那时在北京大学任教，还不是教授，在清华大学是兼课。朱先生从香港大学文学院肄业，于1925年在国外留学，先后肄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斯塔斯大学，1933年回国后即执教于北京大学。他在清华大学兼课时，大概三十四五岁。

朱先生在清华的课堂上，介绍了许多欧洲心理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的新理论，比如李普斯的感情移入说，还有什么人的距离说，等等。这些西方学者，从心理学方面，甚至从生理学方面来解释关于美的问题。而且，朱先生自己也有自己的美学观点，他认为在美感经验当中，心所以接物者，只是直觉，物所以呈现于心者，只是形象。因此，美感的态度与科学的、实用的态度不相同，美感的态度只是聚精会神地对于一个孤立绝缘的意象的观赏。朱先生讲的许多理论，季羡林觉得是有道理的，一直到今天仍能记忆不忘。

陈寅恪先生在东京上高中，在上海复旦公学、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著名大学学习，精通梵文、巴利文和东方古文学。1925年回国后，即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后被清华聘为教授，并在北京大学兼课。他讲授的主要课程是佛经翻译文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料、蒙古史料研究等课程。

陈先生讲课与写文章一样，特别重视资料，有一些文章，他往往先罗列资料，然后再对资料进行分析与评断，如剥春笋，愈剥愈细，最后画龙点睛，点出要害。到了此时，读者往往会豁然开朗，或者小吃一惊，如拨云雾而见青天。人们会想：“原来是这样子呀！”顿时

得到一种解悟甚至顿悟的快感。陈先生在讲课时，往往也重用这种方法：先在黑板上，密密麻麻，写满了资料，然后再开讲，根据的就是黑板上的资料。学生们得到的感受，同读他的文章完全相同。[14]

陈先生开设的“佛经翻译文学”这门课，所用的课本是《六祖坛经》。此书略称《坛经》，是中国佛教禅宗记载六祖慧能的事迹和语录，是禅宗的基本经典。慧能的基本主张是佛性为人心本有，万法尽在人自心，何不从心中顿见真如？他认为人性即是佛性，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慧能的一首偈特别有名：“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他认为众生皆有佛性，人人都可成佛。对于这些，季羨林是不相信的，也从来不信任何宗教，但是，他对于佛教却有浓厚的兴趣。因为他知道，中国同印度有千丝万缕的文化关系，要想把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学史搞清楚，不研究印度的东西是困难的。陈先生的课开扩了他的眼界，增强了他研究印度的兴趣。

吴宓先生开设的两门课“中西诗之比较”、“英国浪漫诗人”，也给季羨林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讲课认真、严肃，有时候也用英文讲，议论时有警策之处。[15]

这三位老师，都是对季羨林影响较大的，他搞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的研究，显然是受朱光潜先生和吴宓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同陈寅恪先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清华西洋文学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必修课规定得有条有理，非常完整，给选修课留下的时间，也是很富余的。除了选修课以外，还可以去旁听甚至是偷听自己感兴趣的课。教师不以为忤，学生也各得其乐。季羨林旁听朱自清、俞平伯、郑振铎等先生的课，都是非常顺利的，且还和郑先生建立了终生的友谊。但也有不顺利的时候，是他同一群学生去听冰心先生的课。当时冰心先生极年轻，但已名满天下。她是燕京大学教授，在清华兼课。冰心先生满脸庄严，不苟言笑，看到课堂上这么多学生，知道有“诈”，便威仪俨然地下“逐客令”：“凡非选修此课者，下一堂不许再来！”季羨林他们悚

然而听，憬然而退，从此不敢再进她的讲堂。[16]想不到 40 多年后，她由怒目金刚而变为慈眉菩萨，季羨林和她谈起此事，她一笑了之。对于这些选修课，季羨林留下了深刻印象：

此外，我还旁听了或偷听了很多外系的课，比如朱自清、俞平伯、谢婉莹（冰心）、郑振铎等先生的课，我都听过，时间长短不等。在这种旁听活动中，我有成功，也有失败。最失败的一次，是同许多男同学，被冰心先生婉言赶出了课堂。最成功的是旁听郑西谛（振铎）先生的课。西谛先生豁达大度，待人以诚，没有教授架子，没有行帮意识。我们几个年轻大学生——吴组缃、林庚、李长之，还有我自己——由听课而同他有了个人来往。他同巴金、靳以主编大型的《文学季刊》是当时轰动文坛的大事。他也有意让我们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充当《季刊》的编委或特约撰稿人，名字赫然印在杂志的封面上，对我们来说这实在是无尚的光荣。结果我们同西谛先生成了忘年交，终生维持着友谊，一直到 1958 年他在飞机失事中遇难。到了今天，我们一想到郑先生还不禁悲从中来。[17]

季羨林觉得这些先生们的课，水平都很高，至今让他忆念难忘。他自认在清华期间，真正获益的，不是必修课的那些“正课”，而是这些选修课和旁听课。

5. 广泛的兴趣

季羨林在清华大学的四年间，学习兴趣相当广泛，语言、文学、历史、宗教，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各个方面，几乎都涉及到了。

在专业课方面，季羨林是德语专门化，德语学了整四年，但是，最后本科生的毕业论文系里要求的不是用德语写，而是要求用英语写。季羨林的毕业论文是《The Early Poems of Hölderlin》，指导教师是艾克（Ecke）。他本人当时认为这篇毕业论文的水平是不高的，内容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

在大学四年期间，季羨林继续写作散文。他相继写成《枸杞树》、《黄昏》、《回忆》、《年》、《兔子》、《母与子》、《红》、《寂寞》等多篇散文，发表在当时颇有权威的报刊上，《年》发表在由叶公超主编的《学文》上。本来已经准备编成一个集子，定名为《因梦集》，郑振铎先生准备编入由他主编的一个丛书之中。后来因为忙于办理出国手续，没来得及编成。这些散文中有几篇，后来编入《季羨林散文集》。

除了散文创作，季羨林还从事翻译。他先后翻译的作品有德莱塞的《旧世纪还在新的时候》、屠格涅夫的《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呵……》、史密斯的《蔷薇》，杰克逊（H. Jackson）的《代替一篇春歌》、马奎斯（D. Marquis）的《守财奴自传序》，索洛古勃（Sologub）的一些作品，薛德林的一些诗，其中《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呵……》、《代替一篇春歌》、《蔷薇》等几篇正式发表了，尚有一些没有发表。季羨林在清华时的兴趣还表现在对西方的所谓“纯诗”上，但他与西方的“纯诗”观有一定的分歧。西方的纯诗观主张废弃韵律，季羨林主张诗歌必须有韵律，否则的话，叫任何什么名称都行，就是不能叫作“诗”。即使印度泰戈尔主张废除韵律的观点，也没能说服他。当时，他最喜欢的西方诗人，是法国的魏尔兰、马拉梅和比利时的维尔哈伦等人。魏尔兰对于“纯诗”的主张是：首先是音乐，其次是明朗与朦胧相结合。这种观点符合季羨林当时的口味，只是后来他反对现在的所谓“朦胧诗”，怀疑现代的“朦胧诗”是“英雄欺人”，是以艰深文饰浅陋。因为文学艺术是要人了解的，如果只有作者一个人了解，或者连作者自己也不见得了解，那么文学艺术还有何用？除了所谓“纯诗”，他还喜欢英国诗人的所谓“形而上学诗”。

对于中国文学，季羨林仍喜欢六朝骈文，唐代李义山、李贺，宋代姜白石、吴文英，这些都是唯美主义的，讲求辞藻的华丽，这些诗作和骈文，至今仍在影响着季羨林，唯美仍然是他的嗜好。

他感兴趣的另一个领域，是梵文。由于旁听了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更加深了他对梵文的兴趣。但是陈寅恪先生当时不开设梵文课，也没有其他人教梵文课，所以此时是空有兴趣，而没能开始学习梵文。这个愿望后来到德国留学期间实现了。

由于学习的兴趣提高了，小学、中学贪玩的兴趣减弱了。四年大学期间，北京那么多的古迹，那么多好玩的地方，尽有许多机会可以作赏花的韵事，但他却很少去光顾了。四年中，他只到中山公园去看过芍药，到颐和园去看过一次玉兰。有一次，好不容易腾出点时间，与一位老朋友在大毒日头下，跑过许多条窄窄的灰土街道，到崇效寺去看过一次牡丹，因为已经错过机会，到了以后看到的只是满地残英，这对于特别喜欢赏花的季羨林来说，太过于残酷了。尤其是，季羨林在济南时那么喜欢海棠花，在北京却很少能看到，连因海棠而出名的寺院似乎都没有听说过。北京的春天非常短，短得几乎没有春天，最初还是残冬，可接连吹上几天大风，再一看，树木已经长出了嫩绿的叶芽，天气陡然暖起来，春天没来就进了夏天了。

6. 政治活动

季羨林曾多次强调，中国知识分子有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也不能望其项背的。而且申明：“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 [18]

季羨林在清华大学期间，虽然发愤读书，兴趣全在各种知识的获取，但他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不是置国难当头于不顾的人。

当然，季羨林对政治活动的认识，有一个逐步加深的过程。

起初，刚入大学的时候，季羨林并没有很清楚地认识到安静的清华园内，国共两党在学生中的势力也有激烈的斗争。与季羨林同年考

入清华的胡乔木（当时叫胡鼎新），一边在历史系读书，一边参加学生的社会活动，于1930年底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胡乔木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更加积极地投入革命活动。胡乔木和吴组缃等几个同学一起，在学校里办了一所工人子弟夜校，以便宣传革命。胡乔木本人进行革命宣传鼓动活动，也不怎么隐蔽。每天早晨，在学生洗脸盆里塞上传单，就是出自于他之手。这是一个尽人皆知的秘密。一天深夜，胡乔木去西洋文学系找到季羨林，动员他也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季羨林还没有意识到革命就等于爱国，加上胆小怕事，他没敢答应。只答应到由胡乔木主办的工人子弟夜校去上课，算是助一臂之力，稍报知遇之恩。

稍后，国内政局更为紧张，国民党蒋介石在拼命“安内”，日本侵略者已兵临古北口，在东北兴风作浪。终于在1931年9月18日，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突然炮击沈阳，同时在吉林、黑龙江也发动大规模进攻。而蒋介石集中力量反共，对日本侵略军采取了卖国政策，命令东北军“绝对不可抵抗”，并撤至山海关内，致使日军在9月19日即侵占沈阳，接着又分兵侵占了吉林和黑龙江等省。

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包括清华大学师生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清华师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组成了学生赴南京请愿团。季羨林读高中时就对国民党官员没有好感，更加上国民党杀害了他的老师胡也频先生，他对国民党群魔乱舞的统治十分痛恨。此时，新仇旧恨一并爆发，季羨林便毫不犹豫地随清华同学，先是在前门火车站卧轨、绝食，而后赴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在南京，季羨林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蒋介石。没想到，学生们满腔爱国热情，结果却被满口谎言的蒋介石捉弄，最后是铩羽而归。

对于清华当时的政治分野，季羨林回忆说：

学生中国共两派的斗争是激烈的，详情我不得而知。我算是中间偏左的逍遥派，不介入，也没有兴趣介入这种斗争。不过据我的观

察，两派学生也有联合行动，比如到沙河、清河一带农村中去向农民宣传抗日。我参加过几次，记忆中好像也有倾向国民党的学生参加。原因大概是，尽管蒋介石不抗日，青年学生还是爱国的多。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爱国主义的传统是源远流长的，根深蒂固的。[19]

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是后来曾出任国民党行政院长、总统府秘书长的翁文灏，这时他的思想还算开明，手里拿着左派学生的名单，一个个叫来谈话。翁文灏叫来积极组织学生活动的胡乔木，对他说：

“清华园好比一座大戏台，生旦净末丑，各种角色都可以登台表演。要是大戏台塌了，就谁也演不成戏了。你演的戏太危险了，会把戏台搞塌的。作为校长，我希望你今后不再参加此类活动。”[20]

翁文灏的话，并没有起作用，胡乔木在1931年8月便被调到共青团北平市委担任市委委员、宣传部长，虽然离开了仅读了一年书的清华这座戏台，但到社会上更大的戏台去担任角色了。其他同学，自然也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自己的爱国政治活动。这正如季羨林后来所说的：

几千年的历史可以证明，中国知识分子最关心时事，最关心政治、最爱国。这最后一点，是由中国历史环境所造成的。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天没有虎视眈眈伺机入侵的外敌。历史上许多赫赫有名的皇帝，都曾受到外敌的欺侮。老百姓更不必说了。存在决定意识，反映到知识分子头脑中，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爱国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管这句话的原形是什么样子，反正它痛快淋漓地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在别的国家是没有这种情况的。[21]

可以说，季羨林在清华时期的政治活动，基本上是以爱国为主线，谈不上是积极参加革命。正如他自己所说，高中时期他曾为“革命”所动，写过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章《现代文艺的使命》，是一篇充满了革命义愤和口号的文章，本来准备在胡也频主办的刊物上发表，但“文章还没有来得及刊出，国民党通缉胡先生，他慌忙逃往上海，一二年后就被国民党杀害。我的革命梦像肥皂泡似的

破灭了，从此再也没有‘革命’，一直到了解放”[22]。

三、师与生

1. 师生之间

清华大学的门槛很高，有一批全国知名的教授。当时教授与学生之间有一条鸿沟，不可逾越。教授每月薪金高达三四百元大洋，可以购买面粉二百多袋，鸡蛋三四万个。教授的社会地位极高，往往目空一切，自视高人一等。学生接近他们比较困难。

学生中经济地位因家庭出身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季羨林家几乎是贫农；他在清华上学期间，家庭的经济情况颇为不妙。每年寒暑假回家，返校时，为筹集学费和膳羹，要颇费一番苦心。由于清华是国立大学，花费还不算多，每学期收学费四十元。但这四十元学校并不使用，在毕业时，学校把所收的学费如数再还给学生，做他们毕业旅行之用。学校也不收住宿费，每月膳费只收六块大洋，顿顿有肉食可吃。即使这样，季羨林家父亲务农，叔父当河务局小职员，对这样的费用还是开支不起。季羨林的老家清平县，本来是个极贫穷的县。但因为季羨林是惟一的国立大学学生，县里便把他视为“县宝”，每年都提供给他一笔奖学金，补贴他五十块大洋。没有这一笔奖学金，他恐怕很难念完大学。另外，季羨林还写点文章，得点稿费，这样，家里的负担就能减轻一些。所以，季羨林的大学生活是颇为拮据的。

虽然有这样的鸿沟存在，但这并不妨碍学生和教授开玩笑。季羨林回忆说：

开玩笑几乎都在《清华周刊》上。这是一份由学生主编的刊物，文章生动活泼，而且图文并茂。现在著名的戏剧家孙浩然同志，就常用“古巴”的笔名在《周刊》上发表漫画。有一天，俞平伯先生忽然大发豪兴，把脑袋剃了个净光，大摇大摆，走上讲台，全堂为之愕

然。几天以后，《周刊》上就登出了文章，讽刺俞先生要出家和尚。[23]

第二个玩笑是和吴宓先生开的。吴先生是一个奇特的人，在他身上表现出不少矛盾：

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他偏写古文，写旧诗，所以奇特。他反对白话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话写成的《红楼梦》，所以矛盾。他看似严肃、古板，但又颇有一些恋爱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学生来往，但又凛然、俨然，所以矛盾。[24]

高兴的时候，他在课堂上就把自己新写成的旧体诗印发给学生，《空轩》十二首，就是他发给学生的。这十二首诗，都是意有所指的。但确切地指什么，学生并不清楚。学生们只知道，他当时正在多方面地谈恋爱。他在追求毛彦文是众所周知的。诗中有一句说“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是夫子自道。于是，引得编《清华周刊》的秀才们，把这些旧诗译成白话，刊出一首七律今译，与吴先生开了一个不大不小又无伤大雅的玩笑，而吴先生则一笑置之，不以为忤。直到现在，季羨林还记得这首七律的前半阙：

一见亚北貌似花，
顺着秫秸往上爬。
单独进攻忽失利，
跟踪盯梢也挨刷。

下半阙的最后一句是：“椎心泣血叫妈妈。”诗中的人物简直呼之欲出，熟悉清华今典的人，都知道这是学生们在开吴宓追求女孩的玩笑。

学生们同俞先生、吴先生开这样的玩笑，学生们觉得好玩，威严方正的教授们也不以为忤，无形之中，就填平了师生之间原来存在的鸿沟。

但是，有一种鸿沟是填不平的。有些老师的威风炙手可热。有的老师，专门给学生不及格，每到考试，他先定下一个不及格的指标，不管学生多么用功，也不管学生成绩怎样，定下的不及格指标却一定要完成。这位老师因此而名扬全校，成了“名教授”。

还有一位老师，就是杨丙辰，则正好相反，他不是对学生过严，而是要求过松。考试时，他预先向学生声明：十题中，答五题就算及格，然后多答一题加十分。考完以后，这位老师根本就不看学生的试卷，学生一交卷，他随手就给学生打分，结果自然是没有不及格的，学生们皆大欢喜。如果有个学生在他面前多站一会儿，他立刻就问这个学生：“你嫌少吗？”于是，大笔一挥，再给他增加十分。

教师的教学态度，学校没有统一的要求，好像当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概念。教师也不准备教学大纲和教案。教授在课堂上，可以信口开河：谈天气，可以；骂人，可以；讲掌故，可以；扯闲话，可以；老师愿意怎么讲就怎么讲，愿意讲什么就讲什么。天上天下，唯师独尊，谁也管不着老师。有的老师竟能坐在讲台上睡过去，有的上一年课，不和学生说一句话，有的教授同时在几个大学兼课，必须制定出一个轮流请假表，才能解决上课的冲突。勤勤恳恳的老师有，但是少数。

老师这样待学生，学生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以师生之间不是互相利用，就是互相敌对。没想到师生关系竟成这样的一种关系：老师为了混饭吃，学生为了拿文凭。

2. 和老师的交往

季羨林自认平生有一个弱点，就是不喜欢拜访人。在清华大学期间，他拜访的老师，也只有少数的几个。

在大学四年期间，季羨林同吴宓先生接触比较多。吴先生当时给天津《大公报》主编一个《文学副刊》。季羨林和几个喜欢舞文弄墨

的青年学生，常常喜欢给《副刊》写点书评和散文一类的文章，因而无形中形成了一个小团体。学生们曾多次应邀到他那在工字厅的住处，藤影荷声之馆去作客，也被请到在工字厅教授们的西餐餐厅去吃饭。这在当时教授与学生之间存在着一条看不见但感觉得到的鸿沟的情况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至今他回忆起来，还感到温暖。[25]

后来，季羨林离开了清华，在以后漫长的几十年里，他只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在北京大学燕东园李赋宁先生家中拜见过吴先生。吴先生在抗战期间去了西南联大，北大和清华复员到北京，吴先生留在了四川，没有回北京。

另一个交往比较多的教授是郑振铎先生。

郑振铎先生当时是燕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的教授，在清华兼课。燕京大学是当时全国十多所教会大学之冠，耶鲁大学建筑师亨利·克拉姆·梅菲（Henry Killam Murphy）所设计的办公楼和教学楼，是用现代钢筋水泥建筑与传统的琉璃瓦大屋顶相结合，形成的新式的对称型宫殿建筑，连自来水塔也隐藏在钢筋水泥的宝塔内，该塔被称为“博雅塔”。

郑先生在清华大学兼课时，季羨林旁听过他的课。他是一个渊博的学者，掌握有大量资料，讲起课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那透过高度的近视眼镜，从讲台上向下看挤满了教室的学生的神态，学生们印象是非常深的。

当时的教授一般都有一点所谓“教授架子”。在中国话里，“架子”这个词儿同“面子”一样，是难以捉摸，难以形容描绘的，好像非常虚无缥缈，但它又确实存在。有极少数教授自命清高，但精神和物质待遇却非常优厚。在他们心里，在别人眼中，他们好像是高人一等，不食人间烟火，而实则饱饕粱肉，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其中有人确实也是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成了人们羡慕的对象。存在决定意识，因此就产生了架子。

在我们眼中，教授简直如神仙中人，高不可攀。教授们自然也是

感觉到这一点的，他们之所以有架子，同这种情况是分不开的。我们对这种架子已经习以为常，不以为怪了。[26]

清华的学生们原以为燕京大学的郑先生，一定也是有架子的教授。但是，同他一接触，他们马上感到，他与别的教授不同，简直不像是一个教授。在他身上，看不到半点教授的架子。

郑先生没有一点论资排辈的恶习，从来不觉得比学生长一辈，他完全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学生们。

郑先生有时候简直就像一个大孩子，不失其赤子之心。他说话非常坦率，有什么就说什么，从来不装腔作势，自然更不以势压人。他从来不随便教训学生，对于学生来说，他任何时候都是亲切和蔼的。当时在社会上流行有一种帮派习气，但在他身上一点都找不到。只要他认为是有一技之长的，不管是老年、中年，还是青年，他都能一视同仁。因此，学生们在背后都议论，说他是一个宋江式的人物。

郑先生同巴金、靳以先生在主编一个大型的文学刊物《文学季刊》。编刊物，按照惯例，是要找一些名人来当主编或编委的。因为这样可以给刊物镀上一层金，增加号召力、吸引力，扩大发行量。郑先生虽然也找过一些名人，但是，像季羨林这些清华既无名又年轻的大学生，他也决不嫌弃。学生中有的人当上了编辑，有的人当上特别撰稿人。这样一批年轻人的名字，都赫然印在杂志的封面上，自然都感到沾沾自喜，有时候简直感到难以理解，甚至有点受宠若惊了。他们感到郑振铎先生对青年人的爱护，除了鲁迅先生以外，恐怕并世无二。

郑先生这样没有架子，又如此提携青年学生，学生们自然都愿意接近他。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既景仰他学问之渊博，又热爱他为人之亲切平易，于是就很愿意同他接触。只要有会，我们总去旁听他的课。有时也到他家去拜访他。记得在一个秋天的夜晚，我们几个人步行，从清华园走到燕园。他的家好像就在今天北大东门里面大烟筒下

面。现在时过境迁，房子已经拆掉，沧海桑田，面目全非了。但是在当时给我的印象是异常美好、至今难忘的。房子是旧式平房，外面有走廊，屋子里有地板，我的印象是非常高级的住宅。屋子里排满了书架，都是珍贵的红木做成的，整整齐齐地摆着珍贵的古代典籍，都是人间瑰宝，其中明清小说、戏剧的收藏更在全国首屈一指。屋子里的气氛是优雅典丽的，书香飘拂在画栋雕梁之间。我们都狠狠地羡慕了一番。[27]

郑先生是燕京大学的名教授，兼职很多，常要奔走于北京城内城外。进城要经过长途跋涉，校车虽有，但非常少，有时候进城要骑驴，有时候坐人力车。郑先生总是随身带着一个大皮包，里面装满了稿子，鼓鼓囊囊的。他的近视眼镜度数很深，走路总愿跨大步，风尘仆仆地来往于清华、燕京和北京城之间。

郑先生爱书如命，买书的方式也很特别。他认识许多书商，从来不与书商讲价钱，只要有好书，他就留下。临时手头不一定有钱偿付书费，先留下书，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还书费，实在凑不齐钱，就用自己的别的书来对换。比方他印过一些珍贵的古籍《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玄览堂丛书》之类，就用这些书去还债，书商愿意拿他的什么书，就拿什么。

对这样一位郑先生，学生们自然都是很尊敬的。1921年，他与沈雁冰、王统照等名家组织起文学研究会，1923年又主编《小说月报》，1931年开始在上海、北京任各大学教授，致力于学术研究、主编文学刊物，他的代表作除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以外，还有《取火者的逮捕》、《中国俗文学史》，并编有《中国版画史图录》。所以，在清华的学生眼中，他简直像长江大河，汪洋浩瀚；泰山华岳，庄严敦厚。当时的一些名人，同他一比，简直如小水洼、小土丘一般，有点微不足道了。

学生们尊敬他，但从来不畏惧他。他们看到他偶尔坐上清华大学的校车，就打开皮包，拿出稿纸，写起文章来。他们便觉得他好玩，

觉得他很可爱。还不免在背后常常议论他，说他的笑话，笑他走路跨大步的样子，就像一只大骆驼。

和没有架子的郑振铎教授之间，师生之情却亲如兄弟，老师没有师道尊严，学生们却更为尊师爱教，这正是师生关系的辩证法。

其他老师，季羨林接触比较多的是叶公超。他教英文，也喜欢英国散文，正好与季羨林爱好相同。季羨林自己常写散文，也翻译散文。他翻译过英国散文作家史密斯（L. P. Smith）的《蔷薇》，发表在1931年4月24日的《华北日报》副刊上，而自己写的一篇散文《年》，就发表在与叶公超有关的《学文》上。但总的来说，季羨林与叶公超的关系，不如与吴宓、郑振铎那样毫无间隔，既受过他的鼓励，也碰过他的钉子。

在清华，季羨林另一个有交往的人是沈从文先生。当时，他喜欢读沈先生的作品，觉得在所有并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独立风格的人并不多见。除了鲁迅先生，就是沈从文先生。因为他的作品，只要读上几行，就能立刻辨认出来，决不含糊。

他出身湘西的一个破落小官僚家庭，年轻时当过兵，没有受过多少正规的教育。他完全是自学成家。湘西那一片有点神秘的土地，其怪异的风土人情，通过沈先生的笔而大白于天下。湘西如果没有像沈先生这样的大作家和像黄永玉先生这样的大画家，恐怕一直到今天还是一片充满了神秘的 *terra incognita*（没有人了解的土地）。[28]

当时，丁玲的《母亲》出版，季羨林读过以后，觉得有一些意见要说，就写成一篇书评，发表在郑振铎、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以后，他听说沈先生有点意见。于是季羨林立即写了一封信给沈先生，同时也请郑先生在杂志再版时，把自己的那篇书评抽掉。就是因为这样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一个不能算是太愉快的因缘，季羨林认识了沈从文先生。

虽然沈先生是著名的作家，季羨林是一个穷学生，社会地位简直如云泥之隔，但沈先生却把季羨林当做自己的知己好友。他同张兆和

女士结婚，在前门外大栅栏撷英番菜馆设盛大宴席，由胡适证婚，出席者名流如云，而一个穷学生季羨林也在被邀请之列。

3. “四剑客”的学友情

在清华读书期间，季羨林有几个要好的朋友，志趣相投，常在一起玩，聊天。吴组缃、林庚、李长之都是他的好朋友，他们是清华园的“四剑客”。

李长之是济南人，和季羨林是小学、中学、大学“三连贯”的同学。季羨林和他联系最多。有一年暑假，他们一块回到济南探家。当时，老舍先生正在济南齐鲁大学教书。有一天，李长之告诉季羨林，他要在家请老舍先生吃饭，要季羨林作陪。老舍先生已是大名鼎鼎的作家和大学教授，要自己陪大学教授吃饭，季羨林有点受宠若惊了。在李长之家中见到老舍先生，没想到全然不是自己心目中的那种大学教授。老舍先生谈吐自然，蔼然可亲，一点架子也没有。他说一种地道的京腔，铿锵有致，听他说话，季羨林感到就像是听音乐，是一种享受。通过李长之，从那以后，季羨林认识了老舍先生。

在清华的时候，季羨林同这几个好朋友经常在工字厅的临湖大厅聚谈。临湖大厅离吴宓先生的“藤影荷声之馆”不远，有名的“水木清华”四个大字的匾，就挂在大厅的后边。厅很大，里边摆满了红木家具，气象高雅华贵。

这里平常很少有人来，因此很幽静。季羨林便同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等好友，相约到这里来闲谈。当时他们还年轻，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说起话来，海阔天空，旁若无人。他们不是粪土当年万户侯，去臧否历史人物、帝王将相，就是挥斥当代文学家。茅盾的《子夜》刚出版时，他们几个人便在这里碰头，议论此书。意见截然分成了两派：一派完全肯定，一派基本否定。季羨林否定，吴组缃肯定。大家推心置腹地争吵，实际上是在侃大山，类似于文学沙龙，各自把

自己的话尽量夸大其词地说完，然后再谈别的问题，一向没有结论，也不需要结论。争论完一个问题，又谈别的问题，觉得其乐无穷。

晚饭之后，几个好友则漫步走出校南门，边走边谈。有时候谈得兴起，忘了路的远近，甚至走得很远很远。有一次，是在深秋时分，几个人走到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衰草荒烟，景象萧森，举目四望，竟看不到有人家。但见野坟数堆，暮鸦几点，上下辉映，益增荒寒，回望西天，残阳如血，余晖闪耀在枯草叶上。这时，他们感到鬼气森森，赶快收住脚步，转身再返回清华园。原来这个地方已经是中关村了。

在清华的一批学友当中，胡乔木、乔冠华后来都参加了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李长之后来在南京国立编译馆工作，是著名文学家。只有吴组缃和林庚，成为和季羨林一样的学者。

吴组缃是安徽泾县人，比季羨林年长三岁，生于 1908 年。他 1929 年考入清华大学，在经济系学了一年，1930 年转入中文系，由于志同道合，与季羨林成为好朋友。吴组缃专攻中国文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研究院继续深造，在此期间，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短篇小说，成为 30 年代文坛的著名左翼作家。他先后在中央大学、四川省教育学院、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1952 年院系调整以后进北京大学工作至今。他和季羨林成为终生来往的好朋友。他的贡献在中国文学领域，《红楼梦》研究、《儒林外史》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都是很有影响的。他的小说《一千八百担》、《西柳绿》、《鸭咀崂》都是短篇小说的佳作。其中《一千八百担》与季羨林写的丁玲《母亲》的书评，都是刊登在由郑振铎、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创刊号上。

4. 孤独的宿舍生活

季羨林由于六岁就离开母亲，一直有一种孤独感。虽然在济南时

叔父、婶母都像父母似地关怀自己，但始终不能代替母亲。

离开济南到清华大学读书，叔父和婶母又不在身边，进一步增加了季羨林的孤独。这种孤独在课堂上、图书馆里，都没有机会显现出来，在与学友的交往中，也被快乐赶跑了。可是一回到宿舍，这种孤独便袭来了。

在孤独的时候，季羨林便常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回忆很不好说。究竟什么才算是回忆呢？我们时时刻刻沿了人生的路向前走着，时时刻刻有东西映入我们的眼里。——即如现在吧，我一抬头就可以看到清浅的水在水仙花盆里反射的冷光，漫在水里的石子的晕红和翠绿，茶杯里残茶在软柔的灯光下照出的几点金星。但是，一转眼，眼前的这一切，早跳入我的意想里，成轻烟，成细雾，成淡淡的影子，再看起来，想起来，说起来的话，就算是我的回忆了。[29]

在这种心境下，季羨林回忆最多的是故乡，故乡的秋，老牛的影，田野的影，都站在他心里的一个角隅里。

灯光平流到我面前的桌上，书页映出了参差的黑影，看到这黑影，我立刻想到在过去不知什么时候看过的远山的淡影。玻璃杯反射着清光，我立刻想到月明下千里的积雪。我正写着字。看了这一颗颗的字，也使我想到阶下的蚁群……

在不经意的时候，我常把母亲的面影叠在茶杯上。把忘记在什么时候看到的一条长长的伸到水里去的小路叠在Hölderlin（薛德林）的全集上。把一树灿烂的海棠花叠在盛着花的土盆上。把大明湖的塔影叠在桌上铺着的晶莹的清玻璃上。把晚秋黄昏的一天暮鸦叠在墙角的蜘蛛网上，把夏天里烈日下的火红的花团叠在窗外草地上平铺着的白雪上……[30]

5. 为未来忧愁

穷人子弟上大学困难，等到上高年级时，又要为自己的未来忧愁了。

当时流行着一个词儿，叫“饭碗问题”，还流行着一句话，是“毕业即失业”，除了极少数高官显宦、富商大贾的子女以外，谁都会碰到这个性命交关的问题。我从三年级开始就为此伤脑筋。我面临着承担家庭主要经济负担的重任。但是，我吹拍乏术，奔走无门。夜深人静之时，自己脑袋里好像是开了锅，然而结果却是一筹莫展。

[31]

在这样的境况之下，在课堂上、操场上，受环境熏染，还不至于太忧愁。因为清华学生一般都很用功，课堂秩序自不用说，上图书馆去看书，甚至都要百米赛跑似地去抢借书，抢占座位。清华的学生同时也勤于锻炼身体，每天下午四点钟以后，图书馆中几乎空无一人，而体育馆内则是人山人海，清华传统的著名游戏“斗牛”，正在热烈地进行。操场上也挤满了跑步、踢球、打球的人。晚饭之后，图书馆里又是灯火通明，人人都在伏案苦读了。

一旦从图书馆回到宿舍，忧愁便马上袭来。这时候，季羨林常感到寂寞像个大毒蛇，盘住了他整个的心。白天的笑声虽然萦绕在耳际，但早已恍如梦中的记忆了，这时他内心的痛苦显而易见：

我只有一颗心，空虚寂寞的心被安放在一个长方形的小屋里。我看四壁，四壁冰冷像石板，书架上一行行排列着的书，都像一行行的石块，床上棉被和大衣的折纹也都变成雕刻家手下的作品了，死寂，一切死寂，更死寂的却是我的心，——我到了庞培（Pompa ii）了么？不，我自己证明没有，隔了窗子，我还可以看见袅动的烟缕，虽然还在袅动，但是又是怎样地微弱呢，——我到了西敏斯大寺

（Westminster Abbey）了么？我自己又证明没有，我看不到阴森的长廊，看不到诗人的墓圻，我只是被装在一个长方形的小屋里，四周圈着冰冷的石板似的墙壁，我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桌子上那两盆草的蔓长嫩绿的枝条，反射在镜子里的影子，我透过玻璃杯看到的淡淡的

影子；反射在电镀过的小钟座上的影子，在平常总轻轻地笼罩上一层绿雾，不是很美丽有生气的吗？为什么也变成浮雕般地呆僵着不动呢？——一切完了，一切都给寂寞吞噬了，寂寞凝定在墙上挂的像片上，凝定在屋角的蜘蛛网上，凝定在镜子里我自己的影子上……

在他的眼里，满世界都像是死了一样。他从这儿看到那儿，像看一个朦胧的残梦，淡黄的阳光从窗子里穿进来，造成一条光的路，又射在光滑的桌面上，但这种光却不耀眼，不辉腾，只是死死地贴在桌子上，像乡间黑漆棺材上贴的金边。看到屋外寥寥的几个看书的，错落地散坐着，使他想到月明夜天空的星星，石像似地坐着，不响也不动，简直就像死尸。他看到他们僵坐的姿势，看到他们一个个翻着的死白的眼，就像是鱼市里的死鱼，一堆堆地排列着，鼓着肚皮，翻着白眼。

这样的一种心境，完全是对自己的前途无法把握而造成的。他像是到了世界末日。

到了世界末日了吗？世界的末日，多可怕！以前我曾自己想象，自己是世界上最后的一个生物，因了这无谓的想法，我流过不知多少汗，但是现在却真教我尝到这个滋味了。天空倒挂着，像个盆，远处的西山，近处的楼台，都仿佛剪影似地贴在这灰白盆底上，小鸟缩着脖子站在土山上不动，像博物院里的标本，流水在冰下低缓地唱着丧歌，天空里破絮似的云片，看来像一贴贴的膏药，糊在我这寂寞的心上，枯枝丫叉着，看来像鱼刺，也刺着我这寂寞的心。[32]

无奈，他平卧在床上，让夜里柔弱的灯光流在他的身上，让寂寞在四周跳动，静听着远处传来的趑趄的足音，隐隐地，细细弱弱到听不清，听不见。隔了窗子，外面是死寂的夜晚，从蒙翳的玻璃里看出去，不见灯光，不见一切东西清晰的轮廓，只是在黑夜里，有一棵迷离的树影，只剩了秃光的枯枝，刺着天空，把小小的温热的生命力蕴蓄在这枯枝的中心，外面披上这层刚劲的皮，忍受着北风的狂吹，忍受着白雪的凝固，忍受着寂寞的侵袭。季羨林自己也就像这枯枝一

样，盼望着春的来临，切盼着寂寞的退走。但是，春什么时候来，寂寞什么时候退走呢？在这漫漫的长长的夜，在这漫漫的更长的冬，季羨林在盼望着，会有一个春天的好消息。

6. 永远感谢清华

在清新、活泼、民主、向上的清华大学，季羨林经历了自己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

在这里，他兼收并蓄，学习了英文、德文和其他各门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在社会科学领域，走出了研究的第一步。

在这里，他开始笔耕，发表了处女作，即收入散文集里的《枸杞树》。它忠实地记录了他的一段真实的心灵活动。他十九岁离家到北京去考大学，第一次走了这样长的路，而且感到中学与大学之间好像有一条鸿沟，跨过这条沟，人生长途上就有了一个起点。这种感觉，反映到他的心灵上，引起了极大的波动，所以一旦考取，有点惊异，有点担心，有点好奇，又有点迷惘。这种心情牢牢地控制着他，使他写成了这篇《枸杞树》。这之后，他便与著名的大型《文学季刊》结下缘分，发表了不少作品。

在这里，他结识了梅贻琦、朱光潜、陈寅恪、吴宓、俞平伯、朱自清、冯友兰、沈从文、冰心、郑振铎等名教授和学者，使他获益良多。

所以，每当回忆起清华园，春天繁花烂漫，夏天藤影荷声，秋天枫叶似火，冬天白雪苍松，以及西山紫气、荷塘月色，都让他忆念难忘。

所以，季羨林说，清华园，永远占据着他的心灵，回忆起清华园，就像回忆自己的母亲。他对清华的感激之情，油然跃于纸上：

每次回到清华园，就像回到我母亲的身边，我内心深处油然起幸

福之感。在清华的四年生活，是我一生最难忘、最愉快的四年。在那时候，我们国家民族正处在危急存亡的紧急关头，清华园也不可能成为世外桃源。但是园子内的生活始终是生气勃勃的，充满了活力的。民主的气氛，科学的传统，始终占着主导的地位。我同广大的清华校友一样，现在所以有这一点点的知识，难道不就是在清华园中打下的基础吗？离开清华以后，我当然也学习了不少的新知识，但是在每一个阶段，只要我感觉到学习有所收获，我立刻想到清华园，没有在那里打下的基础，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已经走了不短的一段路。看来我要走的道路也还不会是很短很短的，对我来说，清华园这一幅母亲的形象，这一首美丽的诗，将在我要走的道路上永远伴随着我，永远占据着我的心灵。[33]

第三章 初尝人生

一、择业

1. 毕业即失业的现实

1934年夏天，季羨林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德文专修科毕业，成绩是四年全优。

但是，横亘在二十三岁的天之骄子面前的是两大难题：其一，正当季羨林大学毕业之时，在济南黄河河务局当小职员叔父正好失业，一家人的生活没有着落，家庭经济实际上已经破了产，贫窘之状可想而知了。其二，当时大学毕业生就业并不容易，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受到歧视，找工作就更难。这一点，从前清华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后来到南京国民党行政院政治事务办公室任职的蒋廷黻所抱怨的，就可以想见。

蒋廷黻说：

从生活方面看，我更喜欢当一个教授。当我回忆起那时候的悠闲，所读过的书以及教学中不断累积起来的著作文稿，有时甚至会落下泪来。在这里我从早到晚忙个不停，许多鲁莽粗率之徒因为不能把话说得简略一些而白白浪费我们的时间。光是求职者就几乎把我逼得发疯。一天早晨七点钟，一个家伙便闯进我的房间大嚷：“可把你找到了。我们足有二十年没见面了。”原来他是我的一位小学时候的同学、同乡。中国和美国的同学，南开、清华、北大的学生都想从我这儿弄到一份工作。我的办公室已经是人满为患了。如果裁减一半，或许我会干得更有效率。可是我的上司反对我无故解雇人们的公职，他希望给所有愿意勤勉工作的人们一定职务的保障。在这方面，他甚至比美国总统还更现代派。[1]

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严酷现实，何去何从？问题非常严峻地摆在了初尝人生的季羨林面前。

季羨林并没有像他的清华同学那样，去找南京国民政府的要员们。他吹拍乏术，只有等待命运的安排。

2. 谁是幸运儿？

清华的同学中，有谁是幸运儿呢？

胡乔木是幸运儿？

胡乔木在 1931 年 8 月，便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辍学，到北平共青团市委担任市委员会委员、宣传部长，他积极参加和领导了北平的学生、工人、市民的罢课、罢工、罢市，游行示威，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出兵抗日，收复失地。但他因被中共河北省委以“同情托派分子”而被“挂”了起来，只得辗转在清华、北大、中国大学等校当旁听生，进行自学。

1932 年到上海，接着在盐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 年 10 月到杭州入

浙江大学外文系插班读二年级。在浙大，胡乔木仍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35年夏天，正要升入四年级时，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把胡乔木的考试成绩八十多分改为五十多分，以不及格为由，开除了胡乔木和其他十几名进步学生。所以，胡乔木大学没毕业，就离开了大学，以后以革命为生。

乔冠华是幸运儿？

乔冠华1929年入清华，学校里发生了赶走国民党走卒校长罗加伦和不学无术的校长乔万选的运动，乔冠华没有参加，只是赞成，其他革命活动也没有参加。他在四年的大学生活里，是一个书呆子，既没有同当时的国民党同流合污，也没有积极参加中共组织的革命活动，他专心致志干的，是读书，包括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这样一个百分之百的书生，到了1933年3月到4月间，由于日军侵入古北口，北京城内已是一片恐慌，学校当局决定，1929级毕业生提前毕业，也不举行毕业考试，交篇论文，便发给毕业文凭毕业了。由于日文教授钱稻孙从中帮忙，乔冠华争得一个公费派遣生的名额，赴日留学。在日本，因涉嫌与日共有联系，在1935年春天被日本警察押运回到上海。

林庚是幸运儿？

林庚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两年后转入中文系。1933年毕业留校，担任朱自清教授的助教，并兼任郑振铎、巴金、靳以等人主办的《文学季刊》编辑，本来是幸运的。他1934年春想去上海体验作家生活，夏天回到北京，继续在清华大学工作，而且先后在北京民国学院、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兼课。

吴组缃是幸运儿？

吴组缃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一年后转入中文系，毕业后进了清华大学研究院，攻中国文学，1935年受聘成为冯玉祥将军的国文教师，后又兼任秘书工作。

李长之是幸运儿？

李长之 1931 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1933 年转入哲学系，参加《文学季刊》编委会，1934 年出任《清华周刊》文艺栏主编，出版第一本诗集《夜宴》，1935 年又任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主编，发表《鲁迅批判》，奠定了他在文学批评界的地位。他 1936 年毕业，留校任华侨生、蒙藏生导师，并在京华美术学院任美学和西洋美学史教授。

看来，专修中国文学和哲学的，算是幸运儿了。季羨林是学西洋文学的，等待他的，会有一个好命运吗？

3. 终于拿到了饭碗

在清华大学学习了四年的西方语言文学，带着满脑袋的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在毕业即失业的 20 世纪 30 年代，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吗？

那时候有两句名言：“毕业即失业”；“要努力抢一只饭碗”。一个大学毕业生，如果没有后门，照样找不到工作，也就是照样抢不到一只饭碗。[2]

出路有没有呢？当然有，那就是出国。如果一个人能出国一趟，当时称之为“镀金”，一回国身价百倍，金光闪烁，好多地方会抢着要，成为“抢手货”。于是，留学热在当时非常浓烈，弥漫全国，其声势之大决不会亚于今天。因此留学牵动着成千上万青年学子的心。

当时要想出国，无非走两条路：一条是私费，一条是官费。前者只有富商、大贾、高官、显宦的子女才能办到。后者又有两种：一种是全国性的官费，比如留英庚款、留美庚款之类；一种是各省举办的。二者都要经过考试。这两种官费人数都极端少，只有一两个。在芸芸学子中，走这条路，比骆驼钻针眼还要困难。是否有走后门的？我不敢说绝对没有。但是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一般是比较公道的，录取的学员中颇多英俊之才。这种官费钱相当多，可以在国外过十分舒

适的生活，往往令人羡慕。[3]

季羨林当然也患了“留学热”，而且他自认其严重程度决不下于别人。以季羨林的家境，私费留学，他连想都没有想过，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我这个癞蛤蟆压根儿不想吃天鹅肉，我还没有糊涂到那个程度”。而官费留学，更是不可能，因为当时只送理工科学生，社会科学受到歧视，出国留学是希望甚微的。

这样一来，出国留学没有希望，只得四处奔走去找工作，但找工作又碰了钉子，他陷于极端痛苦之中。快到秋天了，而饭碗还没有拿到手，如何向家人交待呢？季羨林形容自己的心情说：

总而言之，我大学一毕业，立刻就倒了霉，留学无望，饭碗难抢；临渊羡鱼，有网难结；穷途痛苦，无地自容。[4]

正在无路可走之时，一个意外的机会来了。山东省立济南高中（也就是季羨林高中三年级的母校）的校长宋还吾先生托人邀请季羨林回母校教国文。这对于季羨林来说，真好像是大旱之年遇到了甘露，使他绝处逢生。究其原因，因为季羨林在大学期间写的散文，有一些发表在颇有权威性的报刊上，在全国已经有了点名气。在母校老师们眼中，这几篇散文就足以把他当成作家。而当时的逻辑很简单，既然是作家，自然能教国文。而季羨林心里可直打鼓，他要教国文，就要把学的莎士比亚、歌德，换成屈原、李白和杜甫，一时间换得过来吗？但是既然饭碗还没有拿到手，也就只有横下一条心了：你敢请我，我就敢去！那阵势大有破釜沉舟之概。

二、济南高中

1. 初为人师

就这样，季羨林应宋还吾校长之邀，回到济南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走马上任，开始了初为人师的生活。

当我走进学校大门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复杂的。可以说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我终于抓到了一个饭碗，这简直是绝处逢生；惧的是我比较熟悉的那一套东西现在用不上了，现在要往脑袋里面装屈原、李白和杜甫。[5]

这时，他考虑最多的就是“面子”问题，因为当时中学生颇有“架”教师的风气。所谓“架”，就是把不称职的老师赶走，他自己上小学时就干过这种事，现在轮到自己当教师了，自己会不会也被“架”？对于这种“面子”，季羨林在 1995 年写成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中国知识分子也是极难对付的家伙。他们的感情特别细腻，锐敏，脆弱，隐晦。他们学富五车，胸罗万象。有的或有时自高自大，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有的或有时却又患了弗洛伊德（？）讲的那一种“自卑情绪”（inferiority complex）。他们一方面吹嘘想“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气魄贯长虹，浩气盈宇宙。有时却又为芝麻绿豆大的一点小事而长吁短叹，甚至轻生，“自绝于人民”。关键问题，依我看，就是中国特有的“国粹”——面子问题。“面子”这个词儿，外国文没法翻译，可见是中国独有的。俗话里许多话都与此有关，比如“丢脸”、“真不要脸”、“赏脸”，如此等等。“脸”者，面子也。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国粹“面子”的主要卫道士。[6]

大学毕业的季羨林，未能免俗，不得不考虑自己的面子问题。但为了饭碗，也只好让面子退居二线了。他当时的想法是：我反正是瘸子掉在井里，捞起来也是坐。

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是当时全山东惟一的一所高级中学，师资队伍实力雄厚，工资待遇也很高。国文教师的待遇更是优渥，每个月可以挣到 160 块大洋，是大学助教的一倍，折合今天的人民币，至少可以合 3200 多元。当时大学教授的薪金是 320 块大洋。

原来只是以为由于几篇散文出了名才被邀去济南高中教国文的。

但进了学校之后，才知道个中原因并不是这么简单。

从别的教师的谈话中，季羨林才了解到，原来是校长宋还吾想把本校的毕业生组织起来，好在“对敌斗争”中助他一臂之力。

当时山东中学界抢夺饭碗的搏斗是异常激烈的。常常是一换校长，一大批教员也就被撤换。一个校长身边都有一个行政班子，教务长，总务长，训育主任，会计，等等，一应俱全，好像是一个内阁。在外围还有一个教员队伍。这些人都是与校长共进退的。这时的山东中学教育界有两大派系：北大派与师大派，两者勾心斗角，争夺地盘。宋校长是北大派的头领，与当时的教育厅长何思源是菏泽六中和北京大学的同学，私交颇深。有人说，如果宋校长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与何在国外也是同学，则他的地位会更上一层楼，不止是校长，而是教育厅的科长了。[7]

这才知道，宋还吾校长是在率领着北大派与师大派两军对垒。在这种情势之下，他需要支持，最好是有一支客军来支持自己。季羨林正好符合他的要求，季羨林是济南高中第一届甲班的毕业生，而且有一张与北大齐名的清华大学的证书，因此就被他看中，他觉得这位大学毕业生既非北大派，又非北师大派，而是超然于两派之外，但又有济南高中的背景，正可以被用来壮他的声势。

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之下，季羨林踏上了初为人师的道路，至于其中的酸甜苦辣，如人饮水，冷暖只有自己才知道。

2. 如履薄冰

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之下，季羨林进了济南高中的大门。他深知自己能吃几碗干饭，所以进校时，心虚是在所难免的。他如履薄冰地走上了济南高中的讲台，拿起了国文课的教鞭。

真讲起课来，这才感到问题的复杂。济南高中共有三个年级，每个年级四个班。英文教师满了员，用现在的话说叫“超编”。国文教

师已有三个，人手略嫌不足，因此季羨林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教国文。分工自然是一个教师教三个班，三个老教师都是科班出身，救国文成了老油子，根本用不着备课，可三位老教师每人挑去同一个年级中的三个班，备课、教课只有一个头，剩下的一、二、三年级的各一个班，便留给初出茅庐的季羨林了。有什么办法呢？在济南高中，季羨林毕竟是小字辈呀！

要教三个年级的三个班，不仅备课要兼顾三个头，而且还都是难度比较大的古典文学作品。《诗经》、《楚辞》，季羨林是念过许多的，但是自己念和现在教课，是大不一样的。要教人，自然自己先要弄懂，不然就没法教学生。可真正弄懂这三个头的古典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

三位老教师，本来是季羨林在济南高中上学时的老师，有的还教过他国文课，遇到问题本来是可以向他们请教的。但是，季羨林通过细致的观察，发现他们之间的关系变了，不再是师生关系，而是饭碗的争夺者。在老教师的眼中，这位年轻人几乎成了他们的眼中钉，处在敌对的位置上了。由于这样的敌对关系，即使向他们请教，他们也绝不会告诉他的，这就是“同行是冤家”的深意所在。

没有办法，季羨林只好放“单飞”，随时都要冒险。怕学生“架”自己，要保住知识分子的“面子”，季羨林日夜抱着一部《辞源》，加紧备课。课文中有的典故在《辞源》里查不到，有时急得半夜还绕着宿舍彷徨。

屋前的木槿花正盛开着，枝叶繁茂，花朵鲜艳，不时地，有阵阵暗香破窗而入。整个宇宙都静了下来，而他自己却心急如焚，一点也宁静不下来。季羨林感到，自己仿佛为人所遗弃，真想到什么地方去大哭上一场。只是顾到男子汉的“面子”，他才没有去这么做。

老教师因为饭碗问题不帮季羨林备课，但他们也并非全然不顾这位老学生，他们自然也担心这位老学生会在第一堂课上出丑。于是一个老教师面授机宜，告诉季羨林：上课之前，先要把学生的名字都看

上一遍，因为学生名字里经常会有一些生僻、古怪的字，有这样的字，先要查一查《康熙字典》。一位新教师如果第一堂课上就有念不出的学生名字，或者是念错了，在学生心目中，这个老师就不值钱，毫无威信了，老师就不容易再当下去，自然会影响到饭碗能不能拿牢。如果查了字典，点名时临时又碰到了不认识的字，点名时，就不点这个名。点完其他人的名后，只需问上一声：“还有没点到名的吗？”这时那个没被点到名的学生，一定会举手站起来。然后老师再问一声：“你叫什么名字呀？”他自己一报名，你也就认识了那个字。如此，就不至于丢“面子”，威信就可以保得十足了。季羨林实话实说：

这虽是小小的一招，我却是由衷感激。我教的三个班果然有几个学生的名字连《辞源》上都查不到。如果没有这一招，我的威信恐怕一开始就破了产，连一年教员也当不成了。[8]

第一堂课总算平安无事地对付过去了，但是，并不是每堂课都平静无事。有的学生就颇有挑衅性。其中有一个比季羨林大五岁的学生，从小就在家里念私塾，旧书念了不老少。有一次，他对季羨林说：“老师，我比你大五岁哩。”说罢，嘿嘿一笑，这笑声里，既有威胁，也有嘲笑，更有挑衅。季羨林心里想，你比我大五岁，又怎么样呢，反正老师还是要当下去的，师生的位置是不能换的。

就是这样，也还难免会有尴尬的场面出现。当时的济南高中，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风气：教师一定要无所不知。学生这样要求老师，老师则以此自居。尤其在课堂上，老师决不能承认自己讲错了，也决不能有什么问题答不出来，否则就会被学生讥笑。这一点对于科班出身的人可能不算很难，但对于季羨林这样一个刚从西洋文学系毕业的年轻大学毕业生来说，教国文怎么会应对自如呢？又怎能完全回答学生们提出来的问题呢？

有时候，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被逼得紧了，就硬着头皮，乱说一通。学生究竟相信不相信，我不清楚。反正他们也不是傻子，老师

究竟多轻多重，他们心中有数。我自己十分痛苦。下班回到寝室，思前想后，坐立不安。孤苦寂寥之感又突然袭来，我又仿佛为人们所遗弃，想到什么地方去哭上一场。[9]

幸好，季羨林在这段时间里，还继续写散文。有一篇寄给郑振铎先生，他当时在上海主编《文学》，立即刊登了。而且郑先生还写信来，说他正在编一个丛书，要把季羨林的散文编成一个集子，在这丛书里出版，只是时间太紧，集子没有编成。此外，他还在《山东民国日报》上主编一个文学副刊《留夷》，可以为学生刊登一点好文章。这样一来，季羨林自然在学生中很有威信，且对学生极有吸引力，再加上他年龄与学生相仿，也没有什么架子，不摆什么“师道尊严”，把学生当成自己的伙伴，因此，与学生的关系相处得很好。

至于和一般教师，关系也很融洽。160 块大洋的工资足够花，于是每周都要同几个志同道合者，出去吃小馆。同事之间谁也不会吝啬，感情也容易加深。从外表看来，生活过得是蛮不错的，周围的处境也相当好。

3. 提心吊胆

季羨林在济南高中如履薄冰般地备课、教课，总算在业务上立住了。

但是，宋还吾校长邀请季羨林来这个学校，绝非仅是为了教教国文，还要让他当他的客军，助一臂之力。因此，入校工作后不久，宋校长便授意季羨林，让他组织济南高中毕业同学会，以壮大自己的声势。对于这一方面的苦心，季羨林虽涉世未深，但是很容易就觉察出来了。可惜他没学会这方面的本事，天生不是干这种事的料，既不会吹牛拍马，也不愿陷于这种帮派中。结果是同学会没有好好活动，没能帮上宋校长的忙。

看看其他教师，有一些人可能也有自己的烦恼。家家有一本难念

的经吆！但是，季羨林也看到，颇有几位老师整天价满面春风，十分愉快。这些人自然是混得不错的，究其原因，别人嘴里的风言风语道出了其中的奥秘：某某人陪校长太太打麻将了，某某人给校长送礼了，某某人请校长吃饭了。显然这些人已经加入了校长的“圈”，成了圈里人了。

我立刻想到自己的饭碗，也想学习他们一下。但是，却来了问题：买礼物，准备酒席，都不是极困难的事情。可是，怎样送给人家呢？怎样请人家呢？如果只说：“这是礼物，我要送给你。”或者：“我要请您吃饭。”虽然也难免心跳脸红，但我自问还干得了。可是，这显然是不行的，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一定还要耍一些花样。这就是我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了。我在自己屋里，再三考虑，甚至自我表演，暗诵台词。最后，我只有承认，我在这方面缺少天才，只好作罢。我仿佛看到自己手里的饭碗已经有点飘动。我真想到什么地方去哭上一场。[10]

没有办法，季羨林在这种复杂的人事关系中，只有保持沉默和安静。

可是，问题就出在这“安静”上了。

宋还吾校长已经注意到季羨林的这种安静，并直言不讳地对别的老师说：“羨林很安静！”“安静”这两个字，局外人不会理解其深意所在。而季羨林心里却清楚，他到了学校之后，虽然在别人的帮助甚至是“牵引”之下，把济南高中毕业的同学组织起来了，还被推选为主席，但是从来没搞过什么活动，来具体支持宋校长，壮大其声威，这当然与宋校长的初衷有违。老谋深算的宋校长，表面上不露声色，仍然客客气气地对待季羨林，但这有意与无意之间说出的“安静”二字，却是宋校长深思熟虑的结果。宋校长逐渐发现，在季羨林这个人身上，他失了眼力，看错了人。他不愧是北大国文系的毕业生，深通国故，有很高的古典文学造诣。这“安静”二字，其用心之良苦，境界全出，真是胜似别人的千言万语。而季羨林心里明白，自

己的饭碗，就与这两个字有关。他回到寝室，又绕室彷徨，又仿佛为人所遗弃，想到什么地方去哭一场。

就在这时候，有一件事进一步给季羨林提示了“安静”二字给他的是一种巨大威胁。这是一学期过后，寒假将至，济南高中一位教物理的河南籍教师，因为原有教育厅的一个科长靠山支持，得以在这里任教。但这位科长垮了台，他也就失去了靠山，按照惯例，这位教师自然要卷铺盖走路，要被解聘。宋校长对此事已有所闻，但佯装不知，故意装得大为震惊，三番两次到这位教师屋里，表示挽留，动情时甚至声泪俱下，还信誓旦旦地表示要与他“共进退”。季羨林毕竟涉世不深，原先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观看校长的表演艺术，欣赏他的表演天才，可是看来看去，他已看不出真假，完全被校长那种真挚的态度所感染，也就自动地跳出来帮助校长挽留这位教师。这位物理教师毕竟阅历深一些，他始终也不为校长的“共进退”所动，还是卷了铺盖走路。事实上，他已经知道，他的继任人选已经安排好了。

人情世故之复杂，实在让人提心吊胆！

4. 为“拿到了没有”焦虑

物理教师被解聘，使季羨林长了一番见识，他在心中暗暗责备自己的糊涂。同时，心中也不禁不寒而栗，谁知道哪一天自己也要与校长“共进退”呢？

为此，季羨林情绪低沉，随时担心会被校长“炒鱿鱼”。在紧张的心情之中，过完了执高中教鞭的第二学期。夏天来了，更为紧张的时刻也就来了。

春天早过，夏天又来。这正是中学教员最紧张的时候。在教员休息室里，经常听到一些窃窃私语：“拿到了没有？”不用说拿到什么，大家都了解，这指的是下学期的聘书。有的神色自若，微笑不答。这都是有办法的人，与校长关系密切，或者属于校长的基本队

伍。只要校长在，他们决不会丢掉饭碗。有的就神色仓皇，举止失措。这样的人没有靠山，饭碗掌握在别人手里，命定是一年一度紧张。我把自己归入这一类。我的神色如何，自己看不见，但是心情自己是知道的。校长给我下的断语：“安静”，我觉得，就已经决定了我的命运。但我还侥幸有万一的幻想，因此在仓皇中还有一点镇静。

[11]

实际上，季羨林这时的镇静只是强装出来的。他心里的滋味同前一年大学毕业面临择业时是一样的。见了别的教师，不禁也要窃窃私语地问上一句：“拿到了没有？”他特别不喜欢那些神态自若的人，只去接近那些神色仓惶的人。他与这些人大有同病相怜之感。

夏天的济南高中，校园里的景色更美了。木槿花还在开着紫红或白色的花，已经长满了绿油油的、卵形而三裂的大叶子。玫瑰花也开得正旺，一丛一丛的，煞是好看。池塘里的水浮莲，也开出黄色的小花，倒卵状楔形叶片，昂立在水面上，长而悬垂的根须清晰可见。正可谓“小园香径独徘徊”，是颇有诗意的漫步之时。但上中学便有“诗人”之称的季羨林，这时却一点诗意都没有，甚至身边优美的园景都不再引起他的注意。他的耳边，似乎只有一个声音：“拿到了没有？”他觉得，大地茫茫，却惟独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处。

二十刚出头的年龄，却心怀百岁之忧。我的精神无论如何也振作不起来。我有时候想：就这样混下去吧，反正自己毫无办法，空想也白搭。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我这辆车还没驶到山前，等到了山前再说吧。[12]

5. 离别济南高中

这一年，在济南高中教国文，季羨林初尝了人生的艰辛。他亲眼看到，教师握在手中的那只饭碗，随时都有飘飘欲飞的危险。

被“炒鱿鱼”，还不如主动离开这里。

但是，怎样离开济南高中呢？

这时候，别人出国留学的消息，不时地传入季羨林耳中。他忽然想到，在留学热中，亲眼看到一位同学，因为听到别人出国而自己无份之时，浑身发抖，眼直口呆，满脸流汗，没想到此时却轮到自己浑身发抖了。他遥望着欧山美水，看那些出国者如神仙中人，而觉得自己，只是人间凡夫，与出国留学镀金者相比，“更隔蓬山千万重”了。

突然，一个意外的消息从母校清华大学传来：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教授同德国洽谈，促成清华大学与德国的大学建立了交换留学生制度，与德国学术交换处（DAAD）签订了一份合同：双方交换研究生，路费制装费本人负担，食宿费相互由对方负担。德国留学生在德国每月三十块大洋，中国留学生在德国一百二十马克。条件对双方来说都不理想，三十块大洋约等于今天人民币六百元。德国一百二十马克也只能勉强支付食宿费用，而官费德国留学生每月有八百马克，那就比较富足了。

但是，无论如何，这样的一次机会，对于一心想离开济南高中的季羨林来说，就如同是凭空送来了一根救命的稻草，不管是否能获救，他却非抓住不可了。

得到这一消息，季羨林喜出望外的心情就不用细说了。他立即通过母校清华大学报了名，当时出国留学由学校审核通过即可。季羨林在校期间主修德语专业，四年的成绩全优，自然很容易就获得通过。

消息传来，季羨林没想到梦寐以求的出国留学的愿望就要实现，着实狂喜了一阵子。但是狂喜之后，他开始考虑现实的问题：由于叔父失业造成的家庭经济状况濒于破产，而且家中叔父、婶母、父亲，妻子彭德华、女儿婉如、幼子延宗，老的老，小的小，有他在，一百六十块大洋还可以维持，他一走，全家的生活靠什么来维持呢？想到这些，他又忧心如焚了。

我走到了一个歧路口上：一条路是桃花，一条是雪。开满了桃花

的路上，云蒸霞蔚，前程似锦，不由得你不想往前走。堆满了雪的路上，则是暗淡无光，摆在我眼前是终生青衿，老死学官，天天为饭碗而搏斗，时时引“安静”为鉴戒。究竟何去何从？我逢到了生平第一次重大抉择。[13]

这样的重大问题，必须经过全家的讨论。出乎季羨林的意料，他竟然得到了叔父和全家的支持。全家表示：他们咬咬牙，不就是两年吗？过上两年紧日子，只要不饿死，就能迎来胜利的曙光。叔父是一个知书达礼之人，极为重视家庭门第观念，他下功夫培养季羨林，就是要让他为祖宗门楣增光添辉。这种观念，其实是当时非常流行的观念，人们把小学毕业看做秀才，高中毕业看做举人，大学毕业看做进士，而留洋镀金则属于翰林一流，而且还是洋翰林。现在，一块金光闪闪的洋翰林牌子马上就要挂到季家了，这样的机会怎么能轻易放过呢？

马前桃花马后雪，
教人怎敢再回头？

下定了决心，出国的事也就定了。当时的心情，季羨林后来形容说：

这比考上大学金榜题名的心情，又自不同，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积年愁云，一扫而空；一生幸福，一锤定音；仿佛金饭碗也已经捏在手中。自己身上一镀金，则左右逢源，所向无前。我现在看一切东西，都发出玫瑰色的光泽了。[14]

消息传到济南高中，校园里掀起了一个不小的波澜。宋还吾校长一改认为季羨林安静的态度，对他刮目相看了。这位校长，表现出异常的殷勤，听说费用不很足，亲自带季羨林去找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希望能让教育厅给点资助。但是，不善交际的季羨林又被“安静”害了，结果是空手而回。校长虽然不免有点失望，但热情依旧，又是勉励，又是设宴送别，相期学成归国之日，再回济南高中与他共同工作。

而教师同事们，则又是一番激动不已。同事中有的原是他的老师，有的是他的同辈，但年龄都比他大很多。他们都为这位“洋翰林”表示祝贺。年轻一点的教师，则非常羡慕季羨林。他们对出国留学，早就望眼欲穿，但苦于自己没有办法。现在看到季羨林得到这样一个天赐之良机，洋翰林指日可待，宛如蛰龙升天，自然又是羡慕，又是祝贺。季羨林确有点飘飘然了。

我忽然感觉到，我简直成了《儒林外史》中的范进，虽然还缺一个老泰山胡屠户和一个张乡绅，然而在众人心目中，我忽然成了特殊人物，觉得非常可笑。我虽然还没有春风得意之感，但内心深处是颇为高兴的。[15]

马前桃花在召唤他，远看是那么鲜艳，但是走近以后，会是什么样子呢？一个未知数又摆在了季羨林面前。

第四章 德邦十年（一）

一、初离故土

1. 离愁袭心头

季羨林曾说过，他想到德国留学，并没有伟大的动机。但在事实上，除了不能不说，有改换门庭、为祖宗增光的动机外，也有成就大事业、成名成家的抱负，对于这一点他从来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大吹大擂，冠冕堂皇地去说一番，然而这种动机是有的。

我没有伟大的动机。冠冕堂皇的理由自然也不能没有。但仔细追究起来，却只有一个极单纯的要求：我总觉得，在无量的，无论在空间上或时间上，宇宙进程中，我们有这次生命，不是容易事；比电火还要快，一闪便会消逝到永恒的沉默里去。我们不要放过这短短的时间，我们要多看一些东西。就因了这点小小的愿望，我想到外国去。

[1]

现在，真要实现出国的愿望了，就需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首先是经济问题。在济南高中教书，本来工资相当优厚，但这些工资要抚养六七口之家，再加上他自己也不会计算花钱，这些钱便从他手里水似地流去了。第一个月过去，钱没剩下几个，第二个月过去了，居然拉下了账，需要用第三个月的工资来偿还，结果是教了一年书，却并没有攒下钱。这样，出国筹备路费就成了个大问题。宋还吾跑教育厅没为他筹到经费，季羨林在别处又多次碰壁，这才看出真正的人情和世态。

最后，还是好友大千和洁民替他解了围，北京的梅生也为他张罗这件事。当他几乎丧失信心之时，李长之又写信来劝他，带给他勇气和力量。这时候，季羨林真正体会到友情的可贵，感到这友情像一滴仙露，滴到他焦灼的心上，使他得以圆出国之梦。

这样，朋友们给他凑了点钱，七拼八凑，勉强做了几身衣服，装了两大皮箱，做好了长途万里旅行的物质准备。

经济问题解决之后，立即就有离愁别绪袭上心头。平常他对诸多事情，就有过多的顾虑，这次要出国，他就更不能过多地顾虑了：顾虑到德国以后的生活，顾虑自己走后的家境是否还撑得住。许多琐碎到不能再琐碎的小事，也纠缠着他，给他以痛苦。

这时候，他开始回溯自己过去走过的许多路。回望过去，自己的脚印迭成一条连绵不断的路。这条路，除了在每年的末尾，在心里印上一个浅痕，知道又走过一段路以外，自己很少画过明显的鸿沟，说以前走的是一段，以后是另一段的开端。但是现在他却真的在心里画了一条鸿沟，把以前二十四年走的路截在鸿沟的那一岸，而这一岸，将开始一条新路，一直会把他带到一个渺茫的未来去。

这时候，他首先想到自己的母亲。1933年，母亲已经离开人世，他曾回故乡为母亲送葬。他准备每年秋天，都要回母亲坟上去看看，在母亲墓旁绕上两周，低低地唤一声：“母亲！”由此来补偿母

亲生前足有八年没见到他的遗恨。现在要离家去几万里外的异邦，什么时候才能再回到故乡呢？想到这里，他的心充满了负罪感。

让母亲一个人凄清地躺在故乡的地下，忍受着寂寞的袭击，上面是萋萋的秋草。在白杨簌簌中，淡月朦胧里，我知道母亲会借了星星的微光到各处去找他的儿子；借了西风听取他儿子的消息。然而所找到的只是更深的凄清与寂寞，西风也只带给她迷离的梦。[2]

这时候，他又想到母亲生前最关心的外祖母。季羨林在离开故乡以前，经常住在她的家里，她的慈祥的面貌，永远也不会离开他的记忆。现在，她会龙钟得不像样子了吧！背恐怕会更驼了吧！现在，不能去向她告别，也只能希望她能好好地活下去，等漂泊回来的时候，再跪到她怀里，把受到的委屈都哭出来。

这时候，他又想到了故乡临清的平原，家乡的小屋，清澈的苇塘，秋天的老牛……看一眼在豆棚瓜架下闲话的野老，看一眼在一天工作疲劳之余在门前悠然吸烟的农人，都会引起他极大的向往。

我真不愿意离开这故国，这故国每一方土地，每一棵草木，都能给我温热的感觉。但我终于要走的，沿了自己在心里画下的一条路走。我只希望，当我从异邦转回来的时候，我能看到一个一切都不变的故国，一切都不变的故乡，使我感觉不到我曾这样长的时间离开过它，正如从一个短短的午梦转来一样。[3]

就这样，季羨林要带着乡愁离绪离开故乡，去一个遥远的异邦了。

2. 离家赴京

终于到了离家的日子。

1935年8月1日，季羨林要离开济南的家去北京办理出国手续了。济南虽是山东省首府，但是不能办理出国手续。

临别之时，季羨林思绪万端。叔父，婶母，妻子彭德华一手牵着

女儿婉如的手，另一只手抱着刚出生才几个月的儿子延宗，把季羨林送到大门口。女儿只有两岁，儿子才几个月，不懂事，这时还睡在母亲的怀里，他们自然不知道什么叫离别，女儿也许还觉得好玩。但叔父、婶母和妻子知道这离别意味着什么。

季羨林眼里含着泪，但不让它流出来，硬是把大量的眼泪挤压到肚子里。此时，他心里在想：

我留下的是一个破败的家，老亲、少妻、年幼子女。这样一个家和我这一群亲人，他们的命运谁也不知道，正如我自己的命运一样。生离死别，古今同悲。江文通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他又说：“割慈忍爱，离邦去里，沥泣共诀，抆血相视。”我从前读《别赋》时，只是欣赏它的文采。然而今天自己竟成了赋中人。此情此景实不足为外人道也。[4]

他没有敢再看亲人们一眼。因为他知道，他们的眼里一定也含着泪珠，他怕一家人会哭成一团，便头也不敢再回，扭头就上了一辆洋车。家里大门楼上残砖败瓦的影子，在他眼前一闪，就消逝了。

季羨林坐上了北去的火车，来到了北平。从前门车站下了火车，他又坐上了去沙滩的洋车。在沙滩，他找了一家公寓，赁了一间房子，存放下那两只放衣物的大皮箱。

接着，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往清华大学，在工字厅招待所找到一个床位住下。

同屋住着一位在外地工作的保险公司总经理，也是清华的毕业生，比季羨林要早几届。因为是校友，虽然素不相识，却很快就熟了。俩人夜半联床，娓娓聊天。带着一种职业的优越感，这位总经理再三劝季羨林，到德国后一定要学保险。学成回国，不仅饭碗不成问题，甚至还可以拿到一只金饭碗，何乐而不为呢？总经理的一番说教，虽然有一定的诱惑力，但季羨林的志趣从来不在这里，对于做官、经商，绝对没有兴趣，对发财也没有追求。

仅隔一年，又回到了母校，心情却与做学生大不一样了。

此时正值暑假，学生几乎都离校回家了。偌大一个清华园，静悄悄的。但是风光却更加旖旎，高树蔽天，浓阴匝地，花开绿丛，蝉鸣高枝，荷塘里的荷花正迎风怒放，西山的紫气依旧幻奇。风光虽美，但是我心中却感到无边的寂寞。仅仅在一年前，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那众多的小伙伴都还聚在一起，或临风朗读，或月下抒怀。黄昏时漫步荒郊，回校后余兴尚浓，有时候沿荷塘步月，领略荷塘月色的情趣，其乐融融，乐不可支。然而曾几何时，今天却只剩下我一个人又回到水木清华，睹物思人，对月兴叹，人去楼空，宇宙似乎也变得空荡荡的，令人无法忍受了。[5]

有一天晚上，吃过晚饭，季羨林觉得孤身无聊，便信步走出工字厅。他来到朱自清先生《荷塘月色》所描写的荷塘边上去散步，此时，一弯新月当空，万籁无声。他看到明月倒影在荷塘之中，比天上那一个似乎更皎好。月光之下，荷叶荷花，都显不出本色，只见灰蒙蒙的一片。但是缕缕荷香，还是不时送到岸边，使他仿佛能看到月光下翠绿的荷叶和红艳的荷花。偶尔在荷叶和花丛之中，还有点点似火花的东西在闪耀，那是早出的萤火虫在四处活动。他看到小小的火似的光在动荡不定，忽隐忽现，却仿佛要与天上和水中的月亮争光比辉。这时，一切忧愁都离季羨林远远的了。

此时，宇宙间仿佛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前面的鹏程万里，异乡漂泊；后面的亲老子幼的家庭，都离开我远远的，陷入一层薄雾中，望之如蓬莱仙山了。[6]

利用一些空闲时间，季羨林向几位促成清华与德国签订互派留学生协议的老师拜会和告别。自然首先是冯友兰先生，全靠他的斡旋，才有这次交换留学生的机会。在清华上学期间，虽没有上过冯先生的课，同他根本没有什么来往，只是偶尔听他的报告或者讲话而已。但这次的出国，却全靠冯先生出的力，对冯先生的感激之情，直到今天季羨林还是一如既往的。在1995年12月举行的一次纪念冯友兰先生百年诞辰的会上，季先生仍发言说：我六十年前去留学，全靠冯先生

与德国签订了互换留学生的协议，没有那个协议，没有我去德国留学的机会。我不去德国，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是什么样子，我自己也不知道。

然后去拜访蒋廷黻先生。蒋先生 1929 年到清华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1935 年季羨林在北京办理出国手续时，他还没到蒋介石政府任职，他是这年的 12 月才去南京的。这时，季羨林去拜访他，他还没有行政官僚的习气。他恳切地劝说季羨林：德国是法西斯国家，在那里一定要谨言慎行，免得惹出麻烦。他在签订与德国互换留学生的合同时出了力，临别时，又这样语重心长地劝告学生，这使季羨林分外感动，他感谢师长的叮嘱。

最后，季羨林还去拜访了闻一多先生。这是季羨林第一次见到闻先生，闻先生的诗人和学者风度，季羨林早有所闻。闻先生 1930 年 8 月至 1933 年 1 月，曾在自己的故乡国立山东大学（当时称青岛大学）讲授过名著选读、唐诗、英诗入门的课程，1933 年 1 月才离开山东来到清华。闻先生在 1928 年就出版诗集《死水》，受到朱自清先生的高度评价，认为《死水》转向幽玄，更为严谨，他作诗有点像李贺的雕饰而出，是靠理智的控制比情感的驱遣多些。但他的诗又不失为情诗。另一方面，他又是个爱国诗人。这一次能见到闻先生这样著名的诗人，使季羨林永志不忘。但没想到这也是最后一次见面，等他留学回国时，闻先生已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了。

没想到北京当时没有外国领事馆，办理出国护照的签证，还要到天津去。

正巧，乔冠华被日本警察押送回国之后，从上海来到北平。他从金岳霖教授那里得知，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系主任冯友兰教授，同德国洽谈成互换留学生，哲学系还有一个名额未最后确定。乔冠华经金岳霖教授推荐，冯友兰的支持，也得到去德国留学的机会。

于是，季羨林便和乔冠华联袂乘火车去天津，到德国领事馆办理签证。因为需要途经俄国，也要到俄国领事馆。手续非常简单，两国

领事馆人员只是简简单单地问了几句话，就含笑握手，祝他们一路顺风。几分钟就把出国手续全部办完，只等出发了。

出发之前，林庚、李长之、王锦弟、张露薇等几个老同学，在北海公园为季羨林饯行。他们租了两只小船，荡舟于荷花丛中。其时，荷花在太阳的照射下，红是红，绿是绿，红花绿叶相辉映，各极其妙。老同学一年后又聚在一起，臧否人物，指点时政，意气风发，所向无前。他们兴高采烈，简直成了主宰沉浮的英雄。在北海公园玩了整整一天，老同学们尽欢而散。

3. 别故国

1935年8月31日，老同学们把季羨林、乔冠华等人送到前门火车站，这里是他们万里旅程的起点。老同学们又是叮咛，又是祝福，学友之情溢于言表，使季羨林在登上火车的一刹那，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一句旧诗：

万里投荒第二人。

当时去德国，不像现在这样简便，登上北京机场的国际航班，几小时便可到达。那时要坐火车，从东北三省穿越苏联西伯利亚大铁路，从莫斯科转波兰，然后再进入德国境内。这沿途有两处关口，一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东三省扶持溥仪建立了所谓“满洲国”，这里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天下。二是要在红色苏联停留，他们对苏联还没有什么了解。年轻学子们登上了火车，便开始有了悬念，可这旅途是吉是凶，只有交给命运安排了。

车到山海关，就算进入“满洲国”了。所有乘客都要办理入“国”“过境”手续，列车停下来，乘客填上“过境”的几张表格，交纳三块大洋的手续费。这三块大洋，对于季羨林来说却不是小数目，它是整整半个月的生活费呢。要“入境”就非交不可，学子们递上钱，脸上还不敢露出任何不满的表情，说话也只能小心谨慎。他

们知道，前面是一个布满了荆棘的火坑，季羨林则因为有济南的经验，就更为了解日本鬼子的凶残。他们得谨慎对付。

总算没遇到麻烦，车行进在“满洲国”，学子们说话更为小心谨慎了。夜里，伪满洲国的一个特工钻进季羨林等人的车厢，在季羨林上铺躺下，探问这个，探问那个，好不容易才对付过去，这才天下太平，进入睡乡。

9月2日早晨，他们到了哈尔滨。这里是万里旅途的第一站，要住两天，换乘苏联火车。

季羨林在哈尔滨的两天，算是比较平静，没有什么大风浪，但也有令人啼笑皆非的小插曲。

同行的人中，有一位学心理学的敦福堂。他是清华大学与德国交换留学生的第三人，也是全部三人之一：乔冠华、季羨林和敦福堂。此公虽学心理学，却是个马大哈。另有三个去英国和其他国家留学的清华同学，也同车而行。下了车，要领行李离开车站，却发现托运单丢了，行李不让领。同车的六个同学心急如焚，找管理员，找站长，最后用六个人所有的证件，才算领出了行李。可是到了旅店安顿下来，大家还都余悸未消，敦公偶尔向口袋里伸手，行李托运单却赫然俱在。大家啼笑皆非，此公却怡然自得。以后的旅途上，此公便不是丢护照，就是丢别的，但最后总是化险为夷，逢凶化吉。有这么一个马大哈，倒是不闷了，但是却不知为他担了多少心。

在哈尔滨，需要置办后几天旅途上的食品。因为餐车上的饭太昂贵，且要用美元交付，这些阮囊羞涩的学子，大都付不出那么多的美元。他们很容易就买了几个重约七八斤的大面包，哈尔滨称“裂巴”，是俄语的变音。再买上一两个同样重的大香肠、几斤干奶酪和黄油，外加上几个罐头，总共有四五十斤重的食品，足够以后八九天旅途之用了。

完成了这一主要任务，剩下的时间便可以自由支配了。不意，在简陋的地下室俄罗斯餐馆里，季羨林却吃到了在北京时便久仰大名而

无缘品尝的俄式餐肴，什么罗宋汤、牛尾、牛舌、猪排、牛排，大快朵颐，不亦乐乎。饭菜精美而又便宜，他们便顿顿饭都去吃这些东西。

9月3日，几个人到松花江上去游览。

当时正值初秋，气温可并不高。我们几个人租了一条船，放舟中流，在混混茫茫的江面上，真是一叶扁舟。远望铁桥一线，跨越江上，宛如一段没有颜色的彩虹。此时，江面平静，浪涛不兴，游人如鲫，喧声四起。我们都异常兴奋，谈笑风生。[7]

游兴正浓，旅途中发生的不愉快便烟消云散了。玩到黄昏，他们回到了旅店，等待踏上新的旅途。

4. 异域之旅

9月4日，六个中国留学生登上了由苏联经营的西伯利亚铁路局的火车。

火车在松嫩大平原上行驶了一天，第二天到了满洲里。

当时的满洲里，是苏联与伪满洲国接壤的地方。火车要停下来，接受苏联海关的检查。

检查进行得非常细致、认真而又慢条斯理。行李不管是大是小，是箱是筐，一律都要打开，一一检查，巨细不遗。一把准备在火车上提开水用的铁壶，外表极其粗糙而又平常，引起了苏联海关人员的极大注意。水壶被翻来覆去，推敲研讨，碰碰摸摸，敲敲打打，看看里面是否还会有夹层，薄铁皮做成的壶盖，也被敲打了好几遍。看到此情，季羨林非常恼火，正想发作一下，身旁一位外国老年朋友，赶紧拍拍他的肩膀，向他示意。季羨林心领神会，硬把怒火压下去，恭候检查如故。后来他才领悟到，大概当时苏联人把外国人都当成了“可疑分子”，有存心颠覆他们政权的嫌疑，所以不得不尔。

办理完检查手续，心里恢复了平静，几个人在满洲里闲逛。当时

满洲里连个小城也算不上，最多算个边城小镇，只有几条简单的街道，找不出哪一条是主街，街边的房子都是用木板盖成的，无砖瓦，多木材，建筑就有了这样的风格。他们在一个木板房商店里，买了几个日本生产的甜酱菜罐头，以备火车上佐餐。

重又上了火车，真正的、连续不断的长途异国之旅便开始了。俗话说，人是地里仙，一天不见走一千，他们一天决不止走一千，他们也不止走一天，要走七八天。

车上的生活，单调而又丰富多彩。每天吃喝拉撒睡，有条不紊，有简便之处，也有复杂之处。简便是，吃东西不用再去操持，每人两个大篮子，饿了伸手拿出来就吃。复杂是，喝开水极成问题，车上没有开水供应，凉水也不供应。每到一个大一点的车站，我们就轮流手持铁壶，飞奔下车，到车站上的开水供应处，拧开开水龙头，把铁壶灌满，再回到车上，分而喝之。有一位同行的欧洲老太太，白发盈颠，行路龙钟，她显然没有自备铁壶；即便自备了，她也无法使用。我们的开水壶一提上车，她就颤巍巍地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个杯子，说着中国话：“开开水！开开水！”我们心领神会，把她的杯子倒满开水，一笑而别。从此一天三顿饭，顿顿如此。看来她这个“老外”，这个外国“资产阶级”，并不比我们更有钱。她也不到餐车里去吃牛排、罗宋汤，没有大把地挥霍着美金。[8]

吃着面包，啃着香肠，喝着开水，这种生活虽然单调一点，但是质量还是满高的，这比起在乡下吃红高粱面饼子，又苦又涩的味道，不知要好多少倍了。可真所谓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站在这山看那山高。有一次吃中饭的时候，一个女服务员，满面春风地托着一个大盘子，里面摆满了新出锅的炸牛排，肉香四溢，透人鼻官，是那么的诱惑力，那么让人馋涎欲滴。学子们动心了，但是，一问价钱，学子们却咋舌了：每块牛排三美元。满车厢里的人谁也不肯付出三美元，去啃一块牛排。女服务员托着盘子，转了一趟，又原盘托回。这一阵诱人的香气过后，学子们从篮子里又拿出随身带的“裂巴”，大

啃大嚼起来。

吃喝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而拉撒却成了天大的问题。车上的实情是：

一节列车住着四五十口子人，却只有两间厕所。经常是人满为患。我每天往往是很早就起来排队。有时候自己觉得已经够早了，但是推门一看，却已有人排成了长龙。赶紧加入队伍中，望眼欲穿地看着前面。你想一个人刷牙洗脸，再加上大小便，会用多少时间呀。如果再碰上一个人患便秘的人，情况就会更加严重。自己肚子里的那些东西蠢蠢欲动，前面的队伍却不见缩短，这是什么滋味，一想就可以知道了。[9]

车厢里最愉快的事，是六个人坐在一起侃大山。六个人本来分住两个包厢，每个包厢住四个人，还空出两个床位，是其他人住的。睡足了觉以后，六个人便凑到一个包厢里。六个人在清华都是同学，但因行当不同，接触并不多，道不同，不相为谋么。这个时候因为被迫挤在一起了，也就不管道同道不同了，大家都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学物理的，学哲学的，学文学的，行当的界限全没有了，上天下地，便聊起大天来。他们都是二十三四岁的年轻人，阅世都不深，每个人眼前都有一个未知的世界，堆放着玫瑰花，闪耀着彩虹。他们的心几乎是透明的，说起话来，一无顾忌，二无隔阂，全然没有谈不来的时候。这时候，小小的车厢里往往笑语不断，其乐融融，也就忘了身处异域之旅了。

话说累了，就凑棋局。物理学家王竹溪是象棋高手。他去英国留学，也坐这列火车。其他五个人轮番单个儿与他对弈，一盘输，二盘输，三盘四盘，五盘六盘，都是输。五个人联合起来跟他下，还是输，输，输。哲学家的乔冠华，他的哲学也没能帮他赢王竹溪一局。车上的几天，王竹溪始终是常胜将军，其他五人则全是手下败将，一局都没能胜过。

也有不聊天不下棋的时候。这时候，季羨林便凭窗向外看去。万

里旅途上，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的大森林，无边无际，与无垠的宇宙连为一体。

有一次，列车在森林深处的一个车站短暂停留，季羨林下了车，走到站台。一个农民提着一篮子大松果，松果是那么大，那么可爱，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松果，拿出5角钱的美元，买了一个。这是他在西伯利亚第一次买东西，也是最后的一次。

火车驶经贝加尔湖之时，给季羨林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火车要绕行这个湖一多半，山洞一个接一个，也不知到底钻了多少个山洞，隧洞顶上的山，丛林密布，一绿到顶。往下看，贝加尔湖就在眼下，从车窗外看去，湖水一碧到边。靠岸处湖水清澈见底，越往深处，水越发碧绿，湖心则近乎黑色了，湖水深不可测。他从来没看到这么大的湖，感到真是天下奇景。

经过整整八天不间断的长途旅行，或聊天，或下棋，或观风景，终于结束了这万里旅途的第一个大阶段。

5. 红都停泊

9月12日，晚间，季羨林一行所乘的火车到了莫斯科。按照规定，列车在这里要停上一两天，据说，是为了让从资本主义国家来的人能有一个机会，领略一下社会主义的风采，沾染上一点社会主义的甘露，给他们洗一洗脑筋，如果能转变一下世界观，当然好，若不能，即使在灰色上涂上一点红也是好的。

季羨林当时的心态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和一般青年一样，红都不是没有吸引力，另一方面，他认为外蒙古“独立”，与苏联有关，他对此很不理解，沿途的经历也没有留下什么太好的印象。所以，要停一两天，那就随大流看一看吧。

但是，在红都的第一瞥，却使季羨林大吃一惊。他们下车后，接着来了一个导游小姐，她年轻貌美，白皙的脸庞，修长的身材，穿着

华贵而时髦，涂着口红，染着指甲，一身珠光宝气。季羨林看着这位搔首弄姿的苏联女郎，他大惑不解，这样的一位小姐，到底是无产阶级的呢，还是资产阶级的呢？

就是这位导游小姐，把季羨林这一批外国旅客送上大轿车，到莫斯科市内观光。导游小姐的解说，神色冷漠，脸含冰霜，毫无表情。市内的几处景点，几乎都没留下什么印象。

参观中印象最深的是，前沙皇大臣的一座官邸，当时作了苏联国家旅游总局的招待所。这里大理石铺地，大理石砌墙，大理石圆柱，厅内五光十色，金碧辉煌，天花板上悬挂着一个玻璃大吊灯，至少有十米长。工作人员多是年轻貌美的女郎，个个唇红齿白，十指纤纤，指尖上闪着红光，珠光宝气，气度非凡。从荒寒的西伯利亚，一下子进入这么一个富丽堂皇的官邸，仿佛置身于一个神话世界，甚至有点像太虚幻境了。

参观完莫斯科市容，几个中国留学生受到中国驻莫斯科使馆一位清华老学长谢子敦的邀请，到一家餐馆去吃饭。

这家饭店也十分豪华，我生平第一次品尝到俄国名贵的鱼子酱。其他菜肴也都精美无比。特别是我们这一群在火车上啃了八天干“裂巴”的年轻人，见了这样的好饭，简直像饿鬼扑食一般，开怀畅吃，我们究竟吃了多少，谁也没去注意。反正这是我一生最精美、最难忘的一餐，足可以载入史册了。饭后算账，共付三百卢布，约二百美元。我们都非常感激这位老同学谢子敦先生。[10]

车上的其他外国旅客，包括那位“开开水”老太太和在满洲里海关向季羨林示意的老头，也都自己去找地方吃了饭。老头神秘而狡猾地告诉季羨林：他们去吃了一顿非常精美而又非常便宜的饭。原来，他们在哈尔滨的黑市，用美元换了卢布，比官价低十几倍，结果是用八个美元换来的卢布，就可以美美地“撮”上一顿，这些人真是旅行的老油子，神通广大，无孔不入。

晚上，列车不知不觉地又开动了。

6. 波兰女孩

9月13日，下午，列车行驶至苏联与波兰接界的斯托尔朴塞。在这里，要换乘波兰火车。

火车在波兰境内行驶，上车下车的短途旅客，几乎都是波兰人。

季羨林对波兰人的印象，似乎比苏联人好些。他们衣着华丽，态度比较活泼，大多数人都有相当高的外语水平，能讲俄语、德语，少数人还能讲点英语。

车厢里十分热闹，波兰人对中国人也很感兴趣。中国留学生们便同波兰人或用德语，或用英语交谈起来。

不知不觉之中，一个波兰女孩悄没声息地进了车厢，找到一个座位，大大方方坦然地坐了下来。这时候，列车快到华沙了，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

女孩的座位正对着季羨林。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圆圆的脸庞，淡红的双腮，圆圆的大眼睛。

女孩子瞪大了眼睛，把几个中国留学生轮流看了一遍。这在中国，简直是根本不可能的。几个中国男孩子仿佛是在老师面前背不出书来的小学生，低着头，没有一个人敢说什么。女孩脸上挂着一丝微笑，先开了口。她看出这些异邦青年不可能说波兰话，便用德文问他们会说哪一国话。留学生中有一半没学过德语，而季羨林虽然学到过，但也只是书本上的东西，现在有人问，也只好勉强说自己会说德文。谈话就这样开始了，这时候，他们还不能长篇大论地谈，还有意思都表达不出来的时候。这种时候，他们便相对一笑，在这一笑里，似乎也就了解了更多更深的东西。这让季羨林想起了一个笑话：一位国民党政府驻意大利大使，只会意大利文“这个”一个单词，竟然能指挥意大利仆人。如窗户开着的时候，他口里说“这个”，用手一指窗子，仆人立即把窗户关上。反之，窗子关着，他便说“这个”，仆人立即把窗子打开。一声“这个”，居然圆通无碍，超过佛法百倍。

了。在这个波兰女孩面前，季羨林才真正感到了语言的重要，而在语言不能表达的时候，眼神会更超过言传。

这样，就和这个女孩混熟了，他们拿出一些从哈尔滨买的饮料给女孩喝，女孩则拿出自己带的饼干分给他们吃，还拿出皮包里带的许多相片，一张一张地指给他们看。他们也把自己的书籍画片，甚至毕业证书，都拿给她看。又吃，又喝，又聊天，几乎忘记了是在火车上。在融融的欢悦中，他们知道了她的名字 Wala，同行的谢家泽，立即“哇啦！哇啦！”地叫个不停。女孩则有点摸不着头脑，圆睁双眼，惊疑不定地瞪着小谢。

这时候，一个坐在季羨林旁边的大鼻子中年人也来凑热闹。季羨林一生还没有看到过这样大的鼻子，他耳朵上戴着无线电收音机耳机，衬上这生在脸正中的一块大肉，凑成一幅奇异的图画，使这大鼻子仿佛有了魔力。大鼻子说着破碎的英语，一手指着自己的头，一手指着 Wala，头摇了两摇，脸上显出一丝鄙夷的神情。季羨林这才发现，波兰女孩的头上，戴着一顶红红绿绿的小帽子。

对这个女孩，季羨林虽然是邂逅相遇，但印象之深，却使他永远难忘。他在六年后写的一篇散文里说道：

我现在已经忆不起来，我们怎样分的手。大概是我们，最少是我，坐着朦朦胧胧地睡了会儿，其间 Wala 就下了车。我当时醒了后确曾觉得非常惋惜，我们竟连一声再会都没能说，这女孩子就像神龙似地去了。我仿佛看了一个夏夜的流星。[11]

对一个漂亮女孩，那个大鼻子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一丝鄙夷的微笑，季羨林当时怎么也不理解，他不知道，这个大鼻子为何会讨厌这一顶同秀美的面孔相得益彰的小帽子。

实际上，这是一顶犹太人习惯戴的小帽子。在德国，统治上层的民族歧视是非常厉害的。在希特勒这个法西斯头子的《我的奋斗》里，犹太人和中国人都被定格为劣等民族。

到这样一个民族歧视的国度里，黄皮肤的季羨林，会不会遭到

与这位波兰女孩同样被人鄙视的命运呢？

二、从柏林到小城哥廷根

1. 柏林小住

1935年9月14日早晨四点，列车进入德国境内。八点，到达柏林。长达十几天的旅途才告一段落，但这里是不是在德国的留学地，还不能最后决定。

初到柏林，一出车站，便感到头脑里面有点朦朦胧胧的。脚下踩着光滑的柏油路面，但季羨林却感到是踩在棉花上。他的心情极为复杂。

我心里的感觉是异常复杂的，既有兴奋，又有好奇；既有兴会淋漓，又有忐忑不安。从当时不算太发达的中国，一下子来到这里，置身于高耸的楼房之中，漫步于宽敞的长街之上，自己宛如大海中的一滴水。[12]

自己是乡下人，没有见过多大的世面；乡下人的固执与畏怯也还保留了一部分。……眼前飞动着汽车电车的影子，天空里交织着电线，大街小巷错综交叉着：这一切织成了一幅有魔力的网，我便深深地陷在这网里。我惘然地跟着别人走，我简直像在一片茫无涯际的大海里摸索了。[13]

多亏了清华老同学赵九章等人，到车站接了他们，为他们办理了一切应办的手续，避免了不少麻烦。这样有人帮忙，马大哈敦福堂还是表演了一次：丢护照，走出车站在裤兜里又找到了。

他们先在康德大街彼得公寓安顿好行李物品，清华老同学又带他们到中国饭店去吃饭。店主是中国北方人，女主人是意大利人。俩人的德语都不怎么样，但是服务却极为热情周到，蒸出来的馒头又白又大，菜也炒得很好，价钱又不算贵。没想到在这里吃上又白又大的中

国馒头。不，应该说是吃到家乡山东的馒头。

馒头这种东西，在古代是称“蒸饼”的，起初并不发酵，后来有了发酵技术，改名为“起胶”。《南齐书》中则称“面起饼”，宋代程大昌《演繁露》解释说：“入酵面中，令松松然也。”这就是“馒头”，连“馒头”一词，也还是山东老乡诸葛亮首先使用的，这一点在宋代高承的《事物纪原》里已经肯定了。

而其他中国留学生感兴趣的，则是另一个问题：店主人夫妇不懂彼此的语言，他们如何交流思想？难道也是用“这个”词，就能涵盖宇宙、包罗天地吗？

吃完饭，当务之急是找住处。又是清华老同学帮忙，这一次不是赵九章，而是汪殿华和他的德国太太。他们帮季羨林在夏洛滕堡区的魏玛大街，租了房东罗斯瑙的一间房子。房东看样子是个犹太人，可能是个二分之一犹太人，即父母双方有一方是犹太人。

初步接触，季羨林对德国普通人的印象相当好。

德国人是非常务实而又简朴的人民。他们不管是干什么的，一般说来，房子都十分宽敞，有卧室、起居室、客厅、厨房、厕所，有的还有一间客房。在这些房间之外，如果还有余房，则往往出租给外地的或外国的大学生，连待遇优厚的大学教授也不例外。出租的方式非常奇特，不是出租空房间，而是出租房里的一切东西，桌椅沙发不在话下，连床上的被褥也包括在里面，租赁者不需要带任何行李，面巾、浴巾等等，都不需要。房间里的所有的服务工作，铺床叠被，给地板扫除打蜡，都由女主人包办。房客的皮鞋，睡觉前脱下来，放在房门外面，第二天一起床，女主人已经把鞋擦得闪光锃亮了。这些工作，教授夫人都要亲自下手，她们丝毫也没有什么下贱的感觉。德国人之爱清洁，闻名天下。女主人每天一个上午都在忙忙掇掇，擦这擦那，自己屋子里面不必说了，连外面的楼道，都天天打蜡；楼外的人行道，不但打扫，而且打上肥皂来洗刷。室内室外，楼内楼外，任何地方，都是洁无纤尘。[14]

德国人总的来说是很可爱的，很淳朴老实的，他们毫无油滑之气，有时候看起来甚至有些笨手笨脚，呆头呆脑。[15]

至于法西斯政权，季羨林在国内已有耳闻，蒋廷黻的嘱咐不时在提醒自己，谨言慎行，小心为妙。希特勒 1933 年上台，到季羨林初到柏林时，虽然纳粹味还不到顶点，但希特勒的像片已到处悬挂了，“卐”字旗也随处可见，人们见面的问候，由“早安！”“日安！”“晚安！”改为喊“希特勒万岁！”便表示了一切。这对中国人来说，是极难习惯的。中国留学生，还是一仍旧惯，见面时问候“早安”等，分别时则说“再见”。在德国法西斯政权的政治学民族学词典里，犹太人与中国人都被认作劣等民族。

2. 趣话和洋相

季羨林初来乍到，就如同初进大观园的刘姥姥，晕头转向，分不出东西南北，为此而留下一桩趣闻。

9 月 17 日，是到达柏林之后的第二天，一位“老柏林”中国朋友陪季羨林，从魏玛大街的住处出发去修表。这只表是在出国前下了好大的决心才买下的，在火车到波苏交界处的斯托尔朴塞的时候，因为要换乘火车，搬运行李时，表玻璃被撞碎了。他要找一个表铺去换上玻璃。

他迷惘地跟着老柏林走，仍然有一幅充满了魔力的网笼罩着他的全身。到了康德街，终于找到了一家表铺，说明了要换一个玻璃罩。表匠老头给了一张收条，他也没看，心想反正上面会有表铺的名字和地址，只要有名字和地址，就可以把表拿回去。

9 月 18 日，按约定的时间去取表。季羨林不愿再让老柏林陪着去，他怕麻烦人。拿出那张取表的收条一看，糟了，上面只印着收到一只修理的表，表铺名字没有，当然更没有地址。他迷惑了，只好本能地沿康德街左面走去，他模糊地记得，表铺是在街的左边。结果长

长的康德街从这头走到那头，没有找到表铺，只好再折回来找，终于在一大堆招牌里，找到了一家表铺。表匠也是一位老头，收了纸条，找了半天，表没有找到，用手搔着发亮的头皮，显出非常焦急的样子。额头上冒着汗珠，透过眼镜看着季羨林，对他说：“你明天再来一趟吧，太太或许知道在什么地方，她现在不在家。”随手拿过一支铅笔，把表铺的地址写在上面。

第二天上午，季羨林按约定的时间找到这家表铺，老头不在，太太忙着找表。她拉开每一个抽屉，每一个橱子，把每一个纸包全打开了，甚至屋子里的旮旯晃晃，也都打开电灯找了个遍，表还是没找到。她比老头还急，看着纸条上老头用铅笔写的字，表却找不到，她有点颤抖地对季羨林说，下午再来一趟吧。

下午，将近黄昏，季羨林又去取表。进了铺子，老头急，太太也急，每一个可能的地方都找了，还是没有找到。老头更用力地用手搔着发亮的头皮，太太的头也颤动得更为厉害。忽然，表匠老头灵光一闪，仔细地看了看收条，说：“这不是我的收条！这张是白的，我的收条是绿的，比你这张要大一倍。”季羨林这才知道自己找错了铺子。他只有道歉。老头让他到西边不远的一家表铺去问问，结果还是没找到那块属于自己的表。他迷惑了。

我不知道柏林究竟有多大；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在柏林的哪一部分。柏林是大海，我正在这大海里飘浮着，找一个比我自己还要渺小的表。我终于下意识地走到我那位在柏林住过两年的朋友的家里去，把两天来找表的经过说给他；他显出很怀疑的神气，立刻领我出来，到康德街西半的一个表铺里去。离我刚才去过的那个铺子最少有二里路。拿出了收条，立刻把表领出来。一拿到表，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感觉，我仿佛亲手捉到一个奇迹。我又沿了康德街走回家去。当我想到两天来演的这一幕小小的喜剧，想到那位诚挚的老头用手搔着发亮的头皮的神气的时候，对了这大海似的柏林，我自己笑起来了。[16]

这是季羨林初到柏林留在那里的一件趣闻。

季羨林在柏林还出过一些小洋相。有一次，他去买香肠。因为听说德国人每天只吃一顿热餐，是中午，晚饭则只吃面包和香肠、干奶酪等，佐之以热茶。他要适应德国人的生活方式，便去肉食店里买了点香肠，准备回家去吃晚饭。晚上，泡了一壶红茶，准备美美地吃上一顿。可一咬香肠，觉得味道不对，原来香肠里面的肉全是生的。季羨林像受了侮辱，在心里忿忿不平地说：“德国人竟这样戏弄外国人，简直太不像话了，真正岂有此理！”晚上做梦，他都觉得咽不下这口气。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气冲冲地去了那个肉食店，去要个说法。一个女店员，笑嘻嘻地听着他的申诉，起初默不作声，最后竟大笑起来。笑完之后，她告诉他：“在德国，火腿都是生吃的，有时连肉也生吃，而且只有最好最新鲜的肉，才能生吃。”季羨林这才恍然大悟，在心里骂自己是个“阿木林”（上海话“傻瓜”）。这是他自己出的一次洋相。

他还看到其他留学生出的洋相。

柏林不乏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的子女，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冯玉祥、戴传贤、居正，都有子女或亲属在柏林“镀金”。其中有学习的，但大多数纨绔子弟都不务正业。这里有吃，有喝，有玩，有乐，不用上学听课，也能“镀金”。有一部分学生，竟然只会四句德语，而且是最简单的几个字，就足够几年之用。他们的这四句话是在如此情况下说的：

早晨起来，见到房东，说一声“早安！”就甩手离家，到一个中国饭馆里，洗脸，吃早点，然后打上几圈麻将，就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午饭后，相约出游。晚饭时回到饭馆。深夜回家，见到房东，说一声“晚安”，一天就过去了。再学上一句“谢谢！”加上一句“再见！”语言之功毕矣。[17]

这样的纨绔子弟虽然不是全部，但确有人在。而且还有一些人，一点修养也没有。他们是荒唐和低能的代表。

我自己在欧洲的一个大国里住过十年，一个大国里住过半年，也见到不少的事情。初到那个大国的首都的时候，天天在街上、饭馆里遇到的就是这些纨绔子弟，每个人都是把眼睛安置在头顶上，上下打磨得耀眼明亮，成群结队，招摇过市。没有人知道他们究竟念哪一门学科，因为他们很少与学校发生关系。但他们的生活也并非不紧张。每天一起来就到中国饭馆去。吃完早点，找几个同志下一盘棋，闲谈一下，就到了正午。午饭当然就地解决。吃完又结队出去逛马路看电影。晚饭再回中国饭馆，吃完又出去看戏坐咖啡馆或到其他他们所想去的地方。每人都少不了三“机”：照相机、无线电收音机和野鸡。外国文很少有几个通的，但也用不着。因为他们所接触的外国人大概只有两种，一种是不三不四的女人。同他们在一起嘴还有更重要的用处，不是用来说话的。再一种是警察。这些英雄们贩卖黑钱或犯了其他别的罪，倘若逢巧父亲是大使，自然可以大模大样地掏出红护照来吓外国警察。其余的就不免捉将官里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用不着说话，反正只要能听懂判多少年月徒刑就可以坦然走进监狱里去。等到出来的时候，又可以到处尤其是在中国饭馆里高谈雄辩，叙述他们在狱里的丰功伟绩。据说在里面每人必须作手工，编点什么。他们只学上几天，就可以教同狱的外国难友。这些外国人当然钦佩得五体投地。这样他们就很替中国争了些面子。旁人听了对这些为国争光的英雄也不免肃然起敬了。

这样说也许有人以为太笼统了。我现在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一位院长的公子。我到了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很久了。至于在那个大会里做了些什么，我不大清楚。但以后我们竟然得到一个机会同学过半年。我们差不多天天在一起吃午饭；但一直到他离开学校，我始终不知道他学哪一科。从他的谈话里我知道他听过耶稣教的神学，听过体育原理，听过微积分，听过流体力学，听过生理学，听过法律，对这些他似乎都没有什么兴趣。他念念不忘的只是医学院的产科讲演。他常常向我用很生动的姿态表演他在课堂上听到的女人生产时的情

形。同时复述教授的一句话：“男人无论如何英雄，无论能征服多少国家，也没有女人生产时那种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力量。”于是他也就对女人的伟大赞不绝口起来。但他也有他的伟大，在街上只要看到漂亮女人，便跟上去，百折不挠。挨了耳光，仍然是面不改色，不由得也让我赞叹起来。

第二个是一个上海大商人的儿子。据说从小就学那一国的语言。我到了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住了八年。有一次替一位中国老太太写一封请求信，拿到财政局，外国人说看不懂。这位老太太拿给我看，我才知道他替我们当时住的那一国造了一种新文字。后来他又从另外一个国度寄给她一个中文（记住是中文）明信片，老太太年纪大了，有些字认不清楚，又拿给我看。我又发现他替我们中国造了几个新字，创了一个新文法。他虽然学的是航空工程，但小代数和平面几何都弄不清楚。外国同学都奇怪，他就告诉他们，中国的逻辑和外国不同，数学也另成一个系统。这位先生在那里住了十几年，一天忽动归兴，临走告诉我，他回国要“组织”飞机。我用十二分的虔诚祝他成功，虽然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什么是“组织”飞机。

上面两个例子，一个代表荒唐，一个代表低能。作风虽不同，但总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各擅胜场。类似这样的英雄我最少也还能举几十位来。我虽然不久就离开那大都会，无缘继续欣赏他们的伟业。但在下风遑听之余留在脑海里的故事也足够写一本四百万言的留西外史。无论谁都可以想象到这些人们在外国替我们国家招多少耻辱。在外国浪费金钱还是小事。[18]

有一次，季羨林与乔冠华去一家中国饭馆吃饭。一进饭馆门，中国留学生们高声说话的声音，吸溜呼噜喝汤的声音，吃饭呱唧嘴的声音，刀叉碰盘子的声音，汇成了一个大合奏，其势如暴风骤雨，迎面扑来。

我仿佛又回到了中国。欧洲人吃饭，都是异常安静的，有时甚至正襟危坐，喝汤决不许出声，吃饭呱唧嘴更是大忌。我不说，这是天

经地义；但是总能给人以文明的印象，未可厚非。我们的留学生把祖国的这一份国粹，带到了万里之外，无论如何，也让人觉得不舒服。再看一看一些国民党的“衙内”们那种狂傲自大、惟我独尊的神态，听一听他们谈话的内容：吃、喝、玩、乐、甚至玩女人，嫖娼妓等等。像我们这样的乡下人实在有点受不了。他们眼眶里根本没有像我同乔冠华这样的穷学生。然而我们眼眶里又何尝有这一批卑鄙齷齪的纨绔子弟呢？我们从此再没有进这里中国饭馆的门。[19]

在这样的留学生面前，季羨林感到他们不是像样的“人”，他不愿意看到他们那一脸满不在乎的神气。

3. 强化口语训练

纨绔子弟的表现，使季羨林感到厌恶，他不愿意看到他们一脸满不在乎的神气，更不屑于和他们为伍。

他在柏林最知心的留学生朋友，是乔冠华。在校时，他们不很熟悉，但季羨林常看到乔冠华腋下夹一册又厚又大的德文版《黑格尔全集》，昂首阔步，旁若无人，徜徉于清华园中。为了赴德留学，他们熟了起来，到了柏林，更是天天在一起，几乎形影不离。

季羨林在清华学了四年德语，得了八个优，但没有学到多少口语，乔冠华主修的哲学，更需要提高德语。因此，他们必须补习德语，强化口语训练。柏林远东协会的林德和罗哈尔博士，帮助他们参加了柏林大学外国留学生德语班最高班。乔冠华也取得了这个班的口语训练资格。从此，他们便成了柏林大学的学生，每天季羨林同乔冠华一起乘城内火车到大学去上课。上课时，也同乔冠华在一起。

德语教授叫赫姆，季羨林感到他是最好的德语教师，发音之清晰，讲解之透彻，简直达到了神妙的程度。他虽然是第一次听德语讲课，但是没有一句听不懂，他感到不是自己听力强，而是赫姆说得实在是太清楚了。

上课之外，吃饭、访友、玩、逛动物园，季羨林总是与乔冠华在一起。更重要的是，他们俩人都是书呆子，喜欢书，念念不忘逛旧书铺，去买了不少好书。他非常尊重乔冠华，认为他颇有才气，有一些古典文学的修养。因此，他喜欢与乔冠华交谈，谈得很投机，有时候在乔冠华那里一谈谈到深夜，有几次就睡在乔冠华那里。

一个多月的时间，强化口语训练结束了。这之后，是选择研究生就读的学校。一开始，德国学术交换处的魏娜想把他派到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大学去，那是德国古典哲学家任教授的学校，十分令人神往。但这个学校离柏林太远，太偏僻，季羨林人地生疏，表示不愿意去。磋商的结果，是派他到哥廷根大学去。

这时候，正好遇到从哥廷根来柏林办事的清华老学长乐森璁先生，从他口里了解到哥廷根大学的情况，大有耳聪目明之感。他庆幸自己就要离开自己不喜欢的柏林，尤其离开那些自己不喜欢的成群结队的中国留学生。

4. 小城哥廷根

到1935年10月31日，季羨林在柏林已经小住了一个半月。这一天，他告别了柏林，来到了以风景和学术闻名于世的小城哥廷根。他原准备在这里住上两年，可后来由于二战的阻隔，他一住就是十年。

哥廷根是一座小城，小到只有十万人。可在这十万人中，流转移的外地外国大学生，有时竟多达二三万人，因此它又是一个有名的大学城。

哥廷根大学始建于1737年，已有二百年历史。这个大学是欧洲也是世界最有名的大学之一。1772年，该大学的一批学生创立了德国感伤时代（1740—1780）最著名的一个文艺团体——哥廷根林苑派。F. 格蒂列布·克洛卜施托克的诗《山丘与林苑》，使该派得名

为林苑派。林苑比喻德国吟游诗人的住所，而山丘则为希腊帕纳斯山诗人之家。该派诗人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使诗歌摆脱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和社会成规的羁绊，试图使诗歌免受外国的尤其是法国的诗歌的影响，有爱国的、虔诚的和合乎道德的理想。18 世纪后期，该大学成为德国浪漫主义先驱的诗人们集会的中心。1837 年，该校有七位教授涉嫌政治运动而被开除，使学校声誉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到 19 世纪后期，该大学数学研究所几乎吸引了全世界的学生。20 世纪，该校物理系好几名教师都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现代物理学方面有许多重要的发现。

季羨林到达哥廷根时，这个大学共有五个学院：哲学院、理学院、法学院、神学院、医学院。全校没有一座统一的建筑，没有一座统一的大楼。各学院分布在全城的各个角落，研究所则更为分散，许多大街甚至小巷，都有它的研究所。

学生宿舍更为分散，没有集中的居住所在。小部分学生，住在各自的学生会中，绝大部分则分住在普通市民家中。

学校行政中心叫 Aula，楼上是哥廷根科学院，楼下是教学和行政部门。文科上课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大讲堂，一个是研究班大楼。

德国学术史和文化史上许多显赫的名字，都与这所大学有关。用他们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到处都是。当时数学家高斯（Gauss），大卫·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化学家 A. 温道斯，都在这所学校任教，后者还是诺贝尔物理学奖金得主。文科方面，格林兄弟就曾在哥廷根大学工作，他们的童话流行全世界。他们的大字典，也是德国语言研究中的大事。至于社会科学领域，也不乏学界泰斗，其中有几位后来成为季羨林的业师。

这样的一座小城，使人一进入就会感到洋溢全城的文化学术气氛，仿佛是一个学术乐园、文化净土。

可以说，季羨林对哥廷根城的印象，是相当好的。

哥廷根素以风景秀丽闻名全德。东面山林密布，一年四季，绿草如茵。即使冬天下了雪，绿草埋在白雪下，依然翠绿如春。此地，冬天不冷，夏天不热，从来没遇到过大风。既无扇子，也无蚊帐，苍蝇、蚊子成了稀有之物。跳蚤、臭虫更是闻所未闻。街道洁净得邪性，你躺在马路上打滚，决不会沾上一点尘土。家家的老太婆用肥皂刷洗人行道，已成为家常便饭。在城区中心，房子都是中世纪的建筑，至少四五层。人们置身其中，仿佛回到了中世纪去。古代的城墙仍然保留着，上面长满了参天的橡树。我在清华念书时，喜欢读德国短命抒情诗人薛德林（Hölderlin）的诗歌，他似乎非常喜欢橡树，诗中经常提到它。可是我始终不知道，橡树是什么样子。今天于无意中遇之，喜不自胜。此后，我常常到古城墙上来散步，在橡树的浓荫里，四面寂无人声，我一个人静坐沉思，成为哥廷根十年生活中最有诗意的一件事，至今忆念难忘。[20]

但也有一件事，使季羨林发现了中、德两种文化背景的差异。在中国，“大欺小，不公道”，大孩子不欺侮小孩子，一旦发生，会有人打抱不平。而在德国则不然。季羨林到哥廷根不几天，就遇到这件事：

我到德国以后，不久就定居在一个小城里，住在一座临街的三层楼上。街上平常很寂静，几乎一点声音都没有，只有一排树寂寞地站在那里。但有一天的下午，下面街上却有了骚动。我从窗子里往下一看，原来是两个孩子在打架。一个大约有十四五岁，另外一个顶多也不过八九岁，两个孩子平立着，小孩子的头只达到大孩子的胸部。无论谁也一看就知道，这两个孩子真是势力悬殊，不是对手。果然刚一交手，小孩子已经被打倒在地上，大孩子就骑在他身上，前面是一团散乱的金发，背后是两只舞动着的穿了短裤的腿，大孩子的身躯仿佛一座山似的镇在中间。清脆的手掌打到脸上的声音就拂过繁茂的树枝飘上楼来。

几分钟后，大孩子似乎打得疲倦了，就站了起来，小孩子也随着

站起来。大孩子忽然放声大笑，这当然是胜利的笑声。但小孩子也不甘示弱，他也大笑起来，笑声超过了大孩子。这似乎又伤了大孩子的自尊心，跳上去，一把抓住小孩子的金发，把他按在地上，自己又骑在他身上。面前仍然又是一团散乱的金发，背后是两只舞动的腿。清脆的手掌打到脸上的声音又拂过繁茂的树枝飘上楼来。

这时观众愈来愈多，大半都是大人，有的把自行车放在路边也来观战，战场四周围满了人。但却没有一个人来劝解。等大孩子第二次站起来再放声大笑的时候，小孩子虽然还勉强奉陪；但眼睛里却已经充满了泪。他仿佛是一只遇到狼的小羊，用哀求的目光看周围的人；但看到的却是一张张含有轻蔑讥讽的脸。他知道从他们那里绝对得不到援助了。抬头猛然看到一辆自行车上有打气的铁管，他跑过去，把铁管抡在手里，预备回来再战。但在这时候却有见义勇为的人们出来干涉了。他们从他手里把铁管夺走，把他申斥了一顿，说他没有勇气，大孩子手里没有武器，他也不许用。结果他又被大孩子按在地上。

我开头就注意到住在对面的一位胖太太在用水擦窗子上的玻璃。大战剧烈的时候，我就把她忘记了。其间她做了些什么事情，我根本没看到。等小孩子第三次被按到地上，我正在注视着抓在大孩子手里的小孩子的散乱的金发和在大孩子背后舞动着的双腿，蓦地有一条白光从对面窗子里流出来，我连吃惊都没来得及，再一看，两个孩子身上已经满了水，观众也有的沾了光。大孩子立刻就起来，抖掉身上的水，小孩子也跟着爬起来，用手不停地摸头，想把水挤出来。大孩子笑了两声，小孩子也放声狂笑。观众也都大笑着，走散了。[21]

5. 房东欧朴尔夫妇

哥廷根是季羨林德国留学的最后归宿。他初来哥廷根，在柏林出差先期回到哥廷根的清华老学长乐森璿先生又到车站去接他，给他安

排好了住房，是在一座临街的三层楼上。

季羨林在哥廷根的房东是欧朴尔夫妇。欧朴尔先生是市政府的一个工程师，一个典型的德国人，忠厚老实，少言寡语。他的腿有点瘸，即使拄着手杖，走路也显得吃力。欧朴尔夫人五十岁上下，是一个平平常常典型的德国家庭妇女。她虽然受过中等教育，能欣赏德国文学作品和古典音乐，但趣味显然有些保守，不能容忍爵士乐这种20世纪初在美国新产生的舞曲音乐。一提到它，就满脸鄙夷，冷笑不止。她没有太多的惹人注意的地方，相貌平平常常，衣着平平常常，谈吐平平常常，爱好平平常常，是一个非常平常的普通妇女。

相处时间久了，季羨林觉得她平常中又有不平常之处，她老实，她诚恳，她善良，她和蔼，她不会吹嘘，她不会撒谎，她一切都坦露在外。因此，同她相处，不必费心机，不必设提防，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使人如处和暖的春风之中。

女房东有时候又很固执，甚至有点偏执。有一次，她新买了一顶帽子。她有一个最好的女友，是个寡妇。这个女人见到她买的这顶帽子，喜欢得不得了，也想照样去买上一顶。女房东就大为不满，在季羨林面前讲了许多她对这位女友不满意的牢骚话。原来西欧的一些妇女，有时候男人也一样，绝对不允许别的人戴与自己相同的帽子，穿与自己相同的衣服，这显然是中世纪贵族人物的习惯，而到了现代，却成了普通小市民的习气了。

老夫妇俩只有一个儿子，在外地的一个城市上大学，他住的房间就空出来了，季羨林被安排住在他的房间里，是在三楼上。

欧朴尔夫人每天一早起来，先做好早点，一份给丈夫，让他吃了去上班，另一份给季羨林，让他吃了去上学。然后，她就无休无止地擦地板，擦楼道，也擦大门外面马路旁边的人行道。她那份认真的态度，真让人啧啧称叹，她不仅天天为地板和楼道打蜡，打磨得油光锃亮，而且还用肥皂水冲洗楼门外的人行道，把人行道清洗得纤尘不染。

这样一个家庭，非常和睦。丈夫非常忠厚老实，腿的毛病，让他走路一瘸一拐。可他不辞辛劳，天天去上班。

季羨林在这里还保持中国老习惯，一日三餐。早点在家里吃，一壶茶，两片面包。午饭在外面饭馆里吃，或在学生食堂里吃，晚上吃欧朴尔夫人中午为他留下来的热餐。

其他一切，女房东家里都应有尽有。许多杂活，如洗衣服、洗床单、铺被子、叠被子、准备洗澡水等等，都是由欧朴尔夫人操持。她就像慈母一样对待这个异国青年，拿爱自己儿子的心来爱他。这就使他感到自己好像在家里一样，但他的心情，却怎么也不像在自己的家里。他在到达哥廷根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1日的日记里，写下了他的这种复杂心情。

终于又来到哥廷根了。这以后，在不安定的漂泊生活里会有一段比较长一点的安定的生活。我平常是喜欢做梦的，而且我还自己把梦涂上种种的彩色。最初我做到德国来的梦，德国是我的天堂，是我的理想国。我幻想德国有金黄色的阳光，有 Wahrheit（真），有 Schönheit（美）。我终于把梦捉住了，我到了德国。然而得到的是失望和空虚。我的一切希望都泡影似地幻化了去。然而，立刻又有新的梦浮起来。我梦想，我在哥廷根，在这比较长一点的安定的生活里，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现在又终于到了哥廷根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梦。其实又有谁能知道呢？[22]

事实上，女房东越像慈母般关怀他，他越感到自己六岁就离开母亲的凄楚，就越是激起他的思母情结，梦中常梦见自己可怜的早逝的母亲。

季羨林在到哥廷根后半个月，在11月18日的日记里写道：

从好几天以前，房东太太就向我说，她的儿子今天从学校回家来，她高兴得不得了。……但儿子只是不来，她的神色有点沮丧。她又说，晚上还有一趟车，说不定他会来的。我看了她的神气，想到自

己的在故乡地下卧着的母亲，我真想哭！我现在才知道，古今中外的母亲都是一样的！[23]

两天后的日记又写道：

我现在还真是想家，想故国，想故国里的朋友。我有时想得不能忍耐。[24]

在1936年7月11日，他将自己的这种思母情结写成一篇《寻梦》的散文，开头一段是：

夜里梦到母亲，我哭着醒来。醒来再想捉住这梦的时候，梦却早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25]

最后一段是：

天哪！连一个清清楚楚的梦都不给我吗？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26]

这时候，在他思母情结最难解难分的时候，他心里总是想起临清老家对门宁大婶告诉他母亲生前常说过的的一句话：早知道这孩子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真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离开了故乡，离开了母亲，成了他永远不能追回的“悔”。

6. 初识章用

乐森璿先生真是一个难得的好心人，他不仅到车站去接季羨林，为他安排住处，找到了一个欧朴尔夫妇这样的好房东，还为季羨林介绍了一个后来成为挚友的章用。

到达哥廷根以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935年11月1日，季羨林在哥廷根的街上闲逛。他觉得这条街特别长，太阳也特别亮，一切都沉浸在一片白光里。风景虽然很优美，但季羨林却有一种非常孤独的感觉。

乐森璿好像感觉到了这一点，看出了他的心事。过了几天，他便带着季羨林，也在这样的金色阳光里，走过长长的哥廷根街道去拜访

章用。

章用，字俊之，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党政府的教育总长，号称“老虎总长”的章士钊之子，其外祖父是在朝鲜统兵抗日的民族英雄吴长庆，母亲则是做过孙中山先生秘书的吴弱男。其名字已见于钱基博先生的《现代中国文学史》。

这样的一个章用，虽是世家大族之子，出身于书香门第，但却与一班“衙内”们不同，不仅一点纨绔习气都没有，而且还满身的书卷气，孤高自赏。他来哥廷根是攻读数学博士学位的，但已住了五六年，学位却还没有拿到。因为他有家学渊源，所以对中国古典文献也有深湛的造诣，善古文，能作旧体诗词。

穿过长街，他们来到了章用租住的一座小楼。小楼四周全是花园，但此时已落叶满地，树头上还残留着几片残叶，在秋风中却显得孤单而凄清。上了二楼，乐森璿介绍季羨林认识了章用，没想到初识章用，一见定交，以后成了最好的朋友。

季羨林从小也喜欢杂学，读过不少中国古典诗词，有许多都能倒背成诵，而且还对文学、艺术、宗教有自己的一套看法，所以他们一见如故，情投意合。

在这次拜访中，季羨林还认识了章用的母亲吴弱男女士。章伯母说话挺多，为了照顾儿子，她撇家舍业，来到几万里之外的这座小城，一住就是五六年。对此，季羨林感触最深。

只是这一件，就足以打动了天下失掉了母亲的孩子们的心，让他们在无人处流泪，何况我又是这样多愁善感？更何况还是在这异邦的深秋呢？我因而常常想到在故乡里萋萋的秋草下长眠的母亲，到俊之家里去的次数也就多起来。[27]

这之后，他们俩人便经常来往，感到彼此谁也离不开谁了。

他们经常相约去哥廷根城东面的一片山林去散步。哥廷根的秋天非常美，这片山林如同是一幅未来派画家的画，抬眼就可以看到一片耀眼的绚烂。只说黄颜色，就分不清到底有多少等级，从淡黄一直到

接近棕色的深黄，参参差差地抹在这片秋林的梢上，里面忽然这里杂一点冬青树的浓绿，忽然那里再点缀上一星星的鲜红，使这惨淡的秋色带上了一片凄艳。

就在这片山林里，他们热烈地谈论哲学、宗教上的问题，但谈来谈去，话题总要转到中国旧诗上。章用说话不多，总愿意静静地听季羨林滔滔不绝地说，脸上浮起一片神秘的微笑，目光总要从眼镜上边流出来，注视着眼前的空虚处。每次聚谈，章用总是这个样子。

平常经常在一起论诗，章用有时也喜欢把自己写的旧体诗给季羨林看。有一首诗，其中两句是：

频梦春池添秀句，

每闻夜雨忆联床。

是章用为他俩的聚谈诗歌有感而发的。

还有一首诗，把季羨林称为“诗伯”，这首诗是写在一张硬纸片上，装在一个黄色的信封里交给季羨林的。

空谷足音一识君

相期诗伯苦相薰

体裁新旧同尝试

胎息中西沐见闻

胸宿赋才徕物与

气嘘大笔发清芬

千金敝帚孰轻重

后世凭猜定小文

尽管季羨林自己说没有作过诗，但在济南上中学时就有“诗人”的绰号，这次章用也以“诗伯”相称，可见季羨林虽不写诗，但对诗歌总是有许多见解，正是这些见解，使他和章用成了知音。

有了这样一个知心朋友，季羨林在初到哥廷根之时，得到他不少热情的帮助。陪季羨林奔波全城的是他，到大学教务处的是他，到研究所的是他，到市政府的是他，到医生家里的是他，就连帮助注册选

课、办理入学手续的，也是他。

最后，甚至季羨林最终选择了梵语研究方向，也与章用有关。对这样一个章用，季羨林是感激不尽的。

1936年夏天，章用因为不堪留学费用，又不愿接受德国朋友的接济，不得不中辍学业回国。他先是在青岛山东大学担任了六年数学讲师，后又到浙江大学任教。抗战时期，随浙江大学到了江西，又从江西到香港去养病，最后死在香港。当季羨林知道了章用去世的消息时，心中的痛苦溢于言表：

我们相处一共不到一年。一直到离别还互相称作“先生”。在他没死以前，我不过觉得同他颇能谈得来，每次到一起都能得到点安慰，如此而已。然而他的死却给了我一个回忆沉思的机会，我蓦地发现，我已于无意之间损失了一个知己，一个真正的朋友。在这茫茫人世间究竟还有几个人能了解我呢？俊之无疑的是真正能够了解我的一个朋友。我无论发表什么意见，哪怕是极浅薄的呢，从他那里我都能得到共鸣的同情。但现在他竟离开这人世去了。我陡然觉得人世空虚起来。我站在人群里，只觉得自己的渺小和孤独，我仿佛失掉了倚靠似的，徘徊在寂寞的大空虚里。[28]

这样的一个章用，是季羨林永远也不能忘的。

三、主修梵文、巴利文

1. 又一次选择

哥廷根大学高手如林，各学科都有出类拔萃的教授，有的还是世界一流的学者。仅就季羨林兴趣比较大的语言学方面，这里的希腊文、拉丁文、斯拉夫文、阿拉伯文、梵文、巴利文，当然还有西欧各国的文字，都有水平相当高的教授。

一到哥廷根大学，季羨林就决意学习古代文字。但这种想法既朦

朦朦胧，又清清楚楚。朦朦胧胧的是，究竟要学习哪一种古文字，他自己并不清楚。清清楚楚的是，当年他在国内患“留学热”而留学一事还渺茫如蓬莱三山的时候，他立下大誓：如果能出国留学，他决不写有关中国的博士论文。因为鲁迅先生就看不起这种博士，鄙视有的中国留学生在外国用老子与庄子谋得了博士头衔，令洋人大吃一惊；然而回国后讲的却是康德、黑格尔。他鄙薄这种博士，决不想步他们的后尘。到哥廷根不久，他听说有一个学自然科学的中国留学生，想投机取巧，选汉学作自己的副系。口试时，汉语教授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杜甫同英国的莎士比亚，孰先孰后？这位留学生脱口便说：杜甫在后。他的逻辑大概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长达几千年，同屈原比起来，杜甫是偏后的，而英国的莎士比亚，却算是英国比较古的文学家，所以就有了这种回答。听了这样的回答，德国汉学教授说：“你落第了！下面的问题不需要再提了。”鉴于这些原因，无论是主系和副系，季羨林都不同中国学沾边。

季羨林直到晚年这种观点还是没有改变。他曾语重心长地对初学佉卢文的青年学者林梅村说过：“中国学术要发展，必须能直接与西方一流学者相抗衡。有些人在国人面前大谈希腊、罗马和苏格拉底，而在洋人面前讲《周易》，谈老庄。这不算什么本事。真本事，就应去和西方学者争论他们的学问，与国人讨论中国的学术。” [29]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久已有之的考虑，季羨林对到底选什么专业犯了难。在柏林的那一个多月，朋友汪殿华曾劝他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认为这是祖国所需要的。到哥廷根之后，章用劝他只读希腊文，原因是兼读拉丁文，两年时间来不及。季羨林经过初步考虑，听从了章用的劝说，在第一学期选的课就以希腊文为主，另外又杂七杂八地选了许多课，每天上课六小时，他选这些杂课的用意，只是练习德语，并不是有多明确的目的。

但是，第一堂希腊文课，并没有使季羨林满意。教师的声音太低，他听不懂。老师又不提问，听不懂觉得如坐针毡，难过极了。他

在日记中写道：

下了课走回家来的时候，痛苦啃着我的心——我在哥廷根做的惟一的美丽的梦，就是学希腊文。然而，照今天的样子看来，学希腊文又成了一种绝大的痛苦。我岂不将要一无所成了吗？[30]

学希腊文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季羨林又自学了一段拉丁文，甚至还想学古埃及文。

后来，一个偶然的的机会，季羨林认识了湖南留学生龙丕炎（范禹），他是主修自然科学的，但是却学过一学年的梵文。而季羨林在清华大学上学时听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的课，就动过学梵文的念头，但苦于国内无人讲授。认识了龙丕炎之后，他把自己用过的施滕茨勒所著的一本梵文语法书送给了季羨林。这时，季羨林就同好友章用商量，谈了自己想学梵文，章用听了之后，马上表示支持。

经过几天的苦煎苦熬，季羨林终于审慎地决定要学梵文。

我又想到我终于非读 Sanskrit（梵文）不行。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在德国能把想学的几种文字学好，也就不虚此行了，尤其是 Sanskrit，回国后再想学，不但没有那样的机会，也没有那样的人。[31]

中国有句俗语“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辛弃疾《青玉案》词所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季羨林长期决定不下来的专业方向，经过反复考虑终于找到了，研究道路终于一锤定音。从此，他毕生要走的道路找到了，他沿着这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在走下去。

2. 哥廷根大学的梵文研究室

梵文是中国读者最缺乏了解的一种印欧语系印度语族的语言之一，多指公元前 5 世纪印度的书面语言。再早在公元前 18 世纪，则

已有吠陀梵语存在，公元前 5 世纪帕尼尼著成语法，使梵文规范化。古典梵语盛行于公元前 5 世纪，延续至公元 10 世纪，今已消亡。但仍是印度少量婆罗门教徒使用的宗教语言。通行的梵语用天城体书写，不仅用于学术交流，也用于佛经文学的创作。梵语语法与其他古代印欧语系的语言如拉丁语、希腊语的语法相似，极为曲折，变化繁复，名词和形容词有三种“性”（阳性、阴性、中性）、三种数（单数、双数与复数），八个格（主格、宾格、工具格、与格、夺格、属格、位格、呼格）。动词变化也极为复杂，有时态、语气、语态、数和人称等一系列的变化。字母由最初的婆罗米字母，演变成公元 7 世纪时的天城体梵文字母，有十三个元音字母、三十三个辅音字母。今印度人使用的印地语和尼泊尔语，仍用天城体梵文字母，而孟加拉语则是梵文字母的变体。

这样一种语言，在现在世界上已知的语言中是语法最为复杂的古代语言。形态变化之丰富，同汉语截然相反。

哥廷根大学有悠久的历史梵文和比较语言学的传统。19 世纪末，弗朗茨·基尔霍恩就在这所大学任教，以后递次接替他的是海尔曼·奥尔登堡、西克。西克教授还兼通中亚古代语言吐火罗语。1935 年，西克退休，由瓦尔德施米特接掌梵文讲座，另一个被印度学者誉为活着的最伟大的梵文家雅可布·瓦克尔纳格尔，则曾在比较语言学系任教。正如季羨林所说，哥廷根大学是学习梵文最理想的地方。

真可谓梵学天空，群星灿列。再加上大学图书馆，历史悠久，规模极大，藏书极富，名声极高，梵文藏书甲德国，据说都是基尔霍恩从印度搜罗到的。这样的条件，在德国当时，是无与伦比的。[32]

就从 1936 年春季开始的第一学期，季羨林选了梵文。4 月 2 日，开始到高斯—韦伯楼的东方研究所去上第一课。东方研究所所在的楼因为大数学家高斯和大物理学家韦伯在这里发明了电报，后来就以他们俩人的名字命名该楼，该楼因此而名扬全球。

这座楼的楼下是埃及学、巴比伦文、亚述文、阿拉伯文各研究

室，楼上是斯拉夫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和梵语研究室。

3. 主课梵文和副课

梵文课就在高斯—韦伯东方研究所楼上的梵文研究室里上。

梵文教授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他是在西克教授退休后接替西克的。他是柏林大学梵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的高门弟子，是研究新疆出土的梵文佛典残卷的专家。他年纪轻轻，但在世界梵文学界已颇有名声。

季羨林没有想到，梵文课堂上只有他一个学生。瓦尔德施米特教授面对授课的只有一个学生，而且还是个外国学生，但他讲课却毫无丝毫懈怠之意。第一堂课教授领季羨林念了念字母，在第一堂课上虽然第一次接触梵文字母，这种字母非常啰嗦，绝不像英文字母那样简明，但教授认真传授，使他觉得颇为舒服，没感到有多大压力，他满以为有这样一个好的开始，会一直舒服下去。课一直讲到下午四点才结束。

满以为会一直舒服下去的季羨林，在第二堂梵文课上，就受了当头一棒，以后慢慢才习惯。

教授对梵文非常复杂的连声规律根本不加讲解。教科书上的阳性名词变化规律他也不讲。一下子就读起书后面附上的练习来。这些练习都是一句句的话，是从印度梵文典籍中选出来的。梵文基本上是一种死文字。不像学习现代语言那样一开始先学习一些同生活有关的简单的句子：什么“我吃饭”，“我睡觉”等等。梵文练习题里面的句子多少都脱离现代实际，理解起来颇不容易。教授要我读练习句子，字母有些还面生可疑，语法概念更是一点也没有。读得结结巴巴，译得莫名其妙，急得头上冒汗，心中发火。下了课以后，就拼命预习。一句只有五六个字的练习，要查连声，查语法，往往要作一两个小时。准备两小时的课，往往要用上一两天的时间。我自己觉得，个人

的主观能动性真正是充分调动起来了。过了一段时间，自己也逐渐适应了这种学习方法。头上的汗越出越少了，心里的火越发越小了。我尝到了甜头。[33]

季羨林就这样开始了梵语的学习。课后，还可以到研究所的一个小图书室里去翻阅一下图书。这个图书室有不到一万册书，但却有许多珍本和善本书，最珍贵的是奥尔登堡捐赠的一套上百册德国和世界各国梵文学者寄给他的论文汇集，分门别类，装订成册，大小不等，语言各异。这些书，有的大图书馆都没有，而如果自己去搜集，那更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

从此以后，季羨林天天到这个东方研究所，或者上课，或者去图书馆看书。

和梵文关系最密切的还有一种语言巴利文，它是佛教上座部的宗教语言。它属于印欧语系印度语族，起源于北印度的中古印度——雅利安语，与吠陀语和梵语诸方言有密切关系。公元前 6、5 世纪，被加工成为规范的语言。佛祖释迦牟尼不愿使用梵语布道，鼓励其徒众使用本地语言，其后佛教教义口耳相传，约于公元前 1 世纪，用巴利语记载下来，从此成为标准的佛教国际语言。该语言一直到公元 14 世纪才在印度本土停止使用。

要读懂佛经翻译文学，就必须精通梵文、巴利文。这样，根据德国当时的规定，考取博士学位，必须读三个系：一个主系，两个副系。季羨林选的主系，就确定为梵文、巴利文等所谓印度学。

但是副系选什么呢？季羨林是坚决不会选中国学的。他先考虑的是英国语言学和德国语言学。还考虑过阿拉伯文，而且还下功夫学了一年阿拉伯文，只是后来觉得不妥，又决定放弃了。最后确定的两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则不仅学了俄语，还加学了一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南斯拉夫语。从此，他的一个主系、两个副系最后确定下来。

这里涉及到一个在德国选系和专业的问题，德国是绝对自由的。

对此，季羨林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

德国大学是绝对自由的。只要中学毕业，就可以愿意入哪个大学，就入哪个，不懂什么叫入学考试。入学以后，愿意入哪个系，就入哪个；愿意改系，随时可改；愿意选多少课，选什么课，悉听尊便；学文科的可以选医学、神学的课，也可以只选一门课或者选十门、八门。上课时，愿意上就上，不愿意上就走；迟到早退，完全自由。从来没有课堂考试。有的课开课时需要教授签字，这叫开课前的报到（Anmeldung），学生就拿课程登记簿（Studienbuch）请教授签；有的在结束时还需要教授签字，这叫课程结束时的教授签字

（Abmeldung）。此时，学生与教授可以说是没有多少关系。有的学生，初入大学时，一学年，或者甚至一学期换一个大学。经过几经转学，二三年后，选中了自己满意的大学，满意的系科，这时安定住下，同教授接触，请求参加他的研究班，经过一两个研究班，师生互相了解了，教授认为孺子可教，才给博士论文题目。再经过几年努力写作，教授满意了，就举行论文口试答辩，及格后，就能拿到博士学位。在德国，是教授说了算，什么院长、校长、部长都无权干预教授的决定。如果一个学生不想作论文，决没有人强迫他。只要自己有钱，他可以十年八年地念下去。这就叫做“永恒的学生”（Ewiger Student），是一种全世界所无的稀有动物。[34]

这种绝对自由，对中国学生也适用。季羨林选课，从希腊文、拉丁文，到梵文、巴利文、英文、斯拉夫文，都是这种绝对自由允许的。

乔冠华在德国留学，结束了在柏林的德语强化训练后，选了德国南部一座小城的杜宾根大学，他选的专业是中国学，写了一篇关于庄子哲学的博士论文。因为想提早回国，也不管及格不及格，便从杜宾根到了巴黎，从巴黎乘一艘邮船回国。回国后，他的博士论文缺席通过答辩和评审，取得博士学位，只是博士学位证书未能寄回。乔冠华获取博士学位仅有两年多，他 1938 年 2 月 3 日就回到香港了。这说

明，在德国选课的自由，得中国学的博士学位也是比较容易的。

中国的大学，惟有蔡元培提倡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时期的北京大学堪与德国大学相媲美。北大课堂的惯例也是来者不拒，去者不追。张中行先生在北大上学时，就是这个样子。

有一次，张中行去听梁思成讲的中国建筑史最后一课，讲的内容是花园、桥、塔，以苏州园林为例，两小时的课讲完了，整个中国建筑史这门课也结束了。梁先生说：课讲完了，为了应酬公事，还得考一考吧？诸位说说怎么考好？听课的学生有近二十个，但没有一个答话的。梁先生又说：反正是应酬公事，怎么样都可以，说说吧。还是没有有一个学生答话。梁先生这才恍然大悟，问他们有谁是选课的？结果没有一个人举手。梁先生笑着说：“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谢谢诸位捧场。”说完，向台下作一个大揖，大家微笑而散。[35]于此，可见听课自由之一斑。

季羨林在哥廷根大学选的主系和两个副系，后来没有变化。尤其是梵文，他研究了一辈子，是执业终生的一个专业。

4. 去听诗

和在国内一样，季羨林在哥廷根大学的爱好和兴趣仍然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项，就是对诗歌的爱好。

当季羨林看到老诗人宾丁来哥廷根念诗的海报时，他心中高兴得不得了。很早以前，他由于嗜好听念诗，积多日之想，甚至积成一幅影像，在他眼前晃动，使他在幻影中看到一个垂老的诗人，在暗黄的灯影里，用颤动幽抑的声音，低低地念出自己心血凝成的诗篇。这颤声流到每个听者的耳朵里，也流到他的心里，一直流到灵魂深处。这次，他看到宾丁的海报，这样一位能引起人们幻想的名字，他想不到在这古老的小城哥廷根竟会出现。他和章用立刻买了票，一起去听诗。

老诗人念诗的时间在晚上。他和章用一起走出去，外面正下着雨，雨点滴在脸上，透心地凉。在昏暗的灯光中，他们穿过深秋的街道，走进了哥廷根女子中学的大礼堂。礼堂里已经挤满了上千人，电灯照得明耀如同白昼。人们在散乱嘈杂的声浪里期待着。季羨林和章用更是在激动中等待着。

声音蓦地静下去，诗人已经走了进来。他已经似乎很老了，走路都有点摇晃。人们把他扶上讲台去，慢慢地坐在预备好的椅子上，两手交叉起来，然而不说话。在短短的神秘的寂静中，我的心有点颤抖。接着说了几句引言，论到自由，论到创作。于是就开始念诗。最初的声音很低，微微有点颤动，然而却柔婉得像秋空的流云，像春天的细波，像一切说都说不出东西。转了几转以后，渐渐地高起来了。每一行不平常的诗句里都仿佛加入了许多新的东西，加入了无量更不平常的神秘的力量。仿佛有一颗充满了生命力的灵魂跳动在里面，连我自己的渺小的灵魂也仿佛随了那大灵魂的节律在跳动着。我眼前诗人的影子渐渐大起来，大起来，一直大到任什么都看不到。于是只剩了诗人的微颤又高亢的声音不知从什么地方飘了来，宛如从天上飞下来的一道电光，从万丈悬崖上注下来的一线寒流，在我的四周舞动。我的眼前只是一片空濛，我什么东西都看不到了。四周的一切都仿佛化成了灰，化成了烟；连自己也仿佛化成了灰，化成了烟，随了那一股神秘的力量飞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36]

诗读完之后，老诗人接着念小说。人们在老诗人念完之后把他扶下讲台，热烈的掌声把他欢送出去，接着又把他拖回来，走到讲台前面，向人群慢慢地鞠了一躬，这才又慢慢地踱出去。

接着是人们排成长队请老诗人签名，季羨林和章用也挤在人群里等待着。终于等到了机会，老诗人为季羨林签字，他很费力，手有点颤抖，签完了，抬眼看了看季羨林。季羨林看到了一双异常大而且充满了光辉的眼睛。

雨夜中，他和章用沿着旧路回家，雨丝在昏暗的路灯下闪着光，

地上的积水也凌乱地闪着光，但季羨林似乎看不到，他仍然看到老诗人那双大而充满了光辉的眼睛。直到回到家，他也一直看到那双眼睛，甚至在梦里，也老是看到那双眼睛。他似乎和那位老诗人幻化成了一体，久久离不开诗人的面影。诗的感情，诗的氛围，诗的神奇，使他真正陶醉了。

不久，季羨林又与章用一起，在哥廷根大学的大讲堂，听卜龙克念诗。卜龙克是哥廷根大学学士院主席，其地位类似于英国桂冠诗人。

但这次听诗，一开始的感觉非常不好。到场的人没有听宾丁的诗那样多，讲台的布置不像上次那样只有一张普通桌子，一把椅子。这次桌子前居然挂起了德国国社党红底黑字的旗子，桌子上还摆了两瓶乱七八糟的花。他感到一种深深的失望和悲哀。

季羨林初到哥廷根的那个时候，法西斯头子希特勒上台不几年，德国普通人崇拜他如痴如狂。季羨林碰到过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竟然脱口而出，说：“如果我能同希特勒生一个孩子，是我莫大的光荣！”这样的话真让季羨林大吃一惊，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对法西斯头子，这个女孩竟有这样的态度。季羨林没见过希特勒本人，但是常从广播中听到他那疯狗般的狂吠声。他手下的两支队伍，一支冲锋队，一支党卫军，街上随处可见。因为冲锋队穿黄制服，后者穿黑制服，结果被中国留学生分别称为黄狗和黑狗。起初，在德国人中，反对希特勒的人微乎其微。进商店，会见德国朋友，到处都是“希特勒万岁”声。季羨林牢记蒋廷黻的教诲，小心谨慎，坚持的态度是，你德国人喊你的“希特勒万岁！”我中国人喊我的“早安”、“日安”、“晚安”，各行其是，互不侵犯。井水不犯河水，他们也不同意德国人谈政治，所以还能和平共处。

因为这样的理由，讲台上国社党的旗子便令季羨林反感。诗人出现后，又增加了他的一份反感。卜龙克的相貌颇有点滑稽。

头顶全秃光了，在灯下直闪光。嘴向右边歪，左嘴角上一个大

疤。说话的时候，只有上唇的右半颤动，衬了因说话而引起的皱纹，形成一个奇异的景象。同宾丁一样，说了几句话之后，就开始念自己的诗。但立刻就给了我一个不好的印象。音调不但不柔婉，而且生涩得令人想也想不到，仿佛有谁勉强他来念似地，抱了一肚皮委屈，只好一顿一挫地念下去。[37]

只是到后来，他念到采集的民间故事仿民歌而作的诗，才忽然兴奋起来，声音也高起来了，在单纯而质朴的歌调中，仿佛有一股原始的力量在贯注着。念完诗，又念小说，他异常地高兴起来，微笑不曾离开他的脸，听众也不时发出哄堂的笑声，也跟着兴奋起来。

到这时，季羨林总算找到了比较好的感觉，从听诗中得到了乐趣。

5. 林中撷趣

在小城哥廷根留学，孤独和思母情结苦苦地煎熬着季羨林，深夜，他经常哭着醒来，母亲模糊的面影不时在他眼前浮现。为了排解这无穷无尽的乡思，这难以忍受的孤独，他不知想了多少办法，但多不奏效。只有走到大自然之中，他才偶尔能忘掉忧愁。

他去得最多的地方，自然是哥廷根城东面的那片山林。

章用经常陪季羨林来这片林子里散步，这里不知留下他们的多少游踪。深秋的林子，出奇地静谧，他们甚至能听到叶子从树枝落下来的声音。他们站下来的时候，叶子也会飘落到他们身上，到理会到的时候，头上肩上往往满是落叶了。

间或，树丛里有东西影子似地一闪，原来是一只被他们说话声惊走的小鹿，小鹿跑走之后，接着是索索的干叶声，渐渐地又消逝到无边的寂静里去。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想起了一句诗：

叶干闻鹿行

这时候，季羨林一下子遇到了知己。他平常就喜欢浏览，积累了

不少旧诗词知识，再加上前些日子又刚听了两位德国诗人念诗，自己蛮有一套对文学上的许多派别和几个诗人的看法，平时难得解人，便一直闷在心里。在这小小的山林里，章用很愿意听他讲诗，于是便一下子倾吐出来。这时候，季羨林往往很高兴。

看了他点头赞成的神气，我的意趣更不由地飞动起来，我忘记了时间，忘记了世界，连自己也忘记了。往往是看到桦树的白皮上已经涂上了淡红的夕阳，才知道是应该下山的时候。走到城边，就看到西面山上一团紫气，不久天上就亮起星星末了。[38]

这片山林，成了季羨林撷趣的最好场所，林子和章用，使他忘记了平日的孤独。

除了章用以外，哥廷根还有几位中国留学生。其中龙丕炎（范禹）是冶金学的，曾把梵文语法书赠送给季羨林，另外还有田德望、王子昌、黄席棠、卢寿楠等。

一到星期天，他们几个留学生便不约而同地到城外山下的一片叫做“席勒草坪”的草地上去会面。这里的草地，终年绿草如茵，周围还有参天的古木。草地东边就是一座山，山上树木繁茂，一片大森林长宽各有几十里。山中还有一些名胜古迹，有名的俾斯麦塔，就高踞于山巅之上。登临到塔顶一望，全哥廷根城尽收眼底。周围还有几处咖啡馆和饭店，是为风景区的游人建造的。几个异国青年学子，在席勒草坪会面之后，就经常登山游玩，闲逛，午饭就在山中吃。这样的時候，季羨林往往也忘记了孤独。

见到中国人，能说中国话，真觉得其乐无穷。往往是在闲谈笑话中忘记了时间的流逝。等到注意到时间时，已是暝色四合，月出于东山之上了。[39]

四、哲学博士

1. 紧张的学习生活

由于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听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课激发起季羨林对梵文的兴趣，但因为在国内还没有人开梵文课，所以他只有画饼充饥，徒唤奈何。而到了哥廷根大学以后，他终于有了学习这种语言的机会，而且得以师从于德国梵文权威新秀瓦尔德施米特。他如鱼得水，乐不可支。

第一学期（1936年春天开始）和第二学期，选修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梵文课的学生，只有季羨林这一个外国人。对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学习梵文和巴利文，教授从来没有问是什么动机和理由。尽管只有这一个外国学生，但教授的授课仍然认真而负责。而学生虽然在学习这种语言时并非一帆风顺，但他下定决心，要克服一切困难，一定要征服它。季羨林是一个不喜欢外露的人，他只是多次暗表决心：一定要跳过这个龙门。

到了第三学期，新来了两个德国学生，组成了一个梵文、巴利文班。其中一个哥廷根大学历史系学生，早在二三年前，就曾师从西克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已经学过好几个学期了。另一个则是一位乡村牧师。梵文、巴利文在德国也是冷门，三人成众，教授为自己有三个学生相当满意。

季羨林对学过几学期梵文、巴利文的这位历史系学生，起初肃然起敬，认为他是老学生了，比自己学得要多。但是过了不久，季羨林发现，他学习极为吃力。他在中学时，据说就学过希腊文和拉丁文，还懂英文和法文，但是，在梵文面前，他却难以对付这个语法规则烦琐到匪夷所思程度的语言了，他简直是束手无策。在课堂上，教授只要一提问他，他就眼睛发直，口发呆，嗫嗫嚅嚅，一句话也说不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个学生被征从军，离开了课堂。他始终没进入学习梵文的佳境。这样一个例子，也正好说明了梵文之难绝对非同一般。

当时的德国，正处在一场大风暴的前夕，法西斯气氛越来越浓。但在季羨林初在德国的这两年，起码从表面上来看，市场还比较繁

荣，食品供应也极充足，限量制度还没有实行，所以只要有钱，什么东西还都买得到。在这两年里，季羨林的生活还是相当有规律的，过的是一种极为紧张的学习生活。

我每天早晨在家里吃早点：小面包、牛奶、黄油、干奶酪，佐之以一壶红茶。然后到梵文研究所去，或上课，或学习。中午在外面饭馆里吃。吃完，仍然回到研究所，从来不懂什么睡午觉。下午也是或上课，或学习。晚上六点回家，房东老太太把他们中午吃的热饭菜留一份给我晚上吃。因此我就不必像德国人那样，晚饭只吃面包香肠喝茶了。

就这样，日子过得有条有理，满惬意的。[40]

第一年的梵文课，按当时设定的正式课程名称，是为初学者开设的梵文。每周上两次，一次两小时。第一学期上课时间大约有 20 周，梵文上课时间是八十小时，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讲完了全部梵文语法，而且还教念了几百句练习。

德国的外语教学方法，被季羨林称作是典型的德国式的。这种德国式的外语教学方法，开始于 19 世纪。当时，一位德国语言学家埃瓦尔德说过这样的话：“拿学游泳来打个比方，我教外语就是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一下子把他们推下水去。如果他们淹不死，游泳就学会了。”这种教学方法，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尽早独立自主地“亲口尝一尝梨子”，是行之有效的。[41]

第二学期，季羨林就开始念梵文原著。先是念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第三篇《森林篇》中的著名神话《那罗传》，接着念迦梨陀娑的《云使》。

《那罗传》虽只是神话，但它的首尾完整，可以单独成篇。故事的男主人公是那罗，他身为尼奢陀国的国王，通过天鹅传信，与毗德尔跋国的公主达摩衍蒂相爱。按当时习俗，公主举行选婿大典，她没有选天神而选了那罗为婿，结为百年之好。结果得罪恶神，恶神就一直附在那罗身上，伺机陷害他们。由于恶神作祟，那罗在赌博中输掉

国土，夫妻分离，天各一方。那罗在森林中救了蛇王，蛇王为报恩，咬了那罗一口，使他变了形，然后送他一件仙衣，以便以后穿上能恢复原形。后来，他去一个国王那里当了车夫，精通了赌术。达摩衍蒂被父王找回后，立即派人寻找夫君，夫妻团聚后，那罗利用赌术赢回失去的江山，重新为王。梵文原著故事情节曲折生动，语言朴素流畅，歌颂了忠贞不渝的爱情，刻画了国王责任至上的好丈夫形象。所以此故事是印度梵文文学中的名篇佳作。

而《云使》是印度梵文古典文学中大诗人迦梨陀娑的一篇长篇抒情诗，有一百一十五节，写了一个夜叉小神因迷恋新婚娇妻，致使主人财神俱毗罗的花园被野象捣毁。主人罚他流放南方一年，他不得已去了南方的罗摩山。八个月后，夜叉小神乘雨季来临之际，托往北飞去的雨云带信给娇妻，告诉她再过些日子，就可以回去和她团聚了。诗人迦梨陀娑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雨云经过之地的自然美，用丰富的想象力刻画了他那为离愁所苦的娇妻的憔悴容颜。全诗凄恻缠绵，想象丰富，感情深沉，比喻奇妙，是梵文古典抒情诗的杰出典范。

在接触了一个学期的梵文语法之后，在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指导下，读这么高水平的梵文原著，正像被游泳教练推下水后一样，季羡林没有被水吓倒，他学会了游泳，从这两部名著中获益匪浅。

这是他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中得到的最大快乐，也是他感到最幸福的时候。

2.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

季羡林结识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并成为其学生，全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季羡林说过：“一个人一生中不能没有偶然性，偶然性能给人招灾，也能给人造福。” [42]

这个偶然机会是这样得来的：初到哥廷根大学时，首先碰到的一个难题是确定学习科目。一开始，他想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但在德

国，这两种语言是在中学就开始学习的，拉丁文要学八年，希腊文要学六年，一个中国人要想学好这两种语言，至少也要费上几年。对于一个只有规定的两年学习期限的季羨林来说，那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所以，一开始，他虽然选了希腊文，并自学了拉丁文，但心里并没有明确的目标。甚至是漫无目的地去学习。为这个问题，季羨林着实烦恼了一阵子。

在第一个学期最后，有一天，季羨林到哥廷根大学教务处，去看下学期教授开课的布告。他偶然看到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要开梵文课，这就勾起了他旧有的在清华大学便萌生的学梵文的兴趣。

第一次见到教授，是在梵文第一堂课上，这是 1936 年的春天开学后的那个学期，也是季羨林学梵文的第一个学期。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看起来非常年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一些。他穿一身厚厚的西装，有一张孩子似的面孔。1935 年，他刚在哥廷根大学得到一个正教授职称，接替已退休的西克教授的梵文讲座。

他是柏林大学毕业生，是著名梵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的得意弟子，是研究印度佛教史的专家，尤其在研究新疆出土的佛典梵文贝叶经残卷方面有极高的造诣，在世界梵学界，颇有名声。他还懂汉语和藏语，这对于他的研究工作来说，简直如虎添翼。

德国教授多半都有点架子，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极高，似乎有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不知为什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对季羨林没摆过教授架子。因为季羨林作为外国人，是教授接职以后收的第一个梵文学生，因此而对季羨林有感激之情？还是因为季羨林学习刻苦认真，成绩也很好？这都是不得而知的。而对其他人，他是很严厉的：

后来听说，在我以后的他的学生们都认为他很严厉。据说有一位女士把自己的博士论文递给他，他翻看了一会儿，一下子把论文摔到地下，忿怒地说道：“Das ist aber alles Mist！”（这全是垃圾，全是胡说八道！）这位小姐耿耿于怀，最终离开了哥廷根。[43]

从这一点看来，瓦尔德施米特在季羨林面前不摆教授架子，实在是由于季羨林的学习太好了，简直无可挑剔。因此，他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异国弟子！因此，他从来不对季羨林发脾气。他教课非常认真，很有耐心，梵文语法抠得很细。一个学期，便抠完了施滕茨勒的语法教科书，学习了全部异常复杂的梵文语法，并作了大量从梵文原典选出来的练习题。这与教授严格要求学生是分不开的，季羨林回忆说：

他要求学生极为严格，梵文语法中那些古里古怪的规律都必须认真掌握，决不允许有半点马虎和粗心大意，连一个字母他也决不放过。学习近代语言，语法没有那样繁复，有时候用不着死记，只要多读一些书，慢慢地也就学通了。但是梵文却绝对不行。梵文语法规律有时候近似数学，必须细心地认真对付。教授在这一方面是十分认真的，后来我自己教学生了，我完全以教授为榜样，对学生要求严格。等到我的学生当了老师的时候，他们也都没有丢掉这一套谨严细致的教学方法。教授的教泽真可谓无远弗届，流到中国来，还流了几代。我也总算对得起我的老师了。[44]

事实上，教授不仅严格要求学生，对自己的要求同样是很严格的。他是研究梵文贝叶经的权威，蜚声国际学界。他的博士论文以及取得在大学授课资格的论文，都是关于新疆贝叶经的。这两篇论文，实际上是两部非常严谨的学术著作。

这两本厚厚的大书，里面的材料异常丰富，处理材料的方式极端细致谨严。一张张的图表，一行行的统计数字，看上去令人眼花缭乱，令人头脑昏眩。我一向虽然不能算是一个马大哈，但是也从没有想到写科学研究论文竟然必须这样琐细。两部大书好几百页，竟然没有一个错字，连标点符号，还有那些稀奇古怪的特写字母或符号，也都是个个确实无误，这实在不能不令人感到吃惊。德国人一向以彻底性自诩。我的教授忠诚地保留了德国的优良传统。留给我的印象让我终生难忘，终生受用不尽。[45]

由于这样一些原因，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与季羨林关系最为密

切的德国老师。当时，季羨林甚至受中国“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传统观念的影响，把他称作“博士父亲”。

应该说，瓦尔德施米特起初有一个十分美满幸福的家庭。夫妇二人，只有一个上中学的十几岁的儿子。这位学者家庭的气氛显然有些严肃有余，活泼不足，夫人不大爱说话。

有一段时间，季羨林帮助教授翻译汉文佛典，因此而常到他家里去，与他们全家一起吃晚饭，饭后再工作到深夜。餐桌上，大多数时候是没有人讲话，安安静静的。季羨林记得，只有一次，教授笑着对儿子说：“家里来了一个中国客人，你明天大概要在学校里吹嘘一番吧？”

但是，幸福的家庭并没有维持多久。二次大战一爆发，希特勒法西斯军队兵源不足，教授也被征从军，成为一个什么军官。不过，这时，他还能享受到一点探亲假。后来，他们惟一的儿子也被征入伍，且不久就在北欧的一个国家阵亡了。教授是一个十分刚强的人，但失去了惟一的儿子，再刚强的人，失去独生幼子的伤心之情，也是可以想得见的。战争狂人希特勒害死了他的独生子，但他在季羨林面前却从来没表现出伤心的样子，他们夫妇也从未同他谈到此事。只是本来就活泼不足的家庭，从此便更增添了寂寞冷清的成分。

教授被征从军以前，预订了哥廷根大剧院冬季演出的票，没有退掉。他自己不能陪夫人去观看演出，就委托季羨林陪夫人去观看，每周一次。每到有节目的那天，季羨林吃过晚饭，便去接师母去剧院。剧院的节目，有时候是歌剧，有时候是音乐会，有时候是钢琴独奏，小提琴独奏，演员或来自外地，或来自国外，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虽然处于战争年代，但剧场里仍是一片升平祥和气象：灯火辉煌，灿如白昼，男士们服装笔挺，女士们珠光宝气。但是一出剧院，便是一片黑暗，灯火管制之下的哥廷根城，不允许一缕光线存在。就在这昏天黑地之中，季羨林要摸黑，走很长的路，把师母送回在山下的家中。然后再一个人回欧朴尔太太的家。他一个人在深夜回家，万籁俱

静，走在宁静的长街上，黑暗中，只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不禁想起了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自己故乡的父老乡亲们，一股股乡愁不断地袭上他的心头。

3. 交换期满，有国难回

按照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教授与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的互派留学生协议，学习交换期限为两年，1935年9月到1937年9月。

经过两年学习，季羨林的交换期满，按照双方的协议，到了他该回国的时候了。

这种时候，季羨林的思乡情结越来越浓，已经去世的母亲的面影不时在梦中出现，时而模糊，时而清晰，尤其是母亲对宁大婶说过的那句话：“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每当想到这句话，他总感到有一种撕心裂肺的痛苦在袭击着他。他也经常想到叔父，出国的时候，叔父已经失业，家里的生活该会如何打发呢？他又想到叔父续弦新娶的婶母，她对叔父如何？对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又会如何？自然，他也想到自己的妻子彭德华，她已到三十岁，年纪轻轻，带着一个四五岁的女儿，一个两岁的儿子，该是多么不容易啊！

一想到这些，他出国前从济南到北京之时，全家人为他送行的情景便又浮现在眼前，此时，亲人们可能每天都在大门口翘首盼望自己回去了。他真想插翅飞回到亲人的身边。

但是，就在此时，“七七”事变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开始了大规模侵略战争。事变之后不久，希特勒发布命令，关闭国门，凡是外国人一律不准离开德国。季羨林断了退路，有国难回。

在这之前，季羨林的好朋友章用因国内家庭经济出了问题，先期回国探听消息，留下章用的母亲一人。章伯母是有身份地位的人，丈夫章士钊当过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自己又当过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

书，后来落魄了，还不忘自己的“官家”身份，张口闭口总是“我们官家如何，你们民家如何”。季羨林曾跟她来过一次恶作剧，故意提高声音问她：“你们官家也是用筷子吃饭，用茶杯喝茶吗？”老太太居然觉察不出年轻人的“险恶用心”，继续“官家”“民家”地嚷嚷个不休。可章用走了以后，老太太孤身一人留在哥廷根，等候儿子的消息。季羨林就与龙丕炎（范禹）承担起照顾老太太的责任。

三个人每天在饭馆里一起吃饭，而每天见面时，老太太总要气喘吁吁地说：“我告诉你们一件大事！”这样的话，已经成了老太太的惯例。季羨林也已摸透了她的脾气，她连气都喘不上来要告诉的“大事”，都是芝麻小事。因为她崇拜英国，崇拜英语，到了五体投地的程度，甚至连英国人的傲慢和偏见，她也样样俱全。她厌恶德文，不肯认德国字，结果在德国住了六七年，一句德国话也不会说，也不想说。她一不读书，二不看报，能谈的话题实在有限。所以她说的“大事”，往往也就离不开章士钊。她谈到，章士钊虽贵为总长，对待妻子，仍以西方礼节为准：上汽车为她开车门，走路挽她的胳膊，而且满嘴用英文喊“亲爱的”不止。章伯母自己也如坐在云端里，认为自己是普天下最幸福的女人。但是，后来，她忽然发现真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顿觉自己从九天之上的云端坠落下来。适逢章士钊下了台，夫妇同三个儿子都来到哥廷根。后来，章士钊自己回了国，大儿子章可去意大利就读，三儿子章因到英国就读，二儿子章用和她自己则留在了哥廷根，一住就是六七年。

所以，季羨林已不在乎会有什么“大事”。他们天天吃过午饭之后，便送老太太回家，在章用不在的日子里，天天如此。

后来，章用无法解决经济问题，老太太也必须回国。季羨林和龙丕炎又帮她收拾房子，办理护照，买车票、船票，退房子，忙成一团。季羨林感到可笑的是，就在这样的非常时期，老太太也没忘记“官家”身份，她照了像，让两个年轻人帮她挑选“标准像”，好回国送给新闻记者。

就这样，季羨林终于送走了章伯母。他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回国团聚，自己则只能留在哥廷根。

哥廷根！到底还要呆多久？

4. 在汉学研究所当讲师

交换期满，奖学金停发，回国无望，季羨林简直走到了绝路。

他进退维谷。

他忧心如焚。

不用说继续完成学业，就是维持最简单的生活，也是困难重重。

年轻学子，出路何在？可算是正应了“车到山前必有路”那句话吧，季羨林交换期满的消息传到一个德国朋友的耳朵里。这位朋友是在章用的引见下，到达哥廷根后不久就认识的，两年来，有过一些交往，但是关系并不是很密切。这位朋友名叫古斯塔夫·哈隆，是苏台德人，他是反对法西斯的，担任着汉学研究所所长一职。在有家归不得，正愁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哈隆教授主动与季羨林联系，问他愿不愿意留下。教授的建议自然使季羨林喜出望外，他绝处逢生，立即受聘，当了汉学研究所的讲师。

汉学研究所不在高斯—韦伯楼，而是在另一个地方的一座大楼里。楼前有一个大绿草坪，草坪四周是许多参天的古橡树。楼房的建筑风格古穆堂皇，一进楼门，是一个极为宽敞高大的过厅，木头建成的楼梯又宽又高。一楼几乎见不到什么人，但处处都打扫得油光锃亮。

研究所设在二楼，七八间大房子，有一间是所长办公室，有一间是教室，其余的全是图书室和阅览室。图书馆有几间大房子，书架从地板一直伸到天花板，整整齐齐地全摆满了书，中国版和日本版的汉籍占了绝大多数，还有几架少量的西文书籍。在中国版的汉籍中，颇有一些珍贵的古本，有几种明版小说，在国内图书馆，恐怕也要算善

本书。这个研究所的藏书之富，让季羨林感到吃惊。

结识了哈隆教授以后，季羨林来这个研究所拜访过他。过去是这里的客人，现在受聘为汉文讲师，季羨林成了这里的主人了。

但是，生活既然有了着落，梵文、巴利文的学习也就更要继续了，这可是季羨林下定了决心要跳过的龙门哪！于是，他继续作梵文研究室博士生，据点仍在梵文研究所。而汉学讲师的授课任务，便在汉学研究所完成。

奇怪的是，哈隆教授身为汉学研究所所长，但不会说中国话。不会说中文，却又有十分雄厚的汉学基础。甲骨文尤其是他的拿手好戏，讲起来头头是道，经常发表一些极其精辟的学术见解。中国的一些古典文献如《老子》、《庄子》，他也都有很高的造诣。他还对古代西域史地情有独钟，钻研颇深，且出版一部名作《月氏考》，蜚声国际学术界。

由于哈隆教授非常关心图书资料的建设，在他的研究所图书馆，集中了全哥廷根大学所有的汉文藏书。再加上他本人在国际汉学界的崇高声望，许多国家的权威汉学家都同这个研究所有来往。

在这里，季羨林结识了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这位学者的中国古典诗歌翻译，蜚声国际汉学界，在英国也是传世之作，其唐诗翻译作品，竟然被收入著名的《牛津英国诗选》，此选集中收入的诗都是久有定评的不朽名作，可见韦利中国诗翻译之精湛。

季羨林还在这里结识了德国汉学家奥托·冯·梅兴—黑尔芬。这是一位专门研究明代制漆工艺的专家，请季羨林帮助翻译研究所收藏的一部制漆工艺书。季羨林自知对制漆工艺毫无了解，翻译出来的东西，自己也觉得不甚了了。但精于此道的专家，一看却十分明白。

到1939年，哈隆受聘到英国剑桥大学去当汉学教授，临行前，季羨林和田德望两人在市政府的地下餐厅为他饯行。在哥廷根大学，他郁郁不得志，学校不重视他，这次临别饯行宴会上，他吐露了自己的心声，以极其低沉的声调告诉他俩，说在哥廷根大学这么多年，真

正的朋友却只有这两个中国人！

哈隆教授走了，季羨林则留下来继续当汉语讲师，一直持续到后来回国。

5. 确定博士论文题目

梵文、巴利文的学业继续下来了，这是靠教汉语来养学梵语的。

从第五学期开始，也就是 1938 年春天，季羨林进入讨论班，读中国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贝叶经残卷。到第六学期一开始，即在 1938 年秋天，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同季羨林商量博士论文题目，并主动问他要不要一个论文题目，季羨林听了以后，大有受宠若惊的感觉，立刻表示愿意。

原来，在德国要想得到一个博士论文题目是非常难的。

指导博士论文的教授，德国学生戏称之为“博士父亲”。怎样才能找到博士父亲呢？这要由教授和学生两个方面来决定。学生往往经过在几个大学中获得的实践经验，最后决定留在某一个大学跟其一个教授作博士论文。德国教授在大学里至高无上，他说了算，往往有很大的架子，不大肯收博士生，害怕学生将来出息不大，辱没了自己的名声。越是名教授，收徒弟的条件越高。往往经过几个学期的习弥那尔（高年级的课叫做习弥那尔），教授真正觉得孺子可教，他才点头收徒，并给他博士论文题目。[46]

博士论文是博士学位考试至关重要的一个关口，教授看学生的能力，主要是看博士论文。所以，德国的大学对论文的要求都十分严格。题目一般都不大，但必须要有新东西，才能通过。有的中国留学生一呆就是六七年、七八年，但始终拿不到学位，就是论文没有作好。章用始终没拿到博士学位，原因就在于此。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季羨林才在教授给定论文题目之时有受宠若惊的感觉。经商定，论文定为研究《大事》偈佗部分的动词变化。当

时，季羨林对梵文所知还不太多，还不清楚要作好这篇论文到底要付出多大的努力。

题目确定下来之后，季羨林便在上课、教课之余，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读《大事》。主课梵文、巴利文照样上，副系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的课，都照常上。

《大事》是记载有关佛陀生平传说的一部佛经，是佛教部派之一大众部（音译“摩诃僧祇部”）较晚近的经典，也是佛教典籍“律藏”的楔子，分成三篇，分别记述释迦牟尼投生摩耶夫人胎中、成佛、乃至第一次说法和成立寺院等的事迹。“偈佗”，也译“伽佗”、“伽他”，此是音译，而意译则为“偈”、“颂”、“讽颂”、“孤起颂”等。这是佛经常用的体裁之一，由固定字数的四句组成，但种类并不统一。主要的有两种“偈佗”，一为“通偈”，固定由梵文三十二音节组成，这种也称“首卢偈佗”。二为“别偈”，共有四句，每一句分别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等，形式不定。

可见，《大事》和其中的“偈佗”都是很难啃的硬骨头。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季羨林要读的《大事》是由法国学者塞那校订的，一共有厚厚的三大本。这部佛典是用所谓“混合梵文”写成的，既非梵文，也非巴利文，更不是一般的俗语，而是一种乱七八糟杂凑起来的语言，主要是俗语和梵文的一种混合物。但其中梵文的成份和俗语的成份，随时代早晚而有所不同。时代愈早，其中俗语成份也就愈多，时代愈晚，其中俗语成份也就愈少。甚至在同一部佛经的早晚不同的异本中，也会表现出这种情况。[47]所以，对这样一部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三大本原书，季羨林只能争分夺秒，“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他把每一个动词形式都做成卡片，并查看大量的图书杂志。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被征从军，退休教授西克以垂暮之年，出来代替他上课。

这位退休教授，平常即为季羨林上课，也对他的博士论文加以指

导。而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则在回家休假的时候，对他加以指导。

但西克教授的恩德，绝非到此为止，这将在下文里有所交待。

6. 获哲学博士学位

季羨林积极地利用一切时间写作毕业论文，到 1940 年秋天，

《〈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化》基本上写成。为了使论文能更顺利地通过，他觉得应当在分析限定动词的变化之前，写上一篇有份量的长的绪论，以说明“混合梵语”的来龙去脉以及《大事》的一些情况，所以在论文写作以前，先动笔写这篇绪论。他对此充满自信，觉得此举定会使论文显得更有气派。他回忆说：

我翻看了大量用各种语言写成的论文，作笔记，写提纲。这个工作同作卡片同时并举，经过了大约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写成了一篇绪论，相当长。自己确实是费了一番心血的。“文章是自己的好”，我自我感觉良好，觉得文章分析源流，标列条目，洋洋洒洒，颇有神来之笔，值得满意的。我相信，这一举一定会给教授留下深刻印象，说不定还要把自己夸上一番。当时欧战方殷，教授从军回来短期休假。我就怀着这样的美梦，把绪论送给了他。美梦照旧做了下去。隔了大约一个星期，教授在研究所内把文章退还给我，脸上含有笑意，最初并没有说话。我心里咯噔一下，直觉感到情势有点不妙了。我打开稿子一看，没有任何改动。只是在第一行第一个字前面划上了一个前括号，在最后一行最后一个字后面划上了一个后括号。整篇文章就让一个括号括了起来，意思就是说，全不存在了。这真是“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掉了。我仿佛当头挨了一棒，茫然、懵然，不知所措。这时候教授才慢慢地开了口：“你的文章费劲很大，引书不少。但是都是别人的意见，根本没有你自己的创见。看上去面面俱到，实际上毫无价值。你重复别人的话，又不完整准确。如果有人对你的文章进行挑剔，从任何地方都能对你加以抨击，而且我相信你根本无力

还手。因此，我建议，把绪论统统删掉。在对限定动词进行分析以前，只写上几句说明就行了。”一席话说得我哑口无言，我无法反驳。这引起了我的激烈的思想斗争，心潮滚滚，冲得我头晕眼花。过了好一阵子，我的脑筋才清醒过来，仿佛做了黄粱一梦。我由衷地承认，教授的话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我由此体会到：写论文就应该是这个样子。[48]

生平第一次写规模比较大的学术论文，也是第一次受到这么剧烈的打击，在这样的打击面前，他开始清醒地考虑到：没有创见，不要写文章，否则就是浪费纸张。有了创见写论文，也不要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空洞的废话少说不说为宜。

有了这样的教训，季羨林把所有精力投入到写论文上。

9月13日，季羨林请同住一条街上的迈耶家的大女儿伊姆加德打完了论文的最后一个字母，把论文交给瓦尔德施米特教授。10月9日，又交给文学院院长戴希格雷贝尔教授，因为按德国规定，要由院长安排口试时间。而院长要由最年轻的正教授来担任。因为英文教授勒德尔有病在住院，梵文和斯拉夫语言学被安排在同一天进行。

1940年12月23日这天，是季羨林口试答辩的日子。他早晨五点就醒来，心里光想口试，再也睡不着。七点，他起来吃了早点，又慌乱地看了一阵书。

九点半，他走到大学办公处去。十点开始口试，参加的教授有瓦尔德施米特、戴希格雷贝尔，还有稍晚一点到的布劳恩教授。主课梵文的口试极为顺利，但当布劳恩教授提问的时候，本来让他预备的全没问到，他心里十分慌张。尽管所问的题目都极为简单，简直都是常识，但他还是不能思维，颇呈慌张之像。

口试一直进行到十二点才结束。季羨林对自己的慌张很不满意，事后，他感到心里难过极了。

第二天，也就是1940年12月24日，瓦尔德施米特教授邀请季羨林到家里过圣诞节。晚七点以前，他到了教授家里。一进门，教授

就向他贺喜，告诉他答辩的结果：博士论文是优，印度学和斯拉夫语言学也是优。

这时候，教授的儿子还没去当兵，他先拉了一阵子小提琴表示祝贺，然后吃饭。吃完饭又把圣诞树上的蜡烛全点上，喝酒，吃点心，聊了一阵子天，十点半告辞回家。

在勒德尔教授病愈出院后，1941年2月19日，又补了英文口试。结果又是优。这时，季羨林才如释重负，连论文加口试，一共得了四个优，他自己感到，没有给中国人丢脸，可以以此成绩告慰自己亲爱的祖国，也可以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了。

这样，季羨林获得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时间是1941年。

季羨林的博士论文在答辩委员会中获一致好评，而且引起了轰动。国际著名的比较语言学家克劳泽教授对这篇论文赞不绝口，认为关于动词语尾的论述，简直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发现。这位教授是一位非凡人物，自幼双目失明，但有惊人的记忆力，过耳不忘，能掌握几十种古今的语言，北欧的几种语言，他都能说。这样一位权威首肯这篇论文，更使季羨林激动不已，因为他原先只是觉得自己的论文并不坏，但并不以为有什么不得了，经这位权威一表扬，自己也有点“飘飘然”起来了。

几年来的伏案苦读，终于获得了完满的结果。但季羨林对于获得学位的动机，却真实地这样披露出来：

我为什么非要取得一个博士学位不行呢？其中原因有的同一般人一样，有的则可能迥乎不同。中国近代许多大学者，比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郭沫若、鲁迅等等，都没有什么博士头衔，但都会在学术史上有地位的。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可这些人都是不平凡的天才，博士头衔对他们毫无用处。但我扪心自问，自己并不是这种人，我从不把自己估计过高，我甘愿当一个平凡的人，而一个平凡的人，如果没有金光闪闪的博士头衔，则在抢夺饭碗的搏斗中必然是个失败者。这可以说是动机之一，但是还有之二。我在国内时对某一些趾高

气扬不可一世的留学生看不顺眼，窃以为他们也不过在外国炖了几年牛肉，一旦回国，在非留学生面前就摆起谱来了。但自己如果不也是留学生，则一表示不平，就会有人把自己看成一个吃不到葡萄而说葡萄酸的狐狸。我为了不当狐狸，必须出国，而且必须取得博士学位。这个动机，说起来十分可笑，然而却是真实的。多少年来，博士头衔就像一个幻影，飞翔在我的眼前，或近或远，或隐或显。[49]

季羨林就这样真实而坦然地剖析了自己的动机，没有做作，没有冠冕堂皇，一点没有摆架子，也没有空洞的说教。使人读来感到那么真实、自然，又亲切。在潜移默化之中，灵魂却可得到升华，情绪可得到感染，不得不以他为榜样，来鞭策自己上进，做一个学习的强者！

第五章 德邦十年（二）

一、战争地狱

1. 法西斯点燃的战火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侵入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是希特勒一系列战争罪恶阴谋的一部分，是他长期推行战争政策的必然结果。

生于奥地利的希特勒，从小就不务正业。他中学毕业时，想当艺术家，但去维也纳两次报考美术学院，均落第。后来移居德国慕尼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德国士兵，获铁十字奖章。1919年9月加入德国工人党（次年改称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1921年成为党魁。1923年11月8日，希特勒在慕尼黑一家啤酒店率领国社党徒，围困在这里集会的巴伐利亚邦政府领导人，发动政变。失败后被判刑五年，实际上只关押了九个月，在狱中写成《我的奋斗》第一

部，公开谴责民主政府，仇恨共产主义、犹太人和中国人，全书充满极端反动的沙文主义、复仇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1929年以后，德国经济衰退，工潮迭起，希特勒被急欲物色一个强硬人物的工商资本家看中，终于在1933年1月在垄断集团支持下组织政府，出任总理，2月便乘国会纵火案之机，公开抛弃民主，剥夺自由，开始运用暴力，3月又获国会支持将全部权力收归己有。从1934年8月，在军队支持下，把总理、总统和三军统帅的职权合为一体，自称元首，成为大独裁者。他解散国会，取消所有反对派政党，残酷迫害和疯狂屠杀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犹太人，实行全面法西斯专政。这时适逢德国经济复苏，失业减少，结果公民投票居然有90%的人表示接受这个恐怖的独裁政权。1933年，他着手扩军，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1935年恢复征兵制度，1936年与意大利建立柏林—罗马轴心，接着又与日本订立反共条约。至此，希特勒已经武装到牙齿，对外扩张和发动侵略的条件已经成熟，开始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1938年吞并奥地利，并唾手而得地侵占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区，1939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全境被吞并。1939年8月，为欺人耳目，蒙骗苏联，与苏联缔结《德苏互不侵犯条约》，9月1日，侵入波兰，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身在德国的季羨林，目睹了这场大规模战争的爆发，亲身体验了希特勒的欺骗行为。在这以前，德国的邻国，都被希特勒说成是“侵略狂”或者“迫害狂”。这种“病”，就需要希特勒来医治。越到后来，就越变本加厉地捏造事实，挑起事端，煽动民心。对于大战前夕的德国，季羨林说：

到了此时，德国报纸和广播电台就连篇累牍地报道，德国的东西南北四邻中有一个邻居迫害德国人了，挑起争端了，进行挑衅了，说得声泪俱下，气贯长虹。德国人心激动起来了。全国沸腾了。但是接着来的是德国出兵镇压别人，占领了邻居的领土，他们把这种行动叫作“抵抗”，到邻居家里去“抵抗”。德国法西斯有一句名言：“谎

言说上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这就是他们新闻政策的灵魂。连我最初都有点相信，德国人不必说了。但是到了下半年，或者第二年的上半年，德国的某一个邻居又患病了，而且患的是同一种病，不由得我不起疑心。德国人聪明绝世，在政治上却幼稚天真如儿童。他们照例又激动起来了，全国又沸腾起来了。结果又有一个邻国倒了霉。[1]

按照法西斯的这种强盗逻辑，东邻波兰犯了这种“侵略狂”或“迫害狂”，德国“被迫”出兵到波兰去“抵抗”，结果自然是波兰全国被德军占领。如此一而再，再而三，许多邻国的“病”都被德国治好，国土也就被德军占领。等到法国的马其诺防线被攻破，德军侵入巴黎以后，德国四邻的“病”都被法西斯治好了，这时，季羨林预感到，德国又要寻找别的新病人了。

1941年6月22日那天，季羨林早晨一起床，女房东欧朴尔太太就告诉他，德国同苏联开战了。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准备工作早已完成，在侵占波兰之后，又攻陷荷兰和比利时，败法国、炸英国、夺取挪威，控制巴尔干和北非，正可谓“打遍天下无敌手”，所以一进6月，便准备公开撕毁《德苏互不侵犯条约》，虎视眈眈地要进攻苏联了。

在这样一件天大的大事面前，德国人谁也不紧张，这大概是因为近一两年来，每年几乎都要出现两次这样的大事，所以也就“司空见惯浑无事”了。

季羨林也没有紧张，他按照前两天约好的计划，照样在这一天和两个德国朋友苹可斯和格洛斯去郊游。在一天的时间里，他们又是乘车，又是坐船，还几次渡过小河，在旷野绿林之中，一边走着，一边唱着歌，拉手风琴，野餐，玩了个不亦乐乎，尽欢而归。他们玩了整整一天，在灯火管制街灯尽无的情况下，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回家。对于他们来说，早晨发生的德苏宣战的事，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印象。

我原以为像这样杀人盈野、积血成河的人类极端残酷的大搏斗，理应震撼三界，摇动五洲，使禽兽颤抖，使人类失色。然而，我有幸

身临其境，只不过听到几次法西斯头子狂嚎——这在当时的德国是司空见惯的事——好像是春梦初觉，无声无息地就走进了战争。[2]

战争打响之后，一天没消息，二天没消息，一连五天都没有消息。到了第六天，季羨林猜想，大概是德军在东部战线不十分得手，正准备幸灾乐祸地诅咒一番。但是，在整整打响一个星期之后，在第二个星期日，也就是6月29日，德国广播活跃起来，一个早晨就接连广播了八个“特别节目”：德军在苏联境内长驱直入，势如破竹，每一个节目都报告着一个希特勒的重大胜利。漠不关心的普通德国人，这时也忽然激动起来，如痴如狂地山呼“万岁”。德国普通百姓，绝对不会知道，在希特勒的授意之下，希姆莱在欧洲建立起多少灭绝人性的集中营，在德国、波兰、苏联和其他德军占领区，仅犹太人，就有450—550万人无辜被杀。他们自然也不知道，其他民族的人民死于希特勒的屠刀之下的，也是不计其数。

季羨林亲眼见过日本侵略军在济南的残酷暴行，眼前不时地出现日本鬼子搜查他一个中学生的皮带时的那种奸诈和狰狞。现在德、意、日法西斯沆瀣一气，残酷屠杀世界各国人民，所以，德国广播每报告一次重大胜利，他都要气得暴跳如雷。

一听特别广播，神经就极度紧张，浑身发抖，没有办法，就用双手堵住耳朵，心里数着一，二，三，四等等，数到一定的程度，心想广播恐已结束；然而一松手，广播喇叭怪叫如故。此时我心中热血沸腾，直冲脑海。晚上需要吃加倍的安眠药，才能勉强入睡。6月30日的日记里写道：“住下去，恐怕不久就会进疯人院。”[3]

在这样的战争地狱中，季羨林的心灵在受着痛苦的煎熬，结果失眠成疾，从此失眠成了折磨他几十年的终生痼疾。

2. 饥肠辘辘

战争在继续进行着，一年多来，希特勒不可一世，在扩大着自己

的“战果”。

但是，战争机器并不依法西斯头子的意志为转移，自然也不会跟着希特勒的指挥棒转。

1942年，希特勒在北非阿莱曼和苏联斯大林格勒遭受挫折，这成为他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随着战争的升级，希特勒越来越不顾本国人民的死活。法西斯头子们扬言：要大炮，不要奶油。他们侵略成性的嗜欲永远得不到满足，他们也就一步步把德国人民投入饥饿之中。

战争一开始，人民的生活还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德国人桌子上摆着奶油，肚子里填充着火腿。慢慢地，开始实行食品配给制度。最初限量的是奶油，接着是肉类，然后是面包和土豆，最后连其他生活用品也开始限量供应了。

季羨林是在穷人之家长大的，但小时候虽然一年里至多吃两三次“白的”面食，可吃糠咽菜，吃红高粱饼子，肚子还是可以填饱的，没尝过挨饿的滋味。到了德国，开始的两年还蛮不错，可是后来，开始受“洋罪”了。

这种“洋罪”是慢慢地感觉到的。我们中国人本来吃肉不多，我们所谓“主食”实际上是西方人的“副食”。黄油从前我们根本不吃。所以在德国人开始沉不住气的时候，我还悠哉悠哉，处之泰然。但是，到了我的“主食”面包和土豆限量供应的时候，我才感到有点不妙了。黄油失踪以后，取代它的是人造油。这玩意儿放在汤里面，还能呈现出几个油珠儿。但一用来煎东西，则在锅里滋滋几声，一缕轻烟，油就烟消云散了。在饭馆里吃饭时，要经过几次思想斗争，从战略观点和全局观点反复考虑之后，才请餐馆服务员（Herr Ober）

“煎”掉一两肉票。倘在汤碗里能发现几滴油珠，则必大声唤起同桌者的注意，大家都乐不可支了。[4]

最难忍受的自然面包。量少自不用说，质量更成问题。做面包的东西大部分并不是面粉，德国人自己也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有

人说是鱼骨粉，有人说是木头炮制出来的。一买到的时候，还勉强可以入口，可是只要放上一夜，第二天便腥臭难闻，根本就无法下咽了。

这种面包，吃到肚子里以后，能制造出气体。德国人本来是非常讲究礼貌的，但吃了这样的面包去电影院里看电影，德国人再也保持不住自己的体统了，虚恭之声，此伏彼起，东西相和，习以为常。这样的屁声大合奏发生在极讲礼貌的德国，真是绝妙的讽刺。季羨林非常诙谐地说：“我不敢耻笑别人。我自己也正在同肚子里过量的气体作殊死斗争，为了保持体面，想把它镇压下去，而终于还以失败告终。”[5]

在这样的情况下，季羨林几乎天天在挨饿，晚上则夜夜做梦，梦到中国的花生米。噩梦迷离的时候，居然梦到在祖国吃花生米。几粒花生米下肚，虽然只是在梦中，但也觉得龙肝凤髓也无法比得上了。他不无风趣地说：“我幼无大志，连吃东西也不例外。有雄心壮志的人，梦到的一定是燕窝、鱼翅，哪能像我这样没出息的人只梦到花生米呢？”[6]

城里人普遍是饥肠辘辘，而农村则要好得多。所以在当时，城里人谁要是能同农民有一些联系，别人就会垂涎三尺。有一位德国小姐是季羨林的朋友，不知怎么同一户农民接上了关系，农民邀请她下乡去。小姐约了季羨林，俩人骑着自行车到这户农民家里去摘苹果。苹果树都不高，用一个短梯子，就能摘到树上的全部苹果。帮助这户农民摘了半天苹果，工作就结束了。为了表示感谢，这位农民送了季羨林一篮子苹果，里边还有几个最好的品种。最使季羨林喜出望外的，是农民还送给他五磅土豆。

我大喜过望，跨上了自行车，有如列子御风而行，一路青山绿水看不尽，轻车已过万重山。到了家，把土豆全部煮上，蘸着积存下的白糖，一鼓作气，全吞进肚子，但仍然还没有饱意。[7]

恰巧当时季羨林正在读俄文版果戈里的《钦差大臣》，他读到第

二幕第一场奥西普躺在主人的床上独白的一段话：“现在旅馆老板说啦，前账没有付清就不开饭；可我们要是付不出钱呢？（叹口气）唉，我的天，哪怕有点菜汤喝喝也好呀。我现在恨不得要把整个世界都吞下肚子里去。”他读了以后，大为高兴，因为这位俄国作家在多少年以前，就有了挨饿的经验，说出了季羨林挨饿的感觉。处在饥饿地狱之中的季羨林，觉得为了抑制难忍的饥饿，如果有人向他嘴里投掷热铁丸或者泥土，他一定也会毫不迟疑地不顾一切地把它们吞了下去，至于肚子烧焦不烧焦，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人们由于长期挨饿，都逐渐瘦弱下来。房东欧朴尔先生原来是个大胖子，经过这一场连续的饥饿考验，体重减轻了二三十公斤，最后心脏不堪重负，在战争激烈之时死去。而在饥饿炼狱中被折磨过的季羨林，从此有七八年失掉了饱的感觉，一直到回国前夕才慢慢恢复过来。

3. 尝试回国

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季羨林在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而希特勒点起的战火，又使他陷入饥饿之中，在物质上是极端贫乏的。

这样的時候，季羨林乡思、乡情更一下子爆发出来。他当然想到叔父在临别时希望自己为祖宗门楣增添光彩的嘱托，现在一个熠熠闪光的洋博士学位已经拿到；但他也同时想到故乡的花生米和锅饼——一种烤制的极坚硬的发面面食，北京人称为锅盔——这都是他到了济南以后在叔父家里常吃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他更为想念自己的祖国和家庭。

但在1942年，德国政府承认了南京汉奸汪伪政府，国民党政府驻德国的公使馆被迫撤离到中立国瑞士。要回国，就必须先到瑞士去，再从瑞士设法回去。

季羨林有一位初中时的同班同学张天麟，此时正住在柏林。季羨

林就想先到柏林，看看他有什么办法没有。

决心下定之后，季羨林到熟悉的师友家里去辞行，大家都觉得惋惜，一再挽留他继续住下来。季羨林自然也充满了离愁别绪，也不忍心离开这么多朝夕相处的异国师友们。

最不舍得季羨林的，是女房东欧朴尔太太。欧朴尔先生已经故去，而儿子结了婚住在另一座城市里。这样一来，季羨林就成了她身边惟一的亲人，被她当做儿子来看待。而季羨林也真像儿子般地待她，在欧朴尔先生弥留之际的那个深夜，季羨林跑到大街上去叩门找医生，先生去世之后又伴她守尸。因此，季羨林一说要走，她立刻放声痛哭起来，五间房子只剩下她孤零零一个人，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教她如何忍受？而季羨林也一样，一想到相处七年，和和睦睦，风雨同舟，共渡难关，现在一旦诀别，何日还能再见？想到这里，也不禁热泪盈眶了。

季羨林还是忍泪离开哥廷根，来到柏林。找到张天麟，才知道到中立国瑞士也不容易，而且即便到了瑞士，也难以立即回国。没有办法，只能留在德国了。

在柏林住了几天，抽空拜访了大教育心理学家施普兰格尔、吐火罗语著名学者西克灵教授，然后于1942年10月30日又回到了哥廷根。

一回到欧朴尔太太身边，她仿佛凭空拣了一只金凤凰，真是喜出望外。而季羨林则回国无望，回到住惯了的地方，也有游子还家的感觉。他只好随遇而安，丢掉不切实际的幻想，迫于形势，只能同德国共存亡，同女房东共休戚了。

住下来以后，又照旧生活，照旧挨饿。有一天，季羨林去研究所上班，忽然看到在每天必经过的菜园子里，有一个衣襟缝上有P字的波兰少女在干活，圆圆的面孔，大大的眼睛，一下子让他想起在波兰火车上碰到的Wala。他心里痛苦万端，只是欲哭无泪，他的感觉是同病相怜，“同是天涯沦落人”。

由于战争阻隔，季羨林不能回家，甚至连书信往来也已中断。祖国的抗日战争，进行到什么程度了？德国方面偶尔也广播一点消息，但德、日法西斯头子们是同伙，所以播出的消息也全部是谎言。他就像是一棵无根的浮萍，漂浮在远离祖国几万里的法西斯德国，心中的痛苦是难以忍受的。

杜甫的诗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我想把它改为“烽火连八岁，家书抵亿金”，这样才真能符合我的情况。日日夜夜，不知道有多少事情揪住了我的心。祖国是什么样子了？家里又怎样了？叔父年事已高，家里的经济来源何在？婶母操持这样一个家，也真够她受的。德华带着两个孩子，日子不知是怎样过的？“可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我想，他们是能够忆长安的。他们大概知道，自己有一个爸爸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家里还有一条名叫“憨子”的小狗，在国内时，我每次从北京回家，一进门就听到汪汪的吠声；但一看到是我，立即摇起了尾巴，憨态可掬。这一切都是我时刻想念的。连院子里那两棵海棠花也时来入梦。这些东西都使我难以摆脱。真正是抑制不住的离愁别恨，数不尽的不眠之夜！[8]

他特别经常想到自己的母亲，越是同祖国和家庭联系不上，他的思母之情就越是剧烈。但是母亲一生没留下照片，他十几岁最后见到活着的母亲，二十二岁时见到的是躺在棺材里的母亲，母亲的面影已经不十分可靠。他怅望青天，抱怨连在梦中也难以见到母亲的真面目，他怨恨老天爷的残酷，后悔不该离开母亲。

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个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9]

真是撕心裂肺，情真意切，感人至深！但愿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不要忘记自己的父母，自己的祖国！

4. 成为无国籍者

德国法西斯政权和日本军国主义勾结在一起，为了帮助日本，希特勒法西斯政权在 1942 年宣布撤消对国民党政府的承认，而只承认设在南京的日伪汪精卫汉奸政府。这种反动政策对于季羨林等人来说，产生的直接恶果，就等于宣布中国留学生的护照作废，因为这些护照不是汪伪政府颁发的。没有了护照，在德国的居留就成了问题，有可能被判为非法居留。

对这样一个事关重大又亟待解决的问题，季羨林去找张维商量。张维和陆士嘉夫妇是留在哥廷根的中国留学生。他们严肃地商量了一下，最后决定：到警察局去宣布自己为“无国籍者”。

“无国籍”本来是消极的国际冲突的产物，由于各国国籍法规定的不同，而导致一个人不具有任何国籍的法律状态。如果是采取出生地主义国家的国民，在采取血统主义国家境内出生的子女即成为无国籍者。季羨林和张维他们不属于这种情况，而纯粹是由于希特勒违反国际法惯例，不承认国民党政府而承认汪精卫政府所致，所以是希特勒一手造成的。根据 1930 年国际社会订立的《关于国籍法冲突的若干问题的公约》和同时签订的关于无国籍问题的两个议定书，无国籍者在国际上不享有任何国家的外交保护，对于任何国家也就没有任何义务。这样的举措，自然要冒一些风险，无国籍者在像德国这样的日耳曼血统至高无上的国家里，是会受到歧视的。

但是事已至此，季羨林和张维也只好走这一步了。从此，他们便变成了像天空中的飞鸟一样的人，看上去可以在天空自由自在地飞翔，但是，任何时候都可能受到意外的伤害，任何人也有可能对它进行伤害。

幸亏德国普通人，包括哥廷根大学的师生们，对中国留学生都比较友好，并没有什么人伤害他们。他们仍然过着比较平静而难以忍受的生活。因为在饥饿之外，他们又有了一项新的灾难：轰炸，他们不得不经常躲避轰炸。

5. 盟军轰炸

在季羨林尝试回国，到柏林去找张天麟回到哥廷根之后，英美苏盟军的飞机开始了对柏林的大规模轰炸。

实际上，盟军飞机的轰炸早在大战之初就有过。但在最初的一二年里，技术水平相当低，炸弹只能炸坏高层楼房的最上一二层，下面是炸不透的。每座高楼下的地下室，成为天然的防空洞，躲在里面固若金汤，不必担忧。楼上中了弹，地下室最多摇晃一下而已。这时候，法西斯说谎机器，便大加嘲弄，说盟军的飞机是纸糊的，炸弹是木制的，而把德国的空防系统则吹嘘成铜墙铁壁。

后来，盟军的轰炸能力有了极大提高，白天能炸，晚上也能炸，轰炸的次数越来越多，穿透力越来越强，由穿透一二层提高到穿透七八层，最后十几层楼也抵挡不住，有的炸弹干脆从楼顶穿透到地下室爆炸，地下室也无安全可言了。再往后，就在季羨林离开柏林不久，英国飞机白天从西向东飞，美国飞机晚上从东向西飞，在柏林“铺起了地毯”，前后左右，不留空隙，就像在室内铺地毯一样。

哥廷根不像柏林，目标比较小，在战略上也不像柏林那样重要，但哥廷根也并没有避免被炸，只是次数少一点而已。

有一天晚上，英国飞机来轰炸哥廷根，炸弹就在季羨林住处不远爆炸，楼顶上的窗户玻璃已被震碎。季羨林钻入地下室躲避，心里在念叨着：以后要多加小心了。

第二天早晨，季羨林去研究所上班，大街小巷到处是一片清扫玻璃的哗啦哗啦声。原来飞机投下的是气爆弹，目的只在于震碎全城的玻璃，结果是东西城门各投一颗，全城玻璃差不多全被气流摧毁了。

就在这时候，季羨林在兵营的操场旁边，看到一个老头正在弯腰曲背，仔细地看什么。走近一看，季羨林认出是德国飞机制造之父、蜚声世界的流体力学权威普兰特教授。他在哥廷根大学任应用力学教授，创立了一个空气动力学和流体力学学派而闻名世界，享有空气

动力学之父的称号。看到他，季羨林赶忙问候了一声：“早安，教授先生！”回了礼，教授告诉季羨林，他正在观察操场周围的这段短墙，是怎样被炸弹爆炸引起的气流摧毁的。然后又自言自语地说：

“这真是难得的机会！我的流体力学试验室里是无论如何也装配不起来的！”

这位教授从1925年起就担任流体力学研究所所长，其著作是空气动力学的基本教材，他还是流线型飞艇的早期开拓者，主张单翼机，大大推进了重于空气的飞行体，为亚声速气流创立了定则，用以说明空气在高速时的可压缩效应。在这里，季羨林看到这位老教授在这样艰难的情形下，还在进行艰苦的科学研究，老教授抵死忠于科学、为科学而献身的精神，不禁让季羨林肃然起敬。这种严谨的不惧艰险的科学精神，着实使他感动，他从中获得了教益。

哥廷根被炸的机会多起来了，季羨林再也不敢麻痹大意了。以后，英国飞机几乎天天来轰炸，季羨林在吃完早点以后，就带上装满稿子的皮包，到山上去躲避空袭。

在同去山上的几个留学生中，各人都带上各人觉得最珍贵的东西。季羨林带的是稿子，而刘先志和滕菀君夫妇携带的珍贵东西，既非稿子，也非食品，而是用篮子提着一只乌龟。这原本是因为德国粮食奇缺，不知从哪一个被占领国运来了一大批乌龟，作为肉食品。没想到德国人吃东西非常保守，对此物见而生畏，绝不敢往肚子里填。法西斯政府千方百计，又是宣传营养价值高，又是引经据典，无非想证明乌龟肉不亚于仙丹醍醐。刘氏夫妇在柏林时买下了这只乌龟，可一看到这笨拙的躯体，灵活的小眼睛，一时慈悲大发，对这样一个小生命怎么也不忍心下刀，于是把它养起来，并从柏林带到哥廷根，天天带着上山躲避炸弹。

这批中国留学生仰卧在山中的绿草地上，空中的英国飞机编队掠过上空，而绿草地上的乌龟在瞪着小眼睛，迈着缓慢的步子，仿佛是在与天空的飞机比赛，那种不慌不忙却又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态度

让人佩服。他们此时顾而乐之，仿佛不是生活在恐怖的战争中，倒是乐园净土，空中显然是死亡威胁的飞机声，简直成了阆苑仙宫中的音乐了。他们就是这样在危中求安。

而德国人又如何对待轰炸呢？

每次大轰炸之后，德国人在地下室或防空洞里蹲上半夜，饥寒交迫，担惊受怕，情绪当然不会高。他们天性不会说怪话，至于有否腹诽，我不敢说。此时，法西斯头子立即宣布，被炸城市的居民每人增加“特别分配”一份，咖啡豆若干粒，还有一点别的什么。外国人不在此例。不了解当时德国情况的人，无法想象德国人对咖啡偏爱之深。有一本杂志上有一幅漫画：一只白金戒指，上面镶的不是宝石，不是金刚钻，而是一颗咖啡豆。可见咖啡身价之高。挨过一次炸，正当接近闹情绪的节骨眼上，忽然皇恩浩荡，几粒咖啡豆从天而降，一杯下肚，精神焕发，又大唱德国必胜的滥调了。[10]

掌握着统治机器的法西斯头子，用这种愚民政策，轻而易举地把德国人民蒙骗过去了。

6. 世外桃源

战争仍在进行，轰炸仍在进行，饿魔又在不断地吞噬着生灵，要活下去，必须想办法去找世外桃源。

可陶渊明能带季羨林去找世外桃源吗？显然不能，这世外桃源，得靠自己去寻找。

就在哥廷根城外的山林中，季羨林找到了自己的世外桃源。

这里的夏天，雨水多。雨水浇过的草木，青翠欲滴，翡翠一般晶莹剔透。山林中到处是可爱的翡翠绿。雨中，连续不断的雨丝与翡翠般的浓绿，交织在一起，如同一张神奇而迷茫的大网，季羨林孤身一人，不带伞，不穿雨衣，任凭淅淅沥沥的雨淋着自己，在这铺天盖地的大网中，踽踽独行着。这时候，他似乎忘掉了一切，天人合而为

一，而“天上天下，惟我独尊”，一切都在“我”之外烟消云散，战争不再存在，轰炸不再存在，饥饿似乎也不再存在了。难怪季羨林说：“当全城人民饥肠辘辘，在英国飞机下心里忐忑不安的时候，山林却依旧郁郁葱葱，‘依旧烟笼十里堤’。我真爱这样的山林，这里真正成了我的世外桃源了。”[11]

不知有多少次，季羨林独自一人，来到这片山林，天马行空般在这里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

有时候，他也难免带上几个朋友，或中国人，或德国人，到这里来共享世外桃源的美好。

有一次，季羨林同中国留学生张维和陆士嘉夫妇来这里畅游。这天，他们兴致很高，边走边谈，边游玩，渐渐忘了路的远近，不知不觉走进了深林。这里已经没了路，青苔越来越厚，是人迹罕到之地了。四周死一般寂静，惟有他们的谈笑声，不时地在林中回荡，回声悠扬地传到很远的地方。几只被惊起的梅花鹿，瞪大了眼睛，注视着这几位陌生的林中新客，大概是害怕之故，停了一会便一溜烟似地跑到更深的林中了。

一行三人，来到一个悬崖下，而悬崖的另一边又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树林。他们无法下去，下边就是看不到底的深谷，于是返身往回走。走着走着，又下起了雨。雨越下越大，他们跑着，想找个地方避雨。出乎意料，他们竟然在这里找到了一座木头凉亭。他们走进去，里面已经先坐着一个德国人了。打一声招呼，不用通报姓名，便上天下地聊起天来，宛如故友相逢。

从这片世外桃源，季羨林进一步领悟到，就是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人生乐趣也仍然有，在任何情况下，人生也决不会只有痛苦，在痛苦中仍可找到快乐。这就是他悟出的禅机。

7. 羨煞人的牛肉罐头林

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使战局急转直下。1943年7月，墨索里尼被意大利人民逮捕，法西斯意大利宣布停战。1944年7月，施陶芬贝格上校用炸弹行刺希特勒未果，但军队中对希特勒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希特勒重用纳粹，严禁军队投降，自己却呆在总理府的地堡里，迹近疯狂。1945年春末，战局更急转直下，德国已无还手之力。4月30日，凌晨，希特勒与同居多年的爱娃·布劳恩在宣布结婚后仅一天，便双双自毙于地堡之中。

1945年4月8日，美国坦克开进了哥廷根城。

美国兵进城以后，没有“屠城”，表面看来还非常文明，山姆大叔也没有侮辱德国人的事情，倒是有一些德国女孩子，围着美国大兵转，颇显出一些祥和气氛。

美国兵找到一个纳粹名单，他们按图索骥，来到欧朴尔太太对门的施米特先生家。他们到他家去找他的女儿，据说是纳粹女青年组织的一个大区的头子。男主人不在家，胖太太慌了神，吓得浑身发抖，求季羨林去帮忙。

季羨林只好走到他家，美国大兵自然感到很意外，便问他是干什么的。季羨林回答说是中国人，是“盟国”派来帮他当翻译的。讯问很快结束，美国大兵没再到施米特先生家。

美国兵进哥廷根城之后，占用了不少民房。凡单独成楼，花园优美的房子，大都被选中。瓦尔德施米特在城外山下盖的一栋新楼，自然没逃过去，被当成了临时兵营。他们住了几天就换防搬走了，但有些富丽堂皇、古色古香的家具已经受到一些破坏了。夫妇俩珍贵的几把古典式椅子，从来都是轻拿轻放的，却被美国大兵折断了腿。美国兵撤走后，季羨林到教授家里去，教授早已复员，他指着给季羨林看这些家具，一脸的苦笑，虽然没有说什么话，但心中的滋味，是不难意会的。而教授夫人则显然沉不住气了，她告诉说，美国大兵天天夜里酗酒跳舞，通宵达旦，把楼板跳得震天价响。这玲珑剔透的椅子腿，焉得不断！

季羨林见到的美国兵，个个年轻，有的长身玉立，十分英俊，但显然都吊儿郎当的。士兵向军官敬礼，甚至都嬉皮笑脸，嘻嘻哈哈。军官同级不敬礼，兵对兵也不敬礼。美国兵的少爷习气令人吃惊，吃饭时，一听鸡鱼鸭肉罐头，往往吃不到一半就扔掉。给汽车加油，一桶油还加不到一半，就不耐烦了，大皮靴一踢就滚一边了，桶里的油还汨汨地往外流，闪出丝丝白光。架设电缆，不竖电线杆，只往树枝上挂，有的一棵树上竟挂上十几条几十条，黑压压一大堆。美军撤走，这些电缆被随使用铁钳子剪断，树枝头便累累垂垂挂满剪断的电缆。但从美国人进城后，无国籍的中国留学生流浪汉，一下子成为胜利者盟国的一分子，一下子成了盟军的座上客。

季羨林同张维去找到美国驻军的一个校官，亮出自己的身份，立即受到礼遇，在一张纸上写明他们是由于战争，政治迫害等被迫离开本国的人，让他们就用这一张纸，到一个法国战俘聚居的地方，去找一个战俘头。他们依命而行，找到了这个人。他告诉他们，以后每天都可以从这里领牛肉。

季羨林领到鲜牛肉，那高兴劲自不用说。而对德国百姓来说，鲜牛肉简直同宝贝一样。季羨林作为山东人，没有独自吃喝不管别人的习惯，对牛肉也不例外。眼前的女房东，夫丧子离，孤身一人，季羨林每天领来的牛肉，都交给她，由她烹调后，俩人共同享受。

用这张条子，季羨林和张维还在市政府的一个机构，领到一张照顾中国人饮食习惯特批大米的条子。从此，他们有米有肉，真正成为座上客了。

有一天，有消息说，车站旁的一个仓库里，堆满了牛肉和白糖罐头，原来是德军的贮存食品仓库，法国兵现在正在里面不知干什么。

受好奇心驱使，季羨林又和张维结伴同行去看个究竟。门外挤满了德国人，男女老幼站在那里围观，但没有一个人敢进去。

季羨林和张维也不敢贸然越过把守的法国兵，便绕到后门来。一看这里一个人都没有，门虽然关着，但围墙很矮，也没人站岗。他们

便翻墙进到院子里，里面到处洒满了大米、白糖。据说是美国兵进城时，俄国和波兰俘虏兵抢过一次，米和糖就是他们洒在地上的。

在院子里，他们遇到一个法国兵，把他俩领到楼上一间存放牛肉罐头的屋子里，里面罐头堆得山般高。季羨林心中大喜，赶忙往带来的皮包里面装。忽然一个穿破烂军服的法国兵，过来问他是干什么的。季羨林拿出护照，法国兵翻到有法文的一页，一看没有签名，瞪大眼睛盯着季羨林，像是质问。季羨林给他翻到英文的那页，他看到签名，没再说什么，把护照退还后，示意愿拿什么，就拿什么，愿拿多少，就拿多少。季羨林和张维把皮包塞满，怀里抱满，跳出短墙，走回去。天热，路又不近，满载而归之后，大汗淋漓了。

回家仔细数过罐头，有牛肉的，有白糖的。季羨林把这些东西分了分，女房东、老师和熟人各有一份。这些东西对于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来说，无疑都是仙药醍醐，得到一份的人，都有雪中送炭之感，皆大欢喜。而季羨林却有点后怕了。

我自己事后回想起来，却有一股抑制不住的后怕。在当时兵荒马乱、哥廷根根本没有政权的情况下，一切法律俱缺，一切道德准绳全无，我们贸然闯进令人羡慕的牛肉林中，法国兵手里是有枪的，我们懵然、木然；而他们却是清醒的。说不定哪一个兵一时心血来潮，一扳枪机，开上一枪，则后果如何不是一清二楚吗？我又焉得不后怕呢？[12]

不管怎样，季羨林总算在羡慕人的牛肉林中游览了一番，而且大有收获。从此，饥饿地狱中的生活才是真正结束了。

二、吐火罗语

1. 又一次偶然

季羨林在自己的学者生涯中，不知碰到过几次偶然。而他总是抓

住这偶然的机​​会，使之成为取得光辉成绩的必然。

这一次机会，是学习吐火罗语。吐火罗语是印欧语系中的一种语言，5—10 世纪时曾通行于塔里木盆地一带。6—8 世纪的一些古典文献，是迄今发现的较早的文献，它证实吐火罗语有两种方言：吐火罗语甲种方言，是通行于塔里木盆地东北部吐鲁番的一种语言；吐火罗语乙种方言，主要通行于塔里木盆地北部的库车地区，但在吐鲁番地区也有人使用。

吐火罗语采用的是波罗密字母，与印欧语系中的 K 类语言关系十分亲近。在语音方面，吐火罗语每一个系列的塞音都同时出现，形成了三塞音系统，即清塞音 P、T、K 系统。但在语干构词和人称词尾两个方面，都反映了印欧语系助词系统的特点，而名词则没有留下原始印欧语系曲折变化的痕迹。

吐火罗语的语汇，吸取了土耳其语、伊朗语的若干词汇，后来还吸收了一些梵文词汇。吐火罗语甲种方言，其文献的内容，大多是翻译佛经《本生经》、《出曜经》的译本和有关哲学、训谕方面的著作。《本生经》又译《阇陀经》，是巴利文佛经《小部》中的一部经典。内容多是佛陀前生为国王、婆罗门、商人、女人以及大象、猴子等动物所行善业功德的故事，以此为基础，发挥佛教的基本教义。

《出曜经》则是梵文佛教经典，“出曜”意为“譬喻”。该经通过譬喻来宣传佛教所说的人生无常，以修行戒、定、慧积善根而达到解脱的道理。这些著作多为古印度佛教初学者的入门读物，而吐火罗语甲种方言的这两部经典的译本，为佛教在吐鲁番地区的传播提供了证明。

而吐火罗语乙种方言的文献，则是有关于贸易、寺院、医药巫术方面的诸多记载。这些文献是研究中亚古代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重要材料。

那么，吐火罗语为何人所使用？据希腊和拉丁文的一些史籍记载，在公元前 2 世纪时，曾有一支吐火罗人居住在乌浒河上游的盆地

周围，因此，将吐火罗语之名说成是塔里木盆地通行的语言，可能有误。而多数学者则认为操此种语言者为乌孙人。乌孙人最初是在祁连、敦煌之间活动，后来在公元前 161 年西迁至伊犁河和伊塞克湖一带。而且，吐火罗语与其他印欧语系的关系，以及甲、乙两种方言的关系，至今仍无定论，因此形成延续及今的“吐火罗问题”。

对这样一种稀奇古怪的语言，季羨林在国内时并不了解。到哥廷根之后，虽有所了解，但并不想学。其原因，他自己这样说：

说句老实话，我到哥廷根以前，没有听说过什么吐火罗文。到了哥廷根以后，读通了吐火罗文的大师西克就在眼前，我也还没有想到学习吐火罗文。原因其实是很简单的。我要学三个系，已经选了那么多课程，学了那么多语言，已经是超负荷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有时候我觉得过了头），我学外语的才能不能说一点都没有，但是绝非语言天才。我不敢在超负荷上再超负荷。而且我还想到，我是中国人，到了外国，我就代表中国。我学习砸了锅，丢个人的脸是小事，丢国家的脸却是大事，决不能掉以轻心。因此，我随时警告自己：自己的摊子已经铺得够大了，决不能再扩大了。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

[13]

但是，偶然的机会有意地来了。

二战爆发之后，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被征从军，已经退休的西克教授出来接替他的工作，上课之外还负责季羨林毕业论文的指导。

以古稀之年来接课，自然要比在家里颐养天年辛苦得多，但西克教授却并不想敷衍他的中国学生。第一次上课，他就郑重地宣布：要把自己毕生最专长的学问，统统毫无保留地全部传给季羨林，一个就是《梨俱吠陀》，一个是印度古典语法《大疏》，一个是《十王子传》，最后则是吐火罗语。这四个方面的学问，在中国惟有《梨俱吠陀》略为人知，其他三个方面在中国都是绝学。

西克教授要教吐火罗文，丝毫没有征询意见的意味，既不留给季羨林任何考虑的余地，也不容他提不同意见。季羨林只有乖乖地服从

教授。

他提出了意见，立刻安排时间，马上就要上课。我真是深深地被感动了，除了感激之外，还能有什么话说呢？我下定决心，扩大自己的摊子，“舍命陪君子”了。[14]

吐火罗语残卷是 20 世纪初才发现的。当时德国探险队在中国新疆发掘出了非常珍贵的用各种文字写成的古籍残卷，运到了柏林。德国学者那时还不能读通这些文字，但已经意识到这些残卷的重要性。柏林大学组织了许多年轻的语言学家主要是梵文学家来进行研究，西克教授便是其中之一。面对这天书一般的文字，许多人望而却步了。只有西克教授和西克灵教授俩人决心合作来读通这种语言。

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的工作简直就如猜谜一样，这不仅没能难倒他们，反而提高了他们的研究兴趣。他们日夜几乎是不停止地工作，前途充满了光明。

西克和西克灵的合作一直持续了三十多年，终于把这些天书读通，并定名为吐火罗语。在共同研究期间，他们合作发表了许多震惊学术界的著作和论文。后来，又取得了比较语言学家 W. 舒尔兹的帮助，三人合作著成吐火罗语语法，成为这一新发现的语言学的经典之作。

这部语法著作是长达五百一十八页的煌煌巨著，但它又不是一般的语法入门书，读通它是非常难的。季羨林初接触之时，感到它就像是一片原始森林，艰险复杂，歧路极多，没有人引导，自己想钻进去，是极为困难的。

读通了这一语言的大师西克教授，当然应该是最理想的引路人了。但是他教吐火罗文的方法，也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用的德国传统方法。他根本不去讲解语法，而是直接从读原文开始。

当时，比利时一位治赫梯文的专家沃尔特·古勿勒也慕名来到哥廷根，从西克教授治吐火罗文。西克教授有这两个外国学生，自然十分高兴，一开始，他就把他和西克灵共同转写成拉丁字母、连同原著

影印本一起出版的《福力太子因缘经》交给这两个年轻人去读，并称此书为“精制本”。他们的学习这样进行着：

我们自己在下面翻读文法，查索引，译生词；到了课堂上，我同古勿勒轮流译成德文，西克加以纠正。这工作是异常艰苦的。原文残卷残缺不全，没有一页是完整的，连一行完整的都没有，虽然是“精制品”，也只是相对而言，这里缺几个字，那里缺几个音节。不补足就抠不出意思，而补足也只能是以意为之，不一定有很大的把握。结果是西克先生讲的多，我们讲的少。读贝叶残卷，补足所缺的单词儿或者音节，一整套做法，我就是在吐火罗文课堂上学到的。我学习的兴趣日益浓烈，每周两次上课，我不但不以为苦，有时候甚至有望穿秋水之感了。[15]

后来从西克教授嘴里才知道，当初他和西克灵合作之初，工作更是艰难。西克灵住在柏林，是在普鲁士学士院工作，而西克则在哥廷根大学。俩人不断要有通信联系，有时碰到解决不了的疑难，或者是意见不一致之处，西克教授还得从哥廷根赶到柏林，与西克灵教授商讨。

季羨林非常佩服德国老师们的工作态度，把他们当做自己的楷模。他叹服他们异常认真、严谨、细致的学风。他们治学的彻底性，是名震寰宇的，写文章从来都是再三斟酌，多方讨论，然后才发表。

老师们的优良学风，深深地感染了季羨林，他下决心攻克这种新语言。

我当时工作极多，又患神经衰弱，身心负担都很重。可是看到这位老人那样热心，我无论如何不能让老人伤心，便遵命学了起来。

[16]

季羨林以惊人的毅力，终于读通了这种稀奇古怪天书般的语言，1946年回国后，虽然由于资料缺乏，中断了三十年，但到1975年，由于在新疆吐鲁番出土一批吐火罗文甲种焉耆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残卷，从1981年又得以重新研究，粉碎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

国，而研究在外国”的神话，承担了破译工作，为中国学术界争了光。

2. 山林中的学术沙龙

哥廷根大学的教授们，有一个颇为古老的传统习惯，虽然不知道开始时的确切时间，但一代一代地继承下来了。这个习惯就是：每到星期六下午，教授们便约上二三个同行好友，到哥廷根城外的山林中去散步。

这个传统虽然名义上是散步，但实际上是交流学术问题，因此形成了一个流动着的学术沙龙。

教授们走着谈着，有时候也会出现观点分歧，发生争论。争论起来，也是互不相让，各自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争得面红耳赤。他们不像《庄子》中所提倡的“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齐物论》）庄子认为，用大拇指来说明大拇指不是手指，不如用非大拇指来说明大拇指不是手指，用白马来说明白马不是马，不如用非白马来说明白马不是马，因此，从事理相同的观点来看，天地就是“一指”，有其共同性，万物就是“一马”，也有其共同性。德国学者的彻底性使他们绝不采取庄子的这种“齐是非”的态度，他们在学术问题上，非要争出个谁是谁非来。

在开展学术争论的时候，教授们真是忘乎所以，此时，大自然的旖旎风光，在他们的心目中，早已不复存在。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学问和对方的论点如何把对方说服。

教授们在林中漫游累了，争论倦了，往往找一个林中的咖啡馆，坐下来喝点，吃点，兴尽就回到城里去。

用这种方法，教授们在同行之间相互切磋学术，争论起来，也都会注意对方观点，从而可以做到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促进学术水平

的进步和提高。

就在季羨林获得博士学位后不久，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季羨林正在山下散步，正巧碰到西克教授和约好的几位教授，也要上山。季羨林向他们致以问候，西克教授忙把他叫到跟前，向其他几位教授作了介绍，说：“他刚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是最优等。”西克教授颇有得意之色，深为自己的弟子取得的优异成绩而自豪。而季羨林自己呢？则有这样的感觉：

我真是既感且愧。我自己那一点学习成绩，实在是微不足道，然而老人竟这样赞誉，真使我不安了。中国唐诗中杨敬之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说项”传为美谈，不意于万里之外的异域见之。除了砥砺之外，我还有什么好说呢？[17]

从这种学术沙龙中，季羨林学到的是为真理而坚持不妥协的精神，为真理而接受别人批评的精神。这种精神，他后来不管是写学术文章，还是创作散文，都是力求一个“真”字。这种风格，可以说是他一生都在坚持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我在这一生选择了这样一条道路，走起来并不容易。高山、大川、深涧、栈道、阳关大道、独木小桥，我都走过了，一直走到今天，仍然活着，并不容易。说不想休息，那是假话。但是自谓还不能休息。仿佛有一种力量，一种探索真理的力量，在身后鞭策我，宛如鲁迅散文诗《过客》中的那一位过客一样，非走上前去不行，想休息恐怕是不可能的了。如果有人问：“倘若让你再活一生，你还选择这样一条并不轻松的路吗？”我用不着迟疑，立刻就回答：“还要选这一条路的。我还想探索真理，这探索真理的任务是永远也完不了的。”[18]

季羨林这种孜孜以求探索真理的风格形成，自然是他自己长期努力的结果，但也不能否认，其中也有德国教授影响的因素。

3. 博士后的学习生活

1942年春天，季羨林获得博士学位，本来可以衣锦还乡，光耀祖宗门楣了，但是，到柏林走了一趟，才知回国是不可能的。回国不成，只好又留下来，在1942年10月30日重又回到已经住了七年多的欧朴尔太太家。

回来以后，情况已经有所变化，那就是做学生的时代已经永远地结束了。但仍然要过一种一般人所无法忍受的刻板单调的、清苦的书斋生活。

他每天在家里吃过早点，仍然沿着走熟了的路，到高斯—韦伯楼的梵文研究所。在这里，他的主要精力用在自己读书和写作上，继续钻研佛教混合梵语，沿着博士论文所开辟的道路前进。

他每天都相当紧张地工作到中午。午饭像往常一样到外面饭馆里去，吃完再回到研究所，继续工作，从来没有午休时间。

季羨林已经办完了退学手续，专任汉学研究所的汉语讲师。课就在研究所里上，课也不多，授课对象全是德国学生。有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他在这个工作上从来没有碰到过困难，即使碰到一点困难，他因为有了在济南高中当国文教师一年的经验，也就都不在话下了。

这样，季羨林就有了大量时间，以进行自己的学术研究。生活是极有规律的，也极为平静，但大战结束前肚子饿是常事，偶尔还要躲避空袭，所以还不断地遇到困难，甚至是危险。

极为难得的是在梵文研究所对面，是哥廷根大学图书馆。这里珍藏着许多极为稀奇古怪的学术著作，都是季羨林所需要的宝贵的参考书，他在这里如鱼得水，尽情地享受着书海泛舟的快乐。这种快乐，是那些不入此道者所无法享受到的。

在这样一个理想的学习和写作环境里，季羨林焚膏继晷地工作着，写作着。在博士后的几年内，他取得了相当丰厚的研究成果。几篇相当有学术价值的长篇学术论文，刊登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其中包括博士论文《〈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化》，另外两篇

《中世印度俗语中语尾-am 向-o 和-u 的转变》、《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都是当时在该研究领域内开拓性的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文，至今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国际学术界还不断有人引用。季羨林自己曾谦虚地说：“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19]而从季羨林一生的学术贡献来看，其实这几篇文章，只不过是他的学术研究的开端而已。

《中世纪印度俗语中语尾-am 向-o 和-u 的转变》是季羨林在1944 年用德文写成的，专门讨论的是语尾-am 向-o 和-u 转变的问题。其论证是从公元前 3 世纪时的阿育王碑铭开始的，理由是，一则阿育王碑铭是最古的资料，二则它又是最可靠的资料。在阿育王碑铭中，只有印度西北部的两块碑有语尾-am 转变为-o 的现象，其余的都没有，因此，他必须假定-am > -o 是古代印度西北部方言俗语所独有的现象。

就在这一篇论文中，他不仅引证了晚期佉卢文铭文、新疆古代佉卢文文书—于阗俗语和尼雅俗语、用混合梵语写成的佛典等属于印度雅利安的语言，而且，作为旁支，他还引证了伊朗语系的于阗文、粟特文以及属于印欧语系西支的吐火罗文 B（龟兹文），从而证明了-am > -o 是古代印度西北部方言俗语所独有的现象。从这一结论，他又推测出有这样的音变现象的几部佛经，如《普曜经》、《妙法莲华经》等，一定会同印度西北部有某种联系。

所以，虽然五十多年已经过去了，这篇文章的学术生命力依然如故，各国在该领域的专家学者，还不得不注意到它。当然，对其观点，会有支持者，也会有反对者，这是任何权威的学术文章都不可能避免的，相反，如果只有清一色的支持者，那倒有点奇怪了。

4. 学问三境界的逐一超越

治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绝非一蹴而就。俗语所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就蕴含着这一道理；细检古今学者的治学经验，体现着这一道理。治学成功者，往往与“三”字有联系。季羨林似乎也不例外。

治学既要树立远大的目标，又要有一步一步扎扎实实的平日艰苦努力，历史上一些著名学者，为此提出了“三境界”说。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其三境界是：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答李翊书》）

宋代苏洵的三境界是：惶然骇然，豁然以明，浑浑然觉其来之之易。（《与欧阳内翰书》）

近人王国维的三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人间词话》）

季羨林最欣赏的是王国维的三境界说。认为尽管王国维同我们在思想上有天壤之别，他所说的学问、事业，也与我们了解的不一样，但三境界的基本精神，是可以同意的。

第一个境界是宋代晏殊《蝶恋花》中的一段，全词是：

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天长水阔知何处。

全词并无治学之意，但被王国维抽出的一段，和其他两段组合起来，就成了治学的第一境界。根据季羨林的理解，这段的意思是：在秋天里，夜里吹起了西风，碧绿的树木都凋零了。树叶一落，一切都显得特别空阔，一个人登上高楼，看到一条漫长的路，一直引到天边，不知道究竟有多么长。王国维引用这几句词，形象地说明了一个人立志做一件事情时的情景，志虽然已经立定，但是前路漫漫，还看

不到什么具体的东西。

第二个境界是宋代柳永《蝶恋花》中的几句词，全词是：

独倚危楼风细细，望极离愁，黯黯生天际。草色山光残照里，无人会得凭阑意。

也拟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全词也无治学之意，抽出的几句和另外两段词被王国维当做治学的第二境界。

根据季羨林的理解，王国维借用那两句话来说明：在工作进行中，一定要努力奋斗，刻苦钻研，日夜不停，坚持不懈，以致身体瘦削，连衣裳的带子都显得松了。但是，他（她）并不后悔，仍然是勇往直前，不顾自己的憔悴。他认为在三个境界中，这一境界是关键。因为根据他自己的体会，立志做一件事情以后，必须有这样的精神，才能成功。搞社会科学的，必须积累极其丰富的资料，并加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在工作中，会遇到层出不穷的意想不到的困难，因此要坚韧不拔，百折不回，决不容许有任何侥幸求成的想法，也不容许徘徊犹豫，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最后的成功。

第三个境界是南宋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中的一段，原词也不是谈治学的，但和其他两段组合，被王国维赋以治学第三境界之意。全词是：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根据季羨林的理解，这几句词的意思是：到处找他（她），也不知道找了几百遍几千遍，只是找不到，猛一回头，那人原来就在灯火不太亮的地方。中国旧小说中常见的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一个人既然立下大志做一件事情，于是就

苦干、实干、巧干，但是什么时候才能成功呢？对于这个问题大可以不必过分考虑。只要努力干下去，而方法又对头，干得火候够了，成功自然就会到你身边来。

季羨林还认为，在第二个境界努力奋斗时，还要注意向老师学习，他说：

此外，我们既要自己钻研，同时也要兢兢业业地向老师学习，打一个不确切的比喻，老师和学生一教一学，就好像是接力赛跑，一棒传一棒，跑下去，最后达到目的地。我们之所以要尊师，就是因为老师在一定意义上是跑前一棒的人。一方面我们要从他手里接棒，另一方面，我们一定会比他跑得远，这就是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20]

三个境界包含着树立目标、艰苦奋斗、结出果实的过程。

而如何艰苦奋斗，并非要求人们个个都去头悬梁、锥刺骨地去苦斗，而是有许多窍门的。

三国学者董遇，学习善抓三余：冬天是岁之余，夜间是日之余，阴雨天是时之余。他靠抓余暇时间来学习，成为名学者。

宋代欧阳修利用三上：吾平生作文章，多在三上：马上、枕上、厕上。他利用这三上，写出了漂亮的文章。

南宋朱熹善于抓三到：心到、眼到、口到。因为心不在，则眼看不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就是漫浪诵读，也不能记，就是记也不能久。所以，三到之中，心到最重要。

季羨林自己最珍贵的经验，则是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不过，这是后话，我们以后会看到他是如何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治学的。

不管怎样，季羨林从1935年到德国，经过十年的时间，从第一境界选择方向，第二境界艰苦奋斗，在炮火轰炸下，在饥肠辘辘中，不忘勤奋学习，一直到第三境界，不仅获得博士学位，而且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几篇有力度的学术文章，从此确立了他在国际梵

学界的权威地位。而且，他没有停步，又在吐火罗语方面有所突破，结出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可以说他对治学的这三个境界，是逐一超越的。

从实现了第三个境界以后，季羨林又有许多新的开拓，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许多方面，都成为权威，最后终于成为兼容百家、学贯中外的学界泰斗。所以，如果王国维没总结第四境界，或者一般学者没有第四境界的话，而季羨林则还有第四境界。

这第四境界，可以借用唐代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一首诗中的两句来表现：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这两句话本来也不是写治学的，而是写塞外雪景如画的。这里借用过来，以说明学界泰斗季羨林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有成果问世，著作等身，且量多质高。这也是后话。

三、德国恩师们

1. 博士父亲恩重如山

一个人的一生能有一个或几个名师的指点，对于这个人的成才往往会起到关键的作用。

拿季羨林来说，从在山东大学附属中学上高中时，他遇到好老师王崑玉，受这位老师影响，养成舞文弄墨的习惯，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在山东省立济南高中，他又遇到好老师胡也频、董秋芳，受到现代文学的熏陶，开始写出质量比较高的文章。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他遇到了好老师朱光潜、吴宓，从此打下了比较文学、比较语言学的雄厚基础；又遇到好老师陈寅恪，激起了他对佛经翻译文学的浓厚兴趣，从此奠定了他在佛学研究领域的基础。

而在德国，季羨林又遇到了几个好老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教给

他梵文、巴利文，西克教授则教给他吐火罗文。在这两位老师的栽培之下，季羨林成为国内在梵文和巴利文、吐火罗文诸语言学领域独一无二的权威学者。还有其他一些老师，也对他影响不小，使他获益匪浅。

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的恩师中，首席导师是他的“博士父亲”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一开始，教授只教他一个学生，后来又增加了一个学生，教梵文、巴利文一直到被征从军。在从军时期，教授每次回家度假，还继续指导季羨林。季羨林不无激情地回忆说：

教授每次度假回家，都听我的汇报，看我的论文，提出他的意见。今天我会的这一点点东西，哪一点不包含着教授的心血呢？不管我今天的成就还是多么微小，如果不是他怀着毫不利己的心情对我这一个素昧平生的异邦的青年加以诱掖教导的话，我能够有什么成就呢？所有这一切我能够忘记得了吗？[21]

对这样一位恩师，季羨林充满了感激之情，终生感念至深。

1980年，季羨林离开哥廷根有35年之后，他有机会重返哥廷根，又见到了几十年来昼思夜想最希望能见到的人——博士父亲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和夫人。教授已83岁高龄。夫人寿更高，是86岁高龄，分别35年，重又会面，真有相见翻疑梦之感。季羨林心里如波涛翻滚，一时说不上话来，老教授夫妇也非常激动。

这次会面的地方，不是在季羨林非常熟悉的老教授的风子里，而是在一所豪华的养老院里。原来他已经把房子赠送给哥廷根大学的印度学和佛教研究所了，汽车也已卖掉，搬到这所养老院里来了。

师生围坐在屋子里不太亮的电灯光下，杜甫《赠卫八处士》诗中的名句，一下子涌上季羨林的心头：

人生不相见，
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
共此灯烛光。

十几年和教授相处的情景，历历展现在眼前。而面前坐着的是八十多岁高龄的老两口，虽然养老院富丽堂皇，应有尽有，什么健身房、游泳池，无不齐备，饭食也很好，但对这些行动不方便的人来说，健身房和游泳池无异于聋子的耳朵。这么多高龄人聚在一起，已不再是为健身，而是来等死，头一天晚上还可能在同桌吃饭，第二天早饭前说不定有人就见了上帝。老人生活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会怎么样，季羨林心里非常清楚了。

一听说自己的得意弟子要来，教授的心里激动不已。一下汽车，季羨林就看到在养老院高大明亮的玻璃门里面，教授已经端坐在圈椅上等候很久了。只见面前的教授：

他瞪着慈祥昏花的双目瞧着我，仿佛想把我吞了去。握手时，他的手有点颤抖。他的夫人更是老态龙钟，耳朵聋，头摇摆不停，同三十多年前完全判若两人了。[22]

就在这养老院里，师母还专门为季羨林烹制了当年在她家里常吃的食品。夫妇俩难得和弟子再聊一聊老哥廷根的老生活，他们现在大概也只有用回忆来填充日常生活了。

季羨林过去曾给教授寄过中国佛教的书，这次见面，他又问教授还要不要这类书，教授反问了一句，要那些东西还有什么用呢？谈及目前的情况，教授告诉他，想整理一下以前的旧稿，但不久也就要打住了。季羨林下意识地认识到，在他们前面，正如鲁迅在《过客》中所写的那样：“前面？前面，是坟。”

这时候，季羨林拿出自己翻译的《罗摩衍那》，当时只出了第一本，把它送给教授，没想到受到老师的批评：

我万没有想到，他板起脸来，很严肃地说：“我们是搞佛教研究的，你怎么弄起这个来了！”我了解老师的心情，他是希望我在佛教研究方面能多做出些成绩。但是他哪里能了解我的处境呢？我一无情报，二无资料，我是不得已而为之的。[23]

真正是到了垂暮之年的老人，还在关心着别人的学术研究，这样

的事情，只能在师生之间发生。

临别的时候，季羨林心里陡然凄凉起来。在季羨林 1980 年 11 月重返哥廷根时开始写作，一直到 1987 年 10 月在北京才补充写完的一篇《重返哥廷根》的文章里，写下了难舍难别的师生之情：

老教授毕生勤奋，著作等身，名扬四海，受人尊敬，老年就这样度过吗？我今天来到这里，显然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快乐，我能永远在这里呆下去吗？我真有点依依难舍，尽量想多呆些时候。但是，千里凉棚，没有不散的筵席。我站起来，想告辞离开。老教授带着乞求的目光说：“才十点多钟，时间还早嘛！”我只好重又坐下。最后到了深夜，我狠了狠心，向他们说了声：“夜安！”站起来，告辞出门。老教授一直把我送下楼，送到汽车旁边，样子是难舍难分。此时我心潮翻滚，我明确地意识到，这是我们最后一面了。但是，为了安慰他，或者欺骗他，也为了安慰我自己，或者欺骗我自己，我脱口说了一句话：“过一两年，我再回来看你！”声音从自己嘴里传到自己耳朵，显得空荡、虚伪，然而却又真诚，这真诚感动了老教授，他脸上现出了笑容：“你可是答应了我了，过一两年再回来！”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我噙着眼泪，钻进了汽车。汽车开走时，回头看到老教授还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活像是一座塑像。

过了两天，我就离开了哥廷根。我乘上了一列开到另一个城市去的火车。坐在车上，同来时一样，我眼前又是面影迷离，错综纷杂。我这两天见到的一切人和物，一一奔凑到我眼前来；只是比来时在火车上看到的影子清晰多了，具体多了。在这些迷离错乱的面影中，有一个特别清晰、特别具体、特别突出，它就是我在前天夜里看到的那一座塑像，愿这一座塑像永远停留在我的眼前，永远停留在我的心中。[24]

恩重如山的博士父亲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就是一座永远竖立的塑像，他的恩泽，滋润了异国学子的一生。

2. 西克教授

上面已经说到，季羨林之精通吐火罗语，是有缘结识西克教授之故。

而在感情上，季羨林更感到他是平生所遇到的中外老师中对自己最爱护、感情最深、期望也最大的老师。他不仅以古稀之年来给季羨林授课，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积累了一生的知识，倾囊而出，全部传授给了季羨林，而且，还在各方面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般关心、爱护这位异域来的弟子。所以，季羨林一直到今天，只要一想到他，心便剧烈地跳动，老泪立刻就流满全脸。

西克教授对季羨林的关心，真正做到了无微不至。季羨林在自己的日记里，真实地记载了他对这位恩师的感激之情。1940年10月13日的日记写道：

昨天买了一张 Prof. Sieg 的像片，放在桌子上，对着自己。这位老先生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激他。他简直有父亲或者祖父一般的慈祥。我一看到他的像片，心里就生出无穷的勇气，觉得自己对梵文应该拼命研究下去，不然简直对不住他。[25]

1941年2月1日的日记写道：

五点半出来，到 Prof. Sieg 家里去。他要替我交涉增薪，院长已答应。这真是意外的事。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这位老人家，他对我好得真是无微不至，我永远不会忘记！[26]

1941年10月29日的日记写道：

十一点半，Prof. Sieg 去上课。下了课后，我同他谈到我要离开德国，他立刻兴奋起来，脸也红了，说话也有点震颤了。他说，他预备将来替我找一个固定的位置，好让我继续在德国住下去，万没想到我居然想走。他劝我无论如何不要走，他要替我设法同 Rektor

（大学校长）说，让我得到津贴，好出去休养一下。他简直要流泪的样子。我本来心里还有点迟疑，现在又动摇起来了。一离开德国，谁

知道哪一年再能回来，能不能回来？这位像父亲一般替自己操心的老人十九是不能再见了。我本来容易动感情，现在更制不住自己，很想哭上一场。[27]

季羨林经常到西克教授家里去，但对他的家世始终不是很清楚的。只见过他的夫人，是一个又瘦又小但很慈祥的老人。至于子女或其他亲眷，季羨林从来没有见过。季羨林觉得他的家庭是一个挺孤寂清冷的家庭，但夫妇俩情好极笃，相依为命。

有一次，是美国兵已经攻入哥廷根城以后了，美军曾从城西向城东发射炮弹。炮声一停，季羨林赶忙到西克教授家去看是否有什么危险，因为听声音，炮弹似乎就在他家的附近爆炸。到了家里以后，教授夫人告诉季羨林，炮弹爆炸之时，老头子正在伏案读有关吐火罗语的书籍，窗子玻璃随着爆炸声响，全部被炸碎，玻璃片落满了桌子，但老头子却奇迹般地一点也没有受任何伤害。

季羨林听了，不禁出了一身汗，内心受到深深的震动。

我听了以后，真不禁后怕起来了。然而对这一位把研读吐火罗文置于性命之上的老人，我的崇敬之情在内心里像大海波涛一样汹涌澎湃起来。西克先生的个人成就，德国学者的辉煌成就，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从这一件小事中我们可以学习多少东西呢？同其他一些有关西克先生的小事一样，这一件也使我毕生难忘。[28]

这样的一位老教授，年届八十，对治学这样专心致志，这种精神可以说也影响了季羨林的一生。

3. 西克灵教授

西克灵教授不是季羨林在哥廷根大学的业师，但却是对季羨林有影响的老师之一。

西克灵教授工作的地点是柏林的普鲁士学士院。据说，他是不善

言谈的，只要有三个学生以上，他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他只在柏林大学教过一段很短时间的吐火罗文，最后也还是由于不善言谈而辞了职，以后一生就只在普鲁士学士院工作。

西克灵教授是西克教授研究吐火罗文最好的合作伙伴，许多研究成果，都是用两个人的名字，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克灵被征从军的一个期间是例外。他们的分工很有意思：

西克灵小心谨慎，但没有什么创造的能力，同时又因为住在柏林，在普鲁士学士院（Preuss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里做事情，所以他的工作就偏重在只是研究抄写 Br ā hmi（婆罗米）字母。他把这些原来是用 Br ā hmi 字母写成的残卷用拉丁字母写出来寄给西克，西克就根据这些拉丁字母写成的稿子来研究文法，确定字义。[29]

当然，西克灵并不是只懂字母，而西克只懂文法，他们两人两方面都懂，不过西克灵偏重于字母，而西克则偏重于文法。

西克灵的个性是小心谨慎，有时候小心到常人不能想象的地步。本来根据许多别的字义，一个吐火罗字的字义，明明是毫无疑问地可以确定了，但他偏持怀疑态度，偏反对，无论如何也不承认。在写信讨论无法取得一致的情况下，西克教授一看信不再有效用，便只得坐上火车赶到柏林，用三寸不烂之舌来说服他了。季羨林感到，西克教授就像是火车头的蒸汽机，没有它，火车就不能开走，但火车有时候走得太猛、太快，也会出毛病，这就要用一个停车的刹车，西克灵就可以充当这样一个停车的刹车。

Br ā hmi 字母并不像常见的拉丁字母一样，而是非常复杂的，字母之间的区别，有时候非常细微，稍一不小心，就会发生错误。所以西克灵教授单在读这种字母方面，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他的造诣是非常惊人的，甚至可以说是并世无二。

和西克灵教授的交往，当然不像和西克教授那样多，但季羨林为了读婆罗米字母的问题，在 1942 年春天，曾到柏林去拜访他。季羨

休在普鲁士学士院他自己的研究室里找到他，只见他正在埋头工作，桌子上摆的，墙上挂的，全是些婆罗米字母的残卷，他用他自己特有的蝇头般的小字，一行一行非常认真一丝不苟地抄下来。

所以第一次见面，季羨林得到的印象和听到的一样，人很沉静，不太爱说话，但是，只要问他问题，他却解释无遗。

从他这里，季羨林学到了不少读吐火罗文婆罗米字母的秘诀，感到他外表虽冷静，但内心却是个非常热情的人，像一切良好的德国人一样。

在吐火罗文方面，季羨林从西克灵这里得到的，还有他和西克教授、舒尔兹教授合著的在 1931 年出版的吐火罗语语法，一部长达五百一十八页的辉煌巨著，没有它，季羨林是读不通吐火罗文的。

到 1947 年，季羨林回国后的第二年，他接到西克教授的一封信，告知西克灵教授已于 1946 年春天去世。季羨林真为他惋惜，师友里面少了一个，感到对学术界，尤其是对自己，这个损失是再也不能弥补了。

4. 布劳恩教授

布劳恩教授精通斯拉夫语言学，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其父是莱比锡大学的斯拉夫语言学教授。

布劳恩能说流利的斯拉夫语，由于一开始年纪轻，还不是讲座教授。

二次大战开始时，布劳恩也被征从军，但他没上过前线，只是担任军界的高级俄语翻译。在战争中，苏联的一些高级将领有被德军俘虏的，希特勒等法西斯头子往往要亲自审讯，以便从中挖出一些超级军事秘密。布劳恩就担任这种翻译工作。

奇怪的是，像这样的高级俄语翻译，涉及到许多尖端秘密，按照常规，这样的人是要被保护起来的。但布劳恩居然与普通军人一样，

也享受休假。而每逢休假回家的时候，总是要同季羨林闲聊一些他当翻译的情况，有时就讲到德军或苏军最高司令部的一些机密。有几次，他对季羨林谈到苏军的大炮，说是如何厉害，德国难望其项背，这些话给季羨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战争的早日结束有了一定的信心。

布劳恩的家庭十分和美，夫人同样也很年轻。他们有两个男孩子，大的五六岁，小的两三岁。小的特别喜欢季羨林。因为住得很近，走二三分钟就到他家，季羨林常到他家去，一到他家，小男孩打老远跑过来，扑到季羨林的怀里。布劳恩夫人这时候就告诉季羨林：

“此时你应该抱住孩子，身子转上两三圈，小孩子最喜欢这玩意！”她是个心直口快、说话直爽的人。不过说起话来，有时难免离谱。

布劳恩喜欢中国艺术，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幅中国古代刺绣，上面绣有五个大字：时有溪山兴。他让季羨林把这五个字翻译出来，以后就对汉语发生了兴趣。他自己去买了一本汉德词典，开始念唐诗。他的方法是把每个汉字都查出来，然后连贯起来，居然也能讲出一些意思来，不对的地方，季羨林就帮他改正，并讲一些语法常识。他对汉语的语法结构，既觉得极怪，又觉得极有理，这种语言没有形态变化，同他所熟悉的印欧语系语言迥乎不同，而这正可能是个优点，能给读者提供极大的联想自由空间，不会像印欧语言那样被形态变化死死地捆住。

布劳恩教授多才多艺，喜欢画油画。有一天，他忽然兴致来了，要给季羨林画像。从这天开始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季羨林天天到他家里去，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当起了模特儿。他画得非常逼真，季羨林很满意。

在学术研究领域，布劳恩不像其他学者那样，把语言考据学作为自己的拿手好戏，他是与这些学者反其道而行之的，专门搞义理之学。他的论文和著作都不多，著作只见到一部讲沙俄文学的，从理论分析入手，把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列为两座高峰，而展

开论述。书中见解独特，观察细致，思想深刻，季羨林认为是不可多得之作，但不知为什么在学术界没有引起多少注意。

大概与他这种离经叛道的志趣有关，布劳恩在哥廷根大学颇不得志。他既没有当上正教授，当然就更不可能当哥廷根科学院院士了。他曾一度想去斯特拉斯堡大学，因为那里有一个正教授的空缺，但终于没有去。

到1980年，季羨林重返哥廷根时，布劳恩告诉他，最后总算当了讲座正教授。这一次见面时，他已经很老了，年轻时的英俊潇洒不复存在。夫人也已去世，而两个儿子都不在身边，此情此景，季羨林不无感慨：

老人看来也是冷清寂寞的。在西方社会中，失掉了实用价值的老人，大多如此。我欲无言了。[30]

后来，听德国来华客人说，布劳恩教授已经去世，季羨林以心香一瓣，祝愿他永远安息！

5. 冯·格林和其他教授

冯·格林有博士的学衔，但一直只是担任俄语讲师，因为一直未发表过学术论文，所以副教授的头衔与他无缘。这是德国的习惯，不管你外语多么好，只要没有学术著作，就不能当教授，甚至也不能当副教授。工龄增加了，工资可能很高，但是名分却不能改变，名分是与学术成就相符的。对此，季羨林感触颇深，认为这一点同中国是很不一样的。中国教授贬值，教授膨胀，由来久矣，这也算是中国的“特色”吧。而在德国，冯·格林是出生于俄国的德国人，他精通俄语，俄语几乎是他的母语，俄语水平之高是可以想见的，但他一辈子只是当讲师。

季羨林对冯·格林是非常感激的，是经常想到的一位德国老师。

他教我俄文时已经白发苍苍，心里总好像是有一肚子气，终日郁

郁寡欢。他只有一个老伴，他们就住在高斯—韦伯楼的三楼上，屋子极为简陋。老太太好像终年有病，不大下楼，但心眼极好，听说我患了神经衰弱症，夜里盗汗，特意送给我一个鸡蛋，补养身体。要知道，当时一个鸡蛋抵得上一个元宝，在饿急了的时候，鸡蛋能吃，而元宝则不能。这一番情意，我异常感激。冯·格林博士还亲自找到大学医院的内科主任沃尔夫（Wolf）教授，请他给我检查。我到了医院，沃尔夫教授仔仔细细地检查过以后，告诉我，这只是神经衰弱，与肺病毫不相干。这一下子排除了我的一块心病，如获重生。这更增加了我对这两位孤苦伶仃的老人的感激。[31]

而对冯·格林的外语教学，季羨林则从不适应到适应，学到了不少东西。他回忆说：

我在德国开始学俄语，每周只上课两次，每次二学时，共四个学时。第一次上课，教员领着学生念了念字母。我觉得速度不算快，还比较舒服；第二堂课以后，老师就让学生自己按照教科书的顺序，背生词，学语法，做练习，教员以后就不再讲解了。每次上课就做教科书上的练习，其中也有会话的练习，学生念俄文，学生翻成德文，错了老师纠正。大概过了两个礼拜，老师就让念果戈里的小说《鼻子》。这对我无异是当头一棒，丈二和尚，我简直摸不着头脑。我抱着一本字典，对着原文查下去。几乎每一个字都只能查到前半，后半是语尾变化，我根本不知道，只能乱翻语法，努力找出语尾变化。一个小时的课，我要五六倍七八倍的时间来准备。真是苦不堪言。结果在一个学期内，学完了一本教科书，念完了《鼻子》。我觉得这种教学法真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我曾对许多人谈过我的这一番经历。[32]

季羨林离开德国以后，再也没有看到他。他虽然早已离开人世，但却永远活在季羨林的心中。

除了冯·格林博士以外，在哥廷根大学还有一些老师，季羨林或者听过他们的课，或者与他们有过来往，他们也待他亲切和蔼，是他

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人。这些老师包括：阿拉伯文教授冯·素顿，季羨林曾从他学了一年阿拉伯文；英文教授勒德和怀尔德，哲学教授海泽，艺术史教授菲茨图姆侯爵，德文教授麦伊，波斯语教授欣茨等，季羨林对他们都是永志在心的。

6. 程门立雪的好弟子

中国作为东方文明古国，一向有尊师重教的习惯。

唐代韩愈的名作《师说》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季羨林认为，古代是这样，今之学者亦然。各行各业都必须有老师，“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虽然修行要靠自己，但没有领进门的师父，也是不行的。结合自己的情况，季羨林在1987年写成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我这一生，在过去的六十多年中，曾有过很多领我进门的师父。现在虽已年逾古稀，自己也早已成为“人之患”（“人之患，在为人师”），但是我却越来越多地回忆起过去的老师来。感激之情，在内心深处油然而生。我今天的这一点点知识，有哪一样不归功于我的老师呢？从我上小学起，经过了初中、高中、大学一直到出国留学，我那些老师的面影依次浮现到我眼前来，我仿佛又受了一次他们的教诲。[33]

事实上，季羨林不只是怀念他们，他还是程门立雪的一个好弟子。

程门立雪的故事，旨在提倡尊师重道。在南宋朱熹和吕祖谦共同撰成的《近思录》十四卷中，有：“游（酢）、杨（时）初见伊川（程颐），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曰：‘既晚且休矣。’及出门，门外雪深一尺。”而《宋史·杨时传》中，则具体记载了弟子杨时、游酢拜见老师程颐的故事：

杨时字中立，南剑将乐人。幼颖异，能属文，稍长，潜心经史。熙宁九年，中进士第。时河南程颢与弟颐讲孔、孟绝学于熙、丰之际，河、洛之士翕然师之。时调官不赴，以师礼见颢于颍昌，相得甚欢。其归也，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颢死，时闻之，设位哭寝门，而以书赴告同学者。至是，又见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

杨时死后，谥文靖。元明之际学者谢应芳写过一首题名《杨龟山祠》（杨时曾隐于龟山，世称龟山先生）的诗，说：

卓彼文靖公，

早立程门雪。

从此，“程门立雪”成为尊师重道的故事。

季羨林作为炎黄子孙，齐鲁之邦、礼义之乡的“举子”，更深知尊师的重要，而且，他还不仅只是知其理，明其义，更重视自己的践其行。

对恩重如山的西克教授，季羨林执弟子之礼甚恭。每当回忆起冬天送老师回家的情景，季羨林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凄清中的温暖：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回忆当时的情景，总是同积雪载途的漫长的冬天联系起来。有一天，下课以后，黄昏已经提前降临到人间，因为天阴，又由于灯火管制，大街上已经完全陷入一团黑暗中。我扶着老人走下楼梯，走出大门。十里长街积雪已深，阒无一人。周围静得令人发怵，脚下响起了我们踏雪的声音，眼中闪耀着积雪的银光。好像宇宙间只剩下我们师徒二人。我怕老师摔倒，紧紧地扶住了他，就这样一直把他送到家。我生平可以回忆值得回忆的事情，多如牛毛。但是这一件小事却牢牢地印在我的记忆里，每一回忆就感到一阵凄清中的温暖，成为我回忆的“保留节目”。然而至今已时移境迁，当时认为是细微小事，今生今世却决无可能重演了。[34]

实际上，西克教授的责任心极强，所以几乎每天都到研究所来。

我们天天见面，冬天黄昏，在积雪的长街上，我搀扶着年逾八旬的异国的老师，送他回家。我忘记了战火，忘记了饥饿，我心中只有身边这个老人。[35]

在战争和饥饿的双重威胁下，季羨林深知是多么缺乏营养。

有一次，季羨林发下宏愿大誓，一定要给老人增加点营养，给老人一点欢悦，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从自己少得可怜的食品分配中硬挤出来。他费心拔力地积攒了一点奶油，是自己两个月没吃硬省出来的，又想办法弄到了一点面粉和贵似金蛋的鸡蛋，还有一斤白糖，到一个最有名的糕点店里，请糕点师傅给烤制成一个蛋糕。他捧着这个蛋糕，简直就像捧着一个宝盒一样，小心翼翼地送到老教授家里。在当时，这无疑是一件极其贵重的礼物，老教授显然有点出乎意料，他的双手有点颤抖，叫来了老伴，共同接了过去，两位老人激动得连“谢谢”二字都说不出来了。

虽然自己的饥饿反而加重了，但能用自己所硬挤出来的这一点点东西来回报师恩，季羨林的心里是非常愉快的，而这件事很自然的，也就成为他一生最愉快的回忆之一。

至于后来季羨林和张维在哥廷根车站德军罐头食品存贮仓库里意外得到的一大宗牛肉和白糖罐头，自然也有西克教授和其他师友的份，季羨林是从来不吃独食的。

不仅对老师，对师母，季羨林也同样有一种程门立雪的精神。上面已经提到过，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从军以后，季羨林每周一次陪师母去剧院观看演出，然后又在黑暗中送她回家，最后自己才回家。

四、德国普通人

1. 难忘欧朴尔太太

在德国的十年中，季羨林接触最多、几乎是朝夕相处的是欧朴尔

太太。

从一到哥廷根开始，季羨林就住进了欧朴尔夫妇家里。老夫妇俩，还有一个儿子，全家人都没有把季羨林当外人看待，更没有把他当做外国人看待。法西斯头子对犹太人和中国人的歧视，在德国普通人中是少有响应的。就欧朴尔太太来说，季羨林就像她的亲生儿子，甚至比亲生儿子还要亲，因为对儿子不愿说的话，她都对季羨林说。

初到哥廷根之时，欧朴尔夫妇的儿子在达姆施塔特高级工科学学校读书，离哥廷根挺远。夫妇俩爱子如明珠，惦记着在外的儿子，有一段时间，老头每月购买一些面包和香肠，打包寄给儿子。老头腿脚不好，走路一瘸一拐，拿着手杖也挺吃力，可为了儿子，他不辞辛劳，月月去邮局寄一次。

老夫妇俩趁出去度假之时去看望他们的儿子。到了大学生宿舍，他们看到香肠和面包干瘪瘪地躺在桌子下面，发了霉，已不能食用。

回到家，欧朴尔太太絮絮叨叨地在季羨林面前诉苦，但是，老头明知儿子没吃寄去的东西，却还是照寄不误。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古今中外都相同。

后来，儿子结了婚，还是住在另外一个城市，有了一个小女儿。有时候，一家三口回来探望父母，儿媳妇人长得漂亮，衣着也摩登入时，但就是不讨婆婆的喜欢。就连小孙女，祖母也不喜欢。原来儿媳妇有点马大哈，事事都不在意。一天，女房东忽然拉季羨林到卫生间，指着马桶给季羨林看，是儿媳使用卫生纸过多，把马桶给堵塞了。老太太一边嘟念着，一边脸上还露出了许多怪物相，有愤怒，有轻蔑，有不满，也有憎怨。可这样的事，偏偏不敢对儿子讲，连丈夫也不敢讲，她心中的不平，在茫茫宇宙间，只有对季羨林一个人诉说了。

女房东不仅有不平，也有偏见，尤其是宗教偏见。她自己是基督教徒，对天主教怀有莫名其妙的仇恨，对天主教徒中的好人，也照样有偏见。有一个天主教老处女，每月要来欧朴尔太太这里洗一次衣

服，人很老实，但宗教信仰却很虔诚，每月的收入，除了少量维持生活以外，都捐赠给教堂。女房东虽然承认她忠诚得像“黄金”一样，但一提及她信仰的宗教，便难免有微词了。

在政治上，女房东比较迟钝，既不赞扬希特勒，也不懂去反对他。

经过十年相处，季羨林形成一个对女房东的总体印象：

我的女房东就是这样一个有不平、有偏见、有自己的与宇宙大局世界大局和国家大局无关的小忧愁小烦恼、有这样那样的特点的平平常常的人，但却是一个心地善良、厚道、不会玩弄任何花招的平常人。[36]

欧朴尔夫妇一生和睦相处，从来没拌过嘴，吵过架，丈夫饿死于战争之后，儿子大多在另一个城市住，不回家。结果，季羨林就成了她惟一的亲人了。

战争临近结束之时，日子更难了，食品缺，燃料也缺。哥廷根市政府只得让市民上山砍伐树木，代替燃料。但在林海中划出一片可砍伐地区，在区内，将树又逐一检查，可砍伐者画上红圈，砍伐了没有红圈的树，受罚是理所当然的事。女房东没有劳动力，季羨林则当仁不让，帮老太太上山砍树，再运回家来。

住在这样一个女房东的家里，季羨林从来没把她当成一个小业主看待，自己也从来不以租房者自居，而是把自己当做这个家庭中的一分子，把女房东当做母亲看待，他深情地说：

一想到我的母亲般的女房东，我就回忆联翩，在漫长的十年中，我们晨夕相处，从来没有任何矛盾，值得回忆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即使回忆困难时期的情景，这回忆也仍然是甜蜜的。[37]

离开德国回国以后，季羨林一直对女房东惦记在心。季羨林和女房东保持了几年的书信联系。他回到北京以后，费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弄到一罐咖啡，大喜若狂地连忙跑到邮局把邮包寄走，希望能越过千山万水，使这一罐咖啡能让老太太在孤苦伶仃的生活中获得一点

喜悦。因为季羨林知道，同千千万万德国人一样，她嗜咖啡如命。到1950年代以后，国内突出政治，“海外关系”成为十分危险的东西，季羨林没敢继续给她写信，从此便云天渺茫，互不相闻了。

女房东现在早已不在人世了。季羨林每每回首前尘，总是百感交集，他只有遥遥地祷祝老太太的在天之灵，永远安息。

2. 伊姆加德和她的家

老师们，女房东，都是季羨林在德国最亲近的人。然而，还有一位既不是老师，也不是房东，却也是最亲近的一个人，她就是伊姆加德小姐，她和她的一家，都与季羨林交往深厚。

伊姆加德小姐一家就住在欧朴尔太太的同一条街上，两家相距不远，她的父亲迈耶先生与欧朴尔先生几乎一样，老实巴交，不善言谈，所以很少说话。人多的时候，他总是呆坐在一边，一言不发，脸上则挂着憨厚的微笑，听着别人在天南海北地议论，职业也同欧朴尔先生一样，是个地位不高的小职员，天天忙着上班、工作。退休以后，便呆在家里，不与外人交际，也不大出去活动。季羨林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像他这样的人，一看就知道，决不会撒谎、骗人。

丈夫老实，不善交际，家庭中活跃的是迈耶夫人，她执掌大权，能说会道，善于应对进退，更擅长交际，她同欧朴尔太太年龄相仿，性格却不太一样，是一个乐天派。她总是忙忙碌碌，里里外外，连轴转地忙个不停。不管什么时候，她都是喜笑颜开，没有愁眉苦脸的时候，不像欧朴尔太太有那么多不平和偏见。她们的家庭更为和美。

在她们家里，也住有中国留学生。迈耶一家像欧朴尔一家一样，也善待这些中国人。迈耶太太为中国留学生做的事情，也同欧朴尔太太一样，房主与房客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摩擦，他们相处得非常好。这当然不仅是房主待留学生友好之故，也更有留学生素质比较高之原因，双方有一方不得体，就不会相处得好，这是常识。

当时，住在迈耶家里的中国留学生是田德望。季羨林去看田德望，认识了迈耶一家。田德望走后，又有别的中国留学生住进去。季羨林与他们也有些联系，一来两往，也与迈耶家熟起来。

迈耶夫妇有一对如花似玉的女儿，大女儿就是伊姆加德。

1940 年秋天，季羨林的毕业论文已近尾声，季羨林用德文写成的稿子，在送给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和西克教授审阅以前，必须用打字机打成清稿。而季羨林是既没有打字机，又没有学会打字，这就需要一个人帮忙。

正巧，迈耶家有一台打字机，伊姆加德小姐会打字，而且很愿意帮这个忙，因为博士论文的要求极高，需要屡次反复修改，打字量是很大的。

这样一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季羨林必须天天晚上到她家去，白天他没有时间，她也在上班，只有晚上才能安排打字。原本季羨林的稿子由她一人打字也就行了，但是原稿改动很多，而且改得太乱，论文内容又不是伊姆加德所熟悉的，简直如同天书一般，稀奇古怪，打字稍一不慎，就会出错。因此，她打字时，季羨林必须坐在她身旁，随时以备咨询，工作往往持续到深夜，结束后，季羨林再摸黑回家。

打完了这篇博士论文，季羨林和迈耶家的关系又加深了一层。

这之后，季羨林又写成了几篇学术论文，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造成了不小的轰动。而这些论文，也都是由伊姆加德小姐帮忙打出来的，所以，一直到 1945 年秋后，季羨林离开德国以前，都是伊姆加德家的常客。

关系熟了，她们家里一有什么喜庆日子，或者是招待客人吃点心、吃茶，季羨林则必定被邀参加，特别是在伊姆加德小姐生日的那一天，季羨林一定要去祝贺，成为她家的贵宾。一到这天，迈耶太太在安排宴席座位时，总是让季羨林坐在伊姆加德的旁边。

用不着为贤者讳，伊姆加德一家显然把季羨林当做她的挚友，而

伊姆加德小姐本人，已经爱上这位异国青年学者了。

所以，如果季羨林不是齐鲁之子，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清规戒律，没有浓厚的家庭观念，不时时想念着自己的贤妻彭德华女士和女儿婉如、儿子延宗；或者，如果是今天的时代，像今天这样开放、婚姻多变；那么季羨林很有可能会与伊姆加德结合。但是，事实不是这样。

季羨林不隐讳自己对这位异国女孩的好感，在离别德国前，他在日记里写下了对她的感情。1945年9月24日的日记写道：

吃过晚饭，七点半到 Meyer（迈耶）家去，同 Irmgard（伊姆加德）打字。她劝我不要离开德国。她今天晚上特别活泼可爱。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她，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像我这样一个人不配爱她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孩子。[38]

在启程回国离开哥廷根城的前四天，1945年10月2日，季羨林又在日记里写道：

回到家来，吃过午饭，校阅稿子。三点到 Meyer 家，把稿子打完。Irmgard 只是依依不舍，令我不知怎样好。[39]

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季羨林在写《留德十年》时，还不无深情地说：

日记是当时的真实记录，不是我今天的回想；是代表我当时的感情，不是今天的感情。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感情离开迈耶一家，离开伊姆加德的。到了瑞士，我同她通过几次信，回国以后，就断了音问。说我不想她，那不是真话。1983 年，我回到哥廷根时，曾打听过了她，当然是杳如黄鹤。如果她还留在人间的话，恐怕也将近古稀之年了。而今已垂垂老矣。世界上还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会太多，等到我不能想到她的时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没有了。[40]

实际上，早在 1980 年，季羨林第一次重返哥廷根时，坐在从汉堡到哥廷根的火车上，脑海里想到的，除了老师、女房东，还有“那个宛宛依依的女孩子伊尔穆嘉德（伊姆加德），也在我眼前活动起

来”。[41]

伊姆加德小姐，是永远活在季羨林心中的一个德国普通人。

季羨林的道德理念，切断了这桩有可能发展成恋情的异国情缘！

3. 反战者伯恩克一家

除老师、女房东、伊姆加德小姐之外，季羨林还有一个在政治上能够谈得来的同学，就是伯恩克小姐。

伯恩克小姐比季羨林要大几岁，主修斯拉夫语言学，于是也就成为冯·格林博士的学生，与季羨林则成了俄文班的同学了。

伯恩克小姐读的是本科生，而不是研究生。她是个高材生，通很多语言，在斯拉夫语系中，她就会俄文、捷克文和南斯拉夫文。她的主系就是斯拉夫语言学，但副系是什么，季羨林却无从问起。

他们俩人共同跟冯·格林学俄文，上俄文课也在高斯—韦伯楼里，是在二层楼的斯拉夫语言研究所，与梵文研究所同一层。认识了季羨林之后，伯恩克小姐有时就请他到家里去做客，吃顿饭，喝点茶啊什么的。季羨林还把中国留学生张维、陆士嘉夫妇介绍给她。

她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所以她们一家实际上只有母女二人，父亲早已去世，生前是一位待遇优厚的大学教授，属于德国的高薪阶层。借父亲的福荫，她们家的经济情况仍然相当好，母女二人住一层楼，家里摆设既富丽堂皇，又古色古香，是相当讲究的。

有的传闻说，伯恩克小姐的父亲是四分之一或六分之一血统的犹太人，但反正是越过了被希特勒屠杀或迫害的临界线，所以还能安然地住下去，但也正是因为有这一点瓜葛，使她们母女对希特勒抱有强烈的反感。而这种反感，她们就经常当着季羨林的面发泄出来，这样一来，他们便成了政治上的同盟者，起码在言论上是如此，为此，他们很谈得来。

有一次，伯恩克小姐请季羨林和张维、陆士嘉夫妇到她家去吃

饭。当时，食品奇缺，客人到别人家做客，往往要自带粮票，即使这样，主人请一次客，自己家里往往也要节省几天，才能勉强招待得像个样子。

伯恩克小姐的母亲中等身材，谈吐风雅，雍容大方，满面慈祥，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不愧是高薪教授的夫人。对欧洲的古典文化，老太太懂得很多，文学、艺术自不在话下，连音乐和绘画，谈起来也头头是道，娓娓动听，令听者怡情增兴，乐此不疲。但没想到教授夫人下厨房做起饭来，竟也毫不逊色，是个行家里手，伯恩克小姐，则只能在旁边端端盘子，洗一洗菜，当个下手。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可没想到老太太在物资供应短缺的情况下，却烹制出一桌颇为像样的饭菜来。

她简直像是玩魔术，变戏法。我们简直都成了神话中人，坐在桌旁，一恍惚，热气腾腾的美味佳肴已经整整齐齐地摆在桌子上，大家可以想象，我们这几个沦入饥饿地狱里的饿鬼，是如何地狼吞虎咽了。这一餐饭就成了我毕生难忘的一餐。[42]

然而，真正让季羨林兴奋的，还不是美味的饭菜，而是在政治上他们之间的沟通。他们开怀畅谈，一起痛骂希特勒等法西斯头子给德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所造成的巨大灾难。母女二人的犹太人瓜葛，就对希特勒的“劣等民族论”有一层仇恨，但她们更痛恨的是法西斯分子的倒行逆施，把世界人民推入战争的深渊。这些想法，在德国人面前自然只能埋藏在心底，决不敢随意吐露，否则，脑袋就保不住了，但在几个中国同道面前，中国人和犹太人都是进了希特勒的黑名单的，自然就成了志同道合的人。所以，有机会和中国人在一起，又是在自己家中，伯恩克小姐母女二人就能够无所顾忌地畅所欲言，竹筒倒豆子一般，一吐为快了。

而季羨林、张维和陆士嘉，则除了要忍受德国人普遍忍受的战争和饥饿的灾难以外，还更有家国之思，民族存亡之忧。他们的祖国在日本法西斯铁蹄之下，日本法西斯和德国法西斯完全是一丘之貉，家

人生死不知，情况不明，乡愁在无情地吞噬着他们的心。心的痛苦之外，又有身的痛苦，他们远处异域，无亲无故，生命又朝不保夕。英美盟国的飞机也时常来空袭哥廷根城，说不定什么时候一高兴下几个“炸蛋”，落到他们头上，则必将去见上帝或阎王爷。肚子里是饥肠辘辘，难耐的饥饿，生命又时时受到威胁，没有安全感。他们的精神是绝对不会愉快的，这是常情。

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到了伯恩克家里，我才能暂时忘忧，仿佛找到了一个沙漠绿洲，一个安全岛，一个桃花源，一个避秦乡。因此，我们往往不顾外面响起的空袭警报，尽兴畅谈，忘记了时间的流逝，一直谈到深夜，才蓦地想起，应该回家了。一走出大门，外面漆黑一团，寂静无声，抬眼四望，不见半缕灯光，宇宙间仿佛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一个人仿佛变成了我佛如来，承担人世间所有的灾难。

[43]

在家中，伯恩克小姐和季羨林他们侃侃而谈，但在外边，她的脾气却有点孤高。因此同她来往的人也非常少，母女俩几乎形影不离，感情极为深厚诚挚。

有一次，季羨林在山上林中散步，看到了她们母女俩。只见到她们母女二人并肩站定，母右女左，母左胳膊，女右胳膊，胳膊挽在一起，然后是同出左脚，就好像是演兵场上在训练女兵一样，在无形无声的口令之下，步伐整齐，丝毫不乱，俩人目光直视前方，脚下刷刷刷直响，用近乎竞走的速度走上前去，刷刷刷鞋底叩地的声音，转瞬就消逝在密林深处了。从中季羨林悟出一个道理，“散步”这两个字，看来只适用于中国人，这母女俩的散步，同中国人的悠闲自在，慢慢腾腾，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对她们俩的散步，季羨林始终百思不解，只好怪自己缘分太浅了。

伯恩克小姐有这样孤傲的脾气，所以虽然早已过了及笄之年，却从来没有见过她有男朋友与她来往，她自己似乎也不在意。

季羨林回国时，路过瑞士，曾给她们寄过一封信。回国后，从张维那里后来才知道，她终于嫁给一个瑞典人，母女俩都搬到北欧去了。母亲一直活到九十多岁才去世，伯恩克小姐则仍在瑞典。只是现在，生死不知了。

可以说反战的人们中，伯恩克小姐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

当然，另外也还有反战者。

季羨林认得的，就有两个。

其中一个是退休法官，岁数有七十左右了，这位法官是一个中国留学生先认识的，但季羨林他们几个人对这位留学生印象极差，因为他行动诡秘，来历也诡秘，怀疑他是蓝衣社之类的人物，因此是不大乐意和他来往的。蓝衣社成员的制服为蓝衣黄裤，原名为复兴社，是“中华民族复兴社”的简称，是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为加紧镇压抗日民主运动，于1932年以“复兴民族”为名，在国民党内成立的一种带有特务性质的派系组织，其核心是“力行社”，下设特务处，大特务戴笠为头子。1938年4月该组织取消，其成员转入“三青团”，“力行社”的特务处，则改组为“军统局”。这样一个中国留学生，却认识了一个反希特勒的法官，就有点古怪了。他的主子是崇拜希特勒的，而他却结识反希特勒的法官，从这一点来说，算是一个“不肖”之徒了。本来对法官也有疑问，后来发现他是个孤苦伶仃的老人，没有什么复杂的背景，希特勒的所作所为，他确实是激烈反对的。而且，他也只有与中国留学生在一起时，才敢说几句心里话，发泄发泄满腹的牢骚。这时候，一向表情严肃的老人，才有了一点乐趣。

另一个反希特勒的德国人，是医科大学的一个学生，是龙丕炎先认识的。这个人年纪轻轻，不过二十来岁，热情洋溢，精力充沛，黑头发，黑眉毛，处处透露出机警聪明。季羨林他们对他的家世不了解，对他反希特勒的背景也不了解，他们相信的是一条：

反对希魔同路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

有了这一条，他们便走到一起来了，有时候，到了星期天，他们便相约到山上林中去散步。双方的目的，都有点“醉翁之意不在酒”。季羡林回忆说：

记得有几次在春天，风和日丽，林泛新绿，鸟语花香，寂静无人。我们坐在长椅上，在骀荡的春风中，大骂希特勒，也确实是人生一乐。林深人稀，不怕有人偷听，每个人都敢于放言高论，胸中郁垒，一朝涤尽。此时，虽然身边眼前美景如画，我们都视而不见了。
[44]

在季羡林看来，德国人在政治上并不敏感，甚至有点迟钝，因此，除了伯恩克小姐母女二人，还认识了这样两位反战者，觉得也就很不错了，也就很满意了。

回到国内后，季羡林还经常想到他们。不过，人世变幻，盛会难再，季羡林回忆着往事，山上林中的场面一幕幕再现出来，但人再也见不到，他不禁感到惘然了。

4. 蘑菇山洞与转折中的众生相

对于德国普通人，季羡林的印象随着德国人的情绪变化而有所变化。在希特勒上台初期，德国人受法西斯头子的蛊惑，也有点忘乎所以的样子，把自己的前途看成一条阳关大道，只有玫瑰，没有荆棘。战争开始了，他们随着统治机器的“特别报道”和一连串的“胜利”，自己的情绪也昂扬奋发，有时候甚至高兴得手舞足蹈。听到一些前线不利的消息，则低沉抑郁。到了战争后期，盟军从东西两面压境，他们这才感到情况不妙了。季羡林亲眼目睹了处在天翻地覆转折中的众生相。

这是一个种蘑菇的山洞。在战争后期，为了躲避盟军飞机的轰炸，德国人就暂时把它当做防空洞了。

1945年4月5日、7日、8日，这三天，季羨林和几个中国留学生也到这里来躲空袭。

4月5日晚间，季羨林到了蘑菇山洞，德国人都入睡了，而季羨林怎么也睡不着，里面又潮又冷，坐着又无依无靠。过了很久，响起了空袭解除的警报，但德国人都不离开，季羨林也只好陪着，腿冻得像冰。那时真是思绪万端，啼笑皆非，一有警笛或大的响声，人们就胡猜起来。一直等到6日清晨四点，他终于忍耐不住，回到家里。

季羨林倒下就睡，醒来已经九点了，正要吃早点，又听到大轰炸机的声音，接着是“前警报”、“警报”声连成一片，季羨林又回到蘑菇山洞。德国人也都抢着往里挤，飞机声震得满山颤动。季羨林刚进山洞的门，哥廷根城就是一片爆炸声，山洞仿佛也被震动了，连木头椅子都强烈地抖动起来。德国人有的跪在地上，有的竟哭了起来。

4月6日十一点，季羨林惦记着厨房里煮着的热水，一个人赶回家，不久响起了“前解除警报”。这才吃完了刚才没能吃的早点，生好了炉子。刚躺下，又一次“前警报”，接着是“警报”，下午五点，又到山洞外站了一会儿，警报解除，又回家。

就这样，蘑菇山洞里老是有人进进出出，老是挤满了人。

4月7日，人们仍在山洞里躲避，这一天，飞机来得勤。天空里成排的飞机，一批批炸弹往哥廷根城里扔下去。静下来以后，人们走出山洞，看到哥廷根西城车站一片大火，浓烟直升入天空。装弹药的车被击中，大火里子弹声爆成了一片，汽油车也被击中，大火烧得更猛了。晚上八点，回家吃过晚饭，人们心里还是不安，一个个像热锅上的蚂蚁，结果还是带了东西去山洞躲避。

到4月8日，早饭以后，远处炮声响得厉害，蘑菇山洞里已经乱成一团。消息多起来了，有的说，德国军队要守哥廷根城，有的说，全城准备投降。蓦地，城里响起了五分钟长的警笛，告诉人们盟军已经进城了。山洞前面，有被打散的德国军人在仓皇地奔跑着。很久以后，外面静下来，胆大一点的人出去看，美国坦克车已经开到了。

山洞里更乱了，都害怕美国兵开枪，谁都不敢走出山洞。最后，还是季羨林同一位德国太太走出去，找到一个美国兵，告诉他山洞里的实情。德国人这才陆续出来。而季羨林心里很高兴，自己也不能制止自己了，就跑到一辆坦克前面，忘记了这是战争状态，忘记了炮口正对着他，竟同一个美国大兵聊起来。

回到家，已是下午三点，张维、陆士嘉夫妇带着孩子来了，原来他们房东的房子被美国兵占据了。他们几个人坐在一起，谈论着。心里乱成一团，又快乐，又兴奋。吃过晚饭，同张维又聊，一直到夜深才睡。

季羨林从这几天蘑菇山洞的一个点，看到了整个德国的情况，这个蘑菇山洞的小点，放大了来看，就是整个德国普通人处在大转折中的众生相。

季羨林写道：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极大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哥廷根——我相信，德国其他地方也一样——在历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法西斯彻底完蛋了。他们横行霸道，倒行逆施，气焰万丈，不可一世，而今安在哉！德国普通老百姓对此反应不像我想得那样剧烈。他们很少谈论这个问题。他们好像是当头挨了一棒；似乎清楚，又似乎糊涂；似乎有所反思，又似乎没有；似乎有点在乎，又似乎根本不在乎。给我的总印象是茫然，木然，懵然，默然。一个极端有天才的民族，就这样在一夜之间糊里糊涂地，莫名其妙地沦为战败国，成了任人宰割的民族。不管德国人自己怎样想，我作为一个在德国住了十年对德国人民怀有深厚感情的外国人真有点欲哭无泪了。[45]

对于季羨林个人来说，这样一场人类历史上迄今最为残酷的战争，本来觉得该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但是没有想到竟这样平平淡淡地开始，又平平淡淡地结束。当然，他是战争的局外人，但他深知，战败对于德国人来说，却绝非平平淡淡，有一部分德国人难免会有切肤之痛。

回想从 1935 年到达德国之日起，一直到 1945 年二次大战结束，整整十年间，季羨林几乎与德国人朝夕相处，所以他对德国人的了解是非常深刻的。和德国人十年的接触，季羨林形成了这样的总体印象：

德国人民怎么样呢？经过我十年的观察与感受，我觉得，德国人不愧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民之一，文化昌明，科学技术处于世界前列，大文学家、大哲学家、大音乐家、大科学家，近代哪一个民族也比不上。而且为人正直，淳朴，个个都是老实巴交的样子。在政治上，他们却是比较单纯的。真心拥护希特勒者占大多数。令我大惑不解的是，希特勒极端诬蔑中国人，视为文明的破坏者。按理论，我在德国应当遇到很多麻烦，然而，实际上我却一点麻烦也没有遇到。听说，在美国，中国人很难打入美国人社会。可我在德国，自始至终就在德国人社会之中，我就住在德国人家中，我的德国老师，我的德国同学，我的德国同事，我的德国朋友，从来待我如自己人，没有丝毫歧视。这一点让我终生难忘。[46]

十年了，季羨林似乎已经成了德国人的一分子，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现在，战争已经结束，自己就要回归家园了，一想起老师、房东、同学、朋友，真感到依依难舍。

但决心已下，季羨林还是要回国！

第六章 重归故土

一、尝试回国

1. 邂逅中国青田商人

在哥廷根留学的中国人很少，有一段时间甚至只有季羨林一个

人。一个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置身于日耳曼人的汪洋大海之中，满眼看到的都是蓝眼睛白皮肤的德国人，季羨林有时候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也是白皮肤的德国人，忘记了自己是黄皮肤的了。

由于战争的缘故，德国的几个大城市被盟国飞机轰炸得很厉害。在这几个大城市留学的中国人，已无藏身之地，于是有些人便到哥廷根来避难。

来避难的中国留学生，各人所学科目不同，兴趣爱好也不同。其中几位是学理科的，有姓黄的兄弟俩，是江西老俵，学物理，还有姓程的兄弟俩，是四川人，学自然科学，另外有一个姓张的神秘人物。这些人各有各的主意，各有各的想法，深不可测，季羨林对他们也无需过问，间或也有一聚之时，但都很短。

在这些留学生中，季羨林交的朋友是张维、陆士嘉夫妇，刘先志、滕菀君夫妇。他们之间最要好、最合得来，来往也最多。张维、陆士嘉后来回国之后，也都成了大名。张维是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先志是山东工业大学教授，全国人大代表。当时他们的夫人都是去德国陪读的。

除了这些中国留学生，季羨林还在德国认识了一批中国青田商人。

这些浙江青田商人被迫外出逃荒，青田这个地方养不活这里的人。为了求得一条生路，他们不知经过多少磨难，吃过多少苦头，行程数万里，历经数个国家，有的是横穿中国大地，经中亚，走到西亚，然后又转入欧洲。有的是走海路，但没有钱买船票，就让商人把自己锁在货仓里，用小恩小惠买通有关人员，让他们在大海中航行时，在夜里偷偷打开货仓，送点水，送点饭，方便方便，再锁起来。据说有的人便死在货仓里，到了什么地方登岸时，打开货仓，里边的人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

能够到达欧洲的人，便成了幸存者，为了糊口，他们沿街叫卖一些小东西，如领带之类。领带本是欧洲厂家的产品，商标上是明写着

的，他们却诡称是中国丝绸制成的。就这样，他们靠着祖先在丝绸业方面的威名，捣鼓这些小玩意糊口度日。

他们一无护照，二无人保护，转徙欧洲各国，弄到什么护照，就叫护照上写的名字。所以他们往往是今天姓张，明天姓王，居无定处，行无定名。这护照是世袭的，一个人走了或者死了，另一个人就继承。在欧洲穿越国境时，也不走海关，随便找一个小路穿过，据说也有被边防兵开枪打死的，这样辛辛苦苦，积攒下一点钱，想方设法，带回青田老家。这些人誓死不忘故国，在欧洲同吉卜赛人并驾齐驱。[1]

这些青田商人，不是住在哥廷根，所以起初季羨林并不认识他们，只是常听到别人议论他们。

纯属一个偶然的机，季羨林邂逅了这批特殊的中国商人。

一天，季羨林突然接到一个来自另外一座城市卡塞尔市地方法院的一个命令，让他在指定时间内到该法院出庭当翻译，付翻译费 50 马克，如果不去，要罚款 100 马克。这件事让季羨林感到啼笑皆非，但他知道，德国人是很认真的，以法律为准绳，所以不能抗拒，只有奉命前往。

到了法庭，才知道被告原来是中国青田商人。

青田人多不会讲中国普通话，法庭审判需要靠“重译”。被告既不通德语，也不会说中国普通话，而只会说青田话，这就需要从他们的老乡中选出一位讲普通话稍好一点的，把青田话翻成普通话，再由季羨林翻译成德语，这样审问才得以顺利进行。

经过审问，才知道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原来是这位被告沿街叫卖，违反了德国的规定。货色、价钱也不真实，做了一点手脚，结果几个爱管闲事的德国太太向法院起诉。原先有好几个，她们出庭作证，明确说出被告的所谓“犯罪”事实，包括时间、地点，都明确无误。

但是，被告据“利”力争，矢口否认。他振振有词地说，在德国

人眼里，中国人长得都是一个模样，根本分不清谁是谁，有什么证据硬说这件事一定是他干的呢？这显然是对被告最有利的理由，他便据“利”力争，结果真奏效，几个法官大眼瞪小眼，确实也分不清中国人的模样，反正都是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哪里能分清哪是张，哪是王？法官们无词以对，闲扯了几句，便宣布退庭。此案终于完事大吉。

事后，一位警察对季羨林说，你们这些老乡，真让人伤脑筋，我们拿他们毫无办法，我们也只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也没有多大的了不起的事，只要没有人来告，就听之任之了。季羨林则回应这位警察：如果两只眼睛都闭上，可能效果会更好。警察听了这么幽默的话，大笑不已，同季羨林友好地握手告别。

可这群青田商人，却把季羨林簇拥着到了他们的住处，他们要感谢这位为被告当翻译的中国同乡。

他们来到一间大房子里，七八个青田商人的住处。房子里搭的是地铺，没有什么别的设备，卫生条件自然是谈不上的。他们的生活异常简陋，中国留学生大多都瞧不起他们。而他们的活动是在自己这一个圈子里，对大使馆，他们视之为衙门，除非万不得已，决不与使馆人员沾边。

现在，他们忽然得到季羨林这样一位留学生和大学讲师的帮助，又能够光临他们的陋室，自然万分高兴，季羨林很受感动。

他们简直像捧到一个金凤凰，热情招待我吃饭，我推辞了几次，想走，但是为他们的热情感动，只好留下。他们拿出了面包和酒，还有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猪蹄子，用中国办法煨得稀烂，香气四溢。我已经几个月不知肉味了，开怀饱餐了一顿。他们绝口不谈法庭上的事，我偶一问到，他们说，这都是家常便饭，小事一端，同他们德国人还能说实话吗？我听了，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这一批青田商人背乡离井，在异域奔波，不知道有多少危险，有多少困难，辛辛苦苦弄点钱寄回家去。不少人客死异乡，即使幸存下来，也是十年八年甚至几十

年回不了家。他们基本上都不识字，我没有办法同他们交流感情。看了他们木然又欣然的情景，我直想流泪。[2]

这次邂逅青田商人，真如萍水相逢。季羨林回到哥廷根之后，还经常收到他们寄来的东西。有一次是寄了五十条领带，季羨林自己用不了，便分送给师友们。又一次，是寄来了一大桶中国豆腐。豆腐对欧洲人是极为新奇的东西，喜欢吃的人以为是天下之绝，但这样的人在德国极少。陌生者则以为豆腐是稀奇古怪的东西，不敢轻易去吃。而且在德国，当时只有汉堡的华人能做豆腐，其他地方知豆腐之美名的，可说是少得可怜。因此这一大桶豆腐落到季羨林手里，真让他犯了难，他不光是不会烹调，而且即使是会烹调，一个人也吃不了这一大桶豆腐，送给德国人，要作长篇大论的宣传鼓动工作，否则他们是不肯吃，也不敢吃的。

这样几次折腾，季羨林对这些淳朴善良但又有点天真幼稚的青田朋友，有了更多的了解，除了同情他们的遭遇，怜悯他们的处境，对这些流落异域的受苦受难的炎黄子孙，充满了胞波情谊。在决心离开德国之时，虽然有那么多老师好友值得季羨林去回忆，记忆里塞满了形形色色亲朋好友的影像，很难再容下别的什么，然而却偏偏要想到这些始终不知姓名的中国青田商人。

季羨林，从来都是一个平凡的人。即使获得博士学位，成为洋博士和德国的大学讲师，也没有把自己看得高于普通中国人，而是他们中的一员，这样的心态从这时起，一直保持到成为兼容百家、学贯中外的学界泰斗。

2. 去汉诺威办签证失败

季羨林同张维、陆士嘉夫妇及刘先志、滕菀君夫妇商议，决定先到瑞士，从那里取道回国。这是当时惟一能回国的通路，因为那里有国民党政府的公使馆，而德国是只承认日伪汪记政府的。战后，国民

党驻德公使馆并没有也不可能立即恢复。

于是，季羨林就与张维到处打听去瑞士的办法。几经周折，他们终于得知在哥廷根城有一家瑞士人，他们连忙专程去拜访。这一家的主人是一位家庭主妇模样的中年妇女，她和气地告诉他们，入境签证她帮不了忙，要办，只能到汉诺威的瑞士驻德国代办处。

张维和季羨林俩人接着搭乘长途汽车，经过一百多公里的颠簸，来到哥廷根所在地区的首府汉诺威。

汉诺威是一个有名的历史古城，也是离哥廷根最近的一个大城市。这个城市在公元 1100 年时有了正式的历史记载，1241 年设市，1815 年成为汉诺威王国的首都，因为濒临莱纳河和米特兰尔运河，自然风景非常优美。古建筑包括旧市政厅、歌剧院、市政教堂和博物馆，哲学家莱布尼茨的故居也在这里，1831 年创建了汉诺威大学，另外还有兽医专科学校等其他高等院校。

对这样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季羨林久仰大名，只是无缘到此。这次因为办签证来到这里，使他大吃一惊：

这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城里面光留下一个空架子，几乎没有什么居民。大街两旁全是被轰炸过的高楼大厦，但只剩下几堵墙。沿墙的地下室窗口旁，摆满上坟用的花圈，据说被埋在地下室里的人成千上万。当时轰炸后，还能听到里面的求救声，但没法挖开地下室救他们，声音日渐微弱，终于无声地死在里边。现在停战了，还是无法挖开地下室，抬出尸体。家人上坟就只好把花圈摆在窗外。这种景象实在让人毛骨悚然。[3]

我们来到汉诺威看到的就是这些花圈，这种景象在哥廷根是看不到的。最初我是大惑不解。了解了原因以后，我又感到十分吃惊，感到可怕，感到悲哀。据说地窖里的老鼠，由于饱餐人肉，营养过分丰富，长到一尺多。德国这样一个优秀伟大的民族，竟落到这个下场，我心里酸甜苦辣，万感交集，真想到什么地方去痛哭一场。[4]

整个汉诺威完全不像个城市了。有时候，从远处看，好像是高楼

林立，而走近一看，却只见一片废墟。到处是断壁残垣，简直就像是古罗马的斗兽场遗址。马路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弹坑，还没来得及修复，汽车避开弹坑小心翼翼地行驶。

季羨林和张维只得在这些废墟之中寻找，因为虽然经过“铺地毯”式的狂轰滥炸，仍有个别漏网之鱼，也有一点铺不上“地毯”的空隙。空隙中可能就有个把座幸存的大楼，里边还有几间房子，可以勉强办公，有一些在城里无房可住的人，晚上住在城外乡镇中的临时住处，白天就进城去办公。瑞士驻汉诺威代办处，据说就在这样的一些空隙中的一座大楼内，他们要找的就是这座大楼。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穿过无数的断壁残垣，终于找到了瑞士驻汉诺威代办处。

进了代办处，季羨林和张维碰了一鼻子灰，代办处的办事人员对他们说，因为他们没有收到瑞士方面的正式邀请和批准，因此无法给他们签发进入瑞士的入境签证。季羨林和张维好说歹说也不能说服他，他们只能白跑一趟，悻悻地返回哥廷根。

但是，对于季羨林来说，汉诺威之行他不但不后悔，反而还有点高兴，他在庆幸自己，在无意中得到这样一个机会，去亲眼看一看盟军轰炸之后的德国实况。如果不知道真正的轰炸，反而会抱憾终生了。

经过这一次实地观察，季羨林有了亲身感受，他用旧瓶装新瓶的办法，用左太冲的《蜀都赋》和鲍明远的《芜城赋》中的两段，分别来形容轰炸前后的德国城市，轰炸前是《蜀都赋》所说：

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袿服靓妆。贾贸鬻鬻，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5]

而轰炸后是《芜城赋》所说：

观基扃之固护，将万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余载，竟瓜剖而豆分！泽葵依井，荒葛冒途。坛罗虺蜮，阶斗麀麀。……通池既已

夷，峻隅又已颓。直视千里外，唯见起黄埃。凝思寂听，心伤已摧。

[6]

从1935年到达德国，看到的是一个和平的德国。而一个好端端的德国，在希特勒上台之后，一步步把德国人民推入战争的深渊，德国已经是满目疮痍，不光是德国人“凝神寂听，心伤已摧”，就是季羨林作为一个外国人，目睹了这十年的沧海桑田，心里会是什么滋味也概可想见了。

值得庆幸的是，战争终于结束了，而季羨林则终于有可能回国了。

3. 依依惜别情

汉诺威之行没有办成签证，并没有动摇季羨林和张维、刘先志等人的回国决心。无论如何，他们也不能再在德国呆下去了。季羨林仿佛看到自己的故乡，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国家，在向自己招手了，故乡在欢迎游子回归。

回国还是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走瑞士，先坐汽车到瑞士边境，在边境设法与国民党驻瑞士使馆取得联系，获得入境的许可。

由于战争的破坏，德国的公路交通运输完全中断，所以要想去瑞士，只能靠自己解决交通工具。

可是，几个中国人哪儿去找车呢？

季羨林和张维又想到了“盟军”。当时，美国还有一部分驻军留在哥廷根，而市政府管理的大权则已移交给英国政府。于是，他们决定去找英国人管理的市政府，英军上尉沃特金斯接待了他们，非常客气地答应帮忙，提供一辆吉普车，并配备一名司机。

具备了回国的物质条件，季羨林一方面整理回国的东西，一方面向师友们告别。

而一旦真要离开这个生活了十年的地方，离情别绪立刻袭上季羨

林的心头。这段时间，仅次于当时在济南住的十多年，比在故乡临清的六年和在北京的四年都要长。面对着即将要离开的可爱的哥廷根，每一座建筑，每一条街道，甚至于山下路边的一草一木，似乎都在挽留季羨林继续留下来，似乎用无言的情愫在诉说着它们和他共同度过的近四千个日日夜夜。

我本来就喜欢它们的，现在一旦要离别，更觉得它们可亲可爱了。哥廷根是个小城，全城每一个角落似乎都留下了我的足迹，我仿佛踩过每粒石头子，不知道有多少商店我曾出出进进过，看到街上的每一个人都似曾相识。古城墙上高大的橡树、席勒草坪中芊绵的绿草、俾斯麦塔高耸入云的尖顶、大森林中惊逃的小鹿、初春从雪中探头出来的雪钟、晚秋群山顶上斑斓的红叶，等等，这许许多多纷然杂陈的东西，无不牵动我的情思。至于那一所古老的大学和我那一些尊敬的老师，更让我觉得难舍难分。最后但不是最小，还有我的女房东，现在也只得分手了。十年相处，多少风晨月夕，多少难以忘怀的往事，“当时只道是寻常”，现在却是可想而不可即，非常非常不寻常了。[7]

中国人是最重情的民族，自古已然。情在风雨雷霆之中，在日月三光之中，在诗书万卷之中，在庭园花木之中，在河川大地之中，在崇山峻岭之中，在茂林修竹之中，在丝竹管弦之中；以至道家之言，禅林之慧，儒家之道，也都无处不体现着情。

中国人常说，人非木石，安能无心？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中国人不大理解西方有些思想家的观念。比方说，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动物；尼采说，人是本能的动物；罗曼·罗兰说，人有时是狼，有时是狗，有时是羊；托尔斯泰说，人是不可理解的创造物。中国人反对人是动物的观点，而主张人是万物之灵。灵之表现之一，就是人情之存在。

《礼记·礼运》篇说：“何谓人情？喜、怒、哀、乐、爱、恶、欲，七者不学而能。”后来，中国哲人相沿成习，把这七种感情叫做

情，实际上是把由人的社会需要而产生的心理体验叫做情。

有人说，人情翻覆似波澜；也有人说，人情似飞絮，悠扬便逐春风去；也有人说，情之溺人也甚于水，只有圣人才能驾驭它，所以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而此时季羨林面对的难题，是如何解决这依依惜别情。

对这一难以割舍的离别情，季羨林无论如何要把它了断。他开始了复杂的思想斗争，以割断这留恋之情：

中国古代俗语说：千里凉棚，没有不散的筵席。人的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当年佛祖规定，浮屠不三宿桑下。害怕和尚在一棵桑树下连连住三宿，就会产生留恋之情。这对和尚的修行不利。我在哥廷根住了不是三宿，而是三宿的一千二百倍。留恋之情，焉能免掉？好在我是一个俗人，从来也没有想当和尚，不想修仙学道，不想涅槃，西天无分，东土有根。留恋就让它留恋吧！但是留恋毕竟是有限期的。我是一个有国有家有父母有妻子的人，是我要走的时候了。[8]

季羨林要回国了，离别时那难忘而动人的一幕终于出现了。

我辞别德国师友时，心里十分痛苦，特别是西克教授，我看到这位耄耋老人面色凄楚，双手发颤，我们都知道，这是最后一面了，我连头也不敢回，眼里流满了热泪，我的女房东对我放声大哭，她儿子在外地，丈夫已死，我这一走，房子里空空洞洞，只剩下她一个人。几年来她实际上是同我相依为命，而今以后，日子可怎样过呀！[9]

10月6日这一天终于到了，来了一辆吉普车，司机是一位法国人，还有一位美军少校要陪他们去瑞士。原来，美国官兵只有在服役一定期限以后，才有权利到瑞士去逛，去瑞士的机会在平常极不容易得到，所以他一听说有这样一个机会，就决不放弃，愿意借此机会去游一游瑞士。于是同行的人中就多了一个美国少校。

经过一些紧张激动的场面，终于将吉普车安顿好。要乘吉普车的一共有六个中国人，他们是季羨林，张维、陆士嘉夫妇和孩子，刘先志、滕菀君夫妇。

面对送别的女房东，季羡林头也不敢回，含着热泪登上了美国吉普车。

吉普车开动了，立即驶上了高速公路。季羡林回头看了哥廷根一眼，忽然想起了唐代诗人刘皂的《旅次朔方》：

客舍并州数十霜，

归心日夜忆咸阳。

无端又度桑乾水，

却望并州是故乡！

心里马上有了灵感，套用它想成了表达自己离别之情的一首诗：

留学德国已十霜，

归心日夜忆旧邦。

无端越境入瑞士，

客树回望成故乡。[10]

二、滞留欧洲

1. 揖别哥廷根和德国

美国吉普车在德国国家高速公路上快速地行驶着。一开始，哥廷根城的烟树还入目清新，但是，吉普车越开越快，哥廷根城终于变成一团模糊的阴影，最后完全消失了。

眼看着高速公路两旁的青山绿水，季羡林的注意力被吸引过去，离情别绪暂时得到了缓解。

10月正是德国的金秋时节，到处都是茂密的绿树，虽有六年的战火，但山林树木却并没有受到多少损失，还是那样的蓊郁茂盛。秋林的景色，斑斓繁复，随着汽车的行进，在季羡林的面前一闪而过，他的心依然激动不已，信口吟出了两句诗：

无情最是原上树，

依旧虹霞染霜天。

哥廷根到法兰克福，从中午一直行驶到傍晚。季羨林一行就在这里住宿，这是全德美军总部的所在地，食宿条件都非常便利。

他们住到一家叫四季旅馆——专门为美国军官预备的旅馆。旅馆从经理到普通服务人员，都非常和气，服务也极为周到，专门为他们八个人安排了一顿丰盛的晚餐，这是季羨林几年不曾吃过的，因此大快朵颐。季羨林和其他中国留学生身无分文，德国货币已经作废，而美国钞票又没有，受到这样的优待，从内心感到由衷地感激。

吃过饭，一行人开始休息，旅馆里吵吵嚷嚷，一点也不安静。美国人的好动成性，在这里照样表现出来。而季羨林他们，经过了从中午开始的长途颠簸，已经疲劳不堪，又吃了一顿难得的饱饭，度过了一个非常舒适的夜晚。

1945年10月7日，一大早，他们打点完毕，于八点多开车出发。吉普车沿着国家公路向南行驶，沿途既没经过多少城市，甚至连乡村也难得看到，因为汽车公路大半取直线之故。

汽车驶入曼海姆市以后，在市里陷入了迷魂阵，绕了半天弯子，好不容易才开出城去。这座德国西南的城市，同样没躲过战火的袭击，城里也只剩了断瓦残垣。出城之后没过多久，汽车又驶近了海得尔堡，但并没有进城，只是从旁边绕过，因此没能看到城里的状况，只看到远处的一大片青山。

汽车再往南行驶，进入法国占领区。这里的明显特点是汽车渐渐减少，名为法国占领区，但法国部队里的法国人很少，而大多数是黑人，甚至也有黄种人。黄昏时分，终于到达德瑞边境，顺利地通过了法国检查处。

季羨林以为不会再有麻烦，可以一帆风顺地进入瑞士了。但是，到了瑞士边境，瑞士边防军不让他们入境，因为他们并没有办理入瑞士的签证。几经交涉，瑞士方面仍然态度坚决。没有办法，他们一行人只得退回到德国的小城勒腊赫，在这里住进一家专为法国军官预备

的旅馆里。

本以为会一帆风顺，但想不到在边境受阻，搁了浅。他们进退两难，心里焦躁不安，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得住下再说。

10月8日早晨，季羨林一行又回到瑞士边境。他们没有别的选择，没有退路，要想回国只能横下一条心，无论如何也得闯过这道难关。因此，他们决定以破釜沉舟的态度，背水一战。想了各种办法，都不妥当。最后，季羨林忽然想起了自己在济南上学时的初中同学张天麟，他是正谊中学的毕业生，此时正在国民党政府驻瑞士使馆工作。于是，季羨林就在瑞士边境与张天麟和中国驻瑞士使馆通了电话，结果算是顺利，也是季羨林他们走运。经中国驻瑞士使馆的交涉，瑞士方面来了通知，允许他们入境。

季羨林他们喜出望外，但接着又来了一点小麻烦，陪送中国人的美国少校和法国司机，不能进入瑞士。他们无能为力，一点也帮不上忙。两天多陪送他们，美国少校和法国司机都尽了很大力，现在却不能一块进入瑞士，季羨林觉得真是对不起他俩，只有抱歉。作为答谢，季羨林他们把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些中国小玩意儿分送给他俩，以作纪念。

就这样，季羨林挥别了哥廷根，告别了德国，进入了瑞士，从而完成了漫漫归国途中的第一站旅程。

2. 瑞士弗里堡暂住

季羨林在济南南城根一师附小读小学的时候，在学校小图书室里看过许多属于儿童世界的作品，其中有大量的插图和照片。这些作品，曾鼓动了当时幼稚的幻想，把他带到动物的世界里，植物的世界里，月的国，虹的国里去翱翔，不止一次地，他在幻想里，看到长着金色翅膀的天使，在一团金色的光里飞舞。终于自己也仿佛加入到里面去，一直忘记了哪是天使，哪是自己，而这些天使就这样一直陪

他到梦里去。[11]

这些照片和图画中，有许多是属于瑞士风景的。看了这些照片和图画，季羨林大为吃惊，因为那样的湖光山色，颜色奇丽，青紫相间，斑斓如画，宛如阆苑仙境。他总怀疑，这些作品都是出自艺术家的创造，出自他们的幻想，认为世间根本不可能有这样匪夷所思奇丽如幻的自然风光。[12]

现在季羨林亲身来到了瑞士。虽然起初只能坐在火车上，凭窗观赏外面的风景，但就这样也够让他大吃一惊的了。他亲眼看到的瑞士自然风光，其美妙，其神奇，其变幻莫测，其引人遐思，远远超过了他小时候看到的照片或者图画，也非自己言语能表达：

远山如黛，山巅积雪如银，倒映湖中，又氤氲成一团紫气，再衬托上湖畔的浓碧，形成了一种神奇的仙境。我学了半辈子语言，说了半辈子话，读了半辈子中西名著，然而，到了今天，我学的语言，我说的话，我读的名著，哪一个也帮不了我，我要用嘴描绘眼前的美景，我说不出；我要用笔写出眼前的美景，我写不出。最后，万不得已，我只能乞灵于《世说新语》中的人物，徒唤“奈何”了。我现在完全领悟到，这绝非出自艺术家的创造，出自他们的幻想。不但如此，我只能说，他们的创造远远不够，他们的幻想也远远不足。中国古诗说：“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瑞士山水的意态又岂是人世间凡人艺术家所能表现出的呢！我现在完全不怪那些艺术家了。[13]

瑞士毕竟是个小国，国土面积不大。从边境登上火车，一边欣赏着湖光山色，一边闲聊着，不知不觉地就到了首都伯尔尼。

路途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季羨林因为在德国时挨饿挨怕了，所以在离开哥廷根时，带了几块黑面包，以备路上不时之需。然而在德国境内时，有美国人和法国人接待，面包并没有用上，而到了瑞士，黑面包的历史使命便彻底完成，再也无用武之地了。于是，季羨林想用中国的办法，从车窗里把面包扔出去，让瑞士的蚂蚁去会餐。但铁

轨两边竟然看不到一个有点垃圾，或者有点不洁净的地方，以便为黑面包寻一个归宿之地。他找呀，看呀，看呀，找呀，从瑞士边境，一直到伯尔尼，却始终没找到一片哪怕是有一点垃圾或有点纸片的地方。不得已，他只得手里攥着那块黑面包，下了火车。

季羨林的初中老同学张天麟和牛西园夫妇，带着他们的小儿子张文，还有使馆里的几个人，前来车站迎接他们一行。他们到张天麟家里，略微休息了一会儿，就赶到中国驻瑞士公使馆去报到。时间是1945年10月9日。

公使馆政务参赞王家鸿，负责接待季羨林他们。王家鸿是留德博士出身。和德国来的留学生谈话也比较融洽、投机。这位博士把10月份国民党政府的救济费发给他们，还与他们谈了一些国内的情况。谈话中，季羨林发现，在他身上有一种和哥廷根姓张的那位留学生一样的“蓝衣社”气味。瑞士公使馆已经接到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指令，让他们竭尽全力，救济因二战而沦落或滞留在欧洲的留学生。司马昭之心，季羨林心里自然清楚。但是，使馆为了省钱，让他们到伯尔尼西南不远的一个小城去，住天主教开设的一家公寓。他们觉得能有个地方住，也就心满意足了，所以也都没有异议。

在使馆没停留多久，季羨林一行在当天晚上，乘车来到小城弗里堡。

没想到，在这里从1945年10月9日，一住就住到1946年2月2日，将近四个月。

在这里，季羨林结交了不少新的学者朋友，而且还同公使开展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斗争。

3. 弗里堡的外国新朋友

弗里堡是一个离伯尔尼只有几十公里的小城，人口只有几万人。瑞士本是个山国，小城也是个山城，城里还算平坦，四周就都是山

了。有的桥就修在两个悬崖之间，往往是用铁索桥把两个悬崖连接起来，汽车和行人都从上面通过。行人在铁索桥上走动，桥就摇摇晃晃的，汽车过桥时，全桥都震动起来，简直有地动山摇之势。在桥上走时，往下看心惊胆颤，有如从飞机上往下看的感觉，令人头昏目眩。

季羨林和张维等人被安排在天主教办的圣·朱斯坦公寓里。在他们来这里之前，已有四个中国留学生住在里边了，其中有一个已经当了天主教神甫，其他还有信天主教的。这几个人到车站，把季羨林他们接进了公寓。

本来以为在这里临时住几天就走的，没想到在公寓一住又是几个月，当了几个月天主教公寓的“寓公”。

公寓里的人员和整个瑞士一样，表现出多语言、多民族的现象。老板是讲法语的沙里爱神甫，而管理员则是讲德语的奥地利神甫。管理员个子高高的，说话挺幽默。一见面，就对季羨林说：“年幼长身体的时候，偶一不小心，忘记了停止长，所以就长得这么高。”

住在这样一个天主教办的公寓里，生活往往带有神秘的宗教色彩。每餐饭前，必要祈祷。季羨林不是教徒，但也只能肃立在旁，看着教徒们站在餐桌前，口中念念有词地祈祷上帝普降之福。等他们祈祷完，这才能坐下来狼吞虎咽，大嚼一顿。

在这里，季羨林对天主教有了一些了解。神甫有很大的个人自由，除了明令不允许结婚外，其他人间的饮食娱乐，都可以尽情享受。许多天主教寺院都能酿造出上好的葡萄酒，神甫们可以随便喝。但对修女的要求，则相当严格，颇多限制，行动没有那么自由，禁欲主义是她们必须严格奉行的。

季羨林到弗里堡的第二天，是10月10日。他们应邀返回伯尔尼，参加晚上在使馆举行的所谓双十节宴会。来自欧洲许多国家的留学生都到了，济济一堂，大有“八方风雨会中州”之势。宴会上精美的饭菜多得很，但在饥饿地狱里呆久了已经失掉饱的感觉，人们说饿久的人，不能暴吃，否则会撑死的。季羨林只得随时警惕，不敢畅所

欲吃。

这之后，他们就大部分时间住在弗里堡，只是与使馆交涉时，才去伯尔尼。

弗里堡有一座颇为知名的天主教大学，是 1889 年建成的，成为瑞士天主教的中心。旧市区保留了许多中世纪的外貌，哥特式房屋、防御土墙和塔楼、城门，比比皆是，沙里爱神甫颇得梵蒂冈教廷的信任，没过多久，被任命为瑞士三省的大主教。

1945 年 11 月 21 日，季羨林吃过早饭，到主教府前观看沙里爱大主教的就职仪式。他看到红衣主教们一个个上汽车走了，但到十一点，才知道有庆祝游行。实际上，一直等到十二点，才听到远处有音乐响起来，不久，看到士兵和警察走过，学生紧跟在后面，一队一队穿街而过。不知过了多少队伍，后边才出现了神甫、政府大员和各省主教，最后边则是罗马教皇代表、沙里爱主教。他们穿着奇奇怪怪的衣服，像北京的喇嘛，穿了彩色衣服在跳舞捉鬼一样，一直到一点，庆祝典礼才结束。

1945 年 12 月 25 日，季羨林又去观看了沙里爱大主教主持的第一次大弥撒。上午到了一所叫 St. Nicolas 的大教堂，里边已有不少人先到了。仪式开始以后，神甫们把沙里爱大主教接进教堂，接着是奏乐、唱圣歌、磕头，种种仪式接踵而至，然后，大主教走下祭坛，走到一个大笼子似的小屋里，开始向信仰们布道。布完道，又走上祭坛，这才正式开始做大弥撒。然而其仪式也不过是鞠躬、唱圣歌、磕头，一直到中午十一点半才做完。

在圣·朱斯坦公寓，一个姓田的中国神甫不失时机地与季羨林交谈。几次都谈到宗教信仰和上帝的问题，有想发展他入教之意，但季羨林自认没有任何宗教细胞，是一个没有任何宗教需要的俗人，田神甫的愿望自然落空。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个虔诚的宗教徒，季羨林在解放后的北京见到他，已经脱下僧装换俗装，成家立业了。季羨林只得慨叹人生变化之剧烈。

除了与这些天主教人士的接触，季羨林在弗里堡的最大收获，是结交了一批外国学者新朋友。

弗里茨·克恩教授是波恩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因为思想进步，反对纳粹，在德国呆不下去了，不得已离开德国来到瑞士。但在瑞士却没有相应的大学教席，而瑞士又是米珠薪贵的地方，为了糊口，在德国从来不工作的夫人，只得到近处一个乡村神甫家里当保姆。神甫脾气极坏，常常暴跳如雷，一个教授夫人当这种人的保姆，会有什么样的心态，是可以想见的。

克恩教授年过五十，但精力充沛，为人豪爽。他对中国哲学极感兴趣，和季羨林萍水相逢，却有一见如故的感觉。有一段时间，他俩天天见面，共同将《论语》和《中庸》这两部儒家经典翻译成德语。研究中国经典的计划，是他写一部长达几十卷《世界历史》庞大计划的一部分。

最使季羨林感动的，是他们夫妇俩特别关心他的生活。季羨林深情地写道：

他夫妇俩都非常关心我的生活。我在德国十年，没有钱买一件好大衣，到瑞士时正值冬天，我身上穿的仍然是十一年前在中国买的大衣，既单薄，又破烂。他们讥笑称之为 M■ntelchen（小大衣）。教授夫人看到我的衣服破了，给我缝补过几次，还给我织过一件毛衣。这一切在我这个背井离乡漂泊异域十年多的游子心中产生什么情感，大家一想就可以知道，用不着我再讲了。[14]

短短的一段时间的接触，他们之间产生了深厚的友情，这种友情似乎是超过师生以上的感情，有一种难舍难离的留恋之情。直到老年，季羨林想起他们，还常激动，仍不免有怀念之情，又是快乐，又是痛苦，酸甜苦辣，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就在 1945 年 10 月 23 日第一次见到克恩教授的那天，季羨林还见到了奥地利学者科伯斯教授。而在弗里堡附近的一个小村弗鲁瓦德维尔，他又一次见到了科伯斯教授，另外还认识了奥地利的另一位学

者施米特教授和日本学者沼泽。

两位奥地利教授都是天主教神甫，由于奥地利被德国纳粹所吞并，他们到瑞士来避难，在这个小村里建立了一个研究所。他们都是人类学家，是著名的维也纳学派的领导人。他们就在这个研究所里与这一学派的其他重要人物聚会，还接待外国学者从事研究工作，沼泽就是其中之一。

施米特教授曾在中国辅仁大学任教，著作等身，尤其对世界各民族语言的分类，有自己的一套体系，在世界学人中广有名声。季羨林与他们交往，体会最深的是他们虽是神甫但并没有所谓的“上帝气”，研究天主教以外的其他宗教，颇能持客观态度。

最后，季羨林通过克恩教授的介绍，认识了瑞士的一位学者兼银行家，名叫萨拉赞。

萨拉赞本是一个亿万富翁，但对学问却颇有所爱，尤其对印度学更是情有独钟，建立了一个规模颇大的印度学图书馆，欢迎学者们使用他的图书。季羨林自然不会放过结识他的机会。但是，他并不住在弗里堡，而是住在瑞士最北端的巴塞尔。

巴塞尔市位于莱茵河畔，原是凯尔特人劳里西部族的一个移民定居点，后来成为瑞士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运动的主要中心之一。1460年建成的巴塞尔大学，是瑞士的第一所大学。巴塞尔还因天主教会由教皇马丁五世和尤金四世两任教皇连续召开的“巴塞尔会议”，而闻名于世。

辗转搭车，季羨林从弗里堡到了巴塞尔，与先期到达的克恩教授会齐。俩人一起去拜访萨拉赞，参观了他的印度学图书馆。季羨林感触颇深，认为在世界花园中，有这样一块印度学园地，是十分难得的。在他家中，喝过茶，吃过点心，就告辞出来，到一个在中国住过多年的牧师热尔策家作客，吃饭一直吃到很晚。离别之后，克恩教授仍留在巴塞尔，而季羨林则赶到火车站，因为错过了时间，已没有直达弗里堡的火车。

季羨林心里想，反正瑞士是个极小的国家，上哪一趟车都能到达目的地。可上了车，他不辨方向，晕头转向，而车窗外是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他坐在车里，在瑞士全国转了大半夜，最后终于稀里糊涂在弗里堡站下了车。这一夜，他感到自己仿佛变成了漫游奇境的爱丽丝，不像是处在人的世界中。回到圣·朱斯坦公寓，回想这一夜的经历，还感到似有似无、似真似假，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个梦。

4. 与使馆的一场经济斗争

季羨林与张维他们回国碰到的最大难题，是身无分文，所以要回国，就得想办法弄到一点钱。但是怎样才能弄到钱呢？这可难坏了他们这帮书生。

南京政府在瑞士的公使馆里有一位参赞，原是留德学生。由于有这一层关系，他对季羨林他们几个从德国来的留学生表示出好感，同情他们的境遇。有一天，他偷偷告诉他们，南京汇来了几十万美元，是用来救济留欧学生的。这个人本来与公使有矛盾，总想寻机看公使的热闹，便乘机怂恿季羨林他们赶快去要钱，这正中他们的下怀，正愁筹不到回国的钱呢，有了这样的机会，自然很高兴。

年少气盛的他们经不住怂恿，而且美元也不扎手，于是就一起去公使馆：

最初我们还是非常有礼貌的，讲话措词也很注意。但是，一旦谈到了我们去的主要目的：要钱，那位公使脸上就露出了许多怪物相，一味支吾，含糊其词。……他一支吾，我们也就来了火气。我们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国内已经汇来了美元，这一点我们完全知道，瞒也瞒不住。此时，他脸上勃然变色，似乎有点出汗的样子，他下意识地拉开抽屉，斜着眼睛向里面瞧。我猜想，抽屉里不是藏的美钞，就是藏了账本。不管他瞧的是什么，都挽救不了他的困境。最后，他答应给我们美元。但有一个要求，希望我们不要告诉别的留学生，不要张

扬。我们点头称是，拿了美钞，一走出使馆，我们逢人便说。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当时没有仔细分析，说是惟恐天下不乱吧，有点过分，恐怕只是想搞一点小小的恶作剧，不让那位公使太舒服了，如此而已。[15]

通过这一次接触，季羨林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外交官的丑态和洋相。后来，他还听到了公使和其他官员更多的笑话。

有一次，公使应邀参加一个瑞士人主办的会议，并且发表讲话，外交惯例是应该用中文发言，由翻译译成德语或法语，二者都是瑞士国语。公使想露一手，不用翻译，直接用德语说。如果德语说得好，也未可厚非，但他德语本来就蹩脚，又没准备讲稿，一讲话，把自己的中国习惯，一时想不起要讲什么，连声说“这个，这个，这个……”用德文“das, das, das”，瑞士人莫名其妙自不用说，他们的惊愕状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中国人最初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后来才恍然大悟，顿悟出是“这个，这个”，西方人无论如何是不会有这种顿悟的。

还有一位外交官，本来也是黑眼睛矮鼻梁的黄种人，但却硬要学西方人，戴卡鼻子的单面眼镜，认为这样才有风度。但是矮鼻梁卡不住眼镜，于是他只好皱起眉头，才勉强把眼镜保留在鼻梁上，可稍一疏忽，脸上一露笑容，眼镜立刻从鼻梁上滑下来。这样一位自命有风度的外交官，只得皱着眉头，进退应对于穿笔挺的燕尾服的男士们和浑身珠光宝气的女士们之间。不知到底是有风度乎，还是无风度乎？公使馆举行的招待会，这样的险象环生，真让人啼笑皆非。

然而事情还没有完，大概是怕这位外交官太孤单，武官也来凑热闹。武官是少将军衔，把自己荣获的一枚勋章别在军服的前胸，以示威风，但勋章偏不听话，老是反面向外，正面向里，只得不停地翻转，以保持正面向外。整个晚上，这位武官就忙活这个。在一个本来是庄严隆重的外交招待会上，使馆是主人，结果一个紧皱眉头，一个不停地翻转勋章，让人不禁哑然失笑。

从这个公使馆，季羨林看到了国民党外交官的无能和丑态。与使馆人员打交道的过程，使季羨林获得了一条重要经验，国民党外交官是软的欺，硬的怕，与他们作斗争，硬比软更有效果。

5. 转赴法国马赛

季羨林他们手中有了钱，可以正式启动回国的计划了。他们确定的路线是坐火车到法国马赛，从那里坐船经西贡、香港，再到上海。

路线确定之后，他们采取硬比软更有效的办法，对使馆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人乘火车走，而行李则要用载重汽车，从弗里堡运到法国马赛，此法果然应验，使馆一一答应。自然是先装上行李，结果几个人的行李，装在一辆载重几十吨重的大卡车上，连一层也没有摆满，整个卡车显得空荡荡的，滑稽可笑。

手续办完之后，他们乘隙到瑞士西南边陲离弗里堡不远的日内瓦玩了几天。

日内瓦濒临日内瓦湖（莱芒湖）与罗讷河口，地处三面环山的盆地之内，风景优美，是著名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出生地和法国另一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避难地，是法国的近邻。这里有著名的圣彼得大教堂，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鳞次栉比，许多著名学者曾在这里研修神学、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在日内瓦，几个中国留学生逍遥自在地玩了几天。

1946年2月2日，季羨林一行在日内瓦登上火车，驶向法国。

在过法国国境的时候，法国海关检查极严，因为日内瓦是从瑞士偷运手表到法国去的理想地方，手表走私是极为赚钱的勾当，法国海关自然不会放松边境检查。季羨林他们没有手表，不怕检查，但他们随身携带的几只大箱子，里边大多数是书，如果一一打开，慢慢腾腾仔细检查，则“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连火车恐怕都要耽误了。在紧张慌乱中，不知是谁急中生智，也不知是稀里糊涂并不知觉，反正

从兜里掏出一个瑞士法郎硬币，只是一个法郎悄悄递给了检查员。奇迹于是出现，检查员把瑞士法郎装进自己腰包，在中国留学生的箱子上用粉笔画了一些“鬼画符”，顺利通过了边境检查站。

从日内瓦到马赛，大概有五百公里左右的路程。季羨林是第一次到法国，一路上观看法国的自然风光，有耳目为之一新的感觉，不知不觉也就到了南方港口城市马赛，时间仍是 1946 年 2 月 2 日。

马赛是法国最古老的大城市，临地中海利翁湾，三面被石灰岩山丘所环绕，最早是腓尼基人居住的地方之一，到公元前 6 世纪，从小亚细亚来的希腊水手建成马赛利亚。15 世纪，生产出举世闻名的“马赛洗涤皂”。法国大革命期间，工兵上尉和音乐爱好者鲁日·德·李尔灵感爆发，在一夜之间创作出《莱茵军战歌》，1792 年由五百名志愿者高唱着，由马赛向巴黎进发，鼓舞了沿途广大群众，从此改名为《马赛曲》，并成为法国国歌。第二次大战期间，马赛在 1942 年被德军占领，遂成为抵抗运动的中心之一。马赛的名胜古迹很多，12 世纪的圣尼吉拉斯城堡、圣玛丽教堂，13 世纪的圣让城堡、圣维克多教堂，14 世纪建成的阿库莱斯教堂钟楼尖塔，16 世纪的钻石宫，以及始建于 8 世纪的加德圣母院，到 1853 年建成的教堂及尖顶上九米高的圣母镀金塑像，都吸引着大量的游客。

在马赛，季羨林注意到街上的情景同瑞士完全不同。他写道：

法国这个国家种族歧视比英美要轻得多。我在德国十年，没看见过一个德国妇女同一个黑人挽着臂在街上走路的，在法西斯统治下，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到了瑞士，也没有见过。现在来到马赛，到处可以看到一对对的黑白夫妇，手挽手地在大街上溜达，我的精神一恍惚，满街都是梨花与黑炭的影像，黑白极其分明，我真是大开眼界了。法国人则是“司空见惯浑无事”，怡然自得。[16]

然而最使季羨林难忘的，是他在马赛第一次看到了大海。他常嘲笑自己，出生在山东，又留洋十年，却居然没见过海，没有“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体验。在这里见到海，心里异常高兴，大海的那种波涛

汹涌、浑茫无际的形象，使他振奋不已，一时激动起来，忽然想到杜甫描写洞庭湖的诗句——乾坤日夜浮。认为用这样的诗句来形容大海，也是满合适的。

在马赛一时走不了，他们便拿着在德国哥廷根时美军开的证明文件，到这里管理因战争而抛乡离井的人的办事处去交涉，结果被安排住进了一个大仓库。里边虽然极为简陋，却也洁净，而且饭食也还说过得去。他们就在这里暂时住下了。管理人员都是德国战俘，交谈也很容易了。

安排好住处之后，季羨林一行又去找南京政府派驻马赛的总领事馆，与他们交涉。他们如法炮制，使用了瑞士用过的硬办法，住宿条件得到改善，从大仓库搬进了一个旅馆。他们进一步提出要求，要乘头等舱的船回国，总领事条条答应，留学生们皆大欢喜。事情办妥了，个个如释重负，心情轻松多了。到2月8日开船以前，他们天天到海边去玩，也有钱在大街上买桔子，去吃小馆，逍遥自在，快活似神仙地过了六天，一直住到2月8日晚上，才离开这个港口城市。

三、漫长的船旅漂流

1. 尝到了被骗的滋味

1946年2月8日晚上，季羨林一行终于登上了归国的轮船。从此开始了长达三个多月的漂流，尝尽了旅途的艰辛和苦涩，既有经过雷区时的战战兢兢，也有晕船时的天旋地转。

船名叫 Nea Hellas，这是一艘排水量为一万七千吨的大船。船主是英国人，但被法国租来，运送法军到越南去镇压当地的老百姓。轮船上的管理人员和驾驶员都是英国人，而乘客则是清一色的法国士兵。穿便服的乘客非常少，中国乘客除了季羨林他们从德国来的六个人，新增加了两个，共有八名，成了最为突出的便衣乘客。

八个中国人被分住到两个房间里。房间的设备虽不能说豪华，但是整洁、舒适，他们以为这就是头等舱，所以都很满意。船上的饭菜丰富而可口，其他方面也都很顺利。

轮船启航了，驶入了地中海。

有一天，几个中国留学生到最高层的甲板上去观望海景。突然，一个英国船员走过来，告诉他们，只有头等舱的乘客才允许走上最高层甲板，他们这才知道自己住的舱并不是头等舱。南京驻马赛总领事是一个狡猾的老狐狸，虽亲口答应买头等舱的船票，实际上却不是，轻易地把这些留学生蒙骗过去了。由于战争刚结束，一切正常秩序还没有恢复，再加上轮船主要是运送部队，船票上并没写明船舱的等级。季羨林没坐过轮船，没有乘船经验，自认为是头等舱乘客，实际上却不是，他们尝到了被马赛的总领事欺骗的滋味。

几个中国留学生又好气，又好笑，为自己的幼稚而感到可笑。有了这一番被欺骗的阅历，他们算是吃一堑，长一智，非挽回自己的面子不可，更要在英国人面前争一口气。所以，他们到船长办公室交涉，表明自己掏钱也要改为头等舱，因为最高层甲板决不能不上，只有这样才不致失掉中国人的尊严。于是他们据理力争，船长终于一笑，不用他们补钱，特别批准他们可以上最高层甲板，小小的斗争又取得了胜利，几个人皆大欢喜。

一切都顺利，生活算是正常了。

但是到吃饭的时候，中国留学生们又遇到了一点麻烦。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英国是一个诚实严肃的民族，有过多的保守性，讲究礼节。到船上餐厅里去吃饭，特别是晚饭，必须穿燕尾服，我们是一群穷学生，衣足蔽体而已，哪里来的什么这尾那尾的服装。但是规定又必须遵守，我们没有办法，又跑了去找船长。他允许我们，只需穿着整洁，打好领带，穿好皮鞋，就可以进餐厅了。我们感激他这一番盛情，“舍命陪君子”，尽最大的努力打扮自己。最初，因为天气还不太

热，穿上笔挺的西装，把天花板的通气孔尽量转向自己，笔直地坐在餐桌前，喝汤不出声，刀叉不碰响，正正经经，规规矩矩，吃完一顿饭，已经是汗流浹背，筋疲力尽了，回到房间，连忙洗澡。这样忍耐了一些时候，船一进入红海，天气热得无法形容。穿着衬衫，不走不动，还是大汗直流，再想“舍命”也似乎无命可舍了。我们简直视餐厅为畏途，不敢进去吃饭。我们于是同餐厅交涉，改在房中用餐，这个小小的磨难才算克服。

从地中海进入苏伊士运河，天气实际上就开始转热了。苏伊士沿岸没有冬天，最冷的11月份、12月份，穿一件极薄极薄的毛衣足可以过去了。1月份天气转暖，2月份就相当热了。渡过苏伊士运河，就进入了红海，天气就更热了，难怪这批中国留学生不适应这样的气候了。他们从乍暖还寒时候的欧洲，一下子来到亚洲和非洲的交界处，气候变化巨大，是很难适应的。

2. 看到红海之“红”

轮船进入红海之后，船上尽是新鲜事。

在法国马赛时，季羨林已经对法国人的浪漫和罗曼蒂克有所见，而在这艘轮船上，法国士兵的举动，更进一步证实了他们的这一印象。

船上的法国士兵，男女都有，总共有几千人，女兵的数量不是很多。季羨林在船上冷眼旁观这些法国兵，感到法国人是喜欢交际的民族。同他们打交道，不像和德国人、英国人打交道那样难，以至有人说，法国人是把心托在自己的手上，随时随地都可以交给对方。季羨林上船以后，很快认识了一个很和气的法国年轻军官，他瘦瘦的身材，清秀的面孔，能说流利的英语，他们便经常在甲板碰头，散步。他们之间没有戒心，谈到各式各样的问题，几乎是无话不谈。这位军官甚至用轻蔑的口吻谈到法国军队，说官比兵多，大官比小官多。此

后，在船上漂流的长时间里，他们之间成了要好的朋友。这位军官仿佛真把心托在手掌上，交给季羨林了。

法国男女之间的关系随随便便，天真烂漫。季羨林遇到了一生第一次在中国看来难以想象的景象：

他们和她们都热情活泼，逗人喜爱。他们之间搂搂抱抱，打打闹闹，没有人觉得奇怪。只有在晚上，我们有时候会感到有点不方便，我们在甲板上散步，想让海风吹一吹，饱览大海的夜景，这无疑也是一种难得的福气。可是在比较黑暗的角落里，有时候不小心会踩上甲板上的人，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当然是一男一女。此时，我们实在觉得非常抱歉，非常尴尬。而被踩者却大方得很，他们毫不在意，照躺不误，我们只好加速迈步，逃回自己的房间，房间内灯火通明，外面在甲板上黑暗中的遭遇，好像一下子消逝，只剩下零零碎碎的回忆的断片了。[17]

英国船员和法国兵之间的关系也很融洽，每天晚饭后，他们之间都进行拳击比赛，双方挥拳对击，龙腾虎跃，各不示弱，而打完之后，则其乐融融。

船继续在红海中行驶，在船舷下面，海浪翻腾，汹涌澎湃之声洋洋乎盈耳。海水深碧，浩淼难测，鱼龙水怪潜伏深藏，大海一望无际，而轮船是独立的小世界，在万里大海上显得是那么渺小。季羨林仿佛置身于一个童话或神话世界中，恍惚间又似乎是在梦中，想象中的蓬莱仙山，虚无飘渺的海象，都是呼之欲出了。无论如何，他感到不像是在人间了。

1946年2月19日，轮船在海中已经航行了11天，仍在红海中行驶。

过去，季羨林曾思考过，为什么会有“红海”的名称？后来，他得知海中的颜色一般呈现深青色，局部地区因海藻大量繁殖而呈现绛红色，这是红海得名的缘由。难得的是，这一次他亲眼看到了红海之“红”。

在这天的日记中，季羨林写道：

今天天气真热，汗流不止，吃过午饭，想休息一会儿，但热得躺不下，到最高层甲板去看，远处一片红浪，像一条血线。海水本来是黑绿的，只有这一条特别红，浪冲也冲不破。大概这就是“红海”名字的来源。我们今天也看到飞鱼。[18]

千里航程中，只有几米宽不知有多长的一条红线，由于海藻而呈现绛红色，所以能看到实在不易。季羨林看到这条红线，暗自庆幸自己是一个极有运气的人，如果不是在最高层甲板上，如果不是此时正好走上去，如果没有运气，那就看不到了，想到这里，季羨林有点飘飘然了。

3. 排除了险情

红海是非洲和亚洲之间的狭长海域，这个地区没有任何常年河流注入，周围气候干热，雨量稀少，平均气温就在 25℃—28℃ 之间。2 月中旬以后，天气已经很热了。由于这样，过红海经受的难关，第一个就是这难耐的热，而从苏伊士湾到曼德海峡长达二千一百多公里，轮船要渡过这条漫长的海路，不知要熬过多少个难耐的干热的白天和夜晚。

热之后的第二道难关是险。红海这个地方，缺乏天然良港，由于大气层中炫眼的热闪光、沙暴、暗礁险滩和水流湍急等原因，轮船的航行是十分困难的。季羨林由于是局外人，对此当然不会有体会。

有一件后怕的事，是轮船过了马六甲海峡以后才知道的。原来因为当时第二次大战刚刚结束，大海中满布的水雷还没有来得及全部清除，从地中海到红海，再到印度洋，到处都是这样。在季羨林乘坐的这艘船启航以前，已经有几艘船触雷沉没了，对此，季羨林最初并不清楚，但多少有点感觉，因为一上船的时候，乘客们便被集合到甲板上，戴上救生圈，排班演习。此后，天天要到甲板上去“站班”。

轮船就这样继续行驶，险情在季羨林他们完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被排除了，船驶入印度洋，又继续航行了。二十多天的航行，有多少险情发生，谁也不知道，轮船终于接近马六甲海峡了。这里是连接印度洋安达曼海和太平洋南海的水道。过了这条水道，一天早晨，船长告诉大家，头天夜里他一夜没合眼，这里是水雷危险区，他生怕会出什么问题。现在，最危险的地区已经抛在后面了，险情算是排除了，从此，他终于可以安心睡觉了。季羨林他们听了，心里直发毛，都有点后怕，他们知道险情被排除了，所以感到后怕是幸福的，因为只有危险过了以后，才能有后怕。

就在这种幸福感充溢心中的时候，季羨林乘坐的轮船驶入了越南同奈河的下游，这是一条大河，河面极宽，简直就像《庄子·秋水》中所说的“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过了二十多天海上生活，轮船仿佛在天上航行，见不到大陆，现在终于看到了河两岸的芦苇，蒹葭苍苍，一片青翠，季羨林觉得又回到了人间，心里热乎乎的，感到非常温暖。

1946年3月7日，经过在大河中的一段航行，轮船在西贡市靠了岸，海上漂流的第一个阶段，算是结束了。

4. 在西贡闻到了家乡味

到了西贡，从马赛开出的这艘轮船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

下了船，季羨林想起了在船上结交的法国年轻军官，想与他告别一声，穿过摩肩接踵的人群，好不容易才在万头攒动的法国士兵中找到了他。没想到，季羨林怀着一颗热烈的心，简直是跑上前去想同他握手告别，而他却掉转了头，眼睛根本不看季羨林，而是盯向别的方向。季羨林大吃一惊，当头挨了一棒，仿佛被人浇了一头凉水，先是愕然，后是坦然，最后才感到是当然。因为现在是到了法国人的殖民

地，必须摆出一副殖民主义者的架势，才算够谱。因此，在轮船上托在手掌上的那颗心，现在又收回，装到腔子里去了。季羨林也并不生气，心里只觉得非常有趣。

在这里，要换乘轮船去香港。而轮船又遥遥无期。季羨林他们又住进了旅馆。

经过一番斗争，南京政府驻西贡总领事馆对几个中国留学生的招待颇为周到。有了瑞士和马赛的经验，所以，他们住进旅馆，就决定给这些外交官员一个下马威，给一点颜色看。

第一次吃饭时，季羨林看到餐桌摆的是竹筷子，便试探性地，甚至有点近于无理取闹地说：这竹筷子不行，要换象牙筷子！结果第二次吃饭时，果真换了象牙筷子，筷子上闪闪射出的白光，宣告了他们斗争的第一个胜利。

这之后，他们又与总领事尹凤藻交了几次火。

一次是 1946 年 3 月 13 日。这天上午十点，季羨林他们去领事馆见他，他不在。一直等到十一点，他才回来。一见面，尹凤藻态度非常不客气，季羨林心里大火，和他顶了起来，季羨林这一硬，他反而和气了。这种官僚就是这样欺软不欺硬。

第二次是在 1946 年 4 月 13 日，到西贡已经一个多月了。早晨六点起床，吃过早饭，季羨林便同刘先志等人去领事馆，交涉到香港的大中华轮船的头等舱位。一开始，尹凤藻耍滑头，不想给订，一看他们来势不善，才答应了，他们又一次得到斗争胜利的欢乐。

西贡真是别有一番天地。西贡地处热带，时值春末夏初，骄阳似火，椰树林蓊郁繁茂，浓翠扑人眉宇。季羨林第一次看到热带风光，大开眼界：

仿佛有一股从地中心爆发出来的生命力，使这里的植物和动物都饱含着无量生机，说到动物，最使我这个北方人吃惊的是蝎虎子（壁虎）之多，墙上爬的到处是这玩意儿。这种情景我以后只在西双版纳看到过，还有一种大蜥蜴，在不知名的树上爬上爬下，也是我从来没

有见过的。我用小树枝打它，它立即变了颜色，从又灰又黄变得碧绿闪光，难道这就是所谓变色龙吗？[19]

此时，雨季已经开始。每天多在下午必定下雨，本地人说，雨什么时候开始下，决定于雨季来临时第一天下雨的时间，如果第一天是下午二点开始下雨，那以后每天都是此时开始。

季羨林观赏到热带雨季的风光。暴雨降临前，往往还是烈日当空，普照着大地，连一点下雨的迹象也没有。但是刹那间，鬼使神差似的，一下子彤云密布，天昏地暗，雷电交加，一会儿便大雨倾盆了，其声势，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古人形容说：“滋禾润稼，花枝上斜挂玉玲珑；此地肥田，草梢间乱滴珍珠滚。高山翻下千重浪，低凹平添白练水。遍地草浇鸭顶绿，满山石洗佛头清。推塌锦江花四海，好雨，扳倒天河往下倾。”想不到古人形容的大雨，季羨林在西贡竟身临其境，体验到了。只见大马路上到处溅起了珍珠似的水花，椰子树也都被雨水冲洗。然而时隔不久，大雨会蓦地停下，黑云退席，蓝天出台，又是一片阳光灿烂的大地了。[20]

对越南人的风情习俗，季羨林在这里有了初步的了解。女人的潇洒，男人的闲散，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地处热带，越南妇女的衣着表现出热带的明显特点。越南妇女的衣着，有点类似中国旗袍。但用料是白绸子，而且开衩之处极大，几乎开到腋下。还要穿上黑绸子缝的裤子，穿上这一套衣服，上白下黑，或里黑外白，旗袍由于开衩极大，所以很容易飘动。年轻的越南倩女，在热带的微风之中，款款走来，白色的旗袍和黑色的绸裤，飘动着，招展着，犹如黑白大理石雕成的女神像，但不是兀立在那里不动，而是满世界游动。在她们身上，季羨林他们看到了散发出的青春活力。连整个街道都由于她们而显得生气勃勃，活动起来，这样的一种东方美，是越南少女独有的潇洒，在西欧国家找不到，在其他东方国家也找不到。

而男人们呢？因为在热带，稻米可以一年三熟或四熟，大米是极

便宜的，不用吹灰之力，就可以弄到大米，填饱肚皮。由于谋生容易，所以男人们都十分闲散。除了下雨的时候，人们都在户外活动，椰子树或是其他不知名的树下，人们懒洋洋地坐着，或聊天，或抽烟，或饮茶，那种悠然自得的样子，真让人叫绝。季羨林此时不禁想起西方什么人说过一句话：

世界上什么东西都害怕时间，时间惟独害怕东方人。[21]

最重要的，是季羨林在西贡市看到了不少华人，闻到了强烈的故乡味。

西贡市中心不远的大街上，市场上，来来往往的尽是中国。商店主是中国人，商店的招牌是汉字，顾客也都是中国人，还有许多小型工厂，如碾米厂、砖瓦厂之类，也是中国人在这里开办的。至于吃的东西，则更是中国风味，什么酒楼，小吃摊，一律的广东风味，广东腊肠，广东腊肉，满货架上都是，名贵的烤乳猪也随处可见。人说食在广州，没想到西贡竟有这么多广东菜肴，这使季羨林闻到的故乡味更为浓郁了。

西贡的华人学校很多。中学有几所，小学则很多，华人报纸、华人书店、华人作家、华人文化人、华人医院也到处可见。季羨林这批中国留学生，一到这里，便与华人文化人有了接触，应邀讲演，写文章，赴宴。

一天，季羨林到一个中学去讲演。他偶尔提到了蒋介石的名字，全场忽地一声，全体起立，把季羨林吓了一跳，手足无措，后来知道，这里当时都是这个样子，大概是从国内国民党军队传播出去的。

华侨们非常尊敬这批中国留德学生，把他们当做亲人，关系非常融洽。南京政府派驻的总领事馆，是来管理越南华侨事宜的，但实际上却继承了过去大衙门的一切弊病，华侨吃亏是经常事，但因为无法到南京投诉，也只有忍气吞声了。华侨们看到这批留洋学生，认为他们有后台，便托他们到总领事馆说这说那，把他们当成青天大老爷了。他们见到领事馆的人，有意无意之间，为华侨说上几句，居然也

会奏效，原来领事馆的人也认为他们是有后台的。华侨们信任他们，愿意同他们来往，留学生们住的旅店，经常是门庭若市，宴会无虚日，天天有人请。

季羨林不无深情地写道：

从空间距离上来看，祖国离开我们已经比在万里外的欧洲近得多了。我们也确实感到了祖国的气息。这里的华侨十分关心祖国的抗战。同世界其他各地的华侨一样，他们热爱祖国，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此时抗战虽然已经胜利，但是在长达八年的浴血抗战中出现的许多新鲜事物，仍然在此地保留着。比如《义勇军进行曲》我就是第一次在西贡听到的。它振奋了我这个远方归来的游子的心，让我感到鼓舞，感到光荣，感到兴奋，感到骄傲，觉得从此可以挺起腰板来做人了。……此外，从当地华侨嘴里说的普通话中，我还听到了一些新词儿，比如“伤脑筋”、“搞”等等，都是我离开祖国时还没有出现过的。语言是随时变动的，这些词儿都是变动的产物。

这些大大小小的新鲜事物，都明确无误地告诉我说，我离开祖国不远了，祖国就在我的身边了，我心里感到异常的前所未有的温暖。

[22]

5. 香港印象

在西贡，从 1946 年 3 月 7 日抵达，一直到 4 月 19 日离开，共住了四十多天。

4 月 19 日，季羨林终于登上大中华号轮船，驶离西贡，开往香港。

大中华号是一艘相当小的客轮，载重量不过一千多吨，不到从马赛开出的那艘大轮船的十分之一。船上设备极其简陋，虽经与总领事馆的斗争坐上头等舱，但里面也并不豪华，其他舱位更不必说了。

船小，在风平浪静的时候还勉强可以，但偏偏在开了船离开西贡

到达海上的第二天，遇上了大风，正所谓屋漏偏遇连阴雨了。海上的一场搏斗开始了。季羨林对当时的场面描绘道：

我们这一条小船被吹得像海上的浮萍，随浪上下，一会儿仿佛吹上了三十三天，一会儿又仿佛吹下了十八层地狱。但见巨浪滔天，狂风怒吼，波涛里面真如有鱼龙水怪翻腾滚动，瞬息万变，仿佛孙大圣正用那一根定海针搅动龙宫，以致全海抖动。我本来就有晕船的毛病，现在更是呕吐不止，不但不能吃东西，而且胃里原有的那一点储备，也完完全全吐了出来，最后吐出来的只是绿颜色的水。我在舱里呆不住了，因为随时都要吐，我干脆走到甲板上，把脑袋放在船舷上，全身躺在那里，吐起来方便，此时我神志还比较清楚，但见船上的桅杆上下摆动，有九十度的幅度。海水当然打上了甲板，但我顾不得那样多了，只是昏昏沉沉地半闭着眼，躺着不动。这场风暴延续了两天。船长说，有一夜，轮船开足了马力，破浪前进，但是一整夜，寸步未动，马力摧进一步，暴风打退一步。二者相抵，等于原地踏步了。[23]

两天多的风暴终于过去，季羨林已经是两天滴水未进了。船上为乘客特意熬好了鸡肉粥，季羨林喝了一碗，觉得是生平喝过的最香最美的一碗粥，燕窝鱼翅难比其美，仙药醍醐庶几近之。船外，晴空万里，丽日中天，海平如镜，水波不兴。飞鱼在水面上飞驰，像飞鸟一样。远处望去，一片混混茫茫，不见岛屿，更不见陆地。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季羨林心胸顿觉极为开阔，简直想手舞足蹈了。

1946年4月25日，中华号客轮驶抵香港。

20世纪40年代中叶的香港，与今天的香港相比，惟一相同之处是地少人多，街上行人摩肩接踵，熙熙攘攘；而不同之处，则是那时的香港没有一点文化气息，到处都是土里土气。等住进小客栈，这一印象就更为深刻了。

香港负责接待中国留学生的，是南京政府派驻的特派员公署，这个机构相当于驻其他国家的大使或公使。外交特派员叫郭德华，他派

人到码头迎接他们，把他们送到一家客栈里。

这家客栈很小，设备极为简陋，一间像样的房间也没有，同内地的鸡毛小店相差无几。中国留学生被安排在两间极小的房间里，条件极差，不光拥挤，周围环境也极差。门外就是一个长筒子房间，类似于一个大厅，约有二三十平方米，搭满了地铺，住着二三十个房客，挤挤搯搯。这些房客的素质极低，有的像是小商贩，有的是失业者。他们中有的人根本不讲什么礼貌，也不讲任何社会公德，大声喧哗，随处吐痰，劣质香烟把大厅弄得乌烟瘴气。这还不算，还有人身上竟长着疮，像是梅毒一类的性病。

看到香港地少人多，寸土寸金的情况，住在这样一个地方，季羨林并没有抱怨。到上海的船期不知何时才到，他们只能在这里暂住了。

有了住处，季羨林便可以放心地玩几天了。

季羨林住的客栈，是在山下。周围的街道极窄，街旁的招牌和霓虹灯，五光十色，琳琅满目，商店橱窗里陈列的货品，堆积如山。到处都有饭馆，广东烤肉、香肠，挂满窗口，强烈地刺激着人的食欲。留着长头发，穿着喇叭裤的男女青年，挺胸昂首，匆匆忙忙地来往于穿梭般的人流中间，而头顶上那些鸽子窝似的房子中，喧闹声极大，打麻将洗牌的声音，比比皆是，随处都可以听到。

这样一个香港，在白天几乎没有什么可看的。

香港是个山城，到了夜晚，只见远远近近，万灯齐明，高高低低，上上下下，或大或小，或圆或方，有如天上的星斗，并辉争光，斗奇竞艳，比白天有趣多了。

到香港不是来玩的，而是取道回国。季羨林他们去找外交特派员郭德华，商谈去上海事宜。因为船期难定，要靠特派员大力支持才行。

郭德华有一间宽敞明亮的大办公室，郭德华就坐在巨大的办公桌后面，威仪俨然，戴着一副玳瑁框的眼镜，留着小胡子，面团团如富

家翁，摆着臭架子。见季羨林他们来，连站也不站。

看到他这个样子，季羨林他们心里全明白了，他们决定给他一点颜色看。他失礼不站起来，他们也不在他指定的椅子上就坐，而是一屁股坐到他的办公桌上，见来者不善，他立刻站了起来，脸上有了笑容，船的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拿到了去上海的船票。

四、回归祖国

1. 船到上海

1946年5月13日，季羨林一行登上开往上海的船，走上了回归祖国的最后历程。

轮船很小，与在西贡上的中华号相差无几。设备简陋自不用说了，乘客却比中华号上的多得多。几百名旅客挤在一艘不到一千吨载重量的小船上，拥挤程度可以想见。其他客轮，统舱是最低级的，而这艘船，比统舱还要低一级的甲板上，也到处是人，每个人只有可怜的容身之处。船上到处都是乱放的行李，有的行李里散发着恶臭的咸鱼味，令人作呕。

船上因为容身之地大成问题，于是演出了奇怪的一幕：花钱买地盘。有一些霸道的人，预先抢占了地盘，有些过于拥挤的人就出钱买地盘，为了争价钱，讨价还价之声，争吵喧闹之声，洋洋乎盈耳，往往争半天才能成交。

统舱里有很多人在抽烟，烟雾迷迷腾腾的。烟雾中，人们吵吵嚷嚷，喧声高涨，连小轮船破浪前进激起的海浪声，都被淹没了。

相形之下，季羨林他们几个留学生住在头等舱里，条件要好多了，就是住在二等舱，也算是不错的。外面脏乱，把自己关在舱位里，还能保持相对的清洁和安静。但是，老关在舱内，空气也并不清新，因此也需要到甲板上去呼吸一点新鲜空气。

头等舱离甲板很近，只有几步路的距离。可走这几步路，竟是想不到的艰难。人丛挤得像沙丁鱼，连点空隙都找不到。小心翼翼地走出一条路，绝非易事。好不容易走到外面甲板上，忽然发现一位女留学生也在横躺竖卧的人群中。她可能是比利时人，也可能是法国人，是和季羨林他们一起在香港登上这艘船的。看到她，真让季羨林大吃一惊：

只见她此时紧闭双眼，躺在那里，不吃不喝，不转不动。有人跨过她的身躯走路，她似乎不知不觉；有人不小心踩到她身上，她似乎不知不觉；有人提水水滴到她脸上，她仍然似乎不知不觉。连眉毛都不眨一眨。她是睡着了呢？抑或是醒着呢？我不得而知。她就这样一连躺了几夭，一直躺到上海。我真是吃惊不小。我知道，她是学数学的，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从她的表情来看，我总疑心，她当过修女。不管怎样，她心中一定有自己的上帝，否则她在船上的这番功夫无论如何也是难以理解的。[24]

目睹此情此景，季羨林心里浮想联翩。

他首先想到了祖国。十一年前，他怀着一腔热情，毅然决然出国，究其原因，一是为了救国，二是为了镀金。原定留学期为两年，战争阻隔，变成了十一年。战争中的那种饥肠辘辘，那种时时面临死神的威胁，那种没有亲人信息难熬的孤独，无时不折磨着他。最后总算遭万劫而幸免，弃九死而获一生。现在，这十一年的异域流离生活就要结束了，一幕一幕经历过的事却又展现在眼前，对这一切心灵感情上受到的磨难，他是多么希望能向祖国母亲倾诉一番呀！他感到，祖国就在眼前了，倾诉的时间来到了，可一时该从哪里说起呢？

季羨林是一个极富感情的人，他不能像那位女留学生那样，做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只想自己心中的上帝。他不能。此时，他靠在船舷上，注目大海中翻滚的波涛，心里面翻滚得比大海还要厉害，心里的矛盾无法排解。他真实地记录下自己见到祖国时的复杂心情：

我在欧洲时曾几次幻想，当我见到祖国母亲时，我一定跪下来吻她，抚摩她，让热泪流个痛快。但是，我遇到了困难，我心中有了矛盾，我眼前有了阴影。在西贡时，我就断断续续从爱国的华侨口中听了一些关于南京政府的情况。到了香港以后，听的就更具体、更细致了。在抗战胜利以后，政府中的一些大员、中员和小员，靠裙带，靠后台，靠关系，靠交情，靠拉拢，靠贿赂，乘上飞机，满天飞着，到全国各地去“劫收”。他们“劫收”房子，“劫收”地产，“劫收”美元，“劫收”黄金，“劫收”物资，“劫收”仓库，连小老婆姨太太也一并“劫收”，闹得乌烟瘴气，民怨沸腾。其肮脏程度，远非《官场现形记》所能比拟。所谓“祖国”，本来含有两部分：一是山川大地；一是人。山川大地永远是美的，是我完完全全应该爱的。但是这样的人，我能爱吗？我能对这样一批人倾诉什么呢？俗语说：

“孩儿不嫌娘丑，狗不嫌家贫。”我的娘一点也不丑。可是这一群“劫收”人员，你能说他们不丑吗？你能不嫌他们吗？[25]

就这样，怀着复杂的心情，不知不觉地就来到了上海。

这是1946年5月19日了。从1945年10月6日离开哥廷根，到抵达上海，用去了将近八个月。用今天的航空工具只需走八个小时的路，二战期间竟用了八个月！路上的艰难自不用说了，光是心中那种牵肠挂肚的焦虑，也足以将人折磨得够呛的。

进了上海，季羨林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上海，这真是中国地方了。自己去国十一年，以前自己还想象再见祖国时的心情。现在真正地见了，但觉得异常陌生，一点温热的感觉都没有。难道是自己变了么？还是祖国变了呢？[26]

2. 转赴南京

偌大一个上海，季羨林却无亲无故，竟无立锥之地。

而当时正值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激烈进行，交通中断，他又无法

立即回济南老家探亲。他终于设法和家中取得了联系，寄了一些钱回家。而经济的拮据使他在上海住不起旅馆。

下了船之后，一同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四散而走。季羨林没有落脚之处，又回不了家，他忽然想起了在南京的老同学李长之。何不到南京去找李长之暂住呢？

李长之本是济南人，是季羨林惟一的一个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四连贯”的同学，私交很好，有深厚的友谊。他当时正在南京国立编译馆工作。

李长之 1936 年清华毕业后，先留校任教，后调到重庆中央大学任教，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开始写《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1945 年春天，他身患肺病，不得不离开工作七年的中央大学，担任重庆北碚编译馆编审。1946 年，他又到南京国立编译馆，任代理图书馆主任，在这里完成了《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但南京不是他怎么喜欢的地方，只是在写作时面对着的鸡鸣寺和玄武湖上的风光，让他有恋恋之情。到 1946 年 10 月，在季羨林到北京之后不久，李长之也到北京师范大学担任了副教授。李长之著述颇丰，到 1956 年已出版著作三十多种，论文一百多万字，可惜 1957 年被错划为右派，从此被剥夺了创作与出版著作的权力，1978 年仅 68 岁时死于中毒性肺炎。

季羨林从上海到了南京。当时，抗战胜利不久，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在全国满天飞，搜刮金银财宝，兴高采烈。季羨林一介穷书生，正处于“无条无理”的阶段，到南京仍住不起旅馆，只好借住在李长之的办公室内。

李长之从重庆中央大学来到南京，先在南京中央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不久转到国立编译馆。从来到离开，在南京前后不到一年。

李长之他们白天要在办公室办公，季羨林无处容身，只得出去游荡。

国立编译馆就在风景胜地台城下面，季羨林出去游荡最近也最好

的处所，自然也就是台城了。什么鸡鸣寺、胭脂井，他几乎天天都到。他这样天天游荡，梦想着有朝一日自己能安定下来，有一间房子，有一张书桌，别的奢望，一点也没有。虽然山光水色，风景怡人，但是他并没有多少闲情逸致。他自己觉得，自己的处境颇像旧戏中的秦琼，心里琢磨的是怎样卖掉黄骠马，用自己学到的知识谋得一个安身立命之地。

看着台城上面郁郁葱葱的古柳，季羨林心头不由地涌出了唐代韦庄的一首《金陵图》：

江雨霏霏江草齐，
六朝如梦鸟空啼。
无情最是台城柳，
依旧烟笼十里堤。

韦庄的这首怀古诗，借六朝兴亡来抒发人世的哀愁和凄惋，六朝古都的繁华已如梦般飞逝而去，只剩下一些鸟儿空自在旧地上哀啼。最无情的是那台城的古柳，对六朝兴亡竟全无感触，依然如旧日轻烟，雾蒙蒙地笼罩着十里长堤。

但是，季羨林想到的是，从六朝到现在，又不知道有多少朝多少代过去了。古柳依然是葱茏繁茂，改朝换代并没有影响了它们的情绪。今天，他站在古柳面前，一点也没有觉得它们“无情”，反而觉得它们有情得很。南京本是火炉，是夏天里人们都想避开的地方，而季羨林却不得不天天在六月的炎阳之下，奔波游荡，只有在台城古柳的浓荫之下，才能获得片刻的清凉，让他能够坐下来小憩一会儿。他难道不该感谢这些古柳，反而去说三道四吗？[27]

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李长之告诉季羨林，梁实秋先生全家从重庆复员，也回到南京了，并且就在李长之工作的国立编译馆工作。

季羨林听到这一消息，简直是喜出望外。季羨林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读过不少梁先生的文章，虽然并不认识梁先生，但很欣赏他的文才，对他怀有崇敬的心情。他比季羨林大十几岁，季羨林把他当做自

己的老师一辈。没想到在南京有机会能见到梁先生。

经过李长之的介绍，季羨林认识了梁实秋先生。一见面，季羨林对他的人品和谈吐立刻就产生了倾慕之心。没有任何繁文缛节，俩人成了好朋友。

有一天，梁实秋先生在南京的一家大饭店里宴请季羨林。那天，他们一边吃着十分精美的饭菜，一边进行着十分愉快的交谈。当时，梁先生的夫人和三个孩子文茜、文蔷、文骥也都在场。

这一次和梁先生晤面，对于他的为人毫无架子，像季羨林和李长之这样的年轻人，竟也平等对待，态度真诚和蔼，令人难忘。季羨林感到，这种作风，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总算是难能可贵。

后来梁先生去了台湾，他的爱国之心，学术文章，功在人民，海峡两岸是有目共睹的，谁也不会有什么异辞。直到梁先生去世之前，他还老是惦念着季羨林，让女儿文茜和文蔷专门去看望。季羨林知道他还没有忘记自己，心里非常感动。

就在南京李长之办公室暂住的日子里，季羨林到俞大维官邸谒见了恩师陈寅恪先生。

季羨林在离开德国以前，就听说恩师陈寅恪先生在英国医治眼疾。他连忙写了一封长信，向他汇报自己在德国十年来的学习情况，并将自己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和其他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寄呈给他。季羨林当时很快就收到先生的复信，告知他的近况，并说不久即将回国。陈寅恪还在信中说，他想向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几位先生介绍季羨林去北大任教。看了那封信，季羨林真是喜出望外，有谁听到能到最高学府去任教而不引以为荣呢？所以，季羨林又立即回了一封信，表示同意和感谢。

一听到陈寅恪先生就在南京，季羨林赶快赶到俞大维的官邸。陈先生寄住于此。见了面，陈先生特别高兴，他们畅谈了阔别十多年以来各自的详细情况。临告别之时，陈先生又特别叮嘱季羨林，一定要去鸡鸣寺下的中央研究院，去拜见北大代校长傅斯年先生，并特别嘱

咐，要带上用德文写成的几篇论文。季羨林由衷地感到先生对自己的爱护之深和用心之细。

3. 结识臧克家

在李长之南京的家里，季羨林结识了臧克家，从此一生定交，友谊保持到如今。

说到臧克家，季羨林在上世纪 30 年代就与他有过一次小小的文案。

原来，臧克家在上世纪 30 年代曾出版过一部《烙印》的诗集，其中收有《烙印》、《罪恶的黑手》等二十六首诗，写洋车夫、贩鱼郎、老哥哥等可怜的黑暗角落里的人群，这些诗作被老舍先生称为“石山旁的劲竹”，真心地“希望它变株大松”。[28]而季羨林却认为诗中对洋车夫的真实状况并不理解，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也并不是从劳动人民的立场去理解。因此，他就写过一篇评论发表出去，对《烙印》有些微辞。

没想到在李长之家里见到这位山东老乡，却有一见如故之感，谈得很投机、融洽。

本来季羨林与李长之是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四连贯的同学，但李长之又与臧克家有同学关系，这层关系多不为人所知。

臧克家是山东诸城人，私塾、小学都是在诸城上的。1923 年暑假，臧克家和同学乘胶济路火车去济南投考省立第一中学。一中为各地来省会投考的学生办了个暑期补习班，臧克家参加了。同班参加补习的有四十多人，其中就有个李长植，后来改名为长之，成为文学名家。但到考试时，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在先，臧克家去报考，结果被录取。八百名考生中，录取四十个，臧克家名列第十九。而李长之则考入正谊中学。

第一师范校址在都司衙门，后来成为泮源书院，前师三年，后师

三年。臧克家只读完了前师三年，1926 年去武汉，进了国民政府办的中央军事学校，这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继续，但他只呆到 1927 年 8 月，便回到老家。

1929 年，国立青岛大学（后改名山东大学）补习班招生，但需要大学预科的高中毕业的学历，臧克家本来没有资格报考，但他的族叔臧瑗把中国大学的预科毕业文凭借给他，使他进了学校大门。1930 年暑假，他重新考入这所大学，成为正式学生。在入学考试中，数学得了零分。国文考试有两道作文题，一是《你为什么投考青岛大学？》，一是《杂感》。他两题都作了。在《杂感》中写下三句话：

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做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29]

结果被闻一多先生意外地给了个 98 分。1934 年大学毕业，臧克家又到季羨林的老家临清中学（当时称山东省立第十一中学，现为临清一中）教中学，这又与季羨林多了一层关系。

来南京以前，臧克家在重庆歌乐山呆了三年，1946 年 6 月，夫人郑曼从机关中央卫生实验院“复员”到南京去，他作为眷属同行。

由于有这样一个机会，季羨林才得以结识臧克家。他听说季羨林将去北京大学任教，并就任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很为季羨林高兴。他们同在异乡，吃着故乡风味的饭食，一起去玄武湖上荡舟。

1946 年 7 月下旬，臧克家只身来到上海，投奔到山东同乡张亮忱家，做了一名不速之客。张亮忱是季羨林的临清老乡，是著名的为抗战而牺牲的爱国将领张自忠的弟弟。因为在重庆时同住在歌乐山，为筹备张自忠的纪念活动而认识，张亮忱把臧克家介绍给陈流沙，得以在《侨声报》负责副刊工作。

于是，臧克家便搬进上海北四川路东宝兴路 138 号《侨声报》报馆宿舍。这个宿舍是接收来的一座日本式小楼，楼上是拐尺形的一排房子，每人斗室一间。臧克家住在东头末尾一间，室内一桌一椅，睡“榻榻米”，入室脱鞋，客人来访，便席地而坐。臧克家任职的《侨

声报》是办给华侨看的一份民间报纸，销路只有几千份。他编的副刊是文艺版，每周一次，题名为《星河》。另外每月再出一期诗歌专页，题名为《学诗》。郭沫若、茅盾、巴金、叶圣陶、冯雪峰等著名作家都是副刊的撰稿人。

季羨林在南京住了一段之后，还是无法回济南去看望叔父和婶母。他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从上海乘轮船到秦皇岛，再从那里坐火车到北京。

这样，季羨林来到上海，投奔到臧克家的报馆宿舍，就住在他的“榻榻米”床上。季羨林的随身行李是六个书箱子，一个挨一个，把他的这间小屋挤得更小了。他们俩有时促膝谈心，有时抵足而眠，亲如兄弟。有时候，陈流沙也凑过去，三个人高谈阔论。

没过多久，郑曼在南京接到臧克家的信，让她辞掉工作赶快去上海团聚，以便互相照顾。臧克家夫人郑曼，也就认识了季羨林。她回忆说：

我一到上海东宝兴路 138 号《侨声报》宿舍，就见到一位身材颀长、面容清瘦、不苟言笑而又平易近人的中年人。克家向我介绍：

“这是我在南京李长之处认识的山东老乡季羨林，刚从德国留学回来，要去北京大学任教，我们一见如故，他到上海，就和我住在一起。”这是一座日本式小楼，一家一间小房子，铺的是榻榻米，没有任何家具。季先生不嫌弃我们穷困，他们就席地而坐，抵足而眠。他衣衫朴素，带的一箱箱行李全是书。在他身上，没有一点儿我见过的那些洋博士、洋专家的派头，有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而且，认识季先生越久，在他身上发现的这种美德越多，印象也越深刻，崇敬之情也就油然而生。[30]

当时，郑振铎先生也在上海，季羨林便和臧克家、王辛笛诸友去看过几次。

有一次，郑振铎先生请季羨林他们吃饭。郑先生的老母亲不顾高龄，亲自下厨房做福建菜。几个同去的人，自然都非常感动，季羨林

更是至今难以忘怀。

当时上海反动势力极为猖獗，郑先生追求进步，自然成了反动势力的对立面。他主编了一个争取民主的刊物，推动民主运动，更成了反动派的眼中钉，被列入黑名单，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当郑振铎先生与季羨林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出季羨林的意外。因为郑先生给季羨林的印象，一直是可爱可亲，和和蔼蔼，平易近人，光风霁月，菩萨慈眉。没想到，谈及此事时，郑先生的脸竟一下子红了起来，怒气冲冲，声震屋瓦，流露出极大的义愤和轻蔑。季羨林这才认识到郑先生的另一面：嫉恶如仇，横眉冷对，疾风迅雷，金刚怒目。对友与对敌，是两种态度。季羨林总算比较完整地认识郑振铎先生了。

就在上海，季羨林告诉郑先生，他已受北京大学之聘，担任梵文讲座。郑先生听后，喜形于色，认为在北京大学教梵文简直是理想的职业。表现出对梵文文学的重视和喜爱。稍后，郑先生又在自己主编的《文艺复兴·中国文学专号》的《题辞》中写道：

关于梵文学和中国文学的血脉相通之处，新近的研究呈现了空前的辉煌。北京大学成立了东方语文学系，季羨林先生和金克木先生几位都是对梵文学有深刻研究的。……在这个“专号”里，我们邀约了王重民先生、季羨林先生、万斯年先生、戈宝权先生和其他几位先生们写这个“专题”。我们相信，这个工作一定会给国内许多的做研究工作者们以相当的感奋的。[31]

郑振铎先生对于后学溢于言表的热爱和鼓励之情，使季羨林非常感奋。

此外，在上海时，季羨林还和臧克家到狄斯威路的一座花园洋房里去拜访郭沫若，可惜没见到。而叶圣陶的家就住在距臧克家住处咫尺的大街上，季羨林很顺利地拜访了叶老。

有一天，季羨林忽然听到传闻，国民党警察在南京下关车站蛮横地毒打了进京请愿的进步人士，其中有一个叫曹联亚（靖华）。从此，曹靖华的名字又深深地印在季羨林的记忆中，后来在北京大学工

作时，他们又成了同事。

4. 到达北京

暑假即将过去，北京大学就要开学。但当时战争仍在激烈进行，铁路交通继续中断，津浦路早已不通。

最后，季羨林听说只有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转乘火车才能到北京。因为从秦皇岛到北京的铁路由美国兵把守，所以还能通车。这样，季羨林告别了上海的师友，登上了开往秦皇岛的轮船。

1946年深秋，季羨林乘船到秦皇岛，转乘火车，终于来到了睽别十二年之久的北京。

北京的深秋寂冷，落叶满街，一片“落叶满长安”的悲凉气象。季羨林心潮起伏，酸甜苦辣，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他写道：

此时的局势却是异常恶劣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剥掉自己的一切画皮，贪污成性，贿赂公行，大搞“五子登科”，接收大员满天飞，“法币”天天贬值，搞了一套银元券、金元券之类的花样，毫无用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学教授也不例外。手中领到的工资，一个小时以后，就能贬值。大家纷纷换银元，换美元，用时再换成法币。每当手中攥上几个大头时，心里便暖乎乎的，仿佛得到了安全感。[32]

带着这样的印象，季羨林到达当时称为北平的北京。

第七章 沙滩足迹

一、创办东语系

1. 北大红楼

1952 年院系调整以前，北京大学在市里沙滩。当时北大有三个学院：文学院在沙滩的东部，紫禁城神武门即北门以东的汉花园，这里称一院；理学院在景山以东马神庙路北，即今景山东街，这里称二院，是原清朝所建京师大学堂的所在地；法学院原在南北河沿路西，后期移到文学院内。

文学院的校舍即有名的红楼。红楼是名副其实的红色建筑，四层的砖木结构，坐北向南是一个横长条的布局。在民国初年刚建造之时，本想用作宿舍，建成之后却用作文科教室。

红楼在地理位置上是多方面的中心，四通八达：

东通东四牌楼，西通西四牌楼，南行不远是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北行不远是地安门、鼓楼。风景也好，西行几百步就是故宫、景山、三海。缩小到仅限于学校也是这样；西是第二院（理学院），南是第三院（法学院），学生宿舍大小七处，分布在南、西、北三面。

[1]

张中行提到的这七处学生宿舍，分为两类，以男女分。男生宿舍有五处，分别是红楼西北角的东斋，理学院西墙外的西斋，法学院北边的三斋，红楼北边椅子胡同的四斋，法学院的一座二层“口”字形楼，被叫做第三院宿舍。女生宿舍则有两处，一处是在理学院的西南角，一处是在红楼北边松公府夹道。凡是在北京大学注册的正式学生，都可以住在学生宿舍，不花钱，还有工友伺候。

在张中行就读的 20 世纪 30 年代初，北京大学校内有可包饭的食堂，但北大学生有很多是不吃包饭的，而是去学校附近的饭馆就餐。饭馆的级别都不高，数目不少。红楼大门对面就有两家。东斋附近也有两家，东斋门是坐东向西的，对面稍北的一家是林盛居，北侧坐东向西的一家是海泉居。理学院大门对面的一家是华顺居，东边路北的一家是德胜斋，沙滩西端路南的一家是切面铺。

这些饭馆中最有特点的是三家。

切面铺货真价实，吃饼吃面条，都是足斤足两，但花样太少，品

位不高。照顾这里的大多是卖力气活的，但北大师生也有去吃的，主食吃十两（老秤 16 两一斤）烙饼，菜肴要一碗肉片白菜豆腐，味道不错，价钱也便宜，能吃得饱饱的。

德胜斋是回民饭馆，只卖牛羊肉菜肴，它的拿手好戏是烧饼加炖牛肉，照顾它的学生多半吃这种饭。

海泉居与其他非回民饭馆一样，有一种名菜，叫“张先生豆腐”，是沙滩一带风行的菜，据说发明人张先生是北京大学的，因为菜里有竹笋，可能是南方人。这里的跑堂的一口不中不西的半拉架子英文，常引人发笑。店里还异想天开请人借胡适之名题了副对联：

化电声光个个争夸北大棒

煎炸烹炒人人都说海泉成

下面落款是“胡适题”。[2]

1946 年深秋，季羨林回到故都北京，学校派阴法鲁先生到火车站去接他。汽车行驶在十里长街上，凄风苦雨，街灯昏黄，他真感到有点悲从中来，没想到重入故都竟是这样凄苦！他的心头不由自主地涌出了两句诗：

西风凋碧树，

落叶满长安（长安街也）。

进了学校，季羨林被暂时安置在著名的红楼三层上。

红楼曾是毛泽东和李大钊工作过的地方。进了沙滩汉花园东口红楼大门，往东走，在楼的东南隅，有两间向西的屋子，就是他们的工作处。

1918 年到 1919 年初，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这两间屋子，就是他的工作室和会议室。毛泽东曾在这两间屋子里工作过。外间屋里，有一张褐色的三屉桌和木椅，是毛泽东用过的家具。另有一只褐色玻璃门书橱，则是李大钊使用过的。

里面一间，有一张暗红色的写字台和已经磨坏了靠背垫的坐椅，还有一只与外间一样的玻璃门书橱，都是李大钊使用过的。李大钊在

这里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团结了许多青年，经常在这里开会，讨论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后来，郭沫若写过一首诗：

星火燎大原，
滥觞成瀛海；
红楼弦歌处，
毛李笔砚在。
力量看方生，
勋勤垂后代；
寿与人民齐，
春风永不改。[3]

季羨林住进红楼的时候，听到的是：在日寇占领时期，红楼驻有日寇的宪兵队，地下室就是日本鬼子杀人行刑的地方，传说里面还有鬼叫声。

季羨林从来不相信有什么鬼神，当然也不怕鬼神。但是，当时的红楼上下五层，到处寥寥落落，整个楼也就住着四五个人，再加上经常停电，电灯不明，在楼道的薄暗处，有时真仿佛有鬼影飘忽。当他走过长长的楼道，听到的只是自己的足音回荡，这时，他也颇疑非置身人间了。

但是，我怕的不是真鬼，而是假鬼，这就是决不承认自己是魔鬼的国民党特务，以及由他们纠集来的当打手的天桥地痞流氓。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正处在垂死挣扎阶段。号称北平解放区的北大的民主广场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红楼又是民主广场的屏障，于是就成了他们的进攻目标。住在红楼的人逐渐多起来了。大家都提高警惕，注意动静。我记得有几次甚至想用椅子堵塞红楼主要通道，防备坏蛋冲进来。这样紧张的气氛颇延续了一段时间。[4]

延续了一段时间，大家都担心的恶魔们并没能闯进红楼。但是，沙滩的北京大学和其建筑、周围的环境，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

化。张中行提到的这些饭馆早已不存在了。季羨林吃饭的地方，远不如张中行上学时那样多、那样好了，尽管季羨林是教授，而张中行在北大时是学生，只是张中行念书在先，季羨林教书在后，一“念”一“教”，一字之差，时间差了十几年，而新、老北大之间判然分明，今非昔比了：

红楼对面有一个小饭铺，极为窄狭，只有四五张桌子。然而老板手艺极高，待客又特别和气。好多北大的教员都到那里去吃饭，我也成了座上常客。马神庙则有两个极小但却著名的饭铺，一个叫“菜根香”，只有一味主菜：清炖鸡。然而却是宾客盈门，川流不息，其中颇有些知名人物。我在那里就见到过马连良、杜近芳等著名京剧艺术家。路南有一个四川饭铺，门面更小，然而名声更大，我曾看到过外交官的汽车停在门口。顺便说一句：那时北平汽车是极为稀见的，北大只有胡适校长一辆。这两个饭铺，对我来说是“山川信美非吾土”，价钱较贵。当时通货膨胀骇人听闻，纸币上每天加一个0，也还不够。我吃不起，只是偶尔去一次而已。我有时竟坐在红楼前马路旁的长条板凳上，同“引车卖浆者流”挤在一起，一碗豆腐脑，两个火烧，既廉且美，舒畅难言。当时有所谓“教授架子”这个名词，存在决定意识，在抗日战争前的黄金时期，大学教授社会地位高，工资又极为优厚，于是满腹经纶外化而为“架子”。到了我当教授的时候，已经今非昔比，工资一天毛似一天，虽欲摆“架子”，焉可得哉？而我又是天生的“土包子”，虽留洋十余年，而“土”性难改。于是以大学教授之“尊”而竟在光天化日之下，端坐在街头饭摊的长板凳上却又怡然自得，旁人谓之斯文扫地，我则称之源于天性。是是非非，由别人去钻研讨论吧。[5]

这就是季羨林初进北大住进红楼时的生活。但当时红楼的周边环境，却是极不适合做学问，完全处于一种无序状态，简直不像一个大学校园。对这段生活，季羨林回忆说：

古书上说：“德不孤，必有邻。”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德，但邻

人我却是有了，而且很多。因为我现在住在一座外面看上去似乎像工厂的大楼上，上下左右都住着人，也就可以说都是我的邻人。

古时候有德的人的邻人怎样，我不敢说，也很难想象出来。但他们绝对不会像我现在这些邻人这样精深博大，这是我可以断言而引以自傲的。我现在的邻人几乎每个人都是专家。说到中国戏剧，就有谭派正宗，程派嫡传，还有异军突起自创的新腔。说到西洋剧和西洋音乐，花样就更多。有男高音专家，男低音专家，男不高不低音的专家。在这里，人长了嘴仿佛就是为了唱似的。每当晚饭初罢的时候，左面屋子里先涌出一段二黄摇板来。别的屋子当然也不会甘居人后，立刻挤出几支洋歌，其声呜呜然，仿佛是冬夜深山里的狼嚎。我虽然无缘瞻仰歌者的尊容，但我的眼却仿佛能透过墙壁看到他脸上的青筋在鼓胀起来，脖子拼命向上伸长。余音在长长的走廊里回荡，我们这房子可惜看不到梁，不然这余音绕在上面怕是永远再不消逝了。岂能只绕三天呢！古时候圣人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我听了这样好的歌声，吃到肚子里去的肉只是想再吐出来。自己发恨也没办法。以前我也羡慕过圣人，现在我才知道，圣人毕竟是不可及的了。

但这才只是一个开端。不久就来了乐声。不一定从哪间屋子里先飘出一阵似乎是无线电的声音，有几间别的屋子立刻就响应。一转耳间已经是八音齐奏，律吕调畅，真正是洋洋乎盈耳哉。但却苦了我这不懂音乐的人。有时候电忽然停了，论理我应该不高兴。但现在我却从心里喜悦，以为最少这无线电收音机可工作不成了。但我失了望。不久就又是一片乐声从烛光摇曳的屋子里洋溢出来，在黑暗的走廊里回旋。我的高邻们原来又开了留声机。他们一点都不自私，毫不吝啬地把他们的快乐分给我一份，声音之高，震动全楼。他们废寝忘餐地一直玩到深夜，我也只好躺在枕上陪他们，瞪大了眼睛望着黑暗。

他们不但在这方面表现出一点都不自私，在别的方面他们也表现出他们的大度。他们仿佛一点秘密都不想保守。说话的时候，对方当然要听到，这是不成问题的。但他们还恐怕别人听不到，尽量提高了

喉咙。有时候隔了几间屋还可以听得清清楚楚。倘若他们在走廊里说话，我的屋里就仿佛装了扩音器，我自己也仿佛在听名人演讲。当他们说话中再加上笑声的时候，那声势就更大。勉强打个譬喻，只有八月中秋的钱塘怒潮可以比得来。真足以振懦起弱，回肠荡气。我们这座楼据说已经有了点年纪，我真担心它会受不住这巨声的震荡蓦地倒下去。

当他们离开自己的屋子或者回自己屋子来的时候，他们也没有秘密，而且是惟恐别人不知道。他们关门的声音和底上钉了铁块的大皮鞋的声音就是用以昭告全楼，说是他们要出去或者回来了。在我的故乡，倘若一个人鬼鬼祟祟地放轻了脚步走到人家窗下去偷听人家的私话，我们就说这个人是踏鸡毛鞋。意思是说他的鞋底是用鸡毛做成的，所以走起路来没有声音。我们的高邻却绝对不踏鸡毛鞋，他们的鞋底是铁做成的。有时候我在屋里静静地看一点书，蓦地听到一阵铁与木头相击的声音，我心里已经知道是我的邻人来了。但我还没来得及再想，轰的一声，我的屋子，当然我也在内，立刻一阵震动，桌上玻璃杯里的水也立刻晃动起来，在电灯光下，起了成圈的水纹，伸张，扩散，幻成一条条的金光。我在大惊之余，脑海里糊涂了一阵。再仔细一想才知道是我的邻人在关门。

这一惊还没有定，头顶上又是轰的一声，仿佛中了一个炸弹。我的神经立刻紧张起来，我忘记我现在是在北平，我又仿佛回到两年前去，在德国一个小城的防空洞里，天空里盘旋着几百架英国飞机，就在不远的地方，响着一声声的炸弹。每一个炸弹一响，我就震得跳起来。每一霎那都在等着一个炸弹在自己头上一响，自己也就像做一个恶梦似地消逝了。自己当时虽然没有真地消逝，但现在却像一个被火烧过的小孩，见了一星星的光，身上也就不自主地战栗起来。但是我的头顶上还没有完。一声轰以后，立刻就听到桌子的腿被拖着在地板上走，地板偏又抵抗，于是发出了令人听了非常不愉快的声音。不久，椅子也被拖着走了，书架也被拖着走了，这一切声音合成一个大

交响乐。住在下面的我就只好义务地来听。而且隔上不久，总要重演一次，使我在左右夹攻之中还要注意到更重要的防空。

这种生活确不单调，确不寂寞，也许有不少的人喜欢它。但我却真有点受不了。在篇首我引了两句古书：“德不孤，必有邻。”那么倘若一个人孤而无邻的话，那他就一定是不德了。韩文公说：“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谁都知道德是好东西，我也知道。但倘若现在让我拣选的话，我宁取不德。[6]

2. 东语系系主任和教授

到北大红楼住下的第二天，季羨林便去拜会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先生。汤先生告诉季羨林，按照北京大学和其他一些大学的规定，在国外得到博士学位回国的人，最高只能给予副教授的职称。同样的话，季羨林在南京拜会傅斯年先生时，已经听傅先生说过。这次得到印证，所以他一点也不感到意外。这种博士，在清华只做专任讲师。只有经过几年的时间，才能转为正教授。季羨林知道这一点，自己当然不能例外。他心悦诚服地接受北大的这种安排，没有半点非分之想。而且，生活虽然有点艰难，但他却一点也不后悔。在离开德国之前，一听到有可能到北大工作的消息时，季羨林就写过一封信，寄给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的哥廷根大学老朋友哈隆教授，婉言谢绝了剑桥大学的高薪聘请，决心不再回欧洲。现在，生活虽然还有困难，但他终于因为能在自己祖国的最高学府工作而感到自豪。从那时起，除了短暂的外出访问，季羨林始终都没有离开过北大。

过了大约一周的光景，汤用彤先生突然告诉季羨林，他已被聘为正教授，并兼任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这完全出乎他自己的意料：

这真是石破天惊，大大地出我意料。我这个当一周副教授的记录，大概也可以进入吉尼斯世界记录了吧。说自己不高兴，那是谎言，那是矫情。[7]

就从 1946 年深秋开始，季羨林出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在此职务上，他一干就是三四十年。

据季羨林自己说，东方语言文学系的创办，完全是因缘和合的结果。大概北大早就有建立这样一个空前未有的学系的想法。到了 1946 年，由胡适校长、傅斯年代理校长、汤用彤文学院院长批准，背后再加上清华大学陈寅恪教授的推动力量，这些学者都是国内学术界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之下，东方语言文学系便诞生了。

东语系初创之时，除系主任季羨林外，还有三名教师：王森先生，是原先就在北大工作的；马坚先生于 1946 年初秋从云南大学来北大的；金克木先生，是比季羨林稍晚一点来到北大的。不久，又增加了两位教员：马学良先生和于道泉先生，分别代表两种语言。当时学生的数目还要少于教师，在红楼的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能够召开全系大会。

初建时的东语系是北京大学最小的系，但经过开创者及后继者长达五十余年的努力，东语系一步步发展壮大，不仅培养出大批第一流的东方学者，还培育出数十名驻外大使。而这一切都是与季羨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季羨林从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伊始，对学生就充满了爱心。他一进校时，就了解到学生中也有两种力量，他写道：

在学生中，新旧势力的斗争异常激烈。国民党垂死挣扎，进步学生猛烈进攻。当时流传着一个说法：在北平有两个解放区，一个是北大的民主广场，一个是清华园。我住在红楼，有几次也受到了国民党市党部纠集的天桥流氓等闯进来捣乱的威胁。我们在夜里用桌椅封锁了楼口，严阵以待，闹得人心惶惶，我们觉得又可恨，又可笑。[8]

可以说，从这时候，他已经把自己全部身心都投入到教育事业之中，和青年学生同呼吸共命运了。这种与学生之间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到老年也始终不变。这使他成为桃李满天下的一代名师，从他老

年写的一段话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对青年学生的爱心：

我想到的不只有老年朋友，年轻朋友，包括我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学生，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我也都一一想到了。我最近颇接触了一些青年学生，我认为他们是我的小友。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一群小友的感情越来越深，几乎可以同我的年龄成正比。他们朝气蓬勃，前程似锦。我发现他们是动脑筋的一代，他们思考着许许多多的问题。淳朴，直爽，处处感动着我。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我们祖国的希望和前途就寄托在他们身上，全人类的希望和前途也寄托在他们身上。对待这一批青年，惟一正确的做法是理解和爱护，诱导和教育，同时还要向他们学习。这是就公而言。在私的方面，我同这些生龙活虎般的青年们在一起，他们身上那一股朝气，充盈洋溢，仿佛能冲刷掉我身上这一股暮气，我顿时觉得自己年轻了若干年。同青年们接触真能延长我的寿命。古诗说：“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我一不服食，二不求神。青年学生就是我的药石，就是我的神。我企图延长寿命，并不是为了想多吃人间几千顿饭。我现在吃的饭并不特别好吃，多吃若干顿饭是毫无意义的。我现在计划要做的学术工作还很多，好像一个人在日落西山的时分，前面还有颇长的路要走。我现在只希望多活上几年，再多走几程路，在学术上再多做点工作，如此而已。[9]

季羨林对青年学生的这种爱心，使他永葆青春活力，也是他健康长寿的重要条件之一，这正应了那句古话：仁者寿。

3. 创业者的同伴——马坚和金克木

在季羨林 1946 年深秋到北大之前，马坚先生已经先期到达北大了。

大概在北京大学决定聘任季羨林的时候，就有了筹建东语系的想法。1946 年，经向达教授和白寿彝教授推荐，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汤

用彤先生，代表北大大写信给在昆明云南大学任教的马坚先生，邀请他到北京大学任教。那时，昆明不能直达北京，经北大安排，马坚先生和夫人马存真，经香港、上海，辗转来到北京。后来参与季羨林先生创办东语系的工作，开设阿拉伯语专业，这是中国历史上高等学校最早开设的阿拉伯语专业。

马坚先生比季羨林大五岁，生于 1906 年。他是云南个旧回族人士，字子实，又名自适。他在上海回教会伊斯兰师范学校阿拉伯文速成班学习，1931 年 12 月去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留学期间把中文《论语》译成阿拉伯文，在埃及出版，并译成《回教哲学》、《回教教育史》阿文书籍为中文。1939 年夏天，他乘轮船离开埃及，经香港回国，开始着手翻译《古兰经》。后来，他从上海回到云南沙甸，继续翻译《古兰经》，并着手翻译《伊斯兰哲学史》，同时又在白亮诚先生办的私立养正学校任教。

进北大后不久，在秋季新学期开学之后，经马松亭大阿訇鼎力推荐，从北京成达师范学校阿拉伯语专修班转来十多名学生，成为东语系阿拉伯语专业的第一批学生，壮大了东语系的学生队伍。当时东语系还没有阿文打字机，马坚先生除备课、上课外，还要自己刻蜡板，印阿文讲义。

马坚先生教学循循善诱，让学生学以致用，翻译外文力求做到信、达、雅。读外文书时，遇到解决不了的单词，可先往后看，从下文去领会该词含义，然后查字典以求确切。他告诉学生说：学外文如同织毛衣，学习是艰苦的，学习后须经常使用，包括口语、耳听、阅读等，如果不用，会像拆毛衣一样，拆起来是很容易的。[10]

马坚先生的教学方法，与季羨林的教学法正好相得益彰。

季羨林是用自己在德国学到的外语教学法教学生学梵文。根据他的要求，学生必须在上课以前把他将要讲解的课文仔细预习一遍，尽可能把它读通。到课堂上，他首先向学生提问，让学生讲解课文。第一位学生讲得不对，或者不完全对，他就再问第二位、第三位。而

后，他再根据学生的预习程度，细致而有重点地把课文讲解一遍。讲完之后，再让学生向他提问，直到学生提不出问题为止。所以，季羨林的教学程序是：学生预习，老师问学生；老师讲解，学生问老师。

[11]

金克木先生是安徽寿县人，生于 1912 年，比季羨林小一岁。在家乡时，他大嫂教给他读书法，即用什么，就学什么，用得着就学会了，不用就忘了，再要用又拣起来。这种方法影响了他的一生。在老家上小学时，他开始读《三字经》、《论语》，后来又接触《饮冰室文集》和《新民丛报》、《富强斋丛书》，并读给儿童看的文言书《华盛顿》、《林肯》、《拿破仑》、《牛顿》，以及《唐诗三百首》。九岁以前专读中国书，九岁到十七八岁，兼读中外两种书。他小学毕业后，从上海函授学校学习世界语，后来又到北京和香港，接触了几个外国人，有机会经缅甸到了印度，在鹿野苑从印度老人法喜居士学读古书，专门学习梵文、印地文。学到的读书法是依据文本追查上下文，探索文体，破译符号，解析阐释层次，学习语言学 and 哲学的一种新方法。

金克木先生自称不是专家，而是杂家。他从乡间小学教到初中、高中、大学，还当过图书馆员和报馆编辑。教小学时，他才十几岁，一个人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都要教，只得采取“复式教学法”。

金克木基本上靠自学，掌握了七八种外语，教过的外语就有英、法、梵、印地、乌尔都、世界语，主张外语的本领不是教会的，而是学会的。他在湖南大学文学院任讲师时，又开始学拉丁文，读拉丁文《高卢战记》。

他教的课也范围广泛，在山东德县师范讲习所教语文，在武汉大学当教授时，又教印度哲学史。[12]

由于有这些经历，金克木也被聘为北大东语系教授，担任梵文讲座，并开过其他许多课，包括印地语和印度哲学史等，为东语系培养出大批优秀学生，直到专任北大南亚研究所专职教授为止。

至于参加初建东语系工作的王森先生、于道泉先生、马学良先生，也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马学良先生后来到中央民族学院（现改为中央民族大学）担任教授。

二、翠花胡同

1. 这里是东厂遗址

在北大文学院的红楼住过一段时间之后，季羨林搬进了翠花胡同。

胡同是北京的特产。北京胡同的名称充满了色彩和暗示，如口袋胡同、苏州胡同、梯子胡同、马神庙胡同、弓弦胡同、取灯胡同、妞妞房胡同、羊市胡同、猪市胡同、骡马市胡同、驴市胡同、菜市胡同、缸瓦市胡同、礼士胡同。有一些胡同，本来是极富暗示力的，但后来觉得有点不雅，便用谐音改过，如劈柴胡同改为辟才胡同，烂面胡同改作烂缦胡同，蝎子庙胡同改为协资庙胡同，狗尾巴胡同改为高义伯胡同，鬼门关胡同改为贵人关胡同，勾阑胡同改为钩帘胡同，大脚胡同改为达教胡同。但这一改就有失胡同起名之初衷，所以有人认为这一改，没有一个不是由新奇改为平庸，由优美流为劣下。[13]

翠花胡同很好听，也很雅，用不着改名，但这么漂亮的名称，却与一段非常恐怖的历史联系在一起。

原来这里是明朝东厂的所在地。明成祖朱棣为了镇压人民和官员中的反对派，加强对全国的统治和维护皇权，在加强锦衣卫的同时，于永乐十八年（1420）设立“东缉事厂”，简称东厂，是听命于皇帝而由太监直接掌握的特务组织。由亲信太监提督，专事“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的特务活动，从事侦缉。明宪宗朱见深又于成化十三年（1477）增设西厂，用太监汪直提督。西厂成立后，其人员、权势均超过东厂，活动范围自京师遍及全国各地。明武宗朱厚照正德五年

（1510），废除西厂，而东厂则保留如故。

东厂的设置，是明代一大弊政。罹其毒害者，上至朝廷命臣，下至边远居民，难以数计。魏忠贤提督东厂之时，“东厂番役横行，所缉访无论虚实辄糜烂”（《明史·魏忠贤传》）。这里杀人如麻，惨不忍睹，“刑法有创自有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明史·刑法志》）。明武宗时，宦官刘瑾专权，嫌东厂尚不能尽特务统治之残暴，又于正德三年（1508）设立“内办事厂”，简称“内行厂”，由刘瑾本人亲自指挥控制，作为特务统治的号令机关，对东厂和当时暂时恢复的西厂特务实行监视。“内行厂”在刘瑾被杀之后，与西厂一起因遭剧烈反对而被撤消。

这样一个东厂，就设在翠花胡同。而季羨林的住处，就是当时特务行刑杀人之处。据北京大学教授白化文先生的回忆，当时季羨林居住时翠花胡同的情况是这样的：

抗战胜利后，我家移居北京东城区翠花胡同。这胡同是一溜朝南开门，所对的南墙可就是东厂胡同的后墙了。这一溜墙只开了一个朝北的大门，就是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后门。正和我们家的大门是斜对门。当时我正读高中，并立定了要上北大读中文系的志愿。所以，我是经常到文科研究所以及沙滩红楼溜达的，没有什么目的，吸取气氛而已。日子长了，文科研究所的门房就和我熟悉了，听凭自由出入还告诉我许多人和事。

解放前的文科研究所，就说 1947—1948 年那会儿吧，一进门是一个小院，两厢相对的，一厢是中文系统的“语音乐律研究室”，那似乎是刘半农（夏）先生创办的，当时常驻的是周燕孙（祖谟）先生。周先生除了自己的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和教学任务外，似乎还在编研究所的刊物《国学季刊》，另一厢常驻的则是考古系统的宿季庚（白）先生。再往里还有几层院子，可就不敢进去了。据说那里原来是明朝东厂宦官审讯设私刑之处，弄死人是常事。还有过去那院子的

房子里停满了棺材的传说。总之，是个阴气森森的地方，冤魂聚居之处。我生来胆子就小，经这种传说一吓唬，到现在也没敢进去过。只有一个人住在那里，独自掌管好几层大院子，那就是季希逋（羨林）老师。

那时季先生也就三十六七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些，不过三十岁上下的样子。高高的个子瘦瘦的体态，一副严肃认真的面容。许多人告诉我，这是一位懂得极为深邃古奥的多种古代东方语言的大专家，胡适之校长特聘来的教授和系主任。于是我的对知识分子名人崇拜的心理大大膨胀，看到季先生进出研究所，感到真是“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我还觉得，一位敢于单独住在那样一个深宅大院中的高级知识分子，一定是勘透了天人三界；一位甘愿在近似古庙荒斋之处生活的人，一定在寂静中追求什么，除了钻研学术，我想不出还能有别的了。[14]

后来，臧克家一家从香港到北京，季羨林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臧克家夫人郑曼回忆说：

1949年3月，我随克家乘党组织包租的外轮，自香港来到刚解放的北平。那时候，我们的心是那么的欢畅，天是那样的晴朗，一切都是那样的新鲜，想会老友的心情，是那样的急切。我们首先去拜访季先生。当时，他住在东厂胡同翠花胡同，那是一个很寂静的大院子，树木蓊郁，石碑卓立，里边就住着季先生一个人，他的寝室外间还摆着一口棺木。我脱口而出问道：“季先生，你一个人住在这里，不害怕吗？”他说：“这正是我看书、工作的好地方，不会有人来打扰我。棺木，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又问他：“怎么不把大嫂接来？”他说：“济南还有一大家子人需要她照顾。”季先生留学德国十年，好不容易盼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回到祖国，来北大教书也快三年了，为了顾全大家庭，宁愿自己过着清苦的单身生活。[15]

实际上，季羨林住在这里并不像说的那样轻松。

2. 马缨花做伴

季羨林孤零零一个人住在这样一个很深的大院子里，其寂寞与孤独，不是亲身经历者，恐怕是永远也不会了解的。

季羨林下班之后，从外面走进去，越走越静，自己的脚步声越听越清楚，仿佛是从闹市走进深山。等到脚步声成为空谷足音的时候，季羨林的宿舍也就到了。

这是又一个院子，大院子里边套着的又一个。院子也不小，都是方砖铺地，三面有走廊。天井里遮满了树枝，走到下面，浓荫匝地，清凉蔽体。房子的气势，梁柱的粗细，在炫耀着当年的富贵气象。不知多少忧国忧民的志士在这里被囚禁过，受过酷刑，甚至丢掉性命。当年囚禁志士们的水牢，还有迹可寻。

季羨林住进去的时候，昔日的富贵气象自然早已成为陈迹，然而阴森凄苦恐怖的气氛，却几乎是原封未动的。走廊上，陈列着一些汉代石棺石槨，刻着篆字、隶字的古石碑。季羨林一走回这样的一个大院子里，仿佛走进了一个古墓。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里，季羨林自己觉得像是生活在历史中，俨然成为古人了。

季羨林从来不相信鬼神，所以住在这也能处之泰然。当然也有例外。有时候，半夜里往往能突然听到推门的声音，很大很强烈。季羨林不得不起来去看看，但那时候，北京常停电，他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着爬起来，摸索着找门，摸索着走出去。院子里也是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树的影子仿佛与黑暗纠缠在一起，分都分不出来。他只听到院里大香椿树上有一阵窸窣的声音，忽然间，“喵”的一声，两只小电灯似的眼睛，从树枝深处对着季羨林闪闪发光，这才知道是这东西把门弄得那么大的响声。

最困难的是对他的那些朋友们，这个地方引不起他们的什么好感。有几位大胆一点的，白天还有兴致去找他聊聊天，但在黄昏时分就不敢进这院子了。万一有事，在黄昏时分不得不来的时候，先要向

住在大院子里传达室的工友打听，季羨林是否在屋子里。在屋里，他们才有勇气，“跋涉”过那一个长长的翠花胡同，走过深深的院子，走到他的屋跟前。有一次，季羨林恰巧有事出了门，而工友又没看见。一个朋友就误以为季羨林在家，走进这个院子。在黄昏的微光中，只见一地落叶，满院石棺，却不见屋里有灯光，不见有季羨林的影子。那个朋友吓得腿立即抖起来，浑身筛起糠来，费了好大的劲，拖着两条腿走了出去。第二天，俩人见面时，谈起头天的经历，相对大笑。

由于这样，朋友们往往不敢进这道院，季羨林难免有孤独感。

我是不是有孤寂感呢？应该说是有的。当时正是“万家墨面没蒿莱”的时代，北京城一片黑暗。白天在学校里的时候，同青年同学在一起，从他们那蓬蓬勃勃的斗争意志和生命活力里，还可以吸取一些力量和快乐，精神十分振奋。但是，一到晚上，当我孤零一个人走回这个所谓家的时候，我仿佛遗世而独立。没有人声，没有电灯，没有一点活气。在煤油灯的微光中，我只看到自己那高得、大得、黑得惊人的身影在四面的墙壁上晃动，仿佛是有个巨灵来到我的屋内，寂寞像毒蛇似地偷偷地袭来，折磨着我，使我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在这样无可奈何的时候，有一天，在傍晚的时候，我从外面一走进那个院子，蓦地闻到一股似浓似淡的香气。我抬头一看，原来是遮满院子的马缨花开花了。在这以前，我知道这些树都是马缨花；但是我却没有十分注意它们。今天它们用自己的香气告诉了我它们的存在。这对我似乎是一件新事。我不由得就站在树下，仰头观望：细碎的叶子密密地搭成了一座天棚，天棚上面是一层粉红色的细丝般的花瓣，远处望去，就像是绿云层上浮上了一团团的红雾，香气就是从这一片绿云里洒下来的，洒满了整个院子，洒满了我的全身，使我仿佛游泳在香海里。[16]

这样几座深深的大院子，而在最里面的三个院子里，在这样一个可怕的地方，只住着他一个人，所以有这样的花，有这样的香，他就

觉得非常不寻常。有马樱花慰藉他寂寥，他甚至有一些近乎感激的心情了。从此，他很自然地爱上了马樱花，把它们当成了自己的知心朋友。

朋友们都因这地方阴森可怕，晚上不敢有人去找他，而他则因为有了这些花而怡然自得。每当夏夜，他起床之后，立刻就闻到院子里那些高大的马樱花树散发出来的阵阵幽香，这些香气破窗而入。他于此时，神清气爽，乐不可支，甚至连手中的那支笔，也仿佛生了花。

[17]

有猫做伴，有马樱花做伴，季羨林打发着难熬的一个个孤独的夜晚。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一辈子都喜欢猫，喜欢植物的原因。他写猫、写植物的不少散文，仿佛回答了这个问题。

3. 回济南省亲

济南虽然不是季羨林的出生地，但他从6岁进济南，19岁离开，大学毕业后又在济南工作了一年，前后在济南生活了14年，因此，季羨林一直把济南当做自己的故乡，在回忆文章里总是说到故乡济南如何如何。而且他的叔父、婶母、妻子、儿女，也都在济南。他的家就安在济南，而自己回国以后，是只身一人在北大工作。工作了一年，他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与日俱增。整整12年了，他们如今怎么样了？季羨林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自己济南的家。

1947年，铁路交通仍然不正常，但季羨林还是下决心要回家看看。没有别的办法，他只有坐飞机从北京回济南。这是想尽办法才坐上的资本家运轮胎的包机，他是惟一的乘客。

到了家，看到了未曾识面的第二位婶母。他叔父的第一位夫人，姓马，叫马巧卿，是把季羨林抚养大的，季羨林还没有去德国留学的时候，她去世了。对这位婶母，季羨林并没有太多愉快的记忆。但不知道为什么，季羨林不希望叔父续弦。1935年夏天叔父和这位续弦

的第二个婶母结婚的时候，季羨林借故提前离开济南，滞留北京一段时间，然后去天津办理出国手续，接着乘火车经东北去德国留学。因此，他还从来没有见过她。在德国还能通信的时候，在“敬禀者”的对象中也有对这位继“婶母”的称呼，但对他来说，却还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名和实是对不上号的。直到回到济南，才把概念同真人对上了号。

继婶母姓陈，名韶泽，从名字看似乎是出身名门，其实不然。但家中原也不是最低层的，不然，幼年时不会学到中医知识。

这位婶母是绝顶聪明的人，也是一个有个性有脾气的人。季羨林初回家的时候，婶母是斜着眼睛看他的，意思似乎在说，结婚十几年了，怎么忽然凭空冒出来一个如亲生儿子似的侄子？他是什么人呢？好人？坏人？好不好对付呢？一见面，她似乎有许多的问号。季羨林心里清楚，这是人之常情，不能怪她。

在季羨林的心目中，婶母地位仅次于生母，他对她非常尊敬。在他离家的十二年中，婶母在国内经历了日军占领时期，此时又经历着解放战争。在国外期间，有五六年是音讯不通的，亲老、家贫、子幼，而他又鞭长莫及。叔父脾气非常暴烈，甚至有些乖戾，极难侍奉。家中经常没有经济来源，就全靠婶母一个人支持。她去摆过烟摊，到小市上卖过衣服小家什，在日军刺刀下去领过混合面，骑马到济南南乡去勘查田地，充当地牙子，赚点钱供家用。她靠自己幼年时学到的中医知识，给人看病。婶母以“少妻”的身份，对付难以对付的叔父“老夫”。所以，她的苦心，经常催季羨林下泪。他知道，在那样万分艰难的年代里她竟然没让孙女婉如和孙子延宗（后来改为季承）失学，把他们抚养成人。女儿婉如 1951 年考入天津大学土木工程系，1955 年毕业，后来成为核工业部的高级工程师。儿子季承，1952 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即后来的北京俄语学院，1955 年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搞科研管理，也是高级工程师。所以，季羨林知道，如果没有婶母（后来家里人称她为“老祖”），

自己的家早就完了。没有她，这次回家恐怕也只能看到一座空房，妻离子散，叔父归天了。

我自认还不是一个混人。我极重感情，决不忘恩。老祖的所作所为，我看到眼里，记在心中。回北平以后，给她写了一封信，称她为“老季家的功臣”。听说，她很高兴。见了自己的娘家人，详细通报。从此，她再也不斜着眼睛看我了，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互相尊重。我们全家都尊敬她，热爱她，“老祖”这一个朴素简明的称号，就能代表我们全家人的心。[18]

妻子彭德华也不容易，她比季羨林年长四岁，已经到了四十岁。对于季家来说，她真正是做到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她一辈子勤勤恳恳，含辛茹苦。上有公婆，下有稚子幼女，丈夫十几年不在家。叔公极难侍候，家里又穷，经济朝不保夕。这十几年她到底受过多苦，季羨林怎么也搞不清楚了。

妻子天资不是太高，上学又不多，只上过小学，大概能认千八百个字。她从来没看过任何一部小说，别的书也谈不到去看了。她从来没有给季羨林写过一封信，在德国这十一年也不例外，她根本拿不起笔来。这样一个妻子，文化水平是很低的，但是道德水平是极高的。季羨林对她充满了感激之情。

为了照顾叔公、婶母，妻子呆在济南，一直到叔父去世以后，1962年她才和婶母、子女一起从济南搬到北京，与季羨林团聚。

在济南省亲期间，季羨林去看望了山东省立济南高中的好友许衍梁。他们不是同班，季羨林比许衍梁要高一级或两级，但却是同龄人，因为有共同的爱好，他们成了好朋友。1929年，他们在济南高中上学，都受胡也频宣传的革命文艺的影响，受到感染，写过有关现代文艺的文章。结果，济南高中的国民党训导主任散布流言，说学校成了“土匪训练班”，许衍梁成为“土匪”之一。季羨林考入清华大学以后，他们失去了联系，这次才有机会再次会面。当时济南正处在解放战争的前沿阵地，实际已经成了一座孤城，国民党眼看就要崩

溃。他们见过几次面，季羡林就回北京了。

许衍梁后来当过济南市副市长，在山东省科委主持过工作。20世纪80年代，季羡林回济南参加比较文学学术讨论会，又一次见到了济南高中的老友：许衍梁、余修、黄离等人。老朋友们都兴奋异常，感慨万端，季羡林很自然地想起了杜甫的一首诗：

人生不相见，
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
共此灯烛光。

可惜这次会面之后不久，余修谢世。1986年，许衍梁也病逝于北京。

4. 清苦与快乐

季羡林从济南探亲以后又回到北京，重新过着独身的清苦生活。

他仍然住在翠花胡同的小院里，孤寂而清冷。饿了，同人力车夫一起去路边的小吃摊，坐长条板凳喝豆腐脑；渴了，捅开煤炉子烧上一壶水，泡杯茶喝。从此，他形成一个固定的生活习惯，即每天的早餐就是吃烤馒头片就炒花生米，花生米是那种最平常最一般的炒五香花生米，然后佐以一杯浓茶，天天如此，从无单调厌恶之感，而且味觉还越来越好。这种习惯，季羡林自己戏称是他个人的怪癖。[19]

生活虽然清苦，但清苦中自有快乐。季羡林的快乐，得自读书。这正应了陶渊明《答庞参军》中的一句话：“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是幽居。”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甲全国大学，当时的馆长毛子水对季羡林格外开恩，在图书馆里给了他一间研究室，并允许他从书库中直接提一部分必要的书，拿回研究室，供他随时查用和阅读。他一有闲空，便潜入自己的这间研究室，“躲进小楼成一统”，潜心默读，坐拥书

城。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岁月里，能有这样一处足以安身立命的清静世界，且有书读，实在令他十分兴奋。[20]

同时，北京图书馆的馆长袁同礼先生，聘请季羨林把北图有关梵文的藏书检查一下，看看全不全。他发现，专从东方学而言，北图的藏书并不多，还不如他自己的私人藏书多。

这样，对于季羨林来说，自己喜欢的那一套印度古代语言，就缺乏起码的书刊资料。不管他多么不愿意，研究工作确实是无法进行的，只能束之高阁。但他自己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有志于从事科学研究。经过一段徘徊和迟疑，他决定有什么饭，就吃什么饭；有多大碗，就吃多少饭。从此，研究印度史，研究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印度佛教史，翻译和研究梵文文学作品也成了他的主要工作。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成为一个“杂家”。[21]而且，在所涉及的诸多领域，都是学有所成，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问世。

这段时间，季羨林还有一件快事，那就是在 1947 年或 1948 年，在北京大学子民堂筹办了一个印度诗人泰戈尔的画展。

泰戈尔是印度现代伟大的诗人、作家、哲学家。1913 年，他的抒情诗集《吉檀迦利》获诺贝尔文学奖，其哲学思想也在印度现代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24 年 4 月，泰戈尔在山东济南的省议会发表讲演，著名文学家王统照为他当翻译。泰戈尔一把长须，神采奕奕，虽已年迈，而声音宏亮，开头一句是：“I know……。”他当时来华，因为是和平主义者，革命派并不赞成他。但爱好文艺的人震于他的大名，都欢迎他。[22]那年，季羨林十三岁，他在济南也目睹了泰戈尔的丰采，到高中阶段，又开始读他的作品，也曾模仿他的风格写过一些小诗。到北大以后，开始对他进行研究，写过一篇《泰戈尔与中国》的长文。[23]

在办画展之前，季羨林就知道大画家徐悲鸿先生曾在泰戈尔创办的印度国际大学呆过，且给泰戈尔画过一幅有名的像，所以他就求助于徐先生。徐先生非常热心，不仅借画给他，还亲自到北大去指导。

偕同徐先生的有夫人廖静文女士和画家吴作人。从此，他结识了吴作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身材魁梧，威仪俨然，不像江南水乡人物；沉默寡言，然而待人接物却诚挚而淳朴。他们在无言中成了好朋友。

[24]

在事业中，季羨林忘记了清苦，忘记了寂寞，享受着快乐。

5. 迎接解放

终于到了 1948 年冬天，年底，人民解放军把北京团团围住。北京大学的教授们有一天在沙滩子民堂里欢度校庆。城外炮声隆隆，与会的教授们不无幽默地说，这是为校庆而放的鞭炮。大多数教授们并没有身处危城的恐慌感，反而是有所期望，有所寄托。这时候，校长胡适从南京派来了专机，想接几个教授到南京去，拟了一个名单。胡适校长先期乘飞机在东单的临时机场仓皇逃走，而名单上的人，只有几个教授与他同命运，共进退，其余的都留下了。[25]

其实，就连胡适先生，走的时候也是有思想斗争的。

有一天，季羨林要去校长办公室见胡适，商谈一些问题。正谈着，忽然走进来一个人，告诉胡适，昨天夜里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有专门给胡适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蒋介石集团逃跑，并说将来让他仍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在座的人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感兴趣，也都想看一看胡适有什么反应。只见他听了之后既不激动，也不愉快，而是异常地平静，只微笑着说了一句：“他们要我吗？”短短的五个字，道出了他的心声。虽然看样子他已经胸有成竹，要跟国民党跑，但是，又不能说他对共产党有刻骨的仇恨。不然，他决不会如此镇定自若，他一定会暴跳如雷，大骂一通，来表示自己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忠诚。在政治上，他有时候想下水，但又怕湿了衣裳。作为一位非常复杂的人物，他反对共产主义，但是拿他那一把美国尺子来衡量，他也不见得赞成国民党。[26]

1949年春的一天，人民解放军终于进了北京城。

那一天，天气不好，刮着大风。季羨林冒着大风，走出翠花胡同，到距离不太远的东四牌楼去欢迎解放军。这些可爱的战士，季羨林与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但对他们的事迹，却是非常熟悉的，他不知道从报纸的字里行间有多少次读到过他们胜利的消息，因而为他们的胜利而感到无限的振奋，为祖国的前途有了希望而感到鼓舞。现在，他居然亲眼看到他们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了北京城，对这些未曾谋面的勇士们，他仿佛是碰到了久别重逢的故人。季羨林跟着群众鼓掌、喊口号。由于内心激动，不时地热泪盈眶。剧烈的风沙似乎也被人们的热情压下去了，一点也显不出平常的那种威风来了。

就在这一天的下午，季羨林到西城去看朋友。出了翠花胡同，他走到什刹海的桥上，正巧看到有一个解放军战士在那里站岗。只见这个战士背着背包，全副武装，军帽下一双浓眉，两只炯炯发光的眼睛，更显出战士的英俊和潇洒。他穿着一身厚墩墩的黄色棉军衣，已经不新了，但洗得干干净净。看着这位战士，季羨林的心里顿时涌上一种非常奇特的、从来也不曾产生过的感觉：

我陡然觉得这个士兵特别可爱，觉得他那一身黄色的棉军衣特别可爱。它仿佛象征着解放、安全、稳定。只要穿这样军衣的人在这里一站，各行各业的人就都有了保障，可以安心从事自己的工作，工厂的工人可以安心生产，拖拉机手可以安心耕地，学生可以安心上学，小孩子可以安心在摇篮里熟睡。只要他在这里一站，整个北京城、整个新中国就可以稳如泰山，那一群魑魅魍魉就会销声匿迹。我左思右想，一时万感交集，很想走上前去，用手摸一摸那一身黄色的军衣。我是多么爱那黄色的军衣啊！[27]

事实上，季羨林并没有真的走上前去摸战士的军衣，他继续走自己的路。但是，他又真舍不得离开那个年轻的士兵，一走一回头，回头看了又看，一直到眼中只留下一个隐隐约约的黄色的影子。这影子就永远地镌刻在他的心头了！

我是多么爱那黄色的军衣啊！这黄色，正如我们国旗的红色一样，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颜色。我爱琥珀的黄色，它黄得透明，黄得发亮。我也爱花朵的黄色，它黄得娇艳，黄得鲜嫩。但是，我却更爱这军衣的黄色。它并不透明，也不发亮；它当然更不娇艳，更不鲜嫩。然而它是朴素的，像真理那样朴素；它是动人的，像真理那样动人。

[28]

从那以后，季羨林一看到这黄的颜色，心里就思绪万端，想到许多许多的事。他想到共产党、毛泽东，想到“七一”建党、“八一”起义，想到万里长征路上，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想到艰苦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从那以后，他在北京城，在其他地方，在火车上、电车上、公共汽车上，在一切能看到解放军的地方，虽然他们并不是在什刹海桥头碰到的那一位，但是同样觉得他们个个可爱。在电车或公共汽车上，他还愿意同他们挤在一起。三九严冬的时候，朔风凛冽，他们站在自己身边，就觉得温暖。汽车颠簸，他们站在自己身边，就觉得有了依靠。有时候，他甚至故意去摸一摸，或者碰一碰他们那黄色的军衣，心里一时间会感到无限的幸福与愉快。

开国大典的那一天，东语系师生一齐随北京大学队伍，在三座门前和全国亿万人民一起，共同聆听礼炮齐鸣，目睹那一伟大的历史镜头，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而欢呼。

此后，每年“五一”和“十一”两次游行，季羨林有时候与师生一起，载歌载舞，共庆节日；有时候，他有幸站在天安门前观礼台上，眼前站着的是解放军官兵的代表。金水桥后边观礼台上的，是将军们，制服一片亮蓝色。在金水桥前边台上的是普通官兵，制服一片草黄色。在这样的时候，天安门广场正万紫千红，五彩缤纷，万头攒动，一片花海。而在这花海之中，这一片淳朴的亮蓝和草黄，不但没有相形见绌，被绚烂的花海压住，反而更为引人注目，给整个花海、整个广场，增添了色彩和光辉，使天安门广场显得更美、更可爱。

带着这样的心情，季羨林迎来了北大的解放，北京的解放，全中国的解放。此刻，他沉浸在无比的幸福和快乐之中，有一种和普通人一样翻身了的感觉。

6. 东语系得到扩大

然而，高兴的事还不止是迎了解放。还有另一个好消息在等待着季羨林。

东语系在初创时只有四名教师，加上学生不到十个人。解放前夕，胡适校长批准了马松亭大阿訇推荐的十几名学阿文的回族学生入系，东语系开始人丁兴旺了一点，但同其他系比起来，仍难免时有“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感觉。

到1949年春夏之交，有一天，季羨林忽然接到一封从中南海寄出来的信。信的开头说：“你还记得当年在清华时的一个叫胡鼎新的同学吗？那就是我，今天的胡乔木。”季羨林当然记得，一缕怀旧之情蓦地萦上了他的心头。想不到没过几天，胡乔木突然来到他住的翠花胡同。

原来胡乔木是受中央领导同志的委托，来征求季羨林的意见。由于形势顿变，中国外交和外贸方面人才的需要陡然增加，因此国家需要大量的研究东方问题、通东方语文的人才，为了重点培养通晓东方国家语言的人才，想把南京东方语言专科学校、中央大学边政系的一部分以及边疆学院的一部分，从南京迁到北京，并入北京大学东语系。听到中央有这个意图，季羨林自然很高兴，认为是一件天大的喜事。本来他觉得几个书生，空怀报国之心，实无用武之地，现在这样一个好机会自天而降，又怎能不欢呼雀跃呢？季羨林立即表示同意。

这样，在1949年暑假之后，东方语言专科学校和中央大学边政系、边疆学院各一部分，奉令与北大东语系合并。南京东方语言专科学校的刘麟瑞先生、王世清先生，充实了阿拉伯语专业的教师队伍。

在他们之前，杨有漪已先在北大兼课，教阿语，后来他于 1951 年正式调来北大，同时来系的还有马金鹏和陈克礼。中央大学边政系的郭应德、李森先生，语专的陈玉龙先生等也都来到东语系。陈玉龙被安排在系办公室，协助季羨林处理系务。郭应德则负责系工会的工作。

新来的教师，因为北大一时没有宿舍，暂时都住在红楼的教室里。有一天，季羨林去看望新来的老师们。他当时穿着一件灰色衬衫，手里拿着一个黑皮包，面容清瘦，神采奕奕。他对他们说：你们辛苦了，学校非常欢迎你们。他询问了他们的饮食起居，介绍了北大的校系情况，谈了他对研究东方问题的重要性和中国开展东方学研究看法，并希望将来共同努力，为国家培养出掌握东方语言和研究东方学的有用人才，英雄是大有用武之地的。他朴素无华，深藏若虚，平易近人，给新来的老师们留下难忘的印象，大家为能在他主持下的东语系工作而感到自豪。[29]

系办公室也从红楼搬到沙滩北楼。办公室的书架上，放着一卷卷季羨林收藏的古今名人字画，系务人员从中不难看出他兴趣之广泛，寄托之遥深。常来系办公室的来访者，几乎全是学界名人：郑振铎先生、向达先生、曹葆华先生、萧离先生，德籍专家傅吾康教授，也是季羨林的座上客。进办公室者，都有“入芝兰之室”的感觉，正像刘禹锡《陋室铭》所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30]

从此到 1952 年院系调整之前，东语系教师的人数增加了，学生的人数增加了，语种的数目增加了，成为当时全国惟一的一所培养东方语言人才的最高教学机构。除了按照教育部的计划每年招收的学生外，还曾一度为地质部和公安部等部门突击培养人才。北京大学在城内沙滩时期，是东语系发展的顶峰。[31]

东语系教师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做出了很多贡献，有些成绩受到毛泽东的赞誉。如 1951 年 1 月 19 日，马坚教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穆罕默德的宝剑》、3 月 20 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回

民为什么不吃猪肉？》，还有其他一些文章，为增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了解，加强民族合作，贡献了力量。文章发表后，胡乔木到翠花胡同去看季羨林，一进门就说：“东语系马坚教授写的几篇文章《穆罕默德的宝剑》、《回民为什么不吃猪肉？》等，毛先生很喜欢，请你转告马坚先生，毛先生认为他的文章写得很好，增强了汉回两族人民的团结。请你向他表示谢意！”[32]

至于东语系为国家培养的大量合格人才，更是彪炳史册的。这将在以后的章节叙述。

7. 第一次出访

1951年夏天，中国政府准备派出建国后第一个大型的出国访问团，到印度和缅甸访问，名为赴印缅文化代表团。胡乔木征询季羨林的意见，问他愿不愿意参加。季羨林想，自己研究印度古代文化，却没有到过印度，这无疑是一件憾事。现在从天上掉下来一个良机，可以弥补这个缺憾了，所以他很愉快地答应了。

代表团规模极大，团员文理兼备，大都是在某一方面有代表性的学者、文学家和艺术家。其中颇不乏声誉卓著的知名人物，丁西林任团长，李一氓、郑振铎任副团长，刘白羽任秘书长，团员有陈翰笙、钱伟长、吴作人、常书鸿、张骏祥、周小燕，北大有冯友兰、季羨林。

因为这个代表团是建国以后派出的最大的中国文化代表团，中央很重视，周恩来作为总理和外交部长亲自过问，关心组团工作，亲自审查出国展览的图片。整个夏天，整个团都在做准备工作。最费事的是图片展览，他们需要到处拍照，搜集能反映新中国新气象的图片，最后汇总在故宫里面的一个大殿里，满满的一大屋子，等待周恩来最后批准。团员们每个人几乎都参加工作，兴致很高。他们看什么东西都是玫瑰色的，都是光辉灿烂的，怀着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既兴奋，又愉快，既矫健，又闲逸的、飘飘然的感觉，天天仿佛在云端里过日子。这是一个既忙忙碌碌，异常紧张，又非常兴奋愉快的夏天。

1951年9月20日，代表团从北京乘火车出发，一路来到广州，停留了一段时间，主要任务是将所有重要的发言稿都译为英文。

在广州的闲暇时间里，季羨林不放过机会，到此时在岭南大学工作的陈寅恪先生家里去拜谒，师生相见极欢，陈师母也殷勤招待。还是1948年年底，胡适派专机到北京接几个教授到南京，其中有陈先生。但陈先生到了南京以后，并没有跟胡适他们去台湾，而是辗转去了广州。到广州时，陈先生的眼疾日益严重，周恩来、陈毅、陶铸、郭沫若等人，对陈先生礼敬备至，陶铸和杜国庠还和他成了好朋友。陈毅和陶铸让人在先生楼前的草地上铺成了一条白色的路，路旁全是绿草。碧绿与雪白相映照，好让眼神不好的先生作散步之用。一件小事，反映出解放初国家对陈先生尊重之真诚。

当时，广州刚解放不长的时间，国民党的飞机不时来骚扰，特务活动也时有所闻。代表团成员出门的时候，总要有怀揣手枪的便衣保安人员跟随，好暗中加以保护。

在广州的一切都准备好之后，代表团乘车离开广州赴香港。过深圳罗湖桥，他们看到的深圳是一个破烂而简陋的小车站。

到香港之后，他们住在摩星岭上。季羨林在这里看到的香港，与1946年回国时住在山下的感觉已不一样。山下是贫民区，而这里则别墅林立，街道光洁，空气新鲜，环境阒静。山前是一湾明镜般的海面。海上气象万千，随时变幻。有时海天混茫，有时微波不起。碧琉璃似的海水，有时转化成珍珠似的白色。到了早晨，旭日东升，晓曦淡红，海面上帆影交错，微波鳞起。极目处是黛螺似的点点青山，季羨林几疑自己身处世外桃源。[33]

从香港，代表团乘轮船来到仰光。船一转进伊洛瓦底江，就看到远处的云霭缥缈中，有一个高塔耸入蔚蓝的晴空，闪着耀眼的光。这

就是大金塔，仰光的象征。

在缅甸，代表团住了近三个星期，参观过大金塔，访问过仰光大学，参观过缅甸艺术家的画廊，拜访过作家和电影演员。缅甸艺术家们的杰作，给他们以美的享受。

而缅甸的华侨更使代表团成员难忘。在挂满了中国字招牌的华侨聚居的广东大街，中国味像在国内一样浓烈。华侨们有的在这里住了几代，有的住了几十年，对缅甸的建设贡献了一份力量，又热爱自己的祖国，用最大的毅力来保留祖国的风俗习惯。只要祖国有人来，他们就热情招待。

然后，代表团又访问印度，乘飞机从仰光抵达加尔各答，开始了对印度的正式访问。他们住了六周，几乎遍访了印度全国东西南北中的各大城市及佛教圣迹，一直到亚洲最南端的科摩林海角，在印度洋里游泳。从印度又飞回缅甸，从仰光乘船，于1952年1月10日抵香港。1月24日回到北京。

这次出国访问，虽然宛如走马灯一般，但代表团成员们脑海里天天有新印象，眼前时时有新光景，受到了印度、缅甸人民无法形容的热情接待。季羨林无比深情地写道：

我不能忘记，我们曾在印度洋的海船上，看飞鱼飞跃。晚上在当空的皓月下，面对浩渺蔚蓝的波涛，追怀往事。我不能忘记，我们在印度闻名世界的奇迹泰姬陵上欣赏“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奇景。我不能忘记，我们在亚洲大陆最南端科摩林海角沐浴大海，晚上共同招待在黑暗中摸黑走八十里路、目的只是想看一看中国代表团的印度青年。我不能忘记，我们在佛祖释迦牟尼打坐成佛的金刚座旁留连瞻谒，……我不能忘记，我们在金碧辉煌的土邦王公的天方夜谭般的宫殿里，共同享受豪华晚餐，自己也仿佛进入了童话世界。我不能忘记，在缅甸茵莱湖上，看缅甸船主独脚划船。我不能忘记，我们在加尔各答开着电风扇，啃着西瓜，度过新年。我不能忘记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怎么说也是说不完的。一想起印缅之行，我脑海里就成了万

花筒，光怪陆离，五彩缤纷。[34]

这一次访问，给季羨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总要不由自主地温习一遍，时间越久，印象越深刻，历历如绘，栩栩如生，仿佛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那一种飘飘然的感觉，始终伴随着他。

8. 院系调整

1952年1月24日，季羨林回到北京。这之后不久，教育界经历了解放后的第一次大规模全国性的行动：院系调整。

院系调整早在1951年11月就开始了试点工作，11月3日到9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以华东、华北、中南三个地区为重点，拟定了工学院的调整方案。该方案规定：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改为多科性高等工业学校，南开大学、津沽大学的工学院合并于天津大学，并成立南京工学院等工科院校。1952年4月16日，

《人民日报》为调整方案的公布发表社论：《积极实现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1952年7月4日至11日，教育部又在北京召开全国农学院院长会议，拟定了农林院校的调整方案的专业设置方案。

1952年下半年，教育部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方针，开始进行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工作。9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马叙伦的文章《三年来中国人民教育事业的成就》，总结了高校院系调整的试点经验。到年底，全国3/4的院校进行了调整和专业设置工作。

经过院系调整，高校的性质和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私立大学全部改为公立，工科院校得到加强，综合大学本来是想巩固和加强，但事实上并未取得好的效果。

调整后的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东北人民大学改为综合性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工学院等院校改为多科性高等工业学校，并新设北京钢铁学

院等一大批工科和其他单科院校。

在这次调整中，燕京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岭南大学、华南联合大学各校取消，合并于其他院校。

高等学校教育体制开始全面向苏联看齐。

燕京大学被撤消之后，文理法各学院、系科并入北京大学，原校址成为北京大学的新校址，工学院各系科并入清华大学。而清华大学和其他大学的哲学系全部撤消，合并到北京大学，全国只有北京大学有哲学系。

东语系也作了适当的调整，原来属于国内少数民族的语言，统统划归中央民族学院（现改为中央民族大学），东语系只保留外国语言。国内外均有的民族和语言，如朝鲜语和蒙古语，则与中央民族学院分工培养，东语系主外，民族学院主内。

从此，东语系走上了正常平稳发展的道路。[35]

9. 背上沉重的“原罪”十字架

新社会到来之时，季羨林同当时留下没有出国或到台湾去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一样，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那么向往，但是对国民党是了解的。解放军进北京城时，他的内心是兴奋的，希望而且也觉得从此换了人间。解放初期，政治清明，一团朝气，许多措施深得人心。旧社会留下的许多污泥浊水，荡涤一清。他觉得从此河清有日，幸福来到了人间。但是，他当时才四十岁，刚刚进入中年，心中需要克服的障碍有不老少。比如，参加大会，喊“万岁”之类的口号，最初他张不开嘴。连脱掉大褂换上中山装这样的小事，都觉得异常别扭，其他的则更可知适应之难了。

但是，似乎没有感到有什么特殊的困难，季羨林像是一下子变了一个人。他觉得解放后一切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善良的，天特别

蓝，草特别绿，花特别红，山特别青。全中国仿佛遍地都开满了玫瑰花，中华民族前途光芒万丈，他觉得自己仿佛又年轻了十岁，简直变成了一个大孩子。开会、游行时，喊口号，呼“万岁”，声音不低于任何人，激情不下于任何人。他觉得那时是一生最愉快的时期。

也就从这时起，他反观自己，觉得百无是处。

我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摘桃派”。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自己也跟着挺直了腰板。任何类似贾桂的思想，都一扫而空。我享受着“解放”的幸福，然而我干了什么事呢？我做出了什么贡献呢？我确实没有当汉奸，也没有加入国民党，没有屈服于德国法西斯。但是，当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时候，我却躲在万里之外的异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业。天下可耻事宁有过于此者乎？我觉得无比地羞耻。连我那一点所谓学问——如果真正有的话——也是极端可耻的。

我左思右想，沉痛内疚，觉得自己有罪，觉得知识分子真是不干净。我仿佛变成了一个基督教徒，深信“原罪”的说法。在好多好多年，这种“原罪”感深深地印在我的灵魂中。

我当时时发奇想，我希望时间之轮倒拨回去，拨回到战争年代，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立功赎罪。我一定会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为了革命，为了民族。我甚至有近乎疯狂的幻想：如果我们的领袖遇到生死危机，我一定会挺身而出，用自己的鲜血与性命来保卫领袖。

我处处自惭形秽。我当时最羡慕、最崇拜的是三种人：老干部、解放军和工人阶级。对我来说，他们的形象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在我眼中，他们都是“最可爱的人”，是我终生学习也无法赶上的人。

就这样，我背着沉重的“原罪”十字架，随时准备深挖自己思想，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真正树立无产阶级思想——除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之外，我到今天也说不出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脱胎换骨，重新做人。……[36]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抗美援朝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季羨林积极投入，但知识分子身无余财，只有献笔墨、献心血以表爱国热忱。季羨林找到一本外文资料，约当时在系办公室协助他处理系务的陈玉龙与他合作。他一面详细阅读，琢磨内容，一面认真口译，由陈玉龙一一笔录。书成之后，稿费捐献给抗美援朝之用。季羨林的爱国之心，灼然可见。[37]

紧接着，来了解放初期第一场大型的政治运动：“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运动。“三反”是1951年底开始的，是中央人民政府在国家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教育部于1951年12月31日发出《关于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号召学校教职员积极参加，学校成立节约检查委员会具体计划、布置，教师以思想改造的学习为中心，行政职工人员以参加运动为主。1952年1月9日，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宣布开展“五反”运动，同月，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作出《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这一年的上半年，各校结合“三反”、“五反”运动，在师生中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教育和揭发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斗争。

季羨林认真严肃地怀着满腔的虔诚，参加了运动。他不贪污公家一分钱，“三反”、“五反”与他无缘，但是对于思想改造，却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艰巨的、迫切的。他当时分析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分为两项。首先是解放前，从对国民党的观察中，他得出了一条结论：政治这玩意儿是肮脏的，是污浊的，最好躲得远一点。其次，他认为，外蒙古是被苏联抢走的，中共是受苏联左右的。思想改造，他首先检查和批判这两项思想。

这次运动中，当众检查自己的思想叫做“洗澡”。“洗澡”有小、中、大三盆。小盆是教研室范围，中盆是全系范围，大盆是全校

范围。季羨林是系主任，必须洗中盆，在全系师生大会上公开检查。因为他没有什么民愤，没有升入“大盆”，没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作检查。但就是在“中盆”里洗澡，那滋味也够人受的：

在中盆里，水也是够热的。大家发言异常激烈，有的出于真心实意，有的也不见得。我生平破天荒第一次经过这个阵势。句句话都像利箭一样，射向我的灵魂。但是，因为我仿佛变成一个基督教徒，怀着满腔虔诚的“原罪”感，好像话越是激烈，我越感到舒服，我舒服得浑身流汗，仿佛洗的是土耳其蒸气浴。大会最后让我通过以后，我感动得真流下了眼泪，感到身轻体健，资产阶级思想仿佛真被廓清。

[38]

在运动中，有的人也像季羨林一样，态度虔诚，最后过了关。但也有想蒙混过关的。北大有一位教授，小盆、中盆，不知洗过多少遍了，群众就是不让他通过，只得升入大盆。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这位教授破釜沉舟，想一举过关。他检讨得痛快淋漓，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连同自己的资产阶级父母，也都被波及到，说了父母不少难听的话，群众自然大受感动。但正所谓“无巧不成书”，在这位教授翻发言稿时，大会主席一眼瞥见检讨稿上用红笔在几个关键地方写着大字“哭”，每到这个地方，他就嚎啕大哭。大会主席把此情向群众一宣布，群众大哗。

不管怎样，季羨林是顺利地通过了这一次运动。然而他的“原罪”并没有赎完，新的政治运动接踵而至，不过地点从沙滩移到了西郊的燕园。

三、与师友和北大同事的交往

1. 为陈寅恪送栅栏红葡萄酒

季羨林到北大工作之后不久，陈寅恪先生也来到北京，仍然住在

清华园。

一听说陈师回到北京的消息，季羨林立即到清华园去拜见他。当时从市里中心地带的翠花胡同到清华园，是要费一些周折的，宛如一次短途旅行。

出了城，去清华园沿途几十里路全是农田，秋天，青纱帐起，不时地有绿林人士从里边出来拦路抢劫。吴宓就曾经被抢过一次。但是，为了去看望自己的老师，季羨林决不惮于这样的旅行。

季羨林知道，陈先生年老体弱，但最喜欢喝栅栏红葡萄酒，这种酒是在北京的天主教外国神甫们亲手酿造的。于是，季羨林便先到神甫们的静修院（今为北京市委党校所在地），在地下室中买到这种栅栏红葡萄酒，又长途跋涉到清华园，送到先生的手中，几瓶酒本来算不了什么，但是当时通货膨胀已经达到钞票上每天加上一个0，还跟不上物价飞速升高的情况下，几瓶酒也非同小可了，对于季羨林这样一个当时的穷教授，就更是难能可贵。这样的栅栏红葡萄酒，季羨林到清华园去送过几次。

在陈寅恪与胡适飞到南京之前的三年里，季羨林与陈先生的来往颇频繁。他回国以后，到1947年10月写成了一篇论文《浮屠与佛》，首先读给陈先生听，想听听他的批评意见，不意竟得到先生的赞赏，把此文推荐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发表（1947）。该刊物是当时最具权威性的刊物，有点“一登龙门，身价百倍”的威风。季羨林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此文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代表了当时该领域中较高的学术水平。

季羨林清楚地记得，那是春天里的一天。中山公园的藤萝开满了紫色的花朵，累累垂垂，紫气弥漫。众多的游人和蜜蜂都被吸引在它的周围，流连忘返。陈寅恪的众弟子，季羨林、周一良、王永兴、汪篪等人，深知先生喜欢看花，爱花。此时虽有眼疾，几近失明，但有些东西还能影影绰绰看到一点影子，所以大片藤萝的紫花光亮，先生或许还能看得到。众弟子们想请先生散一散心，在兵荒马乱、物价飞

涨、人命微贱、朝不虑夕的年月里，去找一个清静怡然的去处，暂时得到一点欢乐，所以去征询先生的意见，先生愉快地答应了。弟子们大喜过望，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茶轩的藤萝深处，觅到一个茶桌，侍先生边饮茶，边赏藤萝。众弟子谈笑风生，先生也受到感染，兴致极高。他们玩了一天，尽欢而散。此情此景，令人感动。

那时候，国家的经济已经完全崩溃，从法币改为银元券，又从银元券改为金元券，越改越乱。到了后来，去粮店买几斤粮食，要带的这券那券的重量，要超过粮食本身，甚至要用麻袋装。陈寅恪当时是学术界泰斗，德高望重，令人敬仰，被著名史学家称之为“教授的教授”，但也难免潦倒。到了冬天，先生连买煤取暖的钱都筹不起来。

季羨林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忙把这情况告诉给刚从国外回来的北大校长胡适先生。胡先生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他最尊重最爱护确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当年他推荐王国维先生去清华国学研究所任教，在北京一时传为佳话，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写下几句诗，来歌颂这件事：

鲁连黄鹄绩溪胡，
独为神州惜大儒。
学院遂闻伟绝业，
园林差喜适幽居。[39]

没想到陈寅恪这样的“大儒”，现在却由于买不起煤，又需要胡适先生再次来“独为神州惜大儒”了。胡适这次“惜大儒”的具体办法，是想赠给陈先生一笔数目颇大的美元。没想到，陈寅恪先生决定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胡适先生的美元。于是，胡适先生就派自己的汽车，让季羨林到清华园陈先生家里，装了一车西文中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书。陈先生只收二千美元，这点钱与书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在这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的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因此，这批书实际上是捐赠给北大了，季羨林于此见到的，是陈先生对于金钱一介不取的狷介性

格。

在二年多的时间里，季羨林同陈寅恪先生的来往频繁。这是他们之间来往最多的几年。季羨林回忆说：

在我同先生来往的几年中，我们当然会谈很多话题。谈治学时最多，政治也并非不谈但极少。寅恪先生决不是一个“闭门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关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似乎是满篇考证，骨子里谈的都是成败兴衰的政治问题，可惜难得解人。我们谈到当代学术，他当然会对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除了对一位明史专家外，他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贬低的话。对青年学人，只谈优点，一片爱护青年学者的热忱。真令人肃然起敬。就连那一位由于误会而对他专门攻击，甚至说些难听的话的学者，陈师也从来没有说过半句褒贬的话。先生的盛德由此可见。鲁迅先生从来不攻击年轻人，差堪媲美。[40]

季羨林曾不无深情地说：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人如果没有别人的帮助，一辈子会一事无成的。他觉得自己遇到了极幸运的机遇，生平帮过他的人无虑数百，光是著名的，国外就有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西克教授、哈隆教授，国内则有四个人：一个是冯友兰先生，没有他同德国签订与清华交换研究生的协定，他季羨林根本到不了德国，一个是胡适先生，一个是汤用彤先生，没有他们，他根本来不了北大。最后但不是最少，是陈寅恪先生。如果没有陈先生的影响，他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条道，也同样是来不了北大。

季羨林对老师们的感激之情，是永志终生的。

栅栏红葡萄酒浓重的酒液，似乎凝聚成凝重的四个大字：

师恩当报

季羨林一生都在报师恩，这正应了中国人习惯用的那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季羨林不断地报师恩，他的学生也在不断地报他的

恩。正像白化文先生在庆贺季羨林先生 85 岁生日时敬送的那副对联所说：

鲁殿灵光在，
梵天寿量高。

2. 抬杠会长郑振铎和大胡子冯友兰

除陈寅恪先生之外，季羨林在解放初接触最多过从甚密的老师有两位：郑振铎和冯友兰。他们俩，一个在政治上大红大紫，一个在政治上被一批再批。季羨林与他们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在第一次赴缅甸、印度访问期间，有几个月他们几乎天天在一起。

解放后，郑振铎先生担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王重民先生代理北京图书馆馆长。郑振铎先生很有魄力，季羨林便向他建议，若要在中国建立东方学，仅靠当时图书馆的一点点藏书是远远不够的，解决的办法是“腰缠千万贯，骑鹤下欧洲”，派人到欧美等地，专找旧书店，不管什么书，也不管当时有没有用，文理工农什么书都买，东方学著作更不例外。郑先生虽有雄才大略，但毕竟囿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和经济实力，此事并没有最终落实。[41]

在第一次出国访问期间，季羨林和郑振铎、冯友兰两位老师，同坐一列火车，同乘一艘轮船，同登一架飞机，朝夕相处，增进了相互间的友谊。

郑振铎先生是代表团副团长，他身躯高大魁梧，说话声音宏亮。冯友兰先生是团员，他长须飘胸，神态庄严。郑先生同冯先生年龄相若，郑先生生于 1898 年，冯先生生于 1895 年，但他们风格迥异。

郑先生当时已经渐入老境，但仍不失其赤子之心，他同谁都谈得来，也喜欢“抬杠”，开玩笑。恰好代表团中有几个人都愿意“抬杠”，于是成立了一个“抬杠协会”，简称“杠协”。会员们想选一个会长，领袖群伦。月旦朱紫，唇吻雌黄，最后都觉得郑先生喜欢

“抬杠”，又不自知其为“抬杠”，已经达到圆融无碍的“抬杠”圣境，便一致推举他为“抬杠”协会会长。在他之下，团中“杠业”发达，会员们皆大欢喜。

和郑先生相比，冯先生是威严有余，活泼不足。他说话有点口吃，偶尔也愿意说点笑话，是一个懂得幽默的人。而郑先生开玩笑，找的对象恰恰是冯先生。

郑先生管冯先生叫“大胡子”，不时地和他说了些开玩笑的话。有一次，冯先生正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理发，刮脸的时候，郑先生在旁边起哄，连声对理发师高呼：“把他的络腮胡子刮掉！”理发师被呼得不知所措，一失手，真把冯先生的胡子给刮掉了一块。郑先生胜利似的大笑，旁边的人也陪着笑。然而冯先生只是微微一笑，神色不变。冯先生大度包容若此，难怪“文革”中，他白天挨斗，晚上回家还读《庄子·逍遥游》。

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季羨林对郑振铎先生更为了解了，感到他胸怀坦荡，耿直率真，豁达大度。出国前查体，他的糖尿病已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有几个“+”号。团里的成员都替他担忧，他自己从来不放在心上，喝酒吃点心如故。

回国以后，季羨林也经常同郑先生接触。有一段时间，郑先生在北海团城办公，担负的行政工作更为繁重了，但他对书籍的爱好却一点也没有减少。有一次，他请季羨林在家里吃饭，季羨林看到他满屋里都堆满了书，大都是些珍本小说、戏剧、明清木刻，满床盈案，累架充栋。[42]一谈到这些书，郑先生仿佛早把繁重工作造成的劳累丢在了一边，眉飞色舞地谈起来没个完。没想到晴天一声霹雳，郑先生竟在飞机失事中罹难，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代表团自始至终和睦相处，气氛融洽。他们在熟悉而不褻渎、亲切而互相尊重的气氛中生活了半年。这是季羨林得以认识冯友兰先生最集中的一段时间。他与冯友兰先生同在北大，对先生治中国哲学史的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十分敬佩。为了这门学问，冯先生不知遭受

过多少批判，他提倡的道德抽象继承法，甚至受到过诡辩式的严厉的批判，但他并没有被压垮，同时能在几条战线上应战。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经常不惜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43]这种精神，季羨林非常赞赏。

3. 矛盾人物胡适

胡适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但季羨林与胡适的交往，是在经胡适聘任他到北大当教授以后。

当时，胡适是校长，季羨林是东语系主任。胡适虽然不常在北京，而是经常乘飞机来往于北京与南京之间，但只要在北京时，他们在一起开会，见面讨论工作的机会总是很多的。他们俩人都是北京图书馆的馆务委员，又都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这两个职务又增加了他们见面的机会。

有一段时间，印度尼赫鲁政府往北大派来了一位访问教授师觉月博士和六七位印度留学生。胡适很关心来访的印度教授和这批印度留学生，经常要见见他们，到他们的住处去看望，也请他们吃吃饭。而且把平常照顾印度朋友的任务交给季羨林，这使他有更多机会来了解观察这位在政界和学术界都红得发紫的人物。季羨林在学术上也与胡适有来往，写的一些文章拿给他看，请他指正，他总是连夜看完，提出评价。他对任何人都是和蔼可亲的，没有盛气凌人的架子。根据一段时间的了解，季羨林对胡适形成了一个总体印象。

根据我几年观察，胡适是一个极为矛盾的人物。要说他没有政治野心，那不是事实。但是，他又死死抓住学术研究不放。一谈到他有兴趣的问题，比如说《水经注》、《红楼梦》，神会和尚等等，他便眉飞色舞，忘掉了一切，颇有一些书呆子的味道。蒋介石是流氓出身，一生也没有脱掉流氓习气。他实际上是玩胡适于股掌之上。可惜胡适对于这一点似乎并不清醒。有一度传言，蒋介石要让胡适当总

统。连我这个政治幼儿园的小学生也知道，这根本是不可能的，这是一场地地道道的骗局。可胡适似乎并不这样想。当时他在北平的时候不多，经常乘飞机来往于北平、南京之间，仆仆风尘，极为劳累，他却似乎乐此不疲。我看他是一个异常聪明的糊涂人。这就是他留给我的总印象。[44]

在季羨林看来，胡适之所以是个矛盾的人物，具体表现就在于他是一个异常聪明的糊涂人，这真可谓一语破的。

胡适对待学生的态度很能说明胡适并不是死心塌地拥护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季羨林到北京大学任教之时，正是解放战争激烈展开、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的时候。北大学生一向是在政治上得风气之先的，这或许有点像张中行先生所说的北大学生刺多扎手，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方面，也是如此。沙滩北大的民主广场号称北京城内的“解放区”。学生经常从这里列队出发，到天安门广场等地去示威游行，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国民党反动派则大肆镇压，逮捕学生，想掰掉北大学生的刺。这时候，胡适并没有去帮助反动派压制学生，而是张罗着去保释学生。

有一次，他为了保释学生，亲自去找李宗仁，想利用李宗仁的势力让学生获得自由。当时有些情景是季羨林亲眼目睹的，有的是听到的。即使是听到的，与事实也不会相距太远。

事实上，胡适从来不是国民党员。他对国民党也并非一味地顺从。他真正服膺的是美国的实用主义，他崇拜的是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因此，他是拿美国那一把尺子来衡量，只要不吻合这个尺度，他就会挑点小毛病，闹点独立性。

胡适曾针对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学说，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知难行亦不易》。在季羨林看来，胡适敢于对国民党的“国父”的著名学说提出异议，是需要一点勇气的。因为蒋介石虽从来没听过“国父”的话，但他却打孙中山的牌子欺骗群众，有谁敢碰这块牌子，是断断不能容许的。所以，胡适的文章一出，蒋介石

的御用党棍一下子炸了锅，认为胡适是大不敬，有群起而攻之之势，而胡适却一笑了之，一场风波也终于平息下去。

胡适和新月派的一些人物还曾一度打出过“好人政府”的旗号，他们大声疾呼地宣传，引起了一场喧闹。原因明摆着，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之下，还要去提倡“好人政府”，这就自然隐含着国民党政府不是好人政府的意思。国民党暴跳如雷地反对“好人政府”，原因就在这里。

出于对胡适先生的深切了解，季羨林从来没对胡适进行全面否定。而且不仅如此，季羨林还敢于向胡适学习在他看来是正确的东西，比方说，在进行学术论文的论证时，他服膺胡适先生的两句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45]自己写文章，也采取这样的方法。

4. 老舍的白煮肉和沈从文的汽锅鸡

季羨林 1930 年回济南探家时，在老同学李长之家里陪老舍先生吃过一次饭，从那时起，他就算认识老舍先生了。

到翠花胡同居住以后，季羨林又和老舍先生有过多次数交往，印象深的就有两次。

第一次是发生在解放初召开的一次全国汉语规范化会议时。当时国内语言学界、曲艺界的名人如侯宝林、马增芬姊妹、老舍、叶圣陶、罗常培、吕叔湘、黎锦熙等先生都参加了。当时开会不算多，与会的人兴致很高，会上的气氛也十分融洽。

开会期间的一天中午，老舍先生要请大家吃顿地道的北京饭。与会者都知道，老舍是地道的北京人，北京饭肯定会是非常地道的，因此都欣然答应。

老舍被人戏称为“北京土地爷”，他对北京人生活习惯之熟知，尽人皆知。他结交的北京人朋友，三教九流都有。据说，他能一个人坐在大酒缸旁，同洋车夫、旧警察这些旧社会的“下等人”，亲密无

间地开怀畅饮，就像亲朋好友那样，谁也没有他是大作家、名教授、留洋学士的感觉。

老舍请吃饭，大家的兴致都高起来。与会者商议的结果，是由老舍先生做东去西四砂锅居吃白煮肉。到了砂锅居，大家发现他同饭馆经理甚至到小伙计，都是好朋友。所以，虽然是一餐简单的饭，但饭菜均极佳，服务也很周到，结果是大家尽兴地饱餐了一顿。季羨林、叶圣陶、吕叔湘等同去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件事，是季羨林到东安市场北门对面的一家著名理发馆理发。一进门，季羨林猛然瞥见老舍先生也在那里，他躺在椅子上，脸上下巴上白糊糊的一团肥皂沫，理发师正在给他刮脸。这不是说话的时候，季羨林只寒暄了几句，就不再说什么了。轮到季羨林坐到椅子上时，从镜子里看到老舍先生正在跟自己打招呼告别，一直看着他的身影走出门去。

季羨林理完发，要去付钱，理发师告诉他，老舍先生已经替他付过了。当时，季羨林心想：这样芝麻绿豆般的小事，虽不足以体现老舍先生的精神，但是，不是足以体现他这种细心体贴人的心情吗？

通过多次交往，季羨林更认识到老舍先生的伟大：

老舍先生的道德文章，光如日月，巍如北斗，用不着我来细加评论，我也没有那个能力。我现在写的都是一些小事。然而小中见大，于琐细中见精神，于平凡中见伟大，豹窥一斑，鼎尝一脔，不也能反映出老舍先生整个人格的一个缩影吗？[46]

季羨林到北大任教之时，沈从文也从云南来到北大。他们在同一所学校任职，住处又不远，季羨林住翠花胡同，沈从文住中老胡同，都离沙滩不远。所以，从这时起，他们见面就多了。

有一次，沈从文请季羨林吃饭。这是季羨林吃过的一顿相当别致、毕生难忘的饭，是云南有名的汽锅鸡。

原来做鸡的汽锅是沈从文从昆明带来的，外表看上去很像是宜兴紫砂，上面还雕刻着花卉、书法，古香古色。这种汽锅虽属厨房用

品，但它古朴高雅，季羨林认为它简直可以成为案头清供，与商鼎周彝斗艳争辉。

吃饭时，沈先生要解开一个用麻绳捆得紧紧的什么东西。季羨林觉得只需用剪刀或小刀轻轻地一剪一割，轻而易举就能打开。但沈从文却从季羨林手里一把抢过去，硬是用牙把麻绳咬断。季羨林非常吃惊，接着是感慨：

这一小小的举动，有点粗劲，有点蛮劲，有点野劲，有点土劲，并不高雅，并不优美。然而，它却完全透露了沈先生的个性。在达官贵人、高等华人眼中，这简直非常可笑，非常可鄙。可是，我欣赏的却正是这一种劲头。我自己也许就是这样一个“土包子”，虽然同那一些只会吃西餐、穿西装、半句洋话也不会讲偏又自认为是“洋包子”的人比起来，我并不觉得低他们一等。不是有一些人也认为沈先生是“土包子”吗？[47]

能印证沈从文先生这种“土包子”性格的，还有一件小事。他们俩有一次去中山公园游逛，口渴便要了一壶茶。茶摊伙计端来沏好茶的茶壶，季羨林正要拿起茶壶来给沈先生斟茶，沈先生又是一把抢了过去。他先斟满了一杯，但并不喝，而是又把它倒入壶中，他告诉季羨林，只有这样才能把味调得均匀。这样一件小事，虽微不足道，但在琐细中，也能看到沈先生的精神。

而后，季羨林和沈先生共同迎来了北京的解放。在这前后，沈先生担任北大教职之外，还担任天津《益世报》、北京《经世报》、《大公报》等报的文学副刊编辑。只是他觉得自己的思想、生活和工作方式，都越来越落后于社会现实，所以创作逐渐减少。[48]解放时，沈先生的心情是激动的，然而他并不故做革命状以达到某种目的，他仍然是朴素如常。

没过多久，一位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在香港的一家进步文艺刊物上，发表了一篇长文《文坛一瞥》，用他特别发达的嗅觉和视觉，看出了文坛上的许多颜色。他这“一瞥”，便把沈先生“瞥”成了粉红

色的小生。沈先生当头挨了棒，从此被“瞥”下了文坛，销声匿迹，再也不写小说了。[49]这一场历史的误解之后，沈从文被分配到历史博物馆工作，在丝绸、陶瓷、漆、玉、工艺美术图案中转来转去，什么古纸、古代刺绣、古代衣饰等等，他都研究，出版了一部专讲中国服饰史的专著，一时洛阳纸贵，受到国内外一致的高度赞扬，他也成了这方面的权威。沈先生还自己写章草，成了一个书法家。

后来，季羨林和沈从文在会议上，在公共汽车上，偶尔相遇在一起，他们之间都感到非常亲切。沈先生依然是那么温良、淳朴，时代的风风雨雨在他身上，似乎没有留下什么伤痕。他一谈到中国古代科技、艺术等等，便喜形于色，眉飞色舞，娓娓而谈，如数家珍，天真得竟像个大孩子，这就更增加了季羨林对他的敬意。[50]

5. 忠厚长者曹靖华和抒情诗人冯至

季羨林在清华读书时读过曹靖华的翻译作品，1946年回国在上海臧克家处，听到国民党警察在南京下关车站毒打曹靖华等人的消息，从此他对曹靖华十分敬佩。

季羨林到北京大学工作之后，曹先生在俄语系工作，他们行当不同，接触并不多，但见面的机会还是有的，季羨林对他形成了一个初步印象：

他留给我的印象是非常好的，他长我十四岁，论资排辈，他应该算是我的老师。他为人淳朴无华，待人接物，诚挚有加，彬彬有礼，给人以忠厚长者的印象。他不愧是中国旧文化精华的一个代表人物，同他交往，使人如坐春风化雨中。

但是，这只是他性格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他却如金刚怒目，对反动派决不妥协。他通过翻译苏联的革命文学，哺育了一代代的革命新人。他的功绩将永远为中国人民所记忆。而他自己也以身作则。早年他冒风险同鲁迅先生交往，支持人民的正义斗争，坚贞不

屈，数十年如一日，终于经历了严霜烈日，走过了不知多少独木小桥，迎来了次第春风。他真正做到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51]

解放后，季羨林同曹靖华同在《世界文学》任职，曹靖华任主编，季羨林当编委，开编委会时，他们放言高论，其乐融融。季羨林不喜欢文山会海，不是“开会迷”，但《世界文学》的会，他非常希望参加，与曹靖华见面，成为他的一大乐事。

季羨林不大喜欢拜访人，没去过曹靖华的家。他们平常在校园中见了面，总要问寒问暖，说上一阵子话，彼此之间又欣慰又兴奋。在外面开会时碰在一起，更要促膝长谈。他们之间的交往，正是那种高层次的交往：君子之交淡如水。但情谊却是永存的。

冯至先生长季羨林六岁。季羨林在清华念大学的时候，读过他的抒情诗，对其中的一些形神俱臻绝妙的诗句，无限向往，无比喜爱，因此觉得鲁迅先生赞誉他为中国的最优秀抒情诗人，真是至理名言。对这样一位著名的抒情诗人，季羨林可以说是心仪已久了。

到1946年季羨林到北大任教之时，与冯至见面的机会很多。冯先生在西语系，西语系与东语系的办公室同在沙滩北楼，紧挨着，几乎天天可以见面。

但是，季羨林对冯至先生形成深刻印象，不是在北大，而是在中德学会所在地。这是一所三进或四进的大四合院，房屋建筑是典型北京式的四合院，古色古香。所以虽然没有曲径通幽之处，但回廊重门，也足以让人产生奇趣。庭院深深，正像宋欧阳修《蝶恋花》所描写的：

庭院深深深几许，
杨柳堆烟，
帘幕无重数。

这样的大院，把喧闹闹攘的市声都阻挡在大门外面。院子里静如古庙古寺，一走进去，就让人觉得幽寂怡性。季羨林经常在这里与冯

至、毕华德、张星烺、袁同礼、向达等人开会，讨论中德之间的学术文化交流和其他学术问题。

解放军进驻北京之际，冯至先生没跟胡适先生撤离北京。季羨林也没有走，他们共同度过一段欢喜、激动、兴奋、甜美的日子。

在上世纪 50 年代初的一次会上，周扬开玩笑说：“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冯至先生接着套用了李后主李煜《虞美人》词，说：“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话并没有恶意，但都属于“怪话”，在这方面，季羨林与冯至先生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也可以说是“伯仲之间见伊吕”。不愿开会，也不善交际，是他们的共性。但由于他们学术的地位，解放后集会结社，名目繁多，所以，越不愿意开会，不愿意交际，反而要多次开会，多方交际，最后几乎成为“国际活动家”、“社会活动家”。

对于季羨林来说，与冯至先生的交往，每次回忆起来，几乎每一件事都像一首耐人寻味的抒情诗，歌颂着他们之间的长期交往形成的友谊。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中，我们虽为朋友，我心中始终把他当老师来看待。借用先师陈寅恪先生的一句诗，就是“风义平生师友间”。经过这样长时间的亲身感受，我发现冯先生是一个非常可爱，非常可亲近的人。他淳朴、诚恳，不会说谎，不会虚伪，不会吹牛，不会拍马，待人以诚，同他相处，使人如坐春风中。我从来没有见他发过脾气。[52]

6. 画家吴作人和佛学家汤用彤

季羨林与画家吴作人的友谊，开始于 1948 年为泰戈尔办画展，他们在无言中成了朋友。

这之后，大概是在解放初期，季羨林一下子对藏画发生了兴趣。在藏画方面，他虽然是初出茅庐，但“野心”挺大：不收齐白石以下

的作品。他于是就请吴作人代他买几张白石翁的画作。吴作人便以内行的身份问他：“有人名的行不行？”解放初在收藏家中形成一种偏见，如果画上写着受赠者的名字，则不如没有写名字的值钱。季羨林觉得这种看法十分可笑，立刻回答：“我不在乎。”过了没几天，吴作人就告诉季羨林，画已经买到。季羨林清楚，吴作人是行家，又认识白石翁，买的画绝对不会是赝品。于是，他连忙到吴作人在建国门内离古观象台不远的老房子里去取画。从那时起，季羨林开始收藏书画，但那次他只用了相当于人民币 30 元钱的价钱，便买下了当时最著名画家的四五张画。

后来，在赴印缅途中，季羨林与吴作人有长达几个月的相处。

那是在印度科钦市。这是一个西海岸上的著名港口，中国古书上称为柯枝，古代就与中国有过来往。明朝郑和航海到过这里。城市不大，但到处是中国的影子，房屋建筑的山墙是中国式的，捕鱼的网是从中国来的，博物馆里摆着中国明代青花瓷盘和瓷碗，闪着青白色的光辉，召唤着中国游人发出思古之幽情。

城小，很快就参观完。一天早晨，印度主人安排访问团乘小轮游览海港。

那一天旭日初升，海波不兴。季羨林与吴作人坐在一艘船上，小船向大海驶去，真有点“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的气势。小船在海湾里兜着圈子，季羨林他们心潮澎湃，意气风发，情不自禁地唱起“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大家沉浸在刚解放的欢腾里，激动的人心，回还往复的旋律，就像眼前海中的波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连绵起伏，永无止境。此时此刻，情与景会，歌声逐浪高。水天汪洋，大海茫茫，他们仿佛成了主宰沉浮的宇宙之主了。这时候，季羨林发现，吴作人唱歌声音有点低沉，便好奇地问了他一声。他说这是二重唱的合音。

还有一次，他们在缅甸东枝访问。这里与科钦迥异其趣，既无大海，也无大山，却有秀美的林泉，扶疏的花木，大地上到处是一片浓

碧，偶尔发现一点黄色，那是万绿丛中的桔园中悬挂在枝头的柑桔。东枝有一个茵莱湖，是一个长达百里的狭长淡水湖，湖面上漂浮着人工制造而成的“浮岛”，能够活动。在大的浮岛上，人们修建成木楼，木楼相接而成水村。村村相连，形成水城。居民往来都坐船，船夫划船的姿势是绝无仅有的：他站在船头，用一只脚划船，行驶却很快。这里的居民很少登陆，死后就抛尸水中，所以这里的居民不吃鱼，因为鱼是吃死尸长大的。季羨林感到，这好像是一个神话世界。

在这样童话王国般的环境里，我们参观任务不重，悠闲自在，遗世而独立，颇多聊天的机会。我和作人常常坐对桔园，信口闲聊，上天下地，海阔天空。没有主题，而兴趣盎然。[53]

回国后，行当不同，人各一方。后来他们同时出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在五年任期中每两个月能见一次面，但已无暇晤对闲聊。吴作人曾到季羨林家，送给他一册影印的同夫人萧淑芳女士的画册。他们的友谊，就像这本画册，是永存的。

汤用彤是著名佛学家，在季羨林回国之时，他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是他和胡适校长、傅斯年校长联合聘任季羨林为北大教授的。他 1947 年夏天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讲学，1948 年 9 月回北大。北京解放后，他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1 年任副校长。

季羨林与汤用彤的来往很多，始终把汤先生作为自己的长辈和师长。有关佛教、佛学的许多问题，他经常向汤先生请教。但观点有时会不一致。工作上，他是系主任，要向文学院院长汤先生汇报，请示工作。

季羨林在写作《浮屠与佛》这篇学术论文时，汤先生指出，《魏书·释老志》说：“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浮屠之教。”这最后一句，是魏收臆测之辞，理由是《后汉书·西域传》说：“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张骞但著地多暑湿，乘象而战。”而季羨林则认为，张骞

大概没有闻浮屠之教。魏收处置史料的方法是：只要原来史料里用“浮屠”，他就用“浮屠”；原来是“佛”，他也用“佛”；自序则纯用“佛”。根据这一原则，他认为倘若是魏收臆测之辞，他不应该用“浮屠”两字，而应该用“佛”。所以，虽然不能知道魏收根据的是什么材料，但他一定有所本。[54]季羨林采取的是一种严谨的科学态度，即使是权威学者的观点，他也绝不盲从。对汤用彤是这样，对美国、德国的一些权威学者，也是这样。

但是，季羨林非常尊重汤先生，写成的许多有关佛学的论文，都请汤先生过目，如《〈列子〉与佛典》的初稿，就先送汤先生审阅，汤先生提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当时汤用彤在开设魏晋玄学的课，他征得汤先生的同意，每节课都去听，笔记记了厚厚的一大本。一个教授去完整地听另外一个教授的课，这在北大的校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显然，季羨林与汤用彤的交往，多是学术上的。他们在学术上相互切磋，促进了他们之间的友谊。

第八章 燕园春秋（一）

一、院系调整迁到西郊的北大

1. 这里曾是“万园之园”的一部分

这里是北京西郊，圆明园的遗址，它曾是历史上辉煌的“万园之园”。这座著名的人工园苑，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八年（1708），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多次下江南，回京后让人把江南的名山秀水画成图，选其优者设计到圆明园里。经过六七十年的不断增建，形成举世无双的人工园苑。园中到处是园林殿阁，名园如林，豪华瑰丽，气象万千。圆明园又称“圆明三园”，包括圆明园、万春园和长春园三个大园苑。

圆明园中，溪湖、山石、殿阁台榭相连不断，自然山林溪谷上栽种着无数珍贵花木，各种中西合璧的建筑、历代保存下来的文物、各种华丽的陈设，使这里成为一座五光十色的真正的迷宫。园中仅著名的景点，就有正大光明、九州清晏、澹泊宁静、濂溪乐处、天然图画、上下天光、长春仙馆、万方安和、汇芳书院、日天琳宇、洞天深处、平畴远风、碧桐书院等，都是极富诗意的。景中又有景，楼、台、亭、阁，错落有致，熠熠生辉。

主要景点有许多皇帝手书的匾额或对联，如正大光明殿，有雍正题写的对联：

心天之心而宵衣旰食

乐民之乐以和性怡情

九州清晏殿有乾隆的对联：

所无逸而居，动静适徵仁智

体有常以治，照临并叶清宁

澹泊宁静殿乾隆的对联是：

厥惟艰哉，载芟载柞筹穡事

亦既勤止，日旰日雨验农时

濂溪乐处殿乾隆的对联是：

与古人相对，左图右书

偕造物者游，仰观俯察

天然图画楼雍正的对联是：

欣百物向荣，每识乾坤生意

值万几余暇，长同海宇熙春

上下天光楼乾隆的对联是：

云水澄鲜，一帧波光开罨画

烟岚杳霭，四周山色浸分袂

长春仙馆乾隆的对联是：

安舆欢洽宜春永

庆节诚依爱日长

万方安和乾隆的对联是：

四海升平承帝春

万几竞业亮天工

汇芳书院乾隆的对联是：

宝案凝香，图书陈道法

仙台丽景，晴雨验耕桑

日天琳宇雍正的对联是：

千载丹心扶大义

两间正气护皇图

洞天深处乾隆的对联是：

道统集成归至德

圣功养正仰微言[1]

这些对联喋喋不休地歌颂着清代帝王的“浩荡”皇恩。

圆明园的周围，更有无数从属园苑，如静宜园（香山）、静明园（玉泉山）、清漪园（颐和园）、近春园、熙春园、畅春园、朗润园、勺园、蔚秀园、承泽园、淑春园等等，都是“万园之园”的附属部分。

可惜的是，这座名园在 1860 年遭英、法侵略者的野蛮破坏，无数珍宝被抢劫一空，他们还不满足，竟又满园放火，连烧三天三夜，使巨大园苑在转眼之间变成一片废墟。帝国主义的罪行，永远写在这废墟上！

这里现存的虽然只剩下废墟，但是透过历史的尘烟，穿过历史的时空，在这遗留下的巨大的石基、断柱和残垣上，不难想象出它当年的气势是多么辉煌。而残留下的“福海”花岗石堤、部分石桥和西洋楼的汉白玉石门雕塑，更让我们想到其他大量的精工细雕之作。

鸦片战争之后，美国人到中国传教，其他国家也竞相效尤，设立教会。教会在传教的同时，也以慈善事业为名，办医院，办学校，后

来被称之为文化侵略。

清朝末年，各国在华办的教会学校已经不少，但各校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组织。在国立学校不多、质量不高的情况下，教会学校有相当大的势力，相当大的影响。

五四运动之后，国立学校数量增多，质量也有所提高，形成了压倒教会学校的优势，教会学校便作出回应，将各校联合起来，组织起来，以抵抗国立学校。它们把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华西等区的教会学校合并，每一区只留一两个教会大学。于是就有了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三江大学、华西协成大学、岭南大学等大学。

燕京大学于 1919 年由北通州（今通县）的协和大学、北京汇文大学合并而成。第二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也并入，校长为司徒雷登。

燕京大学成立之后，一面在城里找地方上课，一面在西郊建校舍。

西郊的圆明园废园很多，在当时有的被军阀占有，有的任其荒废。燕京大学选中了其中的一个废园，叫“淑春园”，据说原是和珅的园子。民国初年被陕西军阀陈树藩占有，经协商，他同意将这个废园半卖半捐让给燕京大学，价钱是二十五万元。

燕京大学准备在这个废园建楼，便向美国募捐，谁捐出一座楼的建筑费，该楼就以其名为楼名。对着西校门的那座老办公楼，因为是一个叫 Baker 的人捐建，名就叫“贝公楼”，是当时的主楼。这座楼的楼基，是原圆明园的一个殿基，连门前的一对麒麟和台阶，也是从圆明园搬来的。而从圆明园运来的最大建筑物，是校西门内的一对华表。据冯友兰先生说：

照封建社会的传统制度，皇帝的宫门口有两对华表。在门外的一对，上面的兽头向外，叫“望君出”，门内的一对，上面的兽头向内，叫“望君归”。天安门内外的那两对华表就是这个样子。圆明园

宫门口的两对华表，都还完好，一对在燕京，还有一对在北京图书馆。[2]

在这荒废的皇家园里，耶鲁大学建筑师亨利·克拉姆·梅菲（Henry Killam Murphy）设计出一些中西合璧的建筑，是一些现代钢筋水泥建筑与传统的琉璃瓦大屋顶相结合形成新式的对称形宫殿，雕梁画栋，琉璃飞檐，或浑圆挺秀，或庄严巍峨，或气势磅礴，或平实质朴，是燕园内的主要景点。自来水塔也隐藏在钢筋水泥的宝塔内，矗立在今日未名湖之东岸，取名为博雅塔。湖西南的一片住宅，原是校长所住，1931年冰心女士取名为“临湖轩”，由胡适先生写在一块青色的匾上，下面有胡适的署名。如今那块匾虽然不在了，但仍称之为临湖轩。[3]茂林修竹掩映之中的临湖轩，永远向学人显示着它那无穷的魅力。

北京大学搬进燕京原校址之后，进行了扩建，畅春园、朗润园、勺园、蔚秀园、承泽园、淑春园、燕南园、燕东园、燕北园、中关园，都囊括在北大。燕大的文、理、法三学院全部并入北大，清华的文科，也并入北大。院系调整之后，哲学系只保留了北大一个，其他院校包括清华在内，哲学系全部取消，教师并入北大。清华因此而成为一个多学科的工科大学，而北大则成为文理并重的综合大学。

2. 蓝旗营公寓

东语系搬到西郊燕京大学的一栋古式建筑里，被定名为“外文楼”，西语系则搬进毗邻的“民主楼”，俄语系搬进“俄文楼”。

东语系教师从城里也都搬到燕园居住。马坚先生住到燕东园，宿舍是一座别墅式的住宅，坐落在燕东园的东北角，房子不算很大，但却很实用，一间客厅，一间书房，三间卧室。而季羨林则只身一人，夫人和婶母仍在山东济南老家照顾叔父，女儿婉如在天津，儿子季承在北京，上着大学，他便没住到按资格可以住的燕东园或燕南园，而

是住进了蓝旗营的一所公寓里。当时这里还十分荒凉，公寓门前连马路都没有。修马路时，季羨林心里还有点想不通，心想修这样的马路干吗呀？在这所公寓里，季羨林一住就是十年，对门邻居是杨通方、李玉洁夫妇。

季羨林一个人住在中关村蓝旗营公寓，其生活之艰难是可想而知的。早餐就是烤馒头片就花生米，佐以一杯浓茶，天天如此。午饭，拿一个大茶缸子从食堂打饭，往往多打一些，等饿了时，在炉子上热一热，烩一烩，又是一顿晚饭。

后来，他的孩子大学毕业后到北京来工作。女儿婉如在核工业部，儿子季承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当时工作地点都在城里。所以，这时候，季羨林仍然享受不到家庭的温暖，没有人照顾。

有一次，季羨林生了病，发烧到 40℃，起不了床，那时候又没有电话，系里发觉他没有去上班，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的在城里工作的孩子星期天来看他，差一点连门都没有敲开。

可喜的是，清华时的“四剑客”，李长之、吴组缃、林庚、季羨林，在院系调整后，有三个人又凑在一起了，只有李长之不在。这在季羨林，已感到相当满足了。

清华毕业后，我们“四剑客”天南海北，在茫茫的赤县神州，在更茫茫的番邦异域，各奔前程，为了糊口，为了养家，在花花世界中，摸爬滚打，历尽苦难，在心灵上留下了累累伤痕。我们各自怀着对对方的怀念，在寂寞中，在沉默中，等待着，等待着。一直等到 50 年代初的院系调整，组缃和林庚又都来到了北大，我们这“三剑客”在睽离二十年后又在燕园聚首了。此时我们都已成了中年人，家事、校事、国事，事事萦心。当年的少年锐气已经磨掉了不少，非复昔日之狂纵。燕园虽秀美，但独缺少一个工字厅，缺少一个“水木清华”。我们平常难得见一次面，见面大都是在校内外召开的花样繁多的会议上。一见面，大家哈哈一笑，个中滋味，不足为外人道也。[4]

就在这样静默的环境中，季羨林默默地奋斗着，在文海书山之间

耕耘着。

他最喜欢与青年学生在一起，觉得青年人思想活跃，敢于提出新问题。他和学生们一起劳动，一起布置会场，学生们谁也不觉得他是个著名的教授。

院系调整之后，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职员工开始评级，施行新工资标准。1952年的评级，季羨林被评定为一级教授，冯友兰因为过去的政治关系被评定为四级教授。到1954年又重新评级，季羨林仍是一级教授，冯友兰也被评为一级教授，同时被评为一级教授的还有陈岱孙、翦伯赞、王力、郑昕等人，北大共有28名之多，占全国56名一级教授的二分之一。后来，国务院在中国科学院设立学部委员，季羨林、冯友兰等人都被选为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除拿一级教授的工资以外，每月还享受120元的学部委员补贴。

这期间，季羨林开始参加大量的社会工作，尤其花费大量精力投入文字改革的工作。王力先生1954年从中山大学语言学系调整到北大中文系，他们一块从事语言研究。解放后提倡集体主义精神，成立机构，组织学会，他们一起共事，参加了政务院（后改为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王力先生的工作重点放在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方面，季羨林参加的则是汉字简化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们经常在一起开会，经常听到王力先生以平稳缓慢的声调，发表一些卓见。

东语系经调整后，新增的专业有乌尔都语（1954）、波斯语（1957），加上原有的梵巴语、日语、阿拉伯语、朝鲜语、缅甸语、越南语、印地语、印度尼西亚语、蒙古语、泰国语，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语言文学系。

此时，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东语系开始聘任外籍教师。日籍教师冈崎兼吉回忆说：

我忘不了1953年5月3日的傍晚，来东语系报到的那个日子。我在妻子病故还不到两个月便独自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提着极其简单的行李走进北大的西门，此时外文楼已笼罩在一片暮霭之中，惟有

东面的一角还亮着灯。在那里，系主任季羨林教授一人正等着我的到来。

当时，日语教研室有徐祖正、陈信德、魏敷训、刘振瀛（主任）、黄启助等众多从事日语教育的著名先达。他们都热情地欢迎我以及我的全家，并给予我这样一个毫无大学教学经验的新手以真诚的鼓励和帮助。多蒙这些先生们的厚爱，我于此后的十多年乃至数十年中，才能愉快地埋头于教学和研究。[5]

杨通方教授也受聘来北京大学任教，讲授朝鲜语。他和季羨林同住一楼，而且是对门，长达十年之久。杨通方教授在培养学生的工作中尽上了最大的力量。[6]

在中外教师的共同努力之下，东语系越办越好。

3. 东语系正常平稳发展

院系调整后的北大东语系，走上了正常平稳发展的道路。

进过东语系的人都知道，该系不仅以语种多、师资强、学术空气浓而驰名海内外，而且也以团结向上、艰苦奋斗的作风而享誉燕园。这正与东语系长期受季羨林熏陶有关，他的领导作用、垂范作用，无时不在东方学系发挥影响。原解放军洛阳外语学院院长、少将卞铁坚不无深情地说：

这是与系主任季先生的领导作用、垂范作用密不可分的。他不仅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宗师，而且是一位纯朴、敦厚、勤恳、谦和的长者。学生们不约而同地称他为“季先生”，几乎没有人称他“季主任”，这表明他是最标准的“先生”。那一身蓝布中山装，那始终挂着笑容的和善面孔，那深入浅出、如话家常的谈吐，那极有规律的简朴到了极点的生活，那“润物细无声”的春雨般的散文，那笔耕不辍、手不释卷的坚韧品格——这就是这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老先生。[7]

季羨林作为系主任，精心设计系里的课程。对梵巴语专业，他更是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的指导思想，是把学生培养成印度学的研究人才。只有学好梵文、巴利文，掌握这两把金钥匙，才能打开印度古代文化宝库的大门。而打开宝库之后，会不会鉴别宝库里的收藏品，则要看研究能力。季羨林十分注意培养和激发学生们的研究兴趣，鼓励学生广泛涉猎文史哲各门基础课程。

正是由于季羨林，外文楼几乎成为那些知识探索者的家，成为一个和谐的研究集体。

从整体上来看，教员们的教学热情空前高涨，解放前的教学简直不能望其项背。原因很简单明了。人人有一种解放了的新鲜感觉，解放区的天确实是明朗的天，人人想前进，人人思改造。当时政治清明，社会风气良好。反映到我们教员身上，我们决不想平平稳稳然而却无声无息地教下去，而是要改进，特别是在教学法方面表现得更加突出。教学法是教学工作的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当时全国各大学和学院都十分重视教学法。只要哪一个学校有了新的成功的方法，全国各地都必然前往“取经”。南至云南，北至黑龙江，无远弗届。当时又处在“一边倒”的高潮中，对苏联的一切都是崇拜备至的，奉若神明的。在教学法方面也不例外。苏联的拉赫曼诺夫教学法，一旦传来，群起学习，形成了一股热潮。我们系也决不后人。各个教研室都认真学习、实践，一旦自认为尝试成功，系里便组织公开课，以扩大影响。外校的同行们也纷至沓来。一阵热闹过后，又不知从什么地方兴起了另一种新的教学法，于是又群起学之。最后一直学到“直接教学法”，仍然是大张旗鼓，锣鼓喧天，全国一片直接教学声。但最终还是销声匿迹，又恢复了平稳。是不是我们这种学习教学法的做法，朝令夕改，翻履无常，干扰了教学的平稳，因而是得不偿失或者简直是瞎胡闹呢？否，否，我决不认为是这样。我认为，这是我们系，我们北大，以及全国从事外语教学的同行们，弃旧图新，苦心孤诣，千方百计想把教学搞好，培养出国家需要的高质量的外语人才热情的具体

表现。这种敬业爱国的表现，我们永远不应当忘记。[8]

与教学法相联系，东语系也十分注重教材的建设。几乎每改一次教学法，就必然产生出一批新教材，每一种新教材都凝聚着教师“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的心血。

东语系还强调，教学和科研要齐头并进，二者密不可分，可以互相促进，互相补充，要想真正提高教学质量，就必须随时提高科研水平。在季羨林的影响之下，教师们在进行教学工作的同时，仍然没有停止科研工作。科研成果主要表现在出版的大量学术专著和论文上，最突出的表现是各种词典，外语汉语词典、汉语外语词典，出版的数量多，质量高，很多在中国是前无古人，披荆斩棘，独辟蹊径，另立新天的，因而受到国内外有关方面的高度赞扬。

师生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教师上课，都有详细的大纲和教案，这都要经过教研室事前讨论，上课时决不能信口开河胡讲乱讲。老师们非常关心同学们的学习和生活，经常到学生宿舍去辅导，或者了解学习和生活情况。老师备课一直到深夜，夜深人静之时，老师的屋子里仍然灯火通明，或者在查阅文献，或者是在翻看字典，或者在奋笔疾书，或者在批改作业。老师们都知道，要想送给同学一杯水，自己必须先有一桶水，甚至一井水，谁都不愿意提着空水桶上课堂。

学生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绝大多数学生都能老师指到哪里，他们就做到哪里。他们刻苦学习，认真钻研。

老师教书不是为了吃饭，更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学生念书，也不是为了文凭。师生有一个共同的伟大目标。他们既是师生，又是同志，这是几千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现象。[9]

东语系确实在正常平稳发展。

但是，同世间的万事万物一样，绝对的正常、平稳是根本不可能有的。往往都是正常和不正常，平稳和不平稳，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互相交替。东语系也是这样。

单从系的名称来说，就出现过几次反复。

一开始，正式成立时，系名定为“东方语言文学系”。建国伊始，为了满足国家的需要，系里集中力量培养翻译人才。但是一来二去，谁也不记得到底是从什么时候起，也没有校方的正式通知，系名被悄没声地改为“东方语言系”，“文学”失踪了。最初，作为系主任的季羨林和其他老师们，并没有太介意。他们认为，“名者，实之宾也”。反正系里的重点是语言，“文学”丢掉，就由它去吧。

但是，过了几年，系里培养翻译的任务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而系里的课程设置，同西方语言文学系、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也都没有任何差别。那么，为什么他们的系名里有“文学”，而自己系却没有呢？这时候，季羨林和系里一些老师便感到有些不平衡，“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于是他们也就开始“鸣”了。

先从系里鸣起，一直鸣到学校，鸣到了教务长耳朵里。教务长说：“这不是什么大事，不必过分看重！”但是，我们系里都认为这是一件大事。没有“文学”，好像就低人一等。为了夺回我们失去的“文学”，我们总共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总也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悄没声地，“文学”两个大字又金光闪闪地出现在我们系的名称中。我们知足常乐，从此天下太平。[10]

然而，这只是不正常、不平稳的一个小侧面，而真正不平稳、不正常的，是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

二、经历运动

1. 从艺术界开始的运动

解放初，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尤其是艺术、电影领域，开始了一场被称之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重大斗争”。

首先遭到批判的是电影《清宫秘史》，本来是艺术问题，却被说成是任意歪曲历史事实，美化帝国主义，歌颂保皇党，诬蔑革命的群

众运动和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宣扬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这部影片在全国上映不久，毛泽东就指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刘少奇则针锋相对地提出，该电影是爱国主义的，陆定一、周扬和胡乔木，都支持刘少奇。而江青则支持毛泽东，几次在会上提出要坚决批判《清宫秘史》。解放后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已经开始。

在1950年底，在周扬、夏衍的支持下，电影《武训传》摄制完成，在全国各大城市上映。周扬认为武训是“为人民服务”的，号召学习“武训精神”。影片开始影响全国。

1951年初，毛泽东看到了《武训传》的反动性，是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影片。当江青向周扬传达这些意见时，周扬认为有点改良主义没有什么了不起。5月20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提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扬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毛泽东还指出：“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他号召“应当展开对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从此，在全国教育界和其他各界，都开展了学习这篇社论和批判《武训传》及“武训精神”的运动。教育部要求把这一运动普及到每个学校每个教育工作者，以肃清“武训精神”的影响，澄清教育思想上的混乱，以武训命名的学校，应立即改名。

这之后，是江青组织“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山东去调查，写出

《武训历史调查记》，用“铁一般的事实”，揭露了武训这个打着“义学”旗帜，“为地主阶级尽忠效劳的大骗子、大流氓、大奴才的丑恶嘴脸”，使对“反动的意识形态的一场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大破了“反动的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大立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思想方面为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条件。

但是文艺领域并不是都积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运动，到1954年2月，胡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三十万字的意见书，对毛泽东的文艺路线提出了不同意见，被认为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从此，“胡风反革命集团”被揭发和批判，这一事件也就成为严重的敌我矛盾事件。胡风本人以外，被牵涉到的人数不少，艺术界和学术界都有。季羨林回忆说：

附带进行了一次清查历史反革命的运动，自杀的人时有所闻。北大一位汽车司机告诉我，到了这样的时候，晚上开车，要十分警惕，怕冷不防有人从黑暗中一下子跳出来，甘愿作轮下之鬼。[11]

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揭发和批判还没有完结，俞平伯和胡适又被揪了出来。

1954年9月，毛泽东看到《文史哲》上发表的李希凡等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十分重视。10月，毛泽东就北京大学教授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问题，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些人，批评《文艺报》压制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根据这封信，全国文艺界及哲学社会科学界，都开展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的批判，同时展开了对胡适派唯心论的批判，全国各高等院校文科专业的师生均参加到这一批判之中。

从这次批判中，很多人认识到，过去胡适派的思想没有受到什么批判，古典文学方面，是胡适派的思想占了上风。

从此，很多严肃的学术问题，往往都和政治运动挂上钩，而广大知识分子，必须适应这些运动，逐渐把自己培养成不致被打倒的“运动健将”。

2. 不是阴谋，而是阳谋

到 1957 年，政治运动达到了第一次高潮。从规模上来看，从声势上来看，从涉及面之广来看，从持续时间之长来看，都无愧是空前的。[12]

2 月 27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在其中提出了如下的著名观点：

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13]

针对党内外的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逆流”，毛泽东提醒全党，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党内大多数人是正常的，稳定的，少数人有波动。下雨之前总会有蚂蚁出动，中国也有少数蚂蚁想出洞活动。

到 1957 年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据参加过最高国务会议的冯友兰先生讲，毛泽东讲话的时候，正是政协全国委员会开大会的时期，出席大会的政协委员都列席了最高国务会议，冯友兰是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也参加了会议，听了毛泽东的讲话。毛泽东讲话的时候，既没有讲稿，也没有拿大纲，就像平常讲话一样，随随便便，有时还加上一些诙谐，会场中的气氛非常活跃。[14]

整风运动开始时，最初只说是党内整风，号召大家提意见，并希

望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党的威信当时至高无上，许多爱护党而头脑简单的人，就真提开了意见，虽然绝大部分人是出于一片赤诚之心，但有的意见十分尖锐，有的话说得也不好听。于是，到5月份，毛泽东便向党内发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指示，指出在共产党内部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气，亲如兄弟。毛泽东又向全党指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在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最坚决，最猖狂，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来说，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

毛泽东还告诉全党：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党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他们不顾一切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庄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他们越做得不合理，就会更快地把他们抛到过去假装合作，假装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反面，让人们认识他们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那时他们就会把自己埋葬起来，这有什么不好呢？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纸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除掉它，灭掉它。

到后来，有不少人被揪住了辫子，划为右派。根据“上头”的意见，右派是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而且信誓旦旦说：右派永远不许翻案。

对于这场整风运动，季羨林的认识是：

有些被抓住辫子的人恍然大悟：原来不是说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吗？这是不是一场阴谋？答曰：否，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到了此时，悔之晚矣。戴上右派帽子的人，虽说是人民内部，

但是游离于敌我之间，徙倚于人鬼之隙，滋味是够受的。有的人到了二十年之后才被摘掉帽子，然而老夫耄矣。无论如何，这证明了，共产党有改正错误的勇气，是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15]

当时究竟有多少人被划为右派，确切数字季羨林并不知道。他只知道，右派是下指标的，这指标下达到每一个基层单位，如果没有完成，必须补划。传出了不少笑话。

比方说，北大哲学系教授张岱年，参加一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今之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会上针对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发言说自己非常高兴，欢欣鼓舞。他说：先秦时期曾经出现过百家争鸣，现在又要实行百家争鸣了，但是，现在的百家争鸣与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应有所不同。现在的百家争鸣，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的百家争鸣，张岱年表示自己是坚决拥护马克思主义的。

嗣后，张岱年访问熊十力教授，熊先生告诫他说：你要注意，情况是复杂的。你如果不注意，可能有人以最坏的污名加在你的头上。

但张岱年觉得，自己信仰唯物论，又拥护社会主义，不会有什么问题。到5月17日，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召开工会小组会，张岱年发言说：

三反肃反，我都积极参加了，但觉得也有一些问题。清华搞三反运动，一些老教授，如冯友兰、潘光旦先生，检查了三次才通过，未免伤了知识分子的感情。肃反运动时，本系开了批判王锦第的会，后来又宣布，据调查，王锦第的问题早在解放初期就已经交代了，没有新的问题。为什么不先调查后讨论呢？不先调查，却先开批判会，这不合适。[16]

张岱年发言的当时，并没有人反驳，但是，经过一个暑假，到了九月，系里忽然开会张岱年进行批判，认为他反对三反，反对肃反，宣扬资产阶级的思想自由，于是扣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定为右派。张岱年完全陷入迷惘之中。尤其在对他的批判中，一些人

深文周纳，给他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剥夺了他教学的权利。自此之后，一些熟人，睹面如不相识，但公道自在前辈学者心中，所以金岳霖先生、朱谦之先生、唐钺先生，仍以常礼相待，老友张恒寿、王维诚等人，也仍维持友谊。

经过整风运动，季羨林已认识到，世事如白云苍狗，变幻莫测。正当众多老知识分子兴高采烈，激情未熄的时候，华盖运便降临到头上。他后来说：

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针对的全是知识分子。批完了《武训传》，批俞平伯，批完了俞平伯，批胡适，一路批，批，批，斗，斗，斗，最后批到了陈寅恪头上。此时极大规模的、遍及全国的反右斗争还没有开始。老年反思，我在政治上是个蠢才。对这一系列的批和斗，我是心悦诚服的，一点没有感到其中有什么问题。我虽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在我灵魂深处，我真认为中国老知识分子就是“原罪”的化身，批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一旦批到了陈寅恪先生头上，我心里却感到不是味。虽然经人再三动员，我却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我不愿意厚着脸皮，充当事后的诸葛亮，我当时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我毕竟没有行动。现在时过境迁，在四十年之后，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在天之灵了。[17]

3. 运动中的东语系和季羨林

东语系的运动，和全国的政治运动有共性，有不少教师，因为给党提了些意见，最后被打成右派，如陈炎等人，都是在1957年成为右派的。除了共性之外，还有东语系的个性，这就往往牵涉到办系的指导思想，以及系内成员的思想改造和培养学生的目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问题都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决不允许等闲视之、掉以轻心的。

在全国开展的政治运动，在东语系的体现也是这一次你整我，下一次我整你，其间本没有什么真正的是非曲直，上面领导的意向往往就是金科玉律。结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人为地被搞紧张，本来是很好的人，却被弄得各人都不得安宁，随时准备有人来整，有的人则心怀鬼胎，随时准备表现出自己的积极态度，对自己的同伴下毒手。这样，人人自危，人人心有芥蒂，既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局面，也不利于教学和科研，分散了教师的许多精力，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东语系的主要问题，根据上面的归纳，主要是“智育第一，业务至上”。这样的问题，在现在看来未可厚非，而在当时，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却被“钦定”为“修正主义”。对此，季羨林深感自己有推卸不掉的责任。这是因为：

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在搞行政工作。我担任我们系的系主任垂三四十年之久。总支领导多数为我的学生。所以我的影响对于系风的形成是颇为深远的。我一向重视业务，积时既久，我就有了“业务至上”的名声。因为我有党员这个金字招牌作掩护，所以还没有被列入“白专道路”这个范畴内。但是其间的距离几乎就是“间不容发”了。我们系受了我的连累，在校内颇有“智育第一”的不知道是什么名——美名？每次政治运动一起，系领导当然要带头检讨，深挖思想根源，挖到能触及灵魂的深度。[18]

4. 入党

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他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所以，要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现

有的知识分子的力量，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大规模地培养新生力量来扩大他们的队伍，并且尽可能迅速地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以适应国家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断增长的需要，这成为当时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根本任务。

周恩来的报告分析了解放后知识分子的状况，指出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提出，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要重点做好知识分子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 and 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为此，周恩来要求继续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发展他们中的进步力量，做好在知识分子中的建党工作。[19]

两个月后，《人民日报》1956年3月21日又发表社论《做好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强调各级党委和学校等单位，要从高等学校的教授、中小学教师等知识分子中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大批地从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截至六月底，一大批著名的大学教授、专家和中小学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有二万九千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

季羨林就是在这时加入共产党的。

1956年4月4日，北京大学东语系教员党支部大会讨论并通过了他的入党请求。1957年4月4日，支部大会又通过了他的转正请求。

然而季羨林在思想上发生的转变，却并不是很简单的。

解放初，他觉得自己对共产党并不太了解，对共产主义也不那么向往，但是对国民党是了解的，因此，内心非常兴奋地欢迎解放军进城，希望而且也觉得从此换了人间。政治清明，一团朝气，许多措施

深得人心，他对社会现实极为满意。旧社会留下来的许多污泥浊水，已经荡涤一清，从此，河清有日，幸福来到了人间。

如何适应社会，对于季羨林来说也并不容易，他来自孔孟之乡的山东，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是自不用说的。他虽然刚刚进入中年，但是，心中需要克服的心理障碍却不老少。参加大会喊“万岁”的口号，最初他张不开嘴，连脱掉大褂换中山装这样的小事，他都觉得非常别扭。

他看到周围的一切是那么美好，反观自己，竟觉得百无是处，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摘桃派，没像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那样，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去浴血奋斗，壮烈牺牲，而是在国外追求自己的名山事业。所以，此时的他，对于入党是连想都不敢想，据熟悉他的好朋友著名诗人臧克家说：

北平解放不久，他还有点清高、谦逊思想。谈到有些知识分子入党问题时，他说：“共产党打下了天下，这时候你申请入党了。”环境在教育人，时间在改变人。50年代初，我在济南开人代会，恰好羨林在家，我去看他。亲密的朋友，相会于旧地（他与我都是在济南读中学的），自然别有情意。记得，他留我在他家吃饭，饭罢，羨林亲切而又严肃地对我说：党组织培育了这几年，现在我在考虑这件大事，我的为人你是知道的，入了党，就要为党工作，全力以赴，把个人的一切全交给党。

听了他的话，我感动不已。我也严肃地对他说：你以前关于知识分子入党的看法，今天要用事实纠正了。这一步，你是迈过来了。党和群众培育你，信任你，你应该写申请书！

他听了我的话，很感动的样子，没多说什么。我心里想，羨林不论做人，做学问，不是暴雨式的，而是沁透式的。他入了党，一定会给党好好地工作，只想给党添什么，决不会想向党要什么。

果然，羨林是这么做了。[20]

入党以后，季羨林便以一个新党员的朝气和真诚，以过节一般的

心情，参加党支部的每一次组织生活，组织观念极强。有一次，系里布置各支部召开党员大会，恰巧周恩来总理要请他赴宴，急得他到处去找支部书记请假。

从此，他觉得自己真正了解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这种了解又成了推动他前进的动力。从此，他更辛勤地为党工作，毫无架子，平等待人，系内外，校内外，声誉甚好。

就在 1956 年，季羨林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政治上的红，业务上的专，在季羨林身上真正做到了完美的、和谐的统一。

5. 反右，反右

1958 年，是令人振奋的一年，它让人在几天几个月的时间里看到了共产主义的希望；同时也是令人失望的一年，没想到共产主义来得快，去得也快。

这年年初，便开始反对“反冒进”，肯定了整风运动在全国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里，出现了一个新的洪峰，以反浪费和反保守为中心，掀起了一个新的鸣放高潮和整改高潮，锋芒集中在一个方向：贯彻多快好省勤俭建国的方针，促进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大跃进是一种突变，是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场斗争，一场革命。突变和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轰轰烈烈的反击右派的运动虽然逐渐接近了尾声，但是，车不能停驶，马不能停蹄，立即展开了新的运动，而且这一次运动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以前的运动。这一次是精神和物质一齐抓，既要解放生产力，又要肃清资产阶级思想。于是，人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什么都敢想到，当时的一首民歌，反映了人们想法的“大胆”：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在这样的形势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便树立起来了。

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开始了全民性的大炼钢铁。全国每一角落都行动起来，响应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群众运动的号召，到处搜拣废铁，加以冶炼。季羨林觉得，这样抓钢铁工业，超英赶美，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废铁炼完了，为了完成指标，就把完整的铁器，包括煮饭的锅在内，砸成“废铁”，回炉冶炼。全国各地，炼钢的小炉，灿若群星，日夜不熄，蔚为宇宙壮观，然而炼出来的都是一炉炉的废渣。[21]

人们对人民公社寄予无限希望，“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是当时最响亮的口号。人人都想早上天堂，于是，人民公社在一夜之间遍布全国。适逢当年粮食丰收，结果，粮食的亩产量也无限夸大，从几百斤、几千斤，到几万斤，大家都可以敞开肚皮吃饱饭，家庭里的锅灶已经炼了钢铁，自然地撤掉了，全体人民公社社员全都集中到公共食堂吃饭，谁都不用担心，反正地里有亩产几万斤做保证，“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没想到老百姓梦寐以求的吃饱饭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粮食虽然丰产在望，却由于都去炼钢铁而无人收割，便烂在地里。

当时把群众运动的威力夸大到无边无际，把人定胜天的威力也夸大到无边无际，亩产几万斤，一亩地里光麦粒或谷粒就得铺得老厚，对这样一些根本不可信的事实，季羨林在当时却是相信的：

那时我已经有四十七八岁，不是小孩子了；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留过洋的大学教授，然而我对这一切都深信不疑。“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是坚信的。我在心中还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没有解放”的“胆小鬼”，觉得惟我独马，惟我独革。[22]

在高等学校里，主要任务是肃清资产阶级思想。要求做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既不要被名家、权威吓倒，也不要被名人、大学问家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要插红旗，拔白旗。知识分子必须插红旗，辨风向，插红旗是越红越好。当时的普遍认识是：你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要插白旗，与其让资产阶级插，不如无产阶级插，资产阶级插的旗子，要拔掉它，要敢插敢拔。

“白”就代表落后，代表倒退，代表资产阶级思想，是与代表前进，代表革命，代表无产阶级思想的“红”相对立的。大学里和中国科学院里一些“资产阶级教授”，狠狠地被拔了一下白旗。[23]

“资产阶级教授”的智商并不比别人低，不傻不笨，为了保护自己，别人能投其所好，自己也未尝不能投其所好。知识分子中插的红旗便越来越多了。冯友兰先生回忆说：

各种刊物上都引马克思的话：社会主义国家一天的进步，要等于资本主义国家二十年的进步。各单位都开大会，规定自己的指标，各单位之间互相竞赛，看谁的指标定得高。定高指标叫“放卫星”。科学院的各个研究所在一块儿开会，每个所都报告自己的指标。指标是以字数计算，一个单位说，我们的指标是一年出一千万字；另一个单位就说，我们一年出一千二百万字。那个单位又一合计，说我们再加二百万字，共一千四百万字！这样步步高升，好像打擂台一样，有些地方就是称为打擂台。真是你追我赶，可惜所追赶的并不是实际上的产品，而是纸面上的数字，有些研究所报的指标，也还有些依据，因为他们有些研究员可能有些积存的旧稿，旧稿拿出来也可以算数。可是有些指标，完全没有根据，既没有积存的旧稿，也没有在计划中的

新稿，只是随便报数字，以多为贵，反正无论报多少，并不要当场兑现。

有一个研究所报告说，他们的翻译人员，产量最高，每人每天能翻译八万字。大家心里怀疑，要求当面表演。话已经说出来了，只得定期表演。结果证实，无论怎么样也翻译不出来八万字，就是抄写八万字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系里一位同志的爱人参加了表演，我们私下问这位同志，叫他讲讲他爱人参加表演的经过。他说，他的爱人的单位的领导，头几天就叫参加表演的人看将要翻译的资料，看了又看，心里已经有了一个翻译的腹稿，到表演那天，上班就写，饭也顾不得吃，写了一天，还是不能达到这个指标。可是人在第二天就累病了，一直躺了好几天才起床。[24]

知识分子聪明过了头，反而是害了自己。本来从全国形势来看，当时的政策已经“左”到不能再“左”了，当务之急应该是反“左”。但是到1959年6月，偏偏出现了一些“右倾机会主义”，他们“猖狂进攻”，他们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做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进行攻击，简直要把昆仑山脉推下去了。代表人物是彭德怀，他在7月14日庐山会议上，忽然间上了万言《意见书》，说了几句真话，这就惹了大祸。

《意见书》被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纲领，是举起资产阶级的旗帜，企图招兵买马，分裂党，因此，同彭德怀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原则的问题，而不是个别的问题。

于是一场反“左”，变为反右。

彭德怀的表现，却深得季羨林的赞许，一直到今天，在开国元勋中，他最崇拜最尊敬的无过于彭大将军。在季羨林眼中，彭德怀是一个难得的硬汉子，豁出命去，也不阿谀奉承，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然而知识分子却在继续反右的运动中，一个个难免厄运。

上面既然号召反右，那么就反吧。知识分子们，经过十几年连续不断的运动，都已锻炼成了“运动健将”，都已成了运动的内行里手。这一次我整你，下一次你整我，大家都已习惯这一套了。于是乱哄哄，时松时紧，时强时弱，一直反到社教运动。[25]

反右斗争迅速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人民群众也开始相信这样的事实：看来各地都有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存在着，增长着，有各种程度不同的情况，有些地方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情绪，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加以分析，把这歪风邪气打下去。而且，这样的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从此，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而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生死斗争，知识分子随时在提醒自己：反右，反右！

6. 劳动的乐趣

在经历运动的同时，知识分子也要通过劳动锻炼来接近劳动人民，以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季羨林一直认为，像他自己这样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不管是“高级”的，还是其他级的，思想都必须改造，而且能够改造。他说：

这一点，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今天，人们很少再谈思想改造了，好像一谈就是“极左”。但是我个人认为，思想改造还是必要的。客观世界飞速前进，新事物层出不穷，我们的思想如果不改造，怎么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呢？这是我的经验之谈，不是空口白话。……思想感情方面的转变是非常有意义的。它至少能证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确实有其优越之处，确实是值得我们热爱的。它能让一个人的思想感情在潜移默化中发生变化，甚至像南北极那样的变化。现在有那么一些人觉得社会主义不行了，优越性看不出来了，这个了，那个

了。我个人的例子就说明这些说法不对头。这也可以说是我的现身说法吧。[26]

然而，思想改造并非易事，对于季羨林来说也是这样。

季羨林生在农村，家庭清贫，对农村有一定的了解。但他六岁时便从农村来到城市，从此再也没有在农村长住。所以，他虽然对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他本人却并没有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体会。他小时候捡麦穗，在德国留学时，到农村帮助农民摘苹果，那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劳动。

1958年以后，北大每年都要组织下乡劳动。季羨林最难忘的，是1960年秋天，他和学校里的一些人到离北大不算很远的附近乡村，在一个人民公社参加劳动。他感到，虽然同样是秋天，但是这秋天同他五六岁时在家乡与母亲去摘绿豆荚时的秋天大不一样：

天仿佛特别蓝，草和泥土也仿佛特别香，人的心情当然也就特别舒畅了。——因此，我们干活都特别带劲。人民公社的同志们知道我们这一群白面书生干不了什么重活，只让我们砍老玉米秸。但是，就算是砍老玉米秸吧，我们干起来，仍然是缩手缩脚，一点也不利落。于是一位老大娘就走上前来，热心地教我们：怎样抓玉米秆，怎样下刀砍。在这时候，我注意到，她也有一双长满了老茧的手。我虽然同她素昧平生，但是她这一双手就生动地具体地说明了她的历史。我用不着再探询她的姓名、身世，还有她现在在公社所担负的职务。我一看到这双手，一想到母亲和王妈同样的手，我对她的感情就油然而生，而且肃然起敬，再说什么别的话，似乎就是多余的了。[27]

从这以后，季羨林不仅享受到参加劳动的乐趣，而且总是把自己的生活和长满老茧的手联系在一起。劳动创造了人类，劳动是靠双手实现的。从此，他一看到长满老茧的手，心中便不由自主地生出敬意。

有一天黄昏，季羨林乘公共汽车从城里回北大。车上乘客的一双长满了老茧的手，引起了他的注意。

最初，季羨林只是坐在车上看着一张晚报。但是在有意无意之间，他的眼光偶尔一滑，正巧落在位老妇人的一双长满老茧的手上。他的心立刻震动了一下，眼光不由地就由这双手向上看去：先看到两手之间一个胀得圆圆的布包，然后看到一件洗得挺干净的褪了色的蓝布褂子，再往上是一张饱经风霜布满了皱纹的脸，长着一双和善慈祥的眼睛；最后是包在头上的白手巾，银丝般的白发从里面披散下来。这一切都给了季羨林极好的印象，而印象最深的是那一双长满了老茧的手，它像吸铁石一样吸住了他的眼光。从而想起了母亲、王妈，以及人民公社老大娘的长满老茧的手。

就这样，在公共汽车行驶声中，我的回忆围绕着一双长满了老茧的手联成一条线，从几十年前，一直牵到现在，集中到坐在我眼前的这一位老妇人的手上。这回忆像是一团丝，愈抽愈细，愈抽愈多。它甜蜜而痛苦，错乱而清晰。在我一生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三双长满老茧的手，现在似乎重叠起来化成一双手了。它在我眼前不停地晃动，体积愈来愈扩大，形象愈来愈清晰。

正是这一双双长满老茧的手，在随时提醒着季羨林：自己永远是大地之子，永远是一个“土包子”。劳动，不仅给季羨林带来了乐趣，也使他的情感得到了升华。

7.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会上，毛泽东阐述了著名的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毛泽东指出：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

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28]

因为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因此，全党都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阶级斗争从这时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伟大领袖的地位已经奠定，他一声令下，全国立即投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中。

1964年9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知具体落实毛泽东的路线，指出文科脱离实际的倾向十分严重，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思想影响相当普遍。今后的方向，是使文科院校附设工厂或者迁到农场，办成半工半读或者半耕半读的学校，使文科师生通过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逐步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到11月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开始在北京大学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由五人小组领导之下的运动工作队领导。五人小组成员是：张磐石（中宣部副部长）、刘仰峤（高教部副部长）、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庞达（中宣部教育处副处长）、宋硕（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运动工作队队长是张磐石，成员有从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文教部门及各高校抽调的干部二百五十多人。

到1965年3月，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北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

作队会议上，要求按“二十三条”把运动搞下去，肯定成绩，改正缺点。

在北大的社教运动中，季羨林产生了解放后第一次形成的一点“反动思想”。

北大因为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先走了一步。在运动开始后不久，学校就泾渭分明地分成了两派：被整的与整人的。

我也懵懵懂懂地参加了整人的行列。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也想不通，解放后第一次萌动了一点“反动思想”：学校的领导都是上面派来的老党员、老干部，我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起不了多大作用，为什么上头的意思说我们“统治”了学校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29]

作为北大社教运动试点的直接结果，是在1964年冬天“揪出”了以党委书记陆平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黑帮”，之后，在1965年1月1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全国工作会议，制定了“二十三条”，肯定了社教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这些当权派，有的在幕前，有的在幕后，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上面的甚至有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

事实非常明显，“揪出”了陆平，目的在于“揪”彭真。所以在1965年7月，北京市委在国际饭店召开会议，进行干预，为被揪被批的学校领导陆平等人平反，这就伏下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参加完国际饭店的会议，已经是1965年秋天。季羨林被派到北京郊区农村南口，去搞农村的社教运动。

在南口，季羨林他们充当了社教的领导，党政财文大权统统掌握在自己手里。而同时，对他们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不许自己开火做饭，在全村轮流吃派饭，鱼肉蛋之类营养丰富的食品不许吃，自己的身份和工资不许暴露。因为当时农民每天挣到的工分，不过三四角钱，干一个月也就合十二三块钱，而季羨林是一级教授，在教授中工

资是最高的，每月四五百块钱，这样的身份暴露出去，怕农民会吃惊。时隔三十多年了，今天一级教授的工资数目，再到农村就不肯说，说出去，农民会笑话了。季羨林抚今追昔，真不禁感慨系之矣！

就在南口进行社教之时，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从此，开始了对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的批判，敲响了“文化大革命”的钟声。而“三家村”的主人，季羨林全都认识，而且，还和吴晗在一个代表团出国访问过。他在南口无意中说了出来，结果被一位“高足”有意地牢记在心，文革伊始，这位“高足”对季羨林竟然落井下石，把季羨林打成了“三家村”的小伙计，进行批判。

一向爱护学生的季羨林，心里只觉得有一阵阵的凉意。一向以尊师重教闻名于世的文明古国，师生关系竟被糟蹋到这种地步，悲夫！

8. 报春的燕子——雷锋

从北京解放之时，季羨林就爱上解放军军衣的黄色，觉得这黄色是朴素的，像真理那样朴素；是动人的，像真理那样动人。而自从解放军里出了雷锋，季羨林越发喜欢这军衣的黄色了。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在全军、全国迅速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学雷锋运动。

就在这一号召发出之后不久，季羨林在五一节那天，早晨起来就乘无轨电车进城去。

在季羨林的座位前面，坐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和她的母亲。小女孩透过车窗玻璃，看到外面的无轨电车站上站着几个解放军战士，在那里排队等车。女孩小小的黑眼睛立刻亮了起来，她似乎是对着解放军，又似乎是对着母亲，高声叫着：“解放军叔叔！”

“解放军叔叔好吗？”母亲问着可爱的女儿。

“解放军叔叔好！”女孩立刻用银铃般清脆的声音，不假思索地

答道。女孩接着情不自禁地拍着小手，唱起了：

我是一个兵，
来自老百姓……

听着这清脆的声音，季羨林从内心深处羡慕这幸福的孩子。触景生情，他不由自主地想到，自己像她这样大的时候，看到的兵，一个个都是手里提着皮带、斜楞着眼、满脸杀气的样子。那时的季羨林见了他们，就像是老鼠见了猫，远远地只有躲开，哪里敢同他们说什么话呢？

从眼前的解放军，季羨林又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雷锋。雷锋也是一个穿黄色军衣的解放军，由于生活在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里，雷锋成长起来。又由于有了雷锋这样的战士，解放军就更显得可爱。雷锋作为儿童校外义务辅导员，怎样对孩子们进行辅导，季羨林并不清楚，但他想，雷锋一定会把自己优秀的品质在潜移默化中传给孩子们，雷锋那光辉灿烂的人格一定会照亮儿童们的心。孩子们看到雷锋，也一定会眼里闪出亮光。

季羨林不禁想到雷锋入伍那天的日记：“这天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这天是我最大的荣幸和光荣的日子。我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穿上了黄军服，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我好几年来的愿望在今天已实现了，真感到万分的高兴和喜悦，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季羨林想象着，当雷锋穿上这一身黄色军衣的时候，内心会多么激动，肯定会用双手去抚摸这身军衣，感到它比丝绸更柔滑，比世界上一切美的东西都更美。每当雷锋穿上这件黄色的军衣，便感到有无穷的力量在鞭策自己，这个力量是在驾驶汽车、在火车上当服务员、在工地参加义务劳动的时候，……永远永远也用不完的。

想到这里，季羨林很自然地把雷锋当成了报春的燕子。

我因此就又想到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不但像以前那样想到过去，而且更多地想到将来。我相信，像雷锋这样的人将来还会不断地出现，数目会越来越多。他们就像是报春的燕子，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

看到人类最美好的社会的影子。这样的人，穿黄色军衣的人们里面会出现；穿别的颜色的衣服的人们里面也会出现。[30]

是的，正是由于这报春的燕子越来越多，才使祖国到处都充满了春天。

9. 社教中的心路历程

季羨林自己常说，在政治上，他是幼儿园的小学生。[31]这意味着他在政治上并不敏感，嗅觉并不灵敏，具体表现在对社教的态度上，他并没有嗅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会酿成一场大灾难，社教会成为“文革”的前奏。而是相反，在社教中的季羨林，作为党员教授，是得到信任的，是以领导者的身份参加社教的。他在社教中的心路历程上明显地写着，他是相信阶级斗争学说的，而且认为阶级斗争观念的增强，就是阶级觉悟高的直接表现。另外也明显地写着，在他眼中的社教，使人们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

对此，我们用不着为贤者讳，这正证明了人的认识是逐步提高的，从来就没有什么天生的圣人。

1964年2月，季羨林参加了一些对城市居民进行宣传的工作，深入到城市普通街道妇女的家中，向她们说明一些事情，同她们谈话，几乎天天跟她们在一起，她们也就不再把他当外人，非常愿意向他倾吐她们心里想的是什麼，爱的是什麼，恨的又是什麼，憧憬的又是什麼。

这使季羨林大吃一惊，平常在城市里生活，经常会遇到提着篮子买菜的阿姨、领着孙子孙女出去游玩的老奶奶、梳着两条大辫子卖车票的姑娘、还有忙忙碌碌的街道女干部，只觉得这些人平平常常，面带笑容，心平气和。至于她们想什麼，从来没引起过季羨林的注意。但是，这次宣传使季羨林蓦地发现，这些十分熟悉的人，竟是十分陌生，这些普通人，觉悟竟是如此之高。

当时觉悟高的表现之一，是诉旧社会之苦，忆苦思甜。经常召开各种各样的忆苦思甜会议，大会、小组会，形式多样又活泼，且人人都愿意以自己是“苦出身”的身份，勇敢地揭发地主、资本家的罪恶。

季羨林领导了一个小组会的忆苦思甜，为了存真起见，不妨摘录季羨林的原文：

在小组会上，她们争先恐后地告诉我她们自己过去的经历和今天的感受。有的人说：她七岁给地主当头丫头，三年只挣了一件短褂子。临走的时候，地主连这一件短褂子也不给她，把她扒得浑身精光，赶出了门。有的人说：她丈夫参加了抗日游击队，给地主、鬼子逮住，十冬腊月，脱得一丝不挂，用鞭子抽；浑身流血，他们就铺上麻，等干了的时候，再往下揭，连皮都揭掉一层。有的人说：小时候穷，住的是地主的房子。人家是下雨往屋里跑，我们是下雨往屋外跑，怕房子塌了砸死。后来给地主家去当丫头，地主婆每天夜里来打她。她每次上床的时候，心里就想：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活着看到太阳出来。她亲眼看到，地主婆活活地打死一个十六七岁的丫头，用席子一包就拖了出去，脸上的汗毛也不动一动。有的人说：她从小就被父母卖给地主家当丫头。夜里地主和地主婆吸大烟，要她在旁边侍候。她一打盹，地主婆就用大烟杆子扎她的嘴，扎她的手，把一只手扎成了残废。有一天，她的父母来看她，地主不让见。据说父母留下了两方小手巾，上面写着她的姓名和生辰八字。她才知道自己姓什么。她和父母以后就没有再见面，至今死活不知。就连她这姓，她也有些怀疑；地主那样说，她也就只好那样信了。她就像是孙悟空一样，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32]

这时候，会开到热烈之处，大家边说边哭，有时候竟引得全场流泪。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大娘霍地站起来，把诉苦推向了高潮。她小时候到地主家要饭，地主放狗咬烂了她的腿，地主拿出煎饼擦她腿上的血，又把煎饼扔给狗吃。后来，父母受人骗，把她许给一个比她大二

十多岁的男人当老婆。男人不正，只知赌钱。他们头一胎生了个女孩，饿死了，第二胎生了男孩，第三胎又是女孩，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没出月子就给人锯木头挣钱，坐在洋灰地上整宿拉锯，又硬又凉，好容易挣到的一点钱，又被丈夫偷去赌输了。儿子三岁时，丈夫要把儿子卖了。她气得去赊了半斤烧酒、五盒洋火（火柴），把火柴在酒中泡了泡喝下去，心里难受得像用尖刀割、滚油烧，幸而别人用胰子（肥皂）水灌她，把喝的东西吐出来才没有死。可丈夫卷起两床被子走了，再没有回来，她千辛万苦，拉巴着两个孩子，既受中国有钱人的气，还要受日本人的气，公公和舅舅都被日本人打死了。

老大娘声调一转，接着说，好容易熬到解放，她从地狱里一步登上了天堂，儿子、女儿、儿媳，都是国家干部，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吃穿不愁。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她的骨头早就烂在土里了。

老大娘“解放”一词，把大家的话头都引了出来，异口同声地说：“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也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一个四川口音的老太太说：“我们今天的日子来得不容易，谁要想捣乱，我们一定阶级斗争他！”“阶级斗争他”，她连说了三遍。

这次小组会后，季羨林看到的这些平常人，心里埋藏着对旧社会无比强烈的恨，恨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决不允许他们复辟；埋藏着对新社会无比强烈的爱，用火热的心爱着伟大的党和伟大的领袖。这爱与恨都是达到顶点的、不可调和的。季羨林感到：这样的人民是伟大的，有着这样人民的国家是伟大的。他感到振奋与骄傲。他感到全国亿万人民都是向日葵，向着一轮巨大无比的太阳开放，这轮太阳赤红如炽炭，威猛如火龙，辉辉煌煌，高悬在宇宙之中，吸引住朵朵葵花，照亮了人类前进的道路，光芒直上三千大千世界。[33]

季羨林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两年以后，自己也被“阶级斗争他”的那些人所斗争。

1965年底、1966年初，季羨林在京郊八达岭北梁子上亲眼看到

社教后人们觉悟的提高。

那里正展开一场挖坑田的大战。天寒风急，风沙击面，从八达岭上扫下来的狂风，以惊人的力量和速度扑向这里，把人吹得像水上的浮萍。挖坑的活十分艰苦，地面上松松的一层浮土，几镐刨下去，就露出了胶泥，胶泥软硬不吃，带有弹性，一镐下去像刨在硬橡皮上，留下一点浅浅的镐痕，却掉不下多少泥来。镐下如雨，而地坚如石，刨不了几下，人的手就给震出血来，有的虎口都给震裂。

往年的数九寒天，人们呆在家里的热炕头上，干点轻活，等着吃过春节的饺子，而社教后，人们竟愿意干这样扎手的活。干活的人个个精神抖擞，干劲冲天，在飞沙走石中，沉着、勇猛，身上的热气顶住了寒气，镐声压住了风声，热烈紧张的气氛直冲云霄。

忽然，远处烧起了野火。野火烧掉人民的财富，是决不允许的。大家几乎是在同一秒钟内，丢下铁镐，扛起铁锹，向着野火，飞奔而去。

山沟里并没有路，地边上沟边上长满了葛针，浑身是刺，衣服碰上，会被挂破；手碰上，会被扎伤。但是人们不顾这些，奔向火场。

在火场，人们奋力救火，有人用铁锹扑打；有人用衣服扑打，有人甚至用自己的手脚扑打，衣服烧着了，鞋子烧破了，手烧伤了，脸烧黑了。大片的野火终于被扑灭了。

救完野火，人们又回到北梁子。天更冷了，风更大了，飞沙更多了，人们又投入到热火朝天的挖坑田的劳动中。

季羨林作为这次劳动中的一员，觉得农民的形象在自己眼内高大了起来，他不由自主地想到毛泽东的一句诗：“遍地英雄下夕烟。”这样一群老实朴素的农民，不正是毛泽东诗中的“遍地英雄”吗？！

[34]

这是季羨林在1966年2月17日对社会主义教育的认识，时距“文化大革命”中“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贴出的5月25日，仅有三个多月。而文革一开始，季羨林仍在南口农村参加社教，陶醉

在社教所掀起的一重又一重波浪之中。直到 1966 年 6 月 4 日，他奉召回校，才结束了农村的社教，而投入到另一场规模更大的“阶级斗争”中去，只是到那时，他已不再是领导者，而是被批斗者了。

这自然是后话。

三、春满燕园

1. 人生百味

季羨林自认不喜欢拜访人，就是很要好的老师、朋友，也不例外。但他不拜访人，却并不是不交朋友。他交的朋友，既有同道者，也有不同道者，既有比自己大的人，也有同龄的，还有比自己小的。

其实，季羨林不喜欢拜访人，并不是绝对的。他拜访过恩师陈寅恪；从认识了臧克家，他们俩是经常互访的，他们之间的友谊一直在发展着。

臧克家 1949 年春天从香港来到北京，住在笔管胡同 7 号。

笔管胡同坐落在建国门内一条不宽的街道上，臧克家的住处是在一个坐北朝南的大院子里。院子里住有七户，臧克家与王子野住在东院，庭中有棵大香椿树，挺立如盖，两家屋子均在其荫下。臧克家在这里住，到东总布胡同 10 号人民出版社去上班，徒步走十多分钟，一路安安闲闲地就走到了。臧克家在这个院里的两间小平房里，一直住到 1958 年建国门内大街扩建，从那以后，他住到史家胡同 8 号。

此时，季羨林只身住在翠花胡同。他们经常互相访问。

季羨林常到笔管胡同拜访臧克家，臧克家也常到翠花胡同去看季羨林。北大搬到西郊以后，季羨林也常到城里去看望臧克家。

1951 年，季羨林去印度访问，回国时，给臧克家送去一束孔雀翎毛，大约有二十多支，至今这么多年，翠色不变，完好地保存在诗人家中。以后每次出国访问，季羨林总忘不了送给他一件外国小玩艺

作为纪念品，这都是他自己掏钱买的，外国朋友所赠送的礼品，则全部交公。[35]

1954年，季羨林与在中山大学任教的陈寅恪先生同时被确定为一级教授。暑假，季羨林回济南探家。臧克家正在济南开人代会，臧克家到季羨林在南关佛山街的家中去看他。亲密的朋友，相会于旧地，自然是别有情意。季羨林留老朋友在家吃饭，拉家常。

他们之间的友谊从1946年，一直维持到现在。这是两个文化巨人的友谊。

然而，季羨林的友谊不仅是对臧克家的，还有对一个普通女孩——华华的。

华华是季羨林邂逅相遇的一个两岁的女孩。也是在上世纪50年代，季羨林回济南过暑假，探望婶母和妻子。家仍在南关佛山街上，住在西屋和北屋，是普通的平房。同院的南屋里，住着一家姓田的木匠。

田木匠家有一儿二女，小女儿名叫华子，季家便把这个小名进一步演变为爱称“华华儿”。

她大概只有两岁，路走不稳，走起来晃晃荡荡，两条小腿十分吃力，话也说不全。按辈份，她应该叫我“大爷”；但是华华还发不出两个字的音，她把“大爷”简化为“爷”。一见了我，就摇摇晃晃，跑了过来，满嘴“爷”、“爷”不停地喊着。走到我跟前，一下子抱住我的腿，仿佛有无限的乐趣，她妈喊她，她置之不理。勉强抱走，她就哭着奋力挣脱。有时候，我在北屋睡午觉，只觉得周围鸦雀无声，阒静幽雅。“北堂夏睡足”，一枕黄粱，猛一睁眼：一个小东西站在我的身旁，大气不出。一见我醒来，立即“爷”、“爷”，叫个不停。不知道她已经等了多久了。我此时真是万感交集，连忙抱起小东西，连声叫着“华华儿”。[36]

有一次，季羨林不在家，出门办事去了。等回家时，走到大门口，华华妈正把她抱在怀里，妈妈说想试一试华华，看她会怎么办。

老远见到季羨林回来，华华立即用惊人的力量，从妈妈怀里挣脱出来，举起小手，让季羨林抱她。华华妈说，她早就想到有这种可能，但没想到华华挣脱的力量竟有这样惊人的大。大家都笑个不停，而季羨林在笑中却直想流泪。

过去两年，婶母和妻子到北京小住了些日子。后来听到同院里的邻居说，那一段时间，在上着锁的西屋门前，天天有两个小动物在那里蹲守着：一个小动物是真的，那是一只猫；另一个小动物，就是已长到三四岁的华华。

听到这里，季羨林心里犯开了嘀咕，“可怜小儿女，不解忆长安”，华华那么小，大概还不知道什么是北京，也不知道什么是别离，所以才和小猫咪天天到西屋门前蹲守。她那天真稚嫩的心灵里，不知是什么滋味，望眼欲穿而又不见伊人。她的失望，她的寂寞，大概她自己也说不出，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了。[37]

季羨林有时候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一些孩子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地喜欢他，爱他；他也无缘无故地喜欢这些孩子，爱这些孩子。他常想，自己貌不出众，语不惊人，不过普普通通，且不修边幅，因而常被人误认为是学校里的勤杂老工人、老师傅。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会引起一个孩子的欢心，孩子是那么天真无邪，毫无功利目的。其中的道理，他解释不通，而且相信别人也解释不通，甚至赞天地之化育的哲学家也解释不通。

季羨林在这人生百味中思索着。

但他没有意识到，正是泛爱众、体万物之情的博大胸怀，无私的爱心，才吸引了孩子们。从那时到今天的历史，已经真实地证明了这一点。

2. 朗润园 13 号公寓

季羨林在蓝旗营公寓住单身宿舍，一住就是十年。

单身生活对于他来说，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在长时间里，他无法改变这个现实。他的妻子彭德华，必须留在济南家中，照顾年迈的叔父和婶母。季羨林是个大孝子，虽然叔父母不是他的亲生父母，但对他们的养育之恩，他始终铭记心怀，对下决心培养他成才的叔父，始终十分感激。他知道，妻子照顾叔父这样一个脾气孤傲、极不好对付的老人，是相当为难的。封建社会传统的忠孝节义虽然不再适应新社会，已被废除，但是孝敬老人仍然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保留节目，对此，季羨林是深信不疑的。妻子会受多少委屈，自己独身生活会多么艰难，季羨林都没有去多考虑，他只想让叔父母得到妻子更多的照顾，以安度晚年。

叔父季嗣诚走完了他那坎坷曲折的人生历程，在济南去世。

1962年，婶母与妻子也从济南把家搬迁到了北京。

蓝旗营公寓是单身教工宿舍，家搬来之后，不能再在这里居住。

季羨林很想搬进燕南园去住，光是“燕南”这个名字所具有的诗意，就足以让季羨林动心，更不用说那里优美雅静的环境了。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堂”，就是燕南园中的一景。但是，燕南园里已没有合适的房舍，所以，他始终未能搬进这座名园。

季羨林搬进了燕园中的另一个名园——朗润园，从此13公寓成为他真正的家，一直住到现在。

朗润园是明清名园之一，也是圆明园附属的苑园之一。这里水木明瑟，曲径通幽，绿树蓊郁，红荷映日，园中有许多处所都是有典故的。

13公寓就建在这所名园里，楼前是一池碧水，楼后是有名的万泉河，过了北大后院墙，再过了马路，就是圆明园旧址。楼建成后，季羨林一家最早搬进去住，成为该楼的第一户房主。

后来这里一共又建了五座宿舍楼，结构与13公寓完全一样，四层，两个单元的楼门。其他五座都在湖的东边，由南向北排列，惟有这13公寓是单干户，在湖的北部偏西。

季羨林刚搬来之时，湖里有一片清碧的荷花。夏天里盛开着荷花。清晨，每天季羨林坐到窗前舞文弄墨之时，在薄暗中总可以透过窗子，看到接天的莲叶，而荷花的香气也透过窗缝幽然袭来。季羨林自然顾而乐之。

13 公寓的右边，前临池塘，背靠土山，有几间十分古老的平房，这就是清代保卫八大公园的侍卫一类的人住的地方，与和珅还有点关系。

土山之下，继续向右延伸，是一条曲径。这条曲径非常有名，与《红楼梦》还有点关系。季羨林清楚地记得，他在 1950 年代时，在故宫的一个城楼上，参观过一个有关《红楼梦》的展览。几幅山水画组成了一系列组画，画中就有这条曲径，这条曲径的优美表现在：

一面傍湖，一面靠山，蜿蜒曲折，实有曲径通幽之趣。山上苍松翠柏，杂成树林。无论春夏秋冬，总有翠色在目。不知名的小花，从春天开起，过一阵换一个颜色，一直开到秋末。到了夏天，山上一团浓绿，人们仿佛是在一片绿雾中穿行。林中小鸟，枝头鸣蝉，仿佛互相应答。秋天，枫叶变红，与苍松翠柏，相映成趣，凄清中又饱含浓烈。几乎让人不辨四时了。

小径另一面是荷塘，引人注目主要是在夏天。此时绿叶接天，红荷映日。仿佛从地下深处爆发出一股无比强烈的生命力，向上，向上，向上，欲与天公试比高，真能使懦者立怯者强，给人以无穷的感染力。[38]

这样的环境，正可谓山光湖色，相映成趣。对这块极为幽静的地方，学生们把它称之为“后湖”，他们很少到这里来，自然很难欣赏到这里的美景。一到冬天，不管是在山上，还是在湖中，都会有白雪覆盖。而平日，湖中的坚冰取代了昔日潋艳的绿波。山上，落叶树已光秃，而松柏、冬青，反而精神更加抖擞，绿色更加浓烈，意在把落叶树之所失，由自己一手弥补过来，显示出诱人的绿色的威力。山下又有翠竹为松柏助威，使人置身其间，竟然一点也不会感到冬天的萧

索肃杀之气了。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季羨林的生活、学问都渐入佳境。

3. 团聚的一家人

季羨林最初搬进 13 公寓时，一家人住在二楼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里，后来因为书太重，搬到一楼。受到北大特殊照顾，对面一套三居室也给了他。

季羨林生活十分俭朴，几间屋子里除了书还是书，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连一对单人小沙发，也是后来才买的。

在家中，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不抽烟，不喝酒，只是喜欢在屋子里摆上几盆花：文竹、仙人掌、萝卜花、天冬草，还有最喜欢的君子兰，因为它四季常青，花形美丽，色泽鲜丽，而且也非常高雅，有独立而不改的特行之姿，每当春节前后开花时，他总把它摆在书房兼客厅里，显得雅致而大方。

婶母搬到北京以后，邻里家的人都管她叫“老祖”以示尊敬，相沿成习，季羨林一家也都这样叫开了。而夫人彭德华，虽然住进了大都市，但仍是全身乡里气，为人也是充满古风，远近邻舍都叫她季奶奶，她人缘最好，也是因为总是以忠厚待人。[39]

自从老祖来了之后，几乎天天背着一个大黑布包，出去采买食品菜蔬，成为朗润园的美谈。老祖进了这个家，非常满意，告诉自己的娘家人，也告诉邻居，说“这一家子都是很孝顺的”。

季羨林非常尊敬老祖，觉得这个家几十年来从没有半点龃龉，总是你尊我敬，从来没有吵过架，这是极为难得的。

这个家之所以这样和睦，主要功劳在老祖和妻子彭德华。

夫人来京之后，季羨林过单身生活三十多年，总算到此结束，终于有了一个家。这是夫人一生的黄金时期，也是季羨林一生最幸福的时候。家庭气氛非常温馨，和睦相处，你尊我让，从来没有吵过嘴。

女儿婉如、儿子季承也都成家立业，他们星期天回家，也有朋友来的时候，在这种团聚的时候，烹饪都由老祖和妻子主持，杯盘满桌，可饭菜上桌以后，众人开始狼吞虎咽，大快朵颐，老祖和妻子却总是坐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大家吃，脸上流露出极为愉悦的表情。[40]

对这样的家庭，无须多赞一词。因为一切赞誉之词都是无用的，都会黯然失色。

4. 在家中上早班

有了这样一个幸福而温馨的家庭，季羨林不再孤独，不再为自己的饮食起居浪费巨大的精力。

从此，季羨林的身影总是活跃在朗润园、去外文楼上班的路上和外文楼的办公室里。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的生活极有规律，衣着几乎是几十年一贯制的中山装。张中行先生通过多年的观察，用评论性的话总而言之，不过两个字：“朴厚。”在北京大学这个圈子里，他是名教授，还有几项烜赫的头衔：副校长、系主任、研究所所长，可是看装束，像是远远配不上，一身旧中山服，布鞋，如果是在路上走，手里提的经常是个圆筒形上端缀两条带的旧书包。对他家的印象，是陈旧，简直没有一点现代化气息。室内，墙、地，以及家具、陈设，都像是上个世纪平民之家的。惟一不同的是书多，靠东一个单元三间，架上、案上，都装满了书，只好扩张，把阳台封上，改为书库，书架都是上触顶棚的。[41]

至于饮食，季羨林则更没有什么更高的追求，他的生活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用最时髦的两个字便足以概括：那就是“清苦”。

1984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杨匡满《为了下一个早晨》的长篇报告文学，详细描述季羨林的起居生活和工作情况，下面就是他从搬进朗润园以后到现在一直未加多少改变的生活规律：

清晨四点，他拧亮了灯，起床了。从红楼、翠花胡同、蓝旗营，

一直到朗润园，他几乎都是在这个时候起床。不同的是，在蓝旗营时，他起床不久，就可以在晨曦中看到北京展览馆那金光闪闪的高塔尖顶，而在朗润园，他看到的则是未名湖畔博雅塔的尖顶。

简简单单地抹一把脸，就算是化完了一天的妆。他不出去跑步锻炼，早晨也不散步，而是下了床，洗完脸，就坐到临窗的写字台前开始干活了。

从他入党以来，社会工作一天比一天多，各种各样的头衔接踵而至，让他应接不暇。他不得不去应付各种各样的会议，愿意听的，不愿意听的，主动听的，被动听的，而且还要经常被邀作重要发言。所以他说：

三十几年来，我成了一个“开会迷”。说老实话，积三十年之经验，我真有点怕开会了。在白天，一整天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接到开会的通知。说一句过火的话，我简直是提心吊胆，心里不得安宁。即使不开会，这种惴惴不安的心情总摆脱不掉。只有在黎明以前，根据我的经验，没有哪里会来找你开会的。因此，我起床往桌子旁边一坐，仿佛有什么近似条件反射的东西立刻就起了作用，我心里安安静静，一下子进入角色，拿起笔来，“文思”（如果也算是文思的话）如泉水喷涌，记忆力也像刚磨过的刀子，锐不可当。此时，我真是乐不可支，如果给我机会的话，我简直想手舞足蹈了。[42]

一张不算很大的书桌，是他的第一张工作台。这张写字台，比起那些暴发户的老板式写字台来，简直有些寒酸，但我们经常看到，老板写字台上，总是空荡荡的，因为它们的老板肚子里是一无所有，没有知识的人照样可以做老板。而季羨林这一张桌子，却挤挤揉揉、密密麻麻堆满了前一天就摊开的中文的、外文的各种书籍、报刊、夹书的纸条、各色的卡片，桌面上的空地方，只能铺开一叠稿纸，挤一挤，可以再放上一只水杯。他的脑子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学问，但仍然不够用，他还拼命地从各种书籍中吸取新的知识。没有办法，处在知识不断更新的“知识爆炸”时代，学问再多也是不够用的。季羨

林，就是这样一个智者。

周围的书全是他的朋友，他把它们称之为“书友”。

在书友面前，记忆力惊人的季羨林，也难免窘态毕露。他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不爱清洁和秩序的人，但是，因为事情头绪太多，脑袋里考虑的学术问题和写作问题也不少，而且每天都收到大量的寄来的书刊杂志以及信件，转瞬之间就摞成一摞。加之，他习惯于在两个甚至是三个战场同时作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是需要一本书，往往也会遍寻不得。知道书“只在此屋中”，但却“书深不知处”。有时候，急得满头大汗，也是枉然。

没有办法，只好到图书馆去借阅。

可是，等到把文章写好，把书送还图书馆后，无意之间，在一摞书中，竟能找到原来要找而未得的书，“得来全不费工夫”了，然而晚了，工夫早已费过了。他感到又可气，又可笑。

我啼笑皆非，无可奈何，等到用另外一本书时，再重演一次这出喜剧。我知道，我要寻找的书友，看到我急得那般模样，会大声给我打招呼的，但是喊破了嗓子，也无济于事。我还没有修持到能听懂书的语言的水平。我还要加倍努力去修持。我有信心，将来一定能获得真正的“天眼通”和“天耳通”。只要我想要哪一本书，哪一本书就会自己报出所在之处，我一伸手，便可拿到，如探囊取物。这样一来，文思就会像泉水般地喷涌，我的笔变成了生花妙笔，写出来的文章会成为天下之至文。到了那时，我的书斋里会充满了没有声音的声音，布满了没有形象的形象。我同我的书友们能够自由地互通思想，交流感情。我的书斋会成为宇宙间第一神奇的书斋。岂不猗欬休哉！

[43]

时间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之中流逝。他时而翻阅书刊，时而瞑目深思，时而奋笔疾书。窗外的天幕开始发白，天就要亮了。

这时候，他会弯腰拿起一个在脚边的瓶子，里边装着浇花的水，他用这瓶子往文竹、仙人掌，还有那可爱的君子兰上浇水，细细的水

流把花、叶洗得发亮，他笑了，他就算休息了一会儿。

休息了这一小会儿，他重新坐下来，这时候，他不一定重新进行上半段的工作，他在上半段可以写学术论文，而这一半段，他往往从事翻译，这样转换角色的本身，就是一种休息。

三个多小时轻松地过去。

门轻轻地被推开，老伴出现在书房里。原来已经七点了，老伴来叫他吃早饭。

饭桌上摆着牛奶、炒花生米和烤馒头片，这是季羨林几十年一贯制形成的饮食习惯。这种习惯，人们都觉得有点像老农。吃完早饭，他喜欢喝点茶，有时也就着茶吃馒头片。对于茶，他是喜欢喝点好的，龙井是他很喜欢喝的。妻子往往多烤制一些馒头片，盛在一个布袋子里，挂在他的工作间里，什么时候饿了，就着茶再吃。

就这样，季羨林结束了在家里上的早班，这是他一天紧张工作的第一个时段。

5. 到外文楼去上上午班

早晨七点十分左右，季羨林已经结束了简单的早餐。

他走出家门，沿着向西延伸的曲径，在后湖边的小路上走着。他匆匆地走过一座用条石搭起的小桥，周围的景色是那么美，不时还有湖中浮莲和小山上野花的香气送进鼻孔，但他来不及欣赏，身影很快便离开了后湖，走进了燕园西门的一片古典大屋顶的建筑群。不用任何犹豫，他走进了东语系办公场所外文楼。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东语系系主任办公室就设在外文楼入口处左边的一间小屋里。小屋大概不到十平方米，与这样一座浑然天成的威严建筑极不相称。这用不着解释什么，系里房子够紧张的，系主任有个地方办公就可以了。

系办公室里，助手李铮已在那里恭候了。李铮从在沙滩北大时，

就在系办公室工作，那时他刚从学校毕业出来，还不到二十岁。季羨林最初看到他的时候，是他在给北大晒图，他非常勤奋，中午不休息，也在干活。季羨林便把他要过来，安排在系办公室了。

李铮一边向季羨林汇报头天的信息和有关情况，一边把一大堆文件、信函和杂志书刊，交到季羨林手中。李铮在前辈的指导下边学边做。他默默奉献的精神，使季羨林感动不已。

我又要感谢我的助手李铮同志。他来我身边工作时，只有十几岁。我们合作四十年了，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龃龉，即使是极其微末的，也没有过。他工作认真负责，滴水不漏。……我曾在别的地方说过，他对我的帮助，节省了我的精力，等于延长了我的生命。现在我仍然要说这样一句话。[44]

系主任的工作没有什么规律，系里的教务、行政方面的事情都需要他过问，教师、学生也不断有人找他，国内外学者对他提出的询问和请教，也都需要他亲自作答。

他担任系主任，后来担任副校长，但一直坚持授课，研究生、本科生的课，他都亲授，还要负责指导青年教师。

但是，有时候还有意外的工作在等着他，他也不会拒绝的。

有一年的初秋，正值开学之初，他像往常一样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处理着各种系务。累了，就到西门一带走走。一个毛手毛脚的小伙子，一个来报到的新生，看到他。

“老师傅，我把行李放在这里，请你帮我看一下。我去办个手续就来。”小伙子看到眼前的这个人白发，苍老，衣着陈旧而不整，推断必定是老工友，用不着协商，就吩咐开了。

老师傅“行，行，行”地答应着，继续做着他的事。

到开学典礼那一天，小伙子看到这位“老师傅”居然腰板笔直地端坐在主席台上，难道他就是……

是的，他就是系主任季羨林，北京大学副校长，国内外知名的一级教授。小伙子怎么也想不到，这位北京大学副校长竟是这样进入自

己的视野的。除了激动，还能有什么呢？

也不光是毛手毛脚的小伙子，找他的人多得是。本校的、外校的，北京的、外地的、国内的、国外的，……不断地有人闯进他的办公室，向他请教。他不得不中断自己手头的工作，耐心地向请教者解答各种问题。送走来访者，他又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来访者是那么多，不知占去了他多少时间，但他从来没有拒人于千里之外，不管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

在忙忙碌碌中，季羨林送走了上午的四个小时。

沿着来时的小路，季羨林走回 13 公寓，自己在朗润园的家。

妻子已经做好了午饭，正在等他。老祖、妻子和他坐到饭桌旁。饭菜并不复杂，全是些家常菜。他们吃素的时候居多，也吃点牛羊肉。他的老家临清和济南，回民都挺多，不知道是不是受他们影响所致。

有时候，老祖和妻子会给他一个意外。餐桌上会摆上带有清香的荠菜馄饨。那是老祖拿着一把小铲，带一个黑书包，到土山青草丛里去搜挖出来的荠菜。后来，他摸出了规律，一看到老祖的身影在土山的青草丛里晃动，季羨林就知道，餐桌上会有弥漫着清香的荠菜馄饨在等他了，他自然是顾而乐之。

他虽然喜欢吃荠菜馄饨，但自己从来不向老祖和妻子提出什么饮食方面的要求，他的原则非常简单，从来不挑食。不管什么食品，只要合口味，张嘴便吃，什么胆固醇，什么高脂肪，统统不在乎。他最看不上那些吃东西左挑右拣，战战兢兢，吃鸡蛋不吃蛋黄，吃肉不吃内脏的人，越怕，胆固醇反而越高。而自己什么都吃，胆固醇反而从来没高过。

要说吃饭一点不提要求，那也不完全符合事实，他有时候也会要一个辣椒、一根葱来佐餐，调调胃口。这没有什么奇怪，山东人么！

至此，一天中的第二个阶段又在快乐中结束了。

6. 午后的学术和其他活动

午饭后，季羨林没有午睡的习惯，但他也不是吃完午饭就干活。他往往是在书房的破藤椅上一坐，小猫咪会跳上去让他搂着睡觉，而他自己也眯上眼睛，小憩一会儿。

他本来是利用中午的这点时间喘息一下，调整自己已经工作了几个小时的紧张的神经，以获得重新在书海中搏击的力量。但他太累了，有时候难免会睡着，还会做梦，故乡的土屋、济南的大明湖、哥廷根的研究所，都不时入梦。

睁开眼，窗外流射进来的阳光，在地上流成一条光带，慢慢地移动，在寂静中，万念俱息，而他则怡然自得。

然而，这样静谧的时间并不会维持很久。老伴来告诉他，已经有人在隔壁房间等他了。这段时间拜访他的人更多、更杂了，连气功师、武术师也都来找他。他名声在外，谁都知道他没有架子，有求必应。熟悉他的人知道他的时间紧，总是不去打扰他或尽量少打扰他，以免占去他那宝贵的时间。要见他，往往非常自觉地预约，排队等候。但也有不少楞头楞脑的人，根本就不管什么清规戒律，经常擅自闯进来，搅乱他正常的生活秩序。虽然不在计划之中，但他也尽量让来访者满意而归。

季羨林这方面的苦衷，外人是绝对不可能知其一二的。

等客人走后，夕阳已经西下。他送客人走下台阶，站在窗前的梧桐树下，目送着客人的背影消失在蜿蜒的后湖边的幽境里。这时候，他也绕后湖信步走一走，这不是普通人意义上的散步，他只是利用这点时间再作一次调整，休息休息。

路上偶尔会遇到相识的师生、工友，他都主动地停下来，打打招呼，聊聊天。

他尤其喜欢在楼西土山下的幽径上走，他愿意在原先清代侍卫住的平房前驻足，看一个个子不高的老人，蹲在门前临湖的小花园里

摆弄他种的花。

这是季羨林从搬进 13 公寓最早熟悉的一个邻居，他是中国人，姓赵，在北京钢铁学院当教授，老伴是个德国人。季羨林在德国留学时，这位后来的邻居也在德国，从那时起，他就认识了他们。没想到一搬进朗润园，他们夫妇又成了他最早的邻居。夫妇俩有一儿一女，但不常在家。他们逢年过节便互相拜访，感情十分融洽。夫妇俩都喜欢养花，门前有茂密的竹林，竹林外的后湖边和院东墙外，都辟成了小花园，种上各种花草。老人经常蹲在小花园里，不是除草栽花，就是浇水施肥。或者也砍几根竹子，补修补修篱笆墙。季羨林喜欢看 he 嘴里叼着半只雪茄，笑咪咪乐在其中的样子。

小花园里有常见的花，也有颜色不同的名贵的月季，他还喜欢种外国品种的唐菖蒲。最难得的是他种的一种特大的牵牛花。牵牛花并不名贵，但赵教授种的牵牛，比普通品种的要大一倍，宛如小碗口一般大。因此，每年春天开花时，路过这里的人都会注意。季羨林当然也不会放过欣赏它的机会。老人告诉他，此花来头不小，在北京只有梅兰芳家有，齐白石晚年喜画牵牛花，临摹的就是梅府里种的这种特大牵牛花。

每当欣赏老人种的花时，季羨林心中也乐开了花。

我是颇喜欢一点花的。但是我既少空闲，又无水平。买几盆名贵的花，总养不了多久，就呜呼哀哉。因此，为了满足自己的美感享受，我只能像北京人说的那样看“蹭”花，现在有这样神奇的牵牛花，绚丽夺目的月季和唐菖蒲，就摆在眼前，我焉得不“蹭”呢？每天下班或者开会回来，看到老友在侍弄花，我总要停下脚步，聊上几句，看一看花。花美，地方也美，湖光如镜，杨柳依依，说不尽的旖旎风光，人在其中，顿觉尘世烦恼，一扫而光，仿佛遗世而独立了。

[45]

在紧张的学术研究、各种各样的应酬之后，能有这么一点时间，来赏一赏花，显然成为季羨林每天工作之余的重要活动，它对于养性

怡情，确实是大有裨益的。

季羨林能成为一名长寿老人，养性怡情是一个重要原因。

晚饭之后，一般他不再继续进行学术研究。在有电视以前，他看看报刊，吸收一点最新的科学与技术，他也喜欢在这个时候随便翻翻新到手的书，不管是别人赠给他的，还是他新买到的。他“随便翻翻”的时候，只要有与他的研究或兴趣有关的资料，他都随手抄下来。手头有什么纸，就用什么纸抄，纸张大小不一，中外兼备，连信封、请柬和无用的来信背面，都抄满了资料，这样积之既久，由几张到盈寸，由盈寸到盈尺，由盈尺到盈丈，搜集的资料已经是“等身”，甚至超过“等身”。

有了电视以后，他也看看电视新闻、动物世界，利用电视作为获取外界信息的手段。

晚上，季羨林不会熬夜，他九点半至十点就会睡下，等待他的是第二天清晨四点钟的第一轮拼搏。

从杨匡满采访季羨林而写成的这篇《为了下一个早晨》的报告文学，让我们详细了解了季羨林的起居生活和工作情况。

7. 从南国吹来的春风

广州，是解放后知识分子最先感到春天的地方。当然，这个“春天”不是自然界的春天，而是政治上的春天。

这必须了解当时的政治环境。从1957年所谓反右开始，极“左”思潮支配一切，而且有越来越“左”之势。

1956年，周恩来作过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曾经给知识分子以极大的振奋，他们还陶醉在“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的艰巨任务，每一项工作，愈来愈多地依靠科学、文化和技术，也就是愈来愈多地依靠高级知识分子的积极参加”[46]的崇高评价之中时，一场反右运动一下子把他们打入了闷葫芦之中。不知有多少

优秀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仅仅由于给党支部成员提了一点善意的意见，便被打成右派，从此再也无法参加科研和教学活动，完全被剥夺了政治上的自由。从整体上来说，1957年以后的知识分子的际遇，远不如1956年以前了。

在那以后两年内，拔白旗，反右倾，搞得乌烟瘴气，一塌糊涂，同时浮夸风大肆猖獗。关于粮食产量，夸大到惊人的程度，而且还号召大家迎接共产主义的来临。接着来的是无情的惩罚：三年饥谨。我不愿意用“自然灾害”这个常用的词，明明绝大部分是人为的浮夸风造成的灾害，完全推到自然身上，是不公正的。[47]

当时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同全国普通百姓一样，跌至解放后的最低谷。比如1961年初，广州市民的生活状况大致如下：每人每月只配给二两食用油，每人每年发给布票二尺一寸，肉类是基本上没有供应的，以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对广东的知识分子深致歉意，说很多人“三年不曾吃过猪肉”，粮食定量已跌至每人每月二十市斤左右，且30%要搭配其他杂粮，“火水”（即煤油）每人每月只限量一两。[48]

像季羨林的恩师、被称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时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也不得不经受饥饿的考验。物价之昂贵已创建国以后的最高记录。1963年3月18日，中山大学请求广东省委拨出专款，以便照顾陈先生生活所需开支，报告中所列物品的价格令人咋舌：

陈教授每月所需副食品和费用

鸡：四只，估价三十二元，约一星期送一只。

鸡蛋：五斤，十元，每天二只。

水果：十五斤，十二元，每十天送一次。

鱼：十斤，二十元。

蘑菇：十五斤，十五元。

黄油：一斤，二十元。[49]

这是中山大学为陈先生申请的一个月的生活开支。这些物品不仅

与一般市民无缘，而且也与普通知识分子无缘。

这样的局面显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处在艰难生活环境中的知识分子如果看不到什么希望，沉沦下去，整个国家和民族便毫无希望了。

从1961年2月份开始，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开始对广东的知识分子状况进行摸底，到9月底，终于鼓足了勇气，掀起了精心布置的第一场知识分子风暴。

1961年9月28日，陶铸邀请了广东的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参加由广东省委召开的座谈会，赴会的有在粤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以及各民主党派知名人士。陶铸在会上作了一次演讲，让与会的知识分子耳目一新，为之振奋，后来就把此次会称之为“久旱逢甘露”的会。陶铸的话今天读来仍铿锵作响：

十二年的时间不算短，知识分子可以说已同我们结成患难之交。几年来物质条件比较困难，没有猪肉吃，大家还是积极工作，没有躺倒不干。酒肉之交不算好朋友，患难之交才算，“疾风知劲草”，“岁寒以后知松柏之后凋”。现在的问题是团结高级知识分子不够，对他们信任不够。……现在我们要把团结提高到新的水平，一是尊重，二是关心。所谓高级知识分子，就是比一般人多读了一点书。……今后对于思想认识问题，只能采取关心、倾谈、切磋、诚恳帮助的办法，要把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严格区分开来，今后不能采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来解决思想问题。……凡是三年来斗争批判错了的，我代表中南局和广东省委向你们道歉、认错。如果连这一点也做不到，哪能谈得上新的团结。……同时，我还建议：今后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因为这个帽子很伤害人。其次，凡属思想认识问题，一律不准再搞思想批判斗争会。[50]

陶铸算是有足够的勇气，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戴上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桂冠——开了先河。

听了陶铸这发自肺腑、荡气回肠的演讲，在座的知识分子有不少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而在这之前，1961年6月30日，聂荣臻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触及了所谓“红专运动”在知识界出现的“左”的倾向。此报告直接导致了7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报告》，[51]强调了“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十分紧要”的思想。

聂荣臻的报告被看做是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先声。1962年春节一过，聂荣臻副总理又在广州于2月16日召集了全国科学家的“科学技术十年规划会议”。半个月后此会还未结束，3月2日，文化部、中国戏剧家协会等单位又主办了“全国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

在这次座谈会上，周恩来和陈毅分别发表了讲话。

周恩来的报告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的报告与六年前所作的那场报告没有多大区别，没有太多的新意，它重申了“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就一般范畴说，把知识分子放在劳动者之中”。但这样的话由周恩来重说一遍，意味着勇气与力量，也意味着对知识分子的认识总算回到原来的起点上。[52]

相比之下，陈毅的报告对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都有所涉及，尤其陈毅以他本人特有的知识分子的豪放、坦诚，敢于直言，又妙趣横生、掷地有声，使听众不能不动容。陈毅的报告处处都有精彩的段落，下面两段，是最让人感叹的：

如果对立的形势现在不改变，那我们共产党就很蠢了；人家住房、吃饭、穿衣什么都给包下来，包下来又整人家，得罪人家，不很蠢吗？反动统治阶级，还高明一点。科学家、知识分子的吃饭问题他不管，工作他不管，什么都不管。他也不一定强迫人家搞思想改造，他跟科学家、知识分子和平共处。而我们有些同志的搞法打击面太

大，得罪的人太多，伤了人家的心。使得有些人说：“我们跟共产党走了十二年，共产党总是不相信我们，还是把我们当成外人看待。”这样下去怎么行呢？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经过反复的考虑，昨天我对科学家们讲话时，讲得很尖锐。周总理前天动身回北京的时候，我把我讲话的大体意思跟他讲了一下，他赞成我这个讲话。他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跟你们行“脱帽礼”（笑声）。十二年的改造，十二年的考验，尤其是这几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带来的考验——孔夫子三月不知肉味，有些人是两三年不知肉味，还是不抱怨，还是愿意跟着我们走，还是对共产党不丧失信心，这至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十年八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十年八年十二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其实，1949年解放的时候，有些人不到台湾，不跑香港，就是不错的。

另一段是：

科学家、知识分子是很难得的。我们现在需要扶助这些科学家，使他们消了这口气，使他们出一口气，松一口气。肯定地给他们一个正确的估计。这里面也牵涉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如果说十二年的改造，一点成绩没有，他们全部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也不能交待。这等于说我们共产党十二年来的领导是不行的，等于自己宣布自己破产——共产党你有什么本事呀！[53]

这次会上陈毅的报告，不仅文艺界参加话剧、歌剧座谈会的人听了，参加科学家规划会议的人也听了。普遍的反映是，陈毅的演讲极为坦白透彻，动人甚深，所以反映也热烈。[54]

广州会议上周恩来和陈毅两位国家领导人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讲话，像是一阵和煦的春风，吹到了北国，吹到了北大，吹到了知识分子的心坎里。

知识分子仿佛久旱逢甘露，仿佛在狂风暴雨之后见到了天晴，心里都感到异常喜悦，感到我们国家前途光明，个个如处春风化雨之

中，季羨林自然也如此。

我算是知识分子之一，这种春风化雨之感也深深地抓住了我，在我的灵魂深处萌动、扩散，让我感到空前的温暖。这一年春天我招待外宾的任务特别繁重，每隔几天，总要到北大临湖轩去一趟。当时大厅的墙上挂着一张水墨印的郑板桥的竹子，上面题着一首诗：

日日红桥斗酒卮，
家家桃李艳芳姿。
闭门只是栽兰竹，
留得春光过四时。

我非常喜欢这最后两句诗，我有时到早了，外宾还没有来，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细味诗意，悠然神往，觉得真是春色满寰宇，和风吹万里。而且这个春光还不是转瞬即逝的，而是常在的。[55]

季羨林确实陶醉在从南国吹来的春风之中。

不仅是季羨林，还有全北大的师生，甚至全国的师生，全国的知识分子，都陶醉在从南国吹来的春风之中。

8. 琅琅书声

北大是全国的缩影。

燕园是北大的缩影。

燕园里到处是春天。

这个春天不是自然四季意义上的春天。因为这已是 1962 年 5 月中旬，自然界的春天已经逝去：燕园花事渐衰，桃花、杏花早已开谢；一度繁花满枝的榆叶梅，也已经长出了绿油油的叶子。几天前，开得像一团锦绣似的西府海棠，也已落英缤纷，残红遍地了。就连丁香，虽然还在开着，灿烂满园，香飘十里，但已显出疲惫的样子。确实，北京的自然界的春天，本来就短，正像宋代欧阳修《蝶恋花》一词所说：“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北京自然界

的春天就要归去了。

但是人们心头的春天却方在繁荣滋长。这个春天，同在大自然里的春天一样，也是万紫千红、风光旖旎的。但它却比大自然里的春天更美、更可爱、更真实、更持久。郑板桥有两句诗：“闭门只是栽兰竹，留得春光过四时。”我们不栽兰，不种竹；我们就把春天栽种在心中，它不但能过今年的四时，而且能过明年、后年、不知多少年的四时，它要常驻我们心中，成为永恒的春天了。[56]

《春色满园》的散文告诉我们，这时候的季羨林心里高兴，被这心中的春天所召唤，信步走出家门，在夜晚中走过校园，校园里一片寂静，偶尔有后湖里的蛙鸣会划破夜里的沉寂，季羨林觉得黑暗仿佛凝结了起来，能摸得着，捉得住。

季羨林走着走着，蓦地看到远处有了灯光，是从一些宿舍的窗子里流出来的。他心里一楞，他的眼睛，仿佛有了佛经上叫做天眼通的那种神力，透过墙壁，就看了进去。

季羨林首先看到一位年老的教师，正在伏案苦读，仿佛正在写一篇文章，想把几十年的研究心得写下来，以丰富祖国的文化知识宝库。不，他也可能是在备课，想把第二天要讲的东西整理得更深刻、更生动、更系统，好让青年学生获得更多的营养和滋补。也或许他是在给青年教师看论文，写出审阅意见，共同切磋琢磨。不管这位教师在干什么，反正只见他时而低头沉思，时而抬头微笑。对他说来，这时候除了他自己和眼前的工作以外，宇宙万物似乎都不存在了。他心中只有他的工作，他完完全全陶醉在自己的工作中了。

季羨林透过夜窗看到的是知识分子心中的春天已经来临的讯息。

然而这只是栽种在心中的春天的一部分。

早晨，季羨林又走过校园。这时候，只见晨光初露，晓风未起。浓绿的松柏、淡绿的垂柳、大叶的杨树、小叶的槐树，成行并列，相映成趣。未名湖里，绿水满盈，不见一条波纹，宛如一面明镜。路上的行人还不算多，但从绿草湖畔、丁香丛中、杨柳树下、土山高头，

却传来一阵阵朗诵外语的声音。他倾耳细听：俄语、英语、梵语、阿拉伯语等等，北大三个外文系：西方语言文学系、东方语言文学系、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中的许多外语声，都依稀可辨。但是，他是只闻其声，而不见其人。

从这琅琅书声里，季羨林听出那种如饥似渴、迫切吸收知识，学习技巧的炽热心情。他觉得，这一群看不见踪影的男女大孩子，仿佛想把知识像清晨的空气和芬芳的花香那样，一口气把它吸下去。

吃过早饭，季羨林走进北大图书馆。在那里，他又看到一群既熟悉又陌生的男女青年，挤坐在里边，低头在做着数学、物理或化学的习题，全神贯注，鸦雀无声，青年们完全浸润在知识的海洋里。

这就是季羨林在南国吹来的春风里，看到的燕园，它正是北大的缩影、全国的缩影。他很自然地把夜里的情景同白天的情景联系了起来。

年老的一代是那样，年轻的一代又是这样。还能有比这更动人的情景吗？我心里充满了说不出的喜悦。我仿佛看到春天又回到园中：繁花满枝，一片锦绣。不但已经开过花的桃树和杏树又开出了粉红色的花朵，连根本不开花的榆树和杨柳也满树红花。未名湖中长出了车轮般的莲花。正在开花的藤萝颜色显得格外鲜艳。丁香也是精神抖擞，一点也不显得疲惫。总之，是万紫千红，春色满园。[57]

这不是他的幻觉，不是他一个人的幻象，而是他心中那个春天的反映。

我相信，住在这个园子里的绝大多数的教师和同学心中都有这样一个春天，眼前也都看到这样一个春天。这个春天是不怕时间的。即使到了金风送爽、霜林染醉的时候，到了大雪漫天、一片琼瑶的时候，它也会永留心中，永留园内，它是一个永恒的春天。[58]

但是，这一次季羨林没有言中，他想把春天栽种在心中，把每年的四时，变成一个永恒的春天，这样的想法是错了。春天只有三年多的时间，跟着来的，是一场从未有过的狂风暴雨，季羨林也被卷进这

场暴风雨之中，而且几乎丧生。

第九章 燕园春秋（二）

一、“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

1. 风暴前奏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指不同行业之间是很难相互了解的。没想到，在同一所大学里，隔系也如同隔山。

就在季羨林在南口乡下以领导者的身份在进行社教时，北京大学内的“阶级斗争”已经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了。

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是从哲学系开始的。北大是高等学校社教的试点，而哲学系则可以说是试点的试点。

哲学系的社教，在党总支内形成对立的两派，以王庆淑为首一派，以聂元梓为首一派。聂元梓一派，在社教中受到批评和“围攻”，对此，她如鲠在喉，时刻在寻找机会报复。报复的对象不是王庆淑，而是支持王庆淑的陆平。陆平是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聂元梓在等待机会，在陆平身上开刀。

时机终于来了。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由陈伯达、康生等人起草，又经毛泽东本人多次修改、定稿的“文化大革命”纲领《五·一六通知》，在与会者不能表示任何异议的情况下得到通过，《通知》最后是毛泽东本人向全国人民发出的有强烈战斗性的号召，当时发表时是用黑体字排出的，以引起全国对“最高指示”的重视。毛泽东号召说：“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

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毛泽东还意味深长地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任，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个《通知》是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除了《通知》之外，会议还决定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革命集团”进行批判，停止他们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及其其他的职务，进行专案审查，调任陶铸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调叶剑英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调李雪峰兼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这些决定不是在中央全会做出的，需要中央全会追认。

紧接着，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在5月18日发表的讲话，以后被称为“五·一八”讲话。林彪的讲话，通篇大讲政变，认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就是搞反革命政变的人物。此外，林彪在讲话中大肆吹捧毛泽东，其中有一段话，在全国产生过长时间的影响，他说：

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们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林彪在讲话中，几乎声嘶力竭地嚷着：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什么时候，毛泽东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的讲话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个人迷信”活动。

《五·一六通知》和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在正式发表以前，

已不脛而走。作为“阶级斗争晴雨表”的北京大学，政治神经极为敏感，有些人已经在准备大干一场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对聂元梓等人的情况有所了解的康生，派自己的老婆曹轶欧，悄悄地来到北京大学。在曹轶欧的直接授意下，由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在校内大饭厅东墙南端，贴出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文笔极为平庸，思想上并没有什么惊人之处，表面是对马克思主义有深透的理解，但它到处充满了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认为中共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党委副书记彭珮云，连同北京大学党委、中共北京市委，都在搞修正主义，表示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认为北京大学党委提出的对文化革命的“积极领导”，是“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修正主义轨道”，实行的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

此大字报于5月25日下午贴出之后，北京大学校内一片混乱，最初是在大饭厅周围，然后扩大到三角地带，再后是扩大到学生宿舍区，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既有大量支持聂元梓的，也有少量支持陆平的。晚上，党委书记陆平发表讲话，强调聂元梓在社教运动中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希望全校能团结在党委周围。还有人透露内部消息，陆平校长说聂元梓是个妖精。消息传到学生宿舍区，写过支持聂元梓大字报的年幼无知的学生，立即又写出支持校党委的大字报，并检查自己跟错了聂元梓的立场错误。

5月28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文件，确定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立，任命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为副组长，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为组员。康生几次到北京大学看大字报，进行煽风点火，这就使支

持聂元梓的学生又有所增加。

6月1日晚间8点，毛泽东亲自批准以新华社消息的名义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这张大字报，并指示康生第二天见报，说这张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北京人民公社宣言”，“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大字报广播之后，燕园内立即沸腾起来，师生们几乎一边倒向聂元梓，对陆平为首的北大党委展开了全面进攻。几天来反反复复，折折腾腾，年幼的学子们，今天听人唆使，去支持聂元梓，明天又听人唆使，反对聂元梓，到这时总算统一到毛泽东的伟大旗帜之下，全校拧成一股绳，合力对付陆平了。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在农村参加社教的北大师生奉召回校。

2. 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大灾难

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发表一篇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指责北大党组织，“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北大党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从此，“踢开党委闹革命”，首先在北大，接着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起来了，从此，中共党史上出现了一个新的专有名词“假共产党”，并由此而兴起了揪“假党员”之风。

6月4日，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在《人民日报》发表。新市委宣布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撤销陆平、彭珮云的职务，并派出工作组领导北大“文化大革命”。这在全国又一次引起剧烈震动，产生了广泛而长时间的影响。只是，谁也没有料到，派工作组一事后来又遭到毛泽东的强烈谴责。

由于“运动”逐步深入，北京大学实际上从5月底已开始“停课闹革命”。

大多数参加农村社教的师生于6月初回校。他们回到北大后，看到的燕园已经面目全非了。据哲学系教授张岱年先生说，他一回校，

看到在北大东南门旁贴了一个大标语：“资产阶级教授靠边站！” [1] 哲学系的教授自然都是资产阶级的，但他们也不是一概而论，被分成两组，一组是问题严重的，冯友兰、张岱年、洪谦、熊伟、沈履、周先庚、周辅成、黄楠森、朱伯崑、吴天敏等人，没有问题的有郑昕、王宪钧、任华、宗白华、黄子通等，实际上宗白华、黄子通没过多久也被揪出来，成为有严重问题的人。很快在哲学系形成了以冯定、王庆淑为首的所谓“黑帮分子”。他们每天到一院去扫地、拔草，并随时接受批判。

而在东语系，名教授本来没有哲学系那么多，在全国名气大的是一级教授季羨林，二级教授马坚、金克木，其他知名者是刘麟瑞、徐祖正、刘振瀛、陈信德。这些学者中首先被揪出来的是陈信德和马坚先生。

陈信德被怀疑为日本特务，他因此而被抄家，抄家时被抄出一面“太阳旗”，更加证明了陈信德的“特务身份”，陈信德这个日语权威自此在肉体上、精神上遭受了长期的折磨。

马坚先生被揪斗的起因是由于邬裕池老师。邬裕池老师留校任教后于 1965 年去开罗大学进修阿拉伯语言文学。1966 年初，邬老师用阿拉伯文写了一封私人信件，给马坚先生，谈他到达开罗以后在大学进修的感受，当然也感谢恩师马坚先生的辛勤栽培和教育，表示要好好利用宝贵的进修机会，刻苦学习，取得优异的成绩，绝不辜负恩师的殷切期望。

在一次阿拉伯语教研室的业务会上，马坚先生说到他不久前收到邬裕池从开罗寄来的一封信，是用阿拉伯文写成的，文字很好，出国后的阿拉伯语水平提高很快，希望教研室的老师们向他学习。作为教研室主任的马坚先生，在教室内鼓励青年教师积极上进，钻研业务，本是无可厚非的，表现出老一辈学者对青年一代的厚望。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文化大革命”一起，这封信便被当成马坚先生引导青年只专不红、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真实“罪证”。

东语系有人把邬裕池的信抄成大字报，张贴出来之后，师生们愤怒起来。“文化革命”的目标非常明确，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陆平作为代表已被揪出来，打倒在地了。另一是反动学术权威，东语系的学术权威主要是一、二级教授，但他们谁是反动学术权威，谁是一般学术权威，师生们并不了解，这张大字报把邬裕池老师的信一公布，师生们的眼睛“亮”了，看清了东语系的反动学术权威原来就是马坚先生！

马坚先生作为“革命对象”的身份一旦被确立，便被当做埋藏很深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横遭批判。北京大学校内各系普遍出现了乱批乱斗干部和老教授的现象，北京新市委派出的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力求对此有所控制，但无济于事，终于酿成了6月18日四处抓人，乱打乱斗的“六·一八”事件。在哲学系学生所住的38号楼的东门楼梯台阶上，设立了“斗鬼台”，包括冯友兰先生等在内的一大批学术权威，均在被揪斗之列。一天之内，数十名干部和教师，被“革命小将”戴上高帽子，脸上涂上墨汁，被罚跪、揪头发、撕衣服，被拳打脚踢，强行游街“示众”。他们的人格遭到野蛮的污辱。神经衰弱的人，已不堪忍受这种污辱。只有一些修养到“真人”境界的哲学家，如冯友兰先生，白天挨完了揪斗，晚上回到家里，则念开了《庄子·逍遥游》：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

据说，冯友兰先生从《逍遥游》里悟出：你揪斗我的人，无非是鲲鹏展翅九万里，我挨斗，则是抢榆枋而止的蜩与学鸠，你们斗我是一种自由，我挨斗也是一种自由。对这种传说，无须证明是否真实，但事实是，面对这样残酷的现实，不达到一种“真人”境界，确实是

很难熬过去的。

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对这种非人性的批斗赶到现场加以制止，但无效。当晚，张承先向全校发表广播讲话，说避开工作组乱批乱斗的做法，是有害于革命的行动，他把这次事件定性为“六·一八反革命事件”，说这是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要求同学们擦亮眼睛，不要上坏人的当。

刘少奇代表党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2]全国仿照执行之后，乱批乱斗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运动也就不像初期那样轰轰烈烈了。

1966年7月下旬，毛泽东听信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的汇报，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一不会批，二不会改，要统统驱逐之。这一次，刘少奇等人成为明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后台，而所谓群众运动，不再有任何条条框框限制。根据林彪的理论，群众运动不管采取什么措施，天然都是合理的。这样，工作组时期尚有的法制因素，便荡然无存了。法制社会一去不复返，全国陷入一片无法无天的混乱之中。

在北京大学，工作组灰溜溜地被赶走了，聂元梓成为校革委会主任，掌握了北大的领导权。这时，北京大学极力推行极左路线，实行法西斯专政，搞“上揪下扫”，领导干部是“黑帮分子”，要“上揪”；老教师是“反动学术权威”，要“下扫”。揪斗、游街、劳改、关押、殴打、抄家、“坐喷气式飞机”、挂牌子、戴高帽子，以及私设公堂、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都无所不用其极，干部、教师受到疯狂迫害。

在哲学系，有一天教师们正在开会学习，忽然有一支由学生和青年教师组成的队伍，气势汹汹地大踏步走进来，大喝一声：“你们全给我站起来！竖起你们的狗耳朵，听我讲话！我们是红卫兵，任务是革你们的命。”[3]

真是无独有偶，东语系马坚先生首当其冲，受到猛烈的冲击：

他两次被抄家。第一次，马坚没有思想准备，正在书房里埋头翻译《阿拉伯通史》一书，他看到进来一些学生，还以为他们是来问功课的，就很客气地请他们坐下。当他们大喝一声，勒令他交出“黑材料”，交代“黑关系”时，才知道事情严重了，但他临危不惧，反而很冷静。他讲他没有“黑材料”，只有些学术著作和参考书，都在书架上；也没有“黑关系”，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系都是公开的，摆在桌面上，挂在墙壁上，谁都看得见的。作为“战利品”，他们抄走了一批翻译手稿、资料和银行存折。他们看到存折上存款很少，很快就还回来，部分手稿和资料一直到运动后期才归还。但是，《悬诗》和《阿拉伯文学史纲》的部分译稿，以及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文件汇编和纪念册（包括许多珍贵的资料和图片），已无法追回。抄家之后，就是挂着“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游斗，接着是大大小小的批斗会，有系一级、室一级的批斗会，甚至一个班级、一个宿舍也召开批斗会。[4]

毛泽东本人对这一阶段的文化革命群众性的过激行动，是满意的。他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说“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 [5]

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领导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领袖，没想到自己在战略上大错特错了。顷刻瓦解的，并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堡垒，而是道德斯文。北京大学作为堂堂的全国最高学府，本应是最文明、最讲道德、最讲礼义廉耻的文化圣地，但文革一来，斯文全部丧失，野蛮代替了文明，粗暴代替了善良，兽性代替了人性，流氓作风代替了学生的书卷气，残酷无情代替了人道主义。这一切，使那些当时年幼无知只知盲从的

学子们，每每想起，就会汗毛直竖，一想起自己做过的一些亏心事，脸上会一阵阵发红。

但愿这样的历史不再重演！

3. 情形不妙

季羨林从6月4日回校之后，在有了一段观察之后，知道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资产阶级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没想到知识分子的春天刚来到就逝去，春天再也不可能永恒了。这次运动又是对准知识分子的，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自己自然也在被批之列。他当时虽然不敢以“学术权威”自命，但是，说自己是资产阶级，他确实心悦诚服，毫无怨言。因为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因此，尽管运动来势迅猛，但他并没有费多大力量就通过了。

到后来，“文化大革命”逐渐“深入”，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悲剧不断在“文化革命”中升级，不少的一部分人，理智完全丧失，荒谬绝伦的思想方式和逻辑推理主宰了一切。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深文周纳、断章取义、造谣污蔑、罗织诬罔的刀笔吏习气，成了正统。正像古人所说，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就在这样的時候，奇怪的逻辑出现了，不知道是哪一个“天才”，实际上应该说是绝大的蠢才，发明了这种逻辑：只要是“春”字，代表的肯定就是资本主义。而季羨林写过《春满燕园》的著名散文，就被非常合乎“逻辑”地上纲上线为资本主义的毒草。

春天是万物萌生的时期，喜欢而且歌颂春天是人类正常的感情，现在却视“春天”为蛇蝎，可见这一场“革命”违背人情，扰乱天理到了什么程度！谁要是歌颂春天，谁就是歌颂资本主义。谁要是希望春光常在，谁就是想搞资本主义复辟。我不但歌颂了春天，而且还要“春满燕园”，还要春光永在，这简直是大逆不道，胆大包天，胡作非为，十恶不赦。[6]

这样，季羨林从南口北大社教基地回到北大之后，平静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

有一天，季羨林去看大字报。突然间，他看到一张批判他的大字报，这是矛头针对他的第一张大字报，但是内容却是意想不到的，就是批判他歌颂春天的散文《春满燕园》的。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季羨林至今仍感到不寒而栗！

我当时的政治觉悟是非常低的，我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即使是这样，当我看到这一份大字报的时候，我心里真是觉得十分别扭，仿佛吃了一肚子苍蝇似的，直想作呕。为什么最美好的季节春天竟成了资本主义的象征呢？我那一篇短文的“罪状”还不仅仅是这一点。我里面提到学生的晨读。在“英雄们”的词汇中，这叫做“业务挂帅”、“智育第一”，这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这也完全不能理解，学校之所以要开办，就是让人们来念书，来研究，在学校里为什么一提倡念书就成了修正主义呢？我站在那里看大字报，百思不得其解，不由地“哼”了一声。然而就是这发生在十分之一秒钟内的一“哼”，也没有逃过“革命小将”的注意，他们给我记下了一笔账，把这一“哼”转变为继续批判我的弹药。[7]

年幼无知的“革命小将”们，受到“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最高指示的蛊惑，他们把几千年来形成的尊师重道优良传统一扫而光，开始向自己的恩师们开刀了。恩师们一个个或者成为反动学术权威，或者成为“黑帮分子”。季羨林是双重身份，既是“反动学术权威”，又是党员系主任，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范畴，这就使他毫无疑义地成为“黑帮分子”，在数目不小的北大“黑帮分子”中，虽然属于年轻的，但份量却是重的。

到这时，季羨林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处境的危险性，真正感到情形不妙。

4. 自投罗网

情形虽然不妙，但如果季羨林能沉住气，稳住步子，还是有可能“蒙混过关”的。但季羨林偏偏有着山东人的耿直性格，有不平他就想鸣，而这是很危险的，在无法无天的日子里，这意味着什么，会遭到什么样的迫害，是季羨林始料不及的，也是怎样估计都不会想到的。

就在聂元梓等人在“四人帮”的唆使之下，篡夺了北大领导权之后不久，北大的“群众组织”分裂成两大派，与整个北京市的“群众组织”相对应，一个是“天派”，一个是“地派”。天派是“新北大公社”，地派是“井冈山”。从整个运动过程来看，两个组织都搞打、砸、抢，都乱抓无辜，都压迫真正的群众。所以这两个组织是真正的难兄难弟，枣木球一对，无法评论其是非优劣，但又互相指责对方为“保守派”，两派之间互相攻击，斗争逐步升级。

从北大的具体情况看，新北大公社的头头是聂元梓，人们给她起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外号“老佛爷”，隐喻她手段之毒辣可与慈禧太后相媲美。她本是1938年入党的老干部，1964年来北大工作，社教运动中就与陆平作对，但失败很惨，文革中她有了权力，又打出江青的旗号，横行霸道，炙手可热。她掌握了全校的行政财政大权，迫害异己，一手遮天。在社教中，季羨林就与此人打过交道，深知此人不学无术，语无伦次，却又心狠手辣。

在工作组没被赶跑之前，季羨林是被划在“临界线”上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工作组被赶跑，他本也可以逍遥自在下去的。但他是一个颇爱打抱不平的人，虽然做不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程度，有时候也抑制不住自己，惹点小乱子。对这位“老佛爷”的所作所为，他觉得不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虽然其实他并不真知道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只觉得她对群众的态度不对头，于是，便有点“蠢蠢欲动”了。[8]

也是事有凑巧，有了一个偶然的机遇。

有一件事是出乎季羨林意料之中，又似乎是在意料之内，那就是

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先生挺身而出，与“老佛爷”作对了。季羨林在这之前对周培源先生并无太多了解，只不过，从他的言谈举止中，从别人对他的评论中，季羨林渐渐发现，周先生是一个很有个性，很有骨气，很有正义感，能明辨大是大非的人，一个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人。

为了与“老佛爷”作对，周培源先生干脆参加了对立面“井冈山”，并成为其领导成员。

一次，北大的两大派在大饭厅（即今天的大讲堂）中举行公开辩论，两派头头都坐在主席台上。周培源先生也俨然坐在那里，而且还发了言。周先生岁数最大，地位最高，以一个白发盈巅的老人，同一群后生坐在一起，颇有点滑稽像，但季羨林心里却充满了敬意。

也就在这样的气氛下，季羨林也上了“牛劲”，虽然他属“猪”，不属“牛”，却有了“牛脾气”。他经过长期反复的考虑与观察，抱住“粉身碎骨在所不辞”的决心，“自己跳了出来”，也参加了那个反“老佛爷”的组织。东语系的两派分别是“公社红九团”和“井冈山兵团红九纵”，这是因为东语系在北大的排列序号是“九”，便有了“九团”、“九纵”之名。这一来不打紧，一下子成了“老佛爷”的眼中钉、肉中刺。这真是自投罗网。

这之后，季羨林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了，多次被揪斗，受到了各种各样的人身污辱和攻击。

据乐黛云教授回忆，在1968年仲夏一个十分炎热的下午，她亲眼看到过季羨林被游斗的场面。

那时，“黑帮分子”和牛鬼蛇神们都蹲在烈日下拔草，随时准备接受群众的质询和批斗。我作为一个摘帽右派，被认为是没有多大“政治油水”的死老虎，因而被编入“一类劳改队”，在北大附小抬土。那天收工后，我从东门进来，走到湖畔水塔边，正好迎面撞上一群红卫兵敲锣打鼓，喊着口号，押着两个“黑帮分子”游街，走在后面的是周一良教授，走在前面的就是先生！他们俩人都是胸前挂着

“牌子”，背上扣着一口食堂煮饭用的中号生铁锅，用细绳子套在脖子上，勒出深深的血印。红卫兵们推推搡搡，高呼着“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的最高指示，这是最高统帅对北京大学所作的结论。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和学者，其实与政治并无牵连，仅仅因为他们有影响，就被当做“王八”或“神灵”揪了出来，那背上的黑锅就是“王八”的象征。先生吃力地向前走着，一缕血红的残阳斜抹在他汗涔涔的脸上。我陡然与先生的目光相遇，那是怎样一双眼睛啊！依然清澈，依然明亮，没有仇恨，没有恐惧，只有无边无际的仁爱 and 悲悯，凝视着那些虐待他的、无知的年轻人！此情此景和先生的眼神深深铭刻在我心里，时时警醒我以更宽厚更仁爱的襟怀处事待人。[9]

与此同时，东语系的另一个学术权威马坚先生，则被两派竞相批斗，被轮番批斗。在各种各样的批斗会上，马坚先生有时是主要被斗者，有时是“陪斗者”。马坚先生对这些批斗和形形色色的恶作剧，既很认真，又很不认真。对无理指控和不实之词，他必据理力争，严加驳斥，决不委屈迁就，苟且偷安地胡乱招认了事。有人指责他反党、反毛主席，他驳斥说：我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我写的文章就是证明，毛主席还说过我们合作得很好，你们为什么要给这种合作抹黑呢？马坚所指合作很好，是胡乔木让季羨林转达给马坚的话：请你转告马坚先生，毛泽东先生认为他那两篇文章《回教徒为什么不吃猪肉？》和《穆罕默德的宝剑》写得很好，增强了汉回两族人民的团结，请你向他表示谢意！[10]这是解放后不久发生的事，马坚先生说出这些，使指责他的人无言可答。[11]对诸如此类的政治问题，马坚先生极为认真，而对他业务第一的指责，他则不那么认真。

事实是，不管认真，还是不认真，只要被确定为“黑帮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那就无论如何也难逃批斗的。

对于季羨林和马坚这样的重点人物，仅仅开批斗会，游斗，还是远远不够的。“老佛爷”们知道，除了批斗，他们还有在家的“自由时间”，这个“自由时间”也不该由他们掌握，于是，他们也就被关

进了临时集中营——牛棚。

从此，季羨林开始了自己的“牛棚岁月”。

二、“牛棚”岁月

1. 在完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

季羨林跳出来反对“老佛爷”聂元梓的动机，是既简单，又复杂的。

在《春满燕园》被批判之后，气氛稍微平静下来。他越过第一阵强烈的风暴，问题算是定了。他因此而逍遥了一阵子，日子过得满惬意。如果他能继续逍遥下去，太大的风险不会再有了。这时的季羨林，觉得当时自己无异于过了昭关的伍子胥。春秋时吴国大夫伍子胥，与太子建之子胜奔吴，到达昭关之时，关吏想抓他。伍子胥遂与胜独身步走，几不得脱，追者在后。到了江边，有一渔父乘船，知伍子胥之危急，乃渡伍子胥过江。过了江，伍子胥解下自己的佩剑作为对救命之恩的答谢，渔父说：楚国有法令，得伍子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珪，岂徒百金剑邪！渔父不肯受剑。过了昭关的伍子胥，显然可以平安无事了。

而对于季羨林来说，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季羨林本是个胆小怕事的人，这是常态。而有时候，他的胆子又特别大，在他的一生中，这样的情况也不少见，住东厂的特务机关杀人之处就是属于这种情况，这是变态。他个人认为，如果说自己有什么价值的话，价值往往就表现在变态上。

“文革”中分派之后，季羨林恰恰是变态起了作用。

他看到“老佛爷”仗着后台江青能通天，便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校园里残暴野蛮的事情越来越多，抄家、批斗、打人、骂人、脖子上挂大木牌子，头上戴高帽子，任意污辱人，放胆造谣言，以至发

展到用长矛杀人，不用说这不是什么人性，甚至连兽性也没有了。季羨林便认为这不符合群众路线，不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同时，季羨林也自信自己头上没有辫子，屁股上没有尾巴：既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或任何反动组织，又没有干反人民的事情，因此，他就怀着冒险、侥幸还有点自信的心情，发了牛脾气，自己跳了出来，挺身出来反对那位“老佛爷”，仗义直言了。他自己跳出来了。

季羨林是全国著名的学者，而且在整个北京大学都有影响，他起来在太岁头上动土，自然会影响一大片，所以“老佛爷”就对他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我被抄家，被批斗，被打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我并不是那种豁达大度什么都不在乎的人。我一时被斗得晕头转向，下定决心，自己结束自己的性命。[12]

一个失去自由的人，那是非常痛苦的。裴多菲有诗说：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可见自由之价值，要高于生命和爱情。一旦自由失去，人便会痛不欲生。老舍先生的去世，便是明证。

那是1966年8月，红卫兵们受个人崇拜思潮的影响和支配，他们中的很多人，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和野心家以外，都真心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他们真以为党和国家面临着巨大的危险，面临着修正主义复辟迫在眉睫的危险，便响应号召，挺身而出，在“破四旧”的旗帜之下，焚书、抄家、改街名，横冲直撞，不可一世。如当年冰心所起名的“临湖轩”被改为“反帝院”，“南阁”被改为“五二五楼”，因为第一张大字报是在这里写成的，当时是哲学系办公室。北京市的其他地名也被改得一塌糊涂，人名也都被改成与革命相符合的，什么丹、红、革，都被用成名字，还有改为“胡乱闯”的。

破四旧在8月23日达到顶峰，那一天，在北京文庙召开了一次破四旧大会。据新风霞记述：

北京的八月演出了一出“打全堂”。

这一天在国子监——孔庙的大院中，戏衣、头面、凤冠、玉带、朝靴等演戏的服装、道具堆成了一座大山，点起大火，烧红了天。所谓走资派、学术权威等围着火跪了一圈。红卫兵也排成一排。抡起皮带打这些“罪人”，鲜血淋淋，惨不忍睹。这些手无寸铁，只能跪着挨打的人，有的已被打昏过去，倒在地上。这其中就有老舍先生。我从1949年就认识了先生，他是我们的国宝，文学艺术的天才，为人又这么善良、忠厚、行侠仗义……他有什么罪哪？先生就在这次“打全堂”的第二天含恨死去。怎么死的，都没人知道。[13]

其实，人们都知道，老舍先生是跳进太平湖中溺死的。他不堪忍受自己的人格所受的污辱，他在临死以前，也许想到了两千多年前，屈原自沉于汨罗江，屈原想到的是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那种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现实，因此他决心世人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以己身之一死来与浊世抗争。老舍先生在去世以前，也许有与屈原同样的心态。

对这样一位自己十分尊敬的人民艺术家，季羨林没有想到他的死竟是这样悲惨。他感慨道：

中国有一句俗话：“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一句话道出了一个真理。一个人除非万不得已绝不会自己抛掉自己的生命。印度梵文中“死”这个动词，变化形式同被动态一样。我一直觉得非常有趣，非常有意思。印度古代语法学家深通人情，才创造出这样一个形式。死几乎都是被动的。有几个人主动地去死呢？老舍先生走上自沉这一条道路，必有其不得已之处。有人说，人在临死前总会想到许许多多的东西的，他会想到自己的一生的。可惜我还没有这个经验，只能在这里胡思乱想。当老舍先生徘徊在湖水岸边决心自沉时，眼望湖水茫茫，心里悲愤填膺，唤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答，悠悠天地，仿佛只剩下自

己孤身一人，他会想到自己的一生吧！这一生是忠诚于祖国、忠诚于人民的一生，然而到头来却落到这等地步。为什么呢？究竟是什么呢？如果自己留在美国不回来，著书立说，优游自在，洋房、汽车、声名禄利，无一缺少，舒舒服服地过一辈子，说不定能寿登耄耋，富埒王侯。他不是为了热爱自己的祖国母亲，才毅然历尽艰辛回来的吗？是今天祖国母亲无法庇护自己那远方归来的游子了呢？还是不愿意庇护了呢？我猜想，老舍先生绝不会埋怨自己的祖国母亲，祖国母亲永远是可爱的，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爱的。他也绝不会后悔回来的。但是，他确实有一些问题难以理解，他只有横下一条心，一死了之。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又有谁能够理解呢？我想，老舍先生还会想到自己院子里种的柿子树和菊花。他当然也会想到自己的亲人，想到自己的朋友。所有这一些都是十分美好可爱的。对于这一些难道他就一点也不留恋吗？绝不会的，绝不会的。但是，有一种东西梗在他的心中，像大毒蛇缠住了他，他只能纵身一跳，投入波心，让弥漫的湖水给自己带来解脱了。[14]

其实，与其说老舍先生的死是为自己带来解脱，倒不如说是为了留得自己的清白在人间。所以老舍先生之死，真正实现了泰戈尔所说的“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15]

可惜，老舍先生的死，没能引起全社会理性的回归。

季羨林当时死的决心既下，心情反而显得异常平静，简直平静得有点可怕。他把历年积攒下来的安眠药片和药水，都装在口袋里，最后看了与他共患难的婶母和老伴一眼，算是与她们告别，正要准备出门跳过后墙逃走，到圆明园的废墟芦苇中去静静地死去，大门上突然间响起了雷鸣般的撞门声，原来是“新北大公社”红卫兵来押解他，要去大饭厅挨批斗。

没能逃出去，他被带到大饭厅批斗。这可真是千钧一发的时刻！这一场批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十分野蛮，他被打得遍体鳞伤，躺在地面上站不起来。然而他一下子得到了“顿悟”：原来一个人忍受打击和

折磨的能力，是没有极限的。他下定决心，可以而且能够忍受下去，不死了，要活下去！

季羨林活下来了，只是在“牛棚”里，他度过了漫长的八个月时间，经受了肉体上、精神上无休无止的残酷折磨。没有别的办法，每一次折磨他都得咬着牙挺住。

2. “牛棚”里的八个月

由于反对“老佛爷”，季羨林的罪名更多了。所有的“文化大革命”使用的帽子，几乎都给他戴上了。“老佛爷”甚至大发雌威，两次派人到季羨林的老家官庄去调查，一心一意要把他“打成地主”。老家的乡亲们真实地告诉那几个被派去调查的“革命小将”，说如果开诉苦大会，季羨林是官庄的第一名诉苦者，他连贫农都不够。[16]但这也免不了给他戴上其他帽子，他的罪名多如牛毛，但其中两条罪名，一是宣传资本主义复辟，二是业务挂帅，哪一次批斗都少不了这两条罪名。

“牛棚”设在外文楼后边，那里有几排平房教室，大规模批斗以后，这里成为那些问题比较严重的人，接受劳动改造的住处，总称为“劳改大院”，也称为“牛棚”。一批红卫兵被安排在这里做“监改人员”，对问题严重的人，进行隔离审查，老教授们偷偷地在私下把他们叫做“牢头禁子”。

有一天，牢头禁子下令，不让季羨林出去参加劳动，让他在“牛棚”里等候批斗，但不是主角，而是“陪斗”。这是一种十分残酷的刑罚，类似于旧社会的“陪绑”。已经被批斗多次了，季羨林几乎成了“老手”，什么喊口号，喊“打倒”，喊“拥护”，发言批判，以至满嘴捏造罪名，他都能够习以为常，听之不闻，置若罔闻，但对于肉体上的折磨，坐“喷气式”挨耳光，拳打脚踢，有时竟会被打得鼻青脸肿，也有往脸上唾吐沫而不能动弹的人格污辱，一想到这些，他

心里真有点不寒而栗。因此，当牢头禁子带着满嘴的“国骂”向他下达命令之时，季羨林的心里真正有点哆嗦了。但他毫无办法，在失去理智的年代里，他已失去一切自由，连活着的自由在内都失去了，他只有低头应命，如坐针毡似地等在“牛棚”里。那种坐以待毙的滋味，实在不足为外人道也。

一直等到中午，始终也没有人来押解季羨林。稍后，季羨林才从同棚别的“难友”那里得知，原来“老佛爷”派人在头天夜里去抄家的对象是周培源先生。周先生是中央明令要保护的人，但他们也胆敢违抗去抄家，而且还准备做主要斗争对象。没想到，有人事先透露了风声，周先生得到消息便躲起来了，没有被揪住。本来，“老佛爷”知道季羨林与周培源关系比较密切，都是“井冈山”的高参，所以准备让季羨林陪斗。没想到周培源先生躲起来，没有斗成，所以从早晨等到中午，没有人去“押解”季羨林。听了这个消息，季羨林心里真有点后怕。如果周先生真被“揪”出来，批斗起来声势之猛烈，是概可想见的。

下午，季羨林被“押解”着，去参加劳动。他看到地上、墙上写满了“打倒猪配猿”一类完全是人格污辱的口号，“老佛爷”们对周先生恨得咬牙切齿之状，明显可见。只是最高学府里莘莘学子在“文革”中堕落到如此地步，真让人寒心。

周培源是国务院点名保护的重点对象，所以“老佛爷”不敢公开把他送进“牛棚”。而其他大量学术权威，都遭到与季羨林同样的命运，他们与季羨林成为“棚友”。

在“棚友”中，有季羨林的老师一辈，如朱光潜先生。朱光潜先生先进了“牛棚”，季羨林则是自己“跳”进去的。同住一个“棚”内，有一件小事是季羨林永远也忘不了的。

朱光潜先生锻炼身体有一套方术，大概是东西均备，佛道沟通，有些动作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让季羨林佩服的是，在那样的阴森森的生活环境中，他居然还在锻炼身体。季羨林对此实在非常吃惊，而

且也为他捏一把汗。

晚上，或是早晨，朱先生都在锻炼。晚上季羨林睡下了，发现朱先生在被窝里折腾，不知道在搞一些什么名堂的锻炼。早晨，朱先生经常偷偷跑到劳改大院的一个角落，去打太极拳一类东西。久而久之，有一次被“监改人员”发现了，他被狠狠地批了一通。因为在这些牢头禁子看来，“黑帮分子”锻炼身体是罪大恶极的，是表示要和社会主义干到底的，所以不允许他们锻炼身体。

从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中，季羨林看到它的意义是并不小的。他看到朱先生对自己的前途没有绝望，对自己的事业也没有绝望，执著于生命，坚决要活下去。否则的话，朱先生他完全可以像一些别的难兄难弟一样，破罐子破摔了。从这里，季羨林找到了思想上的差距，觉得自己当时的态度实在比不上朱先生。他把朱先生求生的精神，暗暗地记在心中。

“棚友”中也有年龄比季羨林小的，如比他小13岁的张学书，他们是邻居，同住在13公寓同一单元之内，张学书住在二层。进了“牛棚”，又成了“棚友”。这一段历史，后来还被季羨林提起过，不过轻松多了。

那是季羨林当了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之后，张学书协助他做些具体的日常工作。有一次他们在一起和客人吃饭，闲谈中，张学书向客人介绍，说他和季羨林是邻居。季羨林风趣地说：“不只是邻居，还是‘棚友’。”张学书把“棚友”听成了“朋友”，连忙说：“季老长我13岁，是前辈。”季羨林解释说：“是木字旁的‘棚’，我们一块儿住过‘牛棚’。”张学书经季羨林这一提醒，回想起自己与季先生在劫难逃，被当成“牛鬼蛇神”关在“牛棚”里的那一段岁月，感慨良多。[17]

“牛棚”里的生活，其细节局外人无法了解。对于当事人，谁也不愿意再向他们提起这段令人伤心的往事。虽然难知其详，但还是可以从旁观者的记述中，了解一二。

据冯友兰先生回忆，他当时因为年老体弱，不住“牛棚”，而是住在外文楼，与牛棚为邻，因此也稍微知道了“牛棚”中的一点情况：

住在牛棚中的人就是参加了劳改队，我们住在外文楼的人往往看见他们出工去劳动，个个都是神情沮丧，气象愁惨，排着队慢慢地走向工地。我们住在楼里面的人也有劳动，不过劳动只限于扫外文楼和办公楼外边的马路。扫完了马路就进去学习，学习的主要内容是背语录和老三篇，或者写材料，写关于自己的材料，或是别的单位来外调的材料。在外文楼附近有一个食堂，每到开饭的时候，食堂的人就推着饭菜到劳改大队去卖饭。我们这边的监改人员，隔窗户看见饭车来了，就叫我们在毛主席像前站队，每个人都对着毛主席的像报告自己的名字和当时的政治“帽子”，然后排着队走出来，绕道进入劳改大院，吃完饭再回来。有一次，在站队报名的时候，有一位老年的老资格的心理学家，报了名字以后说：“我是一个有问题的人。”监改人员大怒，说：“什么问题？要说清楚！”这位老科学家说：“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问题。也没有人告诉我我是什么问题，只是有人对我说你也是有问题的人，就叫我在这里来了。”他说的倒是实在情况，监改人员就不再问了。[18]

“文革”中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本来司空见惯。

严重的是，劳改大院中被管制的人，人性被严重扭曲了，有的人精神失常，连笑也失掉了。

3. 失掉笑的人

季羨林听说，只有人是会笑的。他自己活在这个大地上几十年，曾经笑过无数次，自然也看到别人笑过无数次。他从来没有琢磨过人会不会笑的问题，这就好像太阳从东方出来，人天天必须吃饭一样，是一些极其自然的、明明白白的、尽人皆知的、用不着探讨的现象，

不须再动脑筋去关心了。

后来，他又听说，人是能失掉笑的。对此，他以前没有探讨过，没有发现有探讨的必要。因为他从来还没有遇到过失掉笑的人，没有想到过会有失掉笑的人，好像没有遇到过鬼，或者阴司地狱，是因为没有想到过有鬼，或者有阴司地狱那样。

然而，季羨林后来确实遇到过失掉笑的人，自己也成为失掉笑的人。

失掉笑的这个人，是在北大工作的一位参加革命几十年的老干部。

这位老干部虽然资格老，但从来不摆架子。季羨林自己曾有“原罪”感，而对老干部，则怀着一种说不出的、极其深厚的、出自内心的感激与敬佩之情。他把他们当做自己的镜子，用来照见自己的不足，激励自己前进。因此，对这位没有架子的老干部，季羨林很愿意接近，愿意同他谈谈自己的思想。有时候，甚至是海阔天空，上下古今，文学艺术，哲学宗教，无所不谈。老干部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闲谈时的笑声，更使季羨林永生难忘。

在季羨林看来，这不是会心的微笑，而是发自肺腑的爽朗的笑声。这笑声，悠扬而清脆，温和而热情，它好像有极大的感染力，一听到它，顿觉满室生春，连一桌一椅也仿佛充满了生气，一草一木也仿佛洋溢出活力。有时候，他甚至觉得这笑声冲破了高楼大厦，冲破了房屋的门窗，到处飘流回荡，响彻了整个燕园。

但是，那个时候，季羨林在听到这笑声的时候，并没有觉得它是怎样的难能可贵，怎样的不可缺少，而是把它看做日光空气一样，抬眼就可以看到，张嘴就可以吸入。又把它看做春天的和风，秋日的细雨，只要有春天，有秋天，也就自然而然地可以得到。中国古诗说的“司空见惯浑闲事”，他一下子变成古时候的司空了。后来，发现这个爱笑的人忽然失掉了笑，这才意识到笑竟是这样宝贵的，值得珍视的一种东西。这是“文革”中摧残人性的典型一例：

天空里突然堆起了乌云，跟着来的是一场暴风骤雨。这一场暴风骤雨真是来得迅猛异常。不但我们自己没有经受过，而且也没有听说别人曾经经受过。我们都仿佛当头挨了一棒，直打得天旋地转，昏头昏脑。有一个时期，我们都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在一个阴森可怕的恐怕要超过“白公馆”和“渣滓洞”的地方住了一些时候。以后虽然恢复了自由，然而每个人的脑袋上还戴着一大堆莫须有的帽子，天天过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日子，谨小慎微，瞻前顾后，惟恐言行有什么“越轨”之处，随时提防意外飞来的横祸。我们的处境真比旧社会的童养媳还要困难。我们每个人脑海里都有成百个问号，成千个疑团；然而问天天不语，问地地不应。我们只有沉默寡言，成为不折不扣的行尸走肉了。[19]

就是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季羨林有几次在路上遇到过这位老干部。他看到他从远处走过来，垂目低头，步履蹒跚。以前，季羨林看惯了他的他那种矫健的步伐，轻捷的行态，已经消逝得无影无踪了。有时候，季羨林下意识地迎上前去，想要说点什么，但一到了跟前，最多彼此相顾一下，立刻又低下头，别转开脸，他们已经到了彼此不敢讲话，不能讲话的地步了。季羨林这时心里只觉得一阵凄凉，眼泪立刻夺眶而出了。

后来，季羨林又在校医院门前遇到他。这一次，他不是孤身一人，而是有一位老年妇女扶着他。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啊！老干部的身体似乎更不行了，路好像都走不动，腿好像都迈不开，脚好像都抬不起，颤巍巍地好不容易向前挪动，费好大劲才挪进校医院大门。看样子，他已患了病。

季羨林一时冲动，很想鼓足勇气上前去探问一声，然而他不敢。挨斗时那暴风骤雨般的情景猛不丁地展现在他眼前，他那一点剩勇，这时变成了微弱的燭火，经雨一打，立刻就熄灭了。他不知道，再有那样一次暴风骤雨，自己是否还能经受得住。想到这里，他硬是压下了他那向前去探问的冲动，只是站在远处注视着他。季羨林虽然关心

他的身体，但无能为力，只能站在一旁看，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他，看他走进了校医院的大门，身影在里面直晃动，在挂号处停留了一会儿，又被搀扶到走廊里，身影完全消逝，大概是到哪一个门口等候大夫呼唤了。

等到老干部的身影消逝以后，季羨林猛然意识到，怎么他脸上竟然一点笑容都没有？他成了一个不会笑的人，他已经把笑失掉，当然更不用说那爽朗的笑声了。这时，季羨林心里才猛然一震，从前只知道笑是人的本能，现在却又知道，人原来是连本能也会失掉的。他忽然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个这么残酷，又这么令人不寒而栗的真理。于是，他又联想到了自己，发现自己原来也是一个失掉笑的人。

我自己怎么样呢？他在这里又在另外一种意义上成了我的一面镜子。拿这面镜子一照：我同他原来是一模一样，我脸上也是一点笑容都没有，我也成了一个不会笑的人，我也把笑失掉了。如果自己不拿这面镜子来照一照，这情况我是不会知道的。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告诉我，没有一个人敢告诉我。像我这样的人，当时是没有几个人肯同我说话的。如果有大胆的人敢同我说上几句话，我反而感到不自然，感到受宠若惊。不时飞来的轻蔑的一瞥，意外遇到的大声的申斥，我倒安之若素，倒觉得很自然。我当时就像白天的猫头鹰，只要能避开人，我一定避开；只要有小路，我决不走大路；只要有房后的野径，我连小路也不走。只要有熟人迎面走来，我远远地就垂下了头。我只恨地上没有洞，如果有的话，我一定会钻了进去，最好一辈子也不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人能笑得起来吗？让他把笑保留住不失掉能办得到吗？我也只能同那一位老干部一样变成了一个不会笑的人了。[20]

通过这样一段切身的经历，季羨林深深感觉到，一个人如果失掉了笑，那就意味着，他同时也已经失掉了希望，失掉了生趣，失掉了一切。这样的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管是在别人眼中，还是在自己眼中，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多余的人，他不过是行尸走肉，留有一口气

苟延残喘而已。什么清风，什么明月，什么春花，什么秋实，什么高山，什么流水，一切美好的事物，在别人眼中，当然都是非常可爱的，但在他的眼中，则是木然、呆然，什么快感也引不起来。这样，他在这个世界上，就如浮云，如幻影；这个世界对他来说，也如浮云，如幻影。他自己也就变成一个幽灵，踽踽独行于遮天盖地的辽阔寂寞之中，成了一个路人，一个“过客”，在默默地等候着大限的来临。

这个失掉笑的老干部，就是大名鼎鼎的冯定先生。

4. 劫后余生

“文化大革命”明显地是人失去理智的产物。人既然已经失去了理智，那就自然会做出各种各样的不合理的事情。仅打、砸、抢的活动，就不知毁坏多少文物，烧毁多少古书、字画，砸毁多少碑庙，由此而造成的损失是永远也无法弥补的。

然而更有甚者，比这更为骇人听闻、出人意料的事层出不穷，下面只是几个小例子：

广东省恩平县横陂公社一个农民，为了表现自己不平凡的“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行动，竟然刺穿了自己胸前的皮肉，带上一枚毛主席像章，这一行动，使这位农民在一夜之间就成为一颗明星，被邀请到外地去“忆苦思甜”、批判修正主义，没完没了地到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去作大报告，这被认为是阶级觉悟高的一种表现，只有这样摧残自己肉体的残忍举动，才能表现出对伟大领袖至高无上的忠诚。这样的一个像章在胸前的肉中带了整整三年，也算是创了吉尼斯的世界记录。[21]

为了表现革命的彻底性、坚决性，要对那些被定性为“阶级敌人”的人特别残酷，而阶级敌人有九种，是地、富、反、坏、右、叛、特、反、臭老九（指知识分子）。广西的一位中学教师和别的一

些人，是“反革命分子”，自然是阶级敌人，他们竟被人在额头上刺上了“反革命分子”五个栗子般大的字，受尽了侮辱。甚至也有些偏远的地区，还发生过把“反革命分子”打死，而吃其肉和肝的兽性野蛮行为，退回到了远古的蛮荒时代。[22]

和这些野蛮已极的行为相比，北大的红卫兵被冯友兰说成是“到底是北大的红卫兵”，与街道上的红卫兵不一样。

冯友兰说的是一次抄他家的行动，当时他在客厅里看见一个抄家的红卫兵拿着一张纸进来，似乎是发现了一个大秘密，拿着这张纸厉声问冯先生：“这是什么？”冯友兰一看，原来是一张斗方的红纸，四周印着万字花边，是在别人家有喜事时在上边写上大字，钉在幛子上用的。他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找出来，冯先生给他们说明用途，他们又问为什么印上纳粹标志？冯先生向他们解释说：万字起源于印度，传到欧洲，也传到中国，本来的意思是“吉祥”，形状是卐，就是这纸上印的，而纳粹的标志是卐，这与中国的万字毫无关系。这位红卫兵扫兴而去，而冯先生倒是很感谢这些红卫兵，因为他们还容他解释，还相信他解释，而他听说街道上的红卫兵，遇见类似的情况就不由分说，先把当事人痛打一顿再说，所以冯友兰说他们“到底是北大的红卫兵”。[23]

其实，北大红卫兵的野蛮行为也多的是，“水平”也不比别的地方的红卫兵差。用长矛刺死人、用皮带抽人的事也是屡有发生的。为此，北大的老教授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具体到季羨林来说，他被折磨得相当严重：

我的确活下来了。然而，在刚离开“牛棚”的时候，我已经虽生犹死，我成了一个半白痴，到商店去买东西，不知道怎样说话。让我抬起头来走路，我觉得不习惯。耳边不再响起“妈的！”“混蛋！”“王八蛋！”一类的词儿，我觉得奇怪。见了人，我是口欲张而嗫嚅，足欲行而趑趄。我几乎成了一具行尸走肉，我已经“异化”为“非人”。

我的确活下来了，然而一个念头老在咬我的心。我一向信奉的“士可杀，不可辱”的教条，怎么到了现在竟被我完全地抛到脑后了呢？我有勇气仗义执言，打抱不平，为什么竟没有勇气用自己的性命来抗议这种暴行呢？我有时甚至觉得，隐忍苟活是可耻的。然而，怪还不怪在我的后悔，而在于我在很长的时间内并没有把这件事同整个的“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一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我一直拥护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的“革命”。可见我的政治嗅觉是多么迟钝。[24]

所以，季羨林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劫难中虽然活下来了，但那只是肉体上的生，至于精神上的生，尤其是精神上的自由，那是根本不存在的。

三、灾难并没有结束

1. 生活上的煎熬

“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的摧残不仅是肉体上的，也不仅是精神上的，还要包括生活上的。

红卫兵掌权伊始，就对老教授们挣那么多工资感到惊讶，而且他们还听到一些传说，说是钱挣得越多，就越吝啬。北大的一些老教授到秦皇岛、北戴河去疗养，在火车上喝一杯一分钱的茶水，都是自己掏自己的腰包，谁也不愿意为别人多掏出一分钱。血气旺盛的青年人对此极不理解，也不知道“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道理，他们每月只有十几元钱的助学金，还不时拿出一点个人从牙缝里省下来的积蓄，几个好朋友到海淀长征食堂凑一凑，吃上一顿开开斋。有了这样的心理反差，红卫兵们想戏弄戏弄老教授，于是恶作剧便不时地冲教授们而来。

马坚先生就遭遇过这样的恶作剧。马坚是全国知名的教授，工资

相当高，据说是每月二百八十八元八角，一次发工资时，不知是哪一位想出的这个恶作剧点子，让发工资的人故意把这些钱到银行统统兑换成一角一张的“角票”，变成厚厚的一叠子，数起来很费事，好看马先生的热闹，取笑他。当马坚先生点钱时，他们有人就奚落他，说你每月拿这么多钱，干那么一点事，亏心不亏心？马坚先生知道他们这是嫉妒心在作怪，便针锋相对地说：“这是人民给我的，如果人民政府批准，我可以给你一部分。”那人听了以后，气急败坏地说：

“谁要你的臭钱！”马坚接着说：“这是人民币，你怎么能说是臭钱？！”那人气得说不出话来，猛然站起来，冲出门外，“砰”地一声把门关上，狼狈地走了。据说他跑回房间里大哭了一场。[李振中：《学者的追求（九）》，《阿拉伯世界》1995年第4期。]他自然没想到，老教授们的智商毕竟比他们要高好些。

后来，掌权的红卫兵又想出了折磨老教授们的新招，就是降低他们的生活标准。红卫兵在宣布冯友兰先生罪状的同时，规定了对他的临时制裁，其中包括扣发他的工资，只按家中的人数，每月每人发给生活费十二元。当时冯先生的子女都有自己的工作，家中只有妻子任叔明和他自己两人，每月就只发给他们二十四元。

冯先生问发工资的人，“还有房租和保姆的工资呢？”他们说：“你不必管了，由我们处理。”这样，冯先生和老伴任叔明就只有每月二十四元钱的生活费，生活水平自然是相当低的。有一天，冯友兰从外边回来，一进门，老伴对他说：“今天有好吃的。”冯先生问：“有什么好吃的？”老伴说：“今天我上街，看见卖羊肉的，我买了一角五分钱的羊肉。”当时的羊肉大概九角钱一斤，一角五分钱能买一两多，吃这一两多肉，他们就感到是改善生活了。这样的生活标准，过了好几个月，后来才逐渐增加，先是每人每月二十四元，又增加到四十多元，又增加到七十多元。[25]

这样的待遇，对季羨林自然也不例外。只是，季羨林从小吃苦习惯了，并不觉得，而且老祖和老伴德华，还有办法多变换一些花样。

老祖、德华她们，在每人每月只能得到恩赐十几元钱生活费的情况下，殚思竭虑，弄一点好吃的东西，希望能给我增加点营养；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希望能给我增添点生趣。婉如和延宗也尽可能地多回家来。我的小猫憨态可掬，偎依在我的身旁，她们不懂哲学，分不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人视我为异类，她们视我为好友，从来没有表态，要同我划清界限。所有这一些极其平常的琐事，都给我带来了无量的安慰。窗外尽管千里冰封，室内却是暖气融融。我觉得，在世态炎凉中，还有不炎凉者在，这一点暖气支撑着我，走过了人生最艰难的一段路，没有堕入深涧，一直到今天。[26]

包括季羨林在内的这一批老教授们，都是国宝一级的专家，在这异常的时期，不仅在肉体上受折磨，精神上受摧残，在生活上还要受煎熬。但是，就是在这样的艰难情况下，他们也没有丧失对祖国的拳拳之心，我们的知识分子，确实是伟大的！

2. 武斗不断升级

北大的“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6月18日这天开始，就发生了打人的暴力事件。工作组把这次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而中央文革则予以平反，并及时地传达了上边的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说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但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虽然指示里也提到今后不许打人，要摆事实，讲道理，但这一句“对打人要进行阶级分析”，足可以让打人者受用无穷。

到秋天，北大的群众组织分裂成“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两派对立情绪越来越严重，小规模武装冲突不断发生，这时候，如果能及时制止，仍然可以制止大规模流血事件的发生。但是，上边的基本精神是不要怕乱，要靠群众，而群众运动依然是合理的。翦伯赞写那么多书，靠谁去批判？只有靠革命师生，停课又管吃饭，吃了饭

要发热、要闹事，不闹事干什么？只能靠他们去搞。北大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只有依靠群众去搞，才能解决问题，所以要求不用怕动刀动枪，不要怕有乱子。那时的逻辑是，闹事就是革命，要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到8月份，《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运动，提倡文斗，不要武斗。但很快就传来消息，说上边认为北京乱得不厉害，北京太文明了。对学生运动不能镇压，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就是反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本人于1966年10月发出指示，要师生按解放军的编制进行军训，1967年1月正式发出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毛泽东的本意，可能想通过解放军支左，缓和两派之间的对立情绪，但随即而来的上海“一月风暴”，开始了全国性的夺权运动，人的权力欲被无限地调动起来了。到后来，一切秩序混乱的单位实行军事管制，正常秩序也无法恢复了。学校里的斗、批、改，扩大为大规模的武斗。北京大学的武斗到1968年春夏发展到高峰，双方各自修筑工事，安装了音量特别大的高音喇叭，鼓动武斗。

为了煽动对立情绪，北大两大派的广播台都常常捏造谣言，广播人员相信的原则是：宣传是一种专制行为，它不容分说地使听众服从自己，而不许有选择的余地。这种实用主义的逻辑，被当做宣传鼓动的“秘诀”，而恪守不渝地推行。

身为毛泽东夫人的江青，到处插手运动，支持一派打击一派，使派性愈演愈烈。她对自己支持的一派鼓气说：我声明，谁要跟我武斗，我一定要自卫，我一定要还击！她假惺惺地却又欲盖弥彰地说：我不是提倡武斗，你们不要以为我提倡武斗，我是坚决反对武斗的，我是坚决拥护毛主席提出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方针，我说的是，当阶级敌人来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行呢？她发明了“文攻武卫”一词，这在“阶级斗争学说”盛行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是十分明显的。武斗之升级，完全是“四人帮”支持的产物。

北大武斗最凶的时候是 1968 年，双方各种武器都用上了，最常见的是用自来水管焊上磨尖了的螺旋形状的钢筋而制成的长矛和用自行车带做成的大弹弓。在燕园中行走，不定什么时候会飞来一块用大弹弓射来的砖头。

在那样的日子里，人人提心吊胆。

据冯友兰先生说，武斗是相当严重的。

两派互不相让，派性越来越强，发展到武斗。我的院子里两扇大门也被拆走修筑工事去了。我的房子的背后有一座学生宿舍楼，不知是哪一派在楼顶上布置了阵地，居高临下，往下面打弹弓。我没有看见弹弓的样子，据我猜想，大概是像我在意大利看见的那样的打石炮弹的弩弓，不过子弹比较小，只有胡桃那么大。这个阵地上的人，见有来往的人，就往下打弹子，往往有弹子落在我这院子里，有时打在玻璃上，把玻璃打得粉碎。若是打在人头上，伤势也不会轻了。我们这所房子住的几家，都在院子里做饭，做饭的时候都是提心吊胆的。

.....

在两派对立、武斗的局面下，在北大的人，无论是有问题的，还是没有问题的，每天都好像是处在战斗之中。每天所听到的，都是两派互相叫骂的声音，从高音喇叭里喊出来，还有弹弓的声音参（掺）杂其间。[27]

为了制止派性的日益发展和武斗的不断升级，毛泽东发出指示，派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高等院校，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领导那里的斗批改。

这时，分裂的北大总算又统一起来，不过，老教授们的灾难并没有结束。

3. 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

浩浩荡荡的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了北京各

高等院校。先是 1968 年 7 月 27 日进驻清华大学，后是北京大学也有了“驻校”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是 1968 年 8 月 19 日的事。

老教授们盼望着工宣队、军宣队会给他们带来好消息，但他们错了，他们没盼来好消息，而是被投进新的灾难之中。

听说工宣队、军宣队要进驻北大，分裂已久的北大觉得有了指望，在 1968 年 8 月 19 日宣传队进校的那一天，师生们迎候欢迎，等到深夜。终于等到一个工厂的宣传队，师生们列队欢迎他们进了校，接着开会，师生们表示欢迎，老教授也表示欢迎。工宣队的队员马上板起脸孔，训斥说：你们资产阶级教授，没有发言权。后来，工宣队天天开会，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老教授们不敢再说话。这又惹怒了他们，问老教授们：你们资产阶级教授们为什么不发言呀？老教授们被搞得不知如何是好，说了不行，不说也不行，简直是无所措手足。[28]

季羨林被从牛棚放出来之后，有一段时间成了地地道道的“中间人物”，他扫过厕所，掏过大粪，看过电话，当过门房，生活介于人与非人之间，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党员与非党员之间，人民与非人民之间。

我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间人物”，这样的人物我还没有在任何文学作品中读到过（印度神话中的陀哩商古也只能算是有近似之处），他是我们“史无前例”的什么“革命”制造成的，是我们的“发明创造”，对我们伟大的民族来说，是并不光彩的。这种滋味没有亲身尝过的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的。[29]

而宣传队进校以后，季羨林“中间人物”的状况是否改变了呢？

是改变了，不过不是向好的方面改变，而是向坏的方面改变了。这要源于宣传队在清华大学炮制出来的经验。

清华大学是最先派驻宣传队的高校，宣传队全称是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名为宣传队，实为党政大权集于

一身，而且集于一人，就是中共中央警卫部队八三四一的宣传科副科长迟群。在进校后，宣传队据说经过半年的斗争和实践，写出了一份《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报告，经毛泽东批示后，照发全国。该报告点了“建筑学反动权威”梁思成、“机械学反动权威”刘仙洲、“力学反动权威”钱伟长的名，且让他们做反面教员，还点了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抵制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汪家鼎、李卓宝等人。报告捏造事实，说基础课教师赵静安痛哭流涕地检查自己向往“三十成名，四十成家，五十威震天下”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而且深有感触地说：“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了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拯救了我，工人师傅教育了我，我要老老实实在地接受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做一个工农兵欢迎的知识分子。”

当时，清华大学是毛泽东亲自抓的典型，即所谓“六厂一校”之一。六厂是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南口机车车辆厂、二七机车车辆厂、北郊木材厂。清华大学和六厂的经验带有指导性。这个极左的经验，传达到北大之后，在北大引起了极大的混乱。

宣传队进驻北大后，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立即造成全校性的“红色恐怖”。为了“清理阶级队伍”，全校抓了近千个“专案”，将重点人物全部隔离审查。东语系也有几十人被立了专案，马坚先生、陈信德先生都是“重点人物”。

马坚先生被怀疑为“反革命组织伊玛尼党”的后台。本系子虚乌有，马坚先生自然拒不承认，阿拉伯语教研室的人也没有相信他会加入在东北一个偏远地区的“伊玛尼党”，更不相信他会成为这个在解放初已被取缔了的宗教组织的后台，阿语教研室便被宣传队扣上“右倾”帽子。宣传队又组织其他专业师生对马坚先生“攻心”，结果仍是“久攻不克”。在将近两年的“攻心”战中，马坚先生遭受多少折磨是可想而知的。

宣传队在全校范围内对重点人物进行“逼、供、信”，使老教授们胆战心惊，原北京大学副校长、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因不堪忍受，和夫人双双吞食大量安眠药片自杀而死，据说他的衣兜里装了两张纸条，一张上写着，我没有问题；另一张上写着，我拥护毛主席。

在宣传队的“红色恐怖”之下，揪斗严厉，教职员中自杀者多人，几乎每隔几天，就有某人自杀的消息传出。

后来，北京大学也成为毛泽东亲自抓的典型，从此北大成为“六厂二校”之一。到1969年8月15日，全校召开宽严大会，宣传队成员在大会上宣读了《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把清队工作进行到底》的落实政策宣传提纲，在大会上东语系日语专家陈信德先生被当成抗拒从严的典型，以“日本特务”和“现行反革命”的双重身份被公安局逮捕，住进了监狱。

这次宽严大会之后不久，宣传队执行上边“疏散”的指示，大批教职工被“疏散”到江西鄱阳湖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北大许多知名教授如张岱年先生、冯定先生、王宪钧先生、刘麟瑞先生等都去了鲤鱼洲，在那里住草棚，干运石子、编草帘、插稻秧等体力活。有的老教授在那里得了血吸虫病，而且后来死于这种病。

工、军宣队，在北大和清华仍然是在错误思想的指导下继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4. 成为“资产阶级权威”的典型

季羨林曾自信自己头上没有辫子，屁股上没有尾巴，因为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或任何反动组织，没有干反人民的事情，所以在聂元梓掌权时，是他自己跳出来，一跳跳进了“牛棚”。

宣传队进校以后，季羨林没有跳，但他自己知道，照样饶不了他。

他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权威”，实际上是和梁思成、刘仙洲、钱

伟长同等类型的“反动权威”。

既然是反动权威，那就必然要遭到严厉的批判和工农兵给予的“再教育”。

东语系批判季羨林到什么程度，可以从他的一个“大弟子”的一篇批判文章略见一斑，这篇批判文章被选在工人、解放军驻北京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革命大批判组编印于1969年11月的《革命大批判文选》第二集中。用不着追究这个大弟子是谁，因为这是时代的产物，没有必要把罪责全部推到他一个人身上。

下面是这篇题为《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不做资产阶级“权威”的大弟子》一文中的主要段落：

到北大以后，我要求入党。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求我们做张思德、白求恩式的党员，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而刘少奇却要我们做他的“业务党”党员，就是所谓的“红色专家”。……说什么“我们的党员、团员……凡是有条件的，都应当努力使自己成为‘又红又专’的红色专家。”刘少奇所说的“红色专家”就是×××这样挂着共产党员招牌的资产阶级“权威”。陆平吹捧这些人“已经基本上又红又专了”，“已经挂上了社会主义的火车头”。东语系旧总支把他拉进总支委员会。这就是他们“业务党”的标准党员，是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他们就是让我做这样的党员。由于“私”字作怪，我就把×××当做又红又专的榜样，努力做一个这样的“红色专家”。

……旧总支的负责人也跟着喊“党员的业务赶不上需要”。他们发展新党员就是只要业务好的。“业务党”的标准党员、资产阶级“权威”更是言传身教，说什么：“你们的知识面太窄，要多读书。”无耻吹嘘自己成名成家的“经验”，说什么一个单词就可以写一篇论文，用资产阶级的成名成家这个毒饵，引导我们脱离无产阶级政治。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我那时就像丢了魂一样，每天钻图书馆，抱着梵文大字典死“啃”，甚至走在路上也背单词。我忘记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

政，想的是通过刻苦读书，学一门专业知识，既有了成名成家的资本，又创造了入党的条件，一心想走×××的路。资产阶级“权威”对我说：“你学得很稳。”我把毒药当蜜糖，感到莫大安慰，心想这条路越走越稳了。……

经过几年的“修养”，真是越“养”越“修”，我越来越适合修正主义路线的需要了。毕业前我入了党，毕业后被资产阶级“权威”选中，把我留校当做接班人培养，成了他的“大弟子”。

……

我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没有以接班人的五个条件要求自己，而是“受宠若惊”，洋洋得意，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上，认为“理想”已实现了一半，这一辈子“红色专家”当定了，一心想在资产阶级“权威”培养下更快提高业务水平，将来出几本书，什么名呀，利呀，地位呀，都来了。我被修正主义迷魂汤灌醉了，离毛主席革命路线越来越远，在“和平演变”的修正主义道路上越滑越远。我戴上了手表，穿上了呢制服，忘记了劳动人民，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失掉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灵魂。

……

作为人世间最珍贵的感情之一，师生之情被严重亵渎了，辛勤培养和苦心教育，换来的是离经叛道，这对于辛勤的园丁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内心世界的摧残会如何，局外人是绝对无法理解的。

连自己花费那么多心血培养出来的弟子都背叛自己，出来揭发自己的“罪行”，不属于自己门下弟子的其他人，对季羨林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这篇批判文章印出后，虽然把季羨林三字用×××来代替，但是东语系的人都知道×××就是季羨林。

所以，这时的季羨林，真正是一个“不可接触者”。

没有以前的会议，没有以前的发言。没有人敢来找我，很少有人有勇气同我谈上几句话。一两年内，没收到一封信。我服从任何人的调遣与指挥。只敢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30]

“不可接触者”是印度字“阿丘特”的意译。在英国统治时期，这类人算作“表列种姓”，是古代印度社会遗留的产物。晋朝法显去印度时看见的就是不可接触者，他们上街要敲木头，以便让别人回避不碰见他们，因为他们社会地位极为低下，所以经常要遭人训斥。在现代印度，在大都市里也仍能见到“阿丘特”，比方说，在大街上突然看到一个老人，异常瘦弱，头上的短发全白了，胸口凹进去，手臂和腿上好像根本就没有肌肉，完全是皮包着骨头。全身只在下身腰部和两腿之间，缠着一块不白的白布，其余都光着。这样的人，地位之低是可想而知的，在英国人统治时期会有什么样的待遇也可想而知了。圣雄甘地把他们叫做“哈利真”，意为“神之子”，才给他们平了反。[31]

5. 西府海棠含冤、古藤萝遭殃

季羨林终于又像“凤凰涅槃”一般，活了下来。遗憾的是，燕园中许多美好的东西都遭到了破坏。

就在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发表之后，高等院校里对一切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展开了新一轮大讨伐。一时忽然传说：养花是修正主义，最低的罪名也是玩物丧志。于是“四人帮”的小爪牙迟群一伙就在海内名园燕园之内，大肆开展“斗私、批修”，先批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新生的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苗子等等，都在被批判之列。他们后又批花木，张春桥有个理论，叫做“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这一奇特理论的指引下，几十年、上百年的老丁香树，被砍伐殆尽。屡见于清代笔记中的几架古藤萝，被斩草除根。一些楼房外面爬满了墙的爬山虎，统统被拔掉。办公楼前两棵枝干繁茂的西府海棠，也在劫难逃。

说到这两棵西府海棠，在老北京还是颇有名气的。据说，有一个

挺有名的文人，在自己的笔记中专门讲到过它。熟悉北京掌故的人，比如邓拓先生等人，在生前，每年春天都要来燕园中探望一番，欣赏一下绿叶葳蕤、粉红四溢的西府海棠。而季羨林自己，当然也熟悉北京的一些掌故，但他并不是为掌故所吸引，而是每当西府海棠开花之时，到树下流连徘徊，欣赏花色之美，听一听蜜蜂的鸣声。这并不是自命风雅，而是通过赏花，顿时觉得人间是那么的可爱，生活是那么的美好，胸中的干劲和生命的活力陡然腾涌起来。他的身体本来像个蓄电瓶，看到了西府海棠，便仿佛是蓄上了电，生活起来有了力量，在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中，也能够精神抖擞地驰骋了。

他联想到中国古代的诗人，其中喜爱海棠者颇不乏人。诗人们欣赏海棠之美，又以海棠花无香而遗憾。在古代文人的笔记、诗话中，有很多地方都说到这个问题。季羨林很自然地想到宋代著名爱国大诗人陆游的几首《花时遍游诸家园》的诗，其中有一首就是讲海棠的：

为爱名花抵死狂，
只愁风日损红芳。
绿章夜奏通时殿，
乞借春阴护海棠。

想到这里，季羨林心里感叹不已。

陆游喜爱海棠达到了何等疯狂的地步啊！稍有理智的人都应当知道，海棠与人无争，与世无忤，决不会伤害任何人的；它只能给人间增添美丽，给人们带来喜悦，能让人们热爱自然，热爱祖国。然而，就连这样天真无邪的海棠也难逃“四人帮”的毒手，燕园内的两棵西府海棠现在已经不知道消逝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也算是一种“含冤逝世”吧。代替它站在这里的是两棵翠柏。翠柏也是我所喜爱的，它也能给人们带来美感享受，我毫无贬低翠柏的意思。但是，以燕园之大，竟不能给海棠留一点立足之地，一定要铲除海棠，栽上翠柏，一定要争这方尺之地，翠柏而有知，自己挤占了海棠的地方，也会感到对不起海棠吧！[32]

季羨林不禁想到，“四人帮”要篡党夺权，有一些事情容易理解；但是，砍伐花木、铲除海棠，仿佛这些花木会抓住他们那罪恶的黑手似的，因此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宋代苏洵在《辨奸论》中说：“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砍伐西府海棠之不近人情，一望而知。本来么，爱好一切美好的东西，是人类的天性，任何人都有权利爱好美好的东西，花木自然也包括在里边。而“四人帮”却偏要违反人的天性，必欲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铲除净尽而后快。于是，季羨林便从这里很自然地得出结论：“四人帮”这一伙人是大奸慝，已经丝毫没有怀疑了。

在西府海棠被铲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一直到今天，季羨林还经常要到办公楼前原来栽着西府海棠的地方驻足。

有一年，在风和日丽的暮春三月，季羨林偶尔走过办公楼前面。

他看到在盘龙石阶的两旁，在原来西府海棠立着的地方，一边站着一棵翠柏，浑身碧绿，扑人眉宇。它仿佛是从地心深处涌出来的两股青色的力量，喷薄腾越，顶端直刺蔚蓝色的晴空，它自然比不上杜甫当年在孔明祠堂前看到的古柏那样，“苍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但看到它们，也不能不受到感染，内心也会溢满力量。他顾而乐之，流连不忍离去。

正在欣赏之时，在季羨林的眼前蓦地一闪，就在这两棵翠柏站立的地方，神奇地出现了两棵西府海棠，它们正开着满树繁花，已经绽开的花朵呈粉红色，没开的蓓蕾呈鲜红色，粉红与鲜红，纷纭交划，宛如天半粉红色的彩云。蜜蜂在花骨朵中间飞舞，居然还能听到嗡嗡的叫声，犹如春天的催眠曲。这色彩，这声音，把季羨林深深地吸引住了，他沉醉了。

忽然间，海棠花与翠柏同时出现了，两者的影子重叠起来，翠绿与鲜红纷纭交错起来了。他这才意识到，眼前的翠柏和海棠都是现实，翠柏是眼前的现实，海棠则是过去的现实。难道这是名花有灵，是向他显圣来了么？难道是向他告状来了么？可他心想，自己一非包

文正，二非海青天，更没有如来佛起死回生之神力，他只能洒一把同情之泪，寄托一点希望。可是希望什么呢？

我从来不相信什么神话。但是现在我真想相信起来，我真希望有一个天国。可是我知道，须弥山已经为印度人所独占，他们把自己的天国乐园安放在那里。昆仑山又为中国人所垄断，王母娘娘就被安顿在那里。我现在只能希望在辽阔无垠的宇宙中间还能有那么一块干净的地方，能容得下一个阆苑乐土。那里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大地上一切花草的魂魄都永恒地住在那里，随时、随地都是花团锦簇，五彩缤纷。我们燕园中被无端砍伐了的西府海棠的魂灵也遨游其间。我相信，它决不会忘记自己呆了多年的美丽的燕园，每当三春繁花盛开之际，它一定会来到人间，驾临燕园，风前月下，凭吊一番。“环佩空归月下魂”，明妃之魂归来，还有环佩之声。西府海棠之魂归来时，能有什么迹象呢？我说不出，我只能时时来到办公楼前，在翠柏影中，等候倩魂。我是多么想为海棠招魂啊！结果恐怕只能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地茫茫皆不见”了。奈何，奈何！[33]

他叹息自己无力回天，不仅是西府海棠，而且连藤萝、古丁香树，也都被异化为“修正主义”，遭到无情的诛伐。六院前的，才斋与均斋之间的那两棵古藤，都被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掉，永世不得翻身了。整个燕园里，只剩下后湖边上幽径旁的一棵古藤，只可惜，那棵古藤也仅仅存活到 1992 年，也被无端地砍伐了。不过，这又是后话了。

花木的灾难，何时才能结束呢？

知识分子的灾难，何时才能结束呢？

四、《罗摩衍那》的诞生

1. 高等学府即将变成文化沙漠

1969年10月，在林彪下达“第一号令”之后，在北京大学的大部分教师南下江西鲤鱼洲到五七干校劳动的同时，其他一些教师和学生，在工、军宣队的统领下，到北京郊区各县进行“教育革命”。而这时的所谓“教育革命”，只不过是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东语系的学生，大多数到了郊区延庆县永宁公社新华营大队，这里是穷山恶水，口外的狂风无休无止地吹打着这片贫瘠的土地。公社社员们的生活异常贫苦，口粮都严重不足，为了节省粮食，冬天他们实行的是一天两餐制。

更有甚者，东语系的学生为了解决吃饭烧柴问题，要到30里以外的九里梁大队的深山里去砍柴。九里梁的农民，则更闭塞了，他们常年吃的是红薯和红薯干，农民们不知道什么叫“收音机”，有的学生住的房东家，弟兄七个，全是光棍，他们根本娶不起老婆，也没有人肯嫁给他们。有一位90岁的老农，从未离开这深山老林，也不与人接触，大学生有人听说他，去看他，像个古董似的老人，竟问大学生们，现在是清代的什么时候了。

季羨林也和东语系的其他师生一起，到了延庆县永宁公社新华营大队，去进行“三同”，搞“教育革命”。他虽然未被派往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远离血吸虫病的严重威胁，但是他在延庆，和在鲤鱼洲的老师心态完全一样。

当时，季羨林和邬裕池、李振中两位老师同住在新华营大队的一户姓马的农民家里。这里的农民一律睡火炕，一个大火炕能睡十几个人，农民们全家往往都挤在一个大炕上。季羨林他们三人就和老乡睡在一个炕上。他们三人思想相近，都对祖国的前途忧心忡忡，也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渺茫，季羨林甚至连希望都看不到，十分悲观。

延庆地处口外，这对于久住北京的师生来说，确实是十分严峻的考验。北京冬天有暖气，而延庆没有暖气，贫下中农家里能生得起炉子的，可以说绝无仅有。取暖仅靠火炕上那点温热之气。气温最低时达到零下26℃，还要到田野里去进行刨地等劳动。镐头下去，有时

火星四溅，而冻土却纹丝不动。劳动一会，身上热火起来，慢慢地出了汗，手被镐头震得生疼，有的同学虎口都震裂了。休息的时候，坐下不一会，汗就开始变得冷冰冰的，那种难受劲，非亲临其境者，是绝对体会不到的。

天气太冷，有的同学虽然穿两件棉袄，两条棉裤，但仍抵不住口外的严寒。有的同学脸冻坏了，耳朵冻烂了，手冻得肿得像馒头，但绝对不准叫苦。一叫苦，就是缺乏贫下中农感情，就是对“教育革命”态度不端正，就要被扣上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

学生们在这样的地方进行“教育革命”，到底能学到什么，那就可想而知了。当然也有意外的收获，那就是有些同学锻炼了吃苦耐劳的能力，有的同学则见了世面，有的长时间没离开过城市的“资产阶级小姐”，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她们从未见过的一种稀奇动物——毛驴。

东语系另有一支“教育革命小分队”则开到天津塘沽新港，在那里，“教育革命”也是一无所获。正是春节除夕夜，两支队伍都突然接到命令，返回学校，延庆的师生正在包的饺子还未来得及吃，就开拔了。

1970年1月，全国开始讨论文科大学如何办的问题，《红旗》杂志在第1期上发表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小组写的评论《文科大学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文章提出“革命大批判既是社会主义文科大学的基本任务，又是当前改造旧文科大学的战斗任务”，认为只有把革命大批判深入到文科各学科，“旧的文科大学才能在批判中获得新生”。一月底二月初，全国传达了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

在这同时，上海又开展起批判凯洛夫《教育学》的运动，把凯洛夫的学说当成“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理论根据来批判，把其中的合理内容也全部抹杀了。

在校外进行“教育革命”的北大师生，奉召回校，参加“一打三反”和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运动。

3月，陈伯达抓“教育革命”试点，北大和清华1969、1970两届毕业生提前毕业，毕业生必须服从“革命需要”，坚持“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在这里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在“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做出新的贡献。

从这时开始，北京大学这所高等学府，成为一所没有学生的学校，由最高学府向文化沙漠飞快地变化着，谁也没有想到文化领域的沙化，竟是如此之迅速！甚至比自然界中的沙化还要迅速！

然而，高等学校向文化沙漠变化的速度还没有停止的迹象。

到这一年的5月，空荡荡的校园里没有学生已经两个多月。作为毛泽东亲自抓的“二校”北大和清华，这才认识到，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两校已具备了招生条件，为此，两校准备在下半年招生，并制定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到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这份报告，让全国参照执行。

报告中提出了如下一些具体意见：

一、培养目标：“培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有文化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劳动者。”

二、学制：根据各专业具体要求，分别为二至三年。另办一年左右的进修班。

三、学习内容：设置“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各科学生都要参加生产劳动。

四、学生条件：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二十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

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

五、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

六、学生待遇：有十年以上工龄的老工人由原单位照发工资（要扣除学校发的十九元五角），其他来自工厂、农村的学生每月发给伙食费和津贴费十九元五角。解放军学生由部队负责供给。

七、分配原则：学习期满后，原则上回原单位、原地区工作，也要有一部分根据国家需要统一分配。[34]

1970年下半年，北京大学迎来了第一批工农兵学员，结束了高等学校长达数月没有学生的历史。

工农兵学员进校后，按部队编制，一个系为一个连队，各项工作都由连队领导。一个连队有一个食堂，一座宿舍楼，教室、办公室、宿舍都在同一楼内，东语系的连队分在35号楼，食堂则在德斋与才斋之间的原教职员工第一食堂。

从此，工农兵学员便对大学担负起“上、管、改”的“历史使命”。

而老教授们仍然被当做“反动学术权威”，继续是被专政的对象。

东语系马坚教授，被安排打扫35楼的卫生，还分给他一个任务，要为每个房间“配”钥匙。这座楼因为管理松弛，许多房间的原有机匙都丢失了，而备用的机匙被杂乱无序地放在一个脸盆里，不知道哪一把机匙能开哪一个房间的机。马坚先生的任务，就是端着脸盆，一个房间一个房间，一把机匙一把机匙地试验。每打开一个房间，他就很高兴地用纸包起来，标上房间的号码。这样子干了几天，终于把全楼的机匙“配”完了。

工农兵学员上课了，老教授自然没有资格上讲台。马坚的任务，是分发报纸，打上下课的铃。马坚先生风趣地对一位学生说：“我打

一次铃，就是好几块钱。” [35]

季羨林自然也遭受着同样的命运。他的任务是当门房、看电话、分发信件。只能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

工农兵学员在上、管、改的过程中，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这是北大、清华的招生试点报告中早已写明了的。为了配合阶级斗争的主课，他们开始进行各种形式的“阶级教育”，其中“忆苦思甜”是一个重要内容。

东语系的工宣队领导从农村的一个生产队弄来了谷糠，做成糠窝窝头，给老教授和其他师生每人发一个，这是“忆苦饭”，再蒸一些糖三角，每人发一个，这是“思甜饭”。工宣队规定，要先吃糠窝窝头，后吃糖三角，才算完成“忆苦思甜”的全过程。这样的集体活动不能请假，平时不吃食堂在家吃饭的教师也必须参加，少数民族也不例外。季羨林和马坚这些老教授也要参加。对这样的苦，季羨林并不觉得什么，它比在德国饥饿地狱中什么都吃不到要强多了。可马坚先生吃了两口糠窝头，觉得实在难以咽下去，就心生一计，掰开糖三角，用糠窝头蘸着糖吃。不巧立即被人发现，被当场进行现场批判，还被勒令写书面检查。马坚先生在第二天贴出的书面检查是：

昨天我没有先吃糠窝窝，后吃糖三角，而是一起吃了，这不符合工宣队的要求，因此我作检查。

人老心红战斗队，67岁队员马坚[36]

“文革”中，各种“战斗队”在北大纷纷成立，但是属于“批斗”对象的“学术权威”，没有一个“战斗队”敢要，有人给他们出主意，让他们自己也成立一个战斗队，名字就叫“人老心红”，想不到本是一句开玩笑的话，真被马坚先生用在写的书面检查上了。马坚先生之幽默，于此可见一斑。

事后，一位工农兵学员告诉李振中先生，说他们也咽不下糠窝窝，但他们非常机灵，没有掰开蘸糖吃，而是手疾眼快地把它装进口袋，或偷偷塞进书包，带回宿舍楼扔掉了。[37]

从那时起，老实人已经被无情地耍弄了。

2. “文化沙漠”在扩大

1971年8月13日，这对教育界来说，是一个十分恐怖的日子。

在这一天，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而形成的一个文件《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向全国传达，该文件对建国以后至“文化革命”以前这十七年间的教育工作，作了两个估计：一是整个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十七年的教育是“黑线专政”，二是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件认为，资产阶级统治了整个教育领域，他们统治学校的精神支柱，就是“天才教学”、“智育第一”、“洋奴哲学”、“知识私有”、“个人奋斗”。

对这样一个以中央名义下发的文件，高校师生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反对者对这“两个估计”，纷纷表示不理解、想不通，并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抵制，但胳膊拧不过大腿，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批“黑线专政”的新高潮。

这之后不久，9月13日，林彪反革命集团反革命政变的阴谋被粉碎，林彪等人驾三叉戟飞机出逃，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

林彪死后，林彪的一些基本观点本应受到批判，但是，由“四人帮”控制的“批林整风”运动，并没有真正批判林彪，肃清林彪的余毒，而是将批林与批孔结合起来，把矛头进一步指向广大知识分子。

1972年，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科教组提交了一份《关于高等学校试办补习班的报告》，认为北京市十一所学校招收的工农兵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20%，初中程度的占60%，相当于小学程度的占20%，因此，要求市属各高校按照工农兵学员的实际文化程度和专业的不同要求，有重点地为他们补习半年左

右的文化基础知识，补习时间不计入学制之内。这之后，教育界也有人提出：当时教育质量过低，“工农兵学员不像大学生”，教育革命是“乱、糟、低”，把“两个估计”看做是压在知识分子身上的包袱，是林彪极“左”路线的产物。

这些正确意见被“四人帮”指斥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复辟”、“回潮”，是“认识模糊”、“思想混乱”，是“攻击”教育革命，因此要求继续批判林彪的极右。[38]

事情的进一步发展，是张铁生的一份“白卷”所掀起的一场大风浪。

张铁生原为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生产队队长。在1973年春天，辽宁省高等学校入学文化考核时，物理化学为一张试卷，他不会做题，便在试卷背面写了一封信，说为了实现自幼上大学的理想，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学考试中，能对他这个小队长加以照顾，实际希望对他“开后门”。

此事本属违法行为，因为早在1972年5月1日，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批评了各地的“走后门”现象。张铁生此信用意显然是希望“走后门”，本应查处，但身为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的毛远新却将原信作了删改，指令《辽宁日报》加按语发表，按语说：张铁生“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从此，《人民日报》、《红旗》、《文汇报》、《教育革命通讯》等报刊，相继发表文章和评论，把必须的文化考核说成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这样，在全国范围内，由“四人帮”煽起了一股彻底否定文化学习的歪风，树立起一个“闹而优则仕”的坏典型。张铁生进了铁岭农学院，担任了学院的领导职务，入了党，当上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39]

这之后，闹开了考大学教授的丑剧。一大批老教授被强行推进考

场，接受由“四人帮”派人拟定的专治老教授、出老教授洋相的题，从此，老教授们便成了“韭菜麦苗不分”，什么也不懂的“白卷”教授。

在“四人帮”掀起的一阵阵喧闹声中，迟群和毛远新把这场闹剧推向新的高峰。迟群叫嚷：要坚决批判因循守旧，要打破那些老规矩，对文化大革命前的大学毕业生，做了一个结论：这些学生“基本上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了破坏作用”。毛远新则让新的大学生“光懂得农村两条路线斗争不行，还得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并对最神圣的教育殿堂高等学府，做出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结论：“大学就是大家来学。” [40]

就这样，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大学”的范围，扩大到“大家”都来学，全国都是“大学”了，而文化沙漠也就扩大到全国了。

这一段时间，真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文化教育上最不堪忍受的不幸！

3. 二月兰笑对春风的启示

腊月三十，饺子没有吃上，在延庆的北大师生们接到命令，坐上汽车赶回了北京。到了北京，已是正月初一凌晨了，而公历则是1970年2月6日。

季羨林也随大队人马回到了燕园。

回到燕园，季羨林仿佛回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为人们所深深喜爱的花草树木，再也不能见到了。他是多么怀念这些美好的花木啊！他真希望有灵魂，如果花木也有灵魂的话，这灵魂就决不会离开本是美丽的燕园。在月白风清之夜，它们会流连于未名湖畔的湖光塔影之中，如果这些灵魂能回忆，那么它们回忆的丝缕无疑会挂在未名湖上空。季羨林面对着燕园的惨象，就像面对一只本来是美丽的孔雀，突然间羽毛全部脱落，变成了一只丑小鸭。他只得叹息自己不是活神

仙，起死无方，回生乏术。它们消逝了，永远消逝了。他想到了一句戏词：“要相会，除非是梦里团圆。” [41]

但是，有一种花居然逃过“四人帮”的魔掌，存活下来了。这种花叫“二月兰”。

这是一种常见的野花，花朵不大，紫白相间。二月兰是其俗名，本名叫“葎菜”，又名“菲”，《植物名实图考》中称为“诸葛菜”，属十字花科，一年生草本，叶子呈羽状分裂，初夏开花，角果四棱柱形，其叶子可食，种子榨油也可食用。

这本是一种不起眼的小植物，季羨林在燕园住了那么多年，起初并没有特别注意到这种小花，名花名木多的是，足够他欣赏的。

在大批修正主义的年月里，歪风狂吹，北大师生常被命令出来打扫卫生。每次打扫卫生，13公寓的居民都被召唤出来拔草，不是“绿化”，而是“黄化”，为此，季羨林每次都在心中暗恨楼西的这片小山上野草之多。

拔来拔去，二月兰却并没有被拔光。

季羨林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自己开始注意小土山上的二月兰。二月兰开花大概也有小年大年之分，小年时，小山前后稀疏地开上那么几片，大年时，山前山后开成一大片，仿佛发了狂。二月兰这一发狂、发怒，仿佛从土地深处吸来一股原始力量，一定要把花开遍大千世界，紫气直冲云霄，连宇宙都仿佛变成紫色的了。这时，季羨林眼光所到之处，无不有二月兰在：宅旁、篱下、林中、山头、土坡、湖边，只要有空隙的地方，都是一团紫气，间以白雾，小花开得淋漓尽致，气势非凡，紫气直冲云霄，连宇宙都仿佛真的变成紫色的了。他在慨叹二月兰的神奇。

东坡的词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但是花们好像是没有什么悲欢离合，应该开时，它们就开；该消失时，它们就消失。它们是“纵浪大化中”，一切顺其自然，自己无所谓悲与喜。我的二月兰就是这个样子。

然而，人这个万物之灵却偏偏有了感情，有了感情就有了悲欢。这真是多此一举，然而没有法子。人自己多情，又把情移到花，“泪眼问花花不语”，花当然“不语”了，如果花真“语”起来，岂不吓坏了人！这些道理我十分明白。然而我仍然把自己的悲欢挂到了二月兰上。[42]

看着眼前的弱小生命在蔓延、扩大，季羨林想起了自己的命运，也正是在初夏二月兰开花之时，自己被管制劳动改造，日子实在非常难过。他知道，正义是在自己手中，可是是非颠倒，人妖难分，连自己最得意的弟子也起而反对自己，他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答，一腔义愤，满腹委屈，毫无人生之趣。而二月兰却是不屈不挠地抗争着，世事沧桑，一切如浮云。他也想学二月兰，以不变应万变，然而办不到。他在这段时间内，是“不可接触者”，几年间没收到一封信，很少有人敢同他打招呼，感到自己虽处人世，实为异类。他看到，就是在砖瓦缝里，二月兰也依然在开放，怡然自得，笑对春风，好像是在嘲笑自己。

他问这二月兰，到底应该如何面对人生？怎样才能度过眼前的难关？

二月兰沉默不语，兀自万朵怒放，笑对春风，紫气直冲霄汉。

是的，二月兰怎么会回答呢？这弱小的植物只是一种生命，她没有思维，没有意识，没有语言表达能力，怎么会回答呢？

二月兰不会回答，但是她会万朵怒放，笑对春风。这已经是作出了回答，二月兰笑对春风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启示，那就是要以不变应万变，要找回失掉的笑，要恢复中断了几年的“闲不住的习惯”，思考点什么，写点什么。

这时，他嘴里往往低声念着雪莱的诗：

既然冬天到了，

春天还会远吗？

4. 恢复“闲不住”的习惯

二月兰笑对春风，使季羨林看到了希望。

原先，在最难熬的年月，包括在延庆农村时，季羨林的希望确实不多，他常常想：自己这一生算是玩完了，将来到一个农村，或是一个什么地方，去劳动改造，以了此一生吧！对于自己的国家，他没有完全绝望，他眼前还有点光明，他痴心妄想，觉得这样一个民族绝不会就这样堕落下去。想到这里，他觉得自己也不应该觉得“玩完了”，而是要振作起来。

真要振作，谈何容易！谈何容易！

真要振作，首先是恢复中断了几年的“闲不住”的习惯。他在过去几十年来的生活中，养成了一个闲不住的习惯，就是读书和写作的闲不住，不管好坏，总要思考点什么，写点什么，决不让自己的脑筋投闲置散。在德国十年，写日记没有一天中断，集以时日，竟有一两百万字。[43]但是，在“四人帮”统治时期，能思考什么，又能写些什么呢？

创作已经毫无可能，研究也早已断了念头。想来想去，还是搞点翻译吧。翻译了而能出版，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我连想也没有去想。既然为翻译而翻译，为了满足自己那闲不住的习惯而找点活干，最好能选一种比较难的、相当长的、能旷日持久地干下去的书来翻译，这样可以避免由于经常考虑这个问题而产生的困难尴尬的局面。我过去翻译过几本印度古典文学名著，曾被某一些“左”得幼稚可笑而又确实“天真”的人们称作“黑货”与“毒品”。现在再选择也出不了这个范围。我反正也不想出版，“黑货”就“黑货”、“毒品”就“毒品”吧。结果我就选中了《罗摩衍那》。[44]

这是在1973年。下定了决心，季羨林就开始行动了。而当时是在什么处境下开始的工作，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当时，“四人帮”还在台上，耀武扬威，飞扬跋扈，“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我虽然不再被“打倒在地，身上踏上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但处境也并不美妙。我处在被打倒与不被打倒之间，身上还背着不知多少黑锅。国家的前途，不甚了了；个人的未来，也可以说是，在我的心灵深处，还有那么一点微弱但极诱人的光芒，熠熠地照亮了我眼前的黑暗，支撑着我，使我不至完全丧失信心，走上绝路。其间差距，也不过一头发丝宽。现在回想起来，还不寒而栗。我曾相信，这光芒自己一生恐怕很难看到它来到我面前了。我的归宿大概是到一个什么边疆地区或者农村，去接受一辈子“再教育”。我当时对自己的前途只能看到这一点。一切别的想法，都是非分的、狂妄的、不应该的。我当时过的日子，也完全同我的心情相适应。一个月有几天要到东语系办公室和学生所在的楼中去值班，任务是收发信件，传呼电话，保卫门户，注意来人。我当时几乎成为一个“不可接触者”，出出进进的人很多，但多半都不认识，我坐在那里也等于尸位素餐，对保卫门户，起不了什么作用。不过我仍然准时上班，安心工作，习以为常，并无怨言。我想，这样平平静静地活下去，无风无浪，也还是很惬意的。[45]

在这样的处境之下，翻译《罗摩衍那》，无异于没事找事，其危险性是可想而知的。

这部《罗摩衍那》史诗的梵文原本，在国内只有旧版本。他不知从哪里听到一个消息，说印度新出了一部精校本，是继《摩诃婆罗多》精校本之后的另一个伟大成就，颇受国际梵学界的好评，但此书国内没有。季羡林于是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和试一试的想法，托东语系图书馆的人向印度订购。他预料，90%是订不到的，即使订到，也要拖上一年二年。好在那时候时间对他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一年二年就一年二年吧。可出他意料的是，没过几个月，书居然寄来了，装订精美的七大本，就那么整整齐齐地排在那里，他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一时吃惊得说不出话来，呆呆地看着这七大本书出

神。

季羨林于是决心认真地进行翻译，他濡笔铺纸地干了起来。中国佛经中有很多都提到过《罗摩衍那》这部书和书中的故事，但翻译了那么多佛典，却一直没有人把这部书翻译成中文，而国外已有了那么多外文译本，因此，季羨林觉得翻译这部书成了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这时，在他眼前和内心深处的那一点遥远的光芒也起了作用，在无形中督促着他，虽然渺茫，但又具体，给他增添了力量。

在家中的时间是有限的，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他要贡献给发信件、守电话、当门房，在东语系外文楼和 35 号楼学生宿舍值班。由于《罗摩衍那》在当时属于“毒品”范围，他就不能也不敢把原著带到值班的地方。“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季羨林就利用在家的时间，每天把一小段原文抄在一张张的小纸条上，上班干活之余，反复思考构思，打腹稿，如果眼前没有人，再偷偷地写下译成的腹稿，下班后再回家赶紧用中文抄写下来。

季羨林原来以为，该书原文除了个别章节外，是不会太难懂的，虽然量极大，翻译起来会遇到困难，可也不会太多。

一着手翻译，季羨林立即遇到了难题。原文是诗体，他坚持一开始就定下的原则，译文也保持诗体，不能改译为散文体。但是，要什么样的诗体呢？流行的白话诗，没有定于一尊的体裁或格律，诗人是各行其是的，所以所有的形式都不恰当。所谓马雅可夫斯基阶梯体，与此巨著风格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根本用不上。而如果纯用旧体诗来译，也有困难，既不能做到“信”，又不能保证让读者看得懂。经过反复考虑，季羨林终于决定用顺口溜的民歌体，每行字数不要相差太多，押大体上能够上口的韵。

真要让译文押韵，就又来了困难。因为有时候想找到一个适当的韵脚，并非轻而易举之事。他坐在门房里，眼看着来来往往陌生的面孔，脑子里却想着韵脚。下班时回家的路上，也在考虑韵脚。从外文楼回 13 公寓，平常只需要十分钟，而为求韵脚，下班要走四十分钟

才能到家，路上，他仍搜索枯肠，寻求韵脚，以此为乐事。

就这样，季羨林闯过了第一道难关。紧接着又来了另一个极难解决的问题：译多少篇？用多少时间呢？他在心里琢磨开了：这部按出版社的计算方法有三百万字的巨著，自己能译完吗？最后，他想：如果能译出三篇，还不到全书的一半，也就很不错了，也就很满意，可以不虚度下半辈子了。

想法一旦确定，他就给自己规定了每天的定额，今天一张纸条，明天纸条一张，一行一行地译，一节一节地抄。

这个样子进行翻译，世上没有。他从1973年干到1976年，苦干了四年，全书七篇，他译了还不到三篇，还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然而此时天日重明，乾坤朗朗，振作了全国人民的精神，也振作了他的精神。

接下去，他不仅把翻译工作继续下去，而且由于条件已变好，他还找回了失去的笑。

5. 找回失去的笑

1976年，是不平凡的一年。

1月8日，周恩来逝世。

7月6日，朱德逝世。

7月28日，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损失惨重。在此前后，还有5月云南、8月四川的强烈地震。

9月9日，毛泽东逝世，终年八十三岁。

10月6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这时，从前在季羨林眼前那一点遥远的光芒，此时陡然闪耀起来，而且距离他也越来越近起来。但是，这时候，季羨林并没有想到要修改自己的翻译计划，仍然没有立下翻译完全书的雄心大志，会不

会有人给出版，是主要原因。后来，计划有了改变。

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们，不知从什么人那里听说我正在翻译《罗摩衍那》，告诉我，他们准备出版这部书。这是我以前绝对没有想到的。我上面已经说过，我之所以翻译，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那种闲不住的习惯。古人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我并不认为翻译《罗摩衍那》完全无益，但是我的想法却与古人微有相似之处。现在一旦能有出版的机会，自然是喜出望外，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从这时候起，我才认真考虑这一件工作。此时，我的心情好得多了。但也并非完全清醒，我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仍然模糊，我还不了解它那空前的危害性，对粉碎“四人帮”这一件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事我还不完全了解它的重要性。不管怎样，国家光明的前途，我看到了；个人的未来，我也看清楚了。渺茫之感，一扫而空。身上那一些莫名其妙的黑锅，不知怎么一来，全都揭掉了。我已经失掉当“活靶子”的资格。大家可以想象，我失掉这个“资格”，决不会感到惋惜与遗憾。就在这样的心情下，我开始修改我的翻译计划，决心把全书译完。至于能不能译完，究竟能译完几篇，我还不完全清楚。无论如何，雄心已经大了起来，那一个只翻译三篇的计划终于放弃了。[46]

从这时起，季羨林的一些朋友，不管是熟的见过面的，还是没有见过面的，听说他正在翻译这部巨著，都给他写了信，表示鼓励。在“文革”期间，他只在初期收到过一些“砸烂狗头”一类的信，其余几乎有五六年时间，一封信都没有收到过。他已经变得不惯于收信，收到信有一种不知所措之感。因此，对一般人来说，收到信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本用不着大惊小怪，而对他这样“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人来说，却不是这样。他此时能收到有这么多鼓励性的信，使他有受宠若惊之感，这些信起了双倍鼓舞作用，它推动着他前进。

更为难得的是，政治上的气氛越来越轻松了。这种感觉在碰到那位失掉笑变得有点痴呆的老革命冯定后，就更为明显了。

经过了一番风雨，燕园里又出现了阳光，全中国也出现了阳光。记得是在一个座谈会上，我同这一位革命老前辈又见面了。他头发又白了很多，脸上皱纹也增添了不少，走路显得异常困难，说话声音很低。才几年的工夫，他好像老了二十年。我的心情很沉重；但是同时又很愉快。我发现他脸上又有了笑容，他又把笑找回来了。在谈到兴会淋漓的时候，他大笑起来，虽然声音较低，但毕竟是爽朗的笑声。这样的笑声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了。乍听之下，有如钧天妙乐，滋润着我的心灵，温暖着我的耳朵，怡悦着我的眼睛，激动着我的四肢。我觉得，这爽朗的笑声，就像骀荡的春风一样，又仿佛吹遍了整个燕园，响彻了整个燕园。我仿佛还听到它响彻了高山、密林、通都、大邑、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响彻了整个祖国大地，而且看样子还要永远响下去。[47]

事实上，岂止是在这位老革命脸上，在很多人脸上，他都看到了笑容，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妇女、儿童，无一例外。这时，季羨林感到，把笑失掉，是不容易的，把笑重新找回来，就更困难。他相信，一个在沧海中失掉笑的人，决不能做任何事情。他也相信，一个曾经沧海又把笑找回来的人，即能胜任任何艰巨的事情。一个很多人失掉了笑，而只有一小撮人能笑的民族，决不能长久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有能笑、会笑、敢笑，失掉了笑又能重新把笑找回来的民族，才能创建宏伟的事业，才能在短期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才能阔步前进，建成社会主义，最终达到人类大同之域。

这时，季羨林才发现，自己原来也和这位老革命一样，把失掉的笑找回来了。

季羨林带着笑容，重新投入到翻译《罗摩衍那》的工作中。

第十章 燕园春秋（三）

一、北京大学副校长的宝座

1. 灾难终于结束

1976年10月，北京各高校中热闹非凡，长期以来被“四人帮”小爪牙迟群之流控制的北京大学，更是兴奋的热浪一个接着一个，师生们深受“四人帮”之害，现在终于从禁锢中被解放出来了。他们兴奋地与全国人民一起举行集会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愤怒声讨“四人帮”的滔天罪行。

深受迫害的老教授们，更感到获得一次精神的大解放。这对他们来说自然为平生一件大快事，人人心里非常欣喜。

1976年11月，《光明日报》开始揭发批判张春桥在1975年11月8日抛出的“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的谬论，指出其实质“是宣扬取消智育、鼓吹读书无用论、混淆智育和‘智育第一’两个不同的概念”，“是要劳动人民永远成为愚昧无知的奴隶”。[1]这之后，“四人帮”在教育战线所犯下的罪行逐步得到批判。到这时，老教师们才真正舒了一口气，感到精神上真正得到解放了。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大会庄严宣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期。

8月4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8日发表讲话《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他宣布：“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他特别提出对“文革”前十七年的估计问题，认为“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现在差不多

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 [2] 9月19日，邓小平进一步指出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 [3] 从此，知识分子们终于卸掉了背了好几年的“两个估计”的沉重包袱。

1978年3月7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恢复和提升职务问题的请示报告》，决定原来确定和提升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一律有效，恢复职称，并规定可以越级（即后来的破格）提升教授、副教授，将提升教授的审批权限改为由省、市、自治区批准，报教育部备案。在此之后，各高等院校原有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都恢复了职称。

知识分子们又听到了长达12年久违了的“教授”这个神圣字眼。也就在此时，季羨林恢复了一级教授的职称，享受到了中断12年的高级知识分子待遇。

这一年的7月下旬，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研究生培养工作会议，明确了培养研究生在实现新时期总任务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讨论了研究生培养工作，决定在本年恢复研究生的招生工作，学制试行二、三、四年制并行的办法。从此，中断了十几年的研究生高层教育也得到了恢复。

这时候，季羨林回头看了一下自己这“文革”中的十年，从1967年到1977年，在长达十一年的时间内，竟然一篇东西都没有写。

我真是震惊不已。至于为什么成为这个样子，大家心里都明白，用不着多说。我一个人如此，全国又不知道有多少成千上万的人也是如此。想到这里，所谓“文化大革命”究竟产生了多么严重的后果，不是清清楚楚了吗？我又有点后怕，又有点不寒而栗。如果真正让

“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搞一次，一次搞上七八年，搞的结果恐怕要把全国知识分子的知识都搞成光板。卫星上不了天，是可以肯定的；所谓“红旗落地”，是否还有红旗都是值得怀疑的，还谈得上什么落地不落地呢？[4]

季羡林这才意识到，十几年没有发表东西，现在到了结束的时候了。从此，他的散文创作激情和学术研究的兴趣，一下子又萌发出来了。

2. 春归燕园

虽然是 1978 年的深秋，但季羡林凭自己的直觉，感到知识分子的春天真正来临了。

他忽然想起了十几年前写《春满燕园》时的情景，有意再走一遍写《春满燕园》时走过的道路。

虽然眼前真正的季节是深秋，姹紫嫣红的景象早已绝迹，连“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夏天都已经过去，眼里看到的是黄叶满山，身上感受到的是西风劲吹，耳朵里听到的是长空雁唳。但是，走在这昔日走惯的曲径上，季羡林的心中却真真切切地溢满了春意。他无论如何也抑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了，信步绕未名湖走了一周。

他看到男女大孩子们在黄叶林中，湖水岸边，认真地读着书，重又听到了中断了十几年的琅琅读书声，在湖光塔影之中往复回荡着。

“文化大革命”中，湖光塔影、象牙塔，都被贴上荒谬绝伦的修正主义的标签，成为罪恶的象征，今天终于恢复了名誉，显得像雨后的鲜花那样，更加美丽动人。

此时，季羡林心想，“四人帮”真是性与人殊，凡是人间美好的东西，比如鲜花、湖水、美景等等，他们都憎恨，对文化也憎恨，这些憎恨有时简直令人难以理解。到 1976 年，晴天一声霹雳，“四人帮”垮台了，这一群人中败类终于成为人民的阶下囚，昔日炙手可热

的威风一扫而尽。真可谓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就是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四人帮”垮台之时，男女老少拍手称快，买酒相庆。那时正是深秋时分，据说北京城里卖螃蟹的人，把四个螃蟹用草绳拴在一起，三公一母。北京全城的酒，不管好坏，抢购一空。人人喜形于色，个个兴致勃勃。人心向背确实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

季羨林心旷神怡，不但想到中国，而且想到世界；不但想到今天，而且想到未来。

从1976年一直到1978年，是我国从不安定团结慢慢到安定团结的过程。对我自己来说，还不可能一下子改变，还有一些障碍需要清除。我正处在从反革命到革命，从非党员到党员，从非人民到人民，从非人到人的非常缓慢转变的过程中，一句话，是我摆脱中间状态的过程。“文化大革命”流行着一句话，叫做“重新做人”，意思是一个反革命分子、黑帮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等，等等，同旧我决裂变成新我，也可以说是从坏人向好人转变，也可以叫做迷途知返吧。我现在感到自己确实是重新做人了，但并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含义，而是我自己理解的含义。从不可接触者转变为可以接触者，从非人转变为一个人，我觉察到，一切都在急剧地变化着，过去的作威作福者下了台；过去的受压者抬起了头，人们对我的态度也从凉到炎。但也有过去打砸抢的所谓“革命小将”，摇身一变，成了革命的接班人，我暗暗捏一把汗。[5]

季羨林真实地感觉到，解放以后，中国人民有过不少乐事，但像“四人帮”倒台时的快乐，他还没有经历过。虽然没有哪一个领导人曾对他说明“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从整个社会的气氛上，从人们对他的态度上，从人们逐渐有的笑容上，他感到自己的地位有点变了，那种“中间状态”逐渐有所改变，或者正在改变之中。

就这样，季羨林一边想着，一边走着。

我走呀，走呀，大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之慨。我眼前的秋天一下子变为春天，“霜叶红于二月花”，大地春意

盎然。我抑制不住，我要歌唱，我要高呼，我要跳跃，我要尽情地歌颂春天了。〔6〕

他心里最为高兴的是，又有了恣意歌颂春天的权利，歌颂学生学习的权利，歌颂一切美好东西的权利，总之一句话，一个正常的人的权利。季羨林内心里充满了幸福，诗一般美丽的语言，顺着他饱蘸激情的笔尖流淌下来：

春天终于来临了。美丽的燕园又焕发出青春的光辉。我在这里终于又听到了琅琅的书声。而且在这琅琅的书声中我还听到了十多年前没有听到的东西，听到了一些崭新的东西。在这平凡的书声中我听到的难道不就是千军万马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脚步声吗？我听到的难道不就是向科学技术高峰艰苦而又乐观的攀登声吗？我听到的难道不就是那美好的理想的社会向前行进的开路声吗？我听到的难道不就是我们的青年一代内心深处的声音吗？不就是春天的声音吗？

眼前，就物候来说，不但已经不是春天，而且也已经不是夏天；眼前是西风劲吹、落叶辞树的深秋天气。“悲哉，秋之为气也”，眼前是古代诗人高呼“悲哉”的时候。然而在这春之声大合唱中，在我们燕园里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在黄叶丛中，在红树枝下，我看到的却是阳春艳景，姹紫嫣红。这些男女大孩子一下子变成了巨大的花朵，一霎时开满了校园。连黄叶树顶上似乎也开出了碗口大的山茶花和木棉花。红红的一片，把碧空都映得通红。至于那些“霜叶红于二月花”的霜叶，真的变成了红艳的鲜花。整个的燕园变成了一座花山，一片花海。

春天又回到燕园来了啊！

而且这个春天还不限于燕园，也不限于北京，不限于中国。它伸向四海，通向五洲，弥漫全球，辉映大千。我站在这个小小的燕园里，仿佛能与全世界呼吸相通。我仿佛能够看到富士山的雪峰，听到恒河里的涛声，闻到牛津的花香，摸到纽约的摩天高楼。书声动大地，春色满寰中，这一个无所不在的春天把我们联到一起来了。它还

将不是一个短暂的春天。它将存在于繁花绽开的枝头，它将存在于映日接天的荷花上，它将存在于辽阔的万里霜天，它将存在于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严冬。一年四季，季季皆春。它是比春天更加春天的春天。它的踪迹将印在湖光塔影里，印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它将是一个真正的永恒的春天。[7]

这就是季羨林心中终于盼来了的那个春天，这几乎是一个永不凋谢的春天，春之脚步是永远不停止的，它留在每个人的心中，给人以温暖，给人以生的希望，活的热情，工作的奔放，劳动的忘我！这才是一个永恒的春！

3. 出任副校长

就在季羨林心中的那个春天到来之时，国务院下达了一个对季羨林的任命：季羨林为北京大学副校长！这也是在 1978 年的事。

这一任命对于季羨林来说是那么突然。对于他来说，三十二年前陈寅恪先生把他推荐给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先生，由胡适先生、傅斯年先生、汤用彤先生联合聘任他为北京大学教授、东语系系主任，他就够感到受宠若惊的了。三十多年来，他勤勤恳恳地工作，“文革”中又受了那么多委屈，饱经忧患，九死余生，突然又看到光明，看到阳关大道，刚刚感到自己中间状态逐渐有所改变，还没有完全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时，北京大学这座饮誉海内外的最高学府，又空出了一个副校长的宝座，留给了他——一个农民之子。

北京大学的校史，有人认为（比方说冯友兰先生）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对此，季羨林并不反对。这样一来，北京大学的校史就延伸了两千多年。但是，现在讲北京大学的历史，一般是从清朝末年的京师大学堂算起。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是张百熙，任命吴汝纶为总教习，相当于教务长，实际上是管业务的副校长，但吴汝纶没来得及到北京大学上任，就去世了。民国建立，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

严复为第一任校长，后来工科学长（相当于工学院院长）兼代校长，文科学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是夏锡祺。蔡元培在 1916 年出任北大校长之后，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蔡元培实行的是教授治校，兼容并包。兼容并包既为辜鸿铭、刘师培之类人物保留了地盘，也为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邓中夏等人物开辟了道路。后来，是胡适、蒋梦麟出任校长，在蒋梦麟离任期间，傅斯年任代理校长，汤用彤任过文学院院长。

解放后，马寅初、江隆基、陆平、周培源先后出任北大校长，汤用彤、翦伯赞、冯定等学术界的“大腕”出任过副校长。

在这样的一所大学里出任副校长意味着什么，该由有什么样学术贡献的人来出任，难道还不是十分清楚的吗？

三十多年了，季羨林回国以后惟一的工作岗位就是北京大学，除了短期出国访问，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它。北京大学像是一块大磁石吸引住了他的心，使他那记忆的丝缕永远挂在巍峨的红楼上面，挂在未名湖的湖光塔影上面，挂在燕园四时不同的景光上面：春天的桃杏藤萝，夏天的绿叶红荷，秋天的红叶黄花，冬天的青松瑞雪；甚至临湖轩的修篁，红湖岸边的古松，夜晚大图书馆的灯影，绿茵上飘动的琅琅书声，所有这一切，都无不挂着他那回忆的丝缕，他的生活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北京大学。

可这以前，季羨林是以一位教授和东语系系主任的身份，作为北京大学的一员的。而现在，他要以一名副校长的身份，成为北京大学的一员了。

他开始履行副校长的职责了。

有一天晚上，他已经躺下了，电话铃响了。

“季副校长，我们这楼停水了。”“我家里也没水。”“那请你赶快反映反映吧！”

“行行行！”

谁让他没有架子呢？别人什么都愿意找他。

有人在他的桌上发现过这样的纸条：“学生开饭时间有十一点一刻，十一点半，十一点三刻三个方案，据学生反映，倘十一点一刻开饭，晚下课晚去就吃不上好菜……”

这是这位一级教授亲笔记下，准备在校长办公会议上发言用的。他生气地感慨道：“就一个熄灯打铃的问题，讨论了几年还没有解决。” [8]

一个严谨的学者，在严谨地履行着副校长的神圣职责。

4. 忙里偷闲著华章

自从担任了北京大学副校长之职以后，各种虚实职务相继不期而至，东语系主任、南亚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第二届至第五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任着大大小小几十种辞也辞不掉的职务。而且，还因为他作为语言学家、民族学家、作家、翻译家、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涉猎的范围那么广泛，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语言所、宗教所、文学所、外文所、考古所、历史所、南亚所、亚太所、以及各大学的外国语言文学系，中国语言文学系，都与他的工作有密切的关系，不时地有人向他请教，以至找他的人得挂号，排队，他的时间排得是那么满，远到一年内国内各地开的各种会议，近到一周内校、系两级的各项工作，他都要兼顾到。他的时间太宝贵了，只有清晨四点到七点多钟，这三个多小时是属于他的，可以集中搞一点学术研究，其他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全被各种各样的公务和接待工作挤占了。刚刚恢复了的闲不住的习惯——写点什么、思考点什么，被无情地挤占了许多时间，以至白天无法实现。

季羨林要写点散文之类的文章，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充分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了。

时间就是生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而且时间是一个常数，

对谁都一样，谁每天也不会多出一秒半秒。对我们研究学问的人来说，时间尤其珍贵，更要争分夺秒。但是各人的处境不同，对某一些人来说就有一个怎样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的问题。这个怪名词是我杜撰出来的。时间摸不着看不见，但确实是一个整体，哪里会有什么“边角废料”呢？这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平常我们做工作，如果一整天没有人和事来干扰，你可以从容濡笔，悠然怡然，再佐以龙井一杯，云烟三支，神情宛如神仙，整个时间都是你的，那就根本不存在什么“边角废料”问题。但是有多少人能有这种神仙福气呢？鲁钝如不佞者几十年来就做不到。建国以来，我搞了不知多少社会活动，参加了不知多少会，每天不知有多少人来找我，心烦意乱，啼笑皆非。回想十年浩劫期间，我成了“不可接触者”，除了蹲牛棚外，在家里也是门可罗雀。《罗摩衍那》译文八巨册就是那时候的产物。难道为了读书写文章就非变成“不可接触者”或者右派不行吗？浩劫一过，我又是门庭若市，而且参加各种各样的会，终日马不停蹄，我从前读过马雅可夫斯基的《开会迷》和张天翼的《华威先生》，觉得异常可笑，岂意自己现在就成了那一类人物，岂不大可哀哉！但是，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是能够想出办法来的。现在我既然没有完整的时间，就挖空心思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在会前、会后，甚至在会中，构思或动笔写文章。有不少会，讲话空话废话居多，传递的信息量却不大，态度欠端，话风不正，哼哼哈哈，不知所云，又佐之以“这个”、“那个”，间之以“俺”、“啊”，白白浪费精力，效果却是很少。在这时候，我往往只用一个耳朵或半个耳朵去听，就能兜住发言的全部信息量，而把剩下的一个耳朵或一个半耳朵全部关闭，把精力集中到脑海里，构思，写文章。当然，在飞机上，火车上，汽车上，甚至自行车上，特别是在步行的时候，我脑海里更是思考不停。这就是我所说的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积之既久，养成“恶”习，只要在会场一坐，一闻会味，心花怒放，奇思妙想，联翩飞来；“天才火花”，闪烁不停；此时文思如万斛泉涌，在鼓掌声

中，一篇短文即可写成，还耽误不了鼓掌。倘多日不开会，则脑海活动，似将停止，“江郎”仿佛“才尽”。此时我反而期望开会了。这真叫做没有办法子。[9]

这种事，本来是秘而不宣的，但是时间长了，也就难免泄露了。

这个秘密被细心的张学书发现了。张学书一直在校部担任领导职务，从北京大学团委书记当到副校长。季羨林 1962 年搬到 13 公寓，张学书 1963 年搬进去，正好住在季羨林楼上，两家做邻居已经三十多年了。他们相处得很好，是睦邻友好的典型。张学书比季羨林小 13 岁，家里人叫季羨林为季爷爷，叫季夫人为季奶奶，也管季羨林的婶母叫老祖。从季羨林当了副校长之后，他们俩人就常在一起开会。张学书发现，季羨林对长而内容空泛的会议不大感兴趣，但是有时却从口袋里随手掏出一张小纸片，在写着什么，张学书以为他对不感兴趣的会还做笔记，但过几天一篇散文发表了，这才发现他是在开会时“一心二用”，利用这时间的“边角废料”构思文章，先在张纸片上写好了提纲，回到家里，一写一抄，一篇优美的散文便呵呼出来了。

不仅在开会时，在上下班的路上，偶尔散步的时候，他也经常在思考问题，打着腹稿。走着路，他会忽然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小纸片，记上几句。在等公共汽车时，他也会在小报的空白处写写画画。这些常人不会利用的时间经季羨林这么一利用，回家再稍一加工，便点墨成金，成为脍炙人口的优美华章了。

当然这样写出来的“华章”大多是小品、随笔、书评、散文之类的作品，而这期间大部头的学术著作，还是利用清晨的那三个多小时，不过这是后话了。

5. 仍是普通人

因为看到季羨林社会活动多、兼职多，来访客人又连续不断，占

用了他大量时间，因此邻居张学书在与他聊天时脱口而出地说了一句：“干脆来个关门大吉。”意思是客人来时干脆不予理睬，让他们吃闭门羹。季羨林回答了简短的一句话，但却含有两层意思：“做不到”，“那样也不好。”

所谓做不到，应该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季羨林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普通人，他最看不起那些官不大、僚不小的“架子老爷”。他曾意味深长地说：

我最讨厌人摆官架子，然而偏偏有人爱摆。这是一种极端的低级趣味的表现。我的政策是：先礼后兵。不管你是多么大的官，初见面时，我总是彬彬有礼。如果你对我稍摆官谱，从此我就不再理你。见了面也不打招呼。知识分子一向是又臭又硬的，反正我决不想往上爬，我完全无求于你，你对我绝对无可奈何。官架子是抬轿子的人抬出来的。如果没有人抬轿子，架子何来？因此我憎恶抬轿子者胜于坐轿子者。如果有人说这是狂狷，我也只当秋风过耳边。[10]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有的人一出名，就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全世界都应该被踩在脚下，于是想方设法为自己和普通人拉大距离，为此甚至不惜在自家门上贴上来访者禁戒：什么时候不能拜访，什么样的人不能拜访，……季羨林最看不起这样的人，因此说自己做不到。

所谓那样也不好，是说季羨林从来没把自己划在平凡人之外，认为自己是个平凡人，自己的经历属于平凡人的平凡的经历。他喜欢与普通人接触，往往能从学生甚至来访者身上发现值得学习的地方，所以，他从来不把人拒之门外。熟悉季羨林的人都知道他忙，所以都不愿意打扰他，浪费他那宝贵的时间，有非找他不可的事，也预先和他约好，排队挂号，在约定的时间去拜访他。但是有人却不顾这些，也有一些从远方来的拜访者，黑龙江的，广东的，觉得反正季羨林没有架子，所以就硬往季羨林家里闯，什么气功师，武术师，名人崇拜狂，都去找他，其中不乏动机不纯者，季羨林也大多能宽厚地对待他

们，对他们晓之以理，讲一些应该持的科学态度。

有一次，一个武术师也闯进季羨林家里，硬要季羨林为他主编的一个武术杂志写篇东西，并出任顾问，季羨林一再向他解释，自己不懂武术，写不出这样的文章，但来人死缠着季羨林，弄得一点办法都没有，幸亏又有客人来，才算是解了围，武术师悻悻地走了。

季羨林还有一个小邻居，叫商金林，1983年三十四岁被分到13公寓这个“特区”去住。他是“小字辈”，所以要三家合住一套三居室的房子。搬进来的第二天，商金林在楼下见到季羨林和老伴彭德华。季羨林走过去和这位新邻居握手，笑着说：“我们做了邻居了。”商金林从他和蔼的表情里，看到了老学者对年轻人的慈爱和关怀。季羨林的夫人则称小商为“商同志”，问他的爱人在哪儿工作，娃娃几岁了，是用煤气罐还是用蜂窝煤？煤气罐在13公寓这一高级知识分子的特区已经普及，但新来的小字辈还要烧蜂窝煤，小商正在为买煤的事犯愁。季夫人告诉小商，她家虽有煤气罐，但为了用热水方便，还得生个煤火炉子，并说可以帮小商买煤。小商听着这浓重的山东口音，感到特别平易、亲切。季先生又问他，生炉子的技术好不好，说如果炉火灭了，可以到他家里夹烧着的煤，比现点火要省事些。

13公寓当时没有公用电话，商金林要打电话，要绕到校东门外的成府街去打，来回少说也得有二站地。有一次，小商匆匆下楼要去打电话，正好在楼门口遇到季羨林，知道他是出去打电话，连忙叫住他，叫他去自己家里打电话。打完电话，季羨林夫妇都说：“不用客气，要打电话就到我家来。”“要打电话尽可来。”这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和关怀，不仅帮小商解决了许多实际困难，给了他奋进的勇气，而且还从中懂得了做人的道理：人者仁也，仁是人之全德！

小商既然做了季羨林的邻居，他的朋友自然就常让他陪他们去见季羨林，这些朋友年长的六十多岁，年轻的只有二十多岁，都是晚辈。一听说有客人来了，季羨林连忙放下手头的工作，走出来相迎，

让座，泡茶，然后还拿出一个本子，请来客签名留念，笑盈盈的情态中，大有可以“偷得半日闲”的欢愉，客人们自然会感到从容不迫，自由而不拘谨。客人要走了，季羨林总是执意把他们送到门外，站在楼前的平地上目送客人远去。客人们自然地会与老人心灵的交融中，得到启迪、感悟，获得精神上的享受。[11]

季羨林以礼待人，热情迎送客人，连几乎天天见面的邻居也不例外。无论严寒酷暑，刮风下雨，概不例外。

季羨林平易近人，记忆力又好，学校里开车的司机，他都能叫上名字，每次司机送他回家，他都要向他们道谢，“谢谢，辛苦了”是他对司机们最常说的话。下车后，他待司机将车调头开动，挥手目送他们很远才回家。

在各种会议上，季羨林从来不抢先发言，或打断别人的发言。他总要耐心地听别人讲完，才慢条斯理地提出自己的意见。

和季羨林交往多的人不难发现，他和人站着谈话，总要保持一米左右的距离，垂手而立，这是有修养的人形成的一种很好的习惯，既有礼貌，又讲卫生。

每年春节，季羨林总是一大早就给邻居们拜年，个别时候邻居们如果先到他家拜了年，他都要想办法找时间回拜，他信守的原则是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季羨林由于待人诚恳，与人交往从不失礼，从而赢得了邻居和其他与他交往的人的交口称誉。[12]

6. 原则面前人人平等

和普通人交往，季羨林从来没有失礼的时候。但是，与亲朋好友交往，季羨林难免就有例外了。

这源于他对摆官架子的人的厌恶，更源于他对那些滥用手中的权力的人的厌恶。当有亲朋好友想利用他手中的权力时，他遵守的原则是：原则面前人人平等，能帮上忙的尽量帮忙，帮不上忙的，就不怕

得罪人，决不会拿原则做交易。

在这方面，有两个例子具有典型意义。

臧克家是季羨林从上世纪 40 年代就有密切交往的最好朋友之一。臧先生与夫人郑曼有一小女，名苏伊。1980 年代初，季羨林在副校长任上。苏伊因不习惯工厂车间的噪音，进厂半年，就得了高血压症。她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就由郑曼出面，想托季羨林把她安排在他主持的南亚研究所里，当一名职员。这样，换换环境，调节一下紧张的神经，还可以接触一下浓厚的文化气氛，正可谓两全其美。

季羨林听说了，马上约苏伊去谈话。

郑曼女士陪苏伊去见季羨林。见了面，季羨林问苏伊：“你读过《大唐西域记》没有？这可是南亚所的入门书，到我们所，都得先考这本书。”苏伊的学历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一个普通高中生，哪里会读过什么《大唐西域记》这样高深的学术著作？

郑曼和苏伊原以为季羨林只考一考一般常识，一听要考《大唐西域记》，俩人都傻了。回家后，赶紧从图书馆里借了一本《大唐西域记》来看，进行突击。那时，由季羨林主持的《大唐西域记校注》和《大唐西域记今译》还都没有出版，一个高中毕业生读古文原著，会碰上多少困难，自然是可想而知的。苏伊算是碰到了一个大难题。

过了一段时间，郑曼女士所在的工作单位人民出版社招考校对，苏伊报考，被录取。她在人民出版社干了一年校对，又被调往中国作家协会，派给她的父亲臧克家先生当秘书。这次苏伊没有去南亚所应考，她们母女认为季羨林按章办事，是完全应该的，这正是季羨林严守职责的高尚品格。季羨林的言语、行动、都是一是一，二是二，不拐弯抹角，不来什么客套，怎么想，就怎么说，[13]这使郑曼一家十分感动，永远铭怀。

这一件事，还不够典型吗？原则面前就连至友臧克家的小女，也不能得其后门而入。

另一件事，是为《宗白华全集》申报第二届国家图书奖一事，这

是在季羨林卸任副校长之后的 1995 年，但他办事讲原则，于此也可见一斑。

宗白华先生生于 1897 年，去世于 1986 年。他是中国现代著名的美学家，而早年又是著名诗人，有诗集《流云》流行于世，他和郭沫若、田汉三人探讨文艺和社会问题的信函被编辑成《三叶集》，以其特有的艺术品位震撼着文坛。后来，宗先生又致力于西方哲学和美学研究，先后开设的课程有美学、艺术论、形而上学、人生哲学、康德哲学、叔本华哲学、尼采哲学、歌德等，所出版的著作和译作有《美学散步》、《美学与意境》、《意境》、《判断力判断》（上）、

《欧洲现代画派论选》、《宗白华美学文学译文集》等，除去重复的，全部著作也不过四十多万字。

安徽教育出版社有志于出版《宗白华全集》，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宗先生属于“厚积薄发”一类人，文化积累很丰厚，但作品则寥若晨星。但安徽教育出版社不甘心只出这四十多万字的全集，便挖空心思，不惜人力、物力、精力，在宗先生的遗物中，在一大堆准备处理掉的“废纸堆”中，发现了他在 20 世纪 20 至 50 年代的一大批文稿和讲稿，从中整理出一百多万字的论著，分成四卷，于 1995 年正式出版。

安徽教育出版社的编审许振轩先生，在《宗白华全集》出版后，带着这四本书，到北大找季羨林，说《宗白华全集》拟申报第二届国家图书奖，请季羨林写封推荐信。

季羨林抚摩着这厚厚的四卷本《宗白华全集》，惊喜不已，忙说：“好，我给你们当啦啦队长。”

事有凑巧，第二天，季羨林接到新闻出版署打来的电话，请他出任第二届国家图书奖评委会副主任兼文学组组长。季羨林考虑到《宗白华全集》有可能放在文学组评审，有点为难了：已经答应给许振轩写推荐信，如果不写，有失信用。但是写呢，自己是文学组组长，写了推荐信不就等于定了调子，其他评委还怎么畅所欲言？考虑再三，

他还是决定“戒说”，不写推荐信，写了封收回承诺的信给许振轩。几天后，许振轩又去找季羨林，告诉他新闻出版署已将此书安排在社会科学组了，季羨林这才特地开夜车，写了满满三页纸的推荐信，肯定宗先生的美学思想应当重新研究，在中国美学史上的地位，应当重新评定，因为这部全集收有宗先生 60% 以上首次面世的著作，这些新面世的著作，在出版以前是鲜为人知的。从而肯定出版社出版其全集，堪称文坛佳话。对《宗白华全集》的态度，又一次证明了季羨林的原则性。

二、笔耕的快乐

1. 不凡的动机——要使人生更有价值和意义

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季羨林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社会上就曾经刮起过一阵讨论人生意义与价值的微风，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一些讨论文章，各种议论都有一些。当时，季羨林看过一些文章，但没有写文章参加讨论。他觉得有些文章简直是不知所云。而且，当时他认为这种空泛的讨论本身无意义，无价值，还不如实实在在地干几件事好。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季羨林已过“耳顺”之年，早已把“知天命”之年甩在脑后了。几十年的生活积累，使他对人生的种种相，众生的种种相，看得透透彻彻，鼓舞时有，叹息亦时有。在“文革”最艰难之时，他甚至悲观到极点，面对现实，有一种“远不如早一点离开人世这个是非之地，落一个耳根清静”的消极想法。但为时不久，他很快有所顿悟，觉得自己一生要做的事还很多。

他开始认真地思考人生。

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何在呢？

他从个人的观察中发现，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来说，人生一无

意义，二无价值。他们从来不去考虑人生这样严肃的哲学问题，所以只是徒有躯壳地活着，随波逐流者有之，投机取巧者有之。

这些人在走运时，手里攥满了钞票，白天两顿美食城，晚上一趟卡拉 OK，玩一点小权术，耍一点小聪明，甚至恣睢骄横，飞扬跋扈，昏昏沉沉，浑浑噩噩，等到钻入了骨灰盒，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活这一生。

不走运的时候，则穷困潦倒，终日为衣食奔波，愁眉苦脸，长吁短叹。即使有一些日子还能过得去的，不愁衣食，能得温饱，然而也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虽终日忙忙碌碌，然被困于名缰，被缚于利锁。这样的人，同样是浑浑噩噩，昏昏沉沉，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要活这一生。

这些人很自然属于芸芸众生之列，对他们来说，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从何谈起呢？

季羡林认为自己也属于芸芸众生之列，也难免浑浑噩噩，昏昏沉沉，并不比任何人高明出一丝一毫。但是，他又自认为与芸芸众生之流还有一点区别，那就是，他和另外一些人，对人生有一些想法，动过一点脑筋，而且自认这些想法是有点道理的。

我有些什么想法呢？话要说得远一点。当今世界上战火纷飞，人欲横流，“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是一个十分不安定的时代。但是，对于人类的前途，我始终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相信，不管还要经过多少艰难曲折，不管还要经历多少时间，人类总会越变越好的，人类大同之域决不会仅仅是一个空洞的理想。但是，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经过无数代人的共同努力。有如接力赛，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一段路程要跑。又如一条链子，是由许多环组成的，每一环从本身来看，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东西；但是没有这一点东西，链子就组不成。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我们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务，而且是绝非可有可无的。如果说人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这里。

但是，这个道理在人类社会中只有少数有识之士才能理解。鲁迅先生所称之“中国的脊梁”，指的就是这种人。对于那些肚子里吃满了肯德基、麦当劳、比萨饼，到头来终不过是浑浑噩噩的人来说，有如夏虫不足以与语冰，这些道理是没法谈的。他们无法理解自己对人类发展所应当承担的责任。[14]

总而言之，季羨林认为，如果人生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感。

可以说，这正是季羨林笔耕不辍的动机，也是他从笔耕中能得到快乐的原因之所在。

笔耕的意义，在于探索真理。季羨林认为，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追求真理、探索真理的历史，从事各种工作的人，都在自己的领域内追求真理，探索真理。而季羨林则在笔耕中追求真理、探索真理。他曾经说，自己少无大志，不但在中小学里没有立志成为学者，就是在大学，真正的学术论文也没有写成几篇，后来是阴差阳错才走上学术研究这条路的。一旦走上这条路，他却坚持不放。过去在极“左”思想黑云压城的时期，一个人搞学术，现成的帽子就会扣到头上：名利思想，修正主义。他回想自己搞了几十年的行政工作，至少有1/4的时间是泡在无穷无尽的会议中，消磨在花样繁多的社会活动中。但是他仍然坚持看书笔耕不辍，虽然一向被认为是智育第一，业务至上，连带他长期工作的东语系，也成了业务挂帅的典型，他却乐此不疲，坚持不改。

每一次政治运动来了，他首先检查业务至上的“修正主义”，被领导运动的人认为是抓到了点子上，顺利过关。但是检查完了，运动一过，他照样搞自己的“修正主义”：智育第一，业务至上。担心不担心会有下一次运动呢？当然担心，然而他对自己那一套检讨的本领很有信心，也可以说是“检讨有术”，抓自己的问题，一抓就灵，因此也就不过分担心。这样，他就成了一个“死不悔改”的顽固派，而且庆幸自己是一个顽固派。如果不是一个顽固派，而是一度检查之后

就真心悔改，同“修正主义”一刀两断，同“智育第一、业务至上”划清界限，那么到头来在科学研究上还能留下什么东西，就很值得怀疑了。所以，他觉得“死不悔改”的顽固派有时候也会有点好处的。

季羨林这样真诚地坦白了自己笔耕不辍的动机：

那么，我搞这一套东西是不是为名为利呢？说一点都没有，那不是事实。但是我再三检查自己的动机，觉得并不完全是那个样子。研究一个问题，提出一个假设，经过反复的验证，得到了自己认为满意的结论，虽然不过是小事情上的真理，自己却往往大喜过望，以为人生之乐无过于此矣。我之所以拼命钻研，老而不已，置危险于不顾，视饥饿如儿戏，不是为名为利，而是为了探索真理。我想，很多科学工作者恐怕也有同我一样的动力。[15]

他回头看从1967年到1977年，在长达十一年的时间内，竟然一篇东西都没有，真是有点后怕，有点不寒而栗。

决心已下，他不能再有空白。

2. 续译《罗摩衍那》

对于季羨林来说，“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他自己的一个最显著变化，就是翻译《罗摩衍那》再也不用偷偷摸摸进行，不用担心会被当做“毒品”来对待了。这样一来，翻译的速度自然而然也就加快了。

在从事翻译《罗摩衍那》的第八个年头，一个意外的惊喜明白无误地摆在了季羨林面前：印刷精美、装订富丽的《罗摩衍那》汉译本第一篇被他真实地抓在了手中，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80年出版的。他心里自然感到非常喜悦，那种心情不亚于一个孕妇看到自己生产出的第一个婴儿。

在第一篇出版之后，季羨林在1980年夏天应邀去日本访问，随身带去了几本，送给对此书有兴趣的日本朋友，也征求他们的批评意见。东京大学著名梵文学者原实教授、汤山明博士等人，都表示出很

大的兴趣。

《罗摩衍那》汉译本第一篇的出版，使季羡林得到一些不期而获的嘉奖，这使他更加鼓足了干劲。

但是，与此同时，季羡林的行政工作和社会工作也越来越多，究竟有多少个兼职，包括挂名的在内，他自己已经弄不清楚。有人大致给他算了一下，大概当时已有五十多个。加之这时他给自己规定的科研项目也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同他在一起工作过二三十年的一些熟人，看到他的一些科研选题，都有些吃惊，感到莫名其妙。

会也越来越多，以至五花八门，不计其数。有一次，他的老友诗人冯至先生，套用了李后主的词，随口吟出了“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季羡林听后，捧腹大笑，感到实获己心！[16]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季羡林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一点也没有放松《罗摩衍那》的翻译工作。从1973年到1983年2月，历十年风雨，呕十载心血，这一部长达两万颂、译文达九万行、五千余页的皇皇巨著，终于全部译完，大功告成了。

在《罗摩衍那》全书最后的《译后记》中，季羡林写下了他十年来的甘苦：

在过去十年中，我是既有痛苦，又有快乐；既有险阻，又有顺利；既有内心的波动，又有外来的鼓励。何况，我翻译这一部巨著，并不是单打一。几十年来的环境，使我养成一个同时搞几种科研和翻译工作的习惯。让我单打一，或者单打一二，或者给我一间清静的屋子关起门来翻译或写作，我会感到非常别扭，什么东西也写不出。在翻译《罗摩衍那》时，也是这样。除了这件事以外，我还有许多别的工作，特别是在后期，更是这样，并且还有许多开不完的会加入进来。这一些繁杂的工作，实际上起了很好的调剂作用。干一件工作疲倦了，就换一件，这就等于休息。打一个比方说，换一件工作，就好像是把脑筋这一把刀子重磨一次，一磨就锋利。再换回来，等于又磨了一次，仍然是一磨就锋利。《罗摩衍那》我就是用这种翻来覆去地

磨过的刀子翻译完的。[17]

就在翻译工作的后期，季羨林开始改变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起初，他确实拥护这场“革命”，甚至在被打倒、被关进“牛棚”之后，也没有改变，对它毫无正确的认识。进入翻译后期，他才逐渐认识到这场“革命”，也是一件邪恶的东西，同《罗摩衍那》中的十头魔王的所作所为是同属一个范畴的，二者在最后都失败了。而主人公罗摩，是一个理想人物，他经受了无数的挫折与磨难，最终胜利了，享受到与爱妻团聚的幸福。

罗摩的幸福本来与季羨林风马牛不相及，但他自己觉得颇有相通之处。罗摩的胜利，不仅不时地带给他一些安慰，给他这极为枯燥的工作增添了生气，而且也给他的内心灌注了活力，增加了与困难作斗争的勇气。从中他享受到了人间的幸福，精神上也似乎得到升华。

他兴奋地写道：

总而言之，时间经过了十年，我听过三千多次晨鸡的鸣声，把眼睛熬红过无数次，经过了多次心情的波动，终于把这书译完了。我一方面满意，满意这件艰巨工作的完成。另一方面又不满意，不满意自己工作的成果。古人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苏东坡有句著名的诗：“春江水暖鸭先知。”我的译文也如春水，我这一只春水中的鸭，是非常明白水的冷暖的，我觉得，我始终没有能够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翻译外国史诗的中国诗体。从我的能力来说，目前也就只能这样子了。知我罪我，自有解人。后来居上，古今通例。要想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来者。我也并不是说，我做这件工作，一无是处。不管怎样，我毕竟把这一部名著译出来了。这会帮助中国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印度文化，这也会大大地增强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如果我这想法不错的话，我不更应该感到幸福吗？[18]

再进一步，季羨林觉得自己所感受的一切，是有代表性的，有典型意义的。从茫然、木然、精神空虚，到毅然、决然、精神焕发，这是他走过的路，但是这一过程，对于大多数老知识分子来说，又是一

条必由之路。他作为一面镜子，正反映出解放后老知识分子的内心变化，反映出今天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正确与英明。他知道，他这面镜子本身，并不是一面非常光亮美妙的镜子，其中照见的东西有美，也有丑，也有善，也有恶。毕竟它是一面镜子，用它既可照出自己的影子，也可以照出其他老知识分子的影子。顾炎武有两句诗：

苍龙日暮还行雨，
老树春深更著花。

他不敢自比苍龙，自比老树，也许可以，他还是想再行一点雨，再著一点花的。想到这里，他更意识到了时间的重要：

我现在恨不能每天有 48 小时，好来进行预期要做的工作。那当然是不可能的。每人每天只能有 24 小时，谁也多不了一分半秒，关键在于如何使用这 24 小时。我现在就不敢放松一分一秒。如果稍有放松，静夜自思就感到十分痛苦，好像犯了什么罪，好像在慢性自杀。[19]

3. 科研的最佳时段

季羨林自己说过多次，他有一个坏（好？）习惯，喜欢同时进行多项工作。干一件事累了，立刻换一件，这样一来，脑筋就像是新磨的利刃一样锋利无比，用它思考问题，便时有梦笔生花之感，奇妙不可思议。

比方说，他在进行一项大工作的同时，在大工作、大项目的缝隙里，触景生情，灵机一动，写出一些较短的论文。这样的“灵机”是他自己也无法掌握的，有时简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样的“灵机”往往是计划外，属于“编外”项目。[20]

而对计划内的大项目，季羨林往往也安排一段比较集中的时间。

在一天里，季羨林进行科学研究最佳的时段，是早晨四点到七点多这三个多小时里。

清晨四点，朗润园里一片寂静，季羨林书房里的灯亮了。他准时地坐在一张简陋的写字台前。

四周是漆黑的，没有亮光，没有声响。偶尔风吹动窗外的梧桐叶，发出一点声响。时间在不知不觉地过去。坐在桌前的季羨林，时而凝思，时而疾书。

一抬头，眼前一片金光：朝阳正跳跃在书架顶上玻璃盒内的日本玩偶，藤娘身上。她一身和服，花团锦簇，手里拿着淡紫色的藤萝花，浑身上下熠熠发光，而且闪烁不定。

他开始工作的时候，窗外还是一片暗夜。不知怎样一来，不知不觉之中暗夜已逝，旭日东升。季羨林在诧异，这阳光是从哪里流进来的呢？窗外是一棵高大的梧桐树，枝叶繁茂，仿佛张开了一张绿色的网。他从搬进朗润园，这棵梧桐树就在这里了，但那么多年，他竟没有留意，这棵梧桐树属于什么品种。为此，他可以原谅自己，既然不是植物学家，那就不必苛求了。

再远一点，在后湖边上，是成排的垂柳。梧桐、垂柳，所有这一切都不利于阳光的穿透，然而阳光确实流进来了，就流在藤娘身上。这个玩偶藤娘，是日本朋友室伏佑厚先生和室伏千津子夫人送给他的礼物。那是他 1980 年第一次应邀访问日本时的事。

转瞬间，阳光忽然不见了，真是白马过隙。藤娘身上，已是一片阴影。窗外，透过梧桐和垂柳的缝隙，能看到一块块蓝色的天空。成群的鸽子，就在后湖上面的天空盘旋着，飞翔着，飞过的影子不时地在蔚蓝上面划上一道道弧线。鸽子的影子投到后湖水面，清晰可见，好像比天空里的真鸽子更富有神韵，宛如镜花水月一般。

朝阳又升高了一些，透过浓密的枝叶，一直照到坐在书桌前的季羨林头上。他不禁心中一动，觉得阳光好像是有生命的东西，它启迪着什么，暗示着什么。他忽然间想到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每天早晨就是对着初升的朝阳，静坐、冥思、默想，幻想着与天地同体，与宇宙合一。想到这里，他联系到自己，竟然没有这样的福分，从来没有达

到过这样的境界。但虽不能至，心却向往之，于是他也感到太阳的威力，心中思绪翻腾，仿佛自己也有了一种神力，能洞察三界，透视万有了。

稍事休息，季羨林想缓和一下工作了一阵子的紧张神经，心中有了余裕，能够抬起头来，向四周，特别是窗外观察一下。

窗外风光如旧，但是四季不同：春花，秋月，夏雨，冬雪，情趣各异，动人则一。现在正是夏季，浓绿扑人眉宇，鸽影在天，湖光如镜。多少年来，当然都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过去我竟视而不见呢？今天藤娘身上一点闪光，仿佛照透了我的心，让我抬起头来，以崭新的眼光，来衡量一切，眼前的东西既熟悉，又陌生，我仿佛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把我好奇的童心一下子都引逗起来了。我注视着藤娘，我的心却飞越茫茫大海，飞到了日本，怀念起赠送给我藤娘的室伏千津子夫人和室伏佑厚先生一家来。真挚的友情温暖着我的心……[21]

他又扫视到窗外，太阳升得更高。梧桐树椭圆的大叶，和垂柳尖长的细叶，交织在一起，椭圆与细长居然也相映成趣，大叶与细叶也和谐如一。远处，是未名湖畔的塔影，屹立不动。天空里，鸽影仍在晃动，仍然在划着或长或短，或远或近的弧线。

室内的近处，窗台上摆着几盆君子兰，虽然是极为普通的青砖色的土瓦盆，但那深绿肥大的叶子，却依然给他增添着绿色生命的神奇力量。

看着这一切，季羨林怡然自得，其乐陶陶。他感到，大地竟是如此可爱，人生竟是如此美好，受这种气氛的感染，他真有点不知老之已至了。甚至有了一点灵感，信口念出两句自己并不觉得是诗的“诗”来：

此身合是诗人未？

鸽影湖光八月明。[22]

有了诗人的雅兴，好像自己也是一位诗人了。

就这样，季羨林在紧张工作之余，调整了神经，得到了休息，又

开始了每天清晨第二阶段的紧张工作。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每天清晨这3个多小时，成为季羨林进行学术研究的最佳时段。

4. 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季羨林从年轻时就发表学术论文，多为考证性的，直到现在，他的学术论文仍多是考证性的。他的学术论文的写作，解放前并没有系统的理论作指导。解放后，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观。

季羨林认为，现在一讲理论，人们往往想到马克思主义。这样想，不能说不正确。但是，必须注意两点：一是马克思主义随时代而发展，绝非僵化不变的教条，二是不要把马克思主义说得太神妙，令人望而生畏，对马克思主义可以批评，也可以反驳。

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而唯物主义的本质就是实事求是，把黄的说成是黄的，是唯物主义，把黄的说成是黑的，是唯心主义，事情就是如此简单明了。他不喜欢抽象的理论之争，因为理论之争的结果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个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矛盾，矛盾了几千年，到现在还没有哪一个理论家真正说透。他对此的看法是：

以我的愚见，绝对纯之又纯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都是没有的。说一部哲学史就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史，显然也与历史事实不完全符合。特别是最近几十年以来，有一些理论家，或者满篇教条，或者以行政命令代替说理，或者视理论如儿戏，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最终让读者如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反正社会科学的理论不像自然科学的实验那样，乱说不能立即受到惩罚。搞自然科学，你如果瞎鼓捣，眼前就会自食其果，受到惩罚。社会科学理论说错了，第二天一改，脸也用不着红一红。因此，我对于理论有点敬鬼

神而远之。这类的文章，我写不出，别人写的我也不大敢看。我对理论的偏见越来越深。我安于自己对此道不擅长，也不求上进。[23]

他觉得，让他五体投地佩服的，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根本理论，因为它完全反映了客观现实，包括了历史、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所以最为实事求是。即使马克思主义仍然要不断发展，但是迄今它发展达到的水平，业已足让他心服口服。

至于辩证法，也可以作如是观。他认为，看问题不要孤立，不要僵死，要注意多方面的联系，在事物运动中把握规律。他觉得，自己的这种理解，也许是幼儿园的水平，但也许它更接近事实真相。

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以外，季羨林认为，古今中外一些所谓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著作，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推理方式，也要认真学习。他的想法是：百分之百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百分之百的唯心主义哲学家，都是没有的，这就如真空一样，绝对的真空在地球上是没有的。中国古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就是这个意思。因此，所谓唯心主义哲学家也有不少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千万不要像过去那样，把十分复杂的认识问题简单化和教条化，把唯心主义的标签一贴，就“奥伏赫变”。[24]

科学研究的方法很多，季羨林因为最喜欢考证，所以他特别欣赏和服膺胡适先生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为它是不刊之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指导方针。古今中外，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概莫能外。

胡适先生的这两句话，已经被批了很长时间，尤其在教条主义猖獗、形而上学飞扬跋扈的时期内，人们都谈虎色变，不敢再提。对此，季羨林感到百思不得其解。哪一个学者，不管是自然科学家，还是社会科学家，能够离开假设与求证呢？季羨林论述说：

在进行一个课题的研究时，你对于这个课题总会有些想法吧，这些想法就是假设。哪里能一点想法都没有而进行一个课题的研究呢？为什么要“大胆”？意思就是说，不要受旧有的看法或者甚至

结论的束缚，敢于突破，敢于标新立异，敢于发挥自己的幻想力或者甚至胡想力，提出以前从没有人提过或者敢于提出的假设。不然，如果一开始就谨小慎微，一大堆清规戒律，满脑袋紧箍，一点幻想力都没有，这绝对不会产生出什么好结果的。哥白尼经过细致观测，觉得有许多现象是太阳绕地球旋转说解释不了的，于是假设了日中心说。这真是石破天惊的假设，大胆的假设。没有这个胆量，太阳恐怕还要绕地球运转若干年。没有大胆的假设，世界学术史陈陈相因，能有什么进步呢？

但是，光有假设还不够，还要小心求证。因为：

有了假设，不等于就有了结论。假设只能指导你去探讨，去钻研。所有的假设，提出来以后，都要根据资料提供的情况，根据科学实验提供的情况来加以检验。有的假设要逐步修正，使之更加完善。客观材料证实了多少，你就要在假设中肯定多少。哪些地方同客观材料相违，或者不太符合，你就要在假设中加以修正。这样可能反复多次，十次，百次，几百次；假设也要修正十次，百次，几百次，最后把假设变成结论。有的假设经不住客观材料的考验，甚至必须完全扬弃，重新再立假设，重新再受客观材料的考验。凡是搞点科学研究的人，都能了解其中的味道，或甘或苦，没有定准儿。这就叫做小心的求证。[25]

对于“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季羨林提出要反对两个倾向。

一是绝对不能迁就自己假设的结论。

有人往往会灵机一动，提出了一个假说，自己认为是神来之笔，灵感的火花，于是极端欣赏，极端自我陶醉。但是后来客观材料，包括实验结果，都证明这个假设不能成立，在这个关键时刻，有良心的科学家应毅然放弃自己的假设，另觅途径，另立新说。但是个别人却觉得自己的假设美妙绝伦，丢掉了万分可惜，于是不惜歪曲材料，只选一些于假设有利的材料，堆累在一起，以迁就自己假设的错误结

论。季羨林认为这类人是学术骗子，绝对不足取。

二是防止以论代史。有些学者先有了结论，然后再搜集材料，来证实结论。有人研究中国农民战争问题，从什么人的著作里找到了农民战争解放生产力的结论，于是在搜集材料时，有利于这一结论的就收，相违的则视而不见。有时甚至不惜加以歪曲，爬罗剔抉，刮垢磨光，最后磨出一个农民战争解放生产力的结论，而让步政策，则是“修正主义”。他们的“求证”，是戴着有色眼镜去衡量一切，谈不到小心不小心。他们的结论是先验的真理，不许怀疑，只准阐释，他们是在为圣人立言，为经典作注。[26] 这样的态度同样不足取。

在这样的基础上，季羨林自己的科学研究，形成了这样一种风格：学术文章不管是看来多么肤浅，但总想在里面提出哪怕是小小的一点新看法。要提出新看法，就必须先有新假设。假设并不是结论，不管它多么新，在证实之前，都不能算数。所以，他经常被迫修改自己的假设，个别时候甚至被迫完全放弃。有的假设，他最初认为是神来之笔，美妙绝伦，而一旦证实它站不住脚，必须丢弃之时，往往也引起他内心激烈的波动，最终他还是决定忍痛抛弃。季羨林大体上就是这样做的，鹦鹉学舌，非他所能；陈陈相因，非他所愿。他从来不标榜自己的新看法都是真理，他认为，一部人类的学术史证明：学术一定要随时代的前进而前进，将来有新材料发现，或找到观察问题的新角度，自己的看法或者结论也势必要加以修改，这是必然的。

5. 资料的搜集

季羨林的学术研究，偏重于考据，他因此而特别注重搜集资料的问题。

季羨林认为，进行科学研究，必须搜集资料，这是不易之理。但是搜集资料因人而异，并没有什么一定之规。

最常见的搜集资料的办法，是使用卡片，把自己认为有用的资料

抄在上面，然后分门别类，加以排比。

但这并不是惟一的办法。

比方说，季羨林的恩师陈寅恪先生就不用这样的办法。他采取的是“眉批法”，把有关的资料，用眉批的办法，今天写上一点，明天写上一点，积之既久，资料多到能够写上一篇了，就从眉批移到稿纸上，形成了一篇完整的文章。他对《高僧传·鸠摩罗什传》的眉批，比原文要多出好几倍，这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季羨林自己进行学术研究，既很少写卡片，也从来不用眉批，而是用比较大张的纸，把材料写上。有时候，随便看书，会忽然发现有用的材料，他就往往顺手拿一些手边能拿到的东西，比如开会通知、请柬、信封、小纸片之类，把材料写上，然后分类保存。季羨林注意到，别人也有这样做的，如著名历史学家向达先生，有时就把材料写在香烟盒上。

季羨林认为，用比较大张的纸，有一个好处，能把有关的材料都写在上面，因此约略等于陈寅恪先生的眉批。而卡片面积太小，要做到这一地步是办不到的。

季羨林在抄好材料后，十分认真细心地加以保存，常分门别类装入纸夹或纸袋。不然，如果一时粗心大意，丢上张把小纸条，而上面记的又可能是至关重要的材料，所以就会由于它的丢失而影响整篇文章的质量，这就不得不龟勉从事。

搜集资料时，季羨林十分注意资料要巨细无遗，他甚至于有竭泽而渔的精神。但他也十分清楚，资料要搜集到百分之百完整的程度，那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不过他随时警惕，提醒自己，绝不能随便搜集到一点资料就动手写长篇论文。因为这样写成的学术文章，结论之不可靠是显而易见的。

与搜集材料有紧密联系的一个问题是：要注意文献目录，季羨林对此予以严格关注。他认为，只要与自己要写的文章有关的论著的目录，都必须清楚。否则，前人或别人已经有了结论了，你还在卖劲地

论证，岂不是贻笑大方，对此是不可不慎的。

对材料的重要性，季羨林常说，严格讲起来，天下没有无用的材料，问题是对谁来说，在什么时候说。就是对同一个人，也还有个时机问题。

经过几十年的科学研究，季羨林得到这样一个经验：只要是自己脑海里有一个问题，一切资料，书本上的、考古发掘的、社会调查的等等，都能对自己有用。搜集这样的资料，季羨林从来不感到有什么困难，有时候资料简直是自己跃入眼中，比方说，他写作《中华蔗糖史》翻阅《四库全书》，经常是超越了一目十行的极限，而是一目一页，翻着《四库全书》，“糖”字、“蔗”字以及与它们有关的字眼，都自动地往他眼里跳。反之，如果自己脑海里没有这个问题，那么所有这样的资料，对自己可能都是无用的。然而，一个人脑海里思考什么问题，什么时候思考什么问题，有时候谁也掌握不了。一个人一生中不知要思考多少问题，当一个人思考甲问题时，乙问题的资料对这个人没有用。可是说不定什么时候，这个人又会思考起乙问题来，就可能回忆起自己以前看书时，碰到过这方面的资料，而这时再想去查找，可就“云深不知处”了。类似这样的经验，季羨林自己也碰到过不少次，而且知道别的人也有相同的经验，所以，他毫无保留地告诫学术研究者：

最好脑海里思考问题，不要单打一，同时多思考几个，而且要念念不忘，永远不让自己的脑子停摆，永远在思索着什么。这样一来，你搜集面就会大得多，漏网之鱼也就少得多。材料当然也就积累得多，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一旦用起来，你就左右逢源了。[27]

季羨林几十年从事笔耕，从中，他既有快乐，也有苦恼，既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他把自己的治学经验，几乎和盘托出了。

三、像老农而非老农

1. 朴厚的“土包子”

不管是圈里人，还是圈外人，抑或是季羨林本人，都不否认季羨林的“土气”。

在中国人的词典里，“土”字的含义简直多极了，土包子、土气、土人、土著、土专家、土话、土仪、土产、土货、土皇帝……这些词，虽然没有太多的贬意，但也没有太多的褒意。

早在上世纪 40 年代，季羨林从德国回国到北大任职伊始，沈从文先生请他吃饭，他看到沈先生用牙齿把捆东西的麻绳咬断，从这一有点粗劲，有点蛮劲，有点野劲，有点土劲，并不高雅、并不优美的小小举动中，他看到的是沈先生的个性。这种个性在达官贵人和“高等华人”眼中，自然是非常可鄙、非常可笑的，但季羨林却正欣赏这种劲头，而且把自己也看做是这样一个“土包子”，但是这样的“土包子”同那些只会吃西餐、穿西装、半句洋话也不会讲，而偏又自认为是“洋包子”的人比起来，丝毫不比他们低一等。[28]从那时起到现在，五十多年过去了，季羨林始终以这样的“土包子”自居，且以此为自豪。

从季羨林这样的“土包子”身上透露出来的个性，是他的“朴厚”。

这一点，曾经在朗润园住过一段时间的著名学者、原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张中行先生，有着切身的感受。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不知道是由谁介绍，张中行和这位早已闻名的知名学者，在他的家门口成为相识。在这次结识之前，张中行听到的有关季羨林的见闻，用评论性的话总而言之，不过两个字，就是“朴厚”。这次晤面之后，张中行对他朴厚的印象，就更为深刻了。

张中行有清晨散步的习惯，而散步的路线，有时就是后湖边上的幽境，要从季羨林住的 13 公寓前边走过。这时，季羨林在工作一段之后，往往也要到门口站一站，稍事休息。张中行路过时，如果正好

赶上他在家门口，就打个招呼，或者说上几句闲话。

打招呼用和尚的合十礼，也许因为，都觉得对方同佛学有些关系。闲话也是走熟路。消极的是不沾学问的边，原因，我想少一半是研究的那些太专，说，怕听者不懂，至少是没兴趣；多一半仍是来于朴厚，讲学问，掉书袋，有炫学之嫌，不愿意。再说积极一面，谈的话题经常是猫。[29]

张中行感受到的，就是这难得的朴厚：从来也不会炫耀自己的朴厚。

是的，不炫耀本身就是朴厚的一部分。

1985年，上海外国语学院（今更名为上海外国语大学）筹办《中国比较文学》杂志，邀请季羨林、贾植芳先生为主要嘉宾召开座谈会，住在校内的外国专家招待所。会议之余，主办者组织专家参观。其中一项内容是参观上海一座著名的寺庙，游禅堂、观大殿，会见颇有地位的住持长老，显然是一位老僧，还应邀吃一顿闻名上海的高级午间素餐。季羨林深有佛学功底，在如此众多的与佛家有关联的活动中，换一个人，正是发宏论高见，甚至即兴连类而及，去道掌故，说逸闻之处是太多，太方便，也太对题了，特别是在与住持长老会面时，盘道论经，进行高层次对话，是可以显学识、露经纶、表现学问高深、知识广博的，然而他没有去高谈阔论、指手划脚，去显示学问家的样子，而是以一个普通人自居，这种不见学问的学问，正是朴厚的表现，从这朴厚中，人们经常能看到他脸上总是含着平和的浅笑，一切都深蕴不露，然而又不是故意做作而为，更非胸有城府，而是实实在在的、朴素自然的，是融汇于包容在深层文化、高度修养、自在人格中的一种“天然自成”的形象。[30]

在朴厚中，季羨林还透露出几分执著，像一个老农对农事的执著一样，季羨林对学术事业的执著让人更为动情。

在这方面，张中行又有很深的体会。

是不久前，人民出版社印了几个人的小品，其中有季先生和

我的。我有个熟识的小书店，是一个学生的儿子经营，为了捧我之场，凡是我的拙作，他都进一些货。爱屋及乌，这次的系列小品，他每种都进一些货。旧潮，先秦诸子，直到《文选》李善注，因为其时没有刻印技术，也就没有“签名本”之说。有刻印技术之后，晚到袁枚的《随园诗话》，顾太清的《东海渔歌》，也还是没有签名本之说。现在是旧潮换为新潮，书有所谓签名本，由书店角度看利于卖，由读者角度看利于收藏。于是而有签名之举，大举是作者亮相，到书店门口签；小举是作者仍隐于蜗居，各色人等（其中有书商）叩门求签。我熟识的小书店当然要从众，于是登我门，求签毕，希望我代他们，登季先生之门求签。求我代劳，是因为在他们眼里，季先生名位太高，他们不敢。我拿着书，大约有十本吧，去了，让来人在门外等着。叩门，一个当小保姆的年轻姑娘打开门，我抢先说：“季先生在家吗？”小保姆的反应使我始则吃惊，继则感佩。先说反应，是口说“进来吧”，带着我往较远一间走，到大敞的门，用手指，同时说：“不就在这里吗？”这话表明，我已经走到季先生面前。季先生立着，正同对面坐在床沿的季夫人说什么。再说为什么吃惊，是居仆位的这样侍候有高名位的一家之主，距离世间的常礼太远。……这常礼由主人的名位和矜持来，而季先生，显然是都不要，所以使我由小保姆的直截了当不由得想到司马温公的高风，也就不能不感而佩之。言归正传，是见到季先生，说明来意，他毫不思索就说：“这是好事，那屋有笔，到那里签吧。”所谓那屋，是东面那个书库。有笔的桌上也堆满书，勉强挤一点地方，就一本一本写，一面写一面说：“卖我们的书，这可得谢谢。”签完，我说不再耽搁，因为书店的人在门外等着。季先生像是一惊，随着就跑出来，握住来人的手，连声说谢谢。来人念过师范大学历史系，见过一些教授，没见过向求人的人致谢的教授，一时弄得莫知所措，嘴里咕噜了两句什么，抱起书跑了。

[31]

季羨林朴厚的事本够感人，用张中行这朴厚的笔一写，就更为感

人了。张中行与季羨林交往，感到他是一身而具有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三种难能之中，张中行以为，最难能的还是朴厚，因为在见过的诸多知名学者（包括已作古的）中，像他这样的就难找到第二位。

这样的“朴厚”，被认为保持着北方原野那份质朴和单纯。他的普通，如同一滴最平凡的水珠，无声地消融在大江大河的激流之中；如同一粒最平凡的泥土，加入了无比深厚的黄土地的浑重之中。由此让人悟到，一切伟大只因它来自平凡，并由平凡所构成，伟大无须装饰，也不可形容。他是那样的单纯，单纯到不染纤毫的自然，对于枝枝节节往往不甚经心，师生、朋友的情谊也都简化到最平淡处，但正是从这朴素中，使人感受到他那种崇高人格的震撼力。[32]他的朴实的力量，使人和他在一起，矜可平，躁可释，一切多余的雕饰的东西都成为不必要，当工作有了成绩想向他表白时，到了他那里忽然就觉得不必诉说，他的沉着，他的稳重，连同他的朴实，使接近他的人只能脚踏实地埋头苦干。[33]

2. “朴素衣裳常在眼”

对季羨林的朴厚，和他交往达半个多世纪的好友臧克家，也是十分赞佩不已的。臧老曾在上世纪 80 年代作过一首《赠羨林》的诗，说：

年年各自奔长途，
把手欣逢惊欲呼。
朴素衣裳常在眼，
遍寻黑发一根无。

到 1996 年，季羨林 85 周岁华诞前夕，臧老又赋诗《长年贡献多——贺羨林老友八五华诞》：

满头白发，根根记录着你的寿长，

标志着你的业绩受到众多的赞扬。
你兼有诸家的同能；你的独秀孤芳，
有几个能够赶上？
海外十年，心系祖国，艰险备尝，
写下的日记何只万行？
你的人，朴素非常，
你的衣着和你的人一样。
天天跑图书馆，习以为常，
你珍惜每一寸时光。
你学识渊博，对中西文化，
最有资格比较衡量。
你潜心学海，成绩辉煌，
探及骊珠，千秋万岁放光芒！[34]

熟悉季羨林的人，都会注意到他的衣着几乎是没有变化的，春秋是一身蓝涤卡中山装，夏天则或是灰色中山装，或普通白衬衣。这些衣服的式样，从上世纪 50 年代到今天，几乎是几十年一贯制。

在衣着方面，季羨林向来是保守的。刚解放时，连脱掉大褂换上中山装这样的小事，他都觉得异常别扭。而一旦换上了中山装，他则干脆不脱了，一穿就是几十年。

1994 年 5 月，季羨林去泰国曼谷访问，在泰国华人郑午楼博士举办的盛大宴会上，见到了在清华读书时崇拜的摄影家郎静山先生。郎先生已经 104 岁，慈眉善目，面色红润，头发花白，但没有掉多少，腰板挺直，步履稳健，耳聪目明，最吸引他的是郎先生的衣着，仍然穿着长衫。他心里清楚，在解放前，长衫是流行的，它几乎成了知识分子的象征，因此看了郎先生的长衫，心中大感欣慰，联想到了自己：

我身上这一套中山装，久为风华正茂的青年男女士们所讽刺。我表面上置若罔闻，由于某种心理作用，我死不改悔，但心中未免也有

点嘀咕。中山装同长衫比起来，还是超前一代的，如果真进博物馆的话，它还要排在长衫的后面。然而久已绝迹于大陆的长衫，不意竟在曼谷见到。我身上这一套老古董似乎也并不那么陈腐落后了。这一种意外的简直像天外飞来的支援，使我衷心狂喜。[35]

从这里不难看出，季羨林几十年“顽固不化”，穿着中山装，是有某种心理作用，实际上，他是把中山装看做是刚直不阿的知识分子的象征；时时警惕着，绝不和世俗的不良风气同流合污。他注重的，不是衣着的华丽，而是心灵和精神境界的超升。

不仅对衣着，就是对家中的陈设，季羨林也绝对不去刻意追求现代气息，甚至给人的印象是陈旧，简直是没有一点现代气息。朴实之外，是什么也没有。就连老伴彭德华，在大都市里住了多年，还是全身乡里气，为人也是充满古风，以忠厚待人，人缘最好。张中行到季羨林家里去，最感吃惊的就是室内缺乏现代气息，陈旧。

室内也是这样，或说更是这样，墙，地，以及家具，陈设，都像是上个世纪平民之家的。惟一的不同是书太多，学校照顾，给他两个单元，靠东一个单元装书，总不少于三间吧，架上，案上，都满了，只好扩张，把阳台封上，改为书库，书架都是上触顶棚的，我隔着玻璃向里望望，又满了。[36]

衣服之外，是陈设的朴素，而陈设之外，则是饮食的朴素了。

季羨林一日三餐，吃的全是家常饭菜，再普通不过。他从来不挑食，不吃补品，不忌口，什么饭菜都能吃一些，他的饮食，品多类杂，吸取的东西往往注重综合性。在大城市生活了几十年，但他始终钟情于少年时代的家乡饮食习惯，绿豆小米粥，几乎与他的中山装一样，也是几十年一贯制，成为他永远不换的美食佳肴。以至人们分不清，这到底是他长寿的良方，还是由于他一介学生的清贫？是对乡土的眷恋，还是修身齐家的一种自我约束？[37]

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教授耿引曾女士，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她在上世纪 70 年代初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时被季羨林所感动的情景：

（1972年）10月20日，北京已进入深秋季节，天气略有寒意。年过花甲的季羨林先生从燕园出发，辗转几趟公共汽车，按邀请时间准时抵达博物馆展所。从上午九时到下午五时，中午稍作小憩，以博物馆食堂提供的四只猪肉白菜包子和一碗稀粥为食，先生以极大的兴趣和热情，浏览了上下两层8千平方米的展室，边看边谈出自己对中国通史陈列的意见。[38]

当时季羨林还被当做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工、军宣队批判的对象之一，中国历史博物馆邀请他参加通史陈列的审查，是明令让“控制使用”的。而通史陈列新变更的内容是突出农民起义，趋炎附势者这时是容易讨好的，但季羨林又一次用自己朴厚的性格顶住了摆在自己面前的巨大诱惑，决不牺牲学术为自己捞好处，他不附和极“左”思潮，仍然承认让步政策的重要意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齐鲁大地所崇尚的“大丈夫”品格在他身上有非常集中的体现。

几十年的无数事实，告诉我们，季羨林自己粗衣淡食，生活简朴，不注重物质享受，不追求物质利益，却有一个极为富有的精神世界。

对于季羨林来说，不仅仅是“朴素衣裳常在眼”，也不仅仅是朴素的陈设、朴素的饮食，因为“朴素”两字已经成为他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已经渗透到他的血液中了，很容易就化为具体的行动。

熟悉季羨林的人们记得，那是北京缺水季节，在季羨林家非常窄小的卫生间里，增添了一只红色的塑料桶，桶里装着满满的颜色有些发黑的水。外人不知道这桶水有什么用处，只是会发现有时只剩下半桶，有时候又是满的。住在他家的亲戚十分纳闷，这些黑色水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后来他们才知道，因为北京缺水，季羨林就从楼前的湖中提水，用来冲洗马桶、墩布。一个老知识分子的这种精神，让亲戚们感动不已。[39]人们如果都有这样的节水意识，就不会闹水荒了。

3. “微有颠意”寄木石

出生于鲁西北大平原上的季羨林，从小没见过山，曾想象山只不过是一个个巨大无比的石头柱子。六岁进了济南，才见到了山，对山有了一个完整的印象。

不知怎么一来，季羨林对山林木石有了一种特殊的爱好。这也许有点奇怪，石头有什么美可言，值得他这样一个大学者去爱好呢？只要是山区，遍地是石头，磕磕绊绊，走路都不方便，让人厌恶犹有不及，哪里会有什么美感呢？

季羨林不这样看。他认为，欣赏奇石，好像是中国特有的传统审美情趣。南南北北，且不说那些名园，即使在最普通的花园中，都能够找到几块大小不等的太湖石，甚至假山。这些石头都能够给花园增添情趣，增添美感，再衬托上古木、修竹、花栏、草坪、曲水、清池、台榭、画廊等等，使整个花园成为一个审美的整体。错综与和谐统一，幽深与明朗并存，充分发挥出东方花园的魅力。他自己所住的朗润园，是明清名园燕园的一部分。燕园中就有多处怪石古石，据说都是明末朱万钟花费惊人巨资，从南方运来的。

石头之受人青睐，是因其奇而美，奇而美在四个字：透、漏、秀、皱，最忌平板，玲珑剔透，才显现奇美。

季羨林不光喜欢大奇石，小石头他也同样有激情，甚至很内行。如他在济南高中教学的时候，在山水沟无意用低价买到一块寿山石中的精品田黄。如雨花石，产在南京，但大名垂宇宙，却由来久矣。他从报刊上读到一则关于雨花石的报道，说有一块石头上有一幅观音菩萨的像，宛然如书上画的，或庙中塑的，形态毕具，丝毫不爽。还有一石，花纹是齐天大圣孙悟空，也是形象生动，不容同任何人、神、鬼、怪混淆。这些都是鬼斧神工，本色天成，非人力之所能为。

他还喜欢用小山小石组成的盆景，一座只有几寸至多一尺来高的石头山，再陪衬上几棵极为矮小却具有参天之势的树，望之就如泰

岳，巍峨崇峻，咫尺千里，真的是“一览众山小”了。

因此，对奇特的石头，不管大块与小块，他都情有独钟，成为他的审美情趣。在眼下，文化一词极为流行，什么东西都是文化，什么茶文化、酒文化，甚至连盐和煤都成了文化，干脆来一个石文化，恐怕也是无可厚非的。

季羨林认识一位原南京东方语专的毕业生周镇荣先生，引以为北大校友。1993年10月，在昆明参加纪念郑和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周镇荣赠送给他一块奇石，让他分享了奇石之美。1994年，季羨林在曼谷又参观周镇荣先生创建的奇石馆，更让他大吃一惊。

五光十色，五颜六色，五彩缤纷，五花八门，大小不一，方方圆圆，长长短短，粗粗细细，我搜索枯肠，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带数目字的俗语都搜集到一起；又到我能记忆的旧诗词中去搜寻描写石头花纹的清词丽句。把这一切都堆集在一起，也无法描绘我的印象于万一。在这里，语言文字都没用了，剩下的只有心灵和眼睛。我只好学一学古代的禅师，不立文字，明心见性。想立也立不起来了。到了主人让我写字留念的时候，我提笔写了“琳琅满目，巧夺天工”，是用极其拙劣的书法，写出了极其拙劣的思想。晋人比我聪明，到了此时，他们只连声高呼：“奈何！奈何！”我却无法学习，我要是这样高呼，大家一定会认为我神经出了毛病。[40]

季羨林还听周镇荣讲自己搜寻石头的故事，觉得非常有趣。周先生不论走到什么地方，一听到有奇石，便把一切都放下，不吃、不喝、不停、不睡，不管黑天白日，不管刮风下雨，不避危险，不顾困难，非把石头弄到手不可。“精诚所加，金石为开”的古话，在周先生身上得到了证明。宋代大书法家米芾酷爱石头，有“米颠拜石”的传说。季羨林觉得周镇荣之颠，也不在米芾之下。

后来，季羨林在《中国医药报》上读到一篇讲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先生酷爱石头的文章《石头情结》，感叹王先生到耄耋之年形成石头情结，一旦形成，遂一发而不能遏止，爱石头也到了颠的程度。从此

他称朝闻老为北颠，称周镇荣为南颠，南北二颠，顽石之友，在茫茫人海芸芸众生中，他认为有这样的颠，是极为难见的。究其原因，他认为颠石、颠木，要比颠名、颠利高明不知多少倍。他在给刘梦溪的一封信中说：

一个人“颠”石或者“颠”木，并不容易。那些颠名颠利的人，至死也难以理解。这个境界他们永远达不到的。我微有颠意，只是忙于其他事务，至今也还没有成什么气候。[41]

季羨林“微有颠意”寄木石，连及花草，成为他超越名利羁绊而进入人生化境的一部分。

他住的13公寓楼前，有后湖的一泓水。有一年他去杭州开会，一个朋友赠送给他一包洪湖莲子，他十分珍爱，回到北京后，亲手撒在池塘里，第一年，没有动静，到第二年，水面平平，还是没有一点迹象。到第三年5月，只见一片片的小绿叶露出水面。几年过去，半个池塘都长满了，满眼翠绿的是莲叶，含苞欲放、纵情绽开的是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之态，周敦颐的《爱莲说》已有淋漓尽致的描绘：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以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然而，季羨林不仅仅是爱莲，他本身就体现了荷花的那种高洁品性。周一良先生为这片荷花取名为“季荷”，可谓知底之人。

所有路过这一片荷塘的人，都会对满塘的荷花注目欣赏，透过“映日荷花别样红”和“荷香风送远”的意境，似乎可以看到置身陋室的季羨林，临窗挥笔，出神入化，与大自然已完全融汇为一，红绿相映之中，遐思频至，“天人合一”的境界全出，于是在他笔下，一

篇篇妙文佳作便呼之而出了。

4. 守时的“老农”性格

春种，夏长，秋收，冬藏，不违农时，是每个农民都清清楚楚的。一年里边的二十四个节气，几乎全与农时有关，这也是人人都清清楚楚的。

像老农的季羨林，真像老农那样遵守时间。

每天清晨四点，他便准时开始工作，就像春、夏、秋、冬四季准时来到一样。不论刮风，下雨，天晴，天阴，他从来都是如此，如同时钟，应该说同标准的北京时间的时钟一样准确无误，几十年没有变化，几十年没有一次例外，这是不到一定造化之境的人万万做不到的。

然而这仅是他守时的一个方面。

那是一个下着鹅毛大雪的清晨，他在家中工作了三个多小时之后，顶风冒雪，踏雪近一公里，从朗润园赶往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库去看书，他本人并没有觉得是顶风冒雪赶来，准时在开馆之时进了图书馆的特殊感觉，可图书馆工作人员却都感到十分吃惊，纷纷赞叹他的毅力、勇气和像钟表一样准时的精神。[42]

那是一次约会。童庆炳先生主编的“心理美学丛书”鉴定会和小型学术讨论会请季羨林参加，约好早晨八点半到他家去接。时值寒冬，约请的人特意嘱他在家里等，千万不用出门。可等接的人准时到达朗润园 13 号时，季羨林已经站在门口等候了。

那是一次讲座，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持的“华夏审美风尚的演变”课题组请季羨林作讲座，在东方学系会议室，时间是上午九点。等听讲座的人三三两两到达会议室时，季羨林已坐在那里等候了。[43]

那是 1990 年 5 月的一天，北京大学学生会在电教中心组织一个

讲座，请季羨林谈谈自己的治学经历。那天，他本来有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应酬，但听说是学生请他，便放弃了那个应酬，和学生谈谈天。到了开讲的时间，季羨林还没有到，与会的人感到有点奇怪，派人出去看，原来是会议组织者一时疏忽，忘了告诉他开会的教室，发现老人正在挨个教室打听会场在什么地方。本来是会议组织者的责任，可季羨林却毫不介意地说，青年人办事，不能要求他们件件办得十全十美，何况还是自己没有找到地方，才耽搁了一会儿。[44]

.....

更令人肃然起敬的，是1995年夏天，中法比较文化研究会邀请季羨林参加建会五周年的纪念活动。到了开会的那天，他照例是四点钟起床，伏案工作了三个小时之后，要到对面那一套房间里去吃早餐，可巧家人不在，又从外面把门反锁上了，自己打不开门。他转来转去没有办法，又不愿意麻烦别人，他竟然打开窗户，纵身从一点七五米高的窗台上跳了下去。他已八十四岁，结果是扭伤了脚。当时，过路的人都关心地问长问短，邻居们也闻讯赶来，问摔伤了没有。季羨林风趣地说：“从上面看并不高，跳下来往上看还真不矮。没有伤着，就是脚跟有点疼。”“这对我的身体是一次考验，证明我的骨头和五脏六腑还结实。”[45]当他在乐黛云教授和助手李铮先生的搀扶下，一瘸一拐地出现在会场上时，与会代表都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第二天，他应邀又要去郊区参加一个活动，别人都劝他不必去了，他坚持要去，说：“和人家定好的事，不要失信。”最后，他不但忍着脚疼去了，还一拐一拐地跟着走了五六里路。过了几天，闲散下来，到医院拍X光片，发现他的脚后跟骨头摔裂了一条缝。[46]

季羨林就是这样一个守时、守信的人。

5. 一把红枣勾起的乡情

季羨林对自己的故乡鲁西北大平原一往情深，他虽然在那里仅住

了六年，但对那里的一草一木，一池一塘，一乡一邑，一村一户，都充满了无限的眷恋，一件细小的事，总难免勾起他的思乡情结。

1992 年秋天，季羨林大伯父家的直系孙子季孟祥，从故乡临清到北京去看望他。论辈分，季孟祥该叫季羨林为曾祖父。孟祥是他在故乡孙子辈的人中最喜欢、也最亲近的一个。这一年，孟祥从故乡带了些新鲜的红枣给曾祖父。孟祥没想到，这一把红枣竟勾起了季羨林浓浓的思乡之情。

那一天，孟祥到季羨林家的时候，已经晚上八点多了。全家人已经吃过了晚饭，季羨林看到孟祥到来，显得非常高兴，老伴忙操持着给他做饭，饭好后，又拿出鸡块、面包、馒头，切开一大块月饼，为远道来的孙子摆了一大堆。一听说孟祥从家乡带来了红枣，季羨林精神为之一振，立刻拿起一颗，放到嘴里，一边吃一边说：“几十年没吃了。家乡的红枣又脆又甜，很好吃。”

季羨林吃着枣，想起了家乡的一件件往事。他忘不了，叔父和父亲到村南人家的枣林里捡掉在地上的干枣吃；他也忘不了，家乡的一种特产叫“熏枣”，每当红枣收获的季节，临时搭建起的熏枣加工棚，总是白烟缭绕，香飘十里；想着想着，他好像又回到了那阔别几十年的故乡。虽然小时候过的都是穷日子，但那毕竟是自己的故乡啊。

故乡里的小伙伴，哑巴小当了山大王，被杀掉了。还有个杨狗，季羨林总是挂念着他，还让人捎一些钱给他。当杨狗老人接到当了名教授的小伙伴捎的钱时，激动得两手都有些发抖。

故乡里熟悉的小伙伴是哑巴小和杨狗，但季羨林惦记的绝不是仅他俩人，而是整个官庄，整个临清，整个聊城，整个山东。

季羨林十分清楚，故乡要真正发展，必须注重教育。教育必须从娃娃抓起，所以，他几十年来经常给官庄小学邮寄图书，有时几十本，有时一二百本。

官庄小学的老师，每当收到季羨林邮寄来的图书，总要小心翼翼

地打开邮寄的箱子，每个学生发给一本，学生们把自己得到的看完了，再互相交换着看。

这些图书都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看的，连环画，故事书，体裁多种多样。一本本画书，一个个故事，使孩子们知道了很多很多从未听到过的事情。有些最精彩的故事，老师还能选出来在全班讲。当教师给孩子们讲高玉宝的故事时，教师讲得动情，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孩子们听得入神，腮帮两边，泪珠晶莹。

孩子们难以理解，一个大教授寄来的书，怎么就那么适合他们的口味？后来，孩子们才知道，原来是季羨林只要听说有新图书出版，总要自己带上十几岁的孙子、孙女和外孙，一起到书店精心挑选，几个孩子是他的参谋。季羨林体察孩子，心细如此。

1992年，季羨林从弟子段晴那里得知，一位德国朋友准备捐资帮助一所中国小学校，季羨林希望争取捐给官庄小学，季羨林四处活动，德国人终于被季羨林深厚的桑梓之情所感动，欣然同意。官庄小学得到德国友人的资助，季羨林一再叮嘱：这些钱一定要用在刀刃上，让官庄小学多出人才，好为国家多做贡献。

1994年，季羨林获得北京大学特别贡献奖。那时，老伴生病住院已经数月，正需要用钱，奖金的数目也还不清楚，但季羨林准备捐给官庄小学一万元，用来发展教育事业。后来官庄小学用这笔钱设立了奖学金，用以鼓励村里的孩子们好好学习，季羨林对此很满意，说：这办法挺好；还说：一方面要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争取多出人才，同时也要注意调动教师积极性，只有教师认真教，学生才能学好。

一把红枣引起的乡情，一缕缕，一丝丝，永远撕扯不断。不，不光他自己，他也要让自己的孩子们不忘故乡。季羨林让家里人打电话，叫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工作的儿子季延宗回家，说家乡的红枣不吃可不行。延宗第二天冒着雨赶回家中。欢乐的餐桌上，季羨林又围绕着红枣，拉开了关于故乡的话题，沙哑的声音，舒缓的语调，

总是饱含着一股股浓浓的思乡情，有谁能不被这乡情感动呢？

这种思乡情为什么愈老愈烈，季羨林自己也说不清楚，“我不明白，为什么人越老对故乡感情越深。有机会我一定要回故乡住一段时间。” [47]

故乡水坑里的那个小月亮，似乎在向他招手，呼唤他回去看望。

6. 高山仰止

季羨林岂止是爱故乡，他更爱学生。

在北京大学的圈子里，谁都知道，季羨林是“国宝”级学术大师，但他最没有架子，燕园里男女大孩子们渴求知识的青春律动，是季羨林学问生命永远不竭的源泉。但是这绝不是季羨林之所以爱学生的简单因果联系，他爱学生，是出自更为深远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博大无私的胸怀。

季羨林对青年学生非常关心，寄希望于青年，希望青年学生能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北京大学最近一些年来，成立了许多学生社团，如“学海”社、“爱心”社、“修身”社等，季羨林与他们都有密切的关系。社团的学生，经常来找他座谈、作报告，他每次都利用这些机会对青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1995年，“一二·九”前夕，学生们请季羨林谈北京大学的传统。季羨林说：“人们讲北大的传统是科学，是民主，这都对，但依我看，爱国是北大传统的本质。”“五四是爱国，‘一二·九’是爱国，只讲科学与民主并没有揭示出本质。北大还有革命传统，不爱国就谈不上革命。” [48]像他这样讲北大传统，许多人还都是第一次听到。

北大学子的“修身”社团，制定了“修身计划”，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该社团也请季羨林去讲修身问题。他语重心长地对学生们说：“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想为国家干一番事业，

要先学会做人，先从自己的修养做起。我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点能做到就不容易。” [49]

季羨林爱学生的基础，是他对学生深刻的了解。

“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虐待，但他没有任何对学生的仇恨情结，他的一双眼睛依然清澈，依然明亮，没有仇恨，没有恐惧，只有无边无际的仁爱 and 悲悯，凝视着那些虐待他的、无知的年轻人。[50]

1986年冬天，胡乔木找他了解北大情况。

北大的学生有一些爱国活动，有一点“不稳”。乔木大概有点着急。有一天他让我的儿子告诉我，他想找我谈一谈，了解一下真实的情况。但他不敢到北大来，怕学生们对他有什么行动，甚至包围他的汽车，问我愿不愿意到他那里去。我答应了。于是他把自己的车派来，接我和儿子、孙女到中南海他住的地方去。外面刚下过雪，天寒地冻。他住的房子极高极大，里面温暖如春。他全家人都出来作陪。他请他们和我的儿子、孙女到另外的屋子里去玩。只留我们两个，促膝而坐。开宗明义，他先声明：“今天我们是老友会面。你眼前不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而是六十年来的老朋友。”我当然完全理解他的意思，把我对青年学生的想法，竹筒倒豆子，和盘倒出，毫不隐讳。我们谈了一个上午，只是我一个人说话。我说的要旨其实非常简明：青年学生是爱国的。在上者和年长者惟一正确的态度是理解与爱护，诱导与教育。个别人过激的言行可以置之不理。最后，乔木说话了：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说是要把我的意见带到政治局去。能得到乔木的同意，我心里非常痛快。他请我吃午饭。他们全家以夫人谷羽同志为首和我们祖孙三代围坐在一张非常大的圆桌旁。让我吃惊的是，他们吃得竟是这样菲薄，与一般人想象的什么山珍海味、燕窝、鱼翅，毫不沾边儿。[51]

正是出于对青年的无私的爱心，季羨林引发出一系列感人至深的行动：

在周围无人的情况下，他奋不顾身地跳到后湖里，救出一名五六

岁的落水儿童，这一项义勇行为本身足可以成为一名英雄；

到校医院去探望和慰问躺在病床上的学生；

寒假里，他请住校的学生到自己家里去吃年夜饭；

喜欢读书的小保姆返回故乡之后，他不忘给她寄去一些钱，而且注明：这些钱助你读书，都是爬格子所得，都是干净的。[52]

季羨林爱学生，全是出自这样一个信念：“我了解北大的学生，大学生是爱国的。”“大学生是爱读书的，不信你到北大图书馆看看。”[53]

在学生们的心目中，季羨林的性情气质是一个纯粹的儒者，受齐鲁文化的熏陶，他既是文化道德的传授者，又是文化道德的实践者，他是这两方面加在一起的儒者，道德文章双修，言传身教兼备，是文化道德的活生生的榜样。[55]人们感到他虽然是兼融百家、学贯中外的学界泰斗，但他身上从穿戴到神情，不但没有一点点的洋味，反而却让人深深体味出一种中国传统学者文人的文章、道德、风骨三者统一融汇而形成的儒者气度。这正是立足于中国文化深厚装备，又吸取了外域古代和现代文化的深厚营养，而形成的气质和风格。[54]

也正因为此，季羨林赢得了校内外乃至全国青年学子的崇敬。

不知名的青年，会忽然间给季羨林寄去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季老：

在这“一川烟草，满城风絮”之阳春三月，我们祝愿您：健康、快乐！

季羨林在路上走着，忽然会有一辆自行车停在他面前，学生会问一声“您是季羨林教授吗？”他停下自行车并不是找季羨林有什么事，而只是为了说一句：“季先生，我没有什么事，我很敬佩您。”

更有一次，是进修生王文宏陪季羨林外出，因为路不远，他们步行。这是当时的细节：

我们刚走出家门不远，就见迎面开过来一辆白色的轿车，汽车开到我们的面前，竟嘎然而停了。这时，只见一位年轻人从车上走了下

来。他走到季先生面前，双手合掌在胸，向季先生恭敬地鞠了一躬，当他知道了季先生要去的地方后，便请先生上车，可是却被先生婉言拒绝了，他对先生说了些什么，之后又向先生深深地鞠了一躬，便又回到自己的车里。我们又继续向前赶路。我们走的这条柏油小路虽然又平坦又干净，但是路面却不宽，为了让汽车畅快地开过去，我们尽量靠在路边走，可是，过了好一会儿，我们既听不到汽车的响声，也不见车从旁边擦身而过，便奇怪地回头看，这时我们看见汽车在我们身后缓缓而行，既没有太大的响声，又与我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们顿时明白了，汽车是在随先生而行，缓慢的速度，轻微的声音，表达的是对季先生的敬意。见到这个情景，季先生停住脚步摆手让汽车先开过去。可是，汽车见先生停住脚它也停了下来。当我们再向前走时，汽车才又缓缓地开动。走到岔路时，季先生又停住脚步向这位青年招手致意，年轻人在汽车上按了一下喇叭，驾驶着车向另一条路飞驰而去。望着走远的汽车，我心中一阵翻腾，当代的年轻人谁不说是洒脱随意，风风火火呢？这种表现形式是被世人认同的共性，是这位年轻人没有这份活泼，没有这种风风火火吗？不，不是的，他的这种沉稳，这种平静，完全出自于心灵中对于季先生的尊敬与爱戴。[56]

学生们还有更奇特的表达爱慕他的方式。

1998年9月25日，季羨林一早出门，想到外面呼吸点新鲜空气。夜里一点雷阵雨，把地皮打得湿漉漉的一片。因为雨小，没有积水。突然，老人的眼睛突然一亮，瞥见池塘边泥地上有一行用树枝写成的字：

季老好 98级日语

他一回头，在临窗玉兰花前的泥地上，也看到一行用树枝写的字：

来访 98级日语

先是懵然，莫名其妙，接着他恍然大悟：98级是新生，这些男女大孩子们，到他家来，带给他无法用言语形容的一番深情厚意。孩

子们怕打扰他，便用这一惊人的匪夷所思的办法，用树枝把他们的深情写在了泥地上。孩子们估计到他会看到，便悄然离开了他的家。孩子们用这种自己发明出来恐怕别人从未使用过的方式，把对他的深情，送到他这里来，惊出了他的两行老泪。[57]

.....

不管是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还是在山东大学、深圳大学，他的每次演讲，都是掌声雷动。演讲结束，总有一群青年学生将他围得紧紧的，递上一本本或书或本，请他签名留念，他们把“季羨林”三个字深深地、深深地记在心里，直到永远，永远。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两句话用在这里，简直丝毫不爽。

四、永无退休之日

1. 桃李满天下

1994年5月4日，北京大学校庆，过去40年来在校级担任过党政领导的老同志都被请回学校，与校同庆。多年未见的老校友，一旦重逢，倍感亲切，握手相对，春风满面。一位过去的校领导向大家提出一个问题：“你们知道北大哪一个系出的官最多吗？”对这一石破天惊的问题，谁也没有考虑过，当然是谁也答不上来，他就只好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了：“是东方学系！”这位过去的校领导，有统计数字，确确凿凿，无可怀疑。东方学系的人听了，当然都很高兴。[58]

到1996年，东方学系创办五十年，季羨林在北大执教五十年，他培养了多少学生？

当时人们说，季羨林有弟子三千。

此数恐怕不准。

1996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电教中心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建系五十周年及季羨林教授执教五十周年庆祝大会上，准确数字是东方学

系为国家培养了五千名德才兼备的语言、文学和研究人才。这五千名学子，活跃在外交战线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有的成为外交战线发展我国与世界各国人民友谊的光荣使者，有的为促进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合作做出了贡献，有的则辛勤耕耘，成为颇有造诣的东方学问题专家或其他方面专家，为弘扬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做着巨大的贡献。

单就我国解放以后的外交官来说，既有所谓“将军大使”，也有“八路大使”，还有“翻译大使”。

在“翻译大使”的队伍中，出自北京大学东方学系的特命全权大使，就有 12 位，曾出使 25 个国家，他们是：

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使黄振、华黎明；

驻大韩民国大使张庭延；

驻柬埔寨王国大使李世淳；

驻卡塔尔国大使谭声铮；

驻老挝大使李家忠；

驻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大使秦鸿国；

驻马来西亚大使钱锦昌；

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裴家义；

驻缅甸联邦大使陈宝鏊（女）；

驻前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大使黄振；

驻日本国大使徐敦信；

驻塞浦路斯共和国大使陈振友；

驻沙特阿拉伯王国大使郑达庸；

驻苏丹共和国大使吴德成；

驻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大使徐英杰；

驻泰国大使李世淳；

驻文莱苏丹国大使刘新生；

驻乌干达共和国大使徐英杰；

驻新加坡共和国大使张青；
驻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大使张真；
驻前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大使李成仁、郑达庸、李留根；
驻伊拉克共和国大使郑达庸；
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大使华黎明；
驻约旦哈希姆王国大使张真；
驻越南大使李世淳、张青。

这些驻外大使，占与我国建交国家的 1/7（1996 年），比例是相当高的。[59]

另外，东方学系毕业生中，也有部级干部，如外交部部长唐家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李成仁，少将一级的驻外武官也有一些。

这些外交官和其他行政官员，虽然不一定是季羨林的及门弟子或嫡系亲炙弟子，但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季羨林连续的教育生命的一部分，是其自然延伸。

2. 博士、硕士研究生

在季羨林的亲炙弟子中，成名的已不在少数。蒋忠新、黄宝生、郭良鋆、王邦维、段晴、任远、王文宏、钱文忠，……日本的辛岛静志（Seishi Karashima）也是出自他名下的博士。

他叫蒋忠新，原籍江苏武进，1942 年生于上海，从 1960 年进北大东方学系开始学习梵文，便成为季羨林的弟子，他英年早逝，但一生的生活道路几乎都与季羨林有关。季羨林以各种方式从各个方面给了他多得说不完的、令他无法回报的师恩，是他真正的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恩师。

蒋忠新在上学期期间，便感到季羨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丝毫没有教授架子。1965 年毕业以后，他留校工作，在他参加《大唐西域

记》校注工作的全过程中，在翻译《摩奴法论》、研究贝叶经的过程中，都得到季羨林具体而细微的指导。季羨林扶持、提携中青年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为他们作序、写推荐书、鉴定，尤其对青年人几乎是有求必应。他勤奋的治学精神，严谨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无时无刻不在鼓舞着弟子们。

蒋忠新，生前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任研究员，是该所的业务骨干。当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时，季羨林住在 301 医院，他几乎失声痛苦。

他叫黄宝生，上海人，1942 年 7 月生，他 1960 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到中文系报到，被告知调入东语系。在东语系的迎新大会上，系主任季羨林希望在中学学过英语的同学选择梵文、巴利文专业，他受命运安排，成为梵文、巴利文专业的学生。

在跟随季羨林学梵文、巴利文的五年中，深受季羨林一丝不苟作风的影响。梵语历史悠久，有丰富的语汇和复杂的语法，每个名词多达八个格，三个数，二十四种语尾变化，每个动词也按各种时态和语态，变化繁多。季羨林任课时，始终要求学生认准每个名词和动词的变化形态，最忌讳和反对瞎蒙瞎猜。学生们从老师这里受到了严格的语言训练，深知读解一首古典梵文诗，犹如组装一架机器，大部件、小零件全都要安装准确，整个机器才会运转起来；又像拼板游戏，每块拼板放对了位置，才会形成美丽的图形。这样严格的语言训练，使黄宝生和其他同学养成了认真细致的阅读习惯，让他们终生受益。

黄宝生得到季羨林具体的指导，如安排选读梵语文学作品、史诗、往世书、故事文学、古典梵语叙事诗和戏剧，以及梵语佛经《金光明经》、《佛所行赞》、《根本说一切有部律事》等等。季羨林所开巴利文课，直接采用英文文本的巴利文文法讲义；并选读巴利文佛典《本生经》和《法句经》等，还结合梵文巴利文教学，向学生们介绍印度古代文化知识以及各门学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黄宝生、郭良鋈夫妇和他的同学太幸运了，他们能登堂入室，经

常拜访季羨林。他们理解季羨林多读书、扩大知识面的深意。他们知道自己的老师，或者通读《太平广记》，或者通读《鲁迅全集》，对于名篇名作，多能背诵，因此他们也开卷有益，广泛接触中外各种名著，扩大了自己的知识面。

黄宝生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

他叫王邦维，四川重庆人，1950年9月生。他于1979年考入东语系研究生，成为季羨林名下四个梵文巴利文研究生之一。王邦维听季羨林讲过两个故事：

一位德国很有名的医学教授，向以严格著称。一次考试，他进了教室，拿出一样东西，放在桌子上，然后向学生发问：“这是什么？”学生看在眼里，觉得桌子上的东西是猪肝，但转念又想：“教授的考试，怎么可能会这么简单呢？”学生不知所措，虽然觉得真像是猪肝，但始终不敢说是猪肝。到了最后，也没能回答教授的问题。这时教授只好宣布：“这是猪肝。”学生此时似乎才明白了一些什么。教授问学生：“你大概已经认出这是猪肝，可是为什么不敢回答呢？看见是什么，就答是什么，这就是科学。事情不就是这样简单吗？”

季羨林通过这个故事，告诫学生，一定要发扬并坚持实事求是的严格精神。另一个故事是：

一次考试，也是这位教授，问学生一个问题：“你看我这衣服，是什么颜色？”学生有些犹豫。教授穿的是一件很旧，发黑的衣服。学生端详了一阵，回答说：“教授先生，您的衣服，曾经是褐色，但现在已经变成了黑色。”教授听了，大加赞赏，说这位学生回答得准确而全面。原来这位教授平时不注重穿着，他的衣服，已经穿了些年头，旧而且脏，颜色已经变了，显得发黑。[60]

学生们从这些看来卑之无甚高论的故事中，得到启迪，受到感染。

王邦维和他的研究生同学在作毕业论文时，选什么作论文题目，

季羨林从来都是让他们自己考虑。学生们提出了一个选题，季羨林并不先说行还是不行，只是问他们为什么要选这样的题目，如果真要做，打算怎么做。结果学生的想法往往被否定，只得再动脑筋，再提出想法。新想法也可能再被否定，在反复的被否定中间，学生们终于变得比较明白起来，题目也确定了。

王邦维在确定论文题目之后，其中有一项任务，是对一些古代刻本作校勘。其中的一种是藏在北京图书馆的《赵城金藏》，是稀世文物。耿引曾教授为他与北图联系，结果不允许研究生去查阅，但说允许季羨林这样的学者看。这是在 1981 年，季羨林既是北大副校长，又是南亚研究所所长，还有其他兼职，工作极其繁忙，他知道这件事后，一点都没犹豫，就说：那我们找个时间一起去吧。

于是安排了一天，先生为此专门与我一起去了北图。以下的一切都很顺利。卷子从书库调出来，我立刻开始工作。先生先是站在旁边，看着我作记录。过了一阵，先生拿出早准备好的一摞《罗摩衍那》的清样，读自己的清样。就这样，整整半天的时间，先生一直陪着我，直到我校完录完卷子。[61]

后来，王邦维又读季羨林名下的博士生。

当时，季羨林主持着一个不定期的“西域研究读书班”。

中国古代典籍中的西域，指称的范围从小到大，包括今天的新疆、中亚各国、印度乃至伊朗、西亚和欧洲，中心区域是中亚。西域是许多学科的学者都关心的焦点。20 世纪 80 年代初，季羨林把一些研究工作与西域有关的学者召集在一起，不定期地聚会。有话题即谈，无话则不聚。

每次聚会，季羨林必到，而且常是提前到场。每个人的发言，他都认真听，有时也提出疑问。有一次，是博士生王邦维讲博士论文题目，讲印度佛教的部派问题，季羨林就提出许多质询性的意见。

对毕业论文，季羨林要求博士生特别要注意学术规范问题。他告诉学生们：按照德国大学的制度，一篇博士论文在答辩前一个小时，

看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发表了同样的观点，此文即告作废，一点都不含糊。季羨林要求学生严谨精细，连引文也不能有丝毫马虎。他告诉学生德国人做学问的彻底性是尤其值得学习的。

德国学者无论研究什么问题，首先就是努力掌握与这个题目有关的文献，包括古代的和近代的，包括德国的和外国的。德国学者都广通声气，同世界各国的同行几乎都有联系，因此，全世界研究动态，他们基本上都能掌握。对自己要研究的问题的各种学说，都有成竹在心。在这个基础上，或者与此同时就大量搜集资料，不厌其详，不惧其远，只要能搜集到的，全都搜集。这两件工作做完以后，才努力分析资料，然后作出恰如其分的结论。[62]

学生们从季羨林这里得知，德国学者严谨到要求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不仅要求引文注明页数，而且要注意行数。

这些教导，使学生从一开始作论文，就努力遵循从内容到形式的学术规范，有时为了核对一个页码，要去图书馆查阅刚刚还掉的书。[63]

王邦维从 1979 年到现在，一直在季羨林身边学习和工作，年纪轻轻，曾经是北京大学东方学系教授，兼任东方学系副主任，现在是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院长、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主任。

他叫钱文忠，江苏无锡人，1966 年生。他从 1984 年入北大东语系，1989 年毕业后，又师从季羨林读硕士学位，1992 年毕业。他是季羨林的弟子中惟一个学士论文、硕士论文都由季羨林指导的，这自然是他的荣耀。

在八年求学期间，钱文忠 1987—1988 年曾在德国汉堡大学印度与西藏文化历史学院留学，其余七年均追随季先生左右，更能贴近季羨林的日常生活，有机会看到季羨林作为人师却又鲜为人知的一面。下面是钱文忠的一次经历：

1990 年 1 月 31 日，先生命我随侍前往燕南园向冯友兰、朱光潜、陈岱孙三老贺年。路上结着薄冰，天气极为寒冷，也已是八十高

龄的先生一路上都以平静而深情的语调，赞说着三位老先生的为人治学。先到朱先生处，只有朱夫人奚先生在家，先生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再到冯先生三松堂，只有宗璞和蔡仲德先生在家，……先生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最后到陈先生处，陈先生倒是在家，见先生来访，颇为惊喜，先生仍是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其时两卷本《陈岱孙文集》正好出版，陈先生从内室取出书，题签，起身，半躬着腰，双手把书送给先生，先生也是起身，半躬着腰，双手接过，连声说：“谢谢，谢谢。”冬天柔和的阳光，照着两位先生的白发。

[64]

钱文忠记得，一次他陪季羨林散步到办公楼前，恰逢裘锡圭先生低着头走在前面，大概是在思考问题。季羨林低声对他说：“你知道吗？裘先生，古文字专家，专家。”说话时翘起大拇指，微微晃动。

钱文忠记得，一次一个学者评职称，请季羨林和蒋绍愚写评审意见，表格先送到季羨林处，季羨林写好、封好，让钱文忠送交蒋绍愚。蒋绍愚拆开后，愕然说道：“这可怎么办，季先生怎么这么写？”原来季羨林把自己的意见写在了专家推荐栏的底下一格，逼得蒋绍愚只能把自己的意见签在上面了。

钱文忠还记得，一天傍晚，他去季羨林家，老师从书房拿出一封信，对他说：“你知道上海有位徐文堪先生吗？他给我寄了一些有关吐火罗研究的资料，有些我没有见过，真是难得。你回上海，替我看看徐先生。” [65]

钱文忠现在已经是闻名全国的教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多次讲座的演讲者，有众多的粉丝了。

学生们从季羨林这里感受到的，是大海般宽广的胸怀，泰山般的崇高境界。

3. 进修生和外国博士

她叫王文宏，是辽宁人，生于1956年1月。她已经被延边大学中文系聘为副教授了，但一直想圆到季羡林身边进修禅学与美学的梦。她终于在1995年秋天，来到了北大东语系，从季羡林进修。

王文宏的丈夫叫贾锐，是延边大学出版社社长，学中文出身，季羡林对他的印象很好，认为他刚强，正直，干练，是一个决不会阿谀奉承的硬汉子。而她与丈夫迥乎不同，多愁，善感，温柔，纯朴，感情充沛，季羡林认为她感情超过了需要。她不相信天底下还有坏人，而自己是个才女，写诗，写小说，研究美学、文艺理论和禅学，在延边地区颇有名气，是一个极有前途的女学者。1986年，通过北大中文系教授刘烜介绍，她认识了季羡林。1995年，以访问学者身份重返北大，投到季羡林门下。

季羡林向来认为，自己对美学和禅学，虽然也看过一些书，并且有些想法和看法，写成了文章，但自认实际上是“野狐谈禅”，成不了正道的。所以蒙她不弃，从自己受学，使得他经常觳觫不安，如芒刺在背。他甚至觉得，也许是自己那一些内行人决不会说的石破天惊的“奇谈怪论”，使她有了点兴趣？可是就连这一点，他也是没有自信的。

寒假之时，王文宏的丈夫贾锐和女儿未未也到北大来了。未未是个12岁的女孩，季羡林觉得她同别的年龄差不多的女孩不一样，面貌秀美，逗人喜爱，但却有点苍白；个子不矮，但却有点弱不禁风；不大说话，说起话来慢声细语。他不相信王文宏说的，这孩子是娇生惯养惯了，有点自我撒娇，他看不像是这样。对这样一个来自长白山下的小女孩，季羡林觉得像谜一样。

有一天，季羡林请王文宏全家和几位朋友吃饭，未未仍然少言寡语。吃完饭，他们步行回北大，因为他居师座，王文宏便从左边扶着他的左臂搀扶着自己的老师。而他自己并不觉得已经老迈，老态龙钟到非让人搀扶不行的地步，但弟子这一番心意自己明显不好拒绝。就索性倚老卖老，任她搀扶。心里暗觉得好笑，如果再有一个龙头拐

杖，岂不有点旧戏台上佘太君或者国画大师齐白石的派头？正在这样想的时候，未未一步抢上前来，抓住季羨林的右臂搀扶住他，还示意让妈妈放松搀扶，仿佛搀扶他成为她的专利。

1996年夏天，王文宏已经结业。因为要给老师过85岁生日，特意留下来为老师祝寿。丈夫贾锐和女儿未未又一次来到北京，邀请季羨林的一些朋友，为他设寿宴。

寿宴设在圆明园，季羨林旧地重游，觉得已不认识圆明园了。园内游人摩肩接踵，多如过江之鲫，商人们竞奇斗妍，各出奇招，用种种门道，使游人如痴如醉。为季羨林祝寿的人有十六七个，痛痛快快地畅游了半天，福海泛舟，饭店盛宴，他愉快地过了85岁生日。

8月7日，王文宏带未未向季羨林辞行，这样的别离，对于一个感情极为充沛的人来说恐怕会受不了。下面是临别时的一幕，场景中有季羨林、王文宏和未未。

在许多人心目中，我是一个怪人，对人呆板冷漠，但是，真正了解我的人却给我送了一个绰号：“铁皮暖瓶”，外面冰冷而内心极热。我自己觉得，这个比喻道出了一部分真理，但是，我现在已届望九之年，我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天使和撒旦都对我垂青过。一生磨炼，已把我磨成了一个“世故老人”，于必要时，我能够运用一个世故老人的禅定之力，把自己的感情控制住。年轻人，道行不高的人，恐怕难以做到这一点的。

现在，未未和她妈妈就坐在我的眼前。我口中念念有词，调动我的定力来拴住自己的感情，满面含笑，大讲苏东坡的词：“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又引用俗语：“千里凉棚，没有不散的宴席。”自谓“口若悬河泻水，滔滔不绝。”然而，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文宏……泪珠只停留在眼眶中，间或也滴下两滴。而未未却不懂什么诺言，也不会有什么定力，坐在床边上，一语不发，泪珠仿佛断了线似地流个不停。我那八十多年的定力有点动摇了，我心里有点发慌。连忙强打精神，含泪微笑，送她母女出门。一

走上门前的路，未未好像再也忍不住了，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伏在我怀里，哭了起来。热泪透过了我的衬衣，透过了我的皮肤，热意一直滴到我的心头。我忍住泪，捧起未未的脸，说：“好孩子！不要难过！我们还会见面的！”未未说：“爷爷！我会给你写信的！”我此时的心情，连才尚未尽的江郎也是写不出来的。他那名垂千古的《别赋》中，就找不到对类似我现在的心情的描绘。何况我这样本来无才可尽的俗人呢？我搀着未未的胳膊，送她们母女过了楼西曲径通幽的小桥。又忽然临时顿悟：唐朝人送别有灞桥折柳的故事。我连忙走到湖边，从一棵垂柳上折下了一条柳枝，递到文宏手中。我一直看她母女俩折过小山，向我招手，直等到连消逝的背影也看不到的时候，才慢慢地走回家来。此时，我再不需要我那捞什子定力，索性让眼泪流个痛快。〔66〕

这样的场面，连使了定力的季羨林也控制不住，一般人会如何则可想而知了。

王文宏因为这一年来随季羨林进修，经过了无数感人的场面，她亲见许多青年学子围住季羨林，让他签名留念的动人情景。她曾经多次探询原因，季羨林先生何以在年轻学生心目中有如此巨大的魅力？何以受到在心目中已经没有崇拜的学生们如此的崇拜？最后，她从乐黛云教授敬赠给季羨林一部著作扉页上写的一段话找到了答案：

羨林吾师：

如果我有一点成绩，那是由于学习了您的风范。

如果我还有许多失误，那是由于我学习得还不够。

原来，正是季羨林的风范，是他独立于世，立德、立功、立言的人格魅力，引发了青年学子们的崇拜热潮。〔67〕

王文宏现任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网络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在季羨林名下的外国留学生中，日本的辛岛静志博士是比较典型的一位。他是日本大分县人，1957年出生，1987年10月开始从季羨

林学汉译佛教经典。

辛岛静志早在 1980 年季羨林到东京参加印度学、佛教学会议时，就听过他的学术报告，并下了去中国留学，从事印度学和汉译经典研究的决心。

就在 1980 年季羨林访日时，日本学者为他举行过一次招待会。当时人们都知道他是北大副校长、著名敦煌学学者，而对他在印度学方面的成就和贡献，却不甚了了。于是便出现了颇有戏剧色彩的一幕：

宴会进入高潮时，原实先生借着酒意问先生：“听说您在德国学习过梵文，教授是哪一位？”先生答道：“在哥廷根，教授是瓦尔德施米特。”原实先生又接着问：“您或许就是那位研究梵语不定过去式（Aorist）的 Dschi Hian-Lin 先生？”异地遇知音，或者换句话说，自己的成绩得到了他人的肯定，常人至此，早会欢喜至极。先生则仅淡淡地说：“是的。”事后，原实先生告诉我，他简直不能相信，40 年代发表了两部德文论著、推动佛教混合梵语研究的学者，三十多年后竟坐在他面前。若不是被原实先生问到，先生必是不会自己提起的。先生是真正做到了“澹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68]

进北大不久，在北大召开了中日佛教研讨会，日方团长是辛岛静志在东京读书时的老师中村元先生。这次会上，辛岛静志第一次与自己的老师谈话。三人一起去参观北大校园，季羨林与中村元用中、英、德三种语言对话，两人都是印度学权威，学生在旁边听，自然觉得十分有趣。当走到临湖轩前的时候，季羨林回头看了自己的外国学生一眼，微笑着说：“竹林三贤。”

从 1989 年起，辛岛静志开始作博士论文，题目是《法华经汉译本与梵藏本对比研究》。梵文《法华经》写本集成一套十二卷，是写论文必不可少的，而此书只有季羨林家里有。

这样，几乎有两年的时间，学生每天都在老师的书房里读书，季羨林就像当年的瓦尔德施米特一样，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绝学传授给

异国青年。读书读累了，学生可以随便地翻阅老师书架上的书，中文的、英文的、德文的，还有梵文的，有时就会身不由己地超越时空，恍惚于古今中外书籍的世界之中。保姆小阿姨会端过一杯茶，把学生再拉回现实。

学生看到，老师的书桌上有本德国日历，有时则放着正在执笔写作中的散文原稿，学生自然也可以先睹为快。在老师的家里读书，总是和美好的景物联在一起，这些是学生永远可以回忆的美好经历。

辛岛静志现在已经成为日本财团法人东方研究会的研究员、日本创价大学国际佛教学高等研究所教授，即使是这样，他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总要想起自己的老师，想起老师的书房，想起书房前的池塘，这时，他便觉得从容一些、平静一些，有了力量。季羨林教给他的，是远离世俗，平心静气地读书，老实地做人。

异国学生在遥祝老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4. 退職而不退休

季羨林从北京大学副校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了。

季羨林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的位置上也退下来了。

当他刚卸任北大副校长之时，他的老朋友臧克家为他衷心地祝贺了一番。因为季羨林是臧克家最知心、最要好的朋友之一，解放初，他们互相来往颇多，季羨林住翠花胡同，臧克家住笔管胡同，互相拜访的机会是很多的。季羨林入党之后，成为模范党员，职务也渐渐多了起来，而朋友之间晤会畅谈的机会却越来越少了，到季羨林当了副校长，他只能在春节上午到臧克家家去看望他们，与他们全家团聚半天，共进午餐。行政职务压得季羨林喘不过气来，一天里有时候竟然能开两个会，而学术性的会少，事务性的会多，因此而叫苦不迭。每年年初，会议已经排到四五月份。为此，季羨林也在臧克家面前诉

苦，他怅然言之，老朋友惘然听之，两颗心是一个感觉。为鸣不平，臧克家在1980年10月写过一篇短文，叫做《兼职太多压坏人》，为季羨林和白寿彝两位大学者打抱不平：

我们搞社会主义，搞四个现代化，处处需要有学识、有专长的人才。但应当人尽其才，物尽其力。一个人即使博学多能，精力充沛，也难以身兼多职，一个个胜任愉快。是不是应对有专长的同志，给以便利条件，给以充分时间，使他从事专业，发挥所长，做出成绩，贡献四化，其余无关紧要的差事，可以削去。中国地大物博，人才济济，提携后进，使年轻的同志大显身手，岂不两便？现在，许许多多年轻的人在苦闷待业之中，而老一辈科学家身兼职务达三十二项之多，压得喘不过气来，叫苦不迭。这现象岂不有点怪？

老诗人呼吁：

关于人才的使用，是否也该调一下？一人身兼多职的现象，似乎可以休矣。[69]

到1984年，季羨林终于从北大副校长的宝座上撤下来了。臧克家从报纸上一看到北京大学新领导班子的名单，副校长中，没有了季羨林的名字，心头为之大喜，顿觉老友肩头，减却了一份重量，立即乘兴走笔，致函祝贺。

第二天，季羨林便给臧克家写了一封耐人寻味的回信，信上说：

你的祝贺，实获我心。去掉乌纱，如释重负。不过这只能算是一个开端，外面还有不少的近似乌纱的“会长”一类的头衔，有待于去掉。看《北京晚报》，白寿彝同志讲，七十岁以后他感到才开始钻研学术，我极有同感，有好多工作，需要我们去。[70]

臧克家深有同感，他自己虽是诗人，从事写作，但社会活动太多，也使他大感杂务纷纭，不能把精力完全用于所好、所长上。他认为，人到老年，知识、经验丰富了，思想性提高了，见解也成熟了，达到了学术研究的高上境界，是“老更成”了，因此，一些行政事务性的工作，别人可以代为之，而学术专业，如吐火罗文，如历史研

究，却是几十年精力的结晶，是别人无法代替的。一个名义就算是一个花环，套在脖子上太多了，虽然光荣，但也能压坏人。所以，臧克家建议，去掉空的，干实的。去了别人能干的，挑起自己能专干的。要珍惜专家们，特别是老专家的宝贵学术研究工作，不要把他们一刻千金的光阴，再消磨在会议上，那是一种人才的浪费！[71]

但是，季羨林从副校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之后，又担任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任期为五年。常委会的工作是非常多的，而且经常有人找上门来，要求往上边反映这个问题，反映那个问题，有些完全不着边际的问题，不知占去了他多少时间。还不时要参加这样那样的社会活动，这对于一个内向的人，是一个相当大的难题。

我自己检查，我天生是一个内向的人，我自谓是性情中人。在当今世界上，像我这样的人是不合时宜的。但是，造化小儿仿佛想跟我开玩笑，他让时势硬把我“炒”成了一个社会活动家，甚至国际活动家。每当盛大场合，绅士淑女，峨冠博带，珠光宝气，照射牛斗。我看有一些天才的活动家，周旋其中，左一握手，右一点头，如鱼得水，畅游无碍。我内心真有些羡慕愧煞。我局促在一隅，手足无所措，总默祷苍天，期望盛会早散，还我自由。[72]

1989年之后，季羨林终于又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位置上，从行政职务上退下来了。然而其他方方面面的实职、虚职，仍然是他永远无法摆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学位委员、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研究会会长、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九十多个虚实职务，无数的顾问、专家、委员、主任、主编，许多推不掉的会议和活动，仍然在等着他。

季羨林生命时钟上的弦，永远上得满满的，满满的。

第十一章 学界泰斗

一、大杂家

1. 杂家成因

中国学术史上从汉代开始出现了“杂家”的概念，指称的是战国至汉初的一个博采各家学说的综合学派。

学派的称谓，早在《史记》一书中就有。其中的《太史公自序》，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第一次提出先秦至汉初学术上的六个主要派别，它们是：阴阳、儒、墨、法、名、道德，认为六家所从之道不同，然殊途同归，皆“务为治者也”。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进一步扩大为“九流十家”，它们是：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小说家。而十家中“其可观者九家而已”，这是因为小说家属于文学范围以内，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所以称“小说家”之外的九家为“九流”。这九家“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

而“九流”中的“杂家”，其特点是“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贵，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颜师古进一步的解释是“王者之治，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所以杂家学派大体上反映了封建“大一统”国家在创建过程中，一种文化融合的趋势。

季羨林之被称为“杂家”，当然与古代学术史上的学派不同，此“杂家”不是兼儒墨、合名法于“九流十家”之道无不贯综，而是指学术研究兴趣广泛，涉猎面宽，不专一，但兴趣所及，又都有成就。

就学术界普遍的看法来说，季羨林是兼容百家、学贯中外的人文社会科学界泰斗，是语言学家、民族学家、翻译家、史学家、教育家、佛学家，……其涉足学术领域之广，当世罕见，宗教、语言、哲

学、文学、历史、经济……大凡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几乎无不留下季羨林探索的足迹。

追究一下季羨林之成为“杂家”的起因，是当代学术最引人注目的课题之一，也是学界学人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

季羨林自己轻描淡写，把原因归之于“偶然性”。而偶然性其实就是除掉迷信成分的缘分。[1]

可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缘分”啊！

上小学时，在《四书》之外，《彭公案》、《济公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几乎是无书不读，而且还开始学习英语有了浓厚的兴趣。

中学时代，英语和作文都成为班、校之冠，甚至开始翻译英国作家吉卜林的短篇小说。

到大学里，选系科时想过学数学或者经济，最后学了外国文学，学的课程包括文艺复兴文学、中世纪文学、现代长篇小说（大一英文就念J. 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莎士比亚、欧洲文学史、中西诗之比较、英国浪漫诗人、中古英文、文学批评等，还选修文艺心理学、佛经翻译文学、陶渊明诗等课程，兴趣之广，语言、文学、历史、宗教几乎都涉及到了。他还写散文，又搞翻译，在天津《大公报》副刊发表书评，在叶公超主编的《学文》上发表散文，译作屠格涅夫的《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呵……》、史密斯的《蔷薇》、杰克逊的《代替一篇春歌》也都发表出来了。

到德国哥廷根大学，他又念了十年，学习了梵文、巴利文、吠陀、吐火罗文、阿拉伯文等，读吠陀、《大疏》、《十王子传》。

回国后，季羨林兴趣最大、用力最勤的佛教梵文和吐火罗文研究，由于缺少起码的研究资料，已无法进行。适者生存，季羨林为此提出一句口号，“有多大碗，吃多少饭”。国内有什么研究资料，就从事什么研究工作，反正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管多么不甘心，也只能这样做了。他于是只得来翻译文学作品。解放初期，他翻译了德国

女小说家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说，之后又翻译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和《优哩婆湿》以及《五卷书》和《佛本生故事》等篇章。但此时他没有立志专门研究外国文学，用力最勤的还是中印文化关系史和印度佛教史，《唐代中印关系史》的提纲都已写好，可惜因循未果。文革之后，迫不得已，为满足闲不住的习惯，翻译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所以，季羨林之成为“杂家”，主观、客观因素都有。

我在大学里读的是西洋文学。毕业后，因为找不到适当的工作，滥竽充数，在高中教了一年国文。随后出国，开始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等。回国以后，又由于种种原因，原来的研究工作，难以进行，我又东抓西抓，翻译过德国短篇小说和古代印度戏剧、大史诗、寓言童话集等等，也写过有关中印关系、印度历史、印度古代语言和佛教以及吐火罗文的文章。总之，我从一开始就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杂家”。[2]

在另一个场合，季羨林又说：

我这一生是翻译与创作并举，语言、历史与文艺理论齐抓，对比较文学、民间文学等等也有浓厚的兴趣，是一个典型的地地道道的“杂家”。我原以为，我成为“杂家”是被环境逼出来的。现在看起来，似乎并非如此，我真好像是有一些“杂家细胞”。现在环境早已改变了，而我仍然是东抓西抓，还乐此不疲，这事实我能否认掉吗？我早已年逾古稀，至今仍无改变的迹象和意愿，我恐怕将以“杂家”终了。[3]

用张中行先生的话说，季羨林先生是中外知名的学者。知名，这名确是实之宾，与有些人，舍正路而不由，也就真像是抁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不同。他会的太多，而且既精且深，张中行自认只能站在墙外，自然就不能瞥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张中行谦虚地说：退一步，不求美，不求富，自己也不是毫无所见。就算是概貌吧，季羨林的学问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语言，他通很多，母语即汉语之外，世上通行的英、法、德之类也可不在话下，他还通早已作古的梵语和吐

火罗语。另一个方面可以算作重点，是研究、翻译有关印度的经典著作。这方面，他用力最多，贡献最大；说大，还有个理由，是因为这类必须具有为学术而献身的精神才能从事的工作，很少有人肯做，也很少有人能做。还有一个方面是他兴趣广泛，有时也从象牙塔里走出来，走向十字街头，就是说，也写杂文，甚至抒发幽情的散文。[4]

这里先从语言学、宗教学、民族学、翻译、人学、模糊学、教育学等学科说起，其他方面如中外文化交流、传统文化、散文创作，则另外重点叙述。

2. 语言学家

季羨林是国内外公认的著名语言学家，是中国语言学会会长、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他所精通的语言，几乎可以和他的恩师陈寅恪先生相媲美。对此，我们已经比较熟悉了。现在我们来看他在语言学研究方面的贡献。他的贡献太大，只能从他的几部代表性论著中窥其一斑。

《印度古代语言论集》，收入了季羨林用德、英、汉三种语言写成的论文十三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出版。

在十三篇论文中，五篇德文，三篇英文，五篇汉文。其中用德文发表的五篇中有三篇论文，即博士论文《〈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化》和其姊妹篇《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语-am 向-o 和-u 的转化》（德国《哥廷根科学院集刊·语言学历史学类》1944 年）、

《使用不定过去时作为确定佛典年代和来源的标准》（《哥廷根科学院集刊·语言学历史学类》1949 年），这些论文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对现存的佛教经典进行对比和分析，从而描述、发现和证明古代印度语言，尤其是佛教语言各种形态的变化特点，为判定这些经典产生的地点、年代以及它们在印度及中亚地区流传的历史状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他的论文在该领域多有创见，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多有

开拓意义。

季羨林第二部语言学方面的著作是《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出版。

这部著作收入季羨林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所写的论文四篇，这些论文引证巴利文《小品》中的一个故事，说明原始佛教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语言问题。佛教在初兴时是反对占统治地位的婆罗门教的，坚决反对婆罗门教的语言梵文，其中的佛所说的一句话“我允许你们，比丘呀，用（你们）自己的语言来学习佛所说的话”[5]，这种语言既不是梵文，也不是纯粹的摩揭陀语，他最后证明原始佛典的语言是佛陀自己出生和活动的印度东部的古代半摩揭陀语。他的结论是：

一部用东部方言，更具体一点说，就是用古代半摩揭陀语写成的佛典曾经存在过。这就是所谓原始佛典。后来佛教其他宗派的经典，巴利文佛典也包括在内，都是或多或少地从这一部佛典里演变出来的；最古的那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翻译过来的。[6]

在这几篇论文中，季羨林对美国梵文学者弗兰克林·爱哲顿在《佛教混合梵文文法和字典》这一部著作中的错误观点和方法论进行了批驳（《再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对 1976 年在德国哥廷根举办的“最古佛教传承的语言”即“佛教研究座谈会 II”上贝歇特等人所主张的观点“既然佛的语言政策允许使用各自的方言，而方言又是多样化的，当时还没有可能规范化。说方言的人能互相了解。因此，不可能有一个原始佛典的语言”进行了系统的批驳，对他们的方法论尤其提出了质疑，认为在贝歇特的心目中，语法现象完全被实用主义态度所曲解，好像是小孩玩积木，可以任意摆弄，所以其方法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三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所有这些论文用翔实的资料，扎实的论证，匡正了一些所谓“国际权威学者”的错误结论，具有国际一流学术水平，至今对佛教尤其是原始佛典的研究仍有具体的指导意义。季羨林在论文中，把研究印

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印度佛教历史结合起来，从中探寻出一些主要的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及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的过程，这对佛教研究的指导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3. 翻译家

季羨林从上世纪 30 年代开始发表翻译作品，已经有七十多年的翻译史，仅是在国内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译作，就有《论印度》（卡尔·马克思著，与曹葆华合译，人民出版社 1951 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作家出版社 1955 年）、《沙恭达罗》（迦梨陀娑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五卷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优哩婆湿》（迦梨陀娑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罗摩衍那》（共八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1984 年）、《炉火情》（黛维夫人著，广西漓江出版社 1995 年）……他所翻译的巨著《罗摩衍那》荣获 1994 年国家优秀图书一等奖。

季羨林在从事翻译工作的开始，就十分注意翻译的理论探讨。

季羨林反对重译，比方说一本原来是用俄文出版的著作，译者不从俄文翻译成中文，却从日文翻译成中文，翻译已经倒了一次手，结果译文的意义似乎明白，又似乎不明白，念一句就像念西藏喇嘛的番咒，一个长到两三行充满了“底”、“地”、“的”的句子念到一串的时候，已经如坠入五里雾中，再也难挣扎出来了。这种“重译”或转译现象的原因很复杂，但主要原因是不懂原著的语言。

20 世纪 40 年代，季羨林认识一个人，明知道他一个俄文字母都不会，但从俄文译出来的作品却汗牛充栋。上海的一个大学者，以译俄国社会科学书籍出了名，但他根据的却是日译本。因此，季羨林主张，倘若对一个外国诗人、戏剧家或小说家真有兴趣的话，就应该有勇气去学他那一国的语言。

季羨林还反对以译者冒充著者的缺德行为，丁福保“著”了一部

《佛学字典》，原来却是日本织田得能的《佛教大词典》的翻译。对这样的盗窃行为，季羨林异常气愤。[7]

1990年代，季羨林主编一套丛书。1993年，一个朋友推荐一部译稿，收入他主编的这套丛书。朋友介绍说，译者英文水平是高的，曾多次担任口译工作，胜任愉快，在笔译方面也出过两部书。这样的朋友和译者应该说都是信得过的。

译稿就要寄出版社付排了，但季羨林一时心血来潮，想看一看译稿。和原文对照，发现了一些问题，他自己拿不准，又央求周一良教授把译文同原文对上几页，结论也是译文有问题，不能寄出版社。

为此，季羨林重申严复的“信、达、雅”原则，“译事三难，信、达、雅”，仍然是可以信守的。他认为三个字中，以第一个“信”字为基础，为根本，这个字做不到，就根本谈不到翻译。探讨翻译问题，评论翻译作品，首先就是看他信不信，即是否忠实于原文。这一点做不到，就不叫翻译。他把译本分成三类：第一类，信、达、雅都合于标准，是上等；第二类，能信，而达、雅不足，是中等；第三类，不信、不达、不雅，是下等。

译而不信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外语水平，一是工作态度。

季羨林说，学习外语，有如鲤鱼在黄河中逆水上溯，前一段也许并不困难，一旦到了龙门跟前，想要跳过龙门，却万分困难。有的人一辈子也跳不过龙门，终生只能是一条鲤鱼。每一种外语都有一个龙门，天赋高而又勤奋者，龙门近一点，否则就远。跳过一个龙门，才勉强会有一点语感，这一门外语就算是被掌握，被征服了，而这一突变是用艰苦的劳动换来的。

而工作态度是认识问题。有的人当自己还是一条鱼的时候，便傲然认为自己已经成龙，连字典也懒得查了。当年赵景深将“天河”、“银河”译为“牛奶路”，受鲁迅讥讽，成为译界的笑话，但现在这样的例子不仅没减少，反而有所增加，几乎比比皆是，如把“牧师”译为“上帝的人”，“导论到此为止”译为“导论是这样远了”，都

是由于缺乏自知之明或者由于懒惰而造成的笑话。更糟糕的是原文看不懂，却不请教人，二不查字典，便胡译一通或者干脆删掉，此属假冒伪劣一类。

为此，季羨林提倡建立和健全翻译的监督机构，以克服这种“翻译危机”。[8]

季羨林自己在翻译过程中的认真负责，仔细推敲，《罗摩衍那》是最好的证明。他作为一位举世公认的语言大师，不论是在从外文翻译成汉文时，还是在从古代汉语翻译成现代汉语时，抑或是在自己的散文创作、学术研究时，都强调一个“真”字，追求一个“真”字。他成功的窍门是：

事实上，我现在胆子越来越小，经常翻查词典；往往是心中想出一个词儿，如果稍有怀疑，则以词典为据；词典中没有的，决不写进文章。简直有点战战兢兢的意味了。[9]

这样的一种认真态度，是任何进行翻译、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人应认真学习的。

4. 教育家

季羨林教过一年高中，教过六十多年大学，当过三四十年系主任，6年副校长，积累了许多丰富的教育经验，他之作为教育家是当之无愧的。他兼职中有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等职务，都是对他作为教育家的肯定。

作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季羨林关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曾经撰文专门谈自己在这方面的观点和经验。他的外语教学法和培养研究生的经验，都受到过好评。然而作为著名学者兼教育家的季羨林，最关注的是高校学生的人文素质。

针对当前我国教育界重工科轻理科、重理科轻文科的偏向，季羨林提出提高大学生“人文素质”的问题。他认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要有人才，要出人才，不能没有教育。社会上一股只重视科技的风气，对学生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两个文明实际上只抓了物质方面，而忽视了精神方面。他认为只抓物质，只抓科技而能兴国者，未之有也。

季羨林注意到，《齐鲁学刊》有一篇文章讲到人文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但没有引起太多注意。1995年10月22日，《光明日报》报道江苏省张家港市的经验，有一篇《精神文明也出生产力》的文章，用了一个“出”字，绝妙，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抓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就是抓精神文明建设。

人文素质教育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绝非一个方面、一种方法所能胜任，必须各方面通力合作，利用一切能利用的方法来进行，才能奏效。但是教育的重点在于两方面，一是爱国主义，一是骨气、气节。

他认为，爱国主义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但爱国主义有两类，有真假之别，有正义与邪恶之别。被侵略、被压迫国家和人民的爱国主义是真的、正义的爱国主义。侵略者、压迫者的“爱国主义”是假的、邪恶的“爱国主义”，只要想一想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的“爱国主义”，就一清二楚了。

骨气、气节属于道德范畴，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伦理道德占的成份最大。讲是非、辨善恶更是核心之一。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说得最为具体生动，对于“非”的东西，对“恶”的东西，必不能迁就妥协，虽牺牲性命，也在所不辞，这就叫做气节或者骨气。

爱国主义和气节，就是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本钱，必须善于利用。

为配合人文素质教育，季羨林建议：

在大学所有的学科中，文、理、法、农、工、医，都普遍开大一国文课，份量不必太大，不及格，不能毕业；

在所有的学科中设哲学课，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纲领，讲一点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和自古希腊罗马开始的西方哲学，目的在于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分析能力；

文理学生互选对方的一门课，世界学术发展的趋势是文理接近或融合，可为文科学生编一部“自然科学概论”；

进行美术教育，包括书法、绘画、音乐、戏剧、曲艺等，不专门设课，以课外活动形式，由学生自由组合，由学校、学生会或团委加以协助与指导。[10]

季羨林就教育和人文社会科学不受重视的问题大声疾呼。

他认为，国家对教育的投入所以严重不足，主要不在财政上有困难，而在领导思想上对教育是立国之本这一点，认识不足。往往是口号多，行动少，连《教育法》中都不肯将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按世界各国平均水平规定下来，很令人失望。

对人文社会科学不重视，更令人担忧。他提出，现在的“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都名不副实，因为不包括社会科学，应改名为“中国自然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委”。他认为，建国以来我们最大的失误，在于不承认社会科学是科学。从 20 世纪 50 年代反冒进时，就有瞎指挥，胡折腾，把规律当迷信来破除，最后弄到经济几乎全面崩溃。现在真想按规律办事，但仍习惯性地对社会科学不够重视，如：仅把社会科学的作用局限于精神文明建设，不认为社会科学也关系到经济建设的成败、国家管理的好坏、民族素质的高低；对社会科学财政投入极其可怜；自然科学恢复了院士制，工程科学增建了院士制，而社会科学院士制迟迟不能恢复，恢复的阻力很大，等等。

季羨林的清华老同学吴组缃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打过一个精辟的比喻：“如果用人体作比方，社会科学好像身上的骨架，自然科学好像身上的血脉，两者都不可偏废。脊梁骨有了病，轻则致残，重则瘫痪甚至死亡。”季羨林则进一步强调：

社会科学其实起着帅的作用。它对国家的管理，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民族的凝聚力，都有相当直接的关系。科技当然重要，它是强大的活跃的生产力，能够推进社会的变革。但科技不能脱离那个时代的社会科学水平和社会机能的制约而起作用。如果社会的管理水平低，吏治腐败，文盲遍地，那就会大大限制乃至抵消科技所能发挥的作用。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更告诉我们，现代武器掌握在法西斯手中，实在非常可怕。要知道，掌握科技的毕竟是人，是一定社会制度下具有一定思想、一定文化素质的人。所以，只重视科技的那种“科学主义”是应该反对的。照我看，社会科学是“帅”，技术科学是“兵”。[11]

一个教育家所具有的战略眼光，所提出的石破天惊的议论，令人深思。

人文社会科学得到重视之时，就是两个文明建设健全之时！

5. 宗教学家

季羨林接触到佛教研究，已经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在清华当学子之时，他就开始对佛经翻译感兴趣。到德国留学，他开始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是他研究佛教的滥觞。从那以后，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不管他的研究对象“杂”到什么程度，他对佛教的研究始终锲而不舍，兴趣也始终没有降低。

季羨林研究宗教，但从来没有信过任何宗教，对佛教也不例外。他从几十年的研究中得到一条经验：对世界上的任何宗教，只要认真地用科学方法加以探讨，就会发现其教义与仪规都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都有其产生根源，都是人制造成的，都是破绽百出，自相矛盾的，有的简直是非常可笑的。因此，研究越深入，则信仰越淡薄。如果宗教研究者竟然相信了一种宗教，那就说明他的研究不实事求是，不够深入，是自欺欺人。[12]

季羨林之所以研究宗教，是他觉得任何社会现象都是极其复杂的，宗教作为上层建筑更是如此，优点和缺点有时纠缠在一起，很难立即作出定性分析。所以要摒除一切先入之见，细致地、客观地、平心静气地研究宗教。

冯定在世时，季羨林曾与他讨论过宗教前途的问题。他们俩一致认为：国家、阶级先消灭，宗教后消灭，即使人类进入大同之域——共产主义社会，在一定时期内，宗教或者类似宗教的想法，还会以某种形式存在着。

因此，他认为，对任何宗教，我们一方面决不能去提倡，另一方面也用不着故意去“消灭”，因为这样做，毫无用处。如果有什么地方宗教势力抬头了，我们一不张皇失措，二不忧心忡忡，张皇无用，忧心白搭。宗教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产生出来的，它也会在人类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时消灭。操之过急，徒费力气。我们的职责是对人民进行唯物主义无神论教育，至于宗教是否因之而逐渐消灭，我们可以不必过分地去考虑。季羨林分析说：

宗教会不会成为社会发展、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呢？会的，但并非决定性的。研究宗教史，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宗教会适应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而随时改造自己，改变自己。在欧洲，路德的宗教改革是一个例证。在亚洲，佛教小乘改为大乘，大小二乘在个别国家，比如说在日本，改为和尚能结婚，能成家立业，也是一个例证。在日本，佛教不可谓不流行，但是生产力也不可谓不发达，其间的矛盾并不太突出。……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佛教在日本，不管是以什么形式存在，一方面能满足人们对宗教的需要，另一方面又不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才能在社会上仍然保持活力呢！我感觉到，我的这些议论颇有点怪论的味道。但是，我确实是这样想的，我不愿意欺骗别人，所以就如实地写了出来，以求教于方家。[13]

在季羨林看来，在中华民族中，汉族不能算是一个宗教性很强的民族。汉族信仰的宗教最大最古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土生土长的道

教，一个是从外面传进来的佛教。在利用宗教达到政治目的或其他目的方面，汉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上表现出了非凡的本领，其他民族望尘莫及。然而对于宗教，比如说道教和佛教，除了道士和尼姑、和尚以外，老百姓信这两种宗教都信得马马虎虎，佛教庙里有时有道教的神，而且佛道两种庙里，有时竟会出现孔子与关圣帝君文武二圣人。过去，有钱人家办丧，既请和尚，也请道士，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一团和气，处之泰然。因此，整个中国历史上没有一次宗教战争。[14]如果不同宗教的信徒们能互相尊重，互不相妨，则中国社会必能安定团结，世界人民也必能安定团结。[15]

季羨林的日本朋友中村元先生，在大学里是一个谨严的学者，客观地研究探讨宗教问题，但是一进入寺院，就变成了一个信徒。他从口袋里掏出念珠，匍伏在大佛像前，肃穆虔诚，宛然另外一个人了。其间有没有矛盾呢？季羨林觉得他看不出，看来二者完全可以和谐地结合起来。所以他说：人生的需要多矣，有一点宗教需要，也用不着大惊小怪。只要不妨碍他对于社会和国家做出贡献，可以听其自然的。[16]马克思讲过一句话，大意是：宗教是有宗教需要的人们所创造的。“宗教需要”有多种含义：真正的需要，虚幻的需要，甚至麻醉的需要，都属于“需要”的范畴，其性质虽然大相径庭，但其为需要则一也。季羨林认为否认这一点，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17]

季羨林对宗教总的态度是：

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宣传、坚持唯物主义是我们的天职，这一点决不能动摇。我们决不能宣传有神论，为宗教张目。但是，惟其因为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就必须承认客观实际，一个是历史的客观实际，一个是眼前的客观实际。在历史上确实有宗教消灭的现象，消灭的原因异常复杂。总起来看，小的宗教，比如会道门一类，是容易消灭的。成为燎原之势的大宗教则几乎无法消灭。即使消灭，也必然有其替代品。……在人类历史上，靠行政命令的办法消灭宗教，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十分罕见的。[18]

没有偏见，没有偏袒，要承认宗教的客观存在，要对宗教进行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研究，这就是季羨林作为一个宗教学家对宗教所持的态度。他的著作《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季羨林佛教学术论文集》（台北东初出版社 1995 年）以及其他佛教研究的学术论文，都是这种唯物主义态度指导下研究的成果。

季羨林作为宗教学家的杰出贡献，是在佛教史、佛学史领域，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够利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学家和语文学家。他认为，要想了解和研究佛教，至少应懂得梵文。他深深赞许一千多年以前玄奘那样的伟大学者，精通梵文，而以后却后继无人，连有名的高僧在解释音译梵字的时候，都闹出了不少笑话。到现在，竟有无知妄人公然主张学佛经当以中译本为主，这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19] 他研究佛教原典，分析语言的变化，对不同的文本进行对比，进而在佛教史的研究领域内不断提出新问题，真知灼见，层出不穷。

6. 民族学家

作为民族学家的季羨林，是人们平常最不注意的，但是在这方面，他的成就也是非常突出的。

季羨林在民族学方面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提倡各民族平等说，其二是对西域各民族进行具体细微的研究。

季羨林认为，在过去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全世界各个民族，在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时间内，各自创造出水平不一、内容悬殊的文化，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不容否认，哪一个民族也无权垄断整个文明的创造。他认为，一个民族或若干民族发展的文化延续时间长，又没有中断，影响比较大、基础比较统一而稳固、色彩比较鲜明、能形成独立的体系的文化，就是文化体系。世界文化中共有四个文化体系，即中

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欧洲文化体系。

这四个文化体系，三个属于东方，一个属于西方。埃及和巴比伦文化久已中断，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继承了它们的一些东西，因此可归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美国则可以归入欧洲文化体系，不能成为独立的文化体系。

各文化体系之间、各民族之间都是平等的，不能说哪一个体系比哪一个优越、高明。季羨林主张，我们反对那种民族自大狂，认为唯独自己是文化的创造者，是“天之骄子”，其他民族都是受惠者。因为这不符合实际情况。所以，他既反对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中国中心论，又反对现在的西方中心论。

就一个民族来说，它来自共同的心理素质；就一个文化体系内的若干民族来说，它来自各个民族的共同的心理素质，再加上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

季羨林对民族的文化发展规律进行了分析：

我觉得，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约略可以分为三个步骤：第一，以本民族的共同的心理素质为基础，根据逐渐形成的文化特点，独立发展。第二，接受外来的影响，在一个大的文化体系内进行文化交流；大的文化体系以外的影响有时也会渗入。第三，形成一个以本民族的文化为基础、外来文化为补充的文化混合体或者汇合体。[20]

各个民族都是平等的，世界各民族是如此，一个国家内部也是如此。季羨林经常强调，中国文化是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但是讲中国文化的人，却往往只讲汉族的文化，而忽视其他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的文化，这种现象应该改变。中国的历史，应该包括五十六个民族的历史，不能只是汉族的历史。为此，季羨林本人十分重视对国内各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

对民族进行研究，季羨林十分重视语言和风俗的研究。他对语言的研究，是众所周知的，成就多，贡献大。而对于民俗的研究，则不

少人不十分清楚。这是因为在一般人心目中，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只不过是一些细枝末节，不足以登大雅之堂。季羨林批评了这种观点，他指出：

从大处来看，风俗习惯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可能还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风习有的是在极长的历史时期中形成的。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化而不深入风习，则所得结果必然是不全面的，甚至是错误的。稍微对这个问题有点研究的人，都会承认这一点。

从小处来看，一件件一桩桩的民族风习，往往能代表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特点。要同别的民族交往，必须懂得这些特点，不然的话，难免产生一些误会。小之引起一些不快，大之则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历史上这种事情已经发生过不少次了，并不是我在危言耸听。[21]

季羨林对风俗文化的研究具体而细微，一个葫芦神话、一个喷嚏、一个民间故事、一点原始社会风俗的残余，都能引起他的兴趣，可以“小题大作”而成文章，而且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由于他对民族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他是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民俗学会顾问，在山东大学《民俗研究》创刊十周年时，题词说：“民俗研究之重要意义隐而不彰者久矣，不意山大之《民俗研究》竟能长时间继续出刊，而又备受欢迎，谨以数语致以祝贺” [22]，表明了他对民俗研究的重视。

至于季羨林对西域各民族的研究，将在西域研究部分详论。

二、中外文化交流

1. 印度佛与中国佛

中印文化交流是季羨林终生用力最勤的研究领域之一。他自己说，半生搜集有关中印文化交流的资料，至今写的笔记和纸片，说是

积稿盈尺，那还是不够的，比盈尺还要多。他出版的论著已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人民出版社 1957 年）、《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 1982 年）、《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中印文化交流史》（新华出版社 1991 年）。这些著作之外，还有不少单篇论文，数量也相当可观，其中有一篇应周一良教授之邀而写，题为《中印智慧的汇流》，洋洋四万余言，但他仍然感到未能畅所欲言，且限于时间，写得比较粗糙潦草，因此尚感歉愧。[23]

季羨林对中印文化的交流，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是，他不赞成“单向流动”说，而主张“双向流动”说。印度朋友有个说法，在 1949 年中国解放以前，印度文化单方面地向中国流动，是中国学习印度。中国解放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又一个劲地流向印度，是印度学习中国。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中国文化对印度的影响微乎其微，似乎在若有若无之间，中印文化交流似乎成了单向流动。季羨林主张不是单向流动，而是双向流动。他认为印度文化曾流向中国，中国文化也流向印度。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而中国文化，如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然后大约在周初传入印度，中国物质文化丝、纸、钢传入印度，印刷术、造纸术、罗盘、火药，桃、梨、杏，还有白铜、磁土、肉桂、黄连、大黄、土茯苓，至于举世闻名的茶，更不必说了。而在精神文化方面，还有一个中国佛教倒流印度的问题。在这方面，季羨林令人信服地引证了宋代《高僧传》作者赞宁在卷第二十七《含光传》中写的一个“系”，这个“系”非常清楚地说明，佛教从西天传入中土，将这枝叶植入中华之土中，又生根干，传回西天。[24]

季羨林从总体上把握中印文化交流，详细探讨了双方文化交流的意义、特点和规律。

从意义方面来说，中印两国同立国于亚洲大陆，天造地设，成为邻国。四大文化体系，中印各居其一，占人类文化宝库的一半，是一

件了不起的事实。两国文化交流的意义极大极大：

印度河和恒河孕育出来了印度文化，影响了南亚、东南亚以及这一带的广大地区。黄河和长江孕育出来的华夏文化，影响了东亚、东南亚以及这以外的地区。两个文化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圈，对人类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两大文化圈之间又是互相影响，交光互影，促进了彼此文化的发展。[25]

从特点方面来说，季羨林认为是时间长，方面广。两国文化交流有文字记载的至少有两千年，在这之前，就很难说了。方面广是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有所交流，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语言和日常生活，中间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科学、技术等，在很多方面，无不打上了交流的烙印。

从交流的规律来说，季羨林主张世界文化是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共同创造的，反对世界文化一元起源论。民族无论大小，都对世界文化做出过或大或小的贡献。所以，文化交流最根本的规律是：

有了文化，必有交流，接受者与给予者有时候难解难分，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同时身兼二重身分。投桃报李，人类文化从而日益发扬光大，人类社会从而日益前进不停。这是交流规律中最重要的规律，是其他所有规律之本。[26]

另外，物质文化的交流和精神文化的交流，其规律是完全不一样的。物质的东西，交流比较简单，一接触到这些东西，觉得很有用，很方便，用不着多少深思熟虑，也用不着什么探讨研究，立即加以引用，久而久之，仿佛就成了自己的东西。我们现在菜篮子里许多菜，西红柿、菠菜、胡萝卜、土豆、圆白菜、洋葱等等，数也数不完，谁也不会想到是“舶来品”，但这是活生生的文化交流。

而精神文化的交流要复杂得多，季羨林认为，两种陌生的文化一旦交流，一般说来，至少要经过五个阶段：撞击——吸收——改造——融合——同化。一个阶段同下一个阶段之间的交替，有时不十分明显，界限也难以截然划清，两个阶段会泾渭难分，总起来却不离这五

个阶段。[27]

在精神文化的交流方面，季羨林下力最大的一个领域是佛教。他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一部专著也难以写完，笔者学力所限也难精此道，这里侧重说其中的一个方面，这就是他对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的区别。

对于佛教研究来说，古今中外书籍文章已经是汗牛充栋，但是，在季羨林看来，真正搔着痒处的却是绝无仅有，这就影响了对这个宗教的理解。[28]季羨林研究佛教是从语言现象出发的，一开始就是以语言研究者的身份研究佛教，通过原始佛典的语言现象来探讨最初佛教的传布与发展，找出其中演变的规律。[29]

季羨林下力分析了印度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他认为佛教兴起时的印度，同基督教在西方传播时的罗马是不一样的。罗马当时是经济、政治、精神和道德普遍瓦解的时代，而印度则不是。佛教继承了苦行僧的所谓沙门传统，但又加以发展、改进，形成了独立的一派。

佛教形成以后，又有小乘、大乘、金刚乘（密宗）之分。小乘向大乘过渡是印度佛教史上的一场重大变化，其标志之一就是小乘只礼拜弥勒，而大乘则狂热地崇拜；小乘是无神论，大乘是一神论；小乘靠自力解脱，不用救世主，大乘则是靠救世主；小乘卖天国入门券，讨价高，出手比较吝啬，大乘则相对便宜……。

而大乘，季羨林又把其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原始大乘和古典大乘，相距大约二三百年的。原始大乘的特点：使用语言——混合梵文，经典作者——无名无姓，教义内容——在小乘中逐渐孕育，由量变到质变；古典大乘的特点：使用语言——梵文，经典作者——一般有名有姓，教义内容——不同程度成熟的崭新的大乘思想。

大乘到了后期，金刚乘（密宗）出现，大乘与金刚乘关系密切，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了。而佛教世界一直到今天，仍是一半小乘，一半大乘，两分天下。[30]佛教在印度则渐趋式微，以至于消逝，被

印度教所取代。

印度佛教在公元前传入中国，途径有两条，时间有先后，最早的是通过大夏，以后是通过中亚某些古代民族，吐火罗人最有可能。

[31]从大夏来的，称“浮屠”，来源于印度古代俗语；而通过中亚来的，称“佛”，来源于吐火罗文 A（焉耆文）。[32]

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精神文化有一个撞击——吸收——改造——融合——同化的过程。佛教传入中国，为了适应新环境，不得不采取一些比较隐晦的手段，使撞击不至于激化。但也不断有小磨擦，如六朝时代沙门不敬王者论的辩论，引起一些君王的排佛，如“三武灭佛”（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就是。佛教在中国玄学化，是双方文化的双向吸收阶段。到两晋至隋唐，出现了两种文化的改造和融合阶段。宋元出现两种文化的同化。对同化的原因，季羨林分析说：

中印文化交流从后汉三国时期开始。回顾以佛教为主要载体的交流活动，从最早的撞击与吸收阶段，经过了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改造与融合阶段，到了宋元进入同化阶段，延续有千余年，真是完成了一个大的发展过程。……到了宋代的最后一个阶段，印度佛教在印度面临灭绝。此时，它已经失去活力，不可能再有新发展，无源之水，已不可能再影响中国佛教的发展了。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佛教思想才能自由自在地为中国思想所同化，不会受到来自印度的任何的撞击与干扰。[33]

这种同化的结果，就是产生了禅宗和宋明理学。

印度禅法早就传入中国，后汉、三国都有这方面的译经，南朝宋代菩提达摩来华，成为中国禅宗一世祖，但这时的禅宗，印度色彩仍然浓厚，唐代禅宗分成不少小宗派：南宗、北宗、牛头宗、净土宗、菏泽宗、洪州宗等。五代天台德韶成为国师，禅宗也最为兴旺，且进一步分化成五家：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和法眼宗，禅宗还有活力，但印度味越来越淡，中国味越来越浓。唐至五代，出现一

批灯史，宋代又出现许多灯史，目的在于明确禅宗传法灯的系谱。宋代禅宗兴盛至极，“禅宗成了宋代佛教界的元雄”。到元代，在佛教诸派中，“禅宗最为繁荣”，在明代，僧侣们“几乎都是禅宗系统的人”。[34]清代至民国，禅宗仍有活力。

禅宗为什么流行逾千年而经久不衰呢？我认为，这就是同化的结果。再仔细分析一下，可以归纳为两层意思。首先，一部分禅宗大师，比如百丈怀海，规定和尚必须参加生产劳动，认为“担水砍柴，无非妙道”。印度佛教本来是不让和尚劳动的。这种做法脱离群众，引起非议。中国禅宗一改，与信徒群众的隔阂就除掉了。这也符合宗教发展的规律。因此，在众多的佛教宗派中，禅宗的寿命独长。别的宗派几乎都销声匿迹，而禅宗巍然犹在。其次，这也是最主要的原因——禅宗越向前发展，越脱离印度的传统，以至完全为中国同化，有的学者就说，禅宗是中国的创造。话虽有点过分，却也不无道理。有的禅宗大师实际上是向印度佛教的对立面发展。他们呵佛骂祖，比如道鉴（慧能六世法孙，公元856年死）教门徒不要求佛告祖（达摩等），说：“我这里佛也无，祖也无，达摩是老臊胡，十地菩萨是担屎汉，等妙二觉（指佛）是破戒凡夫，菩提涅槃是系驴橛，十二分教（十二部大经）是鬼神簿、拭疮疣纸，初心十地（菩萨）是守古冢鬼，自救得也无。佛是老胡屎橛。”又说：“仁者莫求佛，佛是大杀人贼，赚多少人入淫魔坑。莫求文殊普贤，是田库奴。可惜一个堂堂丈夫儿，吃他毒药了。”这样咒骂还可以找到不少。这简直比佛教最狠毒的敌人咒骂还要狠毒，咬牙切齿之声，宛然可闻。说它是向佛教的对立面发展，难道有一丝一毫的歪曲吗？这哪里还有一点印度佛教的影子？说它已为中国思想所同化，不正是恰如其分吗？[35]

而理学与禅宗有所不同，它是宋代正统儒学，他们排佛，宋代濂、洛、关、闽四大家，无不努力排佛。然而，若仔细研究他们的学说，又几乎都有佛教的成份，受佛教或深或浅的影响，这种中外学者无不承认的事实，也是佛教与中国文化同化的结果。

通过印度佛演变成中国佛的一系列分析，季羨林认为，人类文化一萌芽，就有互相学习，也就是交流的活动。到了后来，一部人类文化史证明了一件事：没有文化交流，就没有人类文化史，文化交流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动力。[36] 今天，普天之下，没有哪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完全是“国货”，一点也没有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离开了文化交流，我们简直无法生活，我们的一切都是无法想象的。但是，文化交流并不是说自己的东西一点都没有了，本民族固有的东西依然存在，它是文化交流的基础。[37]

2. 西域研究和玄奘情结

季羨林从事西域研究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在该领域的研究成绩卓著。

西域，是汉代以后对玉门关以西地区的总称，始见于班固的《汉书·西域传》。该称有广狭二义。狭义专指敦煌以西葱岭以东的地区，在巴尔喀什湖以南、以东，昆仑山以北，有大宛、乌孙等 36 个国家。广义则指通过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如亚洲中西部、印度半岛、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都在内。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成为我国中外交通史上首次重大事件。唐代玄奘游学印度半岛各地，将在沿途所见所闻撰成《大唐西域记》一书，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最重要的著作，是后代研究西域者都不能不读的必读书。

季羨林认为，世界文化由四个文化体系构成，这就是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欧洲文化体系。而唯独汇聚了四大文化体系于一体的，就是西域，尤其是新疆。他指出，在古代很长的时间内，新疆是东西各国文化交流的枢纽，许多国家的文化，包括世界上几个文化发源地的文化，都在这里汇流，有名的“丝绸之路”，就是通过新疆。尽管有许多古代民族今天已经不再存在，然而他们留下的文化痕迹一直到今天还到处可见。[38]

季羨林一向注意对异域记载的著作，最初的一些书如《山海经》、《穆天子传》等，虽然真伪杂陈，时代也难以确定，有些记述甚至荒诞不经，但他认为其中必然有一些很古老又真实的东西，对后人是非常宝贵的。在许多鬼神志怪的书，也有许多宝贵的异域的记载，如传为后汉郭宪撰的《汉武洞冥记》，晋以后伪托汉东方朔的《神异经》、《十洲记》等都属于这一类。唐宋记载异域的书籍，记述精确，远迈前修，段成式《酉阳杂俎》，苏鹗《杜阳杂编》，宋代《太平广记》、《夷坚志》，都有关于远方珍异和异域的记载，当然也都含有更多的神话色彩。明代一些随郑和下西洋的人，都有赴异域的亲身经历，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所写言简意赅，明确真实。而袁忠彻所著《古今识鉴》则有不少神化郑和的记载，而这种浪漫化的色彩对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罗懋登《三宝太监下西洋记》（简称《西洋记》）都有较大影响。[39]

既广博又精深的涉猎，再加上季羨林博闻强记，为研究异域尤其是西域打下了强固的基础。从1960年代起，季羨林便有意对《大唐西域记》进行校注整理，只是因种种原因因循未果。1977年，中华书局计划重新组织人力整理该书，请季羨林出任负责人，使他埋在心底的玄奘情结重又出现，很快与中华书局商定了参加校注的初步人选和资料的准备工作。

经过半年多的准备工作，1978年8月18日，季羨林主持召开了校注的第一次工作会议，参加人员有孙毓棠、朱杰勤、宿白、张广达、杨廷福、张毅、耿世民、蒋忠新、赵守俨、谢方。他们讨论了具体分工和计划、进度和质量要求，取得了一致意见。会后，季羨林自己掏腰包，请与会人员到北京展览馆莫斯科餐厅，当时是豪华级的饭店，吃了一顿饭。

计划既已确定，季羨林便身先士卒，最早完成了《玄奘与〈大唐西域记〉》即校注的《前言》。然后，他又分批审阅各卷的注释稿，

仔细批改，并提出中肯的意见。对有些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又比较重要的条目注释，他自己重写，如长达三千多字的《四吠陀论》的注释，就是他重写的。他还发现大部分引文都有问题，便让他的高足王邦维将全部中外文的引文都查对一遍。

《大唐西域记》校释工作即将完成之时，季羨林提出，要搞一个副产品，对该书进行白话今译，目的在于普及历史知识和弘扬传统文化。他们趁热打铁，马上成立了一个以他为首包括张广达、杨廷福、蒋忠新、李铮、王邦维、谢方的《大唐西域记》今译小组，很快完成了今译工作。

《大唐西域记校注》由中华书局于1985年出版，《大唐西域记今译》由陕西人民出版社于同年出版。两书出版后，均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大唐西域记校注》和季羨林的译作《罗摩衍那》在1994年全国首届优秀图书评选活动中均获一等奖，与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同列。

而季羨林则并不认为《大唐西域记校注》已经十全十美，他对责任编辑谢方说：

我们的注释工作虽然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参加工作的同志也都是很难得的一时之选，但现在看来仍有不少缺点。一些外国研究成果和近几年新发现的材料，我们还未有充分吸取。过一个时候，我想再组织力量对全书作补充修改，然后准备出版一个增订本。[40]

季羨林还有意组织《大唐西域记》的英译，并对《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进行白话今译和英译，但均未实现，这成为季羨林玄奘情结的未了缘。

季羨林对西域的研究始终如一地关注着，上世纪80年代初他组织“西域研究读书班”，张广达、王小甫、荣新江、王邦维、耿引曾、段晴、张保胜、钱文忠、蒋忠新、郭良鋆、黄宝生、耿世民、林梅村等人，都是研究读书班成员，全都精于东方学，有研究梵文、于阗文、佉卢文、回鹘文的，有研究南亚、中亚历史的，有研究佛教、

摩尼教的，在近十年的时间里，读书班讨论过的问题，涉及《大唐西域记》、《南海寄归内法传》，中亚和西藏发现的梵文贝叶经、于阗文资料、粟特文资料，“图木舒克语”资料、新疆新发现的吐火罗语材料和《弥勒会见记剧本》、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西域史料，汉文典籍中南亚史料。季羨林想用读书班的形式，把中亚各种语言的佛典做一个综合研究。[41]

有一些晚辈学者，后来都出版了有影响的学术研究专著，如邓文宽、荣新江共同校勘的《敦博本禅籍校录》、李明伟的《丝绸之路贸易史研究》、王小甫的《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对这些研究成果，季羨林都予以充分肯定，自己的时间虽然宝贵得以秒计，但对这些年轻人向他索序，向来十分慷慨，其中原因，正如他所说：

我认为，吾人为学，有如运动场上的接力赛跑，棒棒不断，代代相传，永远在前进，永远没有止境。后来居上，青出于蓝，是自然规律。我现在想着重讲的是老年人的态度。这个态度，根据我的观察，并不容易处理好。学术圈子里并不缺少“九斤老太”，是谁都看得见的事实。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我跑的这一棒并不很理想，虽然我也努力跑了。但是，我稍有自知之明，我赞成唐人的两句诗：“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我愿意为有才华的年轻人呐喊鼓噪，这样会对年轻学人的发展有利。在古今中外的名利场上，年轻人想脱颖而出，这个颖往往是很硬很硬难以脱掉的。我想从旁帮他们一下。

[42]

季羨林不仅关心国内学者的西域研究，而且关心国外的西域研究。他应邀担任了中华书局推出的《法国西域敦煌学名著译丛》的中方首席顾问，当他看到由法国伊朗籍学者阿里·玛扎海里著、耿升译的《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译本后，那种喜悦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简直不比自己的著作出版逊色。他不仅详细批阅了这部长达四十多万字的著作，而且写成了两篇长文：《丝绸之路与中国文化——读〈丝绸之路〉的观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4

年第4期)和《古代穆斯林论中西文化的差异——读〈丝绸之路〉札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5期)。他认为,科学研究,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产生的效益,有的能立竿见影,有的就不能。文化交流史是一门科学,它当然不能离开这样的原则。但是,他个人认为,它是一门能立竿见影的科学,它能够产生政治、经济和其他效益。它至少能让人们了解到,人民与人民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一向是互相依存的,互通有无的,互相促进的,谁也离不开谁的。了解到这一点大有用处。它能加强人民与人民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感情与友谊。有了争端,双方或者多方要心平气和地来解决,不必大动干戈。因此,他始终相信,不管当前看起来世界上有什么矛盾,有什么危机:人类最终总会共同进入大同之域的。[43]

季羨林的西域研究和玄奘情结,其动机正是在这里。

3. 吐火罗文A《弥勒会见记剧本》

季羨林在德国哥廷根大学所精心学习过的吐火罗语,从回到中国以后,长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时间长达30年。

到1975年,新疆吐鲁番地区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88页吐火罗文A残卷,大约是在唐代用印度婆罗米字母中亚斜体写成的,由季羨林鉴定为《弥勒会见记剧本》。

弥勒是印度佛教的信仰之一。早期印度佛教便有多数佛的想法,释迦牟尼佛只不过是在无数劫波中降生人间的一系列佛陀之一,在目前人类所处的劫波中,已经有四个佛转过法轮,拘留孙佛、拘那含佛、迦叶佛、释迦牟尼佛,还有一个将来要来的弥勒佛。

小乘佛教是无神论,僧侣不礼拜佛,修真养性,全靠自己努力,不假神力,不假外力。大乘佛教则大肆宣扬菩萨,菩萨有无量百千万亿,其中最著名的是弥勒、观世音、文殊、阿闍婆等,弥勒的本质是慈爱,为各部派所共同接受。在金刚乘即密宗中,弥勒有时候是“贤

劫十六尊”之五，有时候被归入六大菩萨，有时是五大菩萨之一：文殊、普贤、观音、弥勒、金刚藏，有时是三大菩萨之一：弥勒、文殊、观音，鼎足而三，而弥勒高居首座。这几个菩萨后来在中国也是家喻户晓的。[44]

吐火罗文 A，即焉耆文，吐火罗文 B，即龟兹文。《弥勒会见记剧本》残卷在新疆屡有发现，但没有哪一个是完整的。吐火罗文 A 的残卷、回鹘文的残卷，都有所发现，且不止一种，古代于阗文也有《弥勒会见记》。这部书不是佛经之一，而自称是剧，叙述的是弥勒会见释迦牟尼如来佛的故事，是圣月菩萨大师自印度语译为吐火罗文，而智护法师又自吐火罗文译为回鹘文的。

吐火罗文 A《弥勒会见记剧本》1975 年在新疆焉耆新发现了 44 张，每张 2 面，共 88 页，每页 8 行，有一页是 7 行，缺的一行可能是撕掉的。这个剧本同以前发现的吐火罗文 A 残卷一样，是用工整的婆罗米字母中亚斜体写成的，与其他残卷一样，也有火烧的痕迹，一般是烧掉左端的 1/3 左右。

吐火罗文 A《弥勒会见记剧本》，系由印度文译成。但“印度文”指的是什么语言，因为原本没有被发现，还不得而知，可能是梵文，也可能是某一种印度俗语。

此剧本同其他印度叙事文学如《五卷书》之类没有什么差别，讲故事韵味、散文相结合，不能给人以戏剧的印象，但“全体退场”、“幕间插曲”等，又可证明它是戏剧无疑。[45]

剧本残卷被发现之后，有的外国人想出高价收买，且扬言“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外国”。这几乎与敦煌学的研究有类似的情况，曾经有日本人扬言“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对这种偏颇之论，季羨林反对用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地方主义的口号来对抗，他一再强调“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46]对于这位外国人的话，季羨林不想用什么话来与他争辩，他知道，行动比语言更重要。

从 1983 年开始，季羨林翻译吐火罗文 A《弥勒会见记剧本》，

已将此剧残卷的绝大部分译为汉文，只有少数几张，因为找不到相应的回鹘文译本，而又残缺过甚而无法翻译。译出的一些先在国内杂志上发表，又将其中的几张译为英文，并写成两篇论文，一篇发表在冰岛的一个杂志上，一篇发表在 Werner Thomas 教授纪念论文集上。之后，他又写成《吐火罗文 A〈弥勒会见记剧本〉研究》一书，全书的汉文、英文两个译本也已出版，另外，其姊妹篇《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也于 1993 年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

他的论文《吐火罗文 A 中的三十二相》、《漫谈新疆博物馆吐火罗文 A〈弥勒会见记剧本〉》发表后，学者们赞扬他“让有关的外国人知道我国建国以来，不仅在吐火罗文 A 的文书文物中有远远超过以前的大量重要发现，而且我国的专家学者们正在从事外国人根本想不到的工作”。日本东京大学东方学权威也肯定他“以中国印欧语形态学方面的伟大成就而闻名于世” [47]。

由于他对吐火罗语研究的巨大贡献，他已被德国哥廷根科学院聘为《新疆吐鲁番出土佛典的梵文词典》顾问，被冰岛大学聘为《吐火罗文与印欧语系研究》顾问。

4. 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不是一门新兴学科，很多国家多年以前就有了。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引起了全世界范围的广泛注意，并且形成了许多以国家为单位的大的流派，主要有德国学派、法国学派、西欧学派、美国学派四个大的独立学派。[48]

季羨林认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属于文化交流的范畴，它所探索的，正是文学方面的文化交流。比较研究的方法是值得倡导的，比如研究中国历史，具体说研究中国史上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问题，已经争论了几十年，但还没有大家都承认的看法，究其原因当然很多，但季羨林认为，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缺少比较的方法。如

果把其他文明古国，比如说印度，由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过渡细致地加以分析，加以对比，会大大扩大我们的视野，会提供给我们很多灵感，会大大有助于讨论的推进与深入。其他学科也有类似的问题。中国的社会科学，其中也包括人文科学，想要前进，想要有所突破，有所创新，除了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以外，利用比较的方法是关键之一。[49]

比较文学的目的，在于通过比较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但规律性的东西必须有用处，为规律而规律不见得是正确的。通过比较而得出来的规律可能有很多用处，如有人说在印度，人们想通过印度国内各种语言文学的比较，而达到写出一部完整的印度文学史的目的。所以，写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不仅仅是汉文文学史，而且应该是包括全国各族文学的文学史，也必须进行一些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50]比较文学作为比较文化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天社会主义建设中有重要意义。显然，研究比较文学绝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研究要为创造新中国的新文学服务，为加强各民族之间的理解服务，为整个人类走向大同之域的理想服务。因为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文学都包括着两方面的因素：民族性和时代性。代表民族性的民族文学是历史形成的，代表时代性的是民族文学随时代而异的现代化。这是共时形成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结合就产生出每一时代的新文学。从广义的文化交流来看，这种现象更为突出。[51]

为了适应世界范围内比较文学研究发展的趋势，季羨林在对西方学派提出了质疑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的设想。对西方学派中影响较大的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他都有微词，认为法国学派着重研究文学的直接影响，美国学派着重研究平行发展，有一些理论，不客气地说，简直是故弄玄虚，英雄欺人。这两大流派专研究直接影响的，失之太狭；专研究平行发展的，又失之太泛。而且两派都轻视东方文学，他们的比较几乎只限于同一文化体系内的比较，都是近亲，彼此彼此，比来比去，比不出什么名堂，因此两者都失之

闭塞。他主张要力矫二者弊病，融合二者之长，从研究直接影响入手，努力搜求资料，在西方、东方各国之间，在东、西方之间，从民间文学一直到文人学士的著作中去搜寻直接影响的证据，刮垢磨光，再归纳出有规律性的东西，借以知古，借以鉴今，[52]期能有助于我们的文艺创作，在此基础上再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

什么叫“中国学派”呢？我认为，至少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以我为主，以中国为主，决定“拿来”或者扬弃。我们决不无端地吸收外国东西；我们也决不无端地摒弃外国东西。只要对我们有用，我们就拿来，否则就扬弃。这一点“功利主义”，我看是必须讲的。第二个特点是，把东方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纳入比较的轨道，以纠正过去欧洲中心论的偏颇。没有东方文学，所谓比较文学就是不完整的比较文学。这样比较出来的结果也必然是不完整的，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比来比去，反正是比不出什么名堂来，对本门学科的发展起阻滞作用，为我们所不取。[53]

为了突出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特点，季羨林反对西方学者在一个国家内不能进行比较文学的研究的怪论，认为这是一种洋“塔布”（taboo），对这种洋戒律，必须推翻。因为欧美人知道的“世界”只有欧美，在那里很少有多民族的国家，往往一国之中只有一种主要语言，因此，要进行比较文学研究必须跨越国家。但是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国内民族林立，这样的国家中民族文学之间的差别不下于欧洲国与国之间文学的差别。中国境内各民族之间的文学关系十分密切，但头绪相当复杂，内容相当丰富，尤其在目前还是一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因此应该尽快在上面播种，让它生长出茁壮的禾苗。这样的研究好处很多，它能够丰富中国文学史的内容——过去所谓中国文学史实际上只是汉族文学史，加强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理解，提高对中华民族文学发展规律的认识，大大有助于全民族的团结，可以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弊。[54]

季羨林写过许多比较文学研究的论文，其中有一部分文章编成

《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最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要出版此书，已经排好了版，打出了校样，但一压几年并没有出版。后来，北京大学出版社毅然承担了出版任务，于1991年出版此书。另有一些比较长的论文，如谈东方文学的《东方文学史·序言》，已经将比较放到更为广阔的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的背景下来考虑，这些文章业已收集到一起。文章的内涵更为丰富，对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构成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了对比。

5. 中外《糖史》

作为历史学家的季羨林，不仅关心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宏观研究，而且关心其微观研究。作为中外文化交流史微观研究的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季羨林的中外《糖史》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季羨林开始考虑“糖”的问题，而起因则可以追溯到七十多年前开始学习梵文之时。

在学习梵文以后，季羨林开始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欧美许多语言（即所谓印欧语系）中表示“糖”的词，英文是 Sugar，德文是 zucker，法文是 sucre，俄文是 caxap，其他语言也大同小异。表示“冰糖”或“水果糖”的词，英文是 Candy，德文是 kandis，法文是 Candi，其他语言也有类似的字。“糖”、“冰糖”这两个词都是外来语，根源就是梵文的 sarkarā 和 khandaka。根据语言流变的规律，一个国家没有某一件东西，这件东西从外国传入，连名字也带了进来，在这个国家变成音译字。眼前中国的例子就多得很，如咖啡、可可、啤酒、苹果等，举不胜举。“糖”、“冰糖”借用外来语，就说明欧洲原来没有糖，而印度则有。实物同名字一同传进来，这就是文化交流。[55]但这时，季羨林还不曾想要去写一部《糖史》。

1980年代初，季羨林得到一个敦煌残卷，其中有一张编号为 P3303，是商务印书馆1962年出版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编定的，

上面记载着印度熬糖的技术。他在解读之余，对糖这种东西的传播就产生了兴趣。后来眼界又逐渐扩大，扩大到波斯和阿拉伯国家。这些国家都对糖这种东西和代表这种东西的字的传播，起过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这样一来，他的兴致更高了，于是怦然心动，在本来已经够杂的研究范围中，又加上一项接近科学技术的糖史这一个选题。

1980年代初，他先写成《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对〈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的一点补充》（《历史研究》1982年第3期）、《古代印度砂糖的制造和使用》（《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CINI 问题——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4期）。1990年代他开始写《糖史》，先写成国内编共十章，40万字。

写《糖史》难度是很大的，因为有关糖史的资料就非常难找。外国学者有一些专著和论文，如德文版有 von Lippmann 的《糖史》和 von Hinüber 的论文，英文有 Deerr 的《糖史》等，印度当然也有，但命名为《糖史》的著作却没有。中国学者有李治寰的《中国食糖史稿》，有一些可用的资料。但上述著作和论文，都不是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写的，因此，季羨林就成为这方面的“始作俑者”。

但是，季羨林必须另起炉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一无现成的索引，二少可用的线索。

在茫茫的书海中，我就像大海捞针。蔗和糖，同盐和茶比较起来，其资料之多寡繁简，直如天壤之别。但是，既然要干，就只好“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我眼前只有一条路，就是采用最简单最原始最愚笨然而又非此不可的办法，在一本本的书，有时候是厚而且重的巨册中，一行行，一页页地看下去，找自己要找的东西。我利用的是《四库全书》，还有台湾出版的几大套像《丛书集成》、《中华文史论丛》等等一系列的大型丛书。……

然而利用这些大书，也并不容易。在将近两年的时间内，我几乎

天天跑一趟北大图书馆，来回五六里，酷暑寒冬，暴雨大雪，都不能阻我来往。习惯既已养成，一走进善本部或教员阅览室，不需什么转轨，立即进入角色。从书架上取下像石头一般重的大书，睁开昏花的老眼，一行行地看下去。古人说“目下十行”，形容看书之快。我则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养成了目下二十行，目下半页的“特异功能”，“蔗”字和“糖”一类的字，仿佛我的眼神能把它们吸住，会自动地跳入我的眼中。我仿佛能在密密麻麻的字丛中，取“蔗”、“糖”等字，如探囊取物。一旦找到有用的资料，则心中狂喜，虽“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也不能与之相比于万一。此中情趣，实不足为外人道也。但是，天底下的事情总不会尽如人意的。有时候，枯坐几小时，眼花心颤，却一条资料也找不到。此时茫然，嗒然，拖着沉重的老腿，走回家来。[56]

就这样，以八十多岁的高龄，拼搏了将近两年，翻了不知多少书，估计至少也有几十万页，虽不能说典籍无所遗漏，但至少太大太多的遗漏是不会有。力量尽到了，学术良心得到了安慰，他在完成任务之时，却念念不忘帮助过他的北大图书馆张玉范、王丽娟、刘大军、岳仁堂、丁世良和北京图书馆的李际宁。北大没有的善本书，他不得不跑到北京图书馆去借阅。

《糖史》的写法，采用陈寅恪先生的惯例，先罗列资料，其中包括罕见的北大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的善本古籍，还有中山大学历史系章文钦教授提供的广东及澳门方面的资料，分为本草和医书、科技专著、地理著作、中外作者游记、笔记、类书、杂著等七大项。接着是根据材料进行分析，分析范围首先是甘蔗种植，包括种植地区、技术、传播、甘蔗的种类，其次是砂糖的制造和应用，包括制造技术、砂糖的种类、贩运、砂糖的药用和食用，再次是外来影响和对外影响，这是分析的重点。他的目的是想让人们都认识到，人类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大事如此，小事也不例外，像蔗糖这样的一种天天同我们见面的微不足道的东西后面，实际上隐藏着一部错综复杂的长

达千百年的文化交流的历史。他认为，一谈文化交流，一般人好像指的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流，这需要作一点补充或纠正，那就是在一国范围内，也有文化交流的问题，以种蔗制糖而论，种植范围的扩大和炼糖技术的传播，有关地域的居民首先获得利益，难道不算文化交流？文化交流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之一，征诸甘蔗和砂糖，这个说法也是成立的。[57]

《糖史》的中国部分以《中华蔗糖史》书名出版，该书虽然侧重于文化交流，但书中所用的大量中外文资料，对研究科技史、农业史、医药史等等，也不无用处。

《糖史》的外国编也已完稿并出版，两部书合计 83 万字，这无疑是一部填补空白的学术著作，其价值有似于沈从文先生的《中国服饰史》。

6. “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

近二十几年来，季羨林经常考虑东方文化的问题。他过去曾多次说过，在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之中，自己最不擅长义理，对义理兴趣也不大。他喜欢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实实在在的东西。他的心里话是：

哲学这东西太玄乎，太圆融无碍，宛如天马行空。而且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今天这样说，有理；明天那样说，又有理。有的哲学家观察宇宙、人生和社会，时有非常深刻、机敏的意见，令我叹服。但是，据说真正的大哲学家必须自成体系。体系不成，必须追求。一旦体系形成，则既不圆融，也不无碍，而是捉襟见肘，削足适履。这一套东西我玩不了。因此，在旧时代三大学科体系：义理、辞章、考据中，我偏爱后二者，而不敢碰前者。这全是天分所限，并不是对义理有什么微辞。[58]

但是，季羨林又是一个天生的“杂家”，对文化问题十分感兴

趣，翻看过不少有关文化的书籍，于是他便开始思考东方文化的问题，涉及到东方文化的四大体系、东方文化的特点、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等等，写出了《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东方文化与东方文学》、《天人合一新解》、《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21 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在跨越世纪以前》、《漫谈东西文化》等学术论文，贯穿这些论文的，是一个核心论点——“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西是西方文化，东是东方文化。

季羨林认为，人类自从有历史以来，总共形成了四个大文化圈：古希腊、罗马一直到近代欧美的文化圈，从古希伯来、古埃及、古巴比伦一直到伊斯兰国家的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中国文化圈。这四个文化圈内有一个主导的影响大的文化，同时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又是互相学习的，各大文化圈之间也有一个互相学习的关系，相互学习就是文化交流。正是文化交流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动了社会前进。而从更大的宏观上来看，四个文化圈又可以分成两大文化体系：第一个文化圈构成了西方大文化体系；第二、三、四个文化圈构成了东方大文化体系。“东方”在这里既是地理概念，又是政治概念，即所谓第三世界。这两大文化体系之间的关系也是互相学习的，就目前来看，统治世界的是西方文化，但从历史上看，二者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59]因为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种文化都有一个诞生、成长、兴盛、衰微、消逝的过程。东方文化到了衰微和消逝的阶段，代之而起的必是西方文化，等西方文化濒临衰微和消逝的阶段时，接之而起的必是东方文化。

季羨林认为，西方文化繁荣昌盛了几百年，把社会生产力提高到了空前的水平，促使人类社会进步也达到了空前的速度，光辉灿烂，远迈前古，世界人民无不蒙受其利。但它同世界上所有的文化一样，也是决不能永世长存的，迟早也会消逝的。在今天，它已逐渐呈现出强弩之末的样子，大有难以为继之势了。具体表现是西方文化产生了一些威胁人类生存的弊端，其荦荦大者，就有生态平衡的破坏、酸雨

横行、淡水资源匮乏、臭氧层破坏、森林砍伐、江河湖海污染、动植物物种不断灭绝、新疾病出现，等等，威胁着人类的发展甚至生存。

[60]

西方文化产生这些弊端的原因，是植根于西方的基本思维模式。季羨林分析了东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因为思维模式是一切文化的基础，思维模式的不同，是不同文化体系的根本不同。他的基本分析是这样的：

简而言之，我认为，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它照顾了事物的整体，有整体概念，讲普遍联系，接近唯物辩证法。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而不是只注意个别枝节。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印度的梵我一体的思想，是典型的东方思想。而西方的思维模式则是分析的。它抓住一个东西，特别是物质的东西，分析下去，分析下去，分析到极其细微的程度。可是往往忽视了整体联系，这在医学上表现得最为清楚。西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完全把人体分割开来。用一句现成的话来说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中医则往往是头痛治脚，脚痛治头，把人体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两者的对立，十分明确。[61]

但是，季羨林并不否认，世界上没有绝对纯的东西，东西方都是既有综合思维，也有分析思维。但是，从宏观上总体上来看，这两种思维模式还是有地域区别的：东方以综合思维模式为主导，西方则是分析思维模式。这个区别表现在各个方面，具体来说东方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就是以综合思维为基础的。[62]西方则是征服自然，向大自然穷追猛打。表面看来，他们在一段时间内是成功的，大自然被迫满足了他们的物质生活需求，日子越过越红火，但是久而久之，[63]却产生了以上危及人类生存的种种弊端。

李慎之认为要解决这些弊端，比如环境污染，只有发展科学，发展技术，发展经济，才有可能最后解决环境问题。季羨林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提出：

为了保护环境决不能抑制科学的发展、技术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这个大前提是绝对正确的。不这样做是笨伯，是傻瓜。但是，处理这个问题，脑筋里必须先有一根弦，先有一个必不可缺的指导思想，而这个指导思想只能是东方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否则就会像是被剪掉了触角的蚂蚁，不知道往哪里走。从发展的最初一刻起，就应当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念念不忘过去的惨痛教训，想方设法，挖空心思，尽上最大的努力，对弊害加以抑制，决不允许空喊：“发展！发展！发展！”高枕无忧，掉以轻心，梦想有朝一日科学会自己找出办法，挫败弊害。常言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到了那时，魔已经无法控制，而人类前途危矣。中国旧小说中常讲到龙虎山张天师打开魔罐，放出群魔，到了后来，群魔乱舞，张天师也束手无策了。最聪明最有远见的办法是向观音菩萨学习，放手让本领通天的孙悟空去帮助唐僧取经，但是同时又把一个箍套在猴子头上，把紧箍咒教给唐僧。这样可以两全其美，真无愧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64]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季羨林主张“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21 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东方文化将取代西方文化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而取代并不是消灭。所以他的全面观点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快走到尽头，而东方寻求整体的综合必将取而代之。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取代”不是“消灭”，而是在过去几百年来西方文化所达到的水平的基础上，用东方的整体着眼和普遍联系的综合思维方式，以东方文化为主导，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华，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这种“取代”，在 21 世纪可见分晓。所以他的结论是：21 世纪是东方文化的时代，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规律。[65]

三、新的追求和开拓

1. 模糊学与浑沌学

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一幕。

1911年生人的季羨林，和1949年生人的许明——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在谈着当前的学术。季羨林问许明，是否见到刚刚出版的《浑沌论》，还有一本刚刚上市的思维科学的书。许明有点悚然了，因为他和有些后辈一样，视季羨林这样名满天下的老先生为偶像，也是与新知无缘的“古董”，所以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专治中印文化史的季老却密切注意着当前学术发展的前沿理论。[66]季羨林风趣地打比方说，中国人的思考就是有自己的特点，我们打电话，拿起话筒，常会说“我是北大”，其实你怎么是北大，你就是某某，这不过是你省略了许多。[67]

许明可能不一定知道，季羨林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对模糊学感兴趣。1986年，他在尼泊尔的加德满都看雾，就浮想联翩，他想明目张胆赞美浓雾的人恐怕不会多，但想不到自己在这高山王国的首都却对浓雾大唱起赞歌来：雾能把一切东西，美的、丑的、可爱的、不可爱的，都给罩上一层或厚或薄的轻纱，让清楚的东西模糊起来，从而带来了另外一种美，一种在光天化日之下看不到美，一种朦胧的美，一种模糊的美。他又想到，一些时候以前，当第一次听到模糊数学这个名词的时候，他还说过几句怪话：数学比任何科学都更要求清晰，要求准确，怎么还能有模糊数学呢？后来了解了模糊数学的内容，反而觉得模糊数学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在人类社会，在日常生活中，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都有大量模糊的东西。承认这个事实，对研究学术和制订政策等等都是有好处的。因此，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在大自然中怎样呢？在大自然中模糊不清的东西更多。连审美观念也不例外。有很多东西，在很多时候，朦胧模糊的东西反而更显得美。月下观景，雾中看花，不是别有一番情趣在心头吗？在这里，观

赏者有更多的自由，自己让自己的幻想插上翅膀，上天下地，纵横六合，神驰于无何有之乡，倾注于自己制造的幻象之中：你想它是什么样子，它立刻就成了什么样子，比那些一清见底、纤毫不遗的东西要好得多，而且绝对一清见底、纤毫不遗的东西，在大自然中是根本不存在的。[68]

模糊性正是东方人综合的思维方式的表現。“模糊学”和“浑沌学”是一个新兴的但是有无限前途的学科。到 1990 年代中期，他特别注意到苗东升和刘华杰合著的《浑沌学纵横谈》一书，其中有一段话：

以精确的观察、实验和逻辑论证为基本方法的传统科学研究，在进入人的感觉远远无法达到的现象领域之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因为在这些现象领域中，仅仅靠实验、抽象、逻辑推理来探索自然奥秘的做法行不通了，需要将理性与直觉结合起来。对于认识尺度过小或过大的对象，直觉的顿悟、整体的把握十分重要。[69]

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科学，模糊学是从数学、哲学、逻辑学、语言学等诞生出来的，正如美国学者扎德所说：“模糊语言的概念是模糊集合理论中最重要的进展之一”，模糊类是指“其界限不是泾渭分明地确定好了的类别”，或者换个说法，“模糊类是指该类中的成员向非成员的过渡是逐渐的，而非一刀切的”。[70]

季羡林认为，没有形态变化的汉语，是世界上模糊性最强的语言。他举唐代诗人温庭筠《商山早行》中的两句诗为例：

鸡声茅店月

人迹板桥霜

他认为，这样描绘深秋旅人早起登程的寂寞荒凉之感，到今天已经一千多年，然而并没有失去其感人之处。两句诗十个字，列举了六样东西，全是名词，没有一个动词。用西方的语法来衡量，连个句子都成不了。六样不相干的东西平铺直叙地排列在那里，它们之间的关系一点也说不清楚，模模糊糊，然而妙就妙在模糊，美就美在模糊。

诗人没把它们排好位置，把安排位置的自由交给了读者。每个读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或理解，去任意安排位置。每个人的经验不同，所安排的位置也决不会相同。读者有绝对完全的自由放开自己的幻想，美就在其中矣。如果把六样东西的位置安排得死死的，就会限制读者的自由，美感享受为之减少。这正是东方综合思维方式或模糊的思维方式在文学创作中的表现，其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71]

季羨林很推重陶东风在《中国古代心理美学六论》中对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解释。陶东风的解释是：这是一首意境深幽的好诗，诗中的人称和时态都不加限定，思念的主体被隐去，可以是诗人，可以是别的他，也可以是你自己，动词“举头”、“望”、“低头”、“思”等词都没有时态的限制。它的时间性是灵活的，读者可以自己去想，去补充。如果你把诗的主人公理解为诗人，那么，时间当在过去；而如果你设想自己正置身于诗的境界，是你自己在“望”，在“思”，那么，时间也可以是当下。这是由于汉文原文时态不确定，人称不确定等原因所致。一旦译成英文，就把这不确定不落实的一切都确定了。人称确定为“我”，使原诗不确定的人物关系变得确定，只能理解为李白自己了。不确定的时态限定为过去时，使诗的意境大为逊色，“望”本可以是一个连续的动作，而译成了“发现”，就使之变成一个终止于过去的动作，“思”也如此，一个连续性的“思念”变成了“突然想到”，不能不使人感到沮丧。这样一来，原文的不确定性和朦胧性也就丧失净尽，审美经验也就受到了影响。[72]

季羨林将模糊理论引入，从模糊语言这一角度来理解这一问题。他认为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是分析的，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两种思维模式产生的文明是不同的，表现在语言方面，汉语和印欧语系的语言是最典型的代表。在这方面，他很欣赏申小龙对两种语言的分析，申小龙的观点是西方语言的句子是一种“焦点视”语言，谓语句必然由限定动词来充当，而这个限定动词又在人称和数上与主语

保持一致关系。句子中如果出现其他动词，那一定采用非限定形式，以示它与谓语动词的区别。因此，抓住句中的限定动词，就抓住句子的主干，整个句子格局也就纲举目张，这就像西方油画一样，采用的是严格的几何形的焦点透视法，而汉语句子的认知心理不是“焦点视”，而是“散点视”，汉语句子的思维不是采用焦点透视的方法，而是采用散点透视的方法，形成了独特的流水句的格局，很像中国画的透视。[73]季羨林认为这种观察是非常细致而准确的，提出了非常精辟的见解。[74]

季羨林认真分析西方为什么在 20 世纪后半期兴起了与西方思维注重分析背道而驰的模糊学、混沌学的原因，认为是由于西方有识之士已经痛感西方分析的思维方式不行了，世上万事万物没有绝对的百分之百的正确，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绝对的好，绝对的美是不存在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分析的方法有限度，要把一切都弄得清清楚楚是办不到的，必须改弦更张、另求出路。季羨林和许明谈到的混沌学的著作，是指美国学者格莱克写的《混沌：开创新科学》。季羨林不仅对此书感兴趣，而且对此书的书评也感兴趣，他对周文斌在《光明日报》（1990 年 11 月 8 日）发表的书评仔细地阅读，注意到其中的一段话：

混沌学是关于系统的整体性质的科学。它扭转科学中简化论的倾向，即只从系统的组成零件夸克、染色体或神经元来作分析的倾向，而努力寻求整体，寻求复杂系统的普遍行为。它把相距甚远的方面的科学家带到了一起，使以往的那种分工过细的研究方法发生了戏剧性的倒转，亦使整个数理科学开始改变自己的航向。它揭示了有序与无序的统一，确定性与随机性的统一，是过程的科学而不是状态的科学，是演化的科学而不是存在的科学。它覆盖面之广，几乎涉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

模糊学、混沌学是西方以前没有的科学，从模糊数学开始，以后又有模糊逻辑学、模糊语言学。人们天天说话，但没注意到自己的语

言是模糊的。如说天气好，怎么叫好？天气暖，怎么叫暖？长得高，怎么叫高？这件事情好，怎么叫好？都是模糊的。人可以对这些问题仔细分析，追根问底，但是要讲清楚却很难。[75]因此，混沌学被誉为继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普朗克的量子力学之后，20 世纪科学的第三个伟大的发现。

而西方模糊学、混沌学的兴起，正说明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快走到尽头，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思维方式为基础的东方文化。

2. 对中国文化特点重新认识

季羨林 20 世纪 30 年代在清华大学读书时，经常驻足于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写的纪念碑文之前。其中有几句话说：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除了这段碑文，陈寅恪先生还为王国维写过一篇《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其中也有一段话：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厚，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当时，他对这些话的理解是，觉得它与王国维之死挂不上钩。因为王国维在溥仪被逐出宫时曾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惨变，义无再辱。”因此与罗振玉、柯绍忞等相约同殉，但未果，他认为这是耻辱，到 1927 年，韩复榘兵临北平城下，他不想再一次受辱，于是自沉于昆明湖。所以季羨林认为王国维是一种忠君思想，同什么“俗谛”、“思想自由”、“文化”有什么关联呢？这些问题多年来一直耿耿于怀，没有得到认真解决。[76]

后来，他又对陈寅恪说的“中国文化定义：三纲六纪”，觉得非常奇怪。[77]

最近一些年，季羨林读到时贤纪念陈寅恪先生的著作和论文，其中有的论文对王国维之死作了一点解释，但有点隔靴搔痒，没搔到痒处，于是便重新思考这些问题。

陈寅恪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说：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见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 Idea（观念·理念——笔者）者。[78]

三纲是君臣、父子、夫妇，六纪是诸父、诸舅、族人、朋友、师长、兄弟。这些话未免迂腐，也有糟粕，如“夫为妇纲”之类。君臣也不存在，但国家与人民却差堪比拟。所以，对这段话的理解，不能拘泥于字面，而应深入其内里。三纲六纪把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发生的人际关系各方面都考虑到了，所以中国文化的根本，就在于处理人际关系。

这一点，香港著名学者饶宗颐教授说得更为明确，他说：“中国文化所以能延绵数千年，仍有如此凝聚力量，实乃受两个因素所驱使，一是文字，二是纲纪，即礼也。依我多年所悟，中华文化的特点，是在儒家思想中的‘礼’，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学问，这个关系就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要明是非，方能取得‘和’，所以《论语》说：‘礼之用，和为贵。’”[79] 季羨林认为，饶宗颐与陈寅恪两位先生的意见是“英雄所见略同”。

因此，季羨林在此基础上解释王国维之死与重视人、重视人的社会关系和伦理关系的中国文化特点有关，既然中国文化偏重伦理道德，而伦理道德的骨架是三纲六纪，所以王国维之死表面上看是臣殉君，但从更深一层的内涵上看，说他是殉中国文化更为合情合理。

[80]

即便在今天，在国内讲安定团结，在国际讲“和为贵”，主张和

平。而人际关系、国际关系都要有一定道德伦理的制约，纲纪就是制约的手段，没有此手段，则国将大乱，国际间也不会安宁。纲纪犹如大街上的红绿灯，没有红绿灯，大街上会何等混乱，一想就明白。所以中国的办法，就是利用几千年来传下来的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精义纲纪的学说，来调整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得到调整，则社会安定也就有了保证。再济之以法，那么天下就可以太平。[81]

这种伦理关系具体到每一个人，就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从一个人的修养，一直到治国、平天下。中国的统一一直是历史的主流，就是因为中国儒家文化的重点是人，重心是解决人的问题，处理好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社会就会安宁，才会发展。

在此基础上，季羨林反对只发展经济不注重道德建设的现象。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头几年有一种说法——“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他并不笼统地反对这种说法，但认为不全面，真正的理想，应该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经济搭台，文化唱戏”。文化和经济相结合，那么文化能发展，经济也能发展。[82]他希望有远大眼光的企业家不应追求在财产后边加“0”，而应该贡献给国家，用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能够做到经济和文化互相搭台互相唱戏，是最好的。[83]

3. 人学

人际关系属于人学的范畴，季羨林重视人际关系，自然也重视人学。

人学可以说是一门新兴的科学，牵涉到许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在中国，最早在现代意义上使用“人学”这一概念的是近代学者廖平。廖平，字季平，晚号六译，四川井研人。他生于1852年，卒于1932年，早年受学于王闿运，治今文经学，曾任教尊经书院、四

川国学院，撰有《知圣篇》、《群刘篇》，又有《今古学考》、《孔经哲学发微》，其中有些论点受到康有为推崇，并在其《新学伪经考》中加以继承。廖平的著作《孔经哲学发微》中提到了“天学”、“人学”、“王伯学”等概念。“天学”是研究六合以外之学，“人学”则是“六合以内之学”，是研究人类社会问题、治国平天下道理的学问。他认为《春秋》是“王伯学”的经典，“治国学”以《王制》为之传；《尚书》为“皇帝学”的经典，“平天下学”以《周礼》为之传；这些皆属于“六合以内”的事，所以称“人学”。“天学”的经典则是《诗》、《乐》、《易》，“游神变化，不可方物”。廖平还认为佛、道、耶（基督教）、回（伊斯兰教）皆归“天学”。廖平的著作编为《六译馆丛书》，但《孔经哲学发微》未编入其中。

而从世界范围来看，一战后，从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开始，兴起了大谈文化的思潮。二战后，又从存在主义的著作开始，大谈“人论”、“人学”。文化和人学相联系，文化是人的产物，而人也是文化的产物。关键是人是什么的问题。

人类对自己是什么的初步答案，周辅成先生认为早在古埃及的“狮身人面”像时代，就提出了古埃及人对“人”的看法：它以奇特的形体让人知道，人并非是不朽的东西，它是从兽转化来的，有聪明的头脑，有勇猛的体力，人是智勇双全的东西。[84]

而季羨林则从他独特的“天人合一”论观点入手来谈人学。

他认为，人类从其他动物中脱颖而出成为“人”以后，成为“万物之灵”。他们改造了世界，也改造了自己。到今天，人类创造出来的文明，光辉灿烂，大之能登上月球，小之能深入原子，穷极微藐，于是在有意无意之间，自命为宇宙的中心，宇宙的主人，气焰万丈，不可一世了。但夷考其实，却不禁令人气短。人有点像孙悟空，一个筋斗跳十万八千里，神通可谓大矣，自以为到了天地尽头，在五根大柱子下面撒了一泡猴尿，翻身回来才知道并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心。

这如来的手心，对人类来说，就是人类本身。

原因在于人对于自己这一架看似微末人人都有躯体，了解得实在太可怜了。这样一个“人”，不管是自然属性，还是社会属性，都所知不多。

在人的自然属性方面，人对躯体确已有所了解，对人体骨骼，甚至骨头的数目，都能了解；对脉络，甚至对血液流动的规律，也都能掌握。但是一进入神经领域，人类便捉襟见肘。光靠解剖刀无能为力，即使被解剖的是活的，解剖刀一下，也立即变为死的，自以为无所不能的医生和心理学家，也只有望刀兴叹了。至于人体特异功能，至今还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在人的社会属性方面，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社会的组织结构等等，在人类历史上都逐渐有所了解，但是矛盾依然存在，而且愈演愈烈。这些矛盾，在过去表现为改朝换代，到今天，则促成了全球大震荡，几乎有一个民族就要形成一个国家。其根源何在，也是无法说清楚的。

至于人与天的关系，人类没能处理好。西方工业革命以后，口口声声要“征服自然”，但一旦触犯了大自然，它的惩罚却是十分严峻、十分可怕的，今天已有许多冷酷的事实摆在人类面前：大气污染，酸雨，臭氧层破坏，生态平衡被破坏，等等，已严重威胁人类生存。有识之士已看到这一点，但大多数人还在懵懵懂懂，包括一些有权势者，还“错把杭州当汴州”，实在令人不寒而栗。

所以，季羨林认为人学的关键是解决人的生存、温饱和发展问题，而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必须解决人本身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即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及兼及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问题，而中心环节是“人”，把“人”弄清楚，而“人学”尚矣。[85]

季羨林提倡不要忽视“人性”的问题。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谁要提“人性”，就是抽象人性论，而抽象人性论就是“修正主义”，

离开反革命只有一根头发丝了。

他从宋赵与峕《宾退录》卷九中摘了一条笔记：

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则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86]

这几篇文学作品确实碰到人内心的某一些地方，震撼了灵魂，使人受到感动，得到“净化”。原因就在于文学作品有阶级性、时代性、民族性之外，还有个“人性”的问题。清代诗人赵瓯北高唱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马克思所说希腊神话有永恒的魅力，说的就是这种“人性”。李白、杜甫的诗到今天，不是数百年，而是一千多年，让人读来仍感觉新鲜，中国和外国都还有一些作家和作品，可以归入这个范畴，其原因就在于能触到人的灵魂，引起共鸣，而能引起这种共鸣的就是这个“人性”。最现成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在承认文学作品的阶级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同时，还承认一个贯通这些性或者高踞于这些性之上的性：人性。[87]

4. 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工作

季羨林既然是个“大杂家”，那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他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事实上，季羨林对《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撰，是贡献了相当大的力量的。

《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启动，开始于1978年。局内人都知道，季羨林在一开始，就大力支持首任总编辑姜椿芳先生，出任《外国文学》卷编委会副主任委员。那时，他已身兼数职，《罗摩衍那》的翻译还未竣工，但仍挺身而出为姜老分忧。1979年7月召开《外国文学》卷第一次会议，他又兼任了南亚文学主编。

与季羨林联系的编辑人员，从来没遭到过拒绝，要求他办的事无不答应，甚至一些琐碎的小事也乐于帮助解决。

但季羨林自己并不这样看，他坦诚地解剖自己说：

我对大百科全书的意义不能说一点认识也没有，但是应该承认，我最初确实认识很不够。大百科出版社成立时，我参加了许多与大百科没有直接关系的学术会议。我记得在昆明，在成都，在重庆，在广州，在杭州，当然也在北京，我参加的会内容颇为复杂，宗教、历史、文学、语言都有。姜老是每会必到，每到必发言，每发言必很长。不管会议的内容如何，他总是讲大百科，反复论证，不厌其详，苦口婆心，惟恐顽石不点头。他的眼睛不好，没法看发言提纲，也根本没有什么提纲，讲话的内容似乎已经照相制版，刻印在他的脑海中。我在这里顺便说一句：朱光潜先生曾对我讲过，姜椿芳这个人头脑清楚得令人吃惊。姜老就靠这惊人的头脑，把大百科讲得有条有理，头头是道，古今中外，人名书名，一一说得清清楚楚。

但是，说句老实话，同样内容的讲话我至少听过三四次，我觉得简直有点厌烦了。可是，到了最后，我一下子“顿悟”过来，他那种执著坚忍的精神感动了我，也感动了其他的人。我们仿佛看到了他那一颗为大百科拼搏的赤诚的心。我们在背后说，姜老是“百科迷”，后来我们也迷了起来。大百科的工作顺利进行下去了。[88]

《外国文学》卷在进入撰写阶段以后，碰到了不少困难，因此有人表现出信心不足，甚至有人主张推迟编写，因为条件尚不具备。1980年7月，编委会在莫干山开会。冯至是主编，季羨林是副主编。季羨林力主编写工作不能推迟。他不仅审稿，而且还自己写稿，《跋弥》、《佛本生故事》、《迦梨陀婆》、《罗摩衍那》、《印度巴利语文学》、《印度俗语文学》、《五卷书》，都出自他的手笔，而这些辞条都是在1980年就完成了的。

1982年《外国文学》卷2册相继出版，季羨林又写了一篇《〈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评价》的文章，发表在《世界文学》1982年第5期上。他肯定了这部360万字的大著作是对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而参加编写的人员来自全国各地，大学

与科研机构相结合，专业与业余相结合，老中青相结合，是空前的壮举，值得大书特书。就在这篇文章中，季羨林提出了他的“百科全书”观：其一，论述应当客观、全面，应以发展和联系的观点看问题，不以“政治态度”定优劣，论取舍；其二，资料必须准确、丰富，要有最新资料，反对固步自封；其三，东方与西方，大国与小国，要正确对待，既重视第三世界，破除欧洲中心论，又不轻视西方；其四，按成就和贡献大小确定是否立条及条目字数，各国的条目和字数要保持相对平衡；其五，文体力求一致；其六，译名务须统一。这些观点被认为丰富了《大百科全书》的编辑方针和编写体例，特别是前四条，完全是亲身经验的实践的总结，没有一本现成的书可以借鉴。[89]

1982年，季羨林又出任《语言文字》卷的编委会主任委员，并被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这时他工作更为繁忙，对大百科的工作却热心如故。

对《语言文字》卷的编写工作，季羨林和吕叔湘都全力支持，并加以鼓励。季羨林对编写人员动情地说：“椿芳同志在前面冲锋陷阵，我们不能后退。”[90]他自己身先士卒，写了《吐火罗语》、《印度伊朗语族》、《宰利文（粟特文）》、《巴利文》、《梵文》、《达罗毗荼语系》等辞条。

1985年12月，为了修改许国璋先生的两个辞条，季羨林亲自出面。出门那天，天气阴冷，北风呼啸，似乎有意阻止他出门。但他毫不在意，只穿中山装，戴一顶鸭舌帽，不加风衣，也不披大衣，要不到车，便与编辑人员乘公共汽车去北京外国语学院。汽车上没有人让座，他就一直站着。到了许国璋家里，他恳切陈词，与许先生谈得十分融洽。告辞时，许国璋叫了一部车把季羨林送回家。

在这之前，季羨林虽然与许国璋有交往，但并不算很多，通过大百科全书，他们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了。这也可以说是大百科全书的一个副产品吧。

5. 投身于中国文化书院建设

上世纪 80 年代中，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之后，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进行反思，研究中国文化的风气，已稍有兴起之势，但还没有真正成气候，后来的“文化热”还没有形成，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几位年轻教师，在系内外、校内外几个老教授季羨林、冯友兰、张岱年、汤一介、楼宇烈、朱伯崑、庞朴等先生的支持下，毅然创建了中国文化书院。

中国文化书院与中国历史上的书院一样，是学者的讲学之所，与官方所办的正规学府有一定的区别。中国从唐代始兴书院，唐玄宗开元六年（718），以乾元院为丽正书院，当时的任务是校刊、收藏“古今之经籍”，以帮助皇帝了解经典史籍，并荐举贤才和提供建议，供皇帝参考和选用。这是官办的书院。私人办的书院则是贞观九年（635）在遂宁县所办的张九宗书院。宋初，大力兴办书院，书院规模也逐渐扩大。宋代的著名书院有白鹿洞、石鼓、应天府、岳麓，号称“四大书院”。南宋时，书院遍及全国，每一书院各有自己的特色，是某一学派传授生徒的据点。如白鹿洞书院是朱熹讲学处，石鼓书院是李士真讲学处，应天府书院是戚舜宾的讲学处，岳麓书院是周式讲学处，后在南宋由朱熹仿白鹿洞书院，设立学规。元明清三代，书院或兴或废，持续不断。

中国文化书院的建立，旨在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一定的裨益。但它并不是像历史上的书院那样是某一学派的讲学之所，而是继承北京大学的传统，提倡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思想观点不一致也可以在这里讨论，甚至交锋。一群包括老、中、青三个年龄层次的学人，真正是不靠天，不信邪，有远见，有卓识，敢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山林终于被他们开辟了。

书院创办之时，季羨林便被聘为导师，后来一直是该书院的名导师之一，并被聘为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

1994 年是中国文化书院创建十周年之际，十年来它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成就，季羨林兴奋地说：

到了今天，在并不能算是太长时间的十年内，他们团结了不少位国内大学和科研机构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著名的学者，还有台湾省的学者，美国的华侨和华裔学者，还有一些外国学者。举办和参加了许多学术活动，出版了一批学术著作，在国内外已经颇有点名声，借用一句古老的俗语，中国文化书院已经“够瞧的”了。[91]

季羨林本人为中国文化书院所做的贡献，一方面是他为书院举办的学术活动作学术演讲，谈治学经验，另一方面，又为文化书院主持学术著作的编撰与出版。仅在最近一些年，由季羨林任主编的大型丛书，就有《神州文化集成丛书》，计划先出一百本，并将配以电视录像，读者对象不限于大陆，也包括大陆以外的华人华裔，台湾在内，自不在话下，连在历史上同中国文化交流密切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也包括在里边，原则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读者越多越好。在已经出版的文化交流类中，十部著作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国文化在日本》、《中国文化在朝鲜》、《中国文化在越南》、《中国文化在欧洲》、《中国文化在美国》、《中国文化在苏俄》、《丝绸之路》、《徐光启与利玛窦》、《孔子与伏尔泰》，均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季羨林亲自撰写了《中印文化交流史》一书。

人们不会知道，在为中国文化书院主持项目的同时，季羨林还在为北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组织撰写《东方文化集成》担任总主编。工程已于 1995 年启动，准备组织全国研究东方文化的力量，用十年时间，撰写出版五百种著作，涵盖东方各国文化，内容浩博，规模宏伟。此工程最初由经济日报出版社承担，其出版必对弘扬东方优秀传统文化传统、促进人类文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后来出版社有所更动，现在已经出版了 100 多部，还在陆续出版之中。

这就可见季羨林为中国文化书院付出的劳动是多么宝贵了，其工作之艰辛也是可想而知的了。这一点，从季羨林为纪念中国文化书院

创建十周年编成的《文化的回顾与展望》一书的《序》中，也可以略知一二。

十年，不算是太长的时间。但是，我们中华民族是崇拜整数的民族。十年是一个整数，因此十年大庆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我们怎样来庆祝呢？我们都不是“大款”或“大腕”，我们不是石崇，不是洛克菲勒，我们无法一掷几十万，摆一桌专门吃金粉的华筵。我们也都不是孙悟空，无法去偷王母娘娘的蟠桃来祝寿。我们是一介书生，是一群秀才。俗话说：“秀才人情半张纸。”我们只有半张纸的能力，半张纸就是我们能力的极限。我们决不会轻视这半张纸，人世间有识之士也不会轻视。

我们都能了解这半张纸的分量。它是从我们的心灵最深处流出来的，其中隐含着不知几多心血，几多辛苦。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我们无一例外。衣带渐宽终不悔，我们无一例外。这半张纸是一行行的字组成的，行间烟霞，笔底风云，它覆盖着宇宙万有，为先民继传统，为万世开太平。这半张纸正是中华文化寄托之所在。[92]

正因为创业之艰难，所以经过十年的努力，对书院取得的成就，书院人都是很珍惜很自豪的。在 21 世纪到来之后，书院人更为深知自己肩头担子之重，因为新世纪将为人类的前途开辟新路，给中华文化、东方文化带来腾飞的机遇，而在它来临之前，书院要为此做好准备。他们深知，弘扬端在努力，爱国不敢后人，年龄不管老少，共同目标把他们拉到一起，年老的，“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年轻的则激扬文字，挥斥方遒。因此，面前虽然还有困难，但季羨林认为，老中青三代非常团结，目标一致，事业正义，认识又一致，广交天下仁人志士，同心协力，就会克服困难。对书院的前途，季羨林个人有一个感觉，就是“真理毕竟胜利”，借用宋人的诗句就是“严霜烈日都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再借用陆游的一句诗，是“柳暗花明又一村”。[93]

6. 出任《传世藏书》总编

几乎在为中国文化书院、北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主持重大项目之时，另一个大型图书出版工程也在第三个战场进行着，这就是由诚成企业集团（中国）有限公司策划、组织并全额投资 1.5 亿元人民币制作的古籍整理工程《传世藏书》。

《传世藏书》是国家“八五”跨“九五”重点图书出版项目，是清朝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之后二百多年来，最大最系统的古籍整理工程。项目启动于“八五”计划期间，由季羨林任总编，张岱年、徐复、王利器、钱伯城、戴文葆等著名学者任主编，并组成学术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工作委员会主任由陈克勤、刘波、李频出任。全国二千多名古籍整理工作者参与整理工作，收入自先秦至清末要籍一千种，总计二亿七千六百万字，分经、史、子、集四库，每库之下又分若干部类，共计一百二十三册。

该工程的初衷，是感叹中华典藏丰伟，但多为御藏、官藏，读之不易，借之尤难。便想汇为一书，变官藏为民藏，让喜读书的普通人，足不出户，能随时阅读，汲取知识，充实思想。

这样一个大工程，困难多矣。经费筹措难，排印难。此书本可以取影印之巧，有错是原书的，不背骂名。但为了读者方便，有巧不取，决心横排、简体加标点，如此决策，平添了千百倍麻烦，千百倍工作量，就使工作中的艰辛，难以言状。

在关键的时刻，季羨林为工作委员会打气，鼓之以真情实感：要办事，便有难，若人人取巧怕难，社会何以发展！于是，编写人员有了劲头，他们下决心给后世读书人行个方便，坚信“人终为灰土，书终以传世”。[94]

在工程启动之后，编撰人员少娱乐，少贪睡，不闲适，多工作；无白发的，添了白发，有白发的，多了白发；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有时候，一本书标点了，编辑了，校勘了，会忽然因为

电脑或别的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前功尽弃，令辛苦人欲哭无泪，只得一切从头另来。

这样一件出版界的大好事，偏偏有人无端非议，指责设计时专注在“藏”，但并不实用，不收选本，不收注释，很可能成为有钱人摆在书柜里的装饰，于弘扬中华文化用处不大。也有人指责季羨林好大喜功。其实，季羨林早就功成名就，学界泰斗的地位早已确定，现在什么也不干，这个地位也不可动摇。对这样指责的人来说，他们的逻辑依然是干的不如不干的，不干的不如捣蛋的！不然，该做何解释呢？

当全书出版工作告竣之后，季羨林于1996年10月11日晚上九点半，乘飞机从北京来到济南，10月12日在山东大学举行了北大教授季羨林、中国建行山东分行为山大九十五周年校庆献礼的“《传世藏书》捐赠仪式”，季羨林为母校捐赠了一套，建设银行山东分行捐赠了一套，每套价值六万八千元。

目前，这两套书已经编码启用，以文史哲见长的山东大学莘莘学子，已经享受到季羨林贡献给中华民族这份厚礼的精神营养，一批学术研究成果将依赖这套丛书而诞生。山大学子们衷心感谢季羨林老学长！

7. 出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总编撰

这是又一个战场，又一个宏大的项目，就是编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项目主持人、总编撰是季羨林，因为此工程的策划者《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撰出版工作委员会认为，担此重任者，非季羨林莫属！

修撰这套大型丛书的起因，是因为《四库全书》虽网罗典籍3461种，70309卷，号称中国传统文化之总汇，但此书并不全，这也是学术界众所周知的，因为大量不合清王朝口味的，或列为存目，或

遭禁毁。仅列存目的，就有 6793 种，93551 卷，约占当时传世典籍的一多半。加之清中叶以来，多有国难，文献散亡，存目者十丧三四，如再不及时抢救，不但无法开发利用，且有继续亡佚之虞，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鉴于这一理由，策划者决定出版存目丛书。齐鲁书社出大陆版，台湾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大陆外版。组成了以季羨林为总编撰的编辑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收录了散藏在全国和欧、美、日等国家的 200 余家图书馆四库存目书 4000 种，6 万余卷，分成约 1200 册，分为百卷（总目），经、史、子、集四部，尾卷（索引）。这部丛书收录的，其中有三成是孤本，许多具有极高学术价值、史料价值和版本价值，实为研究中国文化所必备，堪称保存古代文献之盛举。

收录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有极高学术价值的比比皆是。

对研究哲学和政治思想很有价值的有李贽《藏书》、《续藏书》，张居正《太岳集》、王廷相《雅述》、《慎言》，吕坤《呻吟语》、《去伪斋文集》，方以智《药地炮庄》、颜元《存学编》、《存性编》，李塨《论语传注》、《大学传注》、《中庸传注》、《大学辨业》、《恕谷文集》，李颀《四书反身录》、《二曲集》，黄宗羲《南雷文定》等。

史类著述最为可观，引人注目者有《元典章》、《皇元圣武亲征录》、郑麟趾《高丽史》、雷礼《皇明大政记》、傅维鳞《明书》等。野史笔记杂录中姚汝能《安禄山事迹》、陶宗仪《草莽私录》、黄瑜《双槐岁钞》、田艺蘅《留青日札》、陈全之《蓬窗日录》、焦竑《玉堂丛语》、何良俊《四反斋丛说》、朱国桢《涌幢小品》、文秉《先拨志始》、蒋平阶《东林始末》都很有价值。

地理类值得注意的有刘侗《帝京景物略》、马欢《瀛涯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徐崧《百城烟水》等。

文学类有郎瑛《七修类稿》、吕子孝《玉霄仙明珠集》、纳兰性

德《通志堂集》、孙枝蔚《溉堂集》、万钊《诗经类考》、胡应麟《诗薮》、沈雄《古今词语》、叶燮《原诗》等诗文评著述都很值得注意。

其他如小学类《四声切韵表》、《黄公说字》、《汇雅》，目录类《国史经籍志》、《读书敏求记》、《述古堂书目》，医家类《难经经释》、《临证指南医案》、《医史》、《疮疡经验全书》，天文算法类《算法统宗》、《勾股述》、《天经或问后集》，农家类《沈氏农书》，艺术类《法书通释》，刑法类《洗冤集录》、《刑统赋》，杂家类《西学凡》、《辨学遗牍》、《天主实义》、《灵言蠡测》、《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多能鄙事》，释家类《佛祖统记》、《南宋元明僧宝传》等，都是极有价值的珍贵典籍。

四库存目书之价值如此重要，近代以来学者多有肯定和使用，如梁启超、陈垣、郑振铎、谢国桢等人都是。因此，“四库存目书可以说是珍品杂陈，琳琅满目，难以尽数”。[95]

对这样有价值的大型丛书，也有人出来横加指责，什么名字便不通啦，大就一定好吗？什么既不经济，也无必要啦；什么在文化史上将流为笑谈啦。好事者批评说：“好大未必能成其大，急功未必能成其功。大的，不一定就是好的，正不必一见‘大’，便为吹嘘，替它做广告”，甚至作打油诗说：文化弘扬事可歌，急功近利反蹉跎；真知灼见千般少，充数滥竽一个多。[96]

对这样的讽刺、挖苦，急于想读书的读者忍受不了，丛书编委会、工委会自然更忍受不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宽厚出名的季羨林不得不出来说话了。他不理解，为什么做几件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极为有利的事，偏偏有人出来反对，他写信给发表讽刺画、文的《读书》编辑部说：

我本来想充当一次哑巴，现在已经逼到哑巴头上，不说话不行了。我且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总怀疑，你们并不知道什么叫《四库全书》。你们不妨驾临图书馆去翻阅几分钟，这样总比闭着眼

睛瞎说要好，这样也能保护你们自己的面子。

他又说：

我只是感觉到文化学术界这样的一件大事，事关我们全体的名声，我不能不说几句话，私心不能没有一点，但是主要出之公心。

[97]

最近几年，季羨林写《糖史》，不管春夏秋冬，不顾酷暑严寒，几乎天天跑一趟北大图书馆，主要的吸引力就是《四库全书》，《糖史》中的很多资料，就来自《四库全书》。

连着两天，季羨林给《读书》写了两封长信，道出了读者和编者的心声，使他们有了信心，感到这样的话由他说出来，分量就不一样。[98]

是的，没有人能阻挡住这一大型文化建设工程的推进，从1994年开始编撰，1995年首批《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出版，国内外名报《人民日报》、《文汇报》、《快报》、《世界日报》、《星岛日报》、《世界周刊》、《澳门日报》、《商报》、《大公报》、《联合报》等均以显著位置作了报道。

和《传世藏书》一样，季羨林相信“真理毕竟胜利”。而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还未杀青，季羨林又担任了由安徽教育出版社策划准备出版的《胡适全集》的主编。

季羨林就这样不断有新的追求、新的开拓，这正应了曹操的那首《龟虽寿》诗所说：

老骥伏枥，
志在于里，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四、道德文章

1. 光风霁月

中国宋明时期的理学家们喜欢讲气象，气象本是指大气中各种物理现象和物理状态的统称，有时也在景象、光景的意义上使用。但理学家所讲的“气象”均不是指这两方面的意义，而是指人的道德和精神的境界。程颐为程颢作《明道先生行状》，说：

先生资禀即异，而充养有道：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诚贯于金石，孝弟通于神明。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

[99]

这里程颐所说，均属程颢的“气象”，显系道德境界和精神境界兼而言之。另有黄山谷（庭坚）说理学家周敦颐：

濂溪先生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羸，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100]

这样一个对周敦颐气象的评价，可以说是抓住了本质，所以这个评价深得后来理学家的赞许。

这样的话，用来评价季羡林，也完全适用，毫无夸张。

季羡林道德境界之高尚，在学术界一直传为美谈，学人多有品评，这些品评多是将道德文章放在一起，这里姑且做一个集锦。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说：季羡林不能整，他是国宝。民盟中央主席、北京大学前校长丁石孙教授说：要学习季老的优良品德，因为季老是我国知识分子的楷模。著名外国文学家、诗人冯至先生借用歌德的两句格言诗改为第二人称献给季羡林：你的产业是这样美，这样广，这样宽/时间是你的财产，你的田地是时间。许多国际知名学者均对季羡林有极高评价，如称他为“元老级的东洋学者”，“东亚，包括日本，最伟大的印度学家”等等。[101]

张中行先生说：他会得太多，而且既精且深，我等于站在墙外，

自然就不能瞥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他以一身而具有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三种难能之中，最难能的还是朴厚，像他这样的难于找到第二位。

国际友人韩素音女士说：我真是幸运，能与中国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季羨林教授相遇，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梵文学者之一，我对他的尊敬和称赞愈益增长。他是一位完全具备知识分子品格的人，决心要做出最好的学术成果，他从来没有放弃坚持一切都要优秀的原则。我在他身上发现的不只是博学，而且是睿智，不仅是睿智，而且还有非常谦恭有礼和幽默。他的博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可是他这样谦虚，可以让人们跟他谈论那些他其实比他们知道得更多的话题。他尊严的人格，他的对于物质利益毫不动心，他对于书的热爱，他的耐心，还有他的充分的真诚，对我来说，他将永远是气节的象征。他毫不追求权力、财富或者被人颂扬，他整个地献身于他的国家和人民，还有他的不动摇的忠诚，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榜样。

张学书说他俭以养德，爱国情深，律己谨严，待人以礼。

彭定安说：他脸上含着平和的微笑，平易近人极了。一切都深蕴不露，然而又不是故意的，更非胸有城府，而是实实在在的、朴素自然的，是融汇于、包容在深层文化、高度修养、自在人格中的一种“天然自成”的形象。他真正是学贯中西古今，然而从穿戴到神情，竟没有一点外在的洋味，却深深地体现了一种中国传统学者文人的文章、道德、风骨三者统一融汇而形成的儒者气度，这正是立足于中国文化深厚装备，又吸取了外域古代和现代文化的深厚营养而形成的气质与风格。

白化文为季羨林八十岁生日献寿联有“岱岳华巅”、“宗师鹤寿”句，首嵌“岱宗”二字，译为“学界泰斗”。他又为季羨林八十五岁生日献寿联一副：鲁殿灵光在，梵天寿量高。

谢方说：他自己粗衣淡食，生活简朴，却拥有一个极为丰富的精神世界。

谢冕说：他是那样的普通，普通得无法和周围的人加以区分。他如同一滴最平凡的水珠，无声地消融在大江大河的激流之中；他如同一粒最平凡的泥土，加入了无比深厚的黄土地的浑重之中。伟大无须装饰，也不可形容，伟大只能是它自身。他是极为单纯的，单纯到不染毫纤的自然，从那朴素、平淡和普通中感受到那种崇高人格的震撼力。

黄伟经说：他那质朴的穿着、随和的举止，一下子让我这个晚辈大大地缩小了跟他的距离，在我心里增添了一种亲切感。他自幼至老都有着“乡下人”的朴实、执著、勤奋、坚忍、耿直，和作为学者的睿智和宽容。

袁行霈说：和他在一起，矜可平，躁可释，一切多余的雕饰的东西都成为不必要的了。他是集中了朴实的美德并展现了朴实的力量的典范，他的朴实带有豪华落尽的真淳，好像元好问所称颂的陶诗，这就更加令人尊敬。

刘烜说：他将东方式的顿悟、洞察力、圆融之智，与他在西方文化中汲取的严谨、理性、逻辑与分析，加上山东大汉的倔强的民族精神，融汇贯通在一起形成了他独特的人格力量。季羨林的名字，将作为 21 世纪东方文化的一个象征闪烁着光彩。

梁披云为季羨林题写的条幅是：为天地立心，为万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世界开太平；对联是：德寿无量，日月长明。

叶稚珊说：没有人会为他的沉默而拘束，同座的人都会分享到一种熨帖平淡的温暖和宁静。不在乎他说了什么没有，很在乎他来了，满是智慧的大额头有几分像寿星的季先生来了，气氛就不一样。

许明说：第一次去见季老时，心中并没有那种惶惶不安的朝圣感，这往往是后生的迂钝之处：不知自己正在与历史遭遇，季羨林是注定要写进中国学术史与中国文化史的。

乐黛云说：如果我有一点成绩，那是由于学习了您的风范。如果我还有许多失误，那是由于我学习得还太不够。

王文宏说：季先生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头上的光环是由教育家、语言学家、翻译家、作家等等组合而成，这光环散发的光彩已是夺日照人，他为一代一代的学子指明了学术之路，然而光环的底蕴还有一束潜在的灵光，那是来自先生心灵的照射，这心灵之光便是先生不同于一般学者不同的风范，是他独立于世，立德、立功、立言的人格魅力。

辛岛静志说：从先生那里学到的，不仅仅是他治学的方法，还有他治学的态度，做人的准则。无论今后走什么样的道路，先生的言行总会引导我远离世俗，让我心平气和地读书，老实实在地做人。

陶东风说：季老是一个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同时又坚持非常专门的（甚至可以说是冷僻的）学术研究、兼具思想家与学问家性格的学者，这一点使我获益匪浅。

李春林说：先生的气质仍然是一个纯粹的儒者，他既是文化道德的传播者，又是文化道德的实践者，这两方面加在一起，儒者应该道德文章双修，言传身教兼备，是文化道德的活生生的榜样。[102]

这一段段毫无联系的话，用不着刻意追求把它们加以逻辑化，就让它们是散落的珍珠好了，不用人为地把它们用绳子串起来。但是，从这种朴素的排列中，完全不难看出季羨林那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般的道德，如光风霁月般让人肃然起敬。

季羨林的道德文章也得到国家领导人的认可。2003年9月9日9时45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解放军301医院，看望季羨林先生，说他在海内外享有盛誉，渊博的学识和不断创新的治学精神，堪称学界楷模。在不到两年的2005年7月29日上午9时许，他又到解放军301医院康复楼探望季羨林先生，祝贺他的94周岁生日。温家宝对他说：“您的《留德十年》和《牛棚杂忆》我都学习过。去年我访问德国时还专门引用您的一段话：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的祖国母亲。”温家宝还特别说到他“最喜欢的话：真情”，“常讲做人要真情、真实、真切。”

季羨林坦承“三真”是自己做人做事的原则。这次短时间的探视和拜访，揭示了季羨林的两个优秀品质：爱国主义和“三真”。在这之后的8月17日，温家宝又写亲笔信，对季羨林进行了全面的评价，誉他“先生苦学不倦，笔耕不辍，著作丰厚，学问深刻，用力甚勤，掘发甚广，实为人中麟凤。先生待人真诚，行事正直，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尤为人之楷模。先生的人品深为我所景仰”，高度评价他的学术成就和人品道德。2006年8月6日温家宝第三次去给季羨林祝寿，给他送来一盆枝繁叶茂的君子兰，向这位学贯中西、笔耕一生、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表示敬意。说季羨林先生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生笔耕不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先生写的作品，如行云流水，叙事真实，传承精神，非常耐读。还对他说：“您写的几本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历经沧桑、艰难困苦，但爱国家、爱人民始终不渝，他们不懈奋斗，把自己的知识奉献社会、服务人民。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那时，您利用在传达室看大门的时间，翻译了280万字的梵文作品。这不仅是个人毅力决定的，也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对真理的追求，对国家充满信心。”

到2008年，季羨林一年获得国外三个重要荣誉，是对他道德文章的充分肯定。1月27日，据《印度时报》网站报道，印度总统帕蒂尔日前批准了2008年度印度国家最高荣誉奖“莲花奖”

（Padmaaward）授奖名单，包括印度本国在内全世界共有135人获得这一大奖，在这135人中最引人注目的获奖者当属97岁的我国著名学者季羨林，这也是中国人首次获得这一荣誉。印度媒体用“‘莲花奖’首次跨越喜马拉雅山”来形容这次特殊又迟到的授奖。

5月12日，日本学士院正式聘任季羨林先生为客座院士。至此，季羨林先生成为百年来第一位获得日本学士院客座院士身份的中国籍会员，也是国际印度学领域获此殊荣的第三人。在他之前，唯有两名法国印度学领域的学者Sylvain Lévi（1863—1935）以及

Louis Renou（1896—1966）曾获得此项殊荣。

9月27日，德国哥廷根大学颁发证书，授予季羨林教授、博士为哥廷根大学杰出校友，证书说：

值此2008年第一届国际校友返校之际，哥廷根大学授予季羨林教授、博士2008年哥廷根校友荣誉称号。

季羨林生于中国，1935—1945年间在哥廷根大学学习和研究，1941年获梵文博士学位，上世纪80年代，他撰写《留德十年》，为哥廷根大学在中国塑造了形象，由他描述的德国学术生活对中国的影响更是一直延续至今。

哥廷根大学校长 库尔特·冯·费古拉教授、博士

哥廷根2008年9月27日

2. 学者散文的风格

季羨林一生和散文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最初他并非一开始便创作散文，他最早是创作短篇小说，《文明人的公理》、《医学士》、

《观剧》等短篇小说是他十七岁在家辍学时创作的，用希逋的笔名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进入高中三年级，他写论文《现代文艺的使命》，但文章未及发表。在清华大学上学期间，他首先翻译了屠格涅夫的《老妇》、《世界的末日》、《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

呵……》等散文名篇，先后在山东《国民新闻》的《趵突周刊》和天津《益世报》上发表。从这时起，他便喜欢上了散文这一形式。后

来，他又于1931年翻译了英国散文作家史密斯（L. Pearsall Smith）的《蔷薇》，发表在1931年4月24日的《华北日报》副刊上，其中末节有“整个小城都在天空里熠熠着，闪动着，像一个巢似的星圈”，这几句颇有印象派绘画式的风格对他产生了影响，并有意师法这篇散文，于1933年创作了他的散文处女作《枸杞树》，发表在同年12月27、30日的天津《大公报》上。这篇文章写他高中毕业

进北京参加高考的经历，文章很耐读，报纸分两天把它发表完，这给季羨林以极大的鼓励，从此写作散文便一发不可收拾，一直坚持到现在，有六十多年散文创作的经验了。据不完全统计，至今已结集出版的就有《天竺心影》、《朗润集》、《季羨林选集》（香港）、《季羨林散文集》（中文版，日文版名为《中国知识人の精神史》）、《季羨林小品》、《万泉集》、《中国二十世纪散文精品·季羨林卷》、《季羨林散文选集》、《赋得永久的悔》、《怀旧集》、《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人生絮语》（其中散文占一半），《留德十年》、《季羨林自传》、《牛棚杂忆》、《病榻杂记》也可归入散文一类，另外还有几部在编排中。

日本汉学家依田熹家在《季羨林散文集》日译本的《译者后记》中，曾这样评价季羨林散文创作的价值：

读了这一系列文章以后，笔者感到它恰好传达了从五四运动直到现代，在动荡时代里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变迁。尤其是季羨林先生这样将中国自古而来的读书人的传统和西欧最高学术水平集于一身的大学问家，是代表了这一方面的典型。日本关于这一方面的介绍虽不能说没有，但绝对不多，而且像这样几乎跨越了那整个时代的例子本身就是极为珍贵的。[103]

季羨林的散文创作，是当代文坛的上乘之作，可以作为学者散文的代表作。他被诗人牛汉谥称为“老生代”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家。

[104]

季羨林的散文被当做整个中国近一个世纪知识分子心理变迁的缩影，不是没有道理的。他的散文清楚地反映出这一特点，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心理变迁过程中，蕴含着的一种流动着的一贯的人格精神。有人将他的散文创作分成三个阶段，前期（三、四十年代）的作品，抑郁隐晦，中期（五、六十年代）明快昂扬，后期（七十年代后期至今）朴实无华。[105]这种分析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他的散文仍有一种贯彻始终的统一的风格。

季羨林对中国文学史上的不同写作风格广有涉猎，都有所汲取。

《史记》的雄浑，六朝的浓艳；陶渊明、王维的朴素，徐摛、庾（肩吾）的华丽，杜甫的沉郁顿挫，李白的流畅灵动；《红楼梦》的细腻，《儒林外史》的简明，他注意到无不各擅胜场。[106]他写文章，哪怕是在同一篇文章中，也不使用一种风格，而是尽可能地把几种风格融合在一起，结果给人的印象就特别深刻。这样写出来的散文，或如行云，舒卷自如；或如流水，潺湲通畅；或加淡妆，朴素无华；或加浓抹，五色相宜。长达数千字的，不厌其长；短至几百字，甚至几十个字的，不觉其短；全都灵活方便，得心应手，表达思想、抒发感情、描绘风景，都淋漓尽致、自然天成。在他笔下，一山一石，一草一木，一人一事，一封一邑，都能焕发光彩，增添情趣。谈身边琐事而有所寄托，论人情世局而颇具文彩，因小见大，余味无穷，兼师东西，独辟蹊径。

近代浙江金华人唐彪在《读书作文谱》中评价《左传》的佳处，在于老健者，笔能截铁，句可掷金；风华者，华锦天章，灿然炫目；变化者，叙事或预点于前，或齐列于中，或悬缀于末，不为一律，无非神妙；波澜者，或引诗词，或说梦兆，或详卜筮，其最得意者，在追述旧事中故作奇峰插天，即平叙者，亦必一唱三叹，淋漓尽致；……又评论《战国策》之文，起不用冒，收不作结，单刀直入，脱尽装点，且其气雄力劲，笔秀神清，词腴而不肤，色妍而骨俊。评论《史记》说，笔端变化，或起或伏，或即或离，纵横出没，不可捉摸，有识者读之，知一索可贯千钱，得贯之具，虽数万散钱，无难瞬息约束之矣，所以纵令篇幅广长，端绪纷错，而章法脉理无不显然可见。[107]

读季羨林的散文，大体也可以得到这样的感觉。宗璞说他的散文，对于整个大自然都是心有灵犀，相知相通的，这些对自然的领悟，形成他散文的特色。[108]张颐雯评价说，他的散文淡淡然全无雕琢，浑然一体，在沧桑的底子上，有种明澈与乐观的精神存在。这

是“渐近自然”的至高境界，这种人生的达观态度和哲思的智慧，绝非单纯文字技巧可以达到。[109]李侃评论说：这些散文，真挚、平易、亲切，在朴实中蕴涵着佳美，在静穆中饱含着热情。[110]

季羨林的散文能达到这样高的成就，可以从唐彪的这段话得到解释：

文章读之极熟，则与我为化，不知是人之文、我之文也。作文时，吾意所欲言，无不随吾所欲，应笔而出，如泉之涌，滔滔不竭；文成之后，自以为辞意皆已出也，他人视之，则以为句句皆从他文脱胎也。非熟之至，能如此乎？是境也，惟亲至者乃知之，能言之也。[111]

季羨林的散文就带有这种性质。有人请教季羨林，写散文要注意些什么？他回答说：照我的体会，写散文要注意艺术上的提高。比如开头、结尾都不容易，作者要背点古文，还应做点传统的语言训练，比如做对子。[112]所以他的散文朴实、淳厚，技巧用得使人感觉不出来，有穿透一切的洞察力，充满着睿智，饱含着独特的人生经验。[113]他的散文，看来质朴无华，没有什么雕刻和修饰，实际上光彩照人、韵味无穷，这正是他运用语言高超之处。[114]

当然，季羨林的散文之所以感人，还在于它是作者真情实感的体现。他自己说：

我的文笔可能是拙劣的，我的技巧可能是低下的。但是，我扪心自问，我的感情是真实的，我的态度是严肃的，这一点决不含糊。我写东西有一条金科玉律：凡是没有真正使我感动的事物，我决不下笔去写。[115]

结果，他真有所感，就开始动笔写文章，所以他始终强调一个“真”字。在“真”的原则指导下，他又采用像谱乐曲那样的写法，主要旋律可以多次出现，把散文写得像小夜曲，借以烘托气氛，加深印象，使内容与形式彼此促进，就使这些散文是为情而造文的佳作，而非为文而造情的滥制品，[116]能启人心锁，打开心结。使人读起

来，能深深体会到，亲切似长者，真诚似友人，宛如故人正促膝交谈，于不知不觉中，被那充盈的激情擒住双臂，在无垠的雪地里随心所欲地跳起了华尔兹。[117]

总之，季羡林的散文，饱含诗情画意，其中感人肺腑的激情和扣人心弦的文笔，都是高质量的，高水准的，之所以能达到高质量和高水准，是由于他的写作态度十分严肃认真，没有巨大的变化、没有新鲜的印象、没有激动，也就是没有灵感，他是从不提笔写散文的。

[118]用季羡林自己的话来说，在生活平静的情况下，常常是一年半载写不出一篇东西来。没有刺激，没有激动，没有巨大的变化，没有新鲜的印象，也就是没有灵感，就没有写什么东西的迫切的愿望。

“在这样的时候，我什么东西也写不出，什么东西也不想写。否则，如果勉强动笔，则写出的东西必然是味同嚼蜡，满篇八股，流传出去，一害自己，二害别人。” [119]

季羡林的散文，之所以充诸报端和文艺刊物，其散文集一本又一本，一编再编，一版再版，其原因正在这里。

可以借用彭定安的一段话，对季羡林的散文作一个总的评价。他认为现在有一种“学者散文”的说法，季先生的散文足以当之，这是因为：

先生的散文，从年轻时写的早期之作，到现今已属耄耋之年所写文字，都贯穿着一种文如其人的平实素朴的风格韵味，有真挚之情，而且丰厚深沉、委婉细腻，然而却又深蕴浅露，平实朴素地表达出来，有对中外风情、人事世势、师生友朋、学术艺文等等的观察、记述、感应和评议，但也都是平实素朴而底蕴深沉，其情之发也，风物人情自然之感触反应，真理之阐释也，是高屋建瓴、识见独具，然亦以明白晓畅之形式出之，有真情实感在，有事理在，然而无丝毫做作、无些微卖弄，是真的情感、真的学问，像自然、像事物、像真理本身那样素朴……我们正可以提出“清新俊逸”四字来标示季先生散文的风格，而文能至此，却非仅仅文字之功所可得，而是思想、情感

既真且深，即有“内秀”才可。先生之文，无论是情感、思理、感怀、言志、述事、评人，还是状物、写景、玄想，都是本色天然，又经过惨淡经营，但又不露痕迹。

……先生散文的叙述话语和范型，都是口语化的、中国传统精神的，像日常言谈那样平易，然而思想情感与评议又是融汇中西思想文化的，语言是经过加工锤炼的，而且，时来抒情之笔，逸兴飞思，走笔龙蛇。所以，总体上畅顺而有韵致、淡而有内秀，整个叙述，跌宕起伏、逶迤婉转，像中国的淡墨画，像中国的古琴笙箫奏出的高山流水、春江花月夜。还有一点，先生的散文，总是透着一种深沉不露的幽默感，这是文章的吸引力源泉之一，这是他对人间体事、人情世态以至学术艺文参透彻悟后产生的一种思想情意的曲折而自然的表露。

[120]

正因如此，季先生的散文，在叙事记人，是写他者，但在这过程中，同时也说出了自己，篇篇都潜隐着他自已：他的身影，他的思想情感、价值标准、行为准则、道德信条、人生态度、审美理想等等。这正是他的散文的可读之处和学问所在。[121]

3. 直面对“我”

人生确实是个大舞台，有各种各样的人在这个大舞台上进行着各种各样的表演。

拿学者层面来说，就有多种多样。用最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分为“真”、“伪”两类。商品有真有假，学界也差不多，确有真学者，他们往往是默默耕耘，晦迹韬光，与世无忤，不事张扬。但他们不像禅宗“不立文字”，也写文章。与真学者相对的就是伪学者，这种人会抢镜头，爱讲排场，不管耕耘，专事张扬。他们当然会写文章，但他们的文章晦涩难懂，不知所云；有的则塞满了后现代主义的词语，同样是不不知所云。他们实际上都是以艰深文浅陋，以“摩登”文浅

陋。对这样的伪学者，季羨林当然不曾赞一词，他们的文章，他不敢读，不愿读，读也读不懂。[122]

拿老年人来说，有些人愁这愁那：一方面为子孙积财，甚至不择手段；一方面又为自己的身后着想，修造坟场，筹建祠堂；这是有钱人的事。没钱的老年人心事也不少，想为子孙积攒钱财，又力不从心，捉襟见肘。财积不成，又良心难安，等到大限来到之时，还是两手空空，抱着无限负疚的心情，去见阎罗大王。[123]

季羨林既是知识分子，又是老年人，所以他时时剖析自己，直面对“我”。

季羨林首先剖析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在他看来，中国知识分子是一种很奇怪的群体，是造化小儿加心加意创造出来的一种“稀有动物”。中国知识分子最关心时事，最关心政治，最爱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痛快淋漓地表达了知识分子的心声。但他们又是极难对付的家伙，感觉特别细腻、锐敏、脆弱、隐晦，他们学富五车、胸罗万象，有时自高自大，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有时却又患了弗洛伊德讲的那种“自卑情结”。他们一方面吹嘘，想“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气魄贯长虹，浩气盈宇宙。有时候，却又为芝麻绿豆大的一点小事而长吁短叹，甚至轻生，“自绝于人民”，这就是中国特有的“国粹”——面子问题，知识分子是“面子”的主要卫道士。与面子有关的是处世，即隐居或出仕，有人标榜自己无意为官，实则相反。“大名垂宇宙”的诸葛亮高卧隆中，表面是隐居，实则最关心国家大事，“信息源”非常多，《隆中对》表明他经世之心，昭然在人耳目，却又偏让刘备三顾茅庐然后才出山“鞠躬尽瘁”，就是因为一个面子。知识分子贫穷落魄的多，本来贫无立锥之地，却偏喜欢拼命，拼这一身老骨头，称这为“骨气”。中国知识分子，脾气往往极大，仗着“骨气”这个法宝，敢于直言不讳，一见不顺眼的事，就发为文章，呼天叫地，痛哭流涕，大呼“人心不古，世道日非”，“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他们根本不给当政的最高统治者一点面

子，有时候甚至让他们下不了台。鉴于此，季羨林产生了一个大胆的“理论”：一部中国古代政治史至少其中一部分就是最高统治者皇帝和大小知识分子互相利用又互相斗争，互相对付和应付，又有大棒，又有胡萝卜，间或甚至有剥皮凌迟的历史。[124] 但中国知识分子始终有一个爱国主义的传统，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也不能望其项背的。

剖析完中国知识分子，季羨林又剖析自己。在他看来，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我”，二者亲密无间。人对自己的“我”本应十分了解，然而却不尽然。大部分人并不了解自己，所以古希腊哲人发出狮子吼：“要认识你自己！”季羨林自己觉得是认识自己的，但剖析自己有点过头，有时候真感到自己一无是处：专就学术文章而言，不认为“文章是自己的好”，真正满意的学术论文不多，反而是觉得别人的文章好。在文学作品方面，自己满意的也屈指可数，连散文真正觉得好的也十分有限。在品行方面，他有自己的看法，对什么叫好，什么叫坏，他的标准是：

我认为，只替自己着想，只考虑个人利益，就是坏。反之能替别人着想，考虑别人的利益，就是好。为自己着想和为别人着想，后者能超过一半，他就是好人。低于一半，则是不好的人；低得过多，则是坏人。[125]

他坦诚地解剖自己说：

拿这个尺度来衡量一下自己，我只能承认自己是一个好人。我尽管有不少的私心杂念，但是总起来看，我考虑别人的利益还是多于一半的。至于说真话与说谎，这当然也是衡量品行的一个标准。我说过不少谎话，因为非此则不能生存。但是我还是敢于讲真话的。我的真话总是大大地超过谎话。因此我是一个好人。[126]

季羨林之所以是一个“好人”，原因是他不断地进行思想改造。他认为，作为知识分子，不管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还是新社会培养出来的，思想都必须改造。思想改造是非常有意义的。今天，人们很少再谈思想改造了，好像一谈就是“极左”，而他则认为，思想改造还

是必要的。客观世界飞速前进，新事物层出不穷，思想如果不改造，怎么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呢？[127]

思想改造必须结合道德修养一块进行。季羨林认为，道德应该从责任感、是非感两方面来谈。是非、责任，不是小是小非，而是大是大非。大是大非就是关系到祖国，关系到人民，关系到世界，也就是要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主义。这是大是大非，责任也在这个地方。[128]为此，季羨林一再提倡弘扬爱国主义的问题。

而爱国主义应该分为两种：一种是真正的，一种是假冒伪劣的。真正的爱国主义是正义的爱国主义，应该是不允许别的民族侵略自己，也不侵略别的民族，因此真正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是相联系的。假的爱国主义就是侵略别人、压迫别人，然后反而高呼爱国，日本军国主义、希特勒的“爱国主义”就是。而正义的爱国主义又分为两个层次：一种是爱我们的国家，中国受别人的侵略，起来反抗，这是一般的爱国主义，是应该歌颂的、赞扬的，但层次不高；层次更高的是与文化联系起来，爱我们祖国的文化。[129]

季羨林本人这两种爱国主义是都具备的，且深入到具体细微之处，如在一次罕见的大旱之中，忽然下起了一场春雨。这是 1995 年 4 月 13 日，季羨林一大早就坐到隔成一个小房间的阳台上，准备同一种“死文字”拼命了，这本来需要极静极静的环境，才能安下心来，进入角色，来解读这天书般的“吐火罗语”或“梵文、巴利文”。而阳台顶上有块大铁皮，雨敲铁皮的声音是极为讨厌的，是必欲去之而后快的。

然而，事实却正相反。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到头顶上的雨滴声，此时有声胜无声，我心里感到无量的喜悦，仿佛饮了仙露，吸了醍醐，大有飘飘欲仙之概了。这声音时慢时急，时高时低，时响时沉，时断时续，有时如金声玉振，有时如黄钟大吕，有时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有时如红珊白瑚沉海里，有时如弹素琴，有时如舞霹雳，有时如百鸟争鸣，有时如兔落鹑起，我浮想联翩，不能自己，心花怒

放，风生笔底。死文字仿佛活了起来，我也仿佛又溢满了青春活力。我平生很少有这样的精神境界，更难为外人道也。

原因何在呢？

可我为什么今天听雨竟也兴高采烈呢？这里面并没有多少雅味，我在这里完全是一个“俗人”。我想到的主要是麦子，是那辽阔原野上的青春的麦苗。我生在乡下，虽然六岁就离开，谈不上干什么农活，但是我拾过麦子，捡过豆子，割过青草，劈过高粱叶。我血管里流的是农民的血，一直到今天垂暮之年，毕生对农民和农村怀着深厚的感情。农民最高希望是多打粮食。天一旱，就威胁着庄稼的成长。即使我长期住在城里，下雨一少，我就望云霓，自谓焦急之情，决不下于农民。北方春天，十年九旱。今年似乎又旱得邪行。我天天听天气预报，时时观察天上的云气。忧心如焚，徒唤奈何。在梦中也看到的是细雨蒙蒙。[130]

这显然是爱国主义情怀所致。因为在季羨林看来，乡土之情是非常重要的。山东有山东的乡土，具体到一县有一县的“乡土”，这同爱国主义有紧密联系，你要知道本县、本省、本国可爱在什么地方，我们讲爱国主义，就应该从“乡土”讲起，了解我们中华民族确实伟大，确实值得爱，到这时候，爱国主义才是真的。[131]所以，当他坐在这长宽不过几尺的阳台上，听着头顶上的雨声，不禁神驰千里，心旷神怡。在大大小小、高高低低，有的方正、有的歪斜的麦田里，每一个叶片都仿佛张开了小嘴，尽情地吮吸着甜甜的雨滴，有如天降甘露，本来有点黄萎的，现在变青了，本来是青的，现在更青了。宇宙间凭空添了一片温馨，一片祥和。[132]在这样的心境之中，他钻研着古老的文字，决心为国争气争光，两种爱国主义达到了高度的一致。

日本梵文研究的泰斗、思想家中村元博士在为《季羨林散文集》的日译本《中国知识人の精神史》写的序言中说，中国的南亚研究原来是相当落后的，可是最近几年来，突然出现了一批中年专家！写出

了一些水平较高的作品，让日本学者有“攻其不备”之感。中国学者坐在冷板凳上辛苦耕耘，取得了梵文和南亚研究的成绩，日本人觉得过去对中国的南亚研究评价已经过时了。怎么能说这一套无补于国计民生呢？这正是深层次地弘扬爱国主义。[133]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当邓文宽和荣新江共同校勘的《敦煌本禅籍校录》出版之际，季羨林予以极高评价，认为此书是在国内外众多学者在长达几十年内对敦煌禅籍的校录的基础上的集大成之作，严肃认真，方法精密，既继承了中国朴学考证校勘的传统，又参照了西方的校勘方法，融汇中西，贯通古今，阐幽发微，细入毫发，为敦煌学研究做出一大贡献。

“我由于有此书而感到愉快，感到骄傲。如果要讲爱国主义的话，写出这样的书，能在国际学林中占一席之地，这就是最具体的爱国主义行动，比一千句一万句空话都更有用。” [134]

当然，季羨林也不限于在大是大非方面进行道德锤炼，直面对“我”。他不仅要求做到“大德敦化”，也要求做到“小德川流”。[135]

他个人观察到，老年人喜欢讲话，喜欢长篇发言。开一个会两个小时，他先包办一半，甚至四分之三，别人不耐烦看表，他老眼昏花，不视不见，结果如何？一想便知。他听说某大学有一位老教授，开会时他一发言，有经验的人士就回家吃饭。酒足饭饱，回来一看，老人家的发言还没有结束，还在那里“悬河泻水”哩。因此，他对老年人主要是对自己，提出了几句箴言：老年之人，血气既衰，煞车失灵，戒之在说。[136]人生经验丰富，见多识广本是老年人的优点，但是以此为包袱，便会自以为是，执拗固执。动不动就是：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面还多，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长。个别人仕途失意，牢骚满腹，“世人皆醉而我独醒，世人皆浊而我独清”，结果唠唠叨叨，惹得大家都不痛快。[137]平常和人谈话，他一般总是保持一米的距离。道德修养之细致入微，非一般人所能比拟。

第十二章 业余生活

一、交友之道

1. 与老友臧克家的交情

季羨林自己不止一次地提到，他生平有一个弱点，那就是最不喜欢拜访人。即使是他最尊敬的老师和老友，他也难得一访。他把这种弱点看做是一种“怪癖”，想改之者久矣，但是山易改，性难移，至今并没有什么改进。〔1〕然而，季羨林并非不重视交友，他对陈寅恪先生概括出的中国文化要义是三纲六纪的说法有一种认同感，六纪之中有一纪就是朋友。

在他的朋友中，清华时的同学好友，是不断联系来往的。非同学的朋友中，曹靖华、姜椿芳、吴作人、冯至、许国璋，都是来往接触较多的。但是，就是这些朋友，他也很少去拜访，除非万不得已，或工作需要，他是不大拜访人的。像曹靖华这样在解放后就相知的老朋友，同他交往，季羨林觉得如坐春风化雨中，曹老淳朴无华，待人接物，诚挚有加，彬彬有礼，给人以忠厚长者的印象，所以同曹靖华会面，便成为季羨林的一大乐事。但即使像这样的朋友，季羨林却一次也没去过他的家。

在季羨林的朋友中，臧克家是惟一的例外。臧克家是他最老的老朋友之一，他们之间的友谊已经有六七十年了。在大是大非方面，他们两人是一致的，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国内局势变化万千，他们两人始终没有落伍，始终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他们相互之间的朋友关系忠诚可靠，建立在非常牢固的基础之上，这在交友之道方面是非常难得的。

季羨林每年春节期间，或者在初一或者在初二必到臧克家家中拜

访，和他们全家一道，杯酒畅叙，欢度节日。季羨林每次去，总是带些高级点心，或是故乡风味的特产。有时候，季羨林还约他们的共同老乡历史系宋史专家邓广铭教授一块去，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 20 世纪末几年。他们都已是耄耋之人，觉得每年相聚一次，是很不够的，决心再加一次，便定在“十一”国庆期间。但因为时间太紧，两家相距又有几十里之遥，所以这个愿望一直也未能实现。

论说，他们并不是搞一个行当，一个是学者，一个是诗人。但因为季羨林兴趣十分广泛，自然也就喜欢读诗，大学期间，就读了臧克家的《烙印》、《罪恶的黑手》，感到臧克家的诗是受了闻一多先生的影响。季羨林认为，作诗、写诗，既然叫诗，就应该有诗的形式。臧克家一直重视诗，他觉得这里边有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语言有一个特点，讲炼字、炼句，像“云破月来花弄影”的那个“弄”字，“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那个“闹”字，“春风又绿江南岸”的那个“绿”字，都是典型。写诗、写文章，就必须知道我们语言的特点。季羨林觉得，臧克家一生在这方面倾注了很多心血，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臧克家对诗的艺术性非常重视，这一点也深受季羨林赞许。季羨林借评论臧克家诗作艺术性的机会，进一步强调文学作品的艺术性。他觉得，过去多少年来研究中国文学史，特别是古典文学，对政治性重视，对艺术性则重视得不够。而讲政治性，也并不是讲得很深刻。一看见“人民”这样的词、类似“人民”这样的词，就如获至宝，对艺术性则三言两语带过，他觉得这是很不妥当的。一篇作品，不管是诗歌还是小说，艺术性跟思想性总是辩证统一的，强调一方面，丢掉另外一方面是不全面的。[2]

一个是诗界泰斗，一个是学界泰斗，两位泰斗的友谊已经保持了六七十年，而且一直要长存下去。

2. 同学加朋友胡乔木

季羨林与胡乔木是清华的同学，对于一般人来说，有胡乔木这样掌大权的同学，是很自豪的，而且会主动与他联系，这好像是人之常情，于今为烈。

然而季羨林对胡乔木往往怀着敬而远之的心情。

有一次，胡乔木想约他一起去敦煌参观。季羨林委婉地回绝了。他并不是不愿意陪老同学去参观，他是很高兴去敦煌的。但是，他一想到下面对中央大员那种逢迎招待、曲尽恭谨之能事的情景，一想到那种高楼大厦、扈从如云的盛况，他那种上不得台盘的老毛病又发作了，于是他感到厌恶，感到腻味，感到不能忍受，眼不见为净，所以觉得还是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为好。

季羨林绝不拜访胡乔木，而是胡乔木要拜访季羨林。有一次，胡乔木去北大参观展览会，活动完后，季羨林陪他去燕南园，看清华老同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林庚先生。在林庚家，胡乔木又给吴组缃打电话，想见见他，但电话总是没有人接。胡乔木这次没见到吴组缃，以后再也没有见到，吴组缃已先他而去了。胡乔木的怀旧之情愈加浓烈，几次对季羨林说：老朋友见一面少一面了。

胡乔木最后一次到季羨林家，是和老伴谷羽一起去的。季羨林的儿子季承那一天也回家了，陪着谷羽、秘书和司机在楼外闲聊。屋子里，只剩下他们两个老同学。季羨林不禁回忆起几年前胡乔木接他到中南海时的情景，同是会面，环境迥异。在胡乔木家里，会见是在极为高大宽敞、富丽堂皇的大厅里。而现在却是在低矮窄小、又脏又乱的书堆中。胡乔木用缓慢而低沉的声调说话，签名送给季羨林诗集和文集，并赞扬他在学术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用了几个比较夸张的词儿，他顿时感到惶恐，赧赧不安。季羨林对胡乔木说：你取得的成绩比我大得多而又多呀！对此，胡乔木没多说什么话，只是轻微地叹了口气，慢声细语地说：那是另外一码事儿。

他们谈了许久许久，但话好像还是没有说完。胡乔木终于起身告辞，季羨林目送他的车转过小湖，才慢慢回家，他没有想到，这是胡

乔木最后一次到他家来。

1991年，季羨林听说胡乔木患了不治之症，他大吃一惊，仿佛当头挨了一棍：“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他心里想，难道天道真就是这个样子吗？他没有别的办法，只是寄希望于万一。这时，季羨林真想破一次例，主动到胡乔木家去看他。但是，儿子季承转达胡乔木的意见，无论如何也不让看他。季羨林只好服从他的安排，但心里总是惦念着他。六十多年的老朋友，世上没有几个了，一想到这里，他的心里便难免一阵激动。

1992年8—9月间，胡乔木让老伴谷羽告诉季承，希望季羨林到医院里去看他。

季羨林十分了解他的心情，这是要做最后诀别了。季羨林怀着沉重的心情，同儿子季承到了胡乔木住的医院。医院的病房，同胡乔木在中南海的住房一样宽敞高大，但季羨林的心情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同进中南海那一次相比，他是来与老友诀别的。

重病的胡乔木，这时仰面躺在病床上，嘴里吸着氧气。床旁放着一些点滴用的器具。看到老朋友来了，胡乔木显得有点激动，抓住季羨林的手，久久不松开。胡乔木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握老朋友的手，但神态依然安详，神志依然清明，一点也没有痛苦的表情。胡乔木仍像平常一样慢声慢语地说话，提到季羨林在《人物》杂志上发表的《留德十年》里的一些文章，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季羨林此时此刻百感交集，答应他全书出版后，一定送他一本。季羨林心里明明知道，这只不过是空洞的谎言，对于从来不会说谎的他来说，说出这样的话，心里自然非常难受，这种空洞萦绕在耳旁，使他自己都毛骨悚然。

不久，胡乔木离开了人世。《留德十年》出版之后，季羨林觉得按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做法，该到胡乔木的坟上去焚烧一本，送给他的在天之灵。但是，遵照胡乔木的遗嘱，骨灰都撒到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了，骨灰盒没有留下，真正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这对于季

羨林来说，是极难排遣的。面对着《留德十年》，他泪眼模糊，魂断神销。他想到与胡乔木相交的六十年，在胡乔木生前，他有意回避，绝少主动与他接近，这是天性使然，无法改变的。胡乔木逝世之后，不知道是为什么，他倒常常想到他。他像老牛反刍一样回味着相交六十年的过程，顿生知己之感。这种知己之感却更加浓了他的怀念和悲哀，很自然地对胡乔木有了一个整体的连贯印象：

平心而论，乔木虽然表面上很严肃，不苟言笑，他实则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正派的人，一个感情异常丰富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六十年的宦海风波，他不能无所感受，但是他对我半点也没有流露过。他大概知道，我根本不是此道中人，说了也是白说。在他生前，大陆和香港都有一些人把他封为“左王”，另外一位同志同他并列，称为“左后”。我觉得，乔木是冤枉的。他哪里是那种有意害人的人呢？[3]

胡乔木的死，无疑在季羨林心灵中增加了一份极为沉重的负担，他有没有办法摆脱这一负担呢？他自己说不出，他怅望着苍天，想得很远很远。

3. 同在燕园的昔日清华“三剑客”

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季羨林、吴组缃、林庚、李长之都有共同的爱好，喜欢文学，虽然并不在一个系，却是好朋友，成了有名的“四剑客”。李长之不在北大工作，而且已于1978年走了。而剩下的“三剑客”在院系调整之后又聚在一起，都在北大工作了。这时，“三剑客”都已成为中年人，家事、校事、国家事，事事萦心，当年的锐气已经磨掉不少，非复昔日之狂纵。他们三人平常难得见一次面，见面往往是在校内外召开的花样繁多的各种会议上。他们一见面，大家哈哈大笑，个中滋味，外人是不足以知道的。“文革”期间，季羨林与吴组缃在“牛棚”中还是“棚友”，就更是别有一番滋

味在心头了。但是不论何时，“三剑客”都没有颓唐，仍然在各自的领域里辛勤耕耘，晚年也不甘人后，“日暮行雨，春深著花”，仍忙个不停，都有所建树，都是北大乃至全国的知名教授。“三剑客”中吴组缃最大，生于1908年，林庚第二，生于1910年，季羡林是最小的。吴组缃和林庚在文学界都是大名盈宇宙的，有传世之作。

“三剑客”平常很难凑在一起，胡乔木去北大同去拜访林庚的那次，本来有机会相聚一次，但是电话打到吴组缃家，好久也没有人接，吴组缃已经高卧不起了。“三剑客”失去了一次大团圆的机会，以后再也没有团圆过。

1991年，东方学系庆祝季羡林八十大寿，季羡林提出一个要求，凡是比自己大的学者，一律不要惊动，不要邀请。

到了8月6日这天，北大电教中心大楼四百多座位的报告厅里，座无虚席。那一天正是北京三伏天中最热的一天，季羡林怎么也没有想到，86岁高龄的冯至先生大老远从城里赶来了，颤巍巍地上台发言，季羡林抢先下台搀扶，诗人冯至将歌德的诗句改换人称，大声朗诵：

你的产业是这样美，这样广，这样宽

——时间是你的财富，

你的田地是时间！

全场对诗人的激情报以热烈的掌声。[4]

季羡林自然也没想到，83岁的老友吴组缃，顶着烈日，坐着轮椅也来了。老友相见，分外激动，在场的朋友们也无不为之感动。[5]

那一次会上，还来了许多年长于我或少幼于我的老朋友，比如吴组缃（他是坐着轮椅来的）、许国璋等等，情谊深重，连同所有的到会的友人，包括我家乡聊城和临清的旧雨新交，我都终生难忘。我是一个拙于表达但在内心深处极重感情的人。我所有的朋友对我这样情深意厚的表示，在我这貌似花样繁多而实单调、貌似顺畅而实坎坷的生命上，涂上了一层富有生机、富于情谊的色彩，我哪里能够忘记

呢？[6]

正像人们常说的，季羨林是铁皮暖瓶，外面冰冷而内心极热，他心中始终没有忘记老友们。他想着胡乔木的那一句话：老朋友见一面少一面了。所以 1993 年他出面邀请了六七位有五六十年友谊的老朋友聚了一次，吴组缃、林庚、邓恭三（广铭）、周一良都在其中。老友们的兴致都很高，难得浮生一夕乐。大家都白发苍苍了，但都兴会淋漓。在觥筹交错中，他不禁想起了两个人，一个是李长之，一个是胡乔木，清华的“剑客”于今已飘零成广陵散了。

1994 年，季羨林想再组织一次聚会。但吴组缃已经病重住进了医院，再也不能出院。本来几年里他已经几次进出医院了，却都是逢凶化吉，走出了医院。每到这时，季羨林看到后湖池塘边上一个戴儿童遮阳帽的老人，坐在木头椅子上，欣赏湖光塔影，心里就为朗润园里的这一景而高兴。这一次，他也希望老友能再次出院，结果希望落空，吴组缃永远地走了。面对着偌大一个燕园，风光旖旎如旧，杨柳依依如旧，湖水潋滟如旧，贤俊灿如列星如旧，但少了一个吴组缃，一个平凡又不平凡的老人，他的心里便感到不可名状的空虚寂寞，如果名园有灵，也会感到空虚寂寞的。[7]

1994 年元旦的时候，季羨林还潜心默祷，祝吴组缃早日康复，参加再一次的聚会。怎么也没想到，一个月不到，吴组缃已经永远地走了。听到这个消息，季羨林虽然对这个花花世界确已看透，名缰利索的控制也已经微乎其微，想努力做到宋人蒋捷在《虞美人》的词里所说的“悲欢离合总无情”，但是他遇到伤心之事，怎么也不能“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不能“总无情”，而是深深动情。他感叹道，生而为人，孰能无情？一个“情”字，不就是人之所异于禽兽者的那一点“几稀”吗？[8]

季羨林的最后一位“剑客”朋友林庚，也已经去世。他在世时手已有些发颤，但在几年内依赖助手，仍将《中国文学简史》修改再版，了却了他自己的一个大心愿。

4. 旧雨新知

季羨林一生阅历极为丰富，到过四十多个国家，在国内，足迹也遍及大江南北，像这样的阅历，本应广交天下朋友，但情况并非如此。他确实交了一些朋友，一些素心人，但数目不是太多。他自己检查，是天生一个内向的人，因此自谓是性情中人。季羨林道出其中的玄机，说：

我因此悟到：交友之道，盖亦难矣。其中有机遇，有偶合，有一见如故，有相对茫然。友谊的深厚并不与会面的时间长短成正比。往往有人相交数十年，甚至天天对坐办公，但是感情总是如油投水，决不会融洽。天天“今天天气，哈，哈，哈！”天天像英国人所说的那样像一对豪猪，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天天在演“三岔口”，到了成不了真正的朋友。[9]

所以，季羨林交朋友，绝不追求表面的左一握手，右一点头，如鱼得水，畅游无碍，他奉行的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原则。他与姜椿芳、许国璋的交往，就属于这种情况。

季羨林和姜椿芳相熟是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成立之后，并渐渐了解到姜椿芳不但为大百科呕心沥血，而且对其他文化事业也很关心。姜椿芳自己是知识分子，了解知识分子，爱护、团结知识分子，关心知识分子的遭遇和心情。他曾多次对季羨林谈到在中国出版学术著作困难的情况，以及出书难但买书也不易的情况。他也热心提倡中国的优秀剧种昆曲，多次给季羨林寄票，让他去欣赏昆曲演唱会。

姜椿芳对中国传统绘画和书法也极感兴趣，一切都表明，他是一个有很高文化修养的人。因此，季羨林与他合作编纂大百科全书，一直很愉快。季羨林直觉地感到，他还有不少出版计划要拉自己共同去实现。季羨林默默地期待着，期待着，但是没料到，他竟遽尔归了道山。他真正实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季羨林祝他永远安息。[10]

与许国璋的来往，也是从一起编大百科全书以后才开始多起来。

从那次乘公共汽车去北京外国语大学找许国璋以后，他们经常来往。

许国璋在自己的小花园里种了荷兰豆，几次采摘一些最肥嫩的，亲自送到季羨林家里。这些当时尚珍奇的荷兰豆，嚼在自己嘴里，到底是什么滋味，季羨林觉得用平常的词汇来形容，什么“鲜美”，什么“脆嫩”，都是很不够的。只有用神话传说中的“醍醐”，只有用梵文中的“不死之药”一类的词儿，才能表达其中蕴涵着的醇厚友情于万一。

许国璋带的硕士生、博士生毕业答辩，有几次是约季羨林充当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席。主持完了答辩，许国璋请他在自己住宅附近的一个餐厅里吃饭，有一次吃的是涮锅子。许国璋也到季羨林家里去过几次，他们推心置腹，无话不谈，谈论彼此学校的情况，谈论当前中国文坛，特别是外国语言文学界的新情况和新动向，谈论当前的社会风气。他们对有些青年学子出国留学不归尤其担忧，许国璋特别讲到，一个黄脸皮的中国人，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除外，在种族歧视风气浓烈的美国，除了在唐人街混，或者同中国人来往以外，美国社会是很难打进去的。有的中国人，毕生不说英文，也能在美国过日子，那样的中国人把一块中国原封不动地搬过了汪洋浩瀚的太平洋，带着鸡犬，过着一种同在中国完全一样的日子，笑骂由他笑骂，好饭仍自吃之，究竟有何意义呢？说到这里，季羨林与许国璋都禁不住唏嘘不已，心情非常沉重，欲哭无泪，虽然自己不是“楚囚”，也无“明昌”可话，但却感到“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

后来，在季羨林八十华诞庆祝会上，正当他为冯至、吴组缃的到来既高兴，又忐忑不安，感动得手忙脚乱，一时竟说不出话来的时候，出他意料，许国璋也带着一个大花篮来了。于是一个热烈的场面便产生了：

我们一见面，仿佛有什么暗中的力量在支配着我们，不禁同时伸出了双臂，拥抱在一起。大家都知道，这种方式在当前的中国还是比较陌生的：可我们为什么竟同时伸出了双臂呢？中国古人说：“诚于

中，形于外。”在我们两人的心中，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早已埋下了超乎寻常的感情，一种“贵相知心”的感情。在当时那一种场合下，自然而然地爆发了出来，我们只能互相拥抱了。[11]

在这样的一次祝寿会上，季羨林周旋在男女老少至少有五六百人的​人流中，眼前仿佛是一个春天的乐园，每一个人的笑容都幻化成一朵盛开的鲜花，姹紫嫣红，一片锦绣。季羨林站在台上讲话的时候，心中一时激动不已，眼泪真欲夺眶而出，竟至保持了片刻的沉默，简直说不出话来。[12]在场的新老朋友，无不感动不已。

从一开始认识，季羨林便和许国璋一见如故，一见倾心，他们成了知己的朋友。到 1994 年 9 月，北京外国语大学来电话告知，许国璋教授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季羨林不禁“哎哟”了一声。他这种不同寻常的惊呼，在过去相同的场合下，是从来也没有过的。许国璋的去世对他打击之剧烈是可想而知的，其背后蕴含着极为深沉的悲哀，有如被雷击一般，是事前绝对没有想到的，便只有惊呼“哎哟”，表示其哀悼之意了。遗体告别的那天，人们劝季羨林不用去了，但他心里想的却是，这最后一面无论如何也是要见的，即使不能走，爬也要爬到八宝山。到了八宝山，当他看到许国璋安详地躺在那里时，他泪如泉涌，真想放声痛哭一场。他想到从此人天睽隔，再无相见之日了。[13]旧雨新知之情，溢于言表。

5. 助手李铮和其他人

在季羨林的亲友故旧中，李铮是一位非常难得的人。

李铮 1933 年生于北平，初中毕业因家庭生活困难便失学。十七岁时，来到东语系，在系办公室工作。那是 1950 年。从那时到现在，除“文革”中的一段时间外，李铮几乎都在季羨林身边，从 1978 年起成为季羨林的助手。

一进系办公室，虽然环境不错，但一个极为幼稚的孩子，跻身于

一大堆知识分子中间，有时是并不自在的。李铮是个铮铮的汉子，自尊心特强。李铮就在季羨林指派下做些事，每做完一件事，总是得到长辈的鼓励。事做完，就看书，学打字。好强的李铮无法摆平自己的位置，难免有些自卑感，一到这时，季羨林便鼓励他振奋起来。有一次，全系师生合影，地点在沙滩子民堂前，那里摆好了一排椅子，椅子后是一层比一层高的凳子，显然椅子是给教职工坐的，凳子是学生站的。李铮看了这种布局，心里犯了嘀咕，当学生吗？不够资格，当教职员吗？更不敢当了，于两难境地中，他最后选择不去照相，季羨林出面劝说半天，李铮还是未参加这全系的第一次合影。季羨林只得无可奈何地说：“唉，你这个人啊！”

后来系里组织学习《实践论》，李铮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季羨林便鼓励他发言，在一再催促之下，李铮希望解释一下里边的“道听途说”是什么典故，季羨林笑咪咪地讲了这个成语的出处和含义。

在东语系办公室一直干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李铮转到北京大学附小教书，到1978年，重回东语系，被任命为季羨林的专职助手，季羨林就是在这一年开始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兼任南亚研究所所长。从这时开始，李铮协助季羨林做了大量工作，得到季羨林极高的赞誉。

在学术方面，李铮和令恪一起编成《季羨林著作系年》，还以自己那特有的细致认真的态度来帮助季羨林整理稿件，有了李铮的协助，季羨林得以从二百多万字的学术论文中，选出十七篇，编成《季羨林学术论著自选集》。李铮又和胡乃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校出了一些错误或者不确切的地方，在重新出版的著作中都一一加以改正，这部论著的可靠性增加了，是一个很大的收获，这其中就有李铮的一份贡献。〔14〕李铮又协助季羨林编成《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一书，东方出版社编《留德十年》中的《欧行散记》，人民日报出版社编散文集《赋得永久的悔》，江苏文艺出版社金林编成的《季羨林自传》，都得到过李铮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至于北大出版社出版

《季羡林散文集》，更是由李铮全力以赴帮季羡林收集整理的，季羡林对李铮的工作感铭至深，他说：

把过去五十多年间写的散文集成这样一个集子，是一件非常繁难的工作。稿子的收集与整理，都非常不容易。特别是解放前写的东西，有的我有存稿，有的没有；刊出这些文章的刊物有的能找到，有的就找不到。因此必须进行大量艰苦的工作，才能把想收集的文章收集起来。目前我自己的精力与时间都不允许我做这样的工作，结果这些工作就落到了李铮同志肩上。他以他那种独特的细致深入的工作作风，把这个任务完成得非常完满。我可以这样说，没有他的努力，这个集子是编不成的。[15]

从17岁到去世，这么长的时间一直在季羡林身边工作，一方面他从季羡林身上学到治学和做人的道理，耳濡目染，境界不断提高，从一个中学生成长为一名北京大学的副研究馆员，这个转变是相当不易的。另一方面，李铮一直默默地奉献着，不为名不为利，为繁荣祖国的学术事业任劳任怨，季羡林对他从内心里感激不尽，在几部书里都提到李铮，感谢李铮，在《罗摩衍那译后记》里，他意味深长地说：

最后但不是最小，我还要提到李铮同志。他从17岁起就同我一起工作，除了中间有几年的间断以外，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作为我的助手，他帮助我查阅资料，借阅书籍，誊清一些稿件。我常开玩笑说他有一种“特异功能”，他能认清别人难以认清的我那一些手稿。但我最初并没有完全理解他的全部本领。他受的教育并不高。但他是一个聪明人，我逐渐发现他对现代汉语有一种特别灵敏、特别正确的语感，与他同年龄的人很难比得上他，尽管受的教育比他高得很多。他这个人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认真努力，一丝不苟。他有时帮我推敲词句，往往能提出精辟的见解。有时帮我做一些琐事，给我节约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常想，他对我的帮助等于延长了我的寿命。如果没有他的协助，我决不能做现在做的这些工作。只说一句感

谢，难以表达出我的心情，但现在也只能这样说了。

实际上，熟悉季羨林的人都知道，影响和帮助季羨林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漏掉季羨林的助手李铮。不少人都听季羨林说过，李铮是一个现在很少见的天生不会讲谎话的人，没有他，我会分很多心。

[16] 可以明确而肯定地说，在季羨林的学术贡献里，也有李铮的一份功劳。

然而李铮还不仅在学术上协助季羨林，在生活上也帮助季羨林。

1980年，校方考虑季羨林书太多，破例分给他两套六间住房。但季羨林子女都住在市里，家中只有季羨林、老伴和老祖，难以照顾另一套住房。从那时起，李铮就主动提出，自己晚上可以来这套房住，帮助照顾。到季羨林外孙大学毕业留京工作，每天来家里住宿，李铮才结束了在这套房里“看家”的任务，时间长达七八年。

李铮不光自己，连夫人徐淑燕也出过不少力帮助季羨林一家。季羨林老伴彭德华住医院，是徐淑燕一直守在医院，27个小时没合眼，尽职尽责服侍季羨林夫人。是徐淑燕帮助季羨林买书橱，骑自行车跟在送货的三轮车后面，一直把书橱送到朗润园宿舍。

其他帮助季羨林的人，还有萧淑敏，张淑贞、李玉洁、方方等人。对她们，季羨林也充满了感激之情。

我这个老态龙钟的耄耋老人，虽然还并没有丧失照顾自己的能力，但是需要别人照顾的地方却比比皆是。属于我孙女一辈的小萧和小张，对我的起居生活，交际杂务，做了无微不至的充满了热情的工作，大大地减少了我的后顾之忧。我们晨夕相聚，感情融洽。在这里，我不想再用“宛如家人父子”一类现成的词句，那不符合我的实际。加紧的词儿我一时也想不出来，请大家自己去意会吧。除了她俩，还有天天帮我整理书籍的、比萧和张又年轻十多岁的方方和小李。我身处几万册书包围之中，睥睨一切，颇有王者气象。可我偏偏指挥无方，群书什么阵也排不出来。我要用哪一本，肯定找不到哪一本。“只在此室中，书深不知处。”等到不用时，这一本就在眼前。

我极以为苦。我曾开玩笑似地说过：“我简直想自杀！”然而来了救星。玉洁率领着方方和小李，杀入我的书阵中。她运筹帷幄，决胜斗室，指挥若定。伯仲伊吕，大将军八面威风，宛如风卷残云一般，几周之内，把我那些杂乱无章、不听调遣的书们，整治得规规矩矩，有条有理。虽然我对她们摆的书阵还有待于熟悉；可是，现在一走进书房，窗明几净，豁然开朗。我顾而乐之，怡然自得，不复再有“轻生”之念。我原来想：就让它乱几年吧，等到我的生命划句号的时候，自然就一了百了了，哪里会想到今天这个样子！此外，在我这种孤苦伶仃、举目无亲的生活环境中向我伸出友谊之手的人还有很多很多。我的学生忠新夫妇、保胜、邦维夫妇，我的助手李铮夫妇，等等，等等。我心头常常涌出一句诗：“此时无亲胜有亲”，可见我的心情之一斑。[17]

上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季羨林连遭不幸，1989 年 3 月 1 日，嫡母老祖陈绍泽患肾功能衰竭去世，1992 年 6 月 23 日，女儿婉如因患直肠癌去世，1994 年 12 月 6 日，夫人彭德华去世。儿子季承不在身边，他在市里有自己的工作。孙子、孙女都在美国，外孙在加拿大。女婿何颐华后也于 1996 年 8 月去世。季羨林的亲属还有妻弟彭松夫妇，外甥彭红在北京，也难得一年里聚个一两次。所以，一些非亲属关系的友人，就担负起照顾季羨林的责任来了。

事实上，季羨林对这些友人也是非常仁慈的，他有几次拿出自己的稿费接济李铮，四川小保姆张淑贞和她的儿子都在家里住，儿子余波在北大二附中上高中，一天在家吃三顿饭，学费、杂费均由季羨林负担，每月还有 50 元钱的零花，当然，张淑贞的工资是照付的。至于对友人和学生在业务上的指导和提携，季羨林就更是做到无微不至地关心了，只是他从来不说，正是铁皮暖瓶：外皮是凉的，内心是热的。

二、生活情趣

1. “养生无术是有术”

季羨林的情趣怎样呢？他自认为是一个感情充沛的人，也是兴趣不老少的人。然而事实上生活了将近百年以后，到头来自己感到自己枯燥乏味、干干巴巴，好像是一棵枯树，只有树干和树枝，而没有一朵鲜花、一片绿叶。自己搞的那一套学问，别人称之为“天书”，自己写的一些专门的学术著作，别人视之为神秘。年届耄耋之时，他也曾幻想过，想在生活方面改弦更张，减少一点枯燥，增添一点滋润，在枯枝粗干上开出一点鲜花，长上一点绿叶。然而他没有改变，直到今天仍然是忙忙碌碌，整天连轴转，“为他人作嫁衣裳”，而且退休无日，路穷有期，自己感到可叹亦复可笑！[18]

但是，怪也怪在这里。季羨林虽然已近期颐，[19] 慢性病有一点，主要是老年哮喘和白内障，然而身躯自称顽健，在 2002 年以前，十里八里抬腿就到，过去是早晨四点起床，现在是三点起床，每天工作又增加了一个小时。有人问季羨林，你难道就不困乏，不愿意睡觉吗？季羨林笑笑回答说，怎么不愿意睡觉，其实我很喜欢睡觉，也很愿意睡觉，但是一到时候，就好像有根鞭子抽着我，让我非起来不可，起来好干活。论文他每天能写上几千字，一篇四千字的散文《赋得永久的悔》也是一天创作出来的，他的速度和效率是毫不含糊的，别人以此为怪，他自己却颇有点沾沾自喜。小友们有人说他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他自己也觉得是说到了点子上，但相信自己并没有忘乎所以，胡作非为，相信自己是有所自知之明的。[20]

有人问季羨林，你健康长寿，精力充沛，有什么养生之术，有什么秘诀没有？

季羨林的回答是：没有秘诀，也从来不追求什么秘诀。他有一个“三不主义”，就是：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

所谓“不锻炼”，决不是一概反对体育锻炼，他只是反对那些“锻炼主义者”，对这些人来说，天地，一锻炼也；人生，一锻炼

也，好像除了锻炼，就没有别的事可做。他觉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工作，工作必须有健康的体魄，可以进行一定时间的锻炼，他自己年轻时喜欢打乒乓球、游游泳，但也都不精于此道。但更为重要的是，工作必须有时间，如果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体育锻炼，而耽误了许多工作的时间，这有什么意义呢？

不挑食是很简单的，容易了解，不管是哪一国的食品，只要是合自己的口味，他张嘴就吃，什么胆固醇，什么高脂肪，统统见鬼去吧。他反对那些吃东西左挑右捡、战战兢兢、吃鸡蛋不吃蛋黄、吃肉不吃内脏的人，这样挑来挑去，结果胆固醇反而越来越高。季羨林在日常生活中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平常以素食为主，偶尔吃点牛羊肉，到外边开会从来不挑食，什么都能吃，结果胆固醇从来没有高过。

不嘀咕实指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事，从来不为自己的健康愁眉苦脸，他对有人无病装病，有人无病却幻想自己有病，十分厌恶，看了感到别扭，感到腻味。[21] 有的人吃东西禁忌多如牛毛，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尝。吃一个苹果要消三次毒，然后削皮，削皮的刀子还要消毒，这自然不在话下，而削了皮的苹果还要消一次毒，此时的苹果已经毫无味道了，只剩下消毒药水味了。从前化学系有一位教授，吃饭要仔细计算卡路里的数量，再计算维生素的数量，吃一顿饭用的数学公式之多等于一次实验。结果怎样呢？结果是每月饭费超过别人几十倍，而人却瘦成一只干巴鸡。一个人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人生之乐呢？季羨林心想，如果再戴上放大百倍的显微镜眼镜，则所见者无非细菌，他还能活下去吗？

至于我自己呢，我决不这样做，我一无时间，二无兴趣。凡是我觉得好吃的东西我就吃，不好吃的我就不吃，或者少吃，卡路里、维生素统统见鬼去吧。心里没有负担，胃口自然就好，吃进去的东西都能很好地消化。再辅之以腿勤、手勤、脑勤，自然百病不生了。脑勤我认为尤其重要。如果非要让我讲出一个秘诀不行的话，那么我的秘诀就是：千万不要让脑筋懒惰，脑筋要永远不停地思考问题。[22]

季羨林深知自己已是老年人，所以也愿意观察许多别的老年人。他们中游手好闲者有之，躺在医院里不能动的人有之，天天提鸟笼、持钓竿者有之，这样的人，他绝对看不起。他欣赏那些虽然已经寿登耄耋，年逾期颐，已经向着白寿，甚至茶寿进军，但仍然勤勤恳恳，焚膏继晷，兀兀穷年的人。季羨林认为，人上了年纪，有点这样那样的病，是合乎自然规律的，用不着大惊小怪。他不想做长生梦，对老年，甚至对人生，他采取的态度是道家的。他的具体态度和立场是：

我已年届耄耋，但是，专就北京大学而论，倚老卖老，我还没有资格。在教授中，按年龄排队，我恐怕还要排到二十多位以后。我幻想眼前有一个按年龄顺序排列的向八宝山进军的北大教授队伍。我后面的人当然很多。但是向前看，我还算不上排头，心里颇得安慰，并不着急。

这种对生命的态度完全是道家的，但他对工作的态度却是儒家的，这是他八十岁时的夫子自道：

我一向有一个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看法：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却不是为了吃饭。到了晚年，更是如此。我还有一些工作要做，这些工作对人民对祖国都还是有利的，不管这个“利”是大是小。我要把这些工作做完，同时还要再给国家培养一些人才。我仍然要老老实实干活，清清白白做人；决不干对不起祖国和人民的事；要尽量多为别人着想，少考虑自己的得失。人过了八十，金钱富贵等同浮云，要多为下一代操心，少考虑个人名利，写文章决不剽窃抄袭，欺世盗名。等到非走不行的时候，就顺其自然，坦然离去，无愧于个人良心，则吾愿足矣。[23]

对待名利，季羨林采取道家的态度，是超脱的，他是陶渊明的信徒，陶渊明的四句诗：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

无复独多虑

成了他的座右铭，[24] 名缰利索，对他毫无诱惑力。而对待工作和事业，则采取儒家的态度，是进取的。这也可以算是儒道互补吧！

1993 年，是季羨林一生最辉煌的年份之一。在这一年，求全之毁根本没有，不虞之誉却多得不得了。这些名誉压到他身上，使他一时无法消化，使他感到沉重。有一些称号，初戴到头上时，他自己都感到吃惊，感到很不习惯。12 月 30 日，他获得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性国家图书奖一等奖二项：译著《罗摩衍那》和《大唐西域记校注》。这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十几年来中包括文理工农医以及军事等方面共计五十一万多种图书中，在中宣部和财政部的关怀和新闻出版署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全国七十多位专家的认真细致的评审，共评出了国家图书奖四十五种。这个比例数字，足以说明获奖之难。季羨林自始至终是评委，但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同获奖有份，结果是有两本书获奖。听到消息之后，他在小组会上要求撤出自己的那一本书，评委们不同意，他只得在不投自己票的办法来处理这件事。得了奖，要说自己不高兴，那是矫情，是虚伪，为他所不取。但他更多感到的是惶恐不安，感到惭愧。由于种种原因，许多非常有价值的书没能评上，自己却一再滥竽，这只能算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幸运。[25]在这样的全国大奖面前，他没有被鲜花和赞誉冲昏了头脑，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旺盛的朝气，加大自己的工作量，来为国家做更多的贡献。

2. 不断修身养性

季羨林深知干知识分子这个行当是并不轻松的。在漫长的人生征途上，他尝够了酸甜苦辣，经历够了喜怒哀乐。走过了阳关大道，也走过了独木小桥。有时候光风霁月，有时候阴霾蔽天；有时候峰回路

转，有时候柳暗花明。金榜上也曾题过名，春风也曾得过意。也有四处碰壁五内如焚之时。古人说“人生识字忧患始”，这实在是见道之言。一戴上“知识分子”这顶帽子，“忧患”就开始奔来。有诗说“儒冠多误身”，一戴上儒冠就倒霉，“诗必穷而后工”，连作诗都必须先“穷”，“穷”主要是指倒霉，不是指没有钱。以中国知识分子为例，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群体，是造化小儿加心加意创造出来的一种“稀有动物”，但中国知识分子又最关心时事，最关心政治，最爱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痛快淋漓地表达了知识分子的心声。然而知识分子的感情又特别细腻、锐敏、脆弱、隐晦，他们学富五车、胸罗万象，有时自高自大，有时又自卑自弃。[26] 总之，知识分子的优点和弱点都是非常明显的。

季羨林既然深知知识分子的弱点，就时时严格要求自己，克服自己的弱点。他很重视修身养性，认为对个人来讲，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是联系在一起的，从一个人的修养到平天下，是儒家学说终极关怀的一部分。小时候，季羨林上过“修身”课，现在没有这门课，他感到非常可惜。最近几年，北京大学学生自发组织起来，搞了修身运动，季羨林非常高兴。为什么要修身呢？季羨林认为，因为人和动物的区别是动物只有本能，它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欲望，而人是有理智的，比如吃东西，如果另外一个人比你更需要这份食物，那么在人性的支配下，人会把东西让给更需要的人吃。[27] 而人之理智也需要靠修身养性来加以培养。

季羨林的忍让、宽厚是学术界熟知的，真正具有一种大家的风范。他的忍让和宽厚没有艰苦的修身养性是绝对做不到的。

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季羨林全家和睦，是朗润园里有名的五好家庭。家庭成员之间和睦相处、相亲相敬，从来没有吵过架。那是老祖在世的时候，有一次晚间停水，忘了关好水龙头。家里人都熟睡之后，水来了，水池子堵塞，水全流到屋子里，“水漫金山”了。早晨起来一看，屋内到处是水。用电话通知了助手李铮，李铮很快赶来

了。只见季羨林站在水里，一簸箕一簸箕地往脸盆里舀水，他已经倒了好多盆了。放在地上的报纸已经湿了一些，但还算万幸，并未波及书架上的珍贵书刊。一家人在李铮帮助下，好歹收拾干净利索了，当天家里比较肃静，季羨林只是默默不语，没说过一句埋怨的话。第二天，全家又有说有笑了。

另一个例子是，有一次季羨林应邀参加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是在长江中的一艘豪华客轮上召开的，会议安排在重庆参观一天。但季羨林在京有一个重要的外事活动，只匆匆参观了一项画展就在午餐后搭机回京了。正好邀请单位的一个负责人也要回北京，也同机返京。季羨林、李铮和这位负责人都坐在头等舱里。可下飞机时，普通舱乘客先下，头等舱后下。因为是最后下飞机，机场专用大轿车里已经挤得满满的了，等李铮和他上车时，车里几乎无立锥之地。来机场接季羨林的人和李铮都急得不得了，张开双臂保护季羨林，生怕别人挤着老人，也怕老人站不稳。李铮一眼看见那位负责人乘上小汽车飞驰而去，李铮自然十分气愤，而季羨林则自始至终沉默不语，别人说些气话，他也只微微一笑。是不是季羨林就脾气好到这程度，一点脾气也没有呢？也不是的。有一次，李铮陪他去广州开会。会后组织参观，大家兴致正高，只见来了一些外宾，这时一个年轻人挤到前边，想推开靠近展品玻璃柜台的季羨林。这时他一改往日那慈祥善的面容，厉声质问这位莽撞的年轻人：“推什么？洋人来了，我就该躲到一边去吗？”他维护的是一个中国人的尊严。同样的事还发生在澳门的一次国际会上：会议的参加者来自四面八方，主持者对洋人的过分热情引起了季羨林的强烈反感。开幕式那天，全体与会者都着西装，季羨林却偏偏一身中山装坐在主席台中间，大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知底里的人面面相觑，季羨林的解释是：我识人识事是非常仔细的，我这是有意而为之。[28] 从这里可以看出，季羨林的忍让和宽厚，并不是无原则的。能做到这一步，确实是长期修身养性的结果。

季羨林的宽厚并不限于对家人和友人，有些陌生人找到他，求这求那，他也是宽厚相待。许明就遇到过这样一件事：

我正在与季老谈事的时候，闯进一个东北来的年轻人。他的热络，对季老的亲近，弄得我不好意思将未说完的话说完。我只好静静地坐在一边。机灵的年轻人毫不客气地让我拿着他的相机，替他与季老留影。我当时有些木讷，在他不容置疑的指挥下，按了好几下快门。随后，他又缠着季老，要季老对录音机说几句。季老推托再三，场面有些尴尬，但拗不过这个年轻人的坚持，季老只好对着塞上来的微型话筒说：“我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是很粗浅的……”终于，季老拒绝了这个过分热心的青年题词的要求。我开始对这个来路不明的“记者”怒目而视了，最后他悻悻地走出了门。季老其实并不认识这个人，他只不过曾经来过一封信，说他是中国文化书院第几期的学员。季老说，这样的外地青年，愿意学中国文化，我又是文化书院的导师，不好推辞啊！[29]

对陌生人的这种宽厚，不知发生过多少次。而这无数的宽厚，又占去了他多少宝贵的时间啊！但愿这些陌生人，不要辜负了他的宽厚和恩泽，也能为中国文化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3. 坐拥书城的快乐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季羨林生活中最大的情趣，一是看书，二是看书，三还是看书。

季羨林坦诚地说，古今中外都有一些爱书如命的人，他愿意加入这一行列。在他看来，书能给人以智慧，给人以知识，给人以快乐，给人以希望。当然，书也能给人带来麻烦，带来灾难。远的有秦始皇焚书坑儒，近的有“文化大革命”破旧立新。在“文革”中季羨林以收藏封资修大洋古书籍的罪名挨过批斗，但他“死不悔改”，仍然藏书、爱书如故，几间大房子都已填满了书。[30] 季羨林的书斋是非

常大的，大小房间，加上过厅、厨房，还有封闭起来的阳台，大大小小，共有八个单元。册数没有人真正统计过，他自己说总有几万册吧，有人估计大概有六万多册。在北大教授中，“藏书状元”他是当之无愧的。在梵文和西文书籍中，他有些书是堪称海内孤本的。所以他虽然不以藏书家自命，但坐拥如此大的书城，心里总不免有沾沾自喜之情。[31]

这些书都是季羨林的朋友，而且是密友。他兀坐书城之中，忘记了尘世的一切不愉快的事情，怡然自得。世界之广，宇宙之大，此时只有他和他的书友在。每一本书似乎都认识他，他一走进书房，书们立即活跃起来，他仿佛能听到它们向他问好的声音，仿佛能看到它们向他招手的情景。窗外虽有粼粼碧水、丝丝垂柳，阳光照在白玉兰花那肥大的叶子上，连这些平常最喜欢的东西，也都视而不见了；连平常喜欢听的鸟鸣声“光棍儿好”，也听而不闻了。[32]

有些青年人，看到季羨林有这么多藏书，瞪大了吃惊的眼睛，问他：这些书你都看过吗？季羨林坦白地回答他们，他只看过极少极少的一点。书友们每一本都蕴涵着无量的智慧，这智慧，他是能深深体会到的。读过的书自然给他智慧和力量，而没有读过的那些书，好像也不甘落后，它们不知是施展一种什么神秘力量，把自己的智慧释放出来。如果能有“天眼通”和“天耳通”的神力，他自信会成为世界上古往今来最聪明的人，他愿意为此而努力去修持。[33]

那么要那么多书干什么呢？季羨林自己不清楚，也说不清楚，但是，他相信“开卷有益”这句话。他非常欣赏鲁迅所说的“随便翻翻”，鲁迅之所以能博闻强记、博古通今，与“随便翻翻”是有密切关系的。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必须及时得到信息，只有这样，人才能潇洒地生活下去。读书仍然是重要的信息源。读什么样的书呢？季羨林主张专业书当然要读，专业以外的书也应该“随便翻翻”。知识面是越广越好，得到的信息越多越好，否则很容易变成鼠目寸光的人。而鼠目寸光的人不但不利于自己专业的探讨，也不利于

生存竞争，不利于自己的发展，最终会为大时代所抛弃。[34]

在自己的书斋中，季羨林畅快地进行着自己的精神之旅，他相信自己会同书友们自由地互通信息、互通思想、交流感情，自己的书斋会成为宇宙间第一神奇的书斋，到那时，岂不猗欤休哉！[35]

4. 猫趣

季羨林从小就喜爱小动物，觉得同小动物在一起，别有一番滋味，它们天真无邪，率性而行；有吃抢吃，有喝抢喝；不会说谎，不会推诿；受到惩罚，忍痛挨打；一转瞬间，照偷不误。所以同小动物在一起，他心里感到坦然、怡然、安然、欣然，不像同人在一起那样，应对进退，谨小慎微；斟酌词句，保持距离；感到异常地别扭。[36] 人们对他小时候对小兔的兴趣还会记忆犹新，而到老年，他更喜欢养猫了。

三十多年前，季羨林开始养猫。第一只猫起名为虎子，是一只最平常的狸猫，身上有虎的斑纹，颜色不黑不黄，并不美观。它有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虎虎而有生气，因此起名为虎子。虎子脾气也暴烈，不怕人，谁想打它，不仅不回避，而且要向前进攻，声色俱厉，谁得罪了它，永世不忘。后来，除了家中老祖、老伴和他自己以外，无人不咬。

1981年，季羨林又要了一只雪白长毛的波斯猫，因为是洋猫，起名为咪咪。咪咪一进门，就被虎子看做是自己的亲生女儿，虽没有什么奶，却坚决要给它喂奶。季羨林吃饭时，弄点鸡骨头、鱼刺，虎子自己蹲在旁边，瞅着咪咪吃，从不与它争食。虎子还会从外面抓些麻雀、蚱蜢、蝉、蛐蛐之类给咪咪吃。

季羨林同虎子与咪咪都有深厚的感情，每天晚上，两只猫抢着到他床上去睡觉。到了冬天，他在棉被上面特别铺上了一块布，供它们躺卧。有时候，他半夜醒来，神志一清醒，觉得有什么东西重重地压

在他身上，一股暖气仿佛透过两层棉被，扑到他的双腿上。这时候，即使双腿由于僵卧过久，又酸又痛，他也总是强忍着，决不动一下，免得惊了小猫的轻梦。

到了虎子十一二岁时，咪咪也八九岁了。虎子依然如故，脾气暴烈，威风凛凛，见人就咬，而咪咪却有下世的光景。常常到处小便，桌子上、椅子上、沙发上，几乎无处不便。

最让我心烦的是，它偏偏看上了我桌子上的稿纸。我正写着什么文章，然而它却根本不管这一套，跳上去，屁股往下一蹲，一泡猫尿流在上面，还闪着微弱的光。说我不急，那不是真的。我心里真急，但是，我谨遵我的一条戒律：决不打小猫一掌，在任何情况之下，也不打它。此时，我赶快把稿纸拿起来，抖去了上面的猫尿，等它自己干。心里又好气，又好笑，真是哭笑不得。家人对我的嘲笑，我置若罔闻，“全等秋风过耳边”。[37]

后来，咪咪随意拉屎撒尿的频率增加了，范围也扩大了。桌上、床下、澡盆中、地毯上、书上、纸上，只要从高处往下一跳，尿水必随之而来。季羨林便以耄耋衰躯，匍匐在床下、桌下向纵深的暗处去清扫猫尿，钻出来之后，往往得喘上半天粗气。他不但不气馁，反而大有乐此不疲之概，心里乐滋滋的。年近九旬的老祖这时就笑着说：你从来没有给女儿、儿子打扫过屎尿，也没有给孙子、孙女打扫过，现在却心甘情愿服侍这一只小猫！他这时也是笑，但不回答，不以为苦，反以为乐。他自己也解释不清楚原因何在。[38]

家人终于忍无可忍，主张把咪咪赶走。咪咪被送出门去，关在外边。但晚上睡觉，季羨林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再也睡不着。过几天，咪咪病得更厉害了，给它东西吃也没有胃口，季羨林看了直想流泪。有一次，他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几里路到海淀肉店，买回猪肝和牛肉，想给它吃，一开始，咪咪有点想吃的样子，但一沾嘴唇，又把头缩回去，闭上眼，不闻不问。后来，咪咪不见了，他到山上、塘边、草丛、树后、石缝，都找遍了，“屋前屋后搜个遍，几处茫茫皆

不见”了，咪咪永远地消逝了。他简直像是失掉了一个好友，一个亲人，直到今天回想起来，内心里还颤抖不止。

从别人那里知道，猫有一种特殊的本领，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寿终，到此时此刻，它决不呆在主人家中，让主人看到死猫，感到心烦悲伤。它们总要想找一个最僻静的地方离开人世。从这件事他悟出，新陈代谢是普遍规律，应该向猫学习处理死亡的办法。人生必有死，是无法抗拒的。人是百年过客，总是要走过去的，每一代人都只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长途接力赛的一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是宇宙常规。人老了要死，像在净土里那样，应该算是一件喜事。世界是青年的，老年人应该为青年人活着而不是相反。老年人的天职是尽上仅存的精力，帮助青年前进，必要时甚至可以躺在地上，让后人踏着自己的躯体前进。[39]

咪咪的死毕竟让季羨林非常悲哀，他发誓一定再找一只同样毛长尾粗的白色波斯猫。苍天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找到了，新猫被命名为咪咪二世。后来又有了三世，再后来又有了四世，都是眼睛一黄一绿的波斯猫。

猫是季羨林每天喜悦的源泉之一。在白天，看书写作一疲倦，就往往到楼外小山下池塘边去散一小会儿步。这时，咪咪二世、四世便像一股白烟，从草丛里、野花旁，蓦地窜出来，用长而白的毛蹭他的腿，用嘴舔他的裤腿，用软软的爪子抓他的脚，使他步子也迈不开。他努力迈步向前走，猫们便跟在身后，陪他散步，山上、池边，他走到哪，猫便跟到哪。小猫跟季羨林散步，便成为燕园一奇，连张中行都感叹有加。

咪咪四世是新生小猫，是从临清来的。它小小年纪，却极端调皮，有时候简直是无恶不作，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不需要它，它就偏在那时候那地方窜出来，搅得人心神不安，它自己却怡然自得。而二世是个老猫了，脑袋里似乎有一个表。四点前后，他一开灯，它就会在窗台上抓纱窗，窸窣作响，好像在催他起床，让它进早餐。这时，季

羨林总是悚然而醒，飞快下床，开门一跺脚，声控电灯一亮，只见一缕白烟从黑暗中飞了进来，先踩他的脚，后蹭他的腿，好像是在道早安。几年来，几乎天天如此，因此他对它情有独钟，它对他也一往情深。为它，季羨林写过几句俚词说：

夜阑人静，
虚室凄清。
万籁俱寂，
独对孤灯。
往事如潮，
汹涌绕缭。
伴我寥寥，
惟有一猫。[40]

在老祖、老伴、女儿去世之后，在他精神最苦闷的时候，给了他极大安慰的，就有咪咪二世。

现在，虎子已不在人世，咪咪三世丢了，二世和四世也都相继走了。

定居台湾的梁实秋先生也喜欢猫，甚至在临终前念念不忘的也是他的猫。读到报上发表过的这个消息时，季羨林大为快慰，把梁实秋引为“同志”。两位学者的“猫趣”，堪称为“猫坛”佳话。

5. 怀旧之情

季羨林进入老年以后，常常怀念旧人，记忆的丝缕经常挂到一些已经逝世的师友身上，感触极多，由此经常想到《昭明文选》潘安仁《怀旧赋》中的文句：

霄辗转而不寐，骤长叹以达晨；独郁结其谁语，聊缀思于斯文。

但怀旧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或感情、或心理状态呢·季羨林觉得还没有见过古今中外任何学人给它下的定义，他自己想，古往今

来，天底下的万事万物，包括人和动植物，总在不断地变化着，总在前进着。而既然有变化发展，走在前边的或人生的一个阶段，就会变成旧的。怀念这样的人和物，或人生的一个阶段，就是怀旧。人往往有一个弱点，觉得过去的好，旧的好，古代的好；觉得过去的时代，天比现在要明朗，太阳比现在要光辉，花草树木比现在要翠绿，一切比现在都要好，于是就怀，就会“发思古之幽情”，这就是怀旧了。但并不是一切旧人、旧物都值得怀，有的旧人、旧事，就不值得怀，有的一想到还令人作呕，弃之尚且不暇，哪里还值得去怀呢·季羨林的怀旧情感是很浓烈的，他认为，怀旧就是一种有“人味”的表现，怀旧可以获得很高的报酬：净化人的灵魂。

亲故老友逝去了，或者离开自己远了。但是，他们身上那一些优良的品质，离开自己越远，时间越久，越能闪出异样的光芒。它仿佛成为一面镜子，在照亮着自己，在砥砺着自己。怀这样的旧人，在惆怅中感到幸福，在苦涩中感到甜美。这不是很高的报酬吗·对逝去者的怀念，更能激发我们“后死者”的责任感。先死者固然能让我们哀伤，后死者更值得同情，他们身上的心灵上的担子更沉重。死者已矣，他们不知不觉了。后死者却还活着，他们能知能觉。先死者的遗志要我们去实现，他们没有完成的工作要我们去做。即使有时候难免有点想懈怠一下，休息一下，但一想到先人的声音笑貌，立即会振奋起来。这样的怀旧，报酬难道还不够吗· [41]

在季羨林看来，怀旧比古希腊哲人所说的悲剧更能净化人的灵魂，它比悲剧的净化形式，更为深刻，更为深入灵魂。因此，他对亲人，对朋友，怀有真挚的感情。这种感情看似平常，但实际上却非常不寻常。既然是个人，就应当有“人味”。但他生平遇到一些人，对人毫无感情，没有“人味”，积几十余年之经验，深知一个人有“人味”也并不容易。因此，季羨林庆幸自己能怀旧，庆幸“人味”支持自己怀旧。 [42]

到现在为止，季羨林写过的怀念文章多得不计其数，从老师辈来

说，有中国的吴宓、陈寅恪、朱光潜、胡适、汤用彤、郑振铎、老舍、梁实秋、冯友兰、叶公超、何思源、鞠思敏、胡也频、董秋芳，外国的西克灵、西克、瓦尔德施米特；朋友或同学辈的有李广田、章用、许衍梁、曹靖华、王力、姜椿芳、沈从文、白寿彝、丁声树、冯至、周培源、吴作人、胡乔木、许国璋、乔冠华、吴组缃、李长之、郎静山，外国的 Wala、普拉萨德、室伏佑厚、中村元、池田大作、郑午楼、郑彝元，香港的饶宗颐，韩国的金俊烨、金九；自己的晚辈或学生有李铮夫妇、蒋忠新夫妇、张保胜、王邦维夫妇、李玉洁，以及其他许多人；还有地方如临清、济南、北京、哥廷根和四十多个他去过的国家，都是他怀旧的对象。正是将记忆的丝缕挂到师友和旧物身上，他从中获得了力量，净化了灵魂，产生了巨大的鞭策自己的力量，成为他“老骥伏枥”的动力之一。

6. 也得念念消费经

季羨林作为哲学博士，研究方向是语言文学，他不喜欢义理，所以写的哲学文章很少。但到晚年，却又一反常态，大谈起“天人合一”的玄学来。文章一经发表，便语惊四座，颇有影响。他还谈起了另一种哲学——消费哲学，也引起轩然大波，中年人中有说他是老保守、老脑筋、不合时宜的，青少年就不知道怎么说了。

话得从头说起。他因为是名人，所以约稿者纷至沓来，于是也就有人请他来谈个人消费，于是也就有了他的消费哲学。

消费与经济基础有关。季羨林的经济基础如何呢？从账面上来看，季羨林的工资是北大教师中最高的，因为他是 1950 年代第一批确定的“老一级”教授。但他每月的工资，到上世纪末，经过七扣八扣，领到手以后，平均约七百到八百块钱。这些钱，他要给小保姆张淑贞一半。除了她的工资，她还有一个男孩，在北大二附中上学，学费、杂费、生活费全部由季羨林负担。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季

姜林心肠好，善良，待人宽厚慷慨；二是让小保姆的孩子在身边上学，也免去了她要回四川老家探亲而产生的后顾之忧。可这样一来，他再交完房费、天然气费、电费、电话费等，实际上拿到手的也只有三百元左右了。用它来支付全家的生活费，怎么会够呢？

这里就有了一个对比：1950年代季姜林被定为一级教授，在六类工资地区的北京，每月拿的工资是345元，再加上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相当于今天的院士）每月津贴100元。这是一个“不菲”的工资数目。因为当时物价奇低，去莫斯科餐厅吃饭，吃一顿大约1.5元到2元，汤菜俱全，还有黄油面包，外加啤酒一杯。如果吃烤鸭，六七元钱足矣，还能吃只挺大的。这样的物价，有每月450元的固定工资，简直是“阔死了”（富极了）。而如今，他是全国最有资格的“老一级”教授了，因为比他资格更老的陈岱孙老教授已经去世。而他的全月基本工资加各种补贴，也就一千二三百块钱，这就是他每月实际上留在手里只有三百多块钱的原因。

但这三百多块钱，他还要支付全家人的生活费，这一点钱，在北京连供一个人吃饭都捉襟见肘，何况加保姆和她的孩子呢？所以，就这点钱，“老莫”（莫斯科餐厅）、烤鸭之类，就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了。

这样的老教授，工资这样低，可怎么维持生活呢？不少人自然会问他，老先生笑笑说：“我的生活水平，如果不是提高的话，也绝没有降低。”人们问他：“难道你有点金术吗？”他回答说：“非也。”季姜林道出的奥秘是：1950年代大学教师主要靠工资生活，不懂什么“第二职业”，也不允许有“第二职业”。谁要有这样的想法，那就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是与无产阶级思想对着干的，是最犯忌讳的。而今天却大改其道，学校里也有种种形式的“第二职业”，甚至“第三职业”。季姜林也有了“第×职业”，就是“爬格子”。他爬了几十年格子，名气大，稿费多，时不时地就收到稿费。每当收到汇款单，他便心花怒放，爬格子的劲头就更大了。[43]这

样，他手头虽只剩三百元的工资，却从来不感到拮据，原因就是有源源不断的稿费后备军。

手头虽然有钱，但季羨林在生活上却向来没有太高的追求。对吃，一如既往，从来没有什么过高要求，早晨仍然是烤馒头片或面包，一杯清茶，一碟炒花生米。他从来不让家人或保姆陪他凌晨四点起床，为他做早饭，所以早餐是几十年的“一贯制”，从来不变化。午晚两餐，素菜为多，很少吃肉。饮食如此简单，他全家的伙食费不过五百元多一点。

至于穿，季羨林简直是个清教徒。他的衣服多是穿过十年八年或者更长时间的，有一件风衣，是他在1946年从德国回到上海时买的，至今仍在穿。有一天，他穿着这种风衣，有一位专家说：你的这件风衣，款式真时髦！他听后大惑不解。专家一解释，他才知道：原来几十年前流行的款式，经过了漫长的沧桑岁月，在不知经过多少变化之后，在螺旋式上升的规律指导下，现在又回到了几十年前的款式。他听后，大为兴奋。没想到自己守株待兔，终于守到了。他也没有想到，人类在衣着方面的一点小聪明，原来竟如此脆弱！

他的老主意是：以不变应万变。他想，一个人穿衣服，是给别人看的。如果一个人穿上十分豪华的衣服，打扮得珠光宝气，天天照镜子自我欣赏，那他（她）不是疯子，便是傻子。穿衣服给别人看，观看者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标准，千差万别，那么你满足了这帮人，必然开罪于另一帮人，反正不能让人人都高兴，皆大欢喜是不可能的。所以，季羨林的穿衣哲学是我行我素，我就是这一身打扮，你爱看不看，反正我不能让你指挥我。在穿衣方面，他是个完全自由自主的人。有了这样一种穿衣哲学，我们也就看到他的一身蓝色咔叽布中山装，春、夏、秋、冬，永不变化。他的用品，也是如此。只要能用，他决不丢弃，敝帚自珍是他的用物哲学。我们看到他用的一只手提包，是一种最简单的敞口式的，十几年一点变化没有。而他的穿戴和用品，也真因为观看者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标准不同，有了两种针锋相

对的评论：赶潮流者说他是老古董、老保守、老顽固，而学者层却认为他是一个典型的儒者。儒雅的风度，从其学识和人品中来，而不是从其衣着中来。

季羨林消费哲学的核心是：如果一个人成天想吃想喝，仿佛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吃喝二字，他觉得无聊，“斯下矣”。他的潜意识永远是：食足以果腹，不就够了吗？衣足以蔽体而已，何必追求豪华。

季羨林绝非“大款”，但他在自己的消费哲学指导下，素衣淡食，生活简单，却把大把大把的钱送给身边急需的人，或者捐给家乡的学校。现在工资高了，捐赠也多了。这样的消费哲学，但愿能有更多的人会理解。绫罗绸缎、皮尔·卡丹，自会有人穿；燕窝鱼翅、生猛海鲜，自会有人吃。他们不必一簞食一瓢饮。但他们如果能在食前方丈、一掷千金时，想想季老先生，也为别人多想一想，也为教育想一想。那么，教育的现状绝对不会如此，教育经费绝对不会如此紧张，希望小学、希望中学就会多起来，教育就有希望了。

7. 人生座右铭

进入 90 岁以后，季羨林屡次闹病，先是耳朵，后是眼睛，最后是牙，至今未息。耄耋之人，闹点不致命的小病，本来是人生常事，他一向不惊慌。但却不能不影响自己的写作，进度被拖了下来，不能如期完成。他自觉自己的性与人殊，越是年纪大，脑筋好像越好用，于是笔耕也就越勤。有一位著名作家写文章说，季羨林写文章比他读得还快。这当然有点溢美和夸大。80 岁以后，从 1993 年到 1997 年这四年中他用中外文写成的专著、论文、杂文、序、抒情散文等等，其量颇为可观，至少超过过去的十年或更长的时间。

他常说，自己一生都在教育界和学术里“混”。这是通俗的说法，用文雅而又不免过于现实的说法，则是“谋生”。这也并不是一

条平坦的阳关大道，有“山重水复疑无路”，也有“柳暗花明又一村”。回忆过去 70 年的学术生涯，不能说没有一点经验和教训。迷惑与信心并举，勤奋与机遇同存。他有自己的座右铭，他讨厌说空话、废话、假话、大话，一无灵丹妙药，二无锦囊妙计，只有一点明白易懂简单朴素、迹近老生常谈、又确实是真理的道理。

季羨林最讨厌说假话，自己则知错必改。他写于 1999 年 7 月 27 日发表在《人民日报》10 月 16 日第 7 版的散文《两个小孩子》，说到“相传唐代大诗人白居易 3 岁识‘之’、‘无’，千古传为美谈。如今这个仅仅两岁半的孩子在哪一方面比白居易逊色呢？”文章发表后，《海口晚报》读者张竺夫表示质疑，说白居易的《与元九书》说自己是在生后六七个月就识“之”、“无”两字，并非 3 岁。季羨林知错就改，于 10 月 28 日又撰文《关于〈两个小孩子〉的一点纠正》，对这一错误予以公开且正式地更正，所言毫无遮丑之意，对一位普通读者深表感激，“张先生提出纠正，对我来说是改正了错误，增加了见识；对读者来说是得到了正确的信息，有百利而无一害。”文中又说，“但是，我不想改变原文。古人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我不想偷偷摸摸地改得毫无错误的痕迹。我一向不悔少作，也不改我的文章。”大胆承认错误，虚心接纳指正，这是真正的大家风范。季羨林因此被读者称为“光明磊落真学者，真诚交流是大家”。

他喜欢引宋代大儒朱子的诗：“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他认为这首诗的关键有二：一是要学习，二是要惜光阴。到晚年，季羨林成了陶渊明的志同道合者。

他对老年，甚至对人生的态度是道家的。陶渊明有一首《神释》，其中有四句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季羨林很欣赏这几句话。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一首自警诗，他也很欣赏：“蚕老茧成不庇身，蜂饥蜜熟属他人。须知年老忧

家者，恐似二虫虚苦辛。”

谈到看待自己，他有一篇《我写我》，里面说的，就是对自己的认识。古希腊哲人曾发出狮子吼：“要认识自己！”可见这问题之重要。他称外界对自己的评价过高，应该三七开，只信其三。他认为自己不是天才，勤奋可以算得上。他的勤奋包括把开会的时间都充分利用起来，他诙谐地说：“我开会有一个窍门。本来汉语是世界语言里最简短的。英文要一分钟，我们有五秒就够。可是我们有很多人对不起这个特点，讲话啰里啰嗦，一句话重复来、重复去，还加上‘哼、哈、唉’，就像一个人在敲鼓板一样，所以他讲话，我用不着注意听，我半个耳朵完全能掌握，当别人鼓掌的时候，我跟着鼓掌。那四分之三我就考虑别的问题，做学术，一篇文章怎么写、资料怎么搜集。有一次我讲，将来问我是哪一门的专家，我说我可以开一门‘开会学’，我可以写一个几十万字的讲义，可以开课招研究生。”真正的天才他说没看到过，反正自己绝对不是一个天才，是中才，中等的才。他承认有天才，也有偏才，四平八稳的人成不了天才，觉得自己这个人就有点四平八稳。年轻时有点淘，也打架，什么都干了。后来在社会上磨炼久了，进步了。季羨林认为，他是认识自己的。他经常剖析自己，而且剖析得有点过头。或者说，自知之明过了头，有时候真感到自己一无是处。比如拿写文章为例。专就学术文章而言，他并不认为“文章是自己的好”。他真正满意的学术论文并不多，反而别人的学术文章，包括一些青年后辈的文章在内，他觉得好。又比如自己写散文，而且已经写了六七十年，加起来也有七八十万字了。然而自己真正满意的也屈指可数。在品行的好坏方面，他自己觉得不通伦理学，也没有深邃的理论，只能讲几句大白话。至于说真话与说谎，这当然也是衡量品行的一个标准。他坦白，自己说过不少谎话，因为非此则不能生存。但是总起来还是敢于讲真话的，真话总是大大超过谎话。因此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年届耄耋，过去也曾有过一些幻想，想在生活方面改弦更张，减少一点枯燥，增添一点滋润，在枯枝

精干上开出一点鲜花，长一点绿叶；然而直到今天，仍然是忙忙碌碌，退休无日，路穷有期。

8. “老表走新时”

到 2009 年为止，季羨林在 301 医院前后住了四次院，第四次住进去，就没有出去，一直住在里面。

2001 年 11 月 12 日，季羨林从山东回到北京之后不久，保姆发现老人的裤子非常硬，告诉李玉洁老师后，她们断定是尿了裤子，但是老人一声不吭。后来老人开始尿血，这才到 301 医院看急诊，只得住进了该院。这是他第一次进 301 医院。泌尿外科专家李炎唐教授经过缜密检查，确诊没有大的问题，季老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星期就出院回家了。2002 年 7 月，季老患皮肤病天疱疮，他还是不愿住院，北京大学校领导和李玉洁老师硬是将老人给“押”到医院，这是第二次进解放军总医院。这次他在医院一住就是一个多月。9 月 30 日，要过国庆节，老人“闹”着要出院，工作人员商量后，决定让老人先回家观察两天。谁知，回去第一天就开始发烧，第二天早上，高烧达 38 摄氏度多，到晚上高烧 39 摄氏度多，第三天凌晨 3 点多，学校又用救护车把他送到 301 医院抢救。这次老人的病情非常严重。他一连昏迷了好几天，醒来后连身边的李玉洁老师也不认识了。在医院住了段时间，恢复得不错，于 12 月 30 日出院。回家后，季老感觉很好、很开心，写了篇散文《回家》，不久就发表了，告诉关心他的朋友和读者：季羨林已恢复健康，而且还能写文章。

2003 年 2 月 21 日，季老心肌衰竭第四次入住总医院。住院一段时间后，又发现左腿患骨髓炎，医院请擅长为高龄老人做骨科手术的梁雨田教授为他主刀，手术很成功，老人不再疼痛，也能自行站立、走路。只是从那时到现在，已经 5 年多了，老人再也没有离开解放军总医院，再也没有离开病房大楼。

医护人员把他的病房布置成了“家”，书房、卧室、办公室三位一体。阳台上是几十个大塑料盒，全是李玉洁老师按照顺序放置的书籍、资料；办公桌上是应时的盆花，一年四季随时更换；桌子和床头上方是许多造型新颖的布制小狗、小猫、小松鼠、博士熊等小动物。为了方便老爷子写作和看书，医院特制了一个小桌子，放在沙发前面。病区护士们，把季老当成自己家的老人，凡是季老生活上需要的，她们都提前想到，尽量办到。护士长刘珍蓉，简直就像季老的亲孙女，把老人照料得无微不至。配膳房的小云和小贾两位小姑娘，知道老人爱吃皮蛋粥，平时总想着多做点给老人送过来，并且三天两头到病房询问老先生想吃些什么。护士认为心理治疗，对于季老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宋守礼副主任医师，三年如一日，几乎每天都到季老的病房与他“谈心”，国家大事、天文地理、人情趣事等等，是医生，也似儿子，令老人十分开心。老人专门写了篇以《宋守礼》为题的文章，表示感谢。

老人对医务人员亲人般的照顾非常感动，专门为所住病区写了《白衣天使》，颂扬医务人员的美好心灵和高尚情怀，还题写了“白衣天使行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条幅挂在病区办公室，以自勉和励人。

女医师卢文宁热爱专业，喜欢读书，季羡林鼓励她要胸有大志，目光远大，在学业上再上一层楼。医学是个浩瀚的海洋，大学毕业只是基础，硕士毕业也只能算中等水平，只有迈上更高的知识层次，才能有所作为。小卢不负所望，终于以好成绩考取了医学博士。

对清洁工，他也总是问长问短：“什么学历？”，“为什么不读书了？”不久，两个清洁工一个回家继续读书，一个在北京的一所成人技校上学。一个年轻护士为学习英语发愁，到病房请教季老：用什么办法快速提高英语水平？报刊上刊登的英语速成广告可信不可信？季老笑笑，顺口吟出一句名联：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他说，学好英语记住两个字——勤奋。速成也快，速忘也快，成就事

业要勤奋、刻苦，别无他途。季老出了书，问李玉洁老师科里的年轻医生、护士都送了没有？没有的赶紧送。老人说：“出书是给人看的，哪怕有几句话对年轻人有用了，也值得。”有个护士提出想看看季老的著作《留德十年》，老人马上让李玉洁买了600本，逐一签名送给医生护士们。

对年轻的医生、护士，他总是给予精神上的鼓励和无声的支持。刚做完手术那段时间，每次换药时都刻骨般疼痛，但他总说笑不停，调节气氛。季老把照顾他的护工也当成家庭成员，不但付工资，还额外管吃管喝管水果，让护工从心里感觉跟他是一家人。

李玉洁告诉说：老爷子虽然住在医院，但工作还如同平时上下班一样。在医生的指导下，他对一日作息时间作了非常科学的安排，并坚持了3年，雷打不动，保证每天上午、下午有两个小时的工作时间。而且，老人写作有个特点，在吃饭、输氧和休息时，对写作内容先行构思，动笔时思路如泉涌，一气呵成，两个小时能写2000字左右，基本不需修改。他依然起得很早。王岳川跟季羨林先生说：“您老每天闻鸡起舞。”季羨林正色说：“不，是‘鸡闻我起舞’。”

2005年春天，季羨林心脏不太好，301医院给他安装了个心脏起搏器。现在，除了左腿患骨髓炎外，他身体基本没有大的毛病，能吃饭，能工作，精神好，思维敏捷。

季羨林先生住到301医院以后，到2006年8月7日为止，李玉洁在病倒以前，一直陪伴在那里。她介绍说那时候，“先生每天依然起早，看书、看报、写文章、写日记，一切都和在家里一样。他依然早起写作，生怕时间浪费了。就是对锻炼有点‘懒惰’，舍不得时间呐。先生的心态就更好了，每天谈笑风生，说自己是一块老表，经过擦油泥，修理小毛病，又可以走一段日子了。”李玉洁老师是这样介绍季羨林先生在301手术前后的情况：“90多岁的人动大手术，全身吊着，还笑着问我们都哭丧着脸干什么？我们当然笑不起来，他就说我已经超额了，一点儿都不觉得自己是个病人。手术以后，先生躺

在床上，闭着眼睛皱着眉头，我们以为他难受，谁知他一开口，说的全是保护环境、国际关系、美伊战争、中国的发展等等。他说境界要自己摆好。”每天，医生为季老冲洗骨髓炎手术以后没有完全愈合的伤口，一冲至少半个小时。冲洗过程让周围的人不忍心看下去。可当医生在操作间隙询问季老疼不疼时，他总是平静地躺在治疗床上，手抓着被单，坚定且温和地回答：“不疼不疼。”工作人员非常心疼，季老反来劝慰他们：“说不疼虽是假话，可是即便说疼就能减轻疼痛了吗？那还不如干脆说不疼，别让大夫有顾虑、太紧张啊。”“季老就是这样，即使说谎，也是真心为他人着想！”李玉洁这样说。

他自己在病中，还特意嘱咐年轻人要注意两条：“一是身体，有了身体才能工作，要自己疼自己；二是多补充自己，多有点收入。”

季羡林现在身体状况非常好，除了行走方面不太方便，因为年纪毕竟大了，但是脑子非常清楚，思路极其清晰，目光还是非常清澈，最近他给自己起了个非常有意思的号，自称自己为“四半老人”，半聋、半瞎、半癱、半拐，这虽然是开玩笑的话，但能看出他是非常乐观对待疾病的。老人家说自己活到百岁是有信心的。这令大家都非常高兴。季羡林常说希望自己能活到108岁，108岁是茶寿。到今天，他的基本生活还是很有规律的，看的不是很多，主要是别人在给他念。但是有时候仍然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看些东西。李老师是个有心人，她有时候会故意把许多古诗词念错，结果老爷子一下就听出来了，其实这是李老师一种非常用心的做法，这样可以激发老人的记忆力。对老人的记忆力不断地给予一种刺激，对老人家的脑筋有好处。老人家都能反应过来，李老师说有些诗词她是故意挑的，相当冷僻，但季羡林都有记忆，说明季羡林当年的根底相当深厚。

三、三大洲游踪

1. 列国之游

季羨林平生不喜爱出游，但他也到过大陆以外的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跨越亚、非、欧三大洲，真正称得上见多识广，国际社会、域外风情、各民族风俗习惯的见闻是异常丰富的。

他出游这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可分为三种情况：作为中国政府派出的代表团成员，出国参观访问；应邀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其他会议；应邀进行讲学活动。有时候，三种情况也有合而为一的时候。

作为代表团成员，季羨林的出国访问主要有：1951年，参加由丁西林任团长、李一氓和郑振铎任副团长、刘白羽任秘书长的中国赴印度、缅甸访问文化代表团，时间长达几个月；1955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亚洲国家会议”；1958年，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参加在苏联塔什干举行的“亚非作家会议”；1962年，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和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任团长）、白寿彝等人一起，参加伊拉克“巴格达建城一千二百周年纪念大会”，会后访问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1964年，参加中国教育代表团，前往埃及、阿尔及利亚、马里、几内亚等国参观访问；1978年，作为中国对外友协代表团成员，前往印度访问；1980年，任团长率领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访问；1985年，作为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代表团顾问，参加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斯图加特召开的“第十六届世界史学家大会”；1986年，任团长率领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访日赠书代表团访问日本，并在同年作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团成员访问尼泊尔，参加“世界佛教联谊会第十五届大会”。

季羨林到各国参加的主要国际学术会议有：1955年，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加“国际东亚学术讨论会”；1959年，应邀参加“缅甸研究会（相当于国家科学院）五十周年大会”；1980年，应日本友人室伏佑厚先生之邀赴日本参观访问，参加“印度学佛学会议”；1985年，参加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印度与世界文学国际讨论会”和“蚁垤国际诗歌节”，被大会指定为印度和亚洲文学分会主

席；1987年，应邀参加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1999年3月26日，应圣严法师邀请到达台北，参加台湾法鼓人文社会学院召开的“人文关怀与社会实践系列——人的素质学术研讨会”，27日直接到法鼓山参访。早晨，也来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山溪堂，眺望远山绿景环绕，与83岁的北京国家图书馆长任继愈，嗑起花生闲坐，寻人间一处静谧。29日至31日一连三天在台北图书馆参加会议，29日上午9时半举行开幕典礼，“法鼓大学校长曾济群一一介绍与会贵宾，其中当介绍来自大陆北京，中国人文学泰斗季羡林先生时，88岁的季老神采奕奕地向大会挥手致意，一时之间现场响起温馨的掌声。”为大会主讲的题目是：《关于人的素质几点思考》，把人文关怀的层次分析成“人与自然”、“人与人”、及“人自己的思想情感处理”等三种关系，并表示如果这三种关系处理得当，人就幸福愉快，否则就痛苦。会议间隙拜谒胡适墓、傅斯年墓，分赠蔡德贵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季羡林传》给朋友们；在拜谒胡适墓时，郝斌跟在他后头。季老上前就恭敬地朝着胡先生的墓地三鞠躬，然后回头对跟在后面的郝斌说：“鞠躬。”语气很严厉，容不得半点商量。这在季老是很少有的。郝斌于是也鞠躬完毕。

.....

应邀出国、出境讲学主要有：1985年，应香港中文大学邀请，作“印度文学在中国”的学术讲演；1986年，应中村元、室伏佑厚邀请访问日本，与中村元会谈成立“国际文化交流中心”问题，并应早稻田大学邀请，作“东洋人之心”的讲演，应日本经济界、学术界邀请，作“经济与文化”讲演；1988年，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讲学，讲“吐火罗文剧本与中国戏剧之关系”和“从大乘佛教之起源看宗教发展规律”；1991年，应金俊烨博士之邀，和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李滔教授、杨通方教授，于中韩建交之前访问韩国，访问汉城[44]和古都庆州，访问了许多大学和韩国社会科学院；1994年，应陈贞煜博士、郑午楼博士等人邀请，赴泰国曼谷东

方文化书院，并主讲“天人合一”问题，后又参观曼谷大皇宫、法政大学等；1995年，承金俊烨博士推毂，应韩国国际交流财团之邀，和国家教委、北大等单位负责人士，再次访问韩国。

就是这些访问，构成了季羨林一生中的许多重要经历，足迹遍及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访问，给季羨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尤难忘怀的，有印度缅甸之行、尼泊尔之行、非洲之行、苏联塔什干之行、日本之行、韩国之行、泰国之行。在这些终生难忘的访问中或在访问之后，他写下了许多篇游记，使后人得以了解异域的风土人情、历史风貌，记下了这位文化使者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

2. 印度、缅甸之行

对印度和缅甸的访问，第一次是在刚解放不久，以后他又多次访问印度，多次访问缅甸，这些访问组成了一组游记散文：《初抵德里》、《在德里大学和尼赫鲁大学》、《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难忘的一家人》、《孟买，历史的见证》、《一个抱小孩子的印度人》、《佛教圣迹巡礼》、《回到历史中去》、《深夜来访的客人》、《海德拉巴》、《天雨曼陀罗》、《国际大学》、《别印度》、《重过仰光》。

对印度的参观访问所写成的游记，敷陈的大义是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的、既古老又崭新的友谊，时移世变，沧海桑田，难免有一些变化，但始终离不开这个“大义”。通过这些游记，印度人民、印度朋友的音容笑貌，会重现在眼前，回荡在耳边，成串的红色、黄色、蓝色、棕色的花环会重新戴到脖子上，花香会永远存在。季羨林深深地感觉到：

（中印）友谊确实实是存在的，但却是看不到摸不着，既无形体，又无气味；既无颜色，又无分量。成包地带，论斤地带，都是毫无办法的。惟一的办法，就是用我们的行动带。对我这样喜欢舞笔弄

墨的人来说，行动就是用文字写下来，让广大的中国人民都能读到，他们虽然不能每个人都到印度去，可是他们能在中国通过文字来分享我们的快乐，分享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情。[45]

他永远难以忘怀，印度朋友中有旧知，也有新交。对旧知，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对新交，是“乐莫乐兮新相知”。各有千秋，各极其妙。又是戴花环，又是涂香油，新闻记者、电台录音记者、摄影记者，一拥而上，相机重重，灯光闪闪，一团团热烈紧张的气氛，是十分紧张、十分兴奋、十分动人、十分愉快的访问。[46]

1978年，由王炳南任团长的中国对外友协代表团访问印度。季羡林在德里大学大谈中印文化交流，他不同意那种认为中印文化交流开始于佛教传入中国的说法，他认为要早得多，至少要追溯到公元前的屈原的时代。在这次讲话中，他引证屈原《天问》中“顾菟在腹”，这句话，“顾菟”虽有人解释为“蟾蜍”，但汉以来的注释都说是兔子。月亮里有兔子的神话极为流行。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七《罗睺斯国》就有“三兽窞堵波”的记载：

劫初时，于此林野，有狐、兔、猿，异类相悦。时天帝释欲验修菩萨行者，降灵应化为一老夫，谓三兽曰：“二三子善安隐乎？无惊惧耶？”曰：“涉丰草，游茂林，异类同欢，既安且乐。”老夫曰：“闻二三子情厚意密，忘其老弊，故此远寻。今正饥乏，何以馈食？”曰：“幸少留此，我躬驰访。”于是同心虚己，分路营求。狐沿水滨衔一鲜鲤，猿于林树采异花果，俱来至止，同进老夫。唯兔空还，游跃左右。老夫谓曰：“以吾观之、尔曹未和。猿狐同志，各能役心，唯兔空返，独无相馈。以此言之，诚可知也。”兔闻讥议，谓狐、猿曰：“多聚樵苏，方有所作。”狐、猿竞驰，衔草曳木，既已蕴崇，猛焰将炽。兔曰：“仁者，我身卑劣，所求难遂，敢以微躬，充此一湊！”辞毕入火，寻即致死。是时老夫复帝释身，除烬收骸，伤叹良久，谓狐、猿曰：“一何至此！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之月轮，传乎后世。”故彼咸言，月中之兔自斯而有。后人于此建窞堵

波。

季羨林指出，在汉译佛典里，这个故事还多次出现。根据种种迹象，这个神话很可能就起源于印度，然后传入中国，写入屈原的著作中。那么，中印文化交流至少已有二千三四百年的历史。两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至今益盛，很值得两国人民引以为豪。这个观点，他后来又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中详加申述。他的讲话在当时的听众中，引起了师生的广泛兴趣，师生们把他围了起来，热烈地讨论中印文化交流的问题。有人甚至问到明代黄省曾的《西洋朝贡典录》这部书的情况。[47]

在印度的几次访问，季羨林游览了德里、孟买、象岛、阿旃陀、桑其、那烂陀、菩提伽耶、阿格拉、加尔各答、巴特那、新德里、科钦、特里凡得琅、科摩林海角、瓜廖尔、占西、博帕尔、班加罗尔、海德拉巴、尼克坦等许多著名城市，参观过泰姬陵等名胜古迹，结识了许多朋友。

到缅甸参观访问，次数不比到印度少。他对缅甸的印象有两方面，一是这里华侨多。仰光的主要街道上，甚至有挂满了中国字招牌的华侨聚居的广东大街，这里的中国味就像在国内一样浓烈，华侨们有的在这里已经住了几代，有的住了几十年，他们一方面同本地人和睦相处，遵守本地的法令，为这个国家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另一方面，他们又热爱自己的祖国，用最大的毅力来保留祖国的风俗习惯，只要祖国有人来，他们就热情招待。

二是仰光的大金塔。它是仰光的象征，在云霭缥缈之中，耸入蔚蓝的晴空，闪着耀眼的金光，这金光把周围的一切楼阁殿堂、一切人物树木都化成了黄金色，这金光仿佛弥漫了整个宇宙。季羨林曾赤着双脚，走过两旁摆满了花摊的长长走廊，一步步登上去，终于走到大塔前。脚踏在用大理石铺成的地面上，透心地凉，里边有大大小小的殿堂，有各种各样的佛像。善男信女们就长跪在这些神像面前，闭目合掌，虔心祷祝，有的烧香，有的泼水，有的供鲜花，有的点蜡烛，

有的口中念念有词，大概是在对佛爷说话。这些对于精通佛学的季羨林来说，都是十分有趣的。[48]

然而还有更为有趣的，那就是印度的神牛、鸽子和缅甸的乌鸦，这也都是和宗教信仰有关的。

1951 年季羨林第一次访问印度时，在加尔各答繁华的大街上第一次见到了神牛。

在全世界上似乎只有信印度教的国家才有这种神奇的富有浪漫色彩的动物。当时它们在加尔各答的闹市中，在车水马龙里面，在汽车喇叭和电车铃声的喧闹中，三五成群，有时候甚至结成几十头上百头的庞大牛群，昂首阔步，威仪俨然，真仿佛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它们对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对人类一切的新奇的发明创造，什么电车汽车，又是什么自行车摩托车，全不放在眼中。它们对人类的一切显贵，什么公子、王孙，什么体操名将、电影明星，什么学者、专家，全不放在眼中。它们对人类创造的一切法律、法规，全不放在眼中。它们是绝对自由的，愿意到什么地方去，就到什么地方去；愿意在什么地方卧倒，就在什么地方卧倒。加尔各答是印度最大的城市，大街上车辆之多，行人之多，令人目瞪口呆，从公元前就有的马车和牛车，直至最新式的流线型的汽车，再加上涂饰华美的三轮摩托车，和上下两层的电车，无不具备。车声、人声、马声、牛声，混搅成一团，喧声直抵印度神话中的三十三天。在这种情况下，几头神牛，有时候竟然兴致一来，卧在电车轨道上，“我困欲眠君且去”，闭上眼睛，睡起大觉来。于是汽车转弯，小车让路，电车脱离不了轨道，只好停驶。没有哪一个人敢去驱赶这些神牛。[49]

这种奇观来自于印度教中的神牛崇拜。印度教又称“新婆罗门教”，是 4 世纪前后，由婆罗门教吸收佛教、耆那教等教义和民间信仰演化而成。据印度教传说：毁灭大神湿婆，在喜马拉雅山上修成无边法力，然后跨上一头白色的雄牛，到处惩恶扬善。印度教徒一看到牛，就自然会想到湿婆大神可能正骑在牛背上，因此牛在印度教徒的

心目中就成了神的象征。有的人特意在自己家门口放上牛爱吃的食物，引牛光顾；有人甚至喝牛尿，以“净化”自己的身心。这样看来，大街上牛的悠然自得，就十分自然了。

就在这一年，季羨林在缅甸仰光看到的乌鸦之多，使他感到无限惊异，他相信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会有这么多的乌鸦，原因在于：

据说，缅甸人虔信佛教，佛教禁止杀生到了可笑的地步。乌鸦就乘此机会大大地繁殖起来，其势猛烈，大有将三千大千世界都化为乌鸦王国的劲头。[50]

在离仰光不太远的伊洛瓦底江口，季羨林看到了生平第一次见到的最大的乌鸦群，大约有几万只，停泊在江边，大小船的桅杆上、船舱上、船边上，到处都落满了乌鸦，漆黑一片。除陆上的之外，空中盘旋的更多，数目甚至要超过地上的几倍，简直就是乌鸦的世界，乌鸦的天堂，乌鸦的乐园。甚至在清凉宫、哈奴曼多卡古王宫里，季羨林也看到大群的乌鸦，唢哨一声，王宫宝塔的背面飞出一大群，一片黑影遮蔽了半个天空，又是唢哨一声，一下子又飞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这可真够季羨林惊奇的。

然而还有更惊奇的。那是 1985 年 3 月，他去印度新德里参加《罗摩衍那》的作者蚁垤的国际诗歌节，住在一家五星级饭店的第十九层楼。一天，他去开会，走时忘了关窗子。回来时一开门，听到有鸽子咕噜咕噜在叫，原来是两只野鸽，乘屋里没有人的时候，到房间里来做了不速之客。两只野鸽就在沙发下面亲热着，谈情说爱，卿卿我我，看到人来，竟也无动于衷，丝毫没有想逃避的意思，更没有一点内疚之感。原来是印度人决不伤害动物，野鸽对人也从来不怀戒心，习惯于和人和平共处。从这里他悟出：古今中外有些哲人主张人与大自然浑然一体，人与鸟兽和睦相处，相向无猜，谁也离不开谁，谁都在大自然中有生存的权利。对此，他感慨很深，说：

我是衷心地赞成这些主张的。即使到了人类大同的地步，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同过去完全不同之外，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其中

也包括人与鸟兽的关系，也应该大大地改进。我不相信任何宗教，我也不是素食主义者。人类赖以生存的动植物，非吃不行的，当然还要吃。只是那些不必要的、损动物而不利己的杀害行为，应该断然制止。[51]

类似于在印度缅甸见到的神牛、乌鸦、野鸽，在尼泊尔这样的国家，季羨林也碰到过。

3. 苏联塔什干之行

1958年到苏联塔什干参加“亚非作家会议”时，已是秋天。

塔什干是当时苏联东方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现在为独立的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人口居全苏第四，面积居第三。这是一座既古老又年轻的城市，为了迎接亚非作家会议的召开，城市穿上节日的盛装，大街上，横过马路的成百成千红色布标，用中文、俄文、乌兹别克文、阿拉伯文、日文、英文以及其他文字，写着欢迎祝贺的词句：祝贺亚非人民大团结，祝亚非人民之间的友谊万古常青。成千上万的灯盏将城市装扮成不夜城。季羨林和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就住在纳瓦依大剧院旁边专为召开亚非作家会议而新建的富有民族风格的塔什干旅馆。里边全是崭新的现代化设备，外表却保留着民族风格。墙壁是淡黄色的，最高的一层看来像个凉亭。整个建筑给人的印象是朴素、幽雅、美丽。

会议开幕的那天，代表们从塔什干旅馆出来，到纳瓦依大剧院开会。路上受到塔什干人民非常热烈的欢迎，握手，签字，拍照，到处是一片热闹景象。会场里，气氛更为热烈。

气氛本来就非常热烈的大会会场，现在更热烈了。成千成百的红领巾分三路涌进会场的时候，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一队红领巾走上主席台给主席团献花。这一队红领巾里面，男孩女孩都有，最小的也不过五六岁，还没有主席台上的桌子高；但也站在那里，很庄严

的朗诵诗歌；头上缠着的红绿绸子的蝴蝶结在轻轻地摆动着。主席台上坐着来自三四十个国家的代表团的团长，他们的语言不同，皮肤颜色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但是现在都一齐站起来，同小孩子握手拥抱，有的把小孩子高高地举起来，或者紧紧地抱在怀里。对全世界来说，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象征，它象征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大团结。我注意到许多代表感动得眼里含着泪花。[52]

开幕式之后，每天的会议都是在纳瓦依大剧院进行，代表们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发言，愤怒控诉殖民主义的罪恶，呼吁世界和平。

季羨林在塔什干住了近三个星期，会议结束之前，又到哈萨克加盟共和国（现在为独立的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访问了五天，之后又回到塔什干。

塔什干是一座有名的葡萄城。葡萄架比遍地都是的玫瑰花还多，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架葡萄，撑在房子前面。葡萄品种据说有一千多种，而且都是优良品种。秋天正是葡萄熟了的时候，家家门口或小院子里，都累累垂垂地悬挂着一嘟噜一嘟噜的葡萄：黄的、红的、紫的、绿的、长的、圆的；大小不同，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形状，像是一串串各色宝石。每天的餐桌上都有肥美的葡萄，季羨林觉得其味道是无法形容的，语言文字仿佛失掉了作用，可以说它像山东肥城的蜜桃，像江西南丰的蜜桔，像广东增城挂绿的荔枝，像沙田的柚子，像各种各样最甜最美的水果，但又不全像这些东西，它就是它，塔什干的葡萄。

吃着葡萄，季羨林的思绪又飞到了中外文化交流的主题。

这一种个儿不大的果品还让我们回忆起历史，把我们带到遥远的古代去。在汉代，中国旅行家就已经从现在的中亚细亚一带地方把这种绝妙的水果移植到中国来。移植的地方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塔什干呢？我不能不这样遐想了。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二千多年以前葡萄通过绵延万里渺无人烟的大沙漠移植到东方去的情况，想到我们同这一带地方悠久的历史关系，想到当年横贯亚洲的丝路，成捆成捆的

中国丝绸运到西方去，把这里的美女打扮得更加美丽，给这里的人民带来快乐幸福。就这样，一直想下来，想到今天我们同苏联各族人民的万古常青牢不可破的兄弟般的友谊。我心里面思潮汹涌，此起彼伏。我万没有想到这一颗颗红色的、黄色的、紫色的、绿色的宝石，竟有这样大的魔力，它们把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一幕一幕地活生生地摆在我的眼前。……[53]

这也正是一个文化使者出访异域的任务所在。当他即将要离开塔什干回国之时，他怀了惜别的心情，站到旅馆五层楼的凉台上，想把这里的東西再多看上一眼，把对塔什干美好的印象牢牢地带回国去，把塔什干会议的精神带回国去，让中外人民的友谊像永不凋谢的鲜花一样，永远散发芳香。

4. 西亚、非洲的访问

1962年，季羨林访问了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1964年，访问了埃及、阿尔及利亚、马里和几内亚，结果是写成了散文《处处花开夹竹桃》、《战斗吧，非洲！》、《在兄弟们中间》、《马里的芒果城》、《巴马科之夜》、《科纳克里的红豆》、《五色梅》等名作。

在伊拉克，季羨林和吴晗、白寿彝等代表团成员一起参加巴格达建城一千二百周年庆典，受到当时伊拉克总理的接见，和巴格达市长会谈，参观《一千零一夜》里巴格达窃贼逍遥过的街区，凭吊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流域经历千古风云的遗迹，漫步巴格达鲁沙非沿江大道，聆听渔舟唱晚，品尝底格里斯河的烤鲜鱼，还游览美索布达米亚中部平原的椰枣林，[54]……然而最使他难忘的，还是巴格达市的夹竹桃。因为夹竹桃把他和巴格达与关于童年故乡的回忆联系到一起了。

在巴格达，这个别具风格的城市里，季羨林看到了说不出有多么古老的底格里斯河，也看到了最现代化的摩天大楼；看到了最新式的

美国豪华汽车，也看到了《一千零一夜》中描绘的那种驴子。驴子没有鞍子，没有缰绳，光溜溜什么也没有，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骑在上面，手里只拿一根小棍，就用这仅有的武器，在现代化的汽车洪流中，指挥着以执拗闻名全世界的驴子，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竟像指挥自己的两条腿一样。在巴格达的街头、巷尾、旅馆、会场，代表团一行感到的都是伊拉克人民的温暖和热情。而季羨林正从内心里感激伊拉克人民热情的招待时，蓦然一抬头，会看到一团绿蜡似的竹子、红霞似的花朵，他的眼睛顿时一亮，仿佛闪起了一片光：这不是老朋友夹竹桃吗？一看到这自己熟悉的夹竹桃，仿佛又遇到了知己，身处异域的感觉会一扫而光。

几天之后，季羨林又来到开罗。开罗也是一座别具风格的城市，尼罗河纵贯全城，波光帆影与摩天大楼相映成趣。夜里，霓虹灯把尼罗河照成一条火龙。博物馆里充满了巨大的石棺和古代帝王的木乃伊，又把他的思维带回到四五千年以前。在这里，同在伊拉克、叙利亚一样，阿拉伯人相信圣先知穆罕默德的一句话：学问即使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中阿友谊确是古老，又深入人心的。

在离开罗不远的苏伊士运河边，季羨林又看到了家乡的那种夹竹桃：叶子特别大，枝干特别粗，绿油油地长成堆，长成团，花朵虽不多，却红艳异常，朝霞似地在高高的枝头上闪闪发光。于是，一个连贯的、不再是隐隐约约的感觉终于形成了：夹竹桃遍天下，我们的朋友也遍天下。[55]

在埃及，季羨林还访问了塞得港，感受到埃及人民一团温暖热情的气氛。

到阿尔及利亚，季羨林进行了七天访问，阿尔及尔、君士坦丁、奥兰等城市都留下了他的游踪，接触过政府要员、军队军官、大学校长和教授、中学教员、工人、农民，还有十几岁甚至七八岁的孩子。他们用法语交谈，处处感到中阿人民之间的友谊。而在寓所的感受是更为深刻的：

每当傍晚，我们访问完毕回到我们所住的人民宫的时候，这幸福的感觉总变得更加浓烈。这是一座极大的花园，这里正盛开着月季花、藤萝花，还有一些不知名的花。月季花朵大得像中国农民吃饭用的大海碗；藤萝花高高地挂在树顶上，一片淡紫色的云雾，看样子像是要开到天上去。整个园子里高树浓荫，苍翠欲滴；姹紫嫣红，一片锦绣。在胜利以前，这园子是外国统治者居住的地方，是不许阿尔及利亚人进来的。欣赏这些美妙绝伦花木的只是那些骄横恣睢的眼睛。花木有灵，也会负屈含羞的。然而现在住在这里的却是中国兄弟。于是这些花木棵棵都精神抖擞，摇摆着花枝，毫不吝惜呈现出自己的美丽，来迎接我们。古树仿佛更绿了，月季花的花朵仿佛更大了，藤萝也仿佛更想往高处爬。浓烈的香气使我们陶醉。连喷水池里琤琮的流水声都像是在那里歌唱我们的兄弟情谊。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回想到白天里遇到的一切人、一切事，幸福的感觉仿佛在我心里凝结了起来，久久不能入睡。这时花香透过窗帘涌了进来，把我送入梦中。

[56]

从阿尔及利亚，季羨林一行又来到了马里。马里首都巴拿科和著名芒果城珂里可乐，都使他终生难忘。

马里是一个气温极高的非洲国家，中午大约要有摄氏五十度的高温，骄阳就像是一个大火轮，高悬中天，把炎热洒向大地，洒向一切山之巅，一切树之丛，一切屋顶上，一切街道上，整个大地仿佛是一个大火炉。就在这样的气候之下，季羨林他们在体育场参加非洲青年大会，听身着戎装的青年们振臂高呼控诉殖民主义滔天罪行的口号。他们还参加中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参加马里朋友举行的招待会。

在芒果城珂里可乐，在临近尼日尔河的榨油厂和造船厂参观。这里，数人合抱的木棉高耸入云，树上开满了大朵的花。还有一种不知名的树，也开着大朵的红花，远远望去，像是一片朝霞，一团红云，像是落日的余辉、燃烧的火焰，把半边天染得通红。地上落满了红花，他们就踏着这些花去参观，感受马里人民的热情与友谊。[57]更

难得的是那巨大的芒果树，肥大的果实挂满枝头，浓黑的阴影铺在地上，整个公路两旁都是这巨大的芒果树。离开珂里可乐的时候，他们在一棵高大的芒果树下和这里的人民告别，一个老妇人操着邦巴拉语突然冷不防从一个芒果摊子旁边飞跑过来，和中国客人告别。

回到巴马科，在经过一天的炎热之后，终于迎来了夜晚。巴马科之夜是平静的，平静得像是一潭止水，令人想不到身处闹市之中，炎阳已经隐退，可气温仍在摄氏四十二度左右。

季羡林在这里又一次看到了中外人民友谊的象征，那就是甘蔗和茶树。过去殖民主义者曾大吵大嚷，说要帮助马里人民种茶树和甘蔗，结果，钱花了无数，人力费了无数，却不见茶树和甘蔗的影子。而中国专家不声不响，终于让甘蔗和茶树在马里生了根。细长的甘蔗和矮矮的茶树，同高大的芒果树长在一起，浓翠相连，浑然一体，成为中马两国人民永恒友谊的象征。

有一天夜里，代表团的几个成员在中国大使馆小院里闲谈，周围是一些不知名的花树。他们刚一坐下，就有一股幽香沁入鼻中，像是桂花。闻着这像桂花的香气，季羡林的心一动，立刻有一股乡思涌上心头。本来是平静的心，竟有点乱起来了。乡思很难说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是使人愉快的，还是使人痛苦的。[58]

乡思并没有结束，飞机把代表团送到了非洲的最后一站几内亚。在几内亚，代表团一住就是两个星期。

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城市，是大西洋岸边的明珠，黑非洲土地上的花园。白天，这里有水光潋潋的波光，夜晚，有如万壑松声、万马奔腾似的浪涛声。芒果树长满了大街小巷，一棵棵参天的棕榈，直插云天，最难得的是科纳克里的红豆。

在一个星期日的傍晚，代表团成员到科纳克里植物园去捡红豆。中国人对于红豆向来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送给它一个异常美妙动人的名字：相思子。王维还有一首诗：

红豆生南国，

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
此物最相思。

这都会勾引起人们无限的情思，脑海里浮起一些美丽的联想。他们来到红豆树下，在枯黄的叶子中，干瘪的豆荚上，红豆火焰似地鲜红，像撒上了朱砂，像踏碎了珊瑚，闪射出诱人的光芒。这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正当我们全神贯注地捡着红豆的时候，蓦地听到有人搓着拇指和中指在我们耳旁发出了清脆的响声。我们抬头一看：一位穿着黑色西服、身体魁梧的几内亚朋友微笑着站在我们眼前。这个人好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我们脑海里像打了一个闪似地，立刻恍然大悟：他就是塞古·杜尔总统。原来他一个人开着一部车子出来闲逛。来到植物园，看到有中国朋友在这里，立刻走下车来，同我们每个人握手问好。他说了几句简单的话，就又开着车走了。[59]

他们手里的红豆仿佛增加了份量，增添了鲜艳。科纳克里的风物之美，这里人民的心地之美，仿佛都集中到这一颗颗小小的红豆上面了。它仿佛就是几内亚人民对中国人民深情厚意的结晶，连大西洋的涛声、芒果树的浓影，也都反映到这些小东西上了。

科纳克里既是海之城、树之城，又是花之城。处处都是各种各样的花，就连代表团住的院子里，也开满了花，高大的树上挂着大朵的红花，篱笆上爬满了喇叭筒似的黄花，地上铺着粉红色花，烂漫纷披，五色杂陈。这些花季羡林都是第一次看到，颇有“看花苦为译秦名”之感。有一天，他忽然发现了花园众花丛中有几株五色梅，虽被挤压得有点喘不过气来，但仍然昂首怒放，开得兴致淋漓。

季羡林从小种过五色梅，所以在这里见到它，觉得十分顺眼，感到十分愉快，他几乎连想都没有想，就直觉地认为它是从中国来的，感到自己是他乡遇故知，大有恋恋难舍之感了。

花木自古以来就是四海为家的。天涯处处皆芳草，没有什么地方

没有美丽的花朵。原生在中国的花木传到了外国，外国的花木也传到了中国。它们由洋名而变为土名，由不习惯于那个最初很陌生的地方而变得习惯。在它们心中也许还怀念着自己的故乡吧；但是不论到了什么地方，只要一安顿下来，就毫不吝惜地散发出芳香，呈现出美丽，使大地更加可爱，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采。[60]

季羨林还到金迪亚去访问，沿途山青水秀，柳暗花明，路多长，几内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就有多长。那些金黄色的大桔子，像马头那样大的不知名的水果，都引起他们的注目。

西亚、非洲之行结束了，但中外人民的友谊却永远地留在了季羨林的心里。

5. 日本的三次出访

季羨林于 1980 年有一次，1986 年有两次访问日本，其中的两次是日本友人室伏佑厚先生安排的，1986 年的另一次是率代表团赴日本赠书。主要经历是室伏佑厚先生安排的这两次访问，所去的地方有东京、京都、箱根等地，他在这些地方真实地摸到了日本人民的心：中日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的心。

季羨林自己说过：他对日本没有什么研究，又由于过去在济南遭受日本人欺凌的个人经历，对日本没有什么好感。但通过这两次访问，他改变了看法，通过与室伏佑厚一家的交往和对京都诗仙堂、箱根的参观，他仿佛真正看到了日本人的心。[61]

室伏佑厚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早在 1959 年，他就作为日本首相的私人秘书，陪同前首相石桥湛山来中国，与周恩来商谈中日建交的问题。从那时到现在，他已来华一百多次了。他的大女婿三友量顺博士是研究梵文和佛典的，他和他的二女儿法子和三友曾于 1970 年代末又一次来华。两个孩子访问北大，拜访了季羨林，当天晚上，便由室伏佑厚先生做东，在北海仿膳堂聚会。这之后，他便和

季羨林有了多次联系，并于 1980 年邀季羨林访日，在日费用全由他负担。

在东京，季羨林下榻在新大谷饭店。在这里的重要经历是第一次见到了日本梵文和佛学权威、蜚声世界学林的东京大学教授中村元博士。中村元比季羨林小一岁，是宇井伯寿、和辻哲郎的弟子，著述宏丰，已出版《中村元选集》二十巨册，获得过日本文化勋章。其《比较思想论》中文版出版后，颇受中国学界推重。中村元对季羨林非常尊重，以兄事之。他经常倾囊购书以致经济拮据的佳话，使季羨林深受感动。

在东京，季羨林应邀到早稻田大学作了一次“东洋人之心”的学术讲演。在万丈红尘的东京住了几天之后，便在室伏先生和法子的陪同下乘新干线去京都参观，中村元已在那里等候。

京都是日本的故都，各种寺院不少于一千五百所。在京都的活动有两项：一是参观寺院，有名的寺院都到了；二是参加日本国际佛教讨论会，会见日本著名佛教学者。他印象最深的是在寺院里见到了一位一百多岁的老僧，谈话中，开口闭口总是提到李鸿章。季羨林对寺院的印象也很深：

在参观佛教寺院时，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在日本当和尚实在是一种福气。寺院几乎都非常宽敞洁净，楼殿巍峨，佛像庄严，花木扶疏，曲径通幽，清池如画，芙蕖倒影，幽静绝尘，恍若世外。有时候风动簷铃，悠扬悦耳，仿佛把我们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去，西方的极乐世界难道说就是这个样子吗？[62]

然而印象更深的是从京都到岚山的路上，在有名的“诗仙堂”里的所见。根据日本学者林罗山在 1643 年所写的《诗仙堂记》记载，创建人是 1583 年出生的石川丈山，他自然是著名的文人和书法家，受过中国文化很深的熏陶，能写汉诗。到 56 岁时，石川辞官建诗仙堂，将中华诗人 36 位的小像刻在壁上，并写诗各一首于像侧。36 位诗人是：宋陈与义、黄庭坚、欧阳修、梅尧臣、林逋，唐寒山、杜

牧、李贺、刘禹锡、韩愈、韦应物、储光羲、高适、王维、李白、杜审言，晋谢灵运，汉苏武，晋陶潜，宋鲍照，唐陈子昂、杜甫、孟浩然、岑参、王昌龄、刘长卿、柳宗元、白居易、卢同、李商隐、灵澈，宋邵雍、苏舜钦、苏轼、陈师道、曾几。选择的标准并不明确，排列也不严格，既选有隐逸诗、僧人诗，也有儒家诗、官吏诗，花样颇多，总的倾向是符合石川的隐逸心情。36位诗仙都是中国著名诗人，可见中国诗歌对石川影响之大，可见他沉浸于中国文化之深。

在诗仙堂中其他的轩堂里，还可以看到石川手书的《朱子家训》和“福禄寿”三个大字、“既绝”两个大汉字。石川深通汉诗，酷爱中国儒家思想。从诗仙堂整个气氛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文化了解之深、热爱之切。我相信，今天来这里参观的中国人，谁都会萌发亲切温暖之感，自然而然地想到中日两国文化关系之源远流长，两国人民友谊之既深且厚。回天无方，缩地有术，诗仙堂仿佛一下子把我带回了祖国，不禁发思古之幽情了。[63]

诗仙堂的大门用竹竿编成，门旁的石碑上，镌刻着三个汉字：诗仙堂。门上有匾，横写三个汉字：小有洞。门内是石阶，尽处是木结构房子。园子不大，但房屋整洁，结构紧凑，庭院中有小桥流水，通幽曲径，枝头繁花，水中涟漪，林中鸟鸣，幽篁蝉声，使季羡林一下子仿佛回到了祖国，置身于江南名园之中，进入了一个清幽的仙境。小园中的中国味是那么浓烈，什么啸月楼、残月轩、跃■轩、老梅关，到处是汉字匾额、堂名、轩名、楼名。这对他来说，无一不亲切，无一不熟悉，心中油然升起故园之情。

寺院中印象最深的还有设在京都附近奈良市的唐招提寺。这是唐代中国和尚鉴真主持过的有名寺院，现仍保留着初建时期的金堂、讲堂，还有鉴真和尚夹纆坐像和不少木雕佛像群。在这一座清静肃穆的大寺院里，到处是扶疏的花木，掩映的竹石，宛然一处人间仙境，但季羡林心中却只是思潮腾涌，片刻不停，上下数千年，纵横数千里，遍照三世，神驰四极，对眼前的景物有时候竟视而不见。他看到的只

是日本人民男女老少成群结队，怀着极端虔敬的心情，到这里来参谒，他们面容严肃，脚步轻轻，唯恐惊扰鉴真高僧。鉴真为日本人民的利益，牺牲自己的一切，把他认为能济世度人的佛法传到日本去，去日时，他在船中受难七十余次，终因海风侵袭双目而成盲圣，到今天他圆寂已经一千多年，但他仍然活在日本人民心中，天天受到他们的礼敬。[64]

到箱根之后，季羨林他们住在王子饭店，受到室伏佑厚先生一家的盛情款待，游览了芦湖。当时，已是晚饭过后，万籁俱寂，月色迷蒙，缕缕白烟像柳絮一般缓缓飘来，又像白练浮空，伸手即可抓到，这使他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仿佛遨游在阆苑仙宫之中。同来的中村元博士告诉季羨林，日文的“箱根”，实际上就是中文的“函谷

（关）”。两次在箱根游览，自始至终都有中村元和室伏佑厚先生一家陪同，季羨林感到是一种幸福。室伏先生的外孙女叫朋子，是取自“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这句中国话。这更使季羨林感到日本人民对中国感情之深，想在小孩子心中也埋下中日友谊的种子。

对日本这样一个国家，季羨林感到既陌生，又熟悉；既有神话，又有现实；既属于历史，又属于当前；既显得很远，又显得很近；既令人惊诧难解，又令人感到顺理成章。最重要的是通过访问，他看到了日本人民的心。他们几乎都有一颗对中国人民诚挚的心。他们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曾经帮助过日本这一件事，表示由衷的感谢；对于后来极少数军国主义者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又表示真诚的内疚。季羨林多次为这样一颗颗的心而感动。他感到，从我们中国人嘴里说出的和耳朵里听到的“中日人民世代友好下去”这一句话，表示了我们中日两国人民的真诚愿望，绝不只是一句口号，更不是一句空洞的话。[65]

从三次对日本的访问中，从和室伏佑厚一家的交往中，从和中村元等人的交谈中，季羨林不仅真正地希望，而且真正地相信，中日两国人民都能互相看到对方的心，对中日人民世代友好下去这句

话，他馨香祝之。[66]

6. 泰国的皇宫和韩国的汉城（今首尔）

访问泰国是 1994 年的事。访问由一系列的活动组成。

季羨林先在曼谷东方文化书院作“天人合一”的讲演，受到与会者如郑彝元等先生的发言支持。然后，在陈贞煜博士、郑彝元博士的陪同下参观了泰国法政大学、朱拉隆功大学，出席了郑午楼博士举办的盛大欢迎宴会。

季羨林作为贵宾，参加了华侨崇圣大学的开学典礼。出席者多为各方显贵、各国驻泰国使者，因此场面极为庄严隆重，又因为国主要御驾莅临，更使场面的气氛紧张而又热烈。在这次会上，季羨林由陈贞煜博士介绍，先和德国驻泰国大使用德国茄门话寒暄，又与印度驻泰国大使用英文聊天。之后又由郑午楼介绍给国王陛下。

最让季羨林感怀的是参观皇宫。因为他到过四十多个国家，看到的皇宫不少。北京的故宫自不用说，印度仅莫卧儿王朝皇宫，就看过两个：阿格拉的红堡和德里的红堡。红堡都是用红色岩石筑成，建筑风格是伊斯兰式的，简单明了，线条清晰，令人一目了然，毫无拖沓繁复浓得化不开之感；所有拱门，不论大小，所有窗子，不论大小，上端都是桃形，也是典型的伊斯兰风格。在俄国，有克里姆林宫；在德国，有弗雷德里希大帝的“无忧宫”，他也都看过。

各国皇宫都有各自的特点，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它们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中国皇宫气象万千，巍峨雄伟，大气磅礴，庄严威武，惊心动魄，可远观而不可亵玩，属于阳刚之美。无忧宫和红堡，气势稍差，格局狭隘，可以近观而不宜远望，雕梁画柱，墙上、柱上，镂金错彩，镶宝嵌玉，盈尺之中，有无限风光在，差堪归诸阴柔之美。而到泰国皇宫门口之时，在潜意识中对各国皇宫加以对比，产生了一种德国接受美学学派所说的“期望视野”，隐隐约约地想找到类似于中

国故宫的东西。

我脑海里似乎就晃动着北京故宫的影像，上面还罩上了一层极薄极薄的无忧宫和红堡的影子。踏进了大皇宫的大门，然而，第一个印象就带给我了一点淡淡的失望：宫门一不巍峨，二不精致，只是比普通邸宅的大门大了一些，不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走了进去，庭院也并不宽敞。这同我的期望，即使是朦胧的期望吧，是有极大的距离的。我真感到失望，感到落漠（寞）。然而，当我走近一些宫殿时，我看到一些柱子上镶嵌着宝石之类的东西，闪出了炫目的光辉。墙壁上则彩绘着壁画，烟云缭绕，宫阙巍峨，内容多半是《罗摩衍那》中的故事。原来泰国王室与罗摩有什么渊源，所以印度古代英雄罗摩十分受到崇敬。皇宫里壁画上画着罗摩的故事，也就丝毫不足怪了。我的眼前豁然开朗，目为之明，耳为之聪，深悔刚才的失望与落漠（寞）了。[67]

之后是走进崇高宏伟的玉佛宫。这里金碧辉煌，香烟缭绕，殿非常高，仰头上望，宛如走进欧洲哥特式大教堂，藻井高悬云端，一尊庞大的玉佛，高踞在神龛里，慈眉善目，溢满慈悲。季羨林眼看着陈贞煜博士跪在大理石的地上礼拜佛，他自己虽然不信任何宗教，但对真诚信仰任何宗教的人都怀有敬意，除了个别的阴森古怪的邪教外，任何宗教都是教人做好事的。像陈贞煜博士这样一位泰国知名政论家及法学者，历任泰国法官、法政大学校长、法学院院长、国会议员及制宪委员，担任着世界薄伽梵圣诗联盟副主席、法政大学教授，精研法律哲学、民法及比较法，对孔子学说也有独到见解，但他照样也在这里虔诚地礼佛，而季羨林坐在大理石地上，立即也感到神清气爽，颇能分享大殿中跪在地上的善男信女的天福了。[68]

在曼谷，季羨林还参观了杨海泉开办的泰国北榄鳄龟湖动物园和周镇荣创建的奇石馆。泰国的华侨华裔，知名者颇不少，郑午楼博士是公认的华人领袖，著名银行家、慈善家，曾荣获泰国御赐一级白象大绶勋章。他通晓泰、中、英文，担任过泰国银行公会主席、泰国国

家文化委员会委员，泰国中华总商会和美国旧金山潮州会馆永远名誉主席、会长。他还热心倡导中华文化，对泰华侨社会有重大贡献。郑彝元博士也热中国文化研究，著有《儒家思想导论》，是海外研究儒学的重要著作。杨海泉和周镇荣自然也是华人中的佼佼者。这些著名华人，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

绍述文化今鉴古——

卿云霭霭，邹鲁遗风。

作圣齐贤吾辈事，

民胞物与，人和政通。

世变沧桑俱往矣！

忠荇毋我，天下为公。

静、安、虑、得，勤观照，

辉煌禹甸，乐见群龙。

忠孝礼义仁为本，

发聩启聩新民丰。[69]

从杨海泉先生的这首词里，季羨林看到了泰国华人的奇迹般的伟大事业，给寰宇的炎黄子孙增添了光彩，给世界文化增添了光彩，给炎黄文化增添了光彩，给泰华文化增添了光彩。他由衷地感激他们。

季羨林的两次韩国之行，都是到汉城（今首尔）。不论是 1991 年中韩建交以前的那次，还是 1995 年的这一次，他对汉城的记忆，不用粉刷，依然如新，情景巨细，历历在目。韩国经济腾飞之迅猛，工业技术之先进，农村田畴之整齐，山川草木之葳蕤，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汉城的摩天高楼耸入蓝天，马路上车水马龙，日夜不息。深夜灯火光照夜空，简直可与东京有名的银座相比，更令他难忘的是韩国人民之彬彬有礼，韩国朋友之眷眷情深。但是，金俊烨博士的盛情款待也好，汉城的美丽、繁华也好，虽免不了增加他内心的激动，可在他的心灵深处涌现出来的，却是怀乡思家之情，其势汹涌澎湃，不可抗御。[70]

这一切都说明，不管是在德国的十年，还是四十多个国家的亚、非、欧三大洲访问，外国再好，也不如自己的祖国，这又应了季羨林的那句话：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的祖国母亲。越是在和祖国文化联系多的外国城市，越容易勾起他的思乡思家之情，在汉城一切美景似乎都吸引不住他，就是这种怀乡思家之情在作怪。他的根在中国，因此他最近几年立下宏愿大誓：除非万分必要，不再出国。他更愿意去的地方，是祖国各地，家乡故里，那里留下了他更多的足迹。

四、华夏足迹

1. 祖国各地

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长白山麓，敦煌石窟，香港澳门，家乡故里，……都留下了季羨林的足迹。他去祖国各地，或是参加重要学术会议，或是应邀讲学。

季羨林所到之地，不管是大西南的昆明、西双版纳、石林，还是大西北的天池、火焰山、敦煌；不管是东北的长白山、延吉，还是西北的西安、兰州；不管是华南的香港、深圳、澳门，还是华东的上海、南京、绍兴，还是华北的北戴河……，他都一往情深，对祖国大好河山倾注了无比的热爱，他歌颂过春城昆明、鬼城丰都、上海的菜市场、瑶琳仙境的富春江、延吉风情、陕西扶风县的法门寺，还有黄山、石钟山、虎门炮台……

尽管各地风景各异，姿态万千，但季羨林都能从中读出一片爱国心，读出一片自豪感。

在西双版纳，他爱那里的清晨，爱那里的月夜，爱那里的白云，爱那里的青山：

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北方正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这里却

风和日暖，花气袭人，大概只能算是一个春季吧。我最爱这里的清晨。当一百只雄鸡的鸣声把我唤出梦境的时候，晓星未退，晨星正浓。各种各样花草的香气，在雾中仿佛凝结了起来，成团成块，逼人欲醉。我最爱这里的月夜，月光像水一般从天空中泻下来，泻到芭蕉的大叶子上，泻到累累垂垂的木瓜上，泻到成丛的剑麻上，让一切都浸在清冷的银光中。芭蕉的门扇似的大叶子，剑麻的带锯齿的叶子，木瓜树的长圆的叶子，阴影投在地上，黑白分明，线条清晰。我最爱这里的白云，舒卷自如，变化万端，流动在群山深处，大树林中；流动在茅舍顶上，汽车轮下。它给森林系上腰带，给群峰戴上帽子。每当汽车驶入白云中的时候，下顾溪壑深处，白云仿佛变成了银桥，驮着汽车走向琼楼玉宇的天宫。我最爱这里的青山。簇簇拥拥，层层叠叠，身上驮满了万草千树，肚子里藏满了珍宝奇石，像是一条条翠绿的玉带，环绕着每一个坝子，千峰争秀，万壑竞幽。——我最爱这，我最爱那，我最爱的东西是数也数不完的。[71]

在绍兴，季羨林在鲁迅小时候的天堂——百草园里，看到的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东西和地方，但他觉得这些都是极其不平常的东西和地方，这里的每一块砖、每一寸土、桌子的每一个角落、椅子的每一条腿，鲁迅都踏过、摸过、碰过，他从这些东西想到了鲁迅那战斗的一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仿佛成了一块铁、一块钢、一块金刚石，刀砍不断，石砸不破，火烧不熔，水浸不透，凛然立于宇宙之间，给人带来无限的鼓舞与力量。[72]

在敦煌，季羨林虽然没有看到崇山峻岭，幽篁修竹，看到的只不过是几个人合抱不过来的千岁老榆树，高高耸入云天的白杨，金碧辉煌的牌楼，开着黄花、红花的花丛，但给他的印象却是沙漠中的绿洲，戈壁滩上的明珠，一片淡黄中的浓绿，一个不折不扣的世外桃源。他看过了敦煌莫高窟的千佛洞，那种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五光十色、云蒸霞蔚的景象；想到的是艺术家们前后共画了一千年，不知流出了多少汗水，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才给后人留下了这些动人心

魄的艺术瑰宝。一想到先人的这些业绩，总感到无比兴奋、震惊、感激、敬佩，他也想到今天在敦煌创业的几十位工作人员，他们在这偏僻的沙漠里，忍饥寒，斗流沙，艰苦奋斗，十几年，几十年，为祖国，为人民立下了功勋，为世界上爱好艺术的人们创造了条件，使敦煌学在世界上成为一门热门的学科。[73]

在兰州，他想到甘肃是我国文化宝库之一，敦煌的大名久已蜚声国际，而另一个宝库拉卜楞寺则国内、国际知者甚少，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实际上，那里收藏的大量藏文文献，不但是我国的国宝，而且是世界之宝。拉卜楞寺的建设和文物保护理应得到关心，使它同敦煌一样放射出辉煌的光芒。在兰州，季羨林参加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与全国第一次敦煌学术讨论会。在这次会上，有一种传言，说一位日本学者曾在南开大学的讲坛上说过“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话，引起中国学者的不满。会前会后有些学者之间发生了一些争论，有些地方上的代表希望确立他们从事敦煌研究的主导、核心地位，另外一些代表则认为，敦煌学作为一门全国性、世界性的学问，不能拘于一域。

季羨林在这次会上提出，日本学者的话虽然有偏，但却可以鞭策我们奋起、团结，努力开拓我国敦煌学研究的新局面，但不能因此也提出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地方主义的口号来。敦煌吐鲁番再加上古代藏文文献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的显学。几十年来，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确有成绩，但是同我们国家的地位比较起来，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全国各地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学者都有热切的愿望，要求组织起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团结协作，振兴中华。所以，他一再强调：“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此语一出，中外学者无不折服。经过审慎的努力，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多位学者，终于完成了国内学术界的大事，成立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使中国的敦煌吐鲁番研究在不远的将来，取得巨大的成功，为祖国争取更大的光荣。

[74]

在吐鲁番的火焰山下，季羨林看着百里戈壁，寸草不生，遍布沙粒。极目天际，不见人烟。阳光毫无遮拦地照射在这些沙粒上，每一粒都闪闪发光，仿佛在喷着火焰。火焰山上面没有一点绿的东西，没有一点有生命的东西。石头全是赤红色，从远处望过去，活像是熊熊燃烧的火焰，这不是人间的火，也不是神话中天堂里的火或地狱里的火，这是火焰已经凝固了的火，纹丝不动，但却猛烈；火焰不高，但却团聚。整个天地，整个宇宙，仿佛都在燃烧，人就处在这上达苍穹、下抵黄泉的大火之中。看着这一切，季羨林很不理解，为什么当年竟在这样一个酷热似地狱的地方建筑了一座高昌城，而唐朝玄奘，就在去西天取经途中路过高昌。玄奘当年在这里是什么情景，他想象不出，但他大概每天也就奔波于一片淡黄、一片酷热之中。他一时忍不住发思古之幽情，对玄奘的这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伟大功绩，备加称赞。[75]

季羨林畅游黄山，那里景色之奇丽瑰伟，使他大为惊叹，窃念大化造物，天造地设，独垂青于中华大地，那里的四大奇景：奇松、怪石、云海、温泉，松有迎客松、送客松、蒲团松、连理松、扇子松、黑虎松、团结松、飞虎松、双龙松、龙爪松、接引松，无不千姿百态，石破天惊，违反了一切树木生长的规律，把大根、小根、粗根、细根，一古脑地、毫不隐晦地、赤裸裸地摆在石头上，让人不得不称奇。怪石有名的就不可计数，什么虎头岩、郑公钓鱼台、莺谷石、碰头石、鲫鱼背、羊子过江、仙人飘海、仙桃石、蓬莱三岛、鹦哥石、飞鱼石、飞来石，……不一而足，五花八门，名目繁多，更为黄山增添光彩。云海有北海、西海、天海、前海、后海，再加上一进山就看到的温泉，组成了一幅黄山组画。只见它大则气势磅礴，神笼宇宙；小则玲珑剔透，耐人寻味，既有阳刚之美，又有阴柔之美，这真是灵气所钟。在黄山这样一个灵气所钟的地方，他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无比骄傲与幸福，他因此而更加热爱我们这块土地，更热爱我们这一个国家。[76]

到富春江边，季羡林很自然地背诵起从小就能背诵的梁代文人吴均的一篇名作《与宋元思书》：

风烟俱静，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峰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业务者，窥谷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束条交映，有时见日。

背到这里，他感到富春江也是天地的精英，是灵气之所钟，这样的瑶琳仙境，同样使他惊叹。祖国大地，江山如此多娇，他的幸福之感，骄傲之感，便油然而生。眼前的富春江，更增加了明丽，增加了妩媚，仿佛是一条天上的神江了。[77]

在深圳，季羡林参加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会，参观了深圳大学、沙头角、蛇口特区、西丽湖度假村、银湖度假村、深圳湖游乐园、香密湖度假村，以及当时全国最高的建筑 53 层的国贸大厦，他心潮起伏，思绪万端。他想的最多的是人们的思想必须赶上形势的发展，人的思想最容易保守，许多千百年来遗留下来的观念、想法，往往被认为是真理、准则，正确无误，甚至神圣不可侵犯，用不着改变，也改变不了。然而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世界却是日新月异，现在是大家都承认的“知识爆炸”的时代，知识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缩短，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必须改变旧观念、旧想法，接受新概念、新想法。[78]参观深圳，季羡林受到的启发是更新知识更新观念，以此激励自己不断进取，不断开拓。

2. 还乡时的快乐

对于自己的故乡临清、济南，季羡林更有无限的深情。

从六岁离开临清后，他虽也回去过，但时间极短，一直到 1982

年，他才真正到故乡畅游了一番。

在聊城，在临清，有许多事都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所见所闻，触目快意。他的心有时候激动得似乎要蹦出来。他一向热爱自己的家乡，热爱自己的祖国，一想到自己家乡的穷困，一想到中国农民之多、之穷，他就忧从中来。他曾用稿费捐助过家乡，但始终想不出什么办法，让他们很快地富裕起来，为此他不知经历了多少不眠之夜。这一次还乡，他忽然发现，他的家乡也可以说是全中国的农民富起来了的一个缩影，他觉得自己的家乡从来没有这样可爱过，自己的祖国从来没有这样可爱过，浓烈的幸福之感，油然传遍了他的全身。

在临清市招待所，他看到的是南国的青翠和红艳，再也没有过去的黄色和灰色。作为一个学者和教育家，他参观了临清一中和聊城师范学院之后，怎么也按捺不住自己兴奋的心情。临清一中的男女学生们坐在课桌旁，鸦雀无声地在学习，个个精神专注，在读着什么，写着什么，洋溢着青春的活力。聊城师范学院是聊城地区的最高学府，虽然还存在创业维艰的情况，还存在非常多的困难，甚至聊城这地方，有点闭塞，有点土气，学院很小，显得有点幼稚，生活条件有困难等等，但是闭塞中有开通，土气中有生气，有生气，就有希望，就有未来，微小中有巨大，幼稚中有成熟，未来的希望也就蕴藏于其中。因此，季羨林衷心祝贺聊城师范学院。他的这次还乡，是十分快乐的。

我真觉得，我的家乡是非常可爱的。我虽然不能同街上的每一个人都谈谈话，了解他们在想些什么，但是，从他们的行动上，从他们的笑容上，我知道，他们是快乐的，他们是满意的，他们是非常地快乐和满意的。我的眼睛一花，仿佛看到他们的笑容都幻化成了一朵朵的花，开放在我的眼前。笑容是没有颜色的，但既然幻化成了花朵，那似乎就有了颜色，而这颜色一定是红的。……于是我眼前就出现了一片繁花似锦的景象，灿烂夺目，熠熠生辉，残留在我脑海里的那种灰色，灰色，弥漫天地的灰色，一扫而光，只留下红彤彤的一片，宛

如黎明时分的东天的朝霞。[79]

对济南的感情同对临清一样深，这是他生活了十三四年的第二故乡，济南市的每个地方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大明湖、趵突泉、千佛山自不用说，北园、南关佛山街，都是他一往情深之地。他多次回到济南，并写下了怀念济南的人和事的文章，《我和济南——怀鞠思敏先生》、《怀念衍梁》、《怀念丁声树同志》、《忆念胡也频先生》、《我的老师董秋芳先生》、《何仙槎（思源）先生与山东教育》。从解放初期起，他就和何思源先生同为北京的山东中学校董会成员，念念不忘为山东教育出力。

1996年，在他八十五岁生日过后两个多月，他于10月11日又一次回到了济南，来参加为山东大学九十五周年校庆献礼举行的《传世藏书》赠书仪式。在赠书仪式上，他动情地说：我是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回到母校的，所以一方面是客人，一方面也是主人。回到故乡，回到母校，心里非常激动，古人说：少小离家老大还，乡音未改鬓毛衰，我现在可是乡音、鬓毛都改了呀。他把自己担任总编的《传世藏书》一百二十三巨册，赠送给自己的母校山东大学，为自己的母校建设提供了巨大的精神财富。

季羨林曾在1992年为临清一中校庆题词：

春风化雨

追踪杏坛

又在1995年为山东大学的《民俗研究》题词：

民俗研究之重要意义，隐而不彰者久矣。不意山大之《民俗研究》，竟能长时间继续出刊而又备受欢迎，谨以数语，以示祝贺。

[80]

2001年山东大学建校100周年，季羨林不仅为母校贺岁，而且亲临济南参加校庆活动，几乎累病了。他在《祝贺母校山东大学百年华诞》的纪念文章中深情地说：母校山东大学今年一百岁了。但是，我成为山大的校友却已经有七十五年了，是校龄的四分之三。这样的

人如今恐怕很少见了。

1926年，他考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当时的山大校长是山东省教育厅厅长前清状元王寿彭。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一次祭孔典礼。全体高中学生都集合在山东大学校本部。大门好像是对着正觉寺街。校内有金线泉，距趵突泉不远。当时庭院深深，他自己不知置身何处。当时主祭人是奉系军阀山东掖县人张宗昌，陪祭的有王状元等，都穿着长袍马褂，行三跪九叩礼，气氛极其庄严肃穆。他虽年幼无知，涉世不深，却在心里默默地感到好笑。特别是那一位长得五大三粗的“狗肉将军”山东督军张宗昌，平日无恶不作，奸淫妇女，那时却俨然一副正人君子、圣人之徒的模样，满脸正气，义形于色，让他更是感到十分滑稽可笑。所以他觉得自己是山大的校友，名正言顺，决无攀龙附凤之嫌。

季羨林在文章中回忆说：

当时高中文科设在济南北园白鹤庄，清流环绕，绿柳成荫，风景绝佳。教员水平甚高，可以说是极一时之选。教历史和地理的是祁蕴璞老师，他勤奋好学，订有多份日文杂志，对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了若指掌。他除了上课外，还常作公开报告，讲解世界大势。国文教员是王崑玉老师，文章宗桐城派，个人有文集，但我只读过稿本，没有出版。教英文的老师姓刘，北大毕业生。我只记住了他的绰号，名字则忘记了。教数学的教师姓王，名字也不记得了。几位老师的学问和教学水平，都是极高的，名扬济南教育界。另外还有一位教经学的老师，姓名都已忘记，只记得他的绰号叫“大清国”。他的口头禅是：“你们民国，我们大清国。”绰号由此而来。但是他学问是有的，上课从来不带书。据说，《五经》、《四书》，连同注疏，他都背得滚瓜烂熟，甚至还能倒背，不知道有什么用处。这恐怕只是道听途说而已。

在这样十分优越的自然环境和教学环境中，我埋头苦干，扎扎实实地读了两年书，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28年，日寇

占领了济南，我被迫辍学一年。1929年，日寇撤走，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成立，我继续就读。这事与山大无关，我就不详细叙述了。从我成为山大校友以后漫长的75年中，山东大学同国内许多著名的大学一样，走过一条悠长而又曲折的道路。这条道路并不平坦，也并不笔直，有时布满了鲜花，五彩斑斓，光彩照人；有时却又长满了荆棘，黑云压城。校址也迁来迁去，有时在济南，有时又在青岛，最后终于定居在济南。在新中国建立前有一段时间，大概是在三十年代吧，山大当时还在青岛，许多全国著名的学者和作家在那里任教。许多人都认为，那是山大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或者高峰之一。无论中国或外国，一个大学不能永远处于高峰时期，一个系尤其显著，山大自然不能例外。从那以后，一直到现在，山大高峰迭出，现在已成为全国著名的高校之一了。

我虽然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学校，从国内到国外，都在教书，但是我决不敢承认自己是一个教育家。感性认识我是有的，却没有提高到理论的高度。根据我的观察和体会，一个大学，特别是一个系是否是处在高峰时期，关键全在于有没有名师。中国俗话说：“名师出高徒。”这话一点也没有错。学生年纪轻，可塑性强，影响他们最大的还是老师。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一个大学，一个系，不能永远处于高峰时期，关键也在于老师。我举一个最彰明昭著的例子。我的洋母校德国哥廷根大学的数学系，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因为出了几位世界级的数学大师，比如F·Klein、D·Hilbert等，名震全球，各国学子趋之若鹜，一时成了世界数学中心。这些大师一旦离开人世或退出教席，而后继者又不能算是大师，世界数学中心的地位立即转移。这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清华国学研究院，虽然只办了几年，但是毕业生几乎都成为名教授，原因也在于国学研究院有著名的四大导师。这个例子是众所周知的。

季羨林认为，山东大学在过去和现在都有大师级的学者，这是山东大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今天的山东大学最重要的原因。对一个人来

讲，100 年是高寿了。但是对一个大学来讲，同国外许多有几百年历史的大学比较起来，还只能算是一个小弟弟，有如初升的旭日将越来越发出耀眼的光芒，母校将会有光辉的前途。他这个做了 75 年校友的老校友，从内心深处向母校奉献出诚挚的祝福。

这都表达出他对自己的故乡、自己的母校的眷眷情深。

还乡时有快乐，思乡时也有快乐。

3. 燕园之爱

季羨林到老年以后，经常是既怀念家乡，也热爱燕园，两种感情经常交织在一起。

1989 年，他曾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我现在已经年近耄耋。住的朗润园是燕园胜地。夸大一点说，此地有茂林修竹，绿水环流，还有几座土山，点缀其间。风光无疑是绝妙的。前几年，我从庐山休养回来，一个同在庐山休养的老朋友来看我。他看到这样的风光，慨然说：“你住在这样的好地方，还到庐山去干什么呢！”可见朗润园给人印象之深。此地既然有山、有水、有树、有竹、有花、有鸟，每逢望夜，一轮当空，月光闪耀于碧波之上，上下空濛，一碧数顷，而且荷香远溢，宿鸟幽鸣，真不能不说是赏月胜地。荷塘月色的奇景，就在我的窗外。不管是谁来到这里，难道还能不顾而乐之吗？ [81]

1994 年，他又写道：

现在正是严冬。室内春意融融，窗外万里冰封。正对着窗子的那一棵玉兰树，现在枝干光秃秃的一点生气都没有。但是枯枝上长出的骨朵却象征着生命，蕴含着希望。花朵正蜷缩在骨朵内心里，春天一到，东风一吹，会立即能绽开白玉似的花。池塘里，眼前只有残留的枯叶在寒风中在冰层上摇曳。但是，我也知道，只等春天一到，坚冰

立即化为粼粼的春水。现在蜷缩在黑泥中的叶子和花朵，在春天和夏天里都会窜出水面。在春天里，“莲叶何田田”。到了夏天，“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那将是何等光华烂漫的景色啊。

[82]

1995年，他在汉城回北京的飞机上又写道：

我现在觉得，全世界我最爱的国家是中国；在中国我最爱的城市是北京；在北京我最爱的地方是燕园；在燕园我最爱的地方是我的家。什么叫我的家呢？一座最平常不过的楼房的底层，两个单元，房屋六间，大厅两个。前临荷塘，左傍小山。我离开时，虽已深秋，塘中荷叶，依然浓绿，秋风乍起，与水中的倒影共同摇摆。塘畔垂柳，依然烟笼一里堤。小山上黄栌尚未变红，而丰华月季，却名副其实，红艳怒放，胜于二月春花。刚离开几天，我用不着问：“来日倚窗前，寒梅著花未？”可我现在却怀念这些山水花木。

我那六间房子，决不豪华，也不宽敞。然而几乎间间都堆满了书，我坐拥书城，十分得意。然而也有烦恼。书已经多到无地可容，连阳台和对面房子里的厨房和大厅都已堆满，而且都达到了天花板。然而天天仍然是“不尽书潮滚滚来”。我现在怀念这些不会说话又似乎能对我说话的书。[83]

但面对自己在燕园的家，就是在最美好的良辰美景，他也仍然会想到故乡苇坑里那个平凡的小月亮。见月思乡，已经成为他经常的经历。思乡之病，说不上是苦是乐，其中有追忆，有惆怅，有留恋，有惋惜，流光如逝，时不再来。在微苦中，他实感到有甜美在，因为：

月是故乡明。我什么时候能够再看到我故乡里的月亮呀！我怅望南天，心飞向故里。[84]

不是尾声的尾声

1996年5月4日，上午10点，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北京大学电教中心，一楼大礼堂，一个历史性的地点。

在容纳四五百人的礼堂里，座无虚席，连左右两侧通道，主席台两侧，门口内外，最后一排后边的空场，都站满了人。

来宾中，有年过花甲的长者，有朝气蓬勃的青年，有中国人、韩国人、阿拉伯人、巴基斯坦人、印度人、日本人……，他们彼此不一定相识，但都不远千里，不远万里，来到了北大。

来宾们会说的语言，几乎囊括了亚洲和非洲的大多数语言，日本语、阿拉伯语、朝鲜话、蒙古语、乌尔都语、印地语、缅甸语、泰语、波斯语、越南语、印度尼西亚语、菲律宾语（他加禄语）、希伯来语，以及古代语言梵语、巴利语、于阗语、赫梯语、苏美尔语、亚述语和阿卡德语……，这些来宾包括专家、学者、教授，驻外大使、副部长、厅局长，也有青年学子。他们为了同一个目的，聚集到这里。

会场主席台上方，巨大的红色会标上，等线体的白色大字异常醒目：

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建系五十周年

季羨林教授执教五十周年庆祝大会

是的，他们回到北京大学全是为了她和他。她——东方学系从1946年创立到1996年，已整整五十年，他——季羨林从1946年开始，在北京大学执教也是五十年。没有他，也就没有她。人们赶来庆祝东方学系五十周年华诞，也完全是为庆祝季羨林执教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人们清楚，东方学系永远和季羨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从1946年起，季羨林在胡适、汤用彤、傅斯年和陈寅恪等先生的支持下创办东语系，五十年里，他从未离开过这个他苦心经营的系，光是担任系主任，就长达三四十年，创系主任任职时间之最。1987年，东方语言文学系以系所合一的形式成立了东方文化研究所，1992年，改名为东方学系，使系所合一的学科领域变得更为广阔，运行机制有了更高的灵活性和巨大的发展潜力，能较全面地适应

我国的体制改革和东方各国竞相建设的新兴文化环境，从而能在充满挑战和机遇的世纪之交，更充分地发挥学科专长，从而在教育领域和学术领域里大展宏图。

这个系从创始到此时，已培养出五千多名毕业生，从外交部部长、中联部副部长、驻外大使，到专家、教授、学者，高层次、高水平人士层出不穷，东方学系培养人才功绩卓著，季羨林桃李满天下。

国际友人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和其他著名人士，或发来贺电，或莅临大会，表达他们对中国这位学界泰斗的敬仰之情。

而东方学系培养出来的学生，则把自己的感情浓缩在由阿拉伯语毕业生沈富腾先生送来的一幅对联上：

半世纪耕耘 广栽桃李功在园丁

五十年培育 辈出栋梁根系苗圃

他们在歌颂着八十五岁高龄的季羨林老师，虽至耄耋之年，仍在“传灯不息”。他们在这里聚首，更加感到摆脱“西方中心”影响，唤醒东方意识的使命感。

眼看着自己的数百名学生，季羨林哭了。“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的世纪，从这群学生身上，他似乎看到了东方的朝阳正升腾在21世纪的天空。他看到了希望。

五年以后的2001年5月16日至18日，以“东方文学与东方文化——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展望”为主题的东方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于在北京大学召开。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由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和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主办，大会名誉主席和主席分别由先生和北京大学副校长何芳川教授担任。

5月16日上午10时，庆贺季羨林教授九十华诞暨从事东方学研究六十六周年学术成果展开始在图书馆204北大文库举行。季羨林在戴龙基等馆领导的陪同下，参观“庆贺季羨林教授九十华诞暨从事东方学研究六十六周年学术成果展”，平日仰慕季老的北大学子纷纷请季老签名，与季老合影，和蔼可亲的季老与学子们沉浸在欢乐之中。

整个展览展览内容丰富，收集了季老各个时期 160 多幅珍贵的照片，从德国求学到燕园执教，从意气风发到沧桑历尽……除照片外，还展出了季老 1934 年在清华大学的毕业证书、1941 年德国哥廷根大学的毕业证书、1948 年聘请季老为文学院教授的聘书……季老著作 114 部、主编著作 298 部、有季老文章的著作 92 部。正是季老一生的自强不息孕育着他深厚的学术底蕴和研究精神。季老突出的学术贡献为他赢得了数之不尽的荣誉，北京市获奖证书、国家图书奖……书架上让人目不暇接的各种获奖证书刻下了季老学术生涯中一座座丰碑，自然成了展览中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在留言本上，参观者们写下了对这位高龄老人生日衷心的祝福。师生们的心声正如一位光华同学所写的那样：“您代表了北大的博大精深，谢谢您季老！”参观展览的还有教育部副部长韦钰，北大名誉博士香港著名爱国人士石景宜先生，原图书馆馆长林被甸教授等。

5 月 17 日下午，在北大学术交流中心隆重举办“庆祝季羨林教授 90 华诞暨从事东方学研究 66 周年大会”。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石孙、雷洁琼、罗豪才，外交部部长、原北大东语系毕业生唐家璇、著名科学家李政道等分别发来热情洋溢的贺信，韩国社会科学院理事长金俊烨也发来贺信。外交部副部长李肇星、教育部副部长韦钰、统战部副部长刘延东等到会致辞，充分肯定季老在东方学领域的巨大贡献，并衷心祝愿季老健康长寿。到会祝贺的尚有德国、印度、伊朗等国家的驻华大使。

此后陆续收到贺寿对联，其中钟敬文拟词，启功手书的对联是：

羨林教授九十华诞

珠玉千篇学子同沾光泽

泰嵩一老人寰共仰嵯峨

张中行的贺联是：

行百里者半九十

颂大业人皆万岁

饶宗颐的贺联是：

物外笑谈无畛域

雨余泉石长精神

范曾夫妇应邀前往祝寿，范曾特撰一幅寿联如下：

群星以北斗为尊，万里蒙麻曾贺米；

学界持南山作寿，千秋有幸待烹茶。

王元化写出《季羨林教授九十寿序》说：季羨林平生力行乃师陈寅恪之言，以东方语文学之新材料、新工具，精研西域佛教文史之新问题。述作等身，河润千里，传音振响，布教八方，自王（国维）陈（寅恪）一还，于东方学用意之专愿，力之大，成就之卓绝，未有如先生者。先生外坦荡而内纯正，于新旧学皆有真情……

白化文写出骈文《九十寿序》，中国书店副总经理吴凤祥取去，请书店里的书法家用金色墨汁书写在大红洒金纸上，裱成六扇屏，请季先生来书店作客，恭敬地将寿屏献上。

现在住在 301 医院里的季羨林，在白寿之年仍然精神抖擞，他已经完全进入大化之境……

2009 年 7 月 11 日上午 9 时，季羨林先生在北京 301 医院辞世，享年 98 岁。

附录 季羨林先生著译作目录

◎专著、译作

《论梵文 *td* 的音译》（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

《马克思论印度》（人民出版社，1951）

《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西格斯著，季羨林译，作家出版社，1955）

《沙恭达罗》（迦梨陀娑著，季羨林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57）
- 《印度简史》（1957）
- 《1857—59 年印度民族起义》（人民出版社，1958）
- 《五卷书》（季羨林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 《优哩婆湿》（迦梨陀娑著，季羨林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 《罗摩衍那初探》（季羨林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79）
- 《罗摩衍那》（全七卷，共八册，蚁垤著，季羨林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1984）
- 《天竺心影》（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
- 《朗润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 《中印文化关系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
- 《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 《印度文学研究集刊》（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节录佛教相关部分/中外佛教交通史料汇编》（季羨林著，张星烺编，台湾弥勒出版社，1984）
- 《印度两大史诗评论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 《大唐西域记校注》（玄奘、辩机原著，季羨林等校注，中华书局，1985）
- 《大唐西域记今译》（季羨林、张广达、李铮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 《家庭中的泰戈尔》（黛维著，季羨林译，漓江出版社，1985）
- 《季羨林散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 《东方文化知识讲座》（黄山书社，1989）
- 《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
- 《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 《季羨林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

- 《中印文化交流史》（新华出版社，1991）
- 《季羨林序跋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 《万泉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
- 《季羨林小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 《留德十年》（东方出版社，1992）
- 《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台湾新文丰出版社，1993）
- 《季羨林留德回忆录》（中华书局，1993）
- 《东方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 《季羨林论印度文化》（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
- 《我与中国 20 世纪》（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 《沙恭达罗》（迦梨陀娑著，季羨林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
- 《炉火情：泰戈尔谈话录》（黛维著，季羨林译，漓江出版社，1995）
- 《季羨林佛教学术论文集》（台湾东初出版社，1995）
- 《季羨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 《季羨林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 《人生絮语》（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 《梵文基础读本：语法课文词汇》（施滕茨勒著，季羨林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 《赋得永久的悔》（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
- 《怀旧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延边大学出版社，1996）
- 《禅与东方文化》（商务印书馆，1996）
- 《季羨林文集》（1）（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
- 《季羨林文集》（2）（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
- 《季羨林文集》（3 印度古代语言）（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
- 《季羨林文集》（4）（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

- 《季羨林文集》（5）（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
- 《季羨林文集》（6）（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
- 《季羨林文集》（7 佛教）（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
- 《季羨林文集》（8）（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
- 《季羨林文集》（9 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
- 《季羨林文集》（10 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
- 《季羨林文集》（11 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
- 《季羨林文集》（12 吐火罗文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
- 《季羨林文集》（13 序跋杂文及其他〈一〉）（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
- 《季羨林文集》（14 序跋杂文及其他〈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
- 《季羨林文集》（15 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翻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
- 《季羨林文集》（16）（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
- 《季羨林文集》（17 罗摩衍那〈一〉）（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
- 《季羨林文集》（18 罗摩衍那〈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
- 《季羨林文集》（19 罗摩衍那〈三〉）（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
- 《季羨林文集》（20 罗摩衍那〈四〉）（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
- 《季羨林文集》（21 罗摩衍那〈五〉）（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
- 《季羨林文集》（22 罗摩衍那〈六〉）（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6)

《季羨林文集》（23 罗摩衍那〈七〉）（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6)

《季羨林文集》（24 罗摩衍那〈八〉）（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6)

《东西文化议论集》（上）（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东西文化议论集》（下）（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外国糖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中国历代书画艺术论著丛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朗润琐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我和书》（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

《牛棚杂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季羨林选集》（香港文学研究社，1998）

《名家荐书》（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

《梦萦未名湖》（新世纪出版社，1998）

《季羨林散文全编》（前四卷）（邓九平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清塘荷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

《论世文聚》（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

《世纪老人的话（季羨林卷）》（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

《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季羨林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春归燕园》（吉林摄影出版社，2000）

《汉语与外语》（语文出版社，2000）

《漫谈人生》（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缀玉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

《世态炎凉》（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

- 《东西漫步》（中国旅游出版社，2000）
- 《季羨林人生漫笔》（同心出版社，2000）
- 《旅德追忆：二十世纪几代中国留德学者回忆录》（商务印书馆，2000）
- 《朗润园随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季羨林与名人》（群众出版社，2001）
- 《季羨林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乐黛云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学海泛槎：季羨林自述》（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
- 《季羨林散文全编》（五）（邓九平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 《大学往事：一个世纪的追忆》（昆仑出版社，2002）
- 《我的求学之路》（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 《清华园日记》（辽宁美术出版社，2002）
- 《季羨林语要：修身与治学》（沈阳出版社，2003）
- 《季羨林散文全编》（六册）（邓九平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
- 《火焰山下》（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
- 《畅谈东方智慧：季羨林、蒋忠新与池田大作鼎谈集》（季羨林、蒋忠新、池田大作著，香港商务印书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 《清塘荷韵》（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
- 《留德十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 《德国印象》（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当代散文大家精品文库·季羨林卷》（作家出版社，2005）
- 《皓首学术随笔：季羨林卷》（中华书局，2006）
- 《病榻杂记》（新世纪出版社，2007）
- 《佛教十五题》（中华书局，2007）

- 《季羨林说国学》（京华出版社，2007）
- 《另一种回忆录》（作家出版社，2006）
- 《学问人生》（山东友谊出版社，2006）
- 《世纪之约——先生季羨林》（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 《季羨林学术精粹第一卷》（中国思想与跨文化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06）
- 《季羨林学术精粹第二卷》（佛教与语言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06）
- 《季羨林学术精粹第三卷》（中外文化交流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06）
- 《季羨林学术精粹第四卷》（比较文学与文化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06）
- 《禅与文化》（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 《季羨林论中印文化交流》（新世界出版社，2006）
- 《季羨林论佛教》（华艺出版社，2006）
-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 《季羨林谈写作》（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 《季羨林谈佛》（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 《季羨林谈人生》（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 《季羨林谈师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 《季羨林谈读书治学》（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 《季羨林谈写作》（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 《季羨林谈翻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 《季羨林谈师友》（香港三联书店，2006）
- 《季羨林谈人生》（香港三联书店，2006）
- 《季羨林谈读书治学》（香港三联书店，2006）
- 《季羨林谈佛》（香港三联书店，2006）
- 《我的人生感悟》（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

《此情犹思：季羨林回忆文集》（全5卷，哈尔滨出版社，2005）

《季羨林说写作》（中国书店，2007）

《季羨林说国学》（中国书店，2007）

《季羨林说和谐人生》（中国书店，2007）

《季羨林说自己——镜头人生》（中国书店，2007）

《生命沉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

《季羨林序跋集》（新世界出版社，2008）

《旅德追忆 二十世纪几代中国留德学者回忆录》 季羨林等著（商务印书馆，2000）

《思想者说 当代散文随笔名家名篇》 季羨林等著（青岛出版社，2002）

《思想者说Ⅱ命运》 季羨林等著 桂苓，刘琅编（青岛出版社，2005）

《思想者说Ⅱ感动》 季羨林等著 桂苓，刘琅编 青岛出版社，2005）

《思想者说Ⅱ往事》 季羨林等著（青岛出版社，2005）

《外语教育往事谈 教授们的回忆》 季羨林等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

《大学往事 一个世纪的追忆》 季羨林等著（昆仑出版社，2002）

《思想者说》（上、下两册） 桂苓，刘琅编（青岛出版社，2002）

《季羨林人生小品》（花山文艺出版社，2001）

《书斋杂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

《东西漫步》（中国旅游出版社，2000）

《季羨林学术精粹第一卷》（中国思想与跨文化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06）

《季羨林学术精粹第三卷》（中外文化交流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06）

《季羨林学术精粹第二卷》（佛教与语言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06）

《季羨林学术精粹第四卷》（比较文学与文化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06）

《季羨林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我的人生感悟》（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

《季羨林语要》（沈阳出版社，2003）

《天竺心影》（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

《季羨林论佛教》（华艺出版社，2006）

《季羨林人生漫笔》（同心出版社，2000）

《夜光杯文丛—人生漫谈》（文汇出版社，2007）

《印度的罗摩故事与东南亚文学》（昆仑出版社，2007）

《阅尽沧桑》（中国盲文出版社，2006）

《故乡明月》（中国盲文出版社，2006）

《论范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中国社会年报 2006》（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

《中国政治年报 2006》（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

《中国经济年报 2006》（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

《中国文化年报 2006》（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

《季羨林回忆文集（第壹卷）》（哈尔滨出版社，2006）

《季羨林回忆文集（第贰卷）》（哈尔滨出版社，2006）

《季羨林回忆文集（第叁卷）》（哈尔滨出版社，2006）

《季羨林回忆文集（第肆卷）》（哈尔滨出版社，2006）

《季羨林回忆文集（第伍卷）》（哈尔滨出版社，2006）

《赋得永久的悔》（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

《皓首学术随笔 季羨林卷》（中华书局，2006）

- 《另一种回忆录》（作家出版社，2006）
- 《我的人生感悟》（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
- 《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 《长江流域出土简牍与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 《季羨林论中印文化交流》（新世界出版社，2006）
- 《此情犹思：遥念师友 情系故土》（哈尔滨出版社，2006）
- 《此情犹思：游历天下 老有所悟》（哈尔滨出版社，2006）
- 《此情犹思：耄耋抒怀 学海探珠》（哈尔滨出版社，2006）
- 《此情犹思：汗洒北大 感愤“文革”》（哈尔滨出版社，2006）
- 《草堂怀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季羨林名篇佳作》（东方出版社，2005）
- 《二月兰》（作家出版社，2005）
- 《书山屐痕：季羨林自选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 《朗润思语》（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
- 《德国印象》（华中师大出版社，2005）
- 《清塘荷韵》（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
- 《季羨林文丛——学问之道》（沈阳出版社，2002）
- 《季羨林文丛——耄耋新作》（沈阳出版社，2002）
- 《季羨林文丛——感悟人生》（沈阳出版社，2002）
- 《季羨林文丛——散文精粹》（沈阳出版社，2002）
- 《季羨林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 《东方赤子·大家丛书（季羨林卷）》（王彬，雪步主编 季羨林著）（华文出版社，1998）
- 《季羨林文集 24 卷》（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再版重印）
- 《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9 卷 2006）》季羨林，饶宗颐著（中华书局，2006）
- 《当代中国名家线装自选集（季羨林卷）》（一函一册）（线装

书局，2007）

《东西漫步/学人游记丛书》季羨林著（中国旅游出版社，2000）

《风风雨雨一百年——季羨林自选集》（第一辑）（由华艺出版社推出）

《季羨林自选集——佛》

《季羨林自选集——谈国学》

《季羨林自选集——谈人生》

《红》

《一生的远行》

《牛棚杂忆》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赋得永久的悔》

《悼·念·忆——另一种回忆录》

《读书·治学·写作》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风风雨雨一百年》

《季羨林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4月）

《真话能走多远》（新星出版社，2008年6月）

《季羨林谈公德》（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1月）

《一辈子的承诺》（中国妇女出版社，2008年1月）

《季羨林全集》1—4卷（外研社，2009年8月）

◎主编

《印度民间故事集》（第一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

《东方文学作品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中外文学书目答问》（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

《简明东方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东方文化史话》（黄山书社，1987）

- 《印度古代诗选》（季羨林、刘安武选编，漓江出版社，1987）
- 《东方短篇小说选》（季羨林、刘安武编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
- 《东方文学名著题解》（季羨林、刘安武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
- 《南亚东南亚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 《印度古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 《东方文学辞典》（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
- 《我与中国 20 世纪》（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 《东方文学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
- 《传世藏书》（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
- 《世界文化史知识：插图本》（1—10）（辽宁大学出版社，1996）
- 《泰戈尔名作欣赏》（季羨林、周志宽主编，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
- 《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
- 《书苑雅奏》（钟敬文、季羨林、邓九平主编，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
- 《书人心语》（邓九平、钟敬文、季羨林主编，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
- 《天文知识丛书》（全套 20 册） 季羨林总主编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包括：
- 《天文知识丛书：千里眼与顺风耳 天文观测的方法》
- 《天文知识丛书：太阳大家族——太阳系》
- 《天文知识丛书：无处不在的朋友——时间》
- 《天文知识丛书：太阳的兄弟们——恒星》
- 《天文知识丛书：人类历史的时间表——历法》
- 《天文知识丛书：难解千古之谜——宇宙的一生》

《天文知识丛书：茫茫宇宙觅知音——寻找外星人》
《天文知识丛书：老树新枝——天文学的起源与发展》
《天文知识丛书：星空航海图——天文与航海》
《天文知识丛书：星空的联想——神话与传说》
《天文知识丛书：太阳系的侏儒——小行星》
《天文知识丛书：怎样自制天文望远镜》
《天文知识丛书：地球近邻的故事——月球与日月食》
《天文知识丛书：生命的源泉——太阳》
《天文知识丛书：太阳系里的游荡者——慧星》
《天文知识丛书：星空显微镜——天文台与天文馆》
《天文知识丛书：星星也有宿舍——星座》
《天文知识丛书：人类的家园——地球》
《天文知识丛书：不可思议的天体——黑洞》
《天文知识丛书：地球的史弟姐妹们——行星》

《航空航天知识丛书》（全 24 册） 季羨林总主编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包括：

《导弹》
《人造卫星原理》
《衣食住行在太空》
《太阳系中的旅行》
《运载火箭》
《中国火箭与卫星》
《航天史话》
《空间站》
《民航与民用飞机》
《天之骄子——宇航员》
《中外军用飞机（上）》
《中外军用飞机（下）》

《直升机》

《航空史话》

《应用卫星大观（上）》

《应用卫星大观（下）》

《航空模型的原理与制作（上）》

《航空模型的原理与制作（下）》

《踏上月球》

《水上飞机》

《航空趣话》

《飞行的科学》

《航天飞机》

《你能当飞行员吗》

中华万有文库：

《中小学生医学知识（科普卷）——人类文明的卫士：中医》
季羨林总主编（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中小学生医学知识（科普卷）——你也能成为医生：疾病的自我预测与自我诊断技艺》 季羨林总主编（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中小学生医学知识（科普卷）——自然治病小绝招：中国自然疗法》 季羨林总主编（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中小学生医学知识（科普卷）——做个小药师：用药常识》
季羨林总主编（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中小学生医学知识（科普卷）——给你青春的信心与魅力：青少年保健》 季羨林总主编（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中小学生医学知识（科普卷）——花鸟虫鱼皆是药：你身边的药》 季羨林总主编（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中小学生医学知识（科普卷）-靓丽青春：医学美容》 季羨林总主编（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中小学生医学知识（科普卷）——揭开神秘的面纱：针灸一瞥》 季羨林总主编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先秦两汉—近代文学研究）季羨林名誉主编、张燕谨，吕薇芬主编 （北京出版社，2001）

《枝蔓丛丛的回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

《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

《没有情节的故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

《汤姆叔叔的小屋（双色印刷）》（美）斯托夫人 （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

《飘（上下，双色印刷）》（美）米切尔 （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

《马丁·伊登（双色印刷）》（美）杰克·伦敦（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

《理智与情感（双色印刷）》（美）简·奥斯丁（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

《珍妮姑娘（双色印刷）》（美）德莱塞（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

《红字（双色印刷）》（美）霍桑 （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

《嘉莉妹妹（双色印刷）》（美）德莱塞（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

《雾都孤儿（双色印刷）》（英）狄更斯 （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

《双城记（双色印刷）》（英）狄更斯（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

《格列佛游记（双色印刷）》（英）斯威夫特 （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

《苔丝（双色印刷）》（英）哈代 （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

《简·爱（双色印刷）》（英）夏洛蒂·勃朗特 （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

版社，2005）

《傲慢与偏见（双色印刷）》（英）简·奥斯丁（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

《爱玛（双色印刷）》（英）简·奥斯丁（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

《复活（双色印刷）》（俄）列夫·托尔斯泰（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

《笑面人（双色印刷）》（法）雨果（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

《悲惨世界（上下，双色印刷）》（法）雨果（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

《忏悔录（双色印刷）》（法）卢梭（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

《伊索寓言（双色印刷）》（古希腊）伊索（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

《猎人笔记（双色印刷）》（俄）屠格涅夫（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

《名人传（双色印刷）》（法）罗曼·罗兰（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

《普希金诗选（双色印刷）》（俄）普希金（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双色印刷）》（奥）茨威格（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

《呼啸山庄（双色印刷）》（英）艾米莉·勃朗特（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

《巴黎圣母院（双色印刷）》（法）雨果（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

《三个火枪手（双色印刷）》（法）大仲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

《鲁滨逊漂流记（双色印刷）》（英）笛福（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5)

《圣经的故事（双色印刷）》段琦编著（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5)

《安娜·卡列尼娜（上下，双色印刷）》（俄）列夫·托尔斯泰
（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

《格林童话（双色印刷）》（德）雅各布·格林 威廉·格林
（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

《浮士德（双色印刷）》（德）歌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

《十日谈（双色印刷）》（意）薄伽丘（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5)

《了不起的盖茨比（双色印刷）》（美）菲茨杰拉德（中国书籍
出版社，2005）

《母亲（双色印刷）》（俄）高尔基（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

《汤姆·索亚历险记（双色印刷）》（美）马克·吐温（中国书
籍出版社，2005）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双色印刷）》（俄）契诃夫（中国书籍
出版社，2005）

《死魂灵（双色印刷）》（俄）果戈理（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5)

《金银岛 化身博士（双色印刷）》（英）斯蒂文森（中国书籍
出版社，2005）

《茵梦湖（双色印刷）》（德）施托姆（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5)

《小妇人（双色印刷）》（美）奥尔科特（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5)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双色印刷）》（美）马克·吐温（中
国书籍出版社，2005）

《包法利夫人（双色印刷）》（法）福楼拜（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5)

《娜娜（双色印刷）》（法）左拉·（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

《马丁·伊登（双色印刷）》（美）杰克·伦敦（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

《前夜 父与子（双色印刷）》（俄）屠洛涅夫（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双色印刷）》（苏）尼·奥斯特洛夫斯基（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

《四库家藏（全 150 册）》（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编：

《道教与长江文化》季羨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

《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6 卷 2002）》季羨林等编（中华书局，2002）

《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7 卷 2004）》季羨林等编（中华书局，2004）

《道家与长江文化》季羨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

《长江文化生态》季羨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

《大美为美（余光中散文精选）》当代中国散文八大家季羨林编（海天出版社，2001）

《历史的背面（贾植芳自选集）》（世纪学人文丛）季羨林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艺术词典》（季羨林顾问）（学苑出版社，1999）

《中华国学智库》（16 开 高档礼品装）（全十二卷）（线装书局，2008 传世珍藏版）季羨林 任继愈 文怀沙 汤一介

《胡适全集》（季羨林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年）

◎主要发表文章

一、论文

东方语文范围内的科学研究问题（《科学通报》1954 年 5 期）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7年1期）

再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兼评美国梵文学者弗兰克林·爱哲顿的方法论（1958年4月4日写毕，原载《语言研究》1958年1期）

五四运动后四十年来中国关于亚非各国文学的介绍和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9年2期）

对于新诗的一些看法（《文学评论》1959年3期）

必须用汉语拼音字母的读法来读（《语文建设》1961年2期）

古代印度的文化（《历史教学》1962年10期）

关于《大唐西域记》（《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4期）

新疆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1年1期）

论《五卷书》（《国外文学》1981年2期）

泰戈尔的生平、思想和创作（《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2期）

蔗糖的制造在中国始于何时（《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3期）

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民族语文》1982年4期）

中世印度雅利安语二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3期）

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外国语》1984年5期）

三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4年2月12日写毕，原载《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月）

原始社会风俗残余——关于妓女祷雨的问题（《世界历史》1985年10期）

论东方文学——《简明东方文学史》绪论（《国外文学》1986年4期）

cīnī问题——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4期）

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提婆达多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4期）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5期）

印度文化特征（《电影艺术》1988年8期）

关于神韵（《文艺研究》1989年1期）

梵语（《外语教学与研究》1989年2期）

吐火罗语（《外语教学与研究》1989年2期）

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3期）

《梨俱吠陀》几首哲学赞歌新解（《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4期）

吐火罗文A（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与中国戏剧发展之关系（《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1期）

新疆古代民族语言中语尾——am>u 的现象（《中国文化》1991年1期）

吐火罗文和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性质浅议（《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2期）

再谈东西文化（《哲学动态》1991年7期）

东方文化与东方文学（《文艺争鸣》1992年4期）

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文艺理论研究》1992年4期）

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中国文化》1994年1期）

抽象理想之至境（《中国图书评论》1994年4期）

蔗糖在明末清中期中外贸易中的地位——读《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札记（《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1期）

白糖问题（《历史研究》1995年1期）

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回顾（《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5 年 3 期)

西方不亮，东方亮——季羨林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的演讲
(《中国文化研究》1995 年 4 期)

“天人合一”新解(《中国气功科学》1996 年 4 期)

清代的甘蔗种植和制糖术(《文史哲》1996 年 4 期)

新疆的甘蔗种植和沙糖应用(《文物》1998 年 2 期)

谈文学中的“多余的人”(《昌潍师专学报》1998 年 6 期)

弥勒信仰在新疆的传布(《文史哲》2001 年 1 期)

佛教传入龟兹和焉耆的道路和时间(《社会科学战线》2001 年 2 期)

华夏天竺兼爱尚同——关于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关系的对话(季羨林、郁龙余，《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 年 4 期)

丝绸之路与西行行记考(《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年 6 期)

东学西渐与“东化”(《光明日报》2004 年 12 月 23 日)

鸠摩罗什时代及其前后龟兹和焉耆两地的佛教信仰(《孔子研究》2005 年 6 期)

玄奘时代及其后两地的佛教信仰(《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 4 期)

后记

季羨林先生是国内外公认的学界泰斗，为这样一个大学问家写传，实在是顾虑重重，困难重重。他兼容百家，学贯中外，学富五车，涉及广泛，不易窥其堂奥，这是难点之一；他既博且专，既精且深，所通梵巴语、吐火罗语，均属国内绝学，甚至世界绝学，难见其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这是难点之二；他感情细腻，内涵丰富，见多识广，阅历很深，却又不显露在外，有铁皮暖瓶之称，外皮虽冷，内

心实热，不易探知其精神世界，这是难点之三；他虽已至耄耋之年，但老骥伏枥，日理万机，珍惜时间，治学时间以秒计，不好轻易打扰造访，问这问那，这是难点之四；他记忆力特强，四五十年前，甚至六七十年前的一个眼神，一个手势，至今记忆犹新，召之即来，显现在眼前、耳旁，如见其形，如闻其声，移到纸上，即成文章，先生文章长的达十几万字，短的几百字，著作合计超过一千多万字，吃透这些著作的精神，谈何容易，这是难点之五；本人虽忝列北大学子，为先生三千弟子之一，但绝非七十二贤，更非及门和登堂入室之辈，小子何德何知，敢写先生？加之毕业后又不在先生身边工作，对先生不能周知，这是难点之六；……既如此，为何还敢挑选这样一个大难题，岂非自不量力？

但先生是山东人，我也是山东人；先生是山大学子，我也是山大学子；先生是北大教授，我是北大学生。先生的一切成就，都让我感到骄傲，感到自豪，也为山东人、中国人所骄傲、所自豪，他是我们的国宝。但他宝在何处，为何要为他骄傲，为何要为他自豪，却是许多人并未详知的。我从1984年看到杨匡满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为了下一个早晨》的长文，深为先生的伟大人格力量所激励，所折服。1995年，我在为《文史哲》撰写《学贯中外的季羨林先生》一文时，便自然地产生了为先生写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先生的想法。此想法首先得到我的妻子刘宗贤和孩子们的大力支持，又得到诸位师友的大力支持，之后是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先生清华毕业后到济南高中应聘，“你敢请，我就敢教”的精神，鼓舞了我，坚定了我的信心。这样，便开始濡墨动笔。在写作过程中，我几进北京，得到先生本人、仲跻昆教授、李铮先生和东方学系诸位老师的大力帮助。动笔写起来之后，更感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欲罢不能”了。终于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完成了这部书稿，“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已”。深知拙笔不能完整地写好先生，便想起过去法兰克福学派杰出思想家本雅明，曾称

他自己的最大野心，是用引文构成一部伟大著作。他没有做成这件事，但这种想法却给我以启迪，我就试着用先生的引文构成这部传记，不能直接引用的，则化而用之，在没有先生原作的时候，我才自己说些话，以期不歪曲先生的原意，能更准确地、更完整地反映先生的原貌。这种做法，是耶？非耶？尚待先生和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臧克家老在住院期间，得知我要写《季羨林传》的消息，经臧乐源先生联系，臧老在出院之后，立即欣然为本书题签，又有饶宗颐先生拨冗为本书赐序，为拙笔增色不少。为季先生作助手达四十年的李铮先生所编季羨林年谱和季羨林著译目录，免去本人不少烦劳，一并致谢。

1997年8月19日

于济南东八里洼神凝斋

修订版后记

《季羨林传》出版以来，受到学术界和舆论界的重视，读者也给予肯定。许多读者反映，书店里已买不到书，与原出版单位联系，得知原出版单位已经撤消。为应读者需要，修订版交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修订版保持了原作的基本框架和结构，只是作了一些增删和改正错讹的工作。季羨林先生原助手李铮先生在原作出版后，以他特有的敏锐，纠正了一些错误。极为惋惜的是，他已于1998年10月不幸去世，他已看不到修订版的出版。我只有勉力从事，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作者

2000年6月6日

济南东八里洼神凝斋

陕西师大出版社 2009 年版后记

《季羨林传》和人民出版社的出版合同到 2005 年就到期了，而市场上现在已经很难买到此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愿意出版，我非常感谢。因为时间的关系，只更正了一些明显的错误，也作了一点重要的补充。

作者

2009 年 6 月 28 日

记于美国达拉斯